

房山革命史概要

宋成明

房山区位于京郊的西南部,距北京城 50 公里,面积 2019 平方公里,人口 72 万,地处太行山余脉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北邻门头沟区,东和东北邻丰台区及大兴县,南邻河北省涿州市,西和西北与河北省涞水县接壤。全区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东南部为平原,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区面积的 2/3。全区较大的山峰有百花山、大安山、大房山、白草畔等。境内大小河流 3 条,自西北流向东南,有拒马河、大石河、小清河等。山势巍峨险峻,河流蜿蜒湍急,山水交融。全区景色秀丽,沃野坦荡,物产丰富,农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

房山区历史悠久。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距今房山县城 10 余里的周口店龙骨山猿人遗址就有北京猿人繁衍、生息;金为万宁县,至元 27 年更名为房山县,属大都路涿州;明清属顺天府涿州;1914 年改属京兆地方,1928 年改隶河北省,几经变迁。建国后的 1958 年 4 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为北京市周口店区;1960 年 1 月正式定名为房山县;1987 年 2 月撤销房山县、燕山区,建立房山区。

房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前,房山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开始以良乡为主,后来遍及整个房山。河套沟人民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煤炭资源,上下 27 个村的村民联合起来,掀起阻路(德国人设计和投资架设的口儿村至坨里高线)风潮,斗争持续了 10 多年;北窖村农民组织穷人党向地主豪绅抢粮,给封建地主沉重打击。就在贫苦农民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斗争时,卢沟桥抗日的炮声响了,房山人民投入了抗日战争。

抗日烽火燃遍房山大地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 月 26 日,小股日军就已经在良乡东关及附近的梅花庄、苏庄一带烧、杀、抢、掠。9 月 16 日,日军占领房山县城。

从日军侵入良乡、房山地区起,到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就杀害无辜百姓 800 多人,烧毁房屋 700 多间,制造了二站、太和庄等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施行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唤起了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反抗。当时比较大的抗日地方武装有这样几支:房山五区南窖、大安山一带自卫团,是在原国民党五区保卫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总谢景波,发展到 60 多人。四区河北、河南一带自卫团,是在原国民党四区乡维持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首殷耀东,发展到 200 多人。九区联庄会,是霞云岭、堂上、宝水、四马台、下石堡等八个村长联席会上决定组织的自卫团,团民 200 余人(该团由于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坏人把持,曾几次与八路军作对,后来被八路军击溃)。十渡、蒲洼的“六善会”,司令晋汉臣,发展到上千人,后来被编为八路军挺进军九团三营。此外,还有平原葫芦堡一带的十八村联庄会,八十亩地村的红枪会,洪寺村的“抗日复仇军”,西庄村的“杂牌军”等。

1937 年 11 月,陈东来召集各股地方武装首领郭志和、周文龙、胡振海、白秀亭等 16 人在涞水县石亭村插香结盟,成立了“抗日同盟军”,陈东来任总司令,下设副总司令、参谋长、军需、秘书等,分为十路

军，合计近万人，号称十万大军。其中有三路在房山地区活动。一路军活动在长沟、窦店一带，司令周文龙，有 3000 多人。二路军活动在张坊、南尚乐一带，司令白秀亭，有 1000 多人。三路军活动在周口店、娄子水一带，司令胡振海，有 5000 多人。其他各路军也都活动在房涞涿边界地带。

当时自发兴起的的地方武装，兴起得快，溃散得也快。较大的武装有的后来被八路军改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有的投靠日本，编为日伪保安团，有的内部闹纠纷，自动解散；也有的被日军打散。各自情况不同，结局不一。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8 年 2 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独立师政委邓华率三团（后改为六支队）挺进平西，征服了地主武装的反抗，根据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3 月 20 日在涞水县马水村建立了中共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工委和联合县政府，工委书记杨春甫，县长刘慎之，游击大队长包森。当时辖区有涞水县七区板城一带，涿县六区三坡一带，房山五区南窖和房山八区芦子水、东村一带。3 月底，联合县工委派包森到房山五区开辟工作。

包森来到南窖村，以房山五区为基地向周围开展抗日工作。后来包森挺进冀东，1938 年 4 月，晋察冀军区派五支队到平西接防，根据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从部队抽调得力干部到地方建党建政建军。5 月初，五支队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到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筹建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的工作。5 月 5 日在长操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郭方任主任。5 月 8 日成立了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杜伯华任县长。1938 年 6 月，由赵然和于进琛在上石堡村建立了中共在房山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积极开展了反资敌等抗日活动。同年 11 月，中共房良联合县委在下石堡村成立，县委书记郭强。从此房良抗日根据地在各村开始建立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房良县委和县政府建立后，认真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使房良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

团结一致 艰苦抗日

1940 年 8 月八路军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采取了“总力战”和“囚笼政策”。“总力战”就是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经济封锁、文化腐蚀等一起上。敌人在军事上频繁进攻，三天一轰炸，两天一扫荡，在 1940 年至 1941 年的两年中，较大规模的进攻就有 20 多次。在十渡根据地，敌人大肆地烧、杀、抢，在接近平原的经济发达区，敌人严加封锁和不择手段地掠夺，利用伪组织在政治上实行麻醉教育，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在霞云岭、长操山区一带，敌人利用少数干部政治上不坚定，进行收买和诱骗，房良县一区事变就是在这种严峻情况下发生的。“囚笼政策”就是挖封锁沟，建碉堡，立据点，设封锁卡等等，把抗日根据地围困起来。1941 年夏季日军在房山至涞水挖封锁沟长达 35 公里，动土约 100 多万方；沿抗日根据地边缘增修塔照、张坊、北窖、半壁店、天开、周口店等 10 多个据点；抢修了红煤厂至大安山、班各庄至水峪、长沟至塔照三条公路。从 1941 年 3 月开始，日军在其占领区实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化伪军，强化伪政权，妄图实现剿灭根据地的狂妄野心。1941 年 6 月，由于根据地缩小，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成立房涞涿联合县，县委书记杨流萤。

1942 年日军制订了“经济封锁要领”，房山、良乡、宛平等县联合行动，沿昌宛房和房涞涿根据地边缘，北从杜家庄、东西斋堂，经大安山、长操、南窖，南到周口店、孤山口、张坊等十几个据点，连结成半圆形的“封锁线”，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敌人将物资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为兵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绝对禁止流

动；第二类为金属、建筑材料，需经县长以上的行政长官批准，发放通行证方可流通；第三类生活日用品，严格规定数量，履行审批手续，按指定六条运输道路经检查所检查后，方可流通。

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所需粮食、布匹、盐、医药等极为缺乏。山外物资不能运进根据地，根据地土特产品运不出去，再加上1942年遇到严重旱灾，根据地极为困难。1942秋后颗粒无收，老百姓把树叶都吃光了，实在没的吃，只能到山坡上挖野菜。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和盐，再加上疾病流行，许多人在病饿中死去。

房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渡过难关与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年3月，中共房涿涿县委在平峪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平西地委指示精神，采取了多项措施。党政军民步调一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日伪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大力开辟沟线外工作，摧毁日伪政权；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在干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揭露敌人政治欺骗。

改造村政权。县委组织工作队到敌占区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的一面政权为敌我两面政权，变敌我两面政权为敌我一面政权；巩固和加强敌我一面政权，使敌占区抗日工作有了基础。

加强军事力量，开展军事活动。平峪会后，建立了武装工作委员会，肖炳林任主任，开展沟线外斗争，除掉汉奸，为开辟敌占区扫清道路。

开展大生产运动。干部群众在荒山河滩上造地种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积极贯彻执行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劳资等政策，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抗日积极性，让地主富农多交款、多纳粮，保障抗日物资的供应。

整顿党组织。整党宗旨是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对抗日前途的悲观失望情绪，针对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不同情况，制订了整顿党支部的重点和标准。根据地党支部，以领导当地生产好坏为标准；游击区党支部以对敌斗争是否坚决为标准；敌占区是继续发展和恢复沟线外党支部。

1943年夏秋以后，抗日形势好转，部分地区开始转入反攻。武工队、游击队、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七团和九团频繁袭击敌人据点，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游击战争已经从房涿涿县和昌宛县敌我交界边缘地带越过封锁壕，发展到广大平原地区。到1944年8月，房涿涿县南部除塔照外，其余据点全部被攻下。

1944年10月，中共平西地委和冀察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撤销房涿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设置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房山县成立后，组成了中共房山县委员会和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一军分区四十四团政委徐元甫兼任县委书记，谭惠民任县长。此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频繁活动，规模更大，遵照平西地委指示的“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利用各种时机，开始拔除根据地边缘的日伪军据点，从而使解放区一步一步地扩大。1945年7月，冀察十一军分区七团拔掉山区交通要道长操据点。继此之后，又攻下南窖、北窖、安子、花港、河南、河北、长沟、塔照据点。17日，解放军七团在军分区副政委李水清指挥下，夜袭房山城，击毙日伪保安队大队长孔宪江。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在房山、良乡地区的日军纷纷从各处据点撤退。房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八年的抗日战争，房山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房山良乡两县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战争中有1860人参加八路军，有480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日本侵略者杀害无辜同胞2540人，烧毁房屋14650多间。房山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谱写了反侵略战争的英雄史诗。

保卫胜利果实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就调兵遣将疯狂地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25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孙连仲将原房山县伪军整编，授予“先遣军”称号，任

命张德祥为房山保安团团长，同时，委任原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李仲三为房山县县长兼固安、涑水、房山、良乡、宛平、涿县六县剿共联防司令。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非作歹的汉奸特务及敌伪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的急先锋。退缩在房山、良乡、琉璃河、周口店、长沟的伪军也顿时嚣张起来，疯狂地接连不断向解放区进犯。从9月15日到10月底，仅一个半月时间，就袭击解放区30多次。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平西地委决定建立良乡县，实行房、良两县分治。1945年9月良乡县政府在河北村成立，王漫任县委书记、郝绍尧任县长。房山县委、县政府驻地已从南窖迁到张坊。房、良县委组织大批得力干部，直接深入到县城附近126个村庄开展工作。11月，良乡县委改为良乡县工作委员会，简称“良乡工委”。独立团政委田波兼工委书记。良乡县政府改成良乡县佐公署，王蕴心任县佐。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平西主力部队与房山、良乡两县党政干部密切配合，向一切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展开进攻。

1945年12月7日，平西独立团在团长杜廷忠的带领下，从班各庄出发，来到大董村东南开古庄村，准备伏击从良乡方向过来的两股敌人。午夜时分，恰逢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李仲三从北平开会返回，进入伏击圈后，独立团战士飞身跃出将李仲三俘获，后来房山县政府在南窖召开万人大会将李仲三处决。

1946年春季的一天，独立团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长辛店附近的二龙庄日伪军留守仓库，给日伪军很大打击。

根据斗争的需要，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6年3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涿良宛联合县分为涿县、良乡、宛平三县，良乡县委书记宋浩、县长陈震，原良乡县县佐公署不变。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房良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蠢蠢欲动，整顿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国民党党员，除房山、良乡县城各有一个党部外，还有10多个区分党部。各区分党部及散居在各村的国民党党员公开出来活动，他们网罗汉奸、特务、地痞、流氓，组成黑杀团。黑杀团白天查访，夜间下毒手杀人，形成一股十分猖獗的反革命势力。由于敌人的进攻，根据地缩小了许多，房山、良乡两县解放区436个村庄只剩下十渡、张坊、霞云岭等117个村庄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自卫还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

进行土地改革

1946年春，房山县委和良乡县工委按照党中央1945年12月发布的《关于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在解放区的大部分村庄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运动，部分村庄开展了割断永佃权和献田运动。

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房山县委、良乡工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房山良乡有130个村庄的5万多农民参加了土地改革。

1947年3月至1947年9月，进行了土地复查和纠偏工作。

1947年9月至1948年12月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在148个村进行了新区土改，使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得到满足，在农村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制度。

全面军事反攻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1947年9月12日，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一部和晋察冀第七军分区两个独立团、两个独立营向周口店守敌猛烈进攻，周口店于1947年9月14日宣布解放。同时晋察冀十分区75团一个营在良宛县大队配合下，

袭击了公议庄敌人据点，守敌全部被歼灭。

1947年11月，以独四旅十二团为主，在县大队及当地民兵的配合下，于张坊附近的马鞍山击败了国民党的九十四军、十六军、暂三军各一部向房山根据地的进攻，歼敌300多人，粉碎了敌人进犯解放区的企图。

马鞍山战斗不久，独四旅未及休整，由旅长亲自指挥开始攻打东长沟的守敌。东长沟守敌在绝粮断水的情况下仓惶逃跑，长沟镇解放。

1948年3月，房山独立团一营四个连由团长杨再民和房山民兵连长王兴元带领，击溃了北尚乐守敌，接着又歼灭了以房山保安团中队长何茂银为首在半壁店大集中进行抢劫的120余人。1948年5月28日，军分区独立团、房山独立团和良乡县佐武装部解放了坨里重镇。周口店、长沟、坨里等敌人主要据点被攻克，敌人收缩在房山、良乡和琉璃河等地。

1948年12月7日，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二十旅，在旅长刘秉彦带领下，包围了房山城，并以顾册为中心，开始挖战壕，修筑作战工事。12月13日，作战部队攻下城外的齐家坡和小山坡。

12月14日，城内守敌弃城出逃。

1948年12月14日清晨，房山县委、县政府在县委书记刘祥庆、县长杜恩霖的带领下，随解放军部队迁进房山城内。

在解放房山县城的同时，良乡县城的守敌不攻自破，弃城逃跑了。14日凌晨，良乡县委、县政府在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阎振峰的带领下，迁入了良乡城内。

房山、良乡县城的解放，标志着房山、良乡两县全境的解放。

注：本文转载《北京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区党史办副主任

对晋汉臣自卫团的改编

原房山县县志办公室

1937年7月末芦沟桥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大约在8月初，不知从哪方开来了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之后又有什么孙殿英部，卫立煌部。这些国民党军队撤到良乡、房山平原一带，沿大石河两岸摆成了松散的防线，阻击日寇。但没过多久便又溃败了。房山县城西北平原和山区交界的浅山丘陵一带，国民党军队陈尸累累，丢弃枪支无数。日本侵略军沿公路蜂拥蚁聚般地向房山县逼进，怕中埋伏，汽车上拴上绳子用绳子牵着横木把公路两侧的庄稼拉倒。坦克车陷进泥塘，就用死尸和青杆庄稼垫道。9月16日，日寇侵占房山县城。同一天，良乡城也被日军侵占。

日军占领房良县城后，便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在离房山城约十几里远的二站村村外，日军一次便杀死躲

进天主教堂的逃难百姓八十余人。国破家亡之恨，唤起了不愿做奴隶的房山人民。他们纷纷起来，决心和万恶的日本强盗血战到底。到1937年底，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从山里到山外，有的是单个村子，有的是村与村联合，最多是十几个村子，组成各式各样的地方自卫武装。这些武装名称不一，人数多寡不等，有的叫“六山会”、“联庄会”、“自卫团”，有的叫“抗日复仇军”、“杂牌军”、“红枪会”……最多的数百人，少的几十个人。与地方自卫武装同时兴起的，还有数路土匪。

1938年春，邓宋支队到平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一方面抓地方建党建政工作，一方面派人去做争取自卫团和土匪的工作，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事情发生在1939年。

房山境内有两条较大的河流，一条叫拒马河，一条叫大石河。拒马河源于山西灵丘，流经河北省涞源、涞水二县入房山境，再向南流入涿县。其流经房山一段，有百里左右的山区。自张坊往里，每涉一次河为“一渡”，共有“十渡”。十渡地区风光绮丽，山明水秀。距十渡村十几里远，有个掩在重峦叠嶂中的山村叫平峪。平峪村不大，有一两百户人家，当时出了个有名的人物叫晋汉臣。晋汉臣家境殷实，本人曾在天津做过买卖，曾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辱，富有爱国心。另外，山外土匪又经常进山掠扰。1937年9、10月份，以晋汉臣为首，在十渡联合六渡、八渡、西庄等村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六山会”，任务是保境安民。1937年底，晋汉臣领导的“六山会”曾和霞云岭地区的自卫团联合，号称“国民六路”。1938年春，八路军来到平西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一致抗日，极大地鼓舞了饱受日寇蹂躏的平西人民。当时两地自卫团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意联合抗日。但霞云岭自卫团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自卫团主要首领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于1938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在堂上、王家台、霞云岭三地的八路军，致使我驻王家台的一连八路军战士牺牲六十余人。这一惨案发生后，晋汉臣非常气愤，出于正义，断绝了和霞云岭民团的联系。1939年2月7日，挺进军成立，司令员肖克，并组建了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政治部主任张汉民，总支书记高克恭。平西游击支队下设五个大队：昌宛大队、涞涿大队、宣涿怀大队、房良大队和特务大队。晋汉臣是特务大队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连，计三百余人。虽然队伍被编，但仍由晋汉臣指挥，有相对独立性。为了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曾派一位同志去特务大队任教导员，做争取晋汉臣的工作。但与晋的关系没有搞好，于是，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派总支书记高克恭带几个同志去检查工作。

农历四、五月份，拒马河还是枯水季节。麦子即将黄梢。山里特产的五月鲜杏儿将熟未熟，青中透黄，略带酸根儿。高克恭带几个人来到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正在张坊一带驻守。司令部在张坊，三个连分驻塔照、大峪沟、南尚乐三个村。听说平西游击支队总支书记来检查工作，晋汉臣亲自带人前来迎接。高克恭那时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英气勃勃，身穿土黄色军装，晋汉臣当时已五十出头，个子偏矮，且身体肥胖。俩人一见面，就象彼此稔熟一样，十分亲热。当晚，晋汉臣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招待检查组同志。同时，还把分驻各村的各连连长请来，和高克恭带来的人一起入座。晋汉臣显得十分高兴，在酒席上，他滔滔地讲起自己怎样在天津做买卖，以及后来怎样组织自卫团的事。虽然晋汉臣比较开明，但他手下的人并不全跟他一个心思，有的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戒心，而且沾染流匪习气，恶习不改。喝着喝着，有两个连长醉意朦胧了，一个连长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口里含含糊糊地咕噜着，表示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晋汉臣当即发了火，指着这位连长骂道：“混蛋！你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吗？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都没有吗？”

晋汉臣强烈的民族意识，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时早有人上来，把两个喝得醉醺醺的连长扶了下去。

酒宴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为表示自己的诚意，晋汉臣把自己住的北房腾出来给高克恭住，自己则搬到东房去。

就这样，俩人很快就混熟了。

“高书记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一天闲谈时,晋汉臣问高克恭。

“我是森林大学毕业的。”高克恭说:“我没上过学。”

晋汉臣奇怪了:“那你的书记是怎么当的?”

高克恭微微一笑,“我是生活书记。”

晋汉臣放心了。憨厚地说:“噢,你是随从副官一类的?”

高克恭不禁笑了起来,应声说:“对,就是那么个角色呀!”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调查清楚了。决定将原先派到特务大队任教导员的同志调回,并考虑再从其他部队调一个同志来。晋汉臣知道后,表示一定要高克恭留下。后来经请示黄光明同志,高克恭就在特务大队留了下来任教导员。同时,各连都派了指导员。为此,高克恭征求晋汉臣的意见。晋汉臣略一思谋说:“这没什么,只要不在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就可以”。

过了些日子,晋汉臣突然提出了一个藏在心里许久的问题“高书记,咱俩是不是可以结拜把兄弟呀?”

问题提的这样突然,不由使高克恭一愣。他看看晋汉臣,见晋汉臣正以期待的目光深情地望着他,拒绝吧,不好办,原来派来争取晋汉臣的同志所以和他关系相处不好,就是单纯发号施令,使晋汉臣觉得看不起他。若是答应,会使晋汉臣感到和共产党的干部处于“平等”地位。联想到晋汉臣的历史。他虽然比较开明,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但封建意识浓厚,崇尚哥们义气,还是答应的好,但这事又不能贸然决定,需经组织同意方可。想到这里,高克恭说:“这个问题你好好想想,我也好好想想。”

晋汉臣见高克恭当即没表示可否,也就不再说什么。

事后,高克恭立即把通讯员叫来,写了一封急信给平西游击队司令员黄光明。黄光明表示同意,高克恭即和晋汉臣结拜为兄弟。晋为兄,高为弟。但未举行任何仪式。此后,二人的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

结拜不久,晋汉臣就把高克恭领到家中 and 老母及弟弟相见。

晋汉臣家是个四合院,坐北朝南,有二十几间房。房顶一水儿瓦的青石板。石板很大,很厚,不象有的山村的石板薄而且碎,这儿的石板有寸左右厚,血青色,一两尺宽,三四尺长。院内很整齐,很干净。门前有一株大槐树,院后有不少柿树和山杏树。俩人一进门,晋汉臣便将家里人一一给高克恭介绍。

晋家是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家庭,家规家教很严。晋汉臣事母至孝。在家中,母亲说一不二。晋汉臣弟兄六人,他是老大,就是兄弟之间也分尊卑长幼。每有客人来,晋汉臣坐下和客人吃茶闲聊,老二在旁侍陪。老三若进屋,老二经长兄允许方可坐下,再由老三站在一旁侍奉。

高克恭一去,晋汉臣便叫人去拒马河上捕回鲜鲤鱼款待。发现高克恭的被子脏了,晋汉臣便叫家里的人连夜给拆洗,高克恭虽百般推辞,但拗不过,晋家几房媳妇一夜未睡,拆完洗,洗完又一点点用熨斗熨平熨干。到第二天早上,俩人出门时,被子已缝好,拆洗的干干净净,晋汉臣的几个兄弟一直送出老远。

自此以后,俩人赛过亲兄弟一般。

晋汉臣是商人出身,不善于打仗,且年过五十,身体肥胖,就是平时行军,别的干部配备一头骡子,要给他配备两头骡子,一匹累了,换乘另一匹,身边还总有两个勤务兵侍候。高克恭则相反,他祖籍陕北,十几岁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西到河北,由河北蔚县到平西,之后又到冀东,从冀东折转昌平,由昌平到房山拒马河,转战千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每到战斗,枪一响,晋汉臣就问高克恭,“老弟,怎么办?”高克恭说:“你在家,我出去!”下边的连排长见俩人关系这样亲密,态度也渐渐转变了。

转眼到了西瓜上市的季节。

这天,高克恭正患病,发高烧,卧床休息。夜里,突然一个通讯员闯进屋来,送来一个十分火急的消息:特务大队驻石窝的那个教导员,准备乘夜黑人不备时带队去投降敌人。这个人姓叶,原是国民党兵,被我俘获后参加了革命队伍,是个“解放兵”。一般人认为他是个老红军,平时很尊重他,谁知他在形势严重时发

生了动摇。姓叶的本来带部分人去执行任务，中途他极秘密地把通讯员叫到跟前，要他通知隗连长把家里人也带出来，一起去拒马河南岸“执行任务”。通讯员很机灵，他早看透了姓叶的企图。他回到村，把这事对隗连长一说，隗连长感到事情严重，果断地对通讯员说：“你快去张坊，把这事告诉高书记，先不要告诉大队长。”通讯员一直找到高克恭，详细汇报了此事。

高克恭听通讯员一说，马上起身，不顾病痛，带通讯员去找晋汉臣，晋汉臣一听就发怒了，焦急地说：“他要逃跑，这怎么办？”

高克恭镇定自若：“不要紧，我去处理”。

晋汉臣说：“不行，你正发高烧呀！”

“现在还顾得了这些！”

高克恭匆匆收拾了一下，随即跨上马，带十几个人连夜向塔照奔去。

这一夜风清星暗，月亮只有一个弯弯的金边儿。一行人沿着山路坎坎坷坷急行，事情这样严重，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火，但没有一个人出声音，只顾咬着牙，极力辨着模糊不清的路径，呼吸急促，脚步杂沓。大约有半个时辰，一行人来到塔照村外一道小山梁上。宽宽的拒马河就在眼前，听得见哗哗的水声。从山梁到村内，大约有一二里路。村里只有少数几盏昏暗的灯光，偶尔听得到轻悄的人声。高克恭命令通讯员下去，告诉他：“你去告诉隗连长，但不要姓叶的知道，不要说我来了。”

隗连长这时正在村内焦急地等着，姓叶的叫他集合人，他不集合。通讯员跑下山，来到河滩上，把情况告诉隗连长。姓叶的也在一边听着，他知道高克恭来了，便带了几个人往山上爬，隗连长急了，怕姓叶的有害高克恭，立即带一班人在后面紧追上来。

姓叶的来到高克恭面前，紧张极了，但仍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恐：“高书记，我们打算带人去南岸开辟工作。”说完，姓叶的还煞有介事地回头对隗连长下命令：“老隗，通知队伍赶快做饭！”高克恭想先稳住他，他说：“你要开辟工作，为什么不先请示？你是教导员吗！”

姓叶的张口结舌，但仍极力辩解：“趁黑过去，敌人发现不了，天亮就过不了河了。”

“拒马河水这样深，你怎么过？”

“我从下游水浅的地方过。”

迷蒙的夜影中，姓叶的感到高克恭锋利的目光紧紧逼视着他，他不由浑身战栗。这时硬拚是不行的，他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摆脱困境。于是，他仍强装镇静的对手下人下命令：“队伍集合！”号令一出，没等队伍集合，他先跌跌撞撞地顺山坡跑了下来。有几个不明真象的人想随在他后边走。隗连长急切地问高克恭：“怎么办，高书记？”

高克恭说：“队伍不会跟他走！”并命令：“他再去就把他抓回来！”

果然，姓叶的跑到镇江营，被大队侦察组捉回。

事后，晋汉臣拍着高克恭的肩说：“老弟，你真行！”

1939年11月，挺进军进行整编。特务大队奉命开到宛平山区一个叫桑峪的有三四百户人家的小村。这次整编规模较大，原三十二大队编入三十一大队和三十三大队，改为冀察军区六团和七团，原十二支队和平西游击支队编为九团，平西游击支队的五个大队合编为一个营（九团三营）约一千余人，晋汉臣任营长，高克恭为教导员。副营长是李继高。这人很能打仗。后来每有战斗，总是冲锋在前，实际上是代行营长职务。

整编后，九团的第一个战斗行动是攻打南北窖高线公司。南北窖距房山县城四五十里，地下煤藏丰富，是平西主要煤炭基地。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寇就在这儿建立了据点。这次战斗，炸毁了北窖高线公司锅炉房，使煤炭运输一度瘫痪。这次战斗中，高克恭同志也负了伤。养伤期间，由任成举任三营教导员。不久，任成举在杜家庄战役中牺牲，高克恭又回到九团三营。从到特务大队那天起，高克恭就和各连指导员一起，

秘密地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连都建立了支部,营部有教导员办公室,下边还有几个干事。同时,为了戳穿敌人有关“赤化”的欺骗宣传,消除晋汉臣的戒心和促成他思想的转变,在平时,高克恭要求党员在战斗中要冲锋陷阵,起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当时战斗频繁,捷报很多。每次战斗后都有统计,某某营伤亡多少,共产党员多少。高克恭有意识地把这些捷报给晋汉臣看,他看了后很受感动。

一天,部队在西庄住下,晋汉臣终于忍不住地对高克恭说:“老弟呀,共产党员真好呀!你和黄司令讲讲,也给咱们请来几个共产党员!”

高克恭故意风趣地说:“去年咱们俩谈判时,你说不准发展共产党呀?”

“那是什么时候,那时脑筋不开窍!”晋汉臣十分坦率。

见晋汉臣这样真诚,高克恭兴奋而认真地告诉说:“大哥呀,咱们营不单有,而且各连队都有呢!”

晋汉臣愕然一愣。但马上醒悟过来:“看来老弟你是不糊涂呀。你早发展了党了!”

“是呀!”高克恭说。

“原来你是共产党的书记呀”。

说着,俩人面对面畅爽地笑了起来……

1940年底,晋汉臣调平西任贸易部长。几个月后,日寇进山“扫荡”,他看形势严重,离开部队开了小差。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日寇曾想委任他为华北什么“剿共司令”或副司令一类的官职,他拒不接受。相反,他还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后来还把自己的弟弟和侄子送到部队。

晋汉臣虽然离开了队伍,但那些来自拒马河畔的贫苦农民的子弟,则在革命队伍中渐渐成长起来,很多人成为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41年春,鬼子再次进犯我根据地,九团在片上至沈家庵一带打了一仗,歼灭敌人百八十人。不久又在长操三流水一带用刺刀拚杀鬼子六十多人。

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九团成了保卫平西根据地的主力团队之一。1944年,九团开赴陕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彻底解放,踏上新的征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国民党军队在房良地区的抗战

张东升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以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中国国民党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对于促成抗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中,虽然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当权者,没有放弃反共方针,但广大的爱国官兵是坚持抗日的。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作战的战场上,不少爱国将士,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了英勇斗争和做出了牺牲。他们都应该受到崇敬和纪念。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

在房良地区的抗战，也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向驻守在北平南部芦沟桥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还击，抗日战争爆发了。7月28日到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的大举进攻，并不以占领平津为满足。平津失陷后，日寇根据其“速战速决”的方针，从平津沿平汉、津浦两大铁路长趋直入，目的是在最短期内消灭中国的军队，征服全中国。

良乡城与芦沟桥近在咫尺，战端一开，满城震惊。为了援助中国守军抗战，房山和良乡人民曾自愿聚集抗战物资，派代表送往抗日前线。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未到达芦沟桥。

7月26日，芦沟桥战争虽未结束，但战局已十分清楚。眼见平津攻陷指日可待，日军便派出小股部队，沿平汉线向南，作试探性的进攻。头前是坦克车，车后是紧紧尾随的士兵，边走边观察动静，一直进到良乡东关及苏庄、梅花庄一带。

芦沟桥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良乡、房山平原和山区交界的边缘一带，到处是国民党的败兵。卫立煌部在宛平抓髻山与日军激战后，有一部沿大房山梁南撤。孙殿英部在东郊和日军接火后，也贴山边撤下来，到了丁家洼、牛口峪一带。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将士在军长宋哲元南逃的情况下，退至四郊，有的化整为零，化妆成老百姓，和日军展开零星战斗，尤以西部的战斗较为激烈。

约8月15日，日军尾随国民党吉星文团来到良乡。该团在芦沟桥抗战中十分英勇卓绝，退到郊区后，仍坚持抵抗。8月17日夜，从琉璃河方向悄悄过来数十名国民党官兵，来到良乡城下。城内日军防守松懈，只有个别站岗的士兵在城头逡巡。这几十名官兵从良乡城东南角摸上城，杀死敌哨兵，又冲进敌营，用大砍刀杀死日军几十人。第二日，日军在良乡城内疯狂报复，杀死无辜百姓十数人。

8月20日，日寇从良乡出发，经阎村、吴庄、南坊、北坊，直扑坨里，一举占领高楼。当时，地里庄稼还是一片碧绿，不少正在吐穗扬花。日寇怕庄稼地里有埋伏。一路上，用坦克车在前边开道。车后用长绳系上粗大的木头，先将两侧未成熟的庄稼拉倒。遇有坑坑洼洼，就用青杆庄稼垫道。公路两侧数百亩庄稼被毁，轧成一片烂泥。

孙殿英部撤到房山城附近，见情势危急，没几天便从长沟方向向西南狼狈逃窜。这时，从南边开来了前来增援的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二十六路军共分三个师，沿大石河布成一条松散的防线。当时，汛期刚过，大石河水流湍急。二十六路军扼守大石河，八十亩地、南观一带布防的池峰城的三十一师，前后朱各庄、马各庄，到坨头一带，也是一个师。一直到琉璃河一带都有布防。这时，沿大石河布防的，除了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外，还有不愿撤退的二十九军部分官兵。这些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官兵，怀着誓死报国的决心，黑夜越过大石河去袭击日军。驻守饶乐府的一个团，组织起一支敢死队，叫“登峰队”，每人四颗手榴弹，一把盒子枪，一把大砍刀，深夜过河去开古庄摸日本兵，回来按人耳朵和马耳朵计数。一天黑夜，“登峰队”又去摸开古庄的日军，先是将日军包围，紧接着，日军增援部队从外边又把他们包围，双方互射，死伤数百人。

由于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始终不敢轻进。8月21日，日军在开古庄土坡上炮轰房山城，打炮三百多发。此时，城内百姓大部逃亡。日军炮弹将监狱大门炸开，犯人乘乱逃走。即便这样，日军也没越过大石河。从8月19日到9月15日，国民党军队在大石河防线和日军相持二十余日。最后，日军用飞机轰炸中国守军阵地，并用坦克掩护士兵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开始全线溃退。坚守在南观、八十亩地一带的池峰城部牺牲逾千。许多将士在敌机狂轰滥炸下仍坚守不退，直到血染疆场。在瓜地坚守的一个团，撤退时留下一个班作掩护，最后和日军拚了刺刀，杀死日军十几人，这个班战士也全部阵亡。羊耳峪北大梁凤凰山一带，日军十数架飞机轮番投弹，致使国民党军队伤亡累累，日军也有不少伤亡。撤到定府辛庄的是二十九军一个连，9月14日进入该村。当夜，全村百姓帮助挖战壕，送弹药，配合这一连人打退日军三次进攻。该连配有一门平射炮，曾一炮摧毁日军一辆坦克。后来在日军轰炸下，全连官兵全部殉难。另

外,在其他地方,国民党军队也有不少伤亡。如在丁家洼筒八坡,连长和机枪射手都牺牲了……至此,国民党军队在大石河西南岸的防线崩溃了。9月15日,日军派飞机轰炸房山县城。9月16日,日军侵占房山城。同日琉璃河也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房山县城后,仍继续尾追国民党败兵,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又有不少士兵在败逃中丧生。

国民党军队在房良地区的抗战,是芦沟桥抗战的继续,同样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国民党方面都是仓促应战。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并没有抵抗日寇的决心和准备,甚至犹豫不决,企图妥协,甚至有部分高级将领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置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部分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无指挥无接济而失败。然而,中国国民党军队一些爱国将士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喋血疆场的勇毅精神以及奋勇抗战的英雄行为,同样应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七团夜袭房山城

张成基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7月下旬,活跃在平西的我八路军主力部队“老七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打进了房山城。从战略上讲,当时的房山城,还不是我军可守之地,因而采取了在夜间十点左右打进城,拂晓前又撤出去的办法,房山城在这次战斗中没有得到最后解放。但这一仗的作用却很大,它不仅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威力,也给了住在房山城内的日本鬼子和伪保安队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使敌占区的群众看到了日伪军的末日来临,还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

这次袭击房山城的背景是:从1945年4月份开始,我八路军七团和房山、宛平两个县大队就配合作战,连续打下了长操、南窖、安子、北窖一带的敌人据点。又在7月初,先后解放了长沟峪、车厂、坟山、东流水、羊耳峪等地。当时,我军处在战无不胜的新形势下。我军战无不胜的新形势,造成了房山城内的日本兵和伪军极大的恐惧,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我七团官兵连战连捷之后,正在长沟峪一带进行休整的副政委李水清同志,突然接到前方一个情报说:房山城内空虚,日本鬼子仅有四、五十人,孔宪江的伪保安大队也不到三百人。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时刻处于等着挨打的状态。随即,七团副政委李水清同志和团的主要领导,共同研究这份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和分析,认为我军数量比他多,士气高涨,近日一连攻下十几个据点,仗是越打越有劲,是打房山城最有利的时机。现在敌人虽然怕挨打,但他们并不老实,他们夜间在城内缩着,白天不断出来包围我地方工作人员和我小股部队。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经常向老百姓要粮要款,胡作非为。又联想到,房山新区人民,我军所到之处,一致控诉孔宪江和他的伪军依仗日本鬼子的“洋气”,对老百姓奸淫烧杀,横行暴敛,无恶不作,要求部队尽快消灭他们,为百姓报仇。这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根据当前形势,给房山县城敌人一次打击是非常必要的。既歼灭他有生力量,为民除害,还可夺取武器、弹药装备我军。当即作出决定:在长沟峪村向全军指战员作了动员,各兵种立即进行攻城准备。同时又和当地民兵进行联系,当地民兵听到号令立即组织起来,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们一方面准备上城墙的梯子和

破坏敌人防线的工具，一面研究各路进城的路线和道口，当好向导；还组织了近百副担架作好运送伤员的准备。全体民兵都表示决心：要和大部队“同生死”，“共患难”，不打开房山城决不罢休。

李水清副政委一面作战斗的组织准备，一面带领七团的干部和作战指挥人员，到房山城外的制高点观察地形，选择进军路线。同时还多方听取从房山城里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以便进一步取得战斗胜利的保障。根据各方情况，最后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

1945年7月21日，李水清副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向房山城进发。在房山和宛平两个县大队的配合下，傍晚部队从长沟峪、车厂、西庄一带向房山城挺进，各路部队直奔自己的作战地点。军队的部署是：二连和房山县大队在牛口峪、顾册一线，阻击周口店敌人增援；四连在饶乐府一带，防备良乡敌人；宛平县队在坨里北山，即北车营一带牵制坨里敌人进犯。

天黑以后，我军从西北山坡，分别向房山城运动。指挥部设在北门外西边的高坡上。李水清同志亲自在指挥部指挥战斗。由警卫连专做指挥部的保卫工作。通讯连准备好按进军路线向各作战部队联络。各路部队相继进入阵地，到夜间十点左右，一连从西南城角外发起了攻势。城上守敌向我军还击，被我西山坡掩护部队的机枪压住。攻城部队一拥而上，与敌决战。在我登城部队猛烈攻击下，守敌除被打死、活捉和投诚者外，其残部狼狽逃窜。一连任务是：打进南大门，歼灭南大街两侧的敌伪军政人员。在搜索中还打开敌人设在南门里路西的日伪“合作社”，缴获了大批衣物、鞋袜和布匹等。

三连的任务是：攻打北街两侧敌人。他们跃过城根的封锁沟，从西北城角与西南城角同时发起攻击。在连长王朝银同志带领下，登梯而上，因梯子太矮，不能直接登上城头，城头上守敌又向我登梯部队猛烈射击。王朝银连长英勇善战，站在梯子上，连续向城头上扔了几颗手榴弹，顿时把敌人炸开，顺手扳住了一个酸枣树疙瘩，攀援而上，站在城头上，端起冲锋枪，向着敌人猛烈扫射。我军随即顺序而上，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死者东倒西歪，伤者举枪求饶，有的向我投诚，余者向城下跑去。我军立即开北门，部队鱼贯而入，向北街两侧追击敌人。

这时我军从南北两面合击敌人，枪炮声虽然没有攻城时激烈，大街小巷也连声不断，全城变成了巷战。敌人乱成了一团，首尾难顾，措手不及，溃不成军。

统帅全军的敌伪保安联队副大队长孔宪江从朦胧中起采，立即走出院外，梦想指挥他的伪保安队与我军顽抗，直奔城隍庙街，当和我军相遇时，我军喊他的“口令”，他误认为是伪保安队在喊他，卫兵当即答应“孔大队长”，我军排长李峪立即开枪，嘣嘣将他打倒在地，腹部连中三弹，肚破肠流。敌伪军集中了火力将他抢走（当时虽未断气，到第二天早晨，由他老婆护送，要去北京医治，用太师椅抬到饶乐府村西头大庙前时，断气身亡）。

部队还攻进了伪县政府，伪行政官员早已逃命而去，没有遇到一枪一弹的阻力，部队对伪政府进行了认真的搜索，从这里也缴获了一批弹药、粮食和物资，还得到了一部份重要文件等。住在东街路南的日本鬼子，胆小如鼠，四五十个日本兵，龟缩在他的窝穴里，个个哀求上帝保佑，盼望战斗不要打到他们院内去。又加我们是从西南、西北两个城角攻进来的。伪商店、伪政府也都在西边，自然形成了主战场在城里的西半边。所以没有能够和日本交战，使他们幸运的逃了过去。

战斗结束了，在拂晓前，我军主动从城里撤出，胜利而归。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敌人不计其数。光投诚、俘虏者即近百人。并缴获相当多的枪支、弹药。房山城历史相传“易守”“难攻”，我人民子弟兵在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精神鼓舞下，一举而破。这就说明，房山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什么时候解放它，即随手可取之。

胜利归来的部队，走到西北山区各村，乡亲们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小学生和青年妇女们跳着秧歌舞，热烈欢迎，庆祝胜利。欢迎部队和送慰劳品的群众，都争着和部队指战员热情地握手，问长问短，并说：“你们攻进了房山城打死了孔宪江，可给我们老百姓出了气，解了恨，除了一大祸害，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孔宪江也有个死。这些年来他们可把我们老百姓欺负苦了。没有亲人八路军，谁能把他们打垮呀？可谢天谢地！……”。

打进房山城和打死孔宪江的消息，除军政干部向各地群众宣传这一胜利战况外，各村人民奔走相告。很快传到了敌伪统治多年的南窖、长操、大安山、张坊、南尚乐一带山区，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老七团可给人民立了一大功啊”！

打开房山城战斗的胜利和四月份以来在北部山区一带打下十多处据点，解放大块地区的胜利，使得我们就卡断了把河套沟南窖一带、大安山、长沟峪、周口店等地区大量优质煤炭向日本侵华指挥中心北平的供应。造成了他能源紧张，不少工厂因缺煤炭而被迫停产，居民因缺煤不能做饭，给日本法西斯头目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政治局面。同时这一连串的胜利也使房山城附近的坨里、周口店、天开、长沟等据点的敌人闻风丧胆，并震慑了良乡、长辛店、涿县、涞水、固安等县城敌人的嚣张气焰。各县和据点的反动头子都害怕自己落到孔宪江的可耻下场，军心动摇，各谋生路：有的携带枪支向我投诚，有的逃回本乡和家人团聚。敌军内部已形成土崩瓦解之势。

地方伪保甲长中思想反动、顽固不化、罪恶多端、死心踏地依靠日本鬼子、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带着家眷，逃往敌人据点或大城市躲避。思想进步、有爱国之心的，积极向我地方政府联系，汇报当地情况，接受我地方政府交给的支援前线、缴纳公粮、做军鞋军袜等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我各地区都立即组织地方工作人员和武工队，抓紧有利时机，积极向游击区进行活动。首先进行政治宣传攻势。大讲“敌军必败”，“我军必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道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摧毁伪组织，建立新政权。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工、农、妇、青团体组织，还有的村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家乡，配合部队作战。

七团指战员在房山战役后，稍加整顿，又继续向周口店、天开、坨里等据点进攻。在8月上旬打下了全部据点，解放了这些地区。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的向盟国投降，侵略我国的八年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房山人民和全国一样，从此得到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孔宪江死后，当时没有发表，把尸首放在北门的城门洞内，丘了起来。等到1946年秋季，敌人把被我活捉并镇压击毙的伪县长李仲三的尸首从南窖抢回来，才一起发丧，送回他的家乡西周各庄村去，李仲三也同时送到东周各庄他的家乡埋葬。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系原区人大主任

回忆平郊武工队

王树瑞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昌宛根据地侵犯。为了适应新形势斗争的需要，1946年夏，我昌宛县委决定建立平郊武工队（那时北京称北平）。区长王秀川同志任武工队长，区委书记宋志远、郝宝田、高树存和李子明同志都先后任过政委。我和张国栋同志任敌工委员，王志本同志任城联委员。武工队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党、建政、征购、扩军，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活动地区主要是靠近敌占区的边沿地带和被敌人侵占的一些村镇，北至羊坊，南至香山大岭，东至清河、沙河，西到妙峰山，中间有二百来个村镇。

这一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是战略要地。它距离北京只有三十来里地，是平绥铁路的要冲，敌人支援北上的辐重都要经过这里，所以，敌我斗争相当激烈。平郊武工队就在这一带向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忆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在昨日，历历在目。下面作一简要记述。

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

我们武工队神出鬼没，经常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炸毁敌人的军用列车。那时候，我们把这些行动叫“破交”。

1946年8月，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指示我们配合察哈尔东线战役（即怀东战役），把敌人往南口一带运送弹药的军列炸掉。队长王秀川同志带领我们五、六个人，潜伏在平绥线上清河、沙河之间的汤家岭。列车快到的时候，把炸药和地雷安放在铁路上，列车一到，我们就拉着了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完蛋了。那些满载弹药的车箱，一节顶着一节往高里爬，一直爬到最高处，先是把车头顶出铁轨，随后整个列车尤如一只巨蟒遭雷击，轰隆隆似山崩地裂翻倒在地，炸个粉身碎骨。这次“破交”，敌人损失很大，直到11月份东线战役胜利结束，敌人还没有收拾完残局。老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夸我们武工队是神兵。县委还通报表扬了我们。

后来我们又成功地炸毁了一列敌人的军马列车。由于敌人的铁路运输不断遭到武工队的破坏，他们就沿铁路线每三里地筑起一座碉堡，使全段铁路都在他们的火力射程之内，可是那也挡不住我们的“破交”活动。

1948年4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甫同志来到武工队驻地七王坟村，召集大家开会，交给我们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他先给我们讲了全国解放战场上的形势，随后说：“华北野战军二纵要到东北参战，路过京东铁路，为了防备敌人发现阻止，保证二纵按时安全通过，需要你们在清河至沙河之间‘破交’，时间在明天上午十点。”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当时不但敌人在铁路沿线封锁严密，而且武工队驻地距离“破交”地点三十余里，中间要经过敌人十几道封锁线。常甫同志说：“这个任务困难大，可能会有牺牲，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为早日解放全中国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最后他问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答道：“一定完成任务！”当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都觉得为早日解放全中国出力的时候到了。会后，我们二十四名队员做了出发前的准备。大家纷纷把自己的东西交赠给留守的同志。我把张国栋送我的一支黑杆两头平顶的自来水笔、十斤粮票、一个手章、五角钱交给了王志本同志，我跟他说：“我要回不来，钢笔和手章留给你做个纪念，粮票交给伙房，五角钱替我交党费。”当时我想：只要完成任务，死了也值得。

天黑以后我们出发了，穿野地，走小道，绕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夜急行军，赶到了战斗地点小牛房附近。我们埋伏在一片大柏树的坟地里。这次“破交”的指挥是尚木森，按照计划由地下党梁富亲自安排，上午九点五十分我们吹响了第一遍口哨，队员们拉开了距离，第二遍口哨，个人把自己的炸药安放在铁轨上，第三遍口哨，点燃导火索迅速离开一百米外观察、记录响爆数字、“轰、轰、轰……”最后只响了二十二响，还有两个没响，我们又命令冲回去检查，直到全响了才后撤。

敌人没想到我们会在大白天没有列车通过的条件下“破交”，打他一个冷不防。也没发现我们，直到我们第二次冲回去的时候，他们才开枪扫射。地里的农民、路上的行人乱成一团，我们一面指挥老百姓跑，一面集中到树林子里。这时候，北安河、羊坊的伪军出动了。向我们两面夹击，我们被迫退到一块坟地里，枪声四起，眼看包围了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见远处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原来是县委书记常甫同志带领县大队冲杀过来，使我们二十四名队员安全脱险，无一伤亡，胜利完成了任务，保证了二纵顺利通过京北铁路，为解放全东北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闹得敌人脑袋疼

我们武工队经常深入群众开展活动，灵活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闹得敌人脑袋疼，一点办法没有。

那个时候国民党经常抓壮丁。有钱的主儿，可以买兵，让别人替他去，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去，也能安排在安全保险的地方，当炮灰的自然都是穷人的孩子。1947年底1948年初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县委指示我们，开展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破坏他们抓壮丁。我们武工队就分头到各村开群众会、青壮年会，讲解战争的大好形势，讲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面临失败的必然命运。那时候，宣传工作很少有现成的宣传材料。领导一布置，大家就开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出许多生动活泼的好形式。张国栋同志会唱京剧，他就编了许多词，用京剧腔调唱给老百姓听，效果很好。现在我还记得两段：

站立在面前把话讲，
尊一声老乡听端详。
别的话儿我不讲，
讲一讲日本鬼子侵我中央，
芦沟桥头枪声响，
国民党不抵抗逃奔了南方，
八路军真勇敢又把北方上，
抗战八年日本投了降。
日本投降人人乐，
恼恨那国民党他又还了阳，
它由南方发大兵又把北方上，
又是抓兵又是建大乡，
又是奸淫又是抢，
闹得百姓没有了主张。
没有主张，要想一想，
乘此机会参军拿起三八枪。
跟着共产党，
打败了蒋贼，
民主扬啊！

还有一段是鼓励老乡逃兵抵抗国民党抓壮丁的：

站在面前把话答，
尊一声老乡听根芽，
只因为蒋介石又把内战打
抓捕壮丁我才逃出了家。
你不跑，他就抓，
你要是跑了呀，他就没办法。
军民团结一齐打，
打垮了蒋贼再回家呀。

经过我们的广泛宣传，在羊坊、前后沙涧、台上、梁家园、埠头一带，先后有一千多青壮年逃到区政府

所在地的妙峰山上，打乱了国民党抓兵的计划。

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很讲究策略的。有时候召集敌伪人员家属座谈会，通过家属做敌伪人员的工作，动摇他们的军心；有时候给伪乡长保长去信，威吓他们交公粮，真假虚实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在西北旺大乡据点不远，有个六里屯，保长叫宋永宽，有一次我们写信公开向他要粮，警告他：“如果不交，就要你的脑袋”。宋永宽拿着信跑到西北旺敌人据点，向敌人提出辞职逃跑，他说：“我不给八路送粮，他们要我的脑袋；我给他们送粮，你们要我的脑袋，我只有辞职逃跑是一条活路了。”这下可把敌人难住了：让他逃跑，他们的事也没人办了，不让他逃跑吧！八路怎么对付？想来想去，伪连长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们睁半拉眼合半拉眼，你绕道给八路送去，千万别让外乡的知道。”这样，宋永宽给我们送粮就成了合法的了。其实呢？宋永宽是咱们的地下党员，这是我们摆的迷魂阵。

宋永宽同志干革命很坚决，那年他被特务董孚告密，国民党二〇八师把他逮去，差点没打死他，在家里养了一年，就是那样，他也没动摇继续为党工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1947年秋天，队长王秀川同志带领我们四个人在六里屯开展工作，由于特务董孚的告密使我们遭到敌人的突然包围，要不是他巧妙的应付为我们解了围，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那天，我们几个正在屋里玩纸牌，突然跑进来一个老太太，她风风火火地说：“不好了，快跑吧，敌人来了！”我们四个人一齐跑出了后院，藏在打谷场边上的厕所里。只听敌人进了院，又打又骂问：“八路跑哪儿去了？”我们听见老乡们说：“没瞧见。”正在乱的时候，宋永宽跑来了，只听他说：“哥们爷们的怎么回事？有八路？别听那风言风语的胡说八道，有八路我会不知，走、走、走，先到那边歇会儿去，”他连说带推，把伪大乡队的让到保公所里，让跑腿的买了一筐箩点心，沏上茶水，让他们吃个够，走了。

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在温泉以南三四里地，有个村子叫白家疃，这里是交通要道，敌人设立了据点，把守很严，1946年到1947年春，我部队几次袭击了这个据点，可是敌人又恢复了起来，而且碉堡越筑越高，伪军从十多人增到一百多人，到了1948年的8、9月份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敌人的反动气焰已经一落千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又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解放战争的重大胜利，宣传北平城里学生示威、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同警察搏斗的情况，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召集敌伪人员家属座谈会，让他们给自己的亲人写信，动员他们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我们还给敌伪人员的头子写信，指出国民党的末日为期不远了，敦促他们弃暗投明，不要继续作恶了。那时候，村村有我们的传单、标语。

据我内线人员反映：白家疃据点的敌人整天提心吊胆，夜里不敢在据点里住，偷偷的躲到南山上，军心已乱，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工作得好，劝降是可能的。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请示了政委（区委书记）李子明同志。经区委批准，派张国栋和我两个人空手上南山说服敌人。那是1948年10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当我们走到山半腰一个灰窑的时候，忽听一声大喊：“干什么的？”我俩抬头一望有一百多敌人手持刺刀枪向我们围过来。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和你们谈判来了！”张国栋同志口齿伶俐，说起话来比手划脚，富有鼓动性，气魄很大。眼看着敌人的刺刀伸到了脚前，他不慌不忙，抖擞精神，挥起手大喊：“你们不要这么干，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怕死我们就不空手到这里来了。”走在前边的敌人站住了，张国栋同志就大声疾呼地向他们讲开了形势：“我们正告你们，山东济南已经解放了，东北也将全部解放，东北大军马上就要进关了，国民党的命运不长了，你们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一条光明大道，你们要动武是死路一条！”张国栋同志是本地人，他认识不少敌伪人员，接着他就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随后他说：“咱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你们家里病倒的父母、挨饿的孩子，妻儿老小都怕你们死在外边，盼望你们早日回家团聚，都不愿妻离子散。

如果你们今天放下武器，我向你们担保，回家过太平日子，过去的事绝不追究。何去何从你们要好好考虑！我劝你们收起顽固抵抗这一套，你们杀死我们两个共产党员算不了什么！可是你们的后果要想一想，八路军是饶不了你们的！”说得敌人个个发愣，亚赛木头人了。这时候，张国栋同志发命令一样喊道：“把枪放下！”伪军你看我，我看你。紧接着他又喊道：“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国家过太平日子！”许多伪军说：“愿意。”我们说：“好，放下武器，马上给你们开路条！”话音一落，只见刺刀收回去了，上膛的子弹退出来了。“把枪架到这来，站队集合！”敌人乖乖地听我们俩调遣，一点数，有一百二十多人，一百支步枪，十三支手枪，一挺机关枪，一支冲锋枪。我们把他们带到老乡据点，以武工队的名义给他们开了路条，当场解散了全部伪军，枪支弹药让大车拉着，十三支手枪我用绳子串起来挎在肩上，得意洋洋地回武工队驻地。

县委敌工部长李云、区委书记李子明同志到武工队开庆功大会，号召大家学习张国栋和王树瑞勇敢机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

严惩顽敌

这一带地区，有几个反动家伙，县委指示一定要严惩，不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他们是不会老实的。

西北旺有个特务叫董孚，四十多岁，中等个，平脸。他是国民党二〇八师的铁杆特务。他多次破坏我们扩军、征粮，我们也多次争取他转变，他死不回头。这个家伙很狡猾，我们几次抓他都没有成功。他经常改变服装打扮，住所也不固定，有时他推个货郎车假装卖针线的，走乡串户，刺探我方情报，了解各村骨干。六里屯的地下党员伪保长宋永宽同志，就是他向二〇八师告密的。

西北旺驻有二〇八师一个连和一个伪大乡队，设有两个据点。1947年秋，武工队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抓董孚，我们埋伏在村外一块菜地的园子房里，听群众反映，他常经过这里。我们在这儿等了两天，也没见他个人影。等到第三天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董孚果然推着货郎车过来了，二班长认识他，一见他来了，马上要迎头去抓，我一把拉住他说：“别动，还是让他走过菜园子道口好，我们从背后打他个冷不防。”因为迎面出去，他一发现就要跑，你一开枪，据点里的敌人就发现了。”当他推着车走过园子口，我们从背后突然钻出来，出其不意，他还没明白过来就把他的嘴堵住了，我们连拉带扯，把他弄到玉米地里，按倒了，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因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能打枪，二班长就用刺刀扎他的屁股和腿，血流一地，当时认为他活不了，可是后来听说他没有死，我们就又给他写信，告诉他这次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不改恶从善，马上就要你的小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活动。

太舟坞有个地主叫甄明顺，这个狗特务自己有枪，早想抓他没得机会。有一天，张国栋和我在东埠头活动，听说甄明顺娶儿媳妇正在办喜事。我们两个一商量，晚上就去了。因为我不认识他，进了院子我就上了房，张国栋进了屋一看没有他，我在房顶上看见猪圈里有个黑影，我就把张国栋喊出来，同时我喊：“一班、二班埋伏好，听指挥！”（其实就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也下了房，一看他真在猪圈里，我个子大有劲，跳进猪圈，一把把他拉出来，我们俩把他拉出一里多地，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领子，举起手枪，照他脸就是一梭子，他应声倒下了。过两天，我们要贴枪毙狗特务甄明顺的大布告时，有人说他没死，眼睛打瞎一只，脸上穿了两个洞，在北京住院呢，布告没贴，我们一打听果真没死。等他出院回来，我们给他写信，令他交出手枪，不久他回信问：手枪交到哪里？我们又去信约定了地点，他亲自把枪交了，并且表示“以后再也不干特务的事了，你们征粮保证完成”。

北安河村有个中年妇女，外号叫“洋白面”，他是伪大乡长赵朴的姘头，他经常搜集我方情报向赵朴报告。1946年秋，队长王秀川领着我们北安河开展工作，住在一家开店的赵家大院。那天我们要改善伙食，吃大米饭炖猪肉。那时候，生活艰苦，平时摸不着这样的好饭吃。不巧，饭才熟，有人报信：“敌人进村了！”

好在敌人还没有包围大院，我们凭着地熟，打了一个多钟头，才突围出去，坐在山梁上，我打开夹着的草帽子，一帽壳米饭炖肉还热乎呢，折了两根棍儿就吃起来，别提有多香，这是我临走时盛在草帽里的，大家看见都和我抢着吃，后来叫我“饿不死的王树瑞”。

这次被围，经过查实是“洋白面”送的信。后来，我们抓住了她，执行枪决了。

1946年冬，东埠头一带有国民党青年远征军一个连驻在黑龙潭的山脚下，山脚下有个据点叫杨庄子。经过了解，据点里只有五个特务，都是当地的地主、伪保长的子弟。据点周围有电网，夜里通电，特务看守道口。太阳一出，电网断电。上午特务睡觉，下午他们就到各村活动。为了打击特务活动，由区委书记高树存带领一个小分队，夜间埋伏在特务的据点附近。上午十点左右，我们突然闯进特务的房子里，五个特务都脱的精光睡的正香，乖乖地当了俘虏。我们把他们押到北安河，五个特务的家里都托人找我们谈判，说：“只要把人放回去，要什么条件都答应。”我们要他们送来五只驳壳枪、五十发子弹。没过多久，他们就把枪和子弹放在点心匣子里，以走亲戚为名，给送到武工队来了，我们对这五个特务说：“以后不能当特务了，武工队到村征粮，如不完成，格杀勿论。”他们连连点头说：“照办、照办。”

1947年冬天，驻守门头沟龙泉务的伪军九大队，到我昌宛县上下苇甸抢粮，我县大队在上苇甸的山上把伪军九大队三百多人追击下来，他们狼狈回逃。这时，县委指示武工队在两小时内赶到单里村山头进行阻击。单里村距我驻地妙峰山四十里，我们一路奔跑，按时赶到山头，才架起机枪，九大队就逃窜到山脚下了，这里只有一条小山道，路外手就是滚滚的永定河，我武工队突然火力齐发，敌人乱作一团，往回跑，我县大队已经追过来，一场激战，九大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正在阻击时，突然武工队背后响枪，原来小山坡上还有一班伪军，我和李长春立即冲上去，几颗手榴弹扔过去，我俩大喊：“交枪不杀！”十二名伪军举手投降。县委表扬我们这次阻击战，跑得快，打得狠，取得了全歼九大队的胜利。从此，伪军九大队再也没有成立起来。

王秀川同志永远活在平郊人民心中

平郊武工队从1946年夏建立到北京解放前夕，历时三年多，回忆走过的战斗历程，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取得的每一项胜利都是在区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和当地群众无私支援下取得的。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武工队的每项胜利又都与我们有一位英明的队长——王秀川同志分不开。

秀川同志是门头沟区沿河城人，高小毕业，1937年八路军进驻沿河城，他就是自卫队的队长，1942年日本宪兵队逮住他，给他施加酷刑，过电，灌辣椒水，手指扎竹签，他都没有暴露我方情况。1943年他十九岁，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他长得英俊，细高个，白肉皮，浓眉大眼，留分头；他性格温和，我们都说他是大姑娘。可是在战场上，他却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和人民心连心，他带领我们为老乡干活，和老乡拉家常，体贴群众疾苦，乡亲们亲切地称他“王区长”。

秀川同志常和大家讲：“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共产党员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冲锋陷阵的光荣战士。”他用自己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几次家里捎信来说父母有病让他回去看看，他都不曾放下工作回家一次。在我们几次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他总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高喊：“跟我冲”、“不要管我！”带领大家安全脱险。这样同大家生死与共的好队长，怎么不让人打心里信服他、尊敬他呢？不幸的是，他没有看到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而在胜利的前夕离开了我们。

那是1948年旧历三月十四日，秀川同志带领我们五个人在小峪河村开辟工作，吃过早饭，他来到前院小杂货铺串门了解情况，说话间走进一个人来。秀川上眼一看，就觉得可疑。秀川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催粮草的。”秀川说：“你听着，我是八路军，你不要再干欺压老百姓的事了。”那人吓得直哆嗦，连声说：“是是是”。随着，秀川说：“我们八路军在山东孟良崮一举歼敌四万多人，华北的石家庄已经解放，东北除沈阳、

长春几个孤城,已经全部解放,刘邓大军已经胜利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蒋介石就要垮台了,全国将解放。你们不要再干坏事了,唯一的出路是回家当老百姓,如果再干祸国害民的事,共产党是要跟你们算帐的。”那人连连点头,满口答应“是是是”,最后秀川说:“今天放你回去,以后看你的表现了。”那人点头哈腰的走了。

下午三点钟,秀川一出门,见对面房上有人,他马上退回来,这时对面房上敌人喊道:“交枪不杀!”原来我们已经被包围了,秀川马上作了突围的安排:“先把对面房顶上的敌人压下去,随后跟我冲”。我们顾不得突然事变产生的慌乱,连枪带手榴弹一齐往对面房上打去,迫使敌人下了房,紧跟着在几颗手榴弹硝烟中,秀川一声大喊:“跟我冲!”我们就窜了出去,硝烟未落,我们已经冲出了大院,一直向着村南的小桥跑去。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时我以为已经冲出来了,后边的敌人追不上了,谁想到当秀川第一个踏上小桥的一眨眼间,桥对面突然发生猛烈的射击,只见秀川应声倒下,他急切地向我们喊道:“不要管我,快撤!不要管我!”我们几个人向各处分开了。

我跑了十多里地,后边枪声听不见了。实在跑不动了,嘴里渴得冒烟儿,就爬在稻地里啃才溶化的泥水。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嘴里吐出的气马上变成一股白烟。虽说天气很冷,可是我浑身的汗水都流湿了衣服。我爬在地里望着远处出事的方向,心想:“他们怎么样了?秀川他……我不能一个人回去,我要摸清他们的下落”。我来到苏家坨村边,这个村东西有五里地长,有三个敌人据点。天黑的时候,我悄悄地摸到村边一个老乡家,我叫开门,一看他家有老两口和一个儿子。老大爷见我浑身是泥,心里有点发毛,我也顾不得拐弯抹角就直接向他说:“老大爷,你别害怕,我是八路军,我想求您打听个事。”大爷问:“什么事?”我说:“听说小峪河村下午发生了战斗,您去给我打听一下双方伤亡的情况”。老大爷一听,犯了难,摇着头说:“这可不成,要是碰上国民党……”我没等他说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爷,您可以装作是走亲戚或者请大夫的……”不管我怎么讲,他也不肯去,我急了:“这样吧!我把你儿子带走,在村南坟地里等你,天亮以前你要是不去,我就带走他!”说着,我拉起他儿子就走,老俩直央求我,我说:“你老俩放心,我保证孩子的安全。”老头无奈,只得去了。

为了防备万一,我和那孩子在距坟地一百多米的小沟下等着。天虽然很黑,可是呆时间长了,反而能看见四周的动静,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个人影向坟地走来,我问那孩子:“那是你爹吗?”小孩眼尖,一看就说“是”,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没有别人,才让孩子把他爹叫过来。老乡跟我说:“我问清了,下午有五个八路被包围了,死了一个,逮住了一个,跑了三个。伪军死了一个。”听他说,死的那个八路,留大分头,在小桥上打断了腿,国民党想抓活的,往过一跑,那人一甩手枪,就把当头的伪军打死了,随后用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听人家说那人可是条硬汉子呀!”“秀川同志永别了,我的好队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流下来,我用袖口抹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我感激地拉着老乡的手说:“惊动您了,老大爷,实在是对不起呀。这半夜三更的。”老乡领着儿子走没在黑夜里,我又走了十多里地回到武工队驻地——车营,向政委李子明同志汇报了情况。秀川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平郊人民为失去自己的好武工队长悲痛万分。在追悼大会上,人们痛哭流涕大放悲声。时至今日,平郊人民回想起解放战争时期,没有不提到王秀川的大名的,而且每当提到,人们都赞叹不已。王秀川同志永远话在平郊人民心中。秀川牺牲后不久,东北大军进关,包围了北京城。我们武工队根据上级指示,有的南下,有的开展城区斗争,有的参加野战军,为解放全中国踏上了新的征途。

注:

①全国解放后,我们镇压了特务崔严。他是假装催粮草的被王秀川同志教育后放回,去沙河伪大乡报告,沙河大队和昌平县大队纠集一百多名伪军包围了我们。

②此稿又经常甫、张国栋、宋永宽提意修改。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建委干部

解放前房山境内几股反动武装的历史演变及其活动

史长义

国民党联合地主豪绅组织联庄自卫

民国十七年后，国民党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依靠当地的反动势力，组织“农民协会”，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

当时西北区(原属房山四、五区，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三、五区)的重要人物是殷耀东。殷耀东系东庄子村人，祖父是满清时代的大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成了国民党的红人。家族中有两人在国民党内任要职：一个是殷子固，解放前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秘书；一个是殷祖豪(殷耀东的亲哥哥)，系国民党中央委员。由于殷家在政治上极有势力，在经济上也就成了西北矿区的统治者。吃干股(势力股：不拿本，赔了不管赚了使)、开公司(矿产物归公司统收统卖)是他们统治西北矿区的重要手段。

而东北区(原属房山三区，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一区)的统治者，是晓幼营的王凤来。王凤来家是几辈的大地主，有花果树园二千余亩。他奴役东北区百姓的手段是包干枝(先拿出很少的钱，五年或十年后，树上结的果实均归钱主所有)和指树借钱。

除了殷王两家外，西南周口店的常家也因作过满清的功臣，在国民党中有势力而统治了周口店地区，垄断了周口店地区的商业。

像这样一些地主豪绅，为了保护剥削来的利益，就要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国民党正是利用地方势力的这种心态，组织所谓的“农民协会”，在各村抓派青年壮丁，强迫买枪进行武装；并且经常集中几百人的队伍到各村游行或训练，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这便构成了房山反动武装的雏形。

生活窘迫 土匪四起

由于有了国民党这个政治上的靠山，王凤来就加紧了对东北区人民的压榨统治，他强迫本主把所有指树借钱和典当手续都给他写成死契，使本主很难摆脱他的剥削。于是当地的人民生活无着，只能出卖劳力，走窑修堤，聊以度日。在冬天，不能出卖劳力时，就背些砂锅到外乡去卖。长期下去，这个地区的百姓就具有了很强的流动性，也练就了小商人般的世故和圆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白土面子，沙锅片子，荒河沿子。”民谣的意思是讲东北区的百姓不好惹，其实也正说明了东北区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形。于是，一部分青年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便形成各地土匪四起的局面。当时东北区有刘老虎集中100多人在戒台寺、金蝉洞一带盘踞，经常到平郊和东北区一带绑票和抢劫(这支土匪后来被王凤来找来廿九军剿除，刘老虎被捕)。西南则有娄子水的胡振海集中一部分人到处挖蘑菇(盗坟)、劫道和绑票，造成社会的极端动乱。

抗日初期各统治代表的动态及矛盾

抗日开始时，殷耀东以东庄子村大商会为基地，王凤来以常乐寺、王佐为基地，仍以自卫的名义继续强

迫各村买枪，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西南地区土匪头子胡振海、周文龙、张胡子等抓紧这个机会，把中央军扔下的武器和一部溃散成匪的中央军，连同投奔的土匪纠合在一起，组成一支几千人的匪帮。羊耳峪村苏志超(大恶霸地主)也组织起一支联庄自卫的武装。当时这几支武装的矛盾和活动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东北区因靠近平郊，王凤来又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最招日本人喜欢，当时日本派宣抚班四人经常驻在王凤来家中，给他撑腰。他一面驻在坨里封锁西北，一面与西南的红箍对立。殷耀东比王凤来顾虑多，为了保存并扩大他的势力，一方面联合西南的红箍，一方面和驻长操村的抗日民主专员公署合作，借抗日的名义继续收集枪支，扩大势力。但西北区粮食困难，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经常要到东北区抢粮。殷耀东部下一到东北区就乱抢乱闹，带不走的粮油就扬撒在道边或街道，造成西北区与东北区的对立。西南胡振海的土匪，先叫复仇军，后又叫人民抗日军；胳膊裹红箍，专干抢劫绑票的勾当，老百姓都叫他们红眼军。为了便于在平原上绑票和抢劫。他们联合西北的殷耀东，到东北地区活动。

日寇的进攻与各部的分化

日寇为了在良乡境内伸张势力，首先给王凤来戴上剿匪司令的头衔，同时派大批日军到西南地区，一面扫荡，一面秘密拉拢殷耀东。殷耀东发生了动摇，怕我们改编他的队伍。便经常把队伍拉到山头上表示和我们对抗，准备投降日本。我方识破了他的阴谋，一面号召爱国人士团结起来，真心抗日，一面在河南村把殷耀东控制起来，收缴了他的枪支。对殷耀东的部下，我方指出，愿意抗日的继续抗日，不愿抗日的听其自便。当时檀木港郝绍尧、李各庄赵然等爱国人士跟着共产党起来抗日，殷耀东、殷宗虞等国民党分子，跑到房山城投降了日本。同时，西南红箍在日军军事威胁下，大部投降日军，小部分被我方缴械。周文龙等投降涿县，孔宪江、张德祥、陈亚林投降到房山。

组成房山伪警备团

日寇进驻房山县城时，王凤来任警察大队长，掌握整个房山境内的军事大权。孔宪江、殷耀东投降后，殷耀东等国民党分子利用党团活动，首先掌握了红箍，并且一方面把殷宗虞打入王凤来的亲信尤茂芝部下，拉拢尤茂芝；一方面把王凤来扣押起来，由孔宪江、张德祥、陈亚林等掌握起军事大权，把苏志超、王凤来全部收编到孔宪江部下，组成一千多人的房山县伪警备团，孔宪江任团长。

自卫团的再次成立

王凤来被推下台后，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和在东北区的统治，他的儿子王景安投靠日本人，又在坨里成立武装特务队，王景安任特务主任。武装特务专门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破坏抗日工作，阻碍我们的抗日活动：和抗日干部接近的就活埋，有嫌疑的灌辣椒水等。日本进到西北区建点时，殷耀东马上带着段治安、田耀东等回到河套沟。殷耀东当后台老板，段治安联合李各庄段福森等组织自卫团；田耀东联合河南村恶霸地主张宝宇等组织维持会，配合日本统治了西北地区。

日本投降后各部武装的活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分子、大汉奸李仲三担任六县联防司令兼房山县县长。各地的伪军、警察、武装特

务、自卫团等都集中到房山城内，归李仲三指挥。孔宪江被我打死，张德祥任团长。他们依据房山县城向外活动。在军事上除包围捕捉我工作干部，以屠杀手段镇压人民复仇运动以外，还配合政治宣传；到处宣传“我们跟真八路合作，真八路军在延安，我们打的都是土匪”，借以离间抗日民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

复仇运动与还乡团的成立

日本投降后，西北区全部和东北区北车营一带十几个村庄，都搞起了复仇运动。王景安、殷耀东、郑师桥(坨里大地主，日伪时的坨里乡长)、杨洪志(北车营村地主，日本的大灰厂警察所巡官)等到长辛店一带收拢被人民清算的一部分汉奸、恶霸、恐慌逃跑的敌伪人员、流氓分子、地主和流亡大乡队成员组织还乡团。他们当时的生活费和枪支费，完全依靠在芦沟桥、长辛店的交通要道上勒索东北区和西北区到北平、丰台卖山货的百姓。他们经常在夜间突然到东北活动，专门屠杀我村干部，制造了很多惨案；并利用特务活动威胁群众，威胁我村干部，诱我干部群众投降。当时有一部分认识模糊的村干部跑去参加了还乡团，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了损失。

还乡团的继续发展及活动

全面内战爆发后，各地还乡团跟随在蒋军的后面，到坨里、焦各庄等地安下据点，胁迫我各村干部一部分一部分地参加了还乡团。当时他们的活动，除抓紧据点附近各村征粮抓兵外，为破坏解放区工作，经常到我边沿区扰乱，特别是在每次群众运动时更厉害。1947年5月复查时，他们计划了一次大的进攻，刚走到河北村，就踏响三十多个地雷；接着又奔袭包围檀木港、北窖，突击河北，抢去北窖、檀木港、李各庄等村很多牛羊等胜利果实，并拉走一部分地主、富农和群众。后来我们逼近据点，他们又实行了一种军政经结合活动的办法，把磁家务、北车营等边沿村庄群众全部赶走，制造无人区。以后每次出来活动都把赶走的群众组织起来，胁迫他们到边沿地区抢粮，并胁迫一部分青壮年带枪保护抢粮，以此逐渐拉他们加入还乡团。此外，还乡团利用跑出去的一部分地主，做造谣宣传，制造蒋统区人民对解放区的恐惧。在他们这种活动下，又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的青壮年和被蒙蔽的农民参加了还乡团。

3760部队的编成与士兵成份的改变

在我军胜利进击的震慑下，张德祥把所有的伪军和十三个大乡的还乡团共三千人合编成三个团，沿用河北省保安旅的编制，组成番号为3760的部队。张德祥任部队长。这个部队在开始时，伪军还乡团合计有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内，敌伪人员、地主、流氓占绝大多数。这些人由于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认为我军俘虏中央军放，俘虏伪军还乡团杀，所以战斗坚决，不开小差。在西南几次伏击和坨里的歼灭战以及我们对伪军和还乡团的宽大，使还乡团和伪军开小差的增多。迫使其抓新兵充数。抓到的新兵，农民成份居多，由于被严格监视，不敢逃跑；这样，老兵逐渐减少，新兵的比例逐渐增多。1948年解放前夕，3760部队的三千人中，农民成份的新兵就占了二千至二千五百多人，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成份。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系区文联主席

我在沿河城三年的地下斗争

王树瑞

1941年1月，平西区党组织派我到沿河城日本警务段为日本指导官当“拨役”。让我以这个身份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我平西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3年11月杀死日本清水小队队长、火烧警务段，前后近三年时间。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党的教育、培养、信任和严肃的斗争考验，却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做一简要的回顾。

“一郎”

1940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门头沟的沿河城。沿河城地处丰沙铁路线的中上段，离北京(当时叫北平)八十公里，是进攻我平西根据地，掠夺我平西矿产资源的交通要道。

日本进城后，又筑碉堡又建警察所、维持会。为了讨伐平西游击队和掠夺矿产资源，保证铁路运输安全，他们还设立了警务段。警务段里有十多个日本指导官和三个中队伪军，约四百左右人，他们叫满铁队。

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区，领导平西人民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我方获悉：警务段要让维持会给他们找几个小孩到那里当“拨役”。有一天，我大哥王树芳从山上打柴回来告诉我：“老韩、老王让你回家去一趟，他们在大核桃树底下等你有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知道大哥是地下交通，不该他说的话他一字也不说。

我走出家门，心里盘算：“一定是有重要的事，不然为什么他们俩人找我呢。”老韩叫韩晓照，他是我宛平县敌工部的干部，老王叫王学强，他是区公安员。我大哥常给他们送情报，我跟他们也很熟。

我的家原住在沿河口，离沿河城三里地。日本占了沿河城以后，害怕游击队袭击，敌人实行大并乡，就把五里三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住，我家也被赶进城，就住在离警务段第三道铁丝网大门不远的地方。老百姓上山打柴、回老家背粮拿菜才许可出城。我哥哥就是借上山打柴和游击队接头。

我进了沿河口村，远望大核桃树底下一个人也没有。等我走到树底下的时候，王学强同志在地堰下边等着我呢。他说，“给你寻个吃饭的地方。”他知道我从小没父母，生活很苦，才这么说。我问他上哪儿，他说给日本人当“拨役”去。我不明当“拨役”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给日本人当使唤人。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伺候日本人，我饿死都不去。”他笑着对我说：“拨役是你公开身份，你的任务是搜集日本鬼子的情报。为了完成任务，你要好好的伺候他们，挨打挨骂都不能跑回来。”我这才明白，这是交给我的任务。我问他：“我才十三岁，干得了吗？”他说：“人家要的是小孩，大人还不要呢，我们看你成，才让你去的。”最后他告诉：“你的代号是101，以后有情报写在纸条上可不能写你的名字，要写101，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几天以后，维持会就把我领到警务段，让我伺候日本小队队长石山和清水两个人。他们给我起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一郎”。

扑空

才到警务段，我不熟悉伺候日本人的事，时常挨打。要是由着我的性儿，早就不干他妈的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眼泪咽到肚子里，把满腔怒火压下去。有一回，清水小队长说我没有把他的碗洗干净，把我叫去，不由分说，大嘴巴一个挨一个的抽我，我的脸和嘴立刻就肿起来了，最后一脚把我踢进屋里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跑回家去，见到我哥哥、嫂嫂就伤心地哭起来，告诉我大哥，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了，让王学强换人吧。我大哥看我被打得这个样子，也很难受。他找到王学强同志一说，老王说：“回来可不成，打不死就得去。你告诉你弟弟说，记住日本鬼子的仇恨，咱们打他的日子在后头呢。”后来，三个日本兵也出来找我，我才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慢慢地学会了怎样伺候他们，挨打的时候也少了，我跟他们也混熟了。因为我每天要给他们打扫卫生、做饭、买菜，所以我可以随便出入石山、清水的住屋和警务段的大门。

1941年4月一天，交通员王树芳和索振斌找我，说王学强同志让我到沿河口去一趟。我到那里，老王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搞一份满铁队的花名册。我知道花名册就在石山的保险柜里，钥匙就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可是因为我的文化低，就是拿出花名册，一时半会儿我也抄不完，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等石山到北京休假去了，在清水队长晚上洗澡的功夫，我走进石山的办公室，打开保险柜，取出了花名册，让通讯员索振斌按照约好的地点把花名册交给了王学强同志，他们抄好了又让王树芳给我送回来。

1942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天阴得很沉，伸手不见五指，天气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忽地起了一阵风，跟着霹雳闪电，瓢泼大雨下起来了。我一看没什么事了，就躺下睡觉了。没想到，半夜石山把我叫起来，说让我给他们做饭。我心想：“半夜三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我正在淘米，石山把翻译官找来，他俩叽哩呱啦地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听见有“游击队……沿河口”六个字。我一捉摸沿河口一定是有什么情况。我急忙把米下到锅里，顶着倾盆大雨，爬过三道铁丝网，一口气跑到我的家，告诉我大哥王树芳，要马上通知王学强同志，今天夜里敌人有行动。

凌晨三点钟，日本兵和满铁队冒雨出发了。没想到天刚大亮，他们就回来了，只见大雨把他们淋的跟小鸡子一样。我见石山满脸怒气，就赶忙给他打洗脸水、换衣服。他发疯地嚎叫“他妈的，什么情报，统统是假的！”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倒在椅子上。

事后我才知道，多亏我及时送出了情报，那天夜里王学强等人正在沿河口开会，他们接到情报立刻转移到山上，敌人包围了沿河口，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那次情报是王树芳、黄恩博两个人用大绳把索振斌、李集云从城墙上送下去，为争取时间抄近道送给王学强的。

刀放在了脖子上

沿河城的日本鬼子，常遭到我平西游击队的打击，他们越来越胆小，就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为了增强防卫，他们又在离沿河城十五里的楼岭山上，增驻了一个伪军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是封锁我根据地各村的联系。

为了打击敌人，韩晓照同志让我摸清楼岭伪军的活动情况。我通过满铁队的人，了解到楼岭小分队有三十多人，每个月要换一次防。在换防时，他们要带的是一个月的粮食、弹药。粮食、弹药都由民夫担驮，伪军在后边押送。有一次换防，我事先摸清了他们的换防时间、行动路线，而且了解到这次是由满铁队的刘队长护送。然后我把情报交索振斌送给王学强同志。到了那天，我游击队埋伏在通往楼岭的王乐口村附近。当

伪军和民夫走入埋伏圈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民夫一听枪响都跑了。刘队长挂了花，伪军一看队长挂花也都四散逃跑了。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获了敌人一个月的粮食、弹药。

满铁队的伪军，都是咱中国人。不少人是被迫当兵的。为了争取他们便于开展工作，我有时偷点日本人的饼干、罐头给他们吃。有一个姓杨的小个子，我叫他小杨。他老家是昌平县人，有个老娘跟他在沿河城住，生活很困难，我也常搞点吃的给他老娘吃。

日本指导官里，有个叫佐藤的，他管弹药库和食品库。他常让我帮他打扫库房搬子弹，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些子弹，然后再送到交通索振斌那里，由他再转给游击队。我偷的子弹，装在一双日本人的白袜子里，然后扎在我的裤腰里。我送出的时候，都在日本人还没起床的时候。没想到，日子长了，佐藤对我有了怀疑。有一天早晨，我又在日本兵没起床的时候出去送子弹，一出大门没走多远，就看见佐藤在半路上等着我呢。他问我上哪去，我说给石山买菜去。他问我腰里鼓鼓的是什么，他上前一把拉住我，从腰里把两袜筒子弹掏了出来。他把我拉到院子里，问我是不是给八路送去，我一口咬定：“不是，我是给满铁队的小杨子送的。”因为我过去跟小杨子偷过，所以我才敢这么说。佐藤问：“为什么给他偷？”我说：“小杨子说他的子弹不够用。”佐藤说：“你说谎！”只见他“刷”地抽出了大马刀，一手揪住我的耳朵，把刀就放在了我的脖子上。他喊道：“不说实话就死啦死啦的有！”他听我还是不改口，就收回了马刀，派人把小杨子找来。小杨子一看这阵势就吓坏了。佐藤问他：“这子弹是不是给你偷的？”小杨子说：“我的子弹不够，他给我偷过。”佐藤把小杨子我们俩，一人打了几个嘴巴，这码事就算完了。这回要不是小杨子一句话，我的脑袋就掉了。

攻心战

为了瓦解敌人的斗志，我华北地区把日本战俘组成一个“反战同盟会”。让他们写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宣传品，然后散发到日本军队里去。

有一次，王学强同志让我把宣传品带到日本指导官那里去。我就利用每天到火烟楼那里给日本人取矿泉水的机会，让他们把宣传品送到火烟楼等我。有一大卷，外边包装得还挺好看。我气喘呼呼地扛回来交给石山小队队长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小泉子那里拣的。”鬼子知道我不识字，所以他们并不怀疑我。石山看了“哈哈”大笑，他把那些东西又卷起来。后来运到北京去了。象这样的宣传品，我带进去好几次。听日本人说，那里有些是讲日本人怎样过樱花节的。这是个日本全国性的大节，每到这天，全家都要团聚欢庆。日本兵看了宣传品，自然就会怀念亲人，思念家乡，不愿在中国打仗。我叫它“攻心战”，后来我也想方设法的做这方面的工作。

有一次，清水小队队长喝了酒高兴，让我给他唱歌。我说我不敢唱；他问为什么，我说那都是八路唱的。他说：“没关系，唱给我听听。”我就大胆地给他唱：“五月的鲜花”、“芦沟桥小调”，还有一个小调，歌词是我们游击队编的，是唤起日本兵思念家人团聚的，有几句词我还记得：“家住东洋三岛上，爹娘、父老都在高堂，幼弟十五妹十二，最可悲——新婚三月好梦征程……”后来不但清水让我唱，日本兵也让我唱。那时候，我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语，一边唱还比比划划的解释歌词的大意。有个长得傻里傻气的日本兵，我叫他“傻柱子”，他是管弹药的，经常挨打。他越挨打，我越接近他，给他唱歌，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跟他混得很熟。后来我就给他做工作。我说：“他们竟打你，你到中国来做什么？还不如逃跑呢。”他说他不敢跑，因为家里还有父母、妻子呢。我就利用和他的关系，多次打着伪军的牌子向他要点子弹、药品，然后再给游击队送去。有时候为了拉关系，也要点饼干、罐头送给满铁队伪军吃。

我们搞“攻心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矛盾，对日本鬼子和伪军区别对待。当时我华北战区有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不杀”，就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那次日本鬼子包围

沿河口扑了空，就总想袭击我游击队驻地。有一次，我听说他们要到西大台村清剿我游击队，我就及时地送出了情报。我游击队埋伏在西大台村外的两个山腰上。

日本鬼子有个孙翻译，是个东北人，这小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沿河城内就有十几个妇女被他奸污。他也穿着日本鬼子的黄军装，伪军穿的是绿军装。这天他们出发还跟往常一样，让伪军在前头，鬼子在后边。上午七、八点钟，进入了埋伏圈，我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真是“兵从天降”，敌人一下子乱了阵，火力集中打击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十几个鬼子被打死了七、八个，那个汉奸孙翻译也当场被击毙。沿河城的老百姓，听说这个坏蛋被打死了可高兴了。都说游击队给群众除了一大害。说来也巧，这次满铁队的伪军一个也没伤亡。吃饭的时候我听他们议论：“八路军的子弹都长眼了，专打穿黄衣服的鬼子，不打咱中国人，往后咱可不能作恶。”这次对伪军教育不小，一直到1943年11月我们消灭日本指导官，打死清水小队长时，他们都没出兵支援鬼子。

拔钉子

我平西游击队先后派进警务段的还有师长敏、李继云，他俩在满铁队工作；还有一个小刘（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在日本兵营房里工作。我们当时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凑在一块玩，日本人也不介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搞点鬼子的香肠、罐头、香烟，晚上在一块以打麻将牌为名，互相谈谈个人知道的情况。然后就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写成情报，交给在城里活动的交通员索振斌、王树芳、黄恩博、韩志兰等人送给游击队。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1943年10月底，我平西游击队提出要消灭指导官，拔掉警务段这个钉子。王学强同志和我接了头，让我首先摸清敌人的情况。我借帮佐藤清扫弹药库的机会，查清了库房里有十一万多发子弹，几支手枪，几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我从满铁队那里了解到小杨在11月5日夜里值班，我还了解到11月3日有一部分鬼子回北京休假。我就根据这三点情况写了情报，交给王树芳送给王学强同志。过些日子我接到王学强同志指示：行动日期定在11月5日夜12点，让我设法把鬼子灌醉，打开大门，接应游击队。

11月3日，石山队长和一部分鬼子回北京休息去了，院内只有清水小队队长、佐藤、小松、山口、大成等几个人了。每当石山一回北京，剩下的鬼子就散漫自由了。到了五日这天鬼子悠闲无事。下午我就跟管烧洗澡水的索振斌说：“今天早点烧洗澡水，让他们痛痛快快的洗洗。”水烧好了，我就请清水他们洗澡。我就在这个工夫到他们的屋里，把他们的手枪、大枪、子弹都给锁在他们自己的箱子里，手枪套还挂在墙上。如果他们发现，我就说：“你们都洗澡去了，院里我一个人怕出事。”做完了这事，我又马上把早已准备的酒菜摆满了清水的办公桌。几个鬼子洗完澡肚子也空了，我就顺势把他们让进清水的屋里。他们大吃大喝起来。喝过了一个时辰，就有一个鬼子支持不住了。我就把他扶上床让他睡下，其余几个也喝得东倒西歪了，我就把麻将牌拿来让他们打牌。我说：“今天晚上，你们就痛痛快快地打吧，我出去给你们放哨站岗，保险太平无事。”他们大喊大笑的打牌，我就出去了。我先把四架修电话的梯子顺到围墙外两架，墙里立上两架。我为什么要立梯子呢？因为警务段是个方圆半里多的大院，院墙有二丈多高，墙外有三道铁丝网。指导官的日本鬼子住在院的南头，北边住着满铁队的伪军，还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大岗楼叫大板仓，里边住着一班日本鬼子，南北相距有半里远。我们的游击队如果走正道，进了大门还要往北走，绕个大弯经过两、三个岗楼才能到指导官的宿舍。这样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如果进了大门就翻墙过来，下墙就是鬼子的宿舍了，这样又安全又快。

时间不早了，我心里很不踏实，生怕情况有变化。为了探听动静，我到伙房里拿了一块羊肉，借口给家送肉，到大门的岗楼里向小杨要出了钥匙，小杨子还说：“回头给我弄点吃。”我说：“那还不好办。”我打开

三道大门，出去一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心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往上提，简直要跳出了嗓子眼儿了。

我回来的时候，三道大门都没上锁，我告小杨子说：“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出去，门没锁，省得再开了。”我又回到南屋，见清水他们打得正欢，我又给他们添了添灯油，拨了拨灯。

我第二次出大门时，走出第三道铁丝网没几步，就看见两个人影，站在头里的那个人问我：“你是黄家的外甥吗？”我说：“是。”那人又说：“那你也是我的外甥，我是李文华。”我大舅黄国珠、表兄黄恩普都是我宛平县的干部，我听他们说过李文华是游击队长。我叫了他一声“大舅”。他说：“咱们走吧。”我说：“你们再等我一下，我得先和大门岗楼的小杨子说好。”站在李队长身后还有一个膀大腰圆的大个子，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急速地回到岗楼对小杨子说：“小杨子，游击队杀指导官来了，我也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一听八路军要来，有点害怕，他说：“我有心想跟你走，可是我的老娘怎么办？”我说：“那也好，今天是来杀鬼子的，碍不着你的事，只要你不打枪，也不杀你也不逮你。”他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明白。”说完，我就跑出去，领着李队长、大个子他们，一共五个人爬梯子上墙，从墙上直接就登上了清水他们打牌的南屋。又从南屋顺墙头上了东屋，从房顶上看清了四个鬼子打牌的情况。就在这时，不知谁登下来一块瓦，“叭”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我看见小松警觉地大喊：“谁呀！”、“谁呀！”只见李队长和那个大个子紧跟着扔出去两颗手榴弹，大个子又顺手打了一梭子枪，屋里的灯立刻灭了，鬼子乱作一团，只听见他们在大连铺上“通通”地跑，我知道他们是找枪呢，心里好笑。我跟李队长说：“放心吧，他们的枪和子弹都让我给锁上了。”随后我们六个人都从房上跳下来，我溜进西屋，急中生智，拿起字纸篓，倒上煤油，点着了猛地向南屋一扔。我们也随着火光冲进去。这时清水也看清了我，他瞪起两只血眼，“呀！”的一声，向我冲过来，声嘶力竭地喊：“一郎，你的心大大地坏了坏了的！”我们俩扭打起来。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个“大个子”一个箭步上来，拦腰抱住了清水，我抽身出来，拿起“大个子”的大山镰刀，拼命地照着清水的大肚子砍去，还有的拿手榴弹砸他的脑袋，几下子就结果了他的狗命！字纸篓的余光，照见床下有两只脚，拉出来一看是小松，也让我用大山镰刀砍死了。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五个鬼子就上西天了。

埋伏在外边的游击队和五百多民夫，听到枪响也顺梯子涌进来，抢走了枪支弹药，在日本洋人服务社当会计的李青云也把库房打开，把食盐、香烟让大家抢走。大伙用山镐从岗楼的枪眼开了一个大洞，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撤离了。我点一把火，把鬼子的信鸽房，库房都点着了，火光照亮了游击队和群众前进的道路。

这次警务段的伪军没有动，大板仓的一班鬼子也只打枪，没敢出来。在拂晓前，我们安全到达了根据地——王大台子的外曹子村。天亮以后，我们开了庆功大会。韩晓照和王学强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县游击队政委谭林同志把我高高的举起来，夸我是中华的好儿女，任务完成的很好。韩晓照、王学强也表扬我这次任务计划得好，完成得好。我跟韩晓照同志说：“多亏游击队里的那个‘大个子’，要不是他手急眼快劲头大，我就得死在清水手里，”韩晓照说：“他的外号叫‘干得了’，也跟你一样是个从小没父母的穷小子，他也是拓峪村的人……”可惜的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从那以后我就没见到过他，可是‘干得了’却永远记在我心里。

继续战斗

随着沿河城战斗的胜利，我被党派入警务段为日本鬼子当“拨役”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做为“101”我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了。我随游击从来到了根据地，在那里受了两个多月的训：因为我当时才十五岁，不便于参加游击队打仗，王学强同志就让我继续做沿河城的敌工工作。

后来日本鬼子又重建了警务段，他们把我哥哥王树芳逮去打了一百多棍子，问我跑到哪儿去了，我哥哥也没说。为了控制我哥哥，鬼子把他留在警务段挑水。我因为暴露了身份，不能直接出面活动了。在1944年3、4月，王学强找了两个人，帮我在包家坟的南山上挖了一个洞，让我在那里隐蔽。那里是个深山老林，

没有人去，条件十分艰苦。吃粮靠我嫂子送，吃水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泉子提。有时吃的接不上了，就找些野菜野果子吃。我哥哥借回家吃饭的机会把日本鬼子的情况告诉我嫂子说，我嫂子借给我送粮的机会再告诉我说，我再转给王学强同志。那时王学强住在离我十五里远的东柜山上。就这样我坚持了一年多。日本投降以前，驻守在沿河城的日本鬼子被迫撤离了。1946年4月，经王学强同志介绍，平郊武工队队长王秀川把我调到昌宛七区武工队任敌工委员，为解放全中国，我又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受了锻炼。解放北京时，我被调到补训团当指导员训练俘虏，一直到全国解放。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房良一区事变

区史志办公室

1940年11月，房良县一区连续发生多次事变：13日的庄户台事变，15日的堂上事变，17日的黑牛水事变，从10月14日到11月中旬的王老铺事变，以及宝水、龙门台事变。

这一系列事变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房良一区由旧房山县（1937年前的房山县）九区和八区的四个村（芦子水、宝水、东村、蒲洼）合成。一区当时辖堂上、龙门台、四马台、北直河、王家台、石板台、霞云岭、上石堡、下石堡、银水、三流水、大草岭、芦子水、蒲洼、东村、宝水。一区地处山地，东西长一百零七里，南北长四十余里。村落大都在沟里和沟的北坡上。居民十分分散，交通极为不便。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耕种的皆是山坡地，作物以谷子、玉米为主。芦子水至四马台山地产煤，有土法开采的煤窑十多个。还出产杏仁、桃仁，每年运往天津。太平时节，商贩由北平、桑园、矾山、张坊、南窖运进生活用品。

当地人封建意识浓厚。这里有如青红帮的封建帮会组织，崇信各种封建迷信宗教，民性强悍，乡土观念甚重，很少与外地通婚。霞云岭附近的村有极少数人去旧县城上中学、去北平读高中。大多数没文化。这里人，在民国十八年时方知有了中华民国。

当地人民勤劳刻苦，由于无知常受人愚弄。各村政权皆在上层分子手中，税款钱粮均由他们分派，百姓不能过问。

民国以来，战事频繁，时有兵匪溃入山地，淫杀抢掠，村民惨遭蹂躏。开始，百姓畏惧，逃散深山，后来，组织起民团自卫。一俟兵匪进山，民众凭借熟悉地理，几经周旋，将兵匪消灭，夺取全部枪支财物。当地人颇为自得。这样，民团由土枪变洋枪，使用“新武器”，也颇有山地战斗经验，兵匪轻易不敢进犯。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于宛平与日军接触，相持月余。后来，卫立煌部南逃，部分溃军经过房山九区，被当地人民解除武装，步枪、机枪、弹药隐匿民间。

1937年冬，各地先后建立地方武装。房山县，北起长操、河北，南至长沟、张坊的民团组合，成立“抗日同盟军”一、二、三路军（土匪）。地主豪绅、流氓地痞、贫苦农民皆有加入。以抗日为名，打家劫舍，骚扰百姓。房山九区也组织了民团，名曰“六善会”，从宛平买进大批枪支，司令安纪云（堂上人），参谋长杨

天沛(霞云岭人)。九区“六善会”又与张坊、片上地方武装联系,商议河路沟(张坊往里)各村出枪二百,河套沟(坨里往里)各村出枪一百,共举晋汉臣为司令,安纪云为副司令,双方关系密切。

1938年春,八路军开到平西,建立了宛平、宣涿怀、房涿涿政权。5月31日宋、邓纵队开赴冀东,五支队接防平西,一部驻大安山、长操一带。此时,九区派人到紫石口找房涿涿县政府,县长刘慎之介绍他到金鸡台找五支队司令赵桐,赵桐将河套沟、河路沟民团编为七支队,晋汉臣为支队长,安纪云为副支队长(因两沟地域相隔甚远,在指挥上还是两个单位)。时隔不久,五支队驻大安山的一个连长叛变,打死指导员,带四十余人,全副武装(中有五挺机枪)跑到龙门台,谋投土匪胡振海。五支队致函九区武装堵截。次日,九区武装于庄户台将叛兵全部解决。时值五支队两个营也赶到,留下七支步枪给九区,作为答谢。

1938年6月,五支队一部驻佛子庄、河北一带,借检阅武装之名,将当地民团殷耀东部集中起来,强行解除了民团武装,进行改编。这件事使九区民团极为恐慌不满,认为:八路军早晚会上他们的枪。7月下旬,紫石口发生事变,董丰海率部跑到九区,扬言:“八路军下地方的枪,还要改编我们人员。”群众思想混乱。8月9日,独一师二团二营分驻霞云岭、王家台、堂上三村。王家台驻营部和我一个连约一百五六十人。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勾结二路土匪邢德章,纠集五六百人,10日,将我驻王家台营部和一连人包围。王家台、霞云岭成为战场,相持二日,我战士牺牲二十七名,被捕二十九名,除二人被保出,二人跳崖身亡外,二十五名被杀害。悲惨壮烈,令人饮泪切齿。这就是王家台事变。

10月,宋邓第四纵队由冀东返回平西。12月,宋邓纵队一部从堂上、王老铺、南窖出动剿灭杨天沛叛乱民团。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被捕,叛民四散隐匿枪支。我部队悲愤之下,将存放我牺牲战士血衣、遗物的数间房子焚烧;赶走羊万余只,牛二百头,骡马百余头,羊被杀吃掉。县长杜伯华为争取杨天沛、罗宗奎,仅对杨天沛等首要分子处以罚款,之后,杨天沛被调任专署庶务主任。为后来的一区事变留下了隐患。

1939年春平息王家台事变。5月,初步健全了村政权,旧九区、八区合为房良一区。

1940年秋季日寇“扫荡”后,我主力撤出平西,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地方工作一度陷于混乱。敌人一直深入一区腹地,百姓蒙受极大苦难,群众情绪低落。房良县委对一区工作作了指示:敌退走后,应首先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抚慰群众,立即恢复村政权,由区中心向东、西开展工作,组织武装,重新整顿游击小组。到11月5日,恢复工作略有眉目。为了进一步整顿一区,县委派县区干部十余人突击一区工作,并部署了扩军二百名,交粮一千石的任务。

1940年11月11日,县区干部在四马台召开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安排征兵的动员工作和征粮工作。实际上,征兵、征粮的数额偏高,超过了群众负担能力。早在日寇“扫荡”之前,霞云岭、大地港的土匪头子罗宗奎就密谋和南窖伪军头子程子良勾结,想摧毁一区政权,程子良未予支持,未敢妄动。“扫荡”后,罗宗奎见时机已到,于11月11日,又派人与程子良联系,并亲自率领大地港罗氏兄弟二十多人到南窖去请伪军、汉奸。程子良征得日本人同意后,亲自带伪军六十多人直扑庄户台。事前两天,上石堡支书于进琛曾派人送信三封,分别送往区和县,但未能引起领导注意。

13日凌晨,叛徒王秉旺(民兵中队长)带路,敌人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拂晓,敌人在叛徒郑玉梅(村长)的内应下,发起攻击。我工作人员仓猝应战,因众寡悬殊,经三小时战斗,我一区区长王英武、区干景一民等七人被捕。突围时,又四人被捉。十一人中,一人跳崖牺牲,一人被保释,一人被释放,三人当了伪军,其余六人被押往霞云岭杀害。这就是“庄户台事变。”

庄户台事变后,敌人更加猖獗,在押送我干部去霞云岭沿途,通知各村村长去霞云岭开会,不去的,就抄灭满门。13日深夜,匪首杨天沛、罗宗奎等召集龙门台、四马台、庄户台、王家台、石板台、上石堡、王老铺、东村等十几个村子的村长、村副三十余人开会,会议开到14日晨。会上,杨天沛代表九区(杨曾任九区联庄会参谋长)宣布正式叛变投敌,声称“八路军确已逃走”,“被日本人解决了”,要各村立即抓捕

我工作人员，各村要成立维持会，全区成立“一区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给“皇军”送情报。在汉奸的威吓下，参加维持会者百余人。会后，各村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立即行动起来。

11月15日，堂上村发生事变。事变主谋是1940年春被开除党籍、关押半年的，原堂上村村长高甫万，当过村长的富农李春厚。15日，区委委员韩景义、游击小队指导员张其羽率游击小组由石堡归来，因疲劳过度，在堂上村一座破庙里休息。高甫万先劝降他当游击小组组长的弟弟高甫禄，把游击小组骗至驻地附近，下了组员的枪。由村中一流氓和逃亡军人王有才、石秀珠等到庙中捆绑了正在熟睡的韩景义，将其杀害。堂上支部二十五人，除少数几人外，都参加了这次叛变。堂上支部的叛变，暴露了一区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严重问题。

堂上支部党员二十五名，男二十二名，女三名；青年八名，壮年十四名；雇农四名，贫农七名，中农十一名，富农三名；受过党的训练的七名。支部书记罗才元（中农），有一群羊，自私，受党训一次，事变时是主持者之一，不说实话。由高甫万介绍入党，与之关系密切。组织委员李万宽（贫农），老实，不出头办事。副组长高甫仁（中农），平日最听高甫万的话。宣委李春厚（富农），高甫万介绍入党，此次事变主持者。副宣委高甫禄（雇农），自卫队中队长，事变的直接参与者。堂上支部由郭办强、李伯庭建立。第一批入党的有：高甫万，流氓无产者，因当村长贪污，在押半年释放，1940年春被开除出党。罗才恒，中农，当过支书，自私自利，罗氏家族中最有号召力。该支部一建立，就被流氓、村中办事人（中农）掌握。该支部平日不开会，不讲解党的性质及任务、纪律，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模范作用。这是堂上支部叛变的内在原因。

堂上事变的同一天，房良七区区长罗化之在庄户台被叛徒蔡德禄亲自带人抓捕。

17日，发生黑牛水事变。是日，我自卫总队长傅林、四区区长崔一春率游击小组二十余人、工作人员十余人去四区作恢复政权工作，住在二、四区交界的黑牛水村。夜间，汉奸队偷偷地将村子包围。游击小组成员缺乏训练，枪声起，不知所措，各自散去。傅林同志凭手枪一支，子弹五发，手榴弹二枚，与敌人相持半日，弹尽牺牲。崔一春同志被捕。四区长常守德当场牺牲。二区指导员冯振水负伤后被俘。逃出的只有科员殷毅夫、助理员郭雅如。

王老铺村村长穆存山、武装中队长穆永山，勾结汉奸队长高平和匪首罗宗奎，纠集村中四十六人，从10月14日始，到11月中旬，一个月内先后九次袭击我区政府所在地六渡，到处抓捕我工作人员，十二处捕杀我工作人员十六名。县政府秘书张占祥（11月14日）、县农会主任罗宗烈（11月19日），被王老铺叛乱分子杀害。

此外，宝水村以村长张国全为首，组织十六、七人将我八路军王排长和三名战士抓捕后交霞云岭伪军；龙门台村村长耿文会（党员）、支书张殿福为首，组织召开十二人会议，会后将区党总支委员李兴通交霞云岭敌人杀害。

这一连串的事变称一区事变。此次事变，我县区干部共被捕四十六人、牺牲二十人（党员二十六人），其余者或被释、或逃出、或叛变。一区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房良一区事变发生十二日后，我部队平息了叛乱。

一区事变后，叛乱分子都上了庄户台村北的“三角城”。我部队与叛乱分子在三角城激烈战斗二小时，我部队将汉奸、叛匪彻底打垮，当场击毙二十多人，俘虏数十人。三角城一仗，彻底打垮了一区的反动武装，根据地得到巩固。

房良一区事变的发生，有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因素，应很好总结，以此汲取教训。

一、一区事变的发生是在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0年春、秋两次扫荡之后），我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我军、政力量薄弱，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上层顽固分子，得以蒙蔽群众，扩展势力，投降敌人。

二、这个地区建党初期，对该地区的历史状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研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流氓、地痞，他们维护了上层分子利益，削弱了党的战斗作用。王家台事变后，没有给予祸首严肃处理，更没有在群众中充分地揭露他们的罪恶实质，群众没有认清事变的本质，相反地让他们进入我政府机构，模糊了群众视线，使他们得以再次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东山再起。

三、王家台事变后，领导机关没有接受教训，没有根据当地特点、反动势力的动态给予应有的注意，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四、干部工作脱离群众，作风粗暴，不民主，群众对行刑罚人、赶走羊群十分不满。尤其是在“扫荡”后，群众损失严重、教育动员群众不够的情况下，又征兵二百，要粮千石，忽视了群众实际困难。这是我们政策上的失误。

附表：

一区事变中逮捕干部统计表

| 姓名 | 职务 | 籍贯 | 是否党员 | 被捕地点 | 日期 | 结果 | 备注 |
|------------|--------|--------|------|--------|--------|----------|------|
| 王荣武 | 一区区长 | 房山北窖村 | 党员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牺牲 | |
| 李茂森 | 一区区长 | 房山长操村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叛变 | 在南窖 |
| 程大力 | 一区卡长 | 房山三区人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牺牲 | |
| 李春圃 | 青工团员 | 房山长操人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释放 | 回家 |
| 吴绍先 | 县政府科长 | 冀东滦县人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释放 | 回北平 |
| 武帮清 | 五区助理 | 房山红煤厂人 | 党员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赎出 | 回家 |
| 宿光明 | 一区助理 | 房山粘山台人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释放 | 在南窖 |
| 张文 | 残废军人 | 未详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牺牲 | |
| 晋国壁 | 一区卡局 | 房山蒲洼人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赎出 | 在家害病 |
| 李久荣 | 总队部指导员 | 宣涿怀 | 群众 | 庄户台 | 11月13日 | 牺牲 | |
| 张玉祥 | 县政府秘书 | 冀东丰润人 | 党员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释放 | |
| 吴玉亭 | 县政府传达 | 冀东滦县人 | 群众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释放 | 回北平 |
| 宋恩齐 | 县政府科员 | 房山北尚乐人 | 群众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释放 | 回家 |
| 王新 (女) | 高小校长 | 辽宁 | 党员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解送 北平 | 不详 |
| 陈平 (女) | 高小教员 | 辽宁 | 群众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解送 北平 | 不详 |
| 丁世涌 (女) | 旺后村干部 | 房山塔照村人 | 党员 | 王老铺山 | 11月14日 | 释放 | 回家 |
| 罗化之 | 七区区长 | 房山安子村人 | 党员 | 庄户台井儿峪 | 11月15日 | 牺牲 | |
| 傅宝珍 | 县政府科员 | 房山陈家台人 | 党员 | 王家台地字港 | 11月15日 | 牺牲 | |
| 马修德 | 游击队中队长 | 房山陈家台人 | 党员 | 不详 | 不详 | | |

军政往事

| | | | | | | | |
|-----------|----------|-------|----|--------|--------|----------|-----------|
| 周有 | 办事处小鬼 | 不详 | 群众 | 宝水 | 11月16日 | 释放 | |
| 伤员 | | | | 堂上 | 11月15日 | 未详 | |
| 供给部 人员 | 二名 | | | 宝水 | 11月16日 | 未详 | |
| 张华明 | 四区青救主任 | 南窖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叛变 | 在南窖 |
| 韩景义 | 一区区委 | 宛平马栏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牺牲 | |
| 张其羽 | 游击小队指导员 | 冀东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不详 | |
| 晋显林 | 一区农会主任 | 蒲洼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中释 途放 | 仍工作 |
| 晋显汉 | 自卫队长 | 蒲洼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中释 途放 | 仍工作 |
| 晋天全 | 公安局工作 | 蒲洼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中释 途放 | 仍工作 |
| 任显高 | 村自卫队长 | 四马台 | 党员 | 堂上 | 11月15日 | 逃出 | 参加了 武装 |
| 景一民 | 公安局文书 | 中窖 | 党员 | 庄户台井儿峪 | 11月14日 | 牺牲 | |
| 傅林 | 自卫总队长 | 宛平傅家台 | 党员 | 黑牛水 | 11月17日 | 牺牲 | |
| 冯振水 | 二区自卫队指导员 | 北车营 | 党员 | 黑牛水 | 11月17日 | 牺牲 | |
| 崔一春 | 四区区长 | 宛平田家庄 | 党员 | 黑牛水 | 11月17日 | 牺牲 | |
| 常守德 | 四区区长 | 镇江营 | 党员 | 黑牛水 | 11月17日 | 牺牲 | |
| 郭雅如 | 四区助理 | 镇江营 | 群众 | 黑牛水 | 11月17日 | 逃出 | 回家 |
| 罗宗烈 | 县农会主任 | 安子村人 | 党员 | 王老铺 | 11月19日 | 牺牲 | |
| 罗雅如 | 青工团员 | 南窖 | 党员 | 王老铺 | 11月19日 | 释放 | 回家 |
| 王文华 | 小学教师 | 宛平 | 党员 | 六渡 | 11月25日 | 释放 | |
| 于进琛 | 上石堡村长 | 上石堡 | 党员 | 本村 | | 牺牲 | |
| 解景琛 | | 上石堡 | 党员 | 本村 | | 牺牲 | |
| 王云 | | 上石堡 | 党员 | 本村 | | 牺牲 | |
| 李福贵 | | 上石堡 | 党员 | 本村 | | 牺牲 | |
| 李兴通 | 村农会主任 | 新门台 | 党员 | 本村 | 11月15日 | 牺牲 | |
| 董同志 | 九团扩军组 | | 群众 | 六渡 | 11月25日 | 牺牲 | |
| 范月川 | | | 群众 | | 未详 | | |

被捕结果统计

| 总数 | 牺牲 | 释放 | 赎回 | 叛变 | 未明 | 逃出 |
|-----|-----|-----|----|----|----|----|
| 46人 | 20人 | 11人 | 2人 | 3人 | 8人 | 2人 |

党员统计

| 党员总数 | 牺牲 | 释放 | 赎回 | 叛变 | 未明 | 逃出 |
|------|-----|----|----|----|----|----|
| 27人 | 16人 | 6人 | 1人 | 1人 | 2人 | 1人 |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革命情谊暖心田

王世清口述 董华整理

俺老家在河南省孟津县上河屯村。19岁那年，离开家到山西洪洞县的宛安镇学铁匠。1934年刚过春节，红军队伍来了。俺在家时就听说红军好，是为受苦人谋利益的队伍。碰巧在红军队伍里遇见一个老乡，俺拉着他住在铁匠铺商量了一夜，第二天，就跟上红军走了。

到了陕北，指导员给新兵上政治课，让大家讨论发言。俺不知啥叫“讨论会”，闷闷杵杵坐着没吱声，脾气很暴的小班长还以为俺谋计“开小差”呢，点名让俺先发言，俺更慌了神，哪还说得上来？班长让俺到外边站着。俺丢了手艺来投红军，真心诚意寻找革命的温暖，班长多屈俺的心哪！就站在门外边委屈地抹眼泪了。吃过晚饭，连部领导找我谈话，象拉家常话儿似地先问俺：“从哪儿来的？干过什么活呀？家里还有什么人？”俺见他说话挺和气，就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他听了呵呵笑着说：“打铁匠要算无产阶级呢！开讨论会哭起来，是不是想家，有意见啊？”俺一听急了：“俺没意见！你不用怕俺开小差，俺家穷，来了就为当兵打日本，盼将来过太平日子。就是俺想走，也明白告诉你，不过，不能罚俺站立正啊！”俺把心里话都给端了出来。谁知这么一讲，他笑得更欢了，一边笑一边说：“对！来了就好好干！打跑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救咱们中国。只要吃下苦去，胜利总有一天是咱们的！罚立正是不对的，以后有意见在士兵会上尽管提，可不兴哭鼻子啦？”俺听他说得在情在理，心里踏实多了。

过后才知道那回跟俺和蔼可亲谈话的领导是罗瑞卿。几个月后，罗瑞卿同志调走了。一天，在陕西去子镇西沟开士兵大会，一个看上去30岁冒头、脸色黑红、身材魁梧，穿一件普通老百姓油渍麻花的旧大棉袄的首长给士兵讲话。他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又讲国民党蒋介石怎么反动，中国革命将来的前途，等

等。他大手一挥一挥的，打着比方，说得挺带劲儿，俺听入了神。一个老兵用胳膊肘捅捅俺：“这就是朱老总！”在那三天大会上，吃的是莜麦面疙瘩。比起以前的艰难，那才是想不到的好饭食呢！以后，也慢慢知道了俺们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

俺心里琢磨：在红军队伍里，分不出“官”和兵，上至司令员，下至连长、指导员，跟当兵的穿一样的衣，掏一锅的饭，个个说话都透着和气，进了红军这个“家”，心里暖乎乎的。

在去镇休整了一个月后，我们就跟阎锡山打了一仗。第二仗是在甘肃的三层堡，跟傅作义的兵打仗。正是冻冰茬的节气，红军战士穿着单衣打了一天一夜，十分英勇顽强。由于敌人火力太强，三次冲锋都没上去，有不少战士牺牲了。杨司令员被敌人激怒了，命令俺：“给你配备一个机枪连，一定要冲上去！”俺带着司令部的预备队扑向敌人，为同志报仇的子弹象雨点儿似的泼去，冲垮了压下来的敌军，天亮时胜利结束了战斗。士兵大会上，司令部表扬了俺作战勇敢，俺也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为穷哥儿们打江山的信念。

转过年夏天；俺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以后，俺调到司令部，当电话员、电话排长，一直干了七、八年。

电话排是首长的耳目，每当行军打仗，首长的住处还没安顿好，电话线就架上了。有时邓政委摇不通电话，对俺们火气很大，可一过后，他又找俺们谈心，讲清革命道理，检讨自己。邓政委的爱人李大姐也常开导俺们。有一回临过黄河，俺的脚长了疮，脚面肿得象馒头似的，俺怕邓政委分心，咬着牙硬挺着。可终归没瞒过他的眼，他让警卫员牵来他的黑骡子，要俺骑上，俺不肯，他发了火：“为了执行任务，我命令你王世清骑上！”看着身体单薄、同俺一般年岁的邓政委光着脚板跟队伍行军，眼泪再也憋不住了……

出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红军日渐艰难。冬无棉衣取暖，脚无鞋子可穿。吃的东西靠自筹。弄到养麦吃养麦，弄到黑豆吃黑豆，凡是能下咽的东西都尝过了。烧熟的山药蛋用树枝扎几个跟，塞上几粒盐，就是饭和菜。没有鞋穿，首长和战士坐在一块儿，说着笑着打草鞋。说起来，红军队伍是够艰苦的了。可是就在那艰苦时期，在生存和死亡的考验面前，一壶水，一口干粮，一片药，一件御寒衣和一双鞋，红军里互相推让，战士想着首长，首长关心战士。而在紧急关头，红军的班长、排长，以至司令员，都会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同志，自己挺身而出，去冲锋陷阵。

西安事变以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在河北省涞源山区，部队重新整编，杨司令员是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的司令员，邓华是平西十三分区十一支队的司令员。打那以后，俺就跟随邓政委在平西、冀东、山海关一带活动。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司令部设在门头沟斋堂。俺随师里的一个组织科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分头去怀来县扩军，张科长同俺住的矾山甘庄子相隔10里地，不料想，俺们全被地方汉奸大队包围了。俺们冲了出来，张科长的两把盒子枪打光子弹以后，被敌人捉住，活活架火给烧死了。见到司令员，俺才要汇报，邓华搂着俺，哑着嗓子说：“都知道了，让你们受委屈了。”说着，他掉下了眼泪。俺追随邓政委多年，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没见过他愁过脸，落过泪，这次他落泪了，他的泪水里蘸的是深厚崇高的革命友情啊！

1944年，俺调到教导大队受训，被河北省政府要去，负责一个运输大队，给兵工厂运送煤铁。后来，因为地方工作需要，俺就落户在现在的村子——房山区史家营乡莲花庵村。

从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俺一直当干部。支部书记、治保主任都担任过。生产队长撂挑子，俺就给社员敲钟当队长。“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俺也靠了边，就连组织生活也给排除了。两年前，俺让儿子替俺给邓华写信，三天后，一封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大红信笺到了俺手里——

王世清同志：

你的来信已收到。你所讲的从参军到平西这一段情况是属实的，我可以证明。请你将此信交有关部门去

考虑。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邓 华

1978. 12. 27.

儿子读着邓政委的亲笔信，俺的心一下子翻腾起来。俺的好政委还没忘记俺王世清哟！从 1979 年 12 月，政策落实了，按红军待遇，每月补助俺生活费 30 元。1981 年还参加了县里的第一届政协会议。

俺今年虽然 80 多岁了，可身子骨还结实，俺还要保持红军的本色，继续艰苦奋斗，跟着党中央，带领后辈儿孙干出一个四个现代化的铁打的江山来！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房山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宋成明 郑宗雄

房山区霞云岭乡的上石堡村，地处京西百花山的一个山口中，是霞云岭乡的门户，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上石堡村党支部是房山区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她是由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赵然和上石堡村共产党员于进琛于 1938 年 6 月建立的。

于进琛是上石堡村的进步青年。1938 年 5 月，在建立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期间，他经常到县政府所在地长操村开会，此间，结识了赵然。这两个青年志同道合，说话做事非常投机默契。当赵然经傅伯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赵又介绍于进琛入了党。于进琛常回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赵然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也常到上石堡村来。他们在村子里做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还先后介绍王兴云、李甫贵、谢景申、郑修贤、王水、谢景河六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县委批准，1938 年 6 月，上石堡村正式成立了党支部，于进琛为支部书记，谢景河、王水为支部委员。党支部成员分工为：谢景河任组织委员兼农会副主任，王水任宣传委员，王兴云任民兵指导员兼村武委会主任，李甫贵任农会主任兼民兵中队长，谢景申任青年主任。

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反资敌、夺权、减租减息、成立粮食借贷所救济穷人、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敌情等活动。

抗战时期，上石堡村有 90 户，426 口人，有 530 亩耕地，其中地主的地就占了 380 亩。村民每年交地租 231 石，是个佃户村。伪政权村长赵琪、会计王洵利用手中权力，向村民摊粮派款，以资助南窖据点的日伪军，他们还从中贪污、盗窃，群众对此非常气愤。党支部成员在群众中秘密做工作，检举揭发伪政权的罪行，发动群众与伪政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村民选举时，群众选举了于进琛为村长，而伪政权成员全部落选。从此，村党支部掌握了村政权。

1939 年是上石堡村天灾人祸严重的一年，夏季发洪水，秋季闹虫灾，加上日本侵略军大肆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村民生活极为困难。秋后，党支部研究决定，以农会出面跟地主作斗争，要求

减租。当年减租 40 多石。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粮食借贷所，向地主及富裕农民要粮食 4000 多斤，借给村民，解决了穷苦村民吃粮问题。党支部还多次将日伪军及特务、汉奸活动情况，写报告送给区、县党组织。

1940 年农历十一月，房良联合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一区事变”，上石堡党支部遭到破坏。由于特务、汉奸告密，于进琛、李甫贵、王兴云、谢景申四名共产党员，于 1940 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夜间被敌人抓捕，送到南窖敌人据点。他们受尽严刑拷打，最后，被敌人杀害在南窖村西。从此，上石堡村党支部暂时停止工作。

1941 年 3 月，房良联合县九区组织委员王荣善，到该村恢复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谢景河，支部委员王水。以后又发展了王兴元、魏和宽、魏和常、于进水、郑全巨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上石堡村党支部恢复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先进党支部。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作者郑宗雄系原霞云岭乡副乡长

攻打公议庄

白玉

1945 年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坚持内战。公议庄村的大地主邓凡清，害怕八路军共他的产，在伪良乡县保安团的支持下，纠集本村的地痞，逼迫部分农民子弟，成立了公议庄村“自卫队”，队长是邓凡清，副队长是夏场村的王珍（国民党情报员），其它队员都来自公议庄村。邓凡清打着保卫乡民的幌子，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与良乡县保安团相勾结，称霸赵营、任营、佛满、赵庄一带村庄。邓凡清为了保卫他的家业，用搜刮来的民财，在公议庄街中心靠东头的地方，修了一座两层炮楼，并在距炮楼几十米远的东边和西边方向各建了一座地堡，在炮楼的北面汪惠家的房子上修了高房工事和掩体，这样炮楼、地堡、高房工事可以互相掩护，易守难攻。邓凡清经常带着“自卫队”到附近村庄骚扰或抓捕我方工作人员，是我党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极大障碍。

我涿良宛五区游击队，几次想拔掉公议庄炮楼。区长张晋龄同志，曾几次夜间潜入公议庄，了解敌情，均未找到歼灭敌人的适当时机。只有副队长王珍，在佛满村被我游击队杨宗尧等同志抓获，弄到官庄村，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被我游击队杀掉，为民除了害。

1947 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当时驻在固安县牛坨一带的我地方部队整编七十五团派出的侦察员到公议庄一带侦察，了解到国民党的四纵队、一个正规营在公议庄驻防（实际驻防琉璃河），就昼夜赶回，向团领导作了汇报。七十五团领导决定，要吃掉国民党的正规营，同时拔掉公议庄炮楼，消灭这股地主武装——“自卫队”。

8 月 16 日下午，七十五团从牛坨奔袭八十里，在晚上九时左右包围了公议庄村，悄悄的进了村，抓住了“自卫队”的巡逻哨，得知国民党正规营已往西撤走了。七十五团领导随后抽出两个排的兵力，布防在村东北和村西小清河边，担任警戒任务（以阻击良乡和葫芦堡方向增援的敌人），其余主力利用夜幕的掩护，接近了炮楼，隐蔽在民房中，封锁了炮楼的内外联系。一切布防就绪后，首先是我方部队开展了强大的政治

攻势，敦促敌人投降，到了白天，就让自卫队的家属前来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守楼敌人惊恐万分。匪首邓凡清困兽犹斗，他就站在高房工事里，挥舞着匣子枪高喊：“谁投降就崩了谁！”并用机枪点射喊话的家属。

我七十五团包围封锁敌人一天一夜，守楼敌人粮尽水绝，就连汪家院内的一缸泔水都给喝了，可邓凡清仍拒不投降。团领导见政治攻势无效，就决定用强攻，拿下炮楼。

农历的八月十七日傍晚六时许，夕阳还未落尽，冲锋号响了，我部队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敌人凭借工事，顽固抵抗，双方火力交织在一起，暴雨般的枪声，响彻四面八方，就连任营、赵庄等村的群众也听到了阵阵激烈的枪声。上去爆破的战士，一个个的倒在工事前边，冲在前边指挥战斗的营长也不幸中弹牺牲了。这时我部队就从炮楼南面李大同的北屋地下挖了地道，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地道挖通了，战士们在炮楼底下安放了炸药包，就在敌人还在负隅顽抗之际，炸药包轰隆隆地响了，炮楼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有的敌人坐上了土飞机，邓凡清也被我战士乱枪打死。自卫队员见状，纷纷走出工事，缴械投降了。

子夜时分，枪声渐息，战斗胜利的结束了。这一仗，打死敌人二十七名，跑掉一个李栋，俘虏了二十八名。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战士一把火烧毁了残存的地堡和高房工事，反动派赖以欺压百姓的工事，化成了一座废墟。在押的二十八名俘虏，经过审问，查出了打死营长的刽子手——赵万×，由营长的警卫员和战士推到村外，用大刀给砍了，为死难烈士和营长报了仇。

七十五团指战员拿下炮楼，休整片刻之后，就押着俘虏，运着牺牲了的烈士遗体，撤离了公议庄村。一个月后，二十七名俘虏经过教育被遣送回乡了。

公议庄炮楼的拔除，自卫队的消灭，狠狠打击了这一带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我党在这一带开展活动扫清了道路，群众也受到了鼓舞。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夜袭周口店

赵永德 口述 颜景河 整理

1945年7月，我所在部队——聂荣臻、萧克司令员领导的华北军区九团在斋堂集结。

记得有一天，正值新兵入伍，伙房开了斋，小米饭炖猪肉，大家吃得可香了。饭还没吃完，“哒……”军号就吹响了。部队迅速集合起来。

部队领导黄团长传达了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坚决清除斋堂鬼子的据点，同志们高兴的欢呼起来。当时我在三营三连七班，是部队的主力班。斋堂据点大约驻有300多名日军，在我方猛烈的攻击下，日本鬼子丢弃了据点，仓惶逃窜，我们立即乘胜追击。当追到雁翅时，由于鬼子把安家庄桥烧了，加上天黑，我们只好就地休息。第二天拂晓，部队整装前进，直奔蒲洼、宝水。这时，我们又接到命令，下山攻打周口店。因军情紧急，立即长途跋涉，经过二天多的急行军，于傍晚到达周口店。

当时，日寇在周口店南山、北山各修了一座炮楼，老远望去，阴森森的。我方大约是两个团的兵力，从周口店到长沟，都是我们的人。因为我军着装是用老粗布做的，染上的黄颜色，所以，看去是黄压压的一片。

天气突然变了，夜幕降临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同志们不顾行军的劳累，冒雨修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

我们三连的任务是围北边的炮楼。天擦黑时，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欢叫起来，子弹嗖嗖划破夜空。忽然，我军的迫击炮响了，颗颗炮弹带着复仇的怒火，呼啸着射向敌军阵地。战斗打了大约二、三个小时，敌人的炮楼起火，冒烟了，冲天的烟云宣告了敌人的失败。鬼子溃退、逃窜了，我们猛烈的发动了进攻，我们三连冲破铁丝网，迅速前进，当攻上山坡，看到敌炮楼在烟火中残缺破碎的模样，大家不由的欢笑起来。

这次战役，我们牺牲了十几名同志，我记得当时是用棺材将烈士们埋葬的。

早上天放亮时，炊事员和当地群众将饭送上山，是小米饭炖牛肉，大家边吃饭边猜测下一步的行动。

吃完饭，部队下山进了村，群众亲热地欢迎我们，拿出枣梨等水果往我们衣兜里塞。我们没有吃，却忙着给老乡挑水、扫院子。由于几天来急行军，打仗，又困又累，我们便在周口店休整了一天。当时部队传言，说是要打房山城，大家劲头可足了，忙着擦拭武器，找群众了解房山城的情况。

下午，情况发生了变化，说部队要往北开，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房山暂时放下不打了。这次命令下的急。部队马上就出发了。于是，我们告别了周口店，去迎接新的战斗，攻打北方要塞——张家口。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作者颜景河系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跟随聂帅的三个月

赵永德 口述 颜景河 整理

1945年8月，在张家口西柴沟堡战役中，我负了伤，被送到部队休养所养伤。住了一、二个月，基本痊愈了。可是因原部队调走不能归队，只好在休养所待命。为了战斗需要，上级把我们伤兵和后勤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兵连。

有一天，我们连队集中，传达了上级指示，即：凡是能行军打仗的，均编入战斗部队，开赴东北战场，伤残人员留在当地工作。经过体检，因我伤愈后仍吐血，便把我分到十一分区供给留守处，实际上是分到聂司令员居住的地方。

1946年开春，我来到涿鹿县十一分区留守处。组织上让我到伙房工作。具体任务是买菜，采购办公用品，打扫卫生。当时留守处有两个伙房，聂司令和司令部的军事人员一个。我们的伙房，是为二十多个后勤人员服务的；聂司令的爱人陈萍同志和九团黄团长家属同我们一起就餐。

第一次见到聂司令，就给我一个亲切朴实的感觉。记得那一天，从司令部门内，走出一个胖胖的个子不高的军人，他身上穿着黄色的军服，精神抖擞，胖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出来便亲切的和大家打招呼。当我听到大家称他是聂司令时，我肃然起敬。啊！这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受到人民热爱尊敬的司令员啊！他走到我们面前，和气地和大家聊起天来，知道我是新来的，亲切地和我握了手。

战争年代，聂司令工作很忙，一般是早出晚归，平时也很难见到他，晚上也不闲着，他房间一直到深夜都亮着灯。当时司令部有三匹马，一匹白马和一匹青马是警卫员骑的。聂司令骑的灰色带白点的马，那马养

的很肥，很壮实，跑起来飞快，我们叫它为“花炮马”。司令部的伙食和战斗部队相比算好多了。饭基本上是净粮食，小米、棒子粥，三天两头也能吃上白白的大米饭，鲜菜一直没断，只是肉吃的少。聂司令吃饭也和我们一样。听警卫员说，司令员生活很简朴，从不挑饭挑菜吃，有时忙起来，边吃饭边工作。

聂司令有个孩子，当时四周了，聪明活泼，逗人喜爱，陈萍雇了个保姆照看。后来保姆因故辞去，我便担负了照看孩子的任务。那时涿鹿县属新开辟的解放区，比较平静，晚上没事，大家便上街到戏院看戏。为此，我便负责给首长和同志们买票。当时戏院演的是晋剧，开始听不惯，慢慢就着迷了。什么“牛魔王造反”、“金沙滩”、“金瓶和银瓶”，尽是古装传统戏。聂司令和家属看戏，全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搞特殊。可惜的是，三个月来，聂司令因工作忙，竟连一次戏院也没光顾。

1946年4、5月的一天，聂司令带部队打东北折回。大家私下议论，说是局势要发生变化。后来，我听警卫员说，毛主席去重庆了，现在国共两党要和平谈判，要裁军了。果然，过不多久，部队开始整编，精简机构，我们司令部后勤人员要压缩。一天晚饭后，陈萍大姐找到我，说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司令部要精简人员。并征求我的意见，愿到那儿去。我涨红了脸，说什么也舍不得离开司令员。后来经陈大姐和组织几次做工作，才把我说通了。我提出回老家门头沟，至于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陈萍将这事亲自告诉了聂司令。后经聂司令和组织安排，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司令员，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建营始末

赵润东

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始建于1939年春。当时，我平西部队已合编为挺进军，萧克同志任司令员。4月，八路军总部指示挺进军，主力不再挺进冀东，以巩固和发展平西为目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根据总部指示：以山区为依托，向平西东南方向的房山、涿县、涞水三县平原地区发展，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于是，在军事斗争的同时，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和骨干，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积极宣传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及群众团体，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开辟了房、涿、涞平原地区，从而使平西根据地扩大将近一倍^①。

独立二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张克勤同志。张克勤(1904—?)，长沟乡沿村人。抗战前在岳各庄乡五侯村初小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克勤同志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热爱，毅然弃家舍业，到平西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根据上级指示，张克勤同志任游击队二营营长，人马由自己出山扩充。张带着这个艰巨任务重返五侯。首先找到家境贫寒的王焕文同志，向他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了建立独立二营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建营后的工作目标。时年二十六岁的王焕文同志血气方刚，思想进步，再加上苦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奴役，当即表示志愿加入八路军游击队，誓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张克勤同志十分高兴。任命王焕文同志为二营第一中队长。随后，王焕文同志又找来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一伙青年(其中金茂、陈树、王风才、朱德凤等后来都成为我八路军优秀干部)，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独立二营第一中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

队伍建起来了，营部设在张坊。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整个队伍中只有张克勤佩带一把手枪。于是，张

克勤、王焕文带着队伍，以平西根据地为本营，经常出没于张坊东北的长沟、坟庄、六间房、甘池、罗家峪、孤山口、五侯、西营、小次洛、二站、白庄等地以及东南的涿州一带，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每日步行百余里，采取游击战术，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通常是白天隐藏起来，晚上采取行动，抄小路，过铁道脱了鞋，脚上绑好破棉花，一路小跑。这样，出奇制胜，收拾门岗，收缴各路“老便”和联庄会以及各村财主家中的武器。

那时候，斗争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旺盛，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从秋季到冬季队伍就扩大到八十余人，缴获枪支四十余条。当时，平西地区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南有独立营，北有小八路^②。独立二营的队伍逐渐扩大。不久，上级又给二营派来一个中队，独立二营扩大到一百余人^③。队伍扩大后，新成员大量增加，成分较为复杂。一些土匪、流氓、投机分子也混了进来，给二营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违犯纪律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二营成立约半年时，军需长赵凤喜（五侯人）与高某（长沟人）经常偷偷外出绑票，屡教不改，影响极坏，后被上级组织惩处。再如营副刘希明（涿州刘庄人）和高某（长沟人）、崔某（上坡人）等想策划篡权后投降王兰亭，结果阴谋破产后便带十二人十二条枪逃走，后来被王兰亭打死。

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斗争，增强队伍战斗力，上级指示独立二营调到张坊里的虎各庄进行军事整顿和训练。1939年11月，军区指示“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并号召创造主力兵团”。平西挺进军决定，将三十二大队的两个营和房、涿、涞游击支队编入三十三大队。番号晋察冀军区第七团。从此，平西独立二营被编入七团。

七团在整训中，首先进行了纪律教育，发动群众，批判不良倾向，清洗了奸细、投机分子。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都得到明显提高，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得到加强，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改善，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粉碎翌年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④。

注：

①、④根据《平西儿女》中李水清同志所著《晋察冀军区第七团抗日斗争史》整理。

②“南有独立营”指平西抗日游击队独立二营，“北有小八路”指当时有位叫许亚斋的人自发组织起武装队伍，后编入八路军。

③独立二营只发展到两个中队，没有第三中队，后便改编。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九位无名烈士永垂不朽

赵润东

在上方山下孤山口村北的煤土坑上，端端正正地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书写着十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九位无名烈士永垂不朽。

1947年，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但是，驻守在京郊房山地区的国民党十六军和敌保安团第二大队五、六百人，借助大房山有利地势，筑造明碉暗堡，控制周口店龙骨山各个交通要道。

8月初的一个夜晚，晋察冀军区第四独立旅执行任务，为解放北平铺平道路，首次攻打周口店敌人据点。

战斗前一天的下午，独立旅加强营二连从甘池、天开、上下中院出发，集中在拴马桩村召开战前动员大会。之后，队伍顺着蜿蜒的盘山小道向周口店龙骨山进发。

夜色漆黑，看不见人。为攻克大东山上的炮楼，部队在夜幕掩护下潜伏在敌碉堡附近，并在碉堡附近安放好炸药和导火索，只等炸响后发起总攻。当夜，天阴得沉沉的，夜里二时左右，离总攻只有半个小时了，一道道利剑似的闪电劈开漆黑的夜幕，接着下起瓢泼大雨，我军开始向敌人炮楼攻击，很快将小炮楼拿下。不料，大雨淋湿了碉堡附近的炸药和引信，爆破没有成功。敌人借着闪电，发现了我潜伏的战士。于是凭着强固工事，居高临下，三挺机枪疯狂向我阵地扫射。我们的战士衣服被雨淋透了，弹药又失灵，情况十分不利。但是，我们的战士不畏凶猛的敌人的炮火，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搏斗。结果有的战士负了伤，有的战士牺牲在战场上。战士们根据上级指示，互相掩护，将负伤的战士抢救下来，将牺牲战士的尸体抢下来，使部队迅速撤出阵地。

这次战斗，我部队伤亡一百余人。当地政府积极带领附近村民，将烈士们的遗体运回解放区。因天气炎热，一部分掩埋在长沟乡甘池村，一部分就掩埋在孤山口的煤土坑上。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为永远记住他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当地驻军和中院中学于1986年6月1日在这里立了墓碑。每年清明时节，当地村民和学生们都来这扫墓，祭奠这九位无名烈士。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巧施反间计消灭汉奸

宋成明

抗日战争时期，房山地区的房山、良乡联合县一区干部群众为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及其汉奸，除武装斗争形式外，还采取了“反间计”，就是用巧妙的计谋，离间敌人，造成敌人之间的内讧，用敌人之手消灭敌人。汉奸头子石秀珠、杨大金等就是被日军小队长给杀掉的。

1940年11月房良联合县一区，由于当地土匪汉奸作恶多端，发生了一系列事变。日本侵略军在这年的春、秋季大扫荡以后，日伪军气焰嚣张。八路军驻防在房山地区的军事力量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内线的军事力量相对减弱，加之党政建设基础不牢，当地土匪汉奸石秀珠等趁机猖獗一时，致使房良联合县一区发生了一系列事变，使抗日力量一度遭到破坏。

当年11月13日发生了庄户台事变。房良联合县的县、区干部召开了为时四天的“反对日军扫荡”的总结大会。就在散会的这一天凌晨，由于叛徒出卖，石秀珠等土匪头子带领一百五十多名土匪，包围了庄户台一区区公所。在区公所的县、区干部及游击队员多次突围，因寡不敌众，区长王英武等十一人被捕，其中七人壮烈牺牲。过了两天，也就是11月15日发生了堂上村事变。在杨天沛、石秀珠等土匪头子的策划下，堂上村党支部叛变。石秀珠带领土匪杀害了区委副书记韩景义、组织部长李兴通等。紧接着发生了黑牛水、王老铺、龙门台等村的一系列事变。土匪头子石秀珠等张贴布告，扬言赏重金捉拿抗日干部郭强等。在房良县一区下乡的平西地委组织部部长兼抗敌救国联合会主任郭强，将一区事变情况报告了平西地委领导及挺进军

司令员肖克，肖克当即决定命令挺进军九团团长黄光明带领队伍前去剿匪。经过充分准备，黄团长带领一个营日夜兼程，前往房良县一区。

石秀珠等土匪头子制造了一系列事变后，龟缩在庄户台村的山顶上。这个山顶有个完全用石头砌造的石头城，是一块三、四百亩大的平台，名叫三角城。这里山高坡陡，地势险峻。从山下去三角城只有一条刚能走过人的小路。日军秋季扫荡后，这里的土匪与南窖据点的日伪军相勾结在此占据。上面修筑了围墙，建造了工事，还建起了一排草屋，经常到山下各村要粮要款。叛匪与日伪军狼狈为奸，妄图在此长期盘踞。土匪头子之一石秀珠，是庄户台村人，1938年加入联庄会后，在匪徒中当排长兼机枪手，为人蛮横，欺压百姓。宋时伦、邓华纵队回平西后，消灭了联庄会匪徒，将石秀珠俘虏，编入八路军当战士，曾一度积极抗日。但他在革命队伍中不坚定，受不了苦，又网罗了三百多名匪徒，与南窖据点的日伪军勾结，在三角城盘踞作恶。黄光明团长为歼灭这伙匪徒，带领挺进军九团二营战士，于12月13日拂晓前将三角城围得水泄不通。去三角城路口对面的山头上架起两挺机枪，路口拐弯处十几名战士埋伏在险要的悬崖下。根据地势，黄团长决定不走山前小路，而是先派小股部队从山后的悬崖峭壁上攀登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打开缺口，大部队再从山前小路冲上去消灭敌人。黄团长挑选了十几名能爬山会攀登的青年战士，准备好绳索，单等天黑行动，一切按计划进行。后半夜，小分队在山顶上打响了，两挺机枪猛烈地向三角城扫射，掩护大部队迅速冲上山去。敌人依仗天险，毫无准备，正在酣睡。八路军战士神兵突然从天而降，打得匪徒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战斗胜利结束，消灭和俘虏匪兵九十多人，但土匪头子石秀珠带领二十多名匪徒钻入山洞，在激战后逃跑了。

石秀珠带领匪徒逃跑到南窖日本炮楼据点投靠日军，当了汉奸队长，经常带领汉奸队出来到各村强奸妇女，掠夺民财，骚扰百姓，袭击抗日队伍。中共房良联合县工委、县政府决定除掉这个败类。可是这个家伙神出鬼没，狡诈多端，几次捉拿他都没抓到。后来他听到捉拿他的风声后，躲在炮楼里不敢出来了。县委领导研究决定用“反间计”除掉这一祸害。于是以平西抗日救国会主任郭强的名义，由县委宣传部长赵然执笔，陆续给石秀珠发了三封信。

第一封信大意是：

秀珠老弟：

自三角城分手，多日未见，甚为想念。你现在在南窖所作所为我们都了解，我们对你的处境和你的心情，也全然理解。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们有几句良言相告。最近根据多方面情况反映，说你不仅恶习未改，而且还屡犯新罪，这与释放你时你的表白是极不相符的。这样下去，对你的前途是很不利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你，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望你改恶从善，为时不晚，立功赎罪，更为欢迎，你的表现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二封信大意是：

秀珠老弟：

来信悉，你对自己的过错有所认识，并很少出炮楼，已有悔改表现，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你如能坚持下去，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情况，抗日政府不会亏待你，会重新安排你的工作，重新考虑你的发展前途。

第三封信大意是：

秀珠老弟：

你提供的情报收到，很好，也很重要。对你戴罪立功的举动，我们深表钦佩。我们将不久解决南窖之敌，请你耐心再等数日……。

这三封信，都是南窖炮楼一位做饭的地下交通员带进去，而且都是想方设法将信转到日军星野小队长手里。第三封信去后两天，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汉奸头子被日军星野小队长亲自枪决了。利用敌人之手为群众除掉一害。

杨大金是国民党房山保安团南窖五区队长。1939年6月日军占据南窖后，杨大金勾结日军当了汉奸。

在南窖、霞云岭一带无恶不作。1940年冬一天夜里，杨大金带领伪军抓捕和杀害了上石堡村党支部书记于进琛等四名共产党员，破坏了房山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民愤极大。房良县委决定除掉这一害。

县委宣传部长赵然跟南窖地下党联络员共同工作，一方面挑拨杨大金与霞云岭地区土匪头子杨天沛的关系，以士兵过春节要求吃白面饺子为名，向杨天沛要钱要粮；杨天沛以不是自己的辖区为由，坚持不给；杨大金仗势欺压杨天沛，致使二人结下冤仇。另一方面，县委派霍梁、隗合宽、肖南在3月3日日本的花节时，达南窖日军驻地插山桃花，勾起日军思乡之情。日军看到插花，有的上吊自杀，有的痛哭流涕，军心涣散。日军小队队长星野追查此事，杨天沛及士兵都说杨大金私通地方八路军所为，星野大怒，当即拍板枪决杨大金。日本汉奸杨大金死于日本小队队长之手。

资料来源：

- 1、郭强回忆资料
- 2、隗合宽口头回忆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东港村——平西抗日的前沿阵地

耿子华 口述 张成基 整理

1942年春季以来，日本还在不断地向我平西根据地大规模地扫荡。为了巩固和扩大平西根据地，昌宛房县委决定：在永定河以西，要做为平西的一扇大门来保卫。为了做好保卫工作，把原昌宛县设在这里的河南办事处改组为抗日救国会的形式。派李全善、耿子华、王玉民等为首的地方工作人员二十来人，平西独立营派蒲队长带一个小队干部战士七八十人。两者配合有近百人的队伍。从4月初就进入现在河北乡的东港村。他们就在这里为基地，向日本已经占领的里十三村开展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誓死不当亡国奴，不给敌人做工，不给敌人送粮送水等。同时建立与我军政人员联系的联络网和个别关系，打击日本小股进攻，捉拿汉奸特务。经过一段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效果显著。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抗日，以各种方式对付日本的横征暴敛。很快敌人对群众的召唤不象以前灵了。使南新房、十字道一带的敌人逐渐发现了东港村有我抗日力量。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从六、七月份就开始向东港村住的工作人员和部队进行围剿和堵截。在安子沟的一次包围战中，打死我军战士五名，还打死老百姓王振宝的弟弟。到8月上旬，又在日本特务麻偏策划下，在南新房据点所在地拦截过路行人，给他们提供我军政人员活动情况。把东港去门头沟卖窑桩木的周玉祥叔侄俩捉住，追问东港住着多少八路军，都住在哪里。两人一致说没有见过。他们不信，就把两人赶的六个牲口驼的窑桩木叫周玉祥一人赶上去门头沟卖。后周玉祥被扣下，晚上在把牲口赶回来时，放了周玉祥的叔叔和牲口，把周玉祥和自己的牲口都扣在据点里。一直扣了五天。每天都问两三次，八路军住在哪里，周总是说不知道。

到第六天早晨，日本特务麻偏找周玉祥，要他带路去东港围剿八路军。周玉祥不去也不行，就带着二十来个日本和八个特务，向没有住八路军的代成峪进攻。来到这八、九户人的自然村，群众都上地劳动了，正

碰上保长王振江驮两驴驮毛桃下来，日本问他八路军在哪里，开始他也说不知道，日本要打他，他就说，我是这村的保长，叫我说八路军在哪里，我知道，可以带着你们去抓他们，叫周王祥也得跟着去。由王振江带着日本和特务就奔我工作人员王玉民、韩华青、周大帮三位同志住的小檀港去了。到沟口又遇到了给王玉民等同志送粮食的王宏儒，日本问他八路军在哪里，他说不知道。又问他干什么去，他一时说不出来。就打他两个嘴巴，也叫他跟着去了。走到离王玉民三同志很近的地方，王振江提出叫日本从梁上走，特务从沟里往上走，实行两路包围。分开不久，日本就看到了我方人员，连续打起枪来，因地形关系我三同志无处逃脱，很短时间就将我宣传委员王玉民，一般干部韩华青、周大帮三同志捉住了。

日本和特务将我三名干部抓住，在当地以毒辣手段严刑拷打。企图从他们口中供出我方军政人员、组织机构、居住地点，以便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以王玉民为首的三同志咬紧牙关，忍受着皮肉的疼痛之苦，在日本和特务的棍棒面前，只是横眉冷对敌人的残忍而一声不吭。

同时他们还对王宏儒采取了恶劣手段，说他不老实，不说实话，跟八路军有联系，并进行毒打。但他总是坚定地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将他绑在板凳上，用毛巾把眼、鼻、嘴都蒙上。隔着毛巾往他嘴里灌了一桶水，险些把他折磨死。后来把他带到了南新房据点，服了七天劳役，才把他放回了家。

当他们看出对王玉民三人在现场问不出任何情况时，就把他们带到南新房据点里，又对他们进行软硬兼施，折磨了四、五天。敌人看出不可能从他们嘴里得出什么东西，就决定以残酷的手段将他们杀害。为了镇压群众对他们的反抗，集中当地村民民众。革命英雄临危不惧，当他们走上刑场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口号。最后敌人把雷管炸药塞入他们肛门里，在广大群众面前把他们三人给炸死了。敌人恐吓集会的群众说：“谁要私通八路，就叫你们和他三人一样下场……。”在敌人的训斥下，在场群众个个痛心，流泪而去。

我们三位同志牺牲了，敌人更加猖狂了。又集中了南新房、十字道一带敌人二百多名向我东港村各条山沟进行围剿，想把我抗日力量一网打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政人员主动撤到北峪岭西一带，敌人又追到岭西围攻。为使我方不受损失，在昌宛房县委宣传部长林柯青同志主持下，研究决定：除留少数人隐蔽在群众中坚持工作，大部分人暂时撤到后方去进行整顿，以利再战。

我军政人员执行撤退命令，回到东港和乡亲们告别。广大群众象小孩离娘一样，恋恋不舍。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拿出自己仅有的粮食给做饭吃。摘掉尚未成熟的倭瓜、豆角、小黄瓜等做菜，一定叫我们军政人员吃顿饱饭再走。军队脚上的鞋都破的不能穿了，有二十多位老乡现从脚上脱下自己的鞋给我们的人员穿上。乡亲们都抹着眼泪不迭地说着：“你们可早点回来呀！你们走了我们可没有靠山了，干亡国奴了！”等等。一直把他们送的看不见影子为止。我们撤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敌人据点，他们感到高兴，自认为是胜利了，停止了向我们的进攻。我方留下的工作人员，又继续深入群众，了解敌情，宣传抗日主张和各抗日前线的胜利消息，鼓励群众秋收生产，并把打下的粮食坚壁起来。

撤到后方的同志们，县委指定到四区青林台村的黄土台去进行修整。在边休息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开辟这个地区新的方案。县委对这块地区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对这个地区一定要坚守住不能丢掉。为加强斗争力量，在现有军政人员的基础上，组成武装工作队，继续去做开辟工作。地方上仍由李全善、耿子华等同志为首。配备二十多名地方干部，军分区又派了陈大队长，配备干部战士近百名。两者组成了一百二十多名成员的战斗队伍，他们于十月份重新返回这个地区，开展新的工作。

按他们研究确定的工作方案，首先以东港和北峪为基地，要做好它的巩固工作。同时分成四个分队，向着四个地区开展工作。向西一个分队，积极深入河套沟开展由佛子庄至坨里这块地区。向东去一个分队。要越过桑峪梁进外十三村即何各庄一带。向南去一个分队，要开辟外八村，即晓幼营一带。里十三村留一个分队，孤立各据点敌人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我们的小分队分头出击,在无力以战斗方式打击敌人的情况下,就向敌人开展了政治宣传攻势。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一个晚上向敌人居住的村庄和附近的村庄张贴标语,其口号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汉奸×××!谁要投降日本就砸折谁的狗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其后,抽一个晚上统一行动,各分队都在十来个村中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向他们宣传抗日各前线的胜利消息,日本快完蛋了,叫你们当伪军的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别跟日本干坏事,关键时刻要投降过来,八路的政策是宽大的,缴枪不杀,立功受奖等。

又选一个晚上,在若干村内召开保甲长会,向他们宣布,你们是中国人,不能光给日本人办事,主要得听我们的话,要给我们送粮,做军鞋,敌人有什么活动要给我们送情报,不能给敌人送真情报,不能欺压老百姓,不能干坏事,谁要不按我们说的办,就把谁杀掉等。还组织我们的干部战士给伪军、特务写信,有的是奉告,有的是打,有的是拉,有的是用反间计给他们制造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

我们很快把组织和宣传工作搞起来了,造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使日伪军感到吃惊,地方的反动势力也惊慌失措起来。如东港村带着日本捉我王玉民三同志的保长王振江,听说我们回来了,他就辞去保长不干了,逃到檀木港村去住,后来听到我们的宣传以后,他就跳井自杀了。这村新上任的保长王振普,非常顽固,不和我方联系,不接受我方任务,还向敌人报告我方情况,我们就把他立即枪决了。又把各地的反动保长,也就是拒绝和我方联系,与我为敌的保长,连续枪毙几个。东庄子村保长姓殷,去信要粮,两三次不送,过几天后自己骑着带串铃的小驴来了,经教育他答应按时送粮来,让他回去,警告他到时不来随时可把你杀掉。同时各分队又开展了捉汉奸特务的活动,顽固不化的就地杀掉,有悔改表现的经过教育放回据点。这种形式给了敌人很大震动。不仅孤立了里十三村各据点敌人不敢随便出来了,也打开了新区活动的局面。同时也震慑了芦沟桥以西、长辛店一带的敌人。出现了敌人的保长大部分为我所用,各据点的伪军特务也通过关系向我联系,建立关系,向我提供情报。这种新的形势,既给大部队外出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对巩固扩大平西根据地起到了应有作用。县委随着形势的发展,把这个地区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昌宛房六区,仍保留武工队的建制,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

李全善同志为这个地区地方负责人,因身体不好留在后方休养,前方这段对敌斗争由耿子华和陈大队长指挥,从十月份出来到旧历年底四个多月时间,工作开展很有成效。县委派组织部长史广通等同志下来检查工作也给予了一定表扬。并建议要在过年之际把这段工作认真的进行总结,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在总结工作时,耿子华同志写了一首诗:

发髻山上住英雄 东港深山藏兵营
青龙头上站住脚 马安山下显神通
桑峪梁高飞腿过 河套沟长分组攻
抛掉头颅洒热血 为我中华永安宁

这时的东港村,不仅是武装工作队的生活基地,它还不断地把敌人情报送到我后方机关。同时也成了向后方运送敌人向我根据地禁运物资的一条交通要道。他不仅能把我向城市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送出去,也经常转送城市奔向我后方的各界进步人士。所以说这个深山村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对抗日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起到了平西根据地前沿阵地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杨林水事件记述

张成基

在1941年2月，杨林水村发生过一场敌伪军抓走我八名区、村干部，杀害民政助理高奉林的重大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杨林水村是一个十多华里长的大沟，一百多户人家散居在沟沟港港，很不集中。这个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政治方面也很可靠，在支援抗日和大生产等项工作上都很先进。它又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在长操、南窖一带打游击的我军政人员，经常回到这里休息。当时的房山九区（就是现在的霞云岭乡）有一股以土匪头子杨天沛、罗宗奎为首的地方反动武装，这股反动势力，投靠驻在南窖的日本鬼子，跟共产党作对，坑害百姓，作恶多端。

1941年2月29日这天，天刮着七、八级大风，非常寒冷。就在这时，伪军小队队长罗宗奎带着三十多匪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杨林水村。他们一进村，就直奔村长任宏铎家。敌人想：只要抓住村长，就是这回讨伐的一大胜利。闯进院内，他们便屋内屋外的搜查。当时，只有任宏铎的女儿在家。匪徒们见没有男人，便问：任宏铎哪去了？任的女儿骗敌人说，到柳林水接我娘去了。匪徒抓村长扑了空，就开始抢东西，把屋内能带走的東西都抢走了。匪徒们从任宏铎家出来，往村下头走时，遇见小学教师史广润，看他白面书生的样子，便产生了怀疑，立刻把他抓了起来。

伪军小队队长罗宗奎、副队长任成文对没抓到村长感到不妙，他们重新布置兵力，派七八个匪徒火速占领南台制高点，架上了小炮、掷弹筒，控制东台和北台，造成村民都不能跑的局面。其余的敌人分为三股，到三个自然村，抓捕共产党员和干部，并且见东西就抢。

原来，村长任宏铎，早饭后从家里出来，去工作组打听区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的时间，路过合作社时，便进屋和理事史万水说几句春耕生产的物资准备情况。正在这时，来杨林水看姐夫任显明的柳林水村中队长马玉福，也来到合作社。三个人正说见面话。突然，敌人用脚把门踢开，七、八个匪徒闯了进来，三个人都大吃一惊，任宏铎发现是敌人，迅速把兜里装着的村公所大章，塞到炕席底下。敌人问任宏铎叫什么，当任宏铎说出自己的名字后，七、八双眼睛都盯在他身上，说：好啊！你就是村长。不容分说，马上把他捆了起来，同时，也把史万水和马玉福一起捆上，押到村公所，交给罗宗奎，匪首罗宗奎见村长被抓来，十分高兴，派人把他们严加看管起来。

这时，去南台制高点的敌人打起枪来，并向东台和北台开炮射击，枪声、炮声在村庄上空响成一片，村里的几处柴草垛也被烧着了，霎时，把杨林水上半沟弄了个浓烟滚滚，全村乱作一团。村民们面对敌人的枪声。不知所措，四处躲藏。有的全家挤进了炉坑，有的钻进了菜窖，有的躲到房后滴水檐下。不论猪窝，还是羊圈都藏进了人。青年妇女怕遭不幸，用灰土锅烟抹脸，还把穿的好衣服脱下来，换上破衣服，还有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吓得倒在地下，躺在炕上等死了。

匪徒们窜进各户，开始抓人抢东西，他不管是金银首饰、衣服、被褥，还是烟叶、杂粮和小鸡，都一抢而光。看到象有钱的主，就逼着要钱，谁不给，就拳打脚踢，用皮带抽，用枪托打，还有的用枪口对着户主的头说：“不给钱就开枪打死你。”村里传出的求饶声、喊叫声，此起彼伏，真是惨不忍睹。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罗宗奎下令匪徒集中到村公所，各路凶手已经坏事干绝，迅速到达集中地点。去北台的敌人抄了贸易所的办公室，什么东西也没抢到，抓住了所长宋广宽和一名干事；去东台的敌人，到了

宛平四区驻村工作组。工作组有三名同志，有区委宣传委员史万章，他是工作组长，民政助理高奉林，公安助理史正学，下乡来布置春耕生产，已来了好几天。可巧这天公安助理史正学被区里通知去执行别的任务。高奉林、史万章二人正等着和村长研究村里的备耕工作。工作组是住在史万章家中。当时，党还不公开，虽然他是区委宣传委员，没有公开身份，他对敌人始终坚持他就是这户户主，是老百姓，不是区村干部，敌人也不掌握他的情况。高奉林听到枪炮声后，焦虑万分，根据地形，敌人控制的很严，往外转移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他和史万章把该处理的文件都做了妥善处理。他对史万章说，万一不幸被敌人抓住，你就坚持说是老百姓，反正你是这村的人，党的身份和职务群众都不知道，把我说成是你的表兄，是从岭东来的。敌人将要进院时，史万章把高奉林藏进了菜窖，把窖盖上压了些柴草。当敌人捉住史万章后，就产生了怀疑，对他的屋里院里认真搜查，结果把菜窖打开，发现了高奉林。当时，我们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手无寸铁，只好束手被擒了。本来和史万章有一套安排，被捕后汉奸听到群众说：可毁了，把高助理从菜窖里抓走了。这声对职务的称呼，暴露了高奉林的身份。敌人认为他是这次抓住的最大的干部。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只得承认自己是民政助理，并一口咬定史万章是这户的户主，敌人不相信，便把他们捆了起来，送到村公所，向罗宗奎报告抓住了区里的一个大干部。经过搜查，敌人一共抓住了区干部四名，村干部四名(其中有柳林水一个)。

匪首罗宗奎、任成文也做贼心虚，感到时间不短了，害怕我军赶来消灭他们，所以命令匪徒们迅速集合，撤出杨林水村。他们对这次突然袭击杨林水非常得意，达到了预想的目的，除了抓住我八名区村干部外，还抢了老百姓很多财物。出村时，群众都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满载而归。为了防备我军的追截，出村后，就顺河而下，对路过的柳林水、鸳鸯水都不进村，在惊恐万状的丑态中，直奔贾峪口村。当敌人到了贾峪口村时，又累又饿，都集中在李家店休息。强制老百姓用从杨林水合作社抢来的两袋面给他们做了大条面吃。

李家店的店主叫李德润，他的妻子叫段淑兰，是我们可靠的地下关系户。敌人一进院，他们就看到敌人押着进来八个人。是宛平四区和杨林水村的干部，便大吃一惊。两口子商量要尽力营救这些人。随后，就找罗宗奎说：这些人都是上下连村的，并且说是十亲九故，抓他们干什么，把他们都放了吧：怎么哀求也不行，后来，段淑兰想就是都救不了，能救一、二个也行。又对罗宗奎说宋广宽是我干儿子，还有带着那小孩，他俩是做买卖的，你们抓他们干什么，我可以保他们。敌人还是不答应。吃完饭已九点多了，敌人又开始整队出发，到银水村去住。李德润、段淑兰的心情沉重，到底怎么办呢？段淑兰让李德润带上大烟枪和烟土，跟随罗宗奎去银水，和他抽大烟，拉近乎，看能保出几个。结果李德润缠了罗宗奎一夜，大烟没少抽，事情却没办成。第二天早饭后，段淑兰也赶到了银水，听说李德润事没办成，就大骂他一顿：“你真不会办事，来了一夜，就连我的干儿子也保不出来，他一个做买卖的，跟八路军有什么关系？你还算人呢！”一边骂李德润，一边对罗宗奎说：“你们也别不认好赖人，他的情况我知道，就是做买卖的，经常在我这里住，不信你们问贾峪口的人，谁不认识他呀。”这时罗宗奎和任成文商量说：“河套沟谁都知道老段，她到哪个据点，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保安队都说的来，就是北京、天津都来往无阻，她的干儿子，咱们不放了不合适，就同意放了吧？”接着又对段淑兰说：“段大嫂，别生气了，看在你们两口子的面子上，我们就把你干儿子宋广宽和他带着的那小伙子放了。你们把他们带走吧，别人可不行。”这时段淑兰又说：“你们捆来的这些人都是好人，你们还是行个好，谁家没有妻儿老小的，把他们都放了吧。”罗宗奎不准他再说了。段淑兰怕再说使罗宗奎变卦，心想保下两个，也算是成效。只得把宋广宽他俩带回了贾峪口村。

敌人住的银水村也是一条五、六华里长的山沟，到这里就十点多钟了，在村中有个毡铺挨着三个院住下，把抓来的人关进三间大屋，门上了锁，派人严加看管。这些敌人轮流站岗，害怕我军追来。到第二天早饭后，李德润、段淑兰把宋广宽二人保走后，罗宗奎和任成文等头目，又研究对抓来的人怎么处理，他们感到如果把抓来的人带回去，交给伪军队部或日本人，这一切收获，就落不到自己手里了，如果在这里等待，可能还会有人来保，保一个走，要五百块钱，可从这些人身上得三千块钱。因此，他们决定，在这里等待保人，同

时，还让被抓的人托人来保，或者给家里捎信，让家里来人保。决定后，通知原地待命，说是准备回南窖，却又不走。一方面，加强警戒，防止我军来打，又把从杨林水抢来的戏班子锣鼓和各种乐器，让他们当中的爱好者敲打起来，把个山沟弄的乱轰轰的。老百姓们看了，背地里骂他们吃饱了撑的不知抽的什么疯。

任成文就到被抓人员中问讯，并说：我们也不想把你们带到南窖，你们可以找人来保，每人出五百块钱，就把你们放回去，我们不想往死里打你们。为表示真心，把从杨林水村公所抢来的文件都拿到他们面前烧掉。边烧边说：“这些文件如交到日本人手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被抓的人对他的行为半信半疑，也找不到保人，每人伍百块钱，没有一个能拿的起的。因此，都横眉冷对谁也不回答他的问题，就看他到底要什么花招。

匪徒们从杨林水走后，三水各村一片混乱，杨林水村被抓干部的家属嚎啕大哭，亲友们也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柳林水村中队长马玉福被抓走后，全村人都焦急万分，要想方设法把人救回来。这时，史万章的姐夫刘巨刚和银水村的韩成瑞是知心朋友，交际很广。他立刻前往银水去求韩成瑞，要他出来保史万章。天黑二人来到银水罗宗奎住地，商谈保人的问题。罗宗奎说：你们可把任宏铎、史万水、史广润保回去，但每人要给伍百块钱，我们要把高奉林、史万章、马玉福带到南窖去。这样看来，敌人又要变卦了，还是不想让保的劲头大。正在这时，我们的队伍从下石堡追了下来，已和他们的哨兵接了火。敌人急于向南窖逃跑，未能再往下谈。我军追来的情况是：当时区公所在莲花庵村，离杨林水很远。当接到杨林水被袭击的情报时，敌人早已到了贾峪口。当时我军都在百花山后的黄安坨一带，接到报告已是第二天上午，宛平县大队派了一个连由黄安坨到莲花庵又急行军追到下石堡，天已黑了，了解到敌人在银水村，立即从山坡绕到银水，在村边遇上敌哨兵打了起来，敌人听到枪声急忙向南窖据点撤退，我军追到大西沟村，天已深夜，又是到了敌占区，再追无用，全军撤回。

罗宗奎、任成文还想由他们了结这件事。为了得钱，不上交此案。走到上水峪口原地休息，停止前进。派人去南窖向杨天沛请示，能否把抓来的人送到上水峪村，由本队处理。一小时后，送信的人回来说：“杨天沛命令把抓来的人送到南窖去。”到了南窖后把他们关在真武庙北的一座五间大房里，派上了哨兵严加看管。

第二天，天刚亮，伪军就把六名区村干部交给了日本人，并从大屋里叫出来，到院中排队，稍息、立正、左右转，几个人也没做好，东倒西歪，就停止做了。又让他们到真武庙的大房子里，屋里有两条炕，都让他们坐在炕上，时间不久，来人传高奉林、史万章、马玉福到房山五区政府，由日本队长审讯。十一点回来。拿自己的东西立即送往河南。当时，被抓到河南我军政人员没有能活的。六个人哭一场。押送的催着他们走，送到大门口，被敌人站岗的拦住，留下三人听候对自己的处理。

时隔不久，传史万水过堂，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一个来小时回来了。又传村长任宏铎去。据本人讲，敌人抓他两点，一是他是村长，让他答应由村中送来粮食供他们用，二是认为他家中富裕，只有拿钱来才能保回去。他本人心中沉重，不知该怎么办好。走到审讯室门口，两条洋狗张嘴吐舌地向他示威，被审讯者拦了过去，进到屋内看墙上挂着两把东洋刀，正面方桌后坐着日本官，右边坐着翻译官，叫任宏铎站在前边。由翻译官问道：“你是共产党吗？”任宏铎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又问：“你们村谁是共产党？”任宏铎都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是村长吗？”他回答说是。敌人说：“你是当村长的，八路军训练你们这么多年，问你这些事都不知道。”任宏铎说：“我就知道他们的手榴弹是圆的，怎么放都不知道。”翻译官又问：“你给八路军交了多少公粮？”任说：“一百大石。”翻译官说：“那好，你给我们交多少？”任宏铎说：“不能交。”这时，任成文进来照任宏铎肩膀上拍了一把：“嘿！老任，你看翻译官手提着笔，就是要记你的粮食数字呢，你不答应能交待的了吗？”看着不说不行，答应了五十大石，说了数，落了笔，问什么时候送到？粮不送到，可不叫你回去。任说：“我马上去信。”回到驻地不久，敌人就派人来问，写信了没有？任说：还没写。催他快写。到九点多又来问，只好说假话，说写了，送走了。敌人问：送信的人现在到哪里了？任说：到沙湖了。在这个过程中，敌人对史广润的情况也基本弄清了，知道他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回村

当小学教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等待取保释放。

在南窖住到第三天上午，由于柳林村史万福在南窖开小买卖，早就和罗宗奎、任成文认识，常在一起打麻将，前来把三人保出，条件是史万水、史广润每人伍百元，任宏铎得交够伍百伍拾元才能放走。三天后，史万福为史万水、史广润借齐了钱，把他们赎了出来。又带了任宏铎到陈家台，通过李永建从河北羊肉铺借了伍百伍拾元，到七天交钱后放回了家。他是时间最长的，十二天到家，尽快卖掉自己四亩地，归还了河北羊肉铺的钱。

送到河南交日本只有高奉林三人。宛平县敌工部和四区委利用河北一带地下关系，积极工作。又派柳林水村开店的马福俊去河北一带，各界人士向伪职头面人物做保，不少乡绅也出来说情，最后押到河南大编乡长马大抖身上，他不得不向日本说情，结果是：史万章、马玉福在审讯中没有承认共产党员和干部身份，每人伍百元取保释放，高奉林被捕时就承认是宛平四区民政助理，日本认为他是政府干部，定是共产党员，再加审讯时他什么都不说，要坚决杀掉，给多少钱都不能放。敌人在审讯时。由于高助理态度顽强，被打得遍体鳞伤。高助理在严刑拷打面前，除了承认是民政助理，其他一是不说，二是不知道。日本鬼子对他软硬兼施，总想从他的嘴里得出宛平四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干部名单以及我党在河北沟的战略计划。高助理是钢铁硬骨，无论敌人用何种手段都无济于事。凶恶的日本鬼子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把我们的高助理押到河南村后的刑场杀害。高助理在就义之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停止呼吸。

高奉林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他在革命的队伍中，用一颗红心，满腔热血，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仅活了二十几岁，抛下了年迈老母，离开了妻子儿女，为祖国而献身，在战争年代，他没得到过任何享受。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生活的人，应该经常想到，伟大的祖国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来之不易的，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和性命换来的。因而，我们要热爱她，保卫她，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更加美丽。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侯家坟破袭战

张国银 口述 卓成栋 整理

1947年秋，华北战场我军对北京已形成了包围的局面，为了防止敌军沿京广铁路进入北京增援傅作义部，同时也防止被围敌军沿铁路突围逃走，由京西南窖小区联防团指挥的2700多人的侯家坟破袭战拉开了序幕。

全体参战部队由地方武装、区大队和村游击队及民工三部分组成，分两路直插侯家坟(现窦店东)。当时我担任大部队尖刀侦察班的探路任务，先于大部队来到焦庄，并请当地的一位老乡带路，于当夜的十一点多到达指定地点，两路部队汇合后，马上就开始行动。埋置炸药的同志率先引爆埋好的炸药。于是侯家坟至良乡段十余华里的铁路被分割成数十段，2700多人将切割数段的铁路，肩扛手拉，翻到路基下面。全部工作完成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当敌人发觉后，全部破袭工作已经完成，部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尚未撤完。我方游击队便与敌人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战斗进行十分激烈。当敌人大部队赶来时，破袭队员几乎全部撤出。因

天黑，又地形复杂，敌方畏惧游击队人多势大，只是向破袭队员撤退的方向不断地射击，没有向纵深追赶。当日凌晨八点半钟左右，分散撤退的民工和地方部队陆续在坨里东面小山坡上集合，然后返回解放区中心南窖。还有部分分散撤退的民工和游击队于第二天晚上从南路绕张坊、十渡返回南窖。

至此，1947年秋季破袭战，历经两天全部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山后八军考辨

杨亦武

房山有古迹三角山、关上和鳌头寨。

三角山，在霞云岭乡王家台西北，三峰鼎立，唯东南一峰可上。山高顶平，山上有石城遗址。由此东行至霞云岭南入安子沟至关上。

关上，在张坊西北二十里，南一里有旧城墙一道，由此行入霞岭；东行至黑牛水，由黑牛水东南经东域寺可至鳌头寨。关上地控南北，古为出山要隘。

鳌头寨在南尚乐乡东域寺东南之般洲山上，此山四面陡绝，顶巅坦平。明嘉靖（1522—1566）缮城记云：“般洲山实南北相控之咽喉。”

旧志称三古迹为唐末刘仁恭山后八军遗迹。

清咸丰八年（1858）本高骥云《房山志料》载：“三角城（或称三角山），关上城在中，般洲山寨在南，皆大山前后形胜之地。……访之邑人，或云刘武周屯兵处，或言刘盆子。以予考之乃刘仁恭山后八军也。”民国十七年（1928）本廖飞鹏、高书官《房山县志》在《古迹·鳌头寨》援引高文以代志述。显而易见，旧志撰者认定“山后”为大防山之后，考之正史颇见其讹。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唐纪七十六·昭宗乾宁二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部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妫檀诸州在幽州山北，亦谓之山后。”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后梁记·太祖开平元年：刘守光“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凡守光所李恶者皆杀之……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卢龙，卢龙军。即指幽州。

可见，“山后”本指幽州山北，亦即幽州卢龙巡属的妫、檀、新、武四州。幽州即今以北京为中心的河北北部一带。妫州即今河北怀来及北京延庆一部；檀州，即今北京密云及怀柔一部；新州，即今河北涿鹿至赤城一带；武州，即今涿鹿以北的河北宣化境。足见，“山后”并非房山大防山后。

唐末，妫、檀、新、武四州为幽州北疆，疆北即是日益强盛的契丹。刘仁恭故设山后八军，以防契丹南寇。八军布防四州为山后劲旅。

五代梁太祖乾化二年（912），晋（唐末、五代初山西割据势力）周德威攻幽州。乾化三年（913）刘守光遣大将元行钦率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即山后），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

李嗣源分兵略定山后八军……李嗣源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高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援，元行钦解围而去。李嗣源与高行周追至妫州怀戎县北广边军。凡八战，元行钦力屈而降。至此山后八军终归晋有。此为刘氏山后八军故事，延毫一述以正视听。

毫无疑问，“山后”并非房山大防山后，山后八军亦非驻防大防山。那么，旧说三角山、关上、鳌头寨为刘仁恭山后八军遗迹，实属子虚之谈。

高骧云之误当是因刘仁恭筑馆于房山(大安山)，三角山、关上、鳌头寨诸古关城又在大防山后，以臆断之，疏考正史所致。高书官撰《房山县志》又依附成论，不加思辨，致以讹传讹。为史者足以为戒。

当年，刘仁恭坐镇幽州。涑水祁沟关为其西南边关要隘。敌镇往往破祁沟沿拒马而入。至乾河口后或北取山路历关上，经霞云岭三角山辗转出门头沟进击幽州城。或东下取平原路过张坊，经南尚乐般洲山鳌头寨，再东北行，驱幽州城。般洲山鳌头寨、关上、三角山地当险要。据房山区文物局鉴定，关上古城为唐代遗址。鳌头寨、三角山或属同时。那么，三古迹颇似刘仁恭镇守幽州之西南要隘。岁久无征，正史缺载。尚待明者考正之。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回忆战争年代的王佐地区

张成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几位老战友从五月中旬开始，多次在一起回顾四十年前打过游击的故地“王佐地区”。当我们来到这里，都感到解放四十多年来，王佐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走到哪里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和安定团结的气氛。与我们在这里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可大不一样了。

“王佐地区”在北京西南二十公里处，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历代都属于战略要地，是当时北平的西南大门，卢沟桥、长辛店两个重镇的前沿哨所，又是“平汉铁路”、“平保公路”、良乡城北部的屏障。因此，行政区划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多变。从历史上看，它是原房山县第三区，南部属良乡，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占据，一切伪组织仍属房山县管。我党开辟这块地区的任务就不同了，因地理关系和大敌当前的形势，房山工作重点转向西部山区、拒马河畔，不能东顾。平西地委将任务交给宛平六区武工队，以里十三为依托，向山前平原进行游击战争。这一地区范围较大，即平汉铁路以北，长辛店以西，坨里以东，分水岭以南。自1942年武工队就以各种形式开展工作，任务虽然艰巨，但起到了插入敌人心脏一把尖刀的作用，使周围敌人非常恐惧，寝食不安。武工队经过1943年一年的工作，在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打击、瓦解敌人，获得敌人情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4年春，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急切地要打通北平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交通干线，所以，对国民党战场发动了新的进攻。这就造成了他们战线长，战争持久，兵力不足，财力缺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日军不得不从华北战场抽调近半数的兵力南进。这样一来，他们原来控制的不少地方就保不住了，只能集中兵力龟缩到重要的城镇和交通干线上。从春季开始，房、良地区的日军收缩到房山、良乡、长辛店、琉璃河等地，把一些小据点交给伪军把守。日军兵力大为减弱，这是日本灭亡的

前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仍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实行“三光”政策，还在敌占区横征暴敛，欺害百姓，要粮要款，抓丁征伕，造成老百姓长期不能下地生产。加上连年的旱涝灾害，真是民不聊生，死活无人过问。

根据当时的形势，在1944年10月，宛平县委将王佐地区从六区划出，单独建立宛平八区，宋怀通同志任区委书记，谭天瑞同志任区长。日本投降前夕，宋怀通同志调走，又任命吕永珍同志为区委书记，谭天瑞同志仍任区长，王文志同志任大队长，史正春同志任抗联主任。全区配备了三十多名强有力的干部。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宛平县委建立了前方工作委员会，原宛平六区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耿子华为前委成员。在区小队配合下，就在大灰厂、晓幼营、羊圈头、北车营等靠山的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在街道上写标语，进行屋顶喊话。内容是：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给鬼子送粮送款，不给鬼子当壮工；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共产党万岁等。同时，在平汉铁路两侧、良乡城附近的村庄，开展了同样内容的宣传活动。不断集中民兵对平汉铁路进行爆破和分段进行铁道大翻身，切断敌人铁路运输线，对沿铁路线的电话线砍倒电杆，收回电话线，使敌人的通讯中断。经过一段工作，敌占区老百姓逐渐认识到，八路军是解放中国人民的队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的主力。很快出现了人心向我的局面，很多保甲长主动向我提供情报，并送粮、送钱、送军鞋，参加我们召开的各种会议。敌人来了，还把我方工作人员藏起来。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缩短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时间。8月10日，朱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出大反攻的命令。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向日伪军开始了全面大反攻。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在长辛店、良乡、房山等地的日本兵，再也不敢走出据点了，只能龟缩在岗楼内等待命令。住在王佐地区的伪保安团、大编乡及汉奸特务，依仗日本侵略者为非作歹的坏分子见大势已去，分别撤到房山城和长辛店，在撤退中有的就私奔逃命去了，有的观望动向，都成了惊弓之鸟，人心思散，各想出路，已成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对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立即组织区干部和武工队分片到各村召开不同的群众会议，还通过撒传单，写标语，屋顶广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这一特大胜利。受日本统治八年的王佐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喜出望外，很多人情不自禁地高喊：日本投降了！我们可得解放了！再也不受鬼子的压迫了等口号。大部分村庄召开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请区干部作日本投降的报告。大灰厂、后甫营、羊圈头、大富庄、北车营等村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组织群众沿街游行，庆祝胜利。

在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也是我们向敌占区开展工作最有利的时机。当地群众都认识到，是共产党、八路军艰苦奋斗八年，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从苦海里救出来。纷纷要求推翻保甲制，像老解放区一样，建立民主的新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同时也要求建立民兵组织，保卫家乡和胜利果实。在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下，从王佐至南四位以北的村庄，很快建立了民主政权、工农青妇群众组织和民兵组织，还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征兵任务，征粮纳税实行了合理负担。群众顿时体会到：真是解放了。与此同时，区委立即分片召开各村负责人会，号召各村组织群众搞好冬季生产，作好明年大生产的准备工作。并选出较好的村庄大灰厂、后甫营、晓幼营、南四位、北四位、上万、北车营等村，充分发动群众，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长工工资的运动。在广大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的要求下，把罪大恶极、逃亡在外的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各阶层人民一致反映，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不仅给穷人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还组织我们冬季生产，帮助我们作好生产的准备工作，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共产党、八路军是一片赞扬声。区武装部对这些村的民兵进行了训练，发了枪支弹药。区委还决定，冬季在各村组织识字班，对青壮男女开展学文化运动，小学也都恢复起来，还发了晋察冀边区印的课本。到1946年6月中旬，虽然不断遭到国民党、还乡团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工作开展还是比较活跃的。不少村青壮年学文化的热潮空前高涨，部分学校学生会打“霸王鞭”、跳“秧歌舞”，革命歌曲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到处都可以听

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嘹亮歌声。依靠合作形式烧灰、打片石等冬季生产也开展得轰轰烈烈。靠山根的村庄真是出现了解放后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的新局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国民党军队立即开入平津。不久，孙连仲在北平召见房山、良乡两县伪职头目，听了两县情况，并对他们封官加爵，任命李仲三为房山县伪县长，兼六县（房山、涞水、涿县、固安、良乡、宛平）剿匪联防总司令。任命张德祥为房山伪保安团长。任命黄侃为良乡县国民党书记，杨立天为良乡县伪县长，高定甫为良乡县伪保安团长。并指令他们要尽快接收日本占领的要地，即周口店、长沟、琉璃河、坨里等。要坚决守住房山、良乡两个县城。夺取八路军从日本手中接管的村庄和地区，迅速整编两县保安团，还授予两县保安团为国民党军“先遣军”的称号。并命令他们向新老解放区大举进攻。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非做歹的大批汉奸特务和敌伪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急先锋。原来龟缩在房山、良乡、长辛店等据点的伪军顿时嚣张起来，在张德祥、高定甫两个伪头目指挥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疯狂进攻。从9月15日至10月底，仅一个半月时间，就向我解放区发动了三十多次进攻，所到之处，杀害我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民族战争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又开始了。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更有力地开展房、良地区的工作，平西地委决定，单独建立良乡县。在1945年9月中旬，良乡县委、县政府在河北村正式成立，由王漫同志任县委书记，郝绍尧同志任县长。下设四个区，将宛平八区也就是王佐地区划归良乡一区，崇各庄、大苑村以南划归良乡二区。宛平八区原班人马不动，在良乡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良乡县委建立之时，也成了国民党军向我发动进攻之日。随着各地伪军的复活，龟缩在长辛店、良乡和房山的伪军，向已被我们解放的羊圈头、后甫营、大灰厂、西石府等村不断发起进攻。9月中旬的一天，我区大队长王俊川和王文志二人去魏各庄村下乡，在村东头程家饭铺被长辛店的伪军包围，在突围中，王俊川被敌人抓住，带到了长辛店，遭活埋而惨死。9月底，房山保安队在中队长尤茂志带领下，包围我西庄店下乡工作组，抓捕我区妇联主任、民政助理等七人，除妇联主任通过关系保出，其余六名被送到在长辛店驻防的敌二〇八师充了军。1946年1月份，长辛店伪军一次奔袭中，杀害我魏各庄村农会干部郝国相，紧接着又包围我西石府村民兵队部，制造了打死我民兵翟明、孙英、陈德启、孟祥山四人的流血惨案。3月份，良乡伪军从南四位村抓走从长辛店伪军中逃跑出来的宛平九区抗联主任史正本，给活埋在良乡城西门外。6月13日，长辛店伪军上百人包围以区长谭天瑞为首的羊圈头工作组，四人冲出包围，青年主任任成积被敌人杀害。在这段时间内，长辛店、良乡、房山三路伪军向王佐地区的我党工作人员，实行围追堵截，制造了数起流血惨案。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美帝国主义也公然支持国民党大打内战，于6月20日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从此，持续四年的国、共两党的内战在全国爆发了。

王佐地区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1946年6月20日，驻长辛店国民党九十四军一个师在当地伪军配合下，从长辛店出发沿铁路线向坨里进犯，又分多路，沿王佐地区南北两条土路由东向西进犯。21日，他们在坨里汇合，在进犯中一面捕杀我区村干部，一面选定地点建立岗楼，确定在王佐建立中心据点，又在魏各庄、北洛平建两个据点，属王佐据点管辖。坨里是要害之地，部署新建十三个岗楼，形成群体形的据点。23日又向河北进攻。在河北遭到我独立团的阻击，撤回磁家务建立据点，一村设三个岗楼。这样从磁家务至长辛店七十华里的地带建立二十四个岗楼。霎时，王佐地区和坨里一带出现了大兵压境、兵荒马乱的局面。把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各村民主政权、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全部摧垮了。

北车营村是我党最早建立的党支部。敌人对此恨之入骨。他们闯进村，将党支部书记刘剑英全家老少六口人全部杀掉。还先后杀害了瓦窑村农会干部孙德喜、东王佐的陈兴、西王佐的李嘎四、佃起村的曹立等，又把魏各庄村东头饭铺的程老太太给就地活埋，原因是她经常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时间风云突变，王佐

地区阴云密布，又重新被敌人控制。当时，就连我良乡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也无占脚之地。由县委组织全部县、区干部主动撤到大安山，集中研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怎样开展对敌斗争、如何坚持良乡县的工作，以及重新开辟这块地区的工作方法。由于王佐地区的地主阶级组织起来的还乡团对我党干部进行血腥报复，各村绝大部分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都抛家舍业，跟着党组织逃到河套沟（当时的房山七区）的河北、陈家台、佛子庄一带，直到偏僻的北峪沟、陈家坟都住满了逃来的村干部、家属和群众。所有群众无不叹息，日本刚刚投降，人民欲想安居乐业，没想到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坑害人民。上千户的难民逃到这十几个村子，又是异地他乡，双方群众都不习惯，虽然当地区村干部和群众都热情接待，村民们争着腾房安灶，但对良乡县委和房山七区仍有很大压力，吃饭就是第一大问题，除少数人投亲靠友自己安排生活，多数人家由政府发给口粮，同时下大力量组织生产自救，并以游击方式回到家中解决生活问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深受蒋匪帮和地主阶级还乡团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绝对不能忍受这种阶级报复和封建统治的，各村干部群众积极向县委请示，要求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枪支弹药，打回老家去，为死难者报仇，打击蒋匪军和还乡团，并表示，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闹翻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良乡县委研究，当前对敌斗争处于尖锐化时期，由于原来的区小队在日本投降时编入了分区组建的独立四团，这一年来工作主要靠地方干部进行，就当前形势，没有武装要开辟良乡地区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在1946年8月中旬，良乡县委决定，以良乡一区逃到后方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建立一支复仇队，选拔了三十多人，编成了三个班，后来发展到五十多人，加上区干部三十多人，达到了八十多人，这就是良乡一区武工队的前身。队长由区长谭天瑞担任，政委由区委书记吕永珍担任。9月份分区独立营在河北村成立，营长刘景武，副营长肖丙林，政委刘鹏飞。他们的活动重点也在房良地区。又有分区独立团和独立四旅也把这个地区作为对敌斗争的重点。从1946年底，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国民党及伪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为了强化对敌占区的统治，完全推行了日本时期的那一套保甲制。在1946年下半年，他们在房、良地区建立了包括王佐在内的十一个大编乡，各乡都建立大乡队，组织还乡团，大乡长都是有名的地主来当，或是日本时期的汉奸特务。建乡后，他们强迫各村成立自卫队，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接受训练。还乡团、大乡队经常以“通匪”为名，对老百姓敲诈勒索，进行迫害，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还规定谁家也不许留八路军吃住，如有留者，对全家进行活埋。如谁发现八路军不报告，也同样活埋。伪大乡和伪军头目对各村保长分类排队，忠诚他们的发给武器。他们为防止人民军队的铁拳打到他们头上，还组织各村青壮年夜间站岗，发现我军政人员要立即报告。还强制各村埋地雷，下地枪，以各种手段阻止我军政人员进村。在1947年2月初，我区大队长王文志被上万地枪打成重伤。7月12日，坨里伪军在黑石咀包围我区副大队长谭巨隆，在突围中谭壮烈牺牲。8月上旬，王佐伪军在后甫营包围我区委组织委员杨景厚。在突围中，杨左膀被打穿，造成重伤。8月23日，良乡伪军在怪村南边小庄子打伤二区区委书记吴怀聪，打死二区组织委员肖德民。还有其他战斗数起，真使人民群众忍无可忍。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杀害人民的罪恶行径，奋起进行反击。王佐地区的人民，为收复被敌人强占的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在县委书记刘民同志亲自指挥下，首先突破后甫营这个点。保长段玉山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几次向国民党报告我方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瓦解我方在村中建立的各种组织。因他反共有功，国民党发给他长把手榴弹二枚，他每天都带着手榴弹检查岗哨，查看过路人，看是否有八路军。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就选派了一个工作队，由一区大队长王文志、区抗联主任史正春和队员刘振清，于1946年9月2日从佛子庄出发，爬山越岭，昼夜兼程，经过羊圈头，第二天上午到达后甫营。一进村，正碰上保长段玉山在村边检查情况。王文志立即将他捉住，缴了长把手榴弹，派羊圈头的保长李功强把段玉山送到西大洼，又转送到红煤厂的良乡县法庭。工作队进村后，群众一见就跑，怕国民党来了活埋。王文志三人找到几个甲长，要他们召集开会，召集不来，

也要活埋他们。群众知道八路军是不会活埋人的，不过是吓唬甲长而已。一般群众都愿意来开会，人来的差不多时，王文志给大家讲了国内的形势，向大家提了要求，一是我们来了你们别跑，谁要跑就和国民党有联系，对你们实行镇压；二是我们来了你们不要向敌人报告，如果让敌人打死我们，你们也绝没有好下场；三是从今天起每七天给我们送一次情报；四是每月向我们交五百斤小米的公粮。群众要求交五百斤米的布，也答应了。散会后，工作队要走，大家挽留吃饭，在强留的情况下，同意了。当时怕是圈套，怕有人给敌方送情报。等了两个小时，饭也不熟，结果是一个叫大金牙的特务到王佐乡向敌人报告，已经被敌人包围了，经过百般周旋，三人才冲了出来。这次行动，抓住了敌人的伪保长，宣传了群众，从此，打开了这个村的工作局面，群众按时向我方递送情报，送来了布匹。伪保长段玉山，经良乡法庭审讯，实属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在红煤厂被枪决。这一行动，使各据点的敌人受到了震惊，也给各村伪保甲长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敢死心塌地为敌人干事了。我们再到哪村，他们不敢报告敌人。我们进村，敌人来了，还把我们保护起来。紧接着工作队又除掉了几个罪行严重的汉奸和保长，先后杀掉上万村保长郭金才，魏各庄的汉奸郝维雪、郝维丙和向坨里伪军缴我手枪，获得三百元奖金的北车营刘铁匠等。同时不断进行对敌人的阻击、反击和各种战斗。对国民党军的反击和对罪大恶极反动分子的镇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区复仇队和区干部在王佐地区的活动也经常得到独立营和独立团的配合。

1947年7月下旬，独立四旅在独立营和民兵的配合下，一举攻下了坨里群体型的十三个岗楼，活捉坨里大编乡长郑师桥；打死敌军三十多人，俘虏一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一百多支，子弹若干发，手榴弹若干枚，还有大批粮食、物资和档案。我们虽未能守住坨里，但给了国民党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在7月底，分区独立团一个连，在武工队的配合下，打下了魏各庄岗楼，守敌逃跑，我军无一伤亡。9月中旬，我军独立团连续打下了北洛平和王佐两个岗楼。这时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发现我军到来，扔下据点逃命而去。我军进入据点收拾各种物资和枪支弹药，烧掉岗楼，胜利而归。除在攻打王佐岗楼时，区青救会主任李增儒被敌人火药烧成重伤，其它战斗无一人伤亡。本应再打南岗洼岗楼，因它是平汉路的车站，我军如有动静，敌正规军可倾巢出动死保，所以，按当时情况只好不打，采取了削弱敌人兵力的办法。在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独立营和武工队出奇不意，摸进据点，一枪没放，一人未伤，活捉了十八名俘虏，送到良乡县，经审查，都是长辛店附近人，没有罪大恶极者，将他们交给城联部训练四十天，提高了认识，接收了任务，全部送回。回到敌营，这些人全被敌人开除了，都回家自谋生路。解放时，这些人对我们清查敌人仓库，捉拿敌特人员起了一定的作用。焦各庄岗楼属坨里管辖，9月底被我区武工队攻克。敌人早知难守，在岗楼四周和主要干道埋了很多地雷和地枪，岗楼正门也挂上地雷，他们从后门进出。我军到达时，他们全部逃走。我武工队采取了门板盖地雷，大步迈过地枪拉线的办法进到院中。我军战士顾森不慎推门，将挂在门上的地雷引爆，受了重伤。武工队长吕士清急奔现场，踩着地雷，大腿被炸成重伤。在无敌人抵抗的情况下，武工队烧掉了岗楼，迅速撤回，到1947年9月底，良乡一区(王佐地区)除南岗洼车站岗楼尚存，其他四个敌人岗楼全部被我军拿掉。正式宣布王佐地区绝大部分又重新解放出来。1948年5月28日，军区独立团和独立营以及民兵，集中二千多人，合围坨里，打伤守敌大队长尤茂志，俘虏敌军一百三十六人。1948年底平津解放，随之，王佐地区也获得了彻底解放。

随着形势的变化，于五月份良乡一区和二区合并，区址设在大苑村，地区又扩大了。到1958年房良合并，划归北京。王佐地区划归丰台区，崇各庄单建一个乡，上万一带归坨里，还有一些村庄归良乡和紫草坞。通过以上回忆，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一片新面貌。”当今享安然，战史不可丢，总结血泪史，拼命干四化。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南窖矿区的罢工斗争

潘惠楼

房山的煤矿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矿工们就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矿区工会组织，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38年春，八路军五支队派人来到房山的南窖矿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9年，党在南窖矿区附近的长操村建立了县人民民主政府。当年党就派共产党员郭芳来到南窖，向矿工宣传抗日主张，宣讲革命道理。以后又有赵然、庄敬山等共产党员来到南窖的矿工中间，开展工会工作。当时的南窖一带，有小煤窑一百多个，附近村民也多以采煤为生，矿工多达几千名。还有从清港至坨里的几十里运煤高线，担负着矿区煤炭的外运。矿工们听说工会是自己的组织，成立工会是为了团结工人与日伪进行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是为了工人们谋利益，于是纷纷要求加入。党依靠矿工骨干，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会就发展会员两千多人，有的矿工还秘密加入了党组织，使一百多个小煤窑都有了工会组织。矿工刘兴、赵存、史良存、傅有深等还被选为工会组长。工会会员不仅分布在煤窑里，还分布在南窖、安子、水峪、大西沟等许多村庄。

工会成立后，第一次斗争就是要求为高线和运煤工人增加工资。工会代表向高线站站长刘秀峰提出了工人们的要求，然而日伪统治下的高线资本家们没有把工人放在眼里，对工人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推拖搪塞，工人们非常气愤，工会决定五天后罢工。五天后，高线不能运转了，斗车运不了煤，生产停顿了，矿区的煤炭运不出去，影响了坨里铁路运煤和京津一带的用煤，这可使高线资本家着了慌，刘秀峰不得不找到工会，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增加了工资。

这次罢工的胜利，给了工人们很大鼓舞，使工人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随后工会又组织了新的斗争。矿工们提出了减少挖煤趟数的要求。工会把这个要求向资本家和窑主提出来，资本家们接受了上次高线罢工的教训，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表面上也只好答应下来，把矿工们的拉煤趟数由每天的十几趟减少为八趟。矿工们唱着自已的歌曲——《黑莽军战歌》开展工会活动，在南窖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矿工们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在房山煤矿区的统治，但敌人并没有善罢干休。在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期间，随着县政府从长操村的转移，南窖矿区一带的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工会领导人和会员在斗争中壮烈牺牲，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为生活所迫跑到门头沟一带背煤求生，有的隐蔽或转移，还有的被敌人逮捕。工会领导人之一刘兴在日寇包围中，英勇不屈跳崖牺牲。然而工人斗争的火种始终在矿区燃烧，矿工们的斗争此起彼伏，直至矿山解放。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难忘的一课

张 珍

1947年5月下旬,我有幸到解放区史各庄村参加由边区房山县公安局(地址在张坊村)举办的敌占区青年训练班。这年我十七岁,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开始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懂得了劳苦大众只有靠共产党领导才能翻身解放、才有出路的真理。

我家住本县尤家坟村,是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家境贫寒,整天随父兄种地劳动。每年收获的粮食,除给地主交租和交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所剩无几。一家七八口人,粮食不够吃,只有用野菜、树叶掺在粮食里充饥。一家人饿的皮包骨,生活贫困到了极点。我家距解放区虽然仅有五十多华里路程,但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整天疲于奔命的老百姓,只听说山区有共产党领导,穷人都翻了身,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情况及其前途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在训练班上听了讲课以后,使我耳目一新,倍感亲切。

在这次训练班上讲课的两位同志:一位是杨华,一位是吴同。他们操着涑水口音,口才流利,道理深刻,语言动听。讲的课大体是三方面内容:一是讲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向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富农阶级作斗争。劳苦大众为什么整日辛苦种地而没有粮食吃,就是因为有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中国共产党不信鬼神,农民受穷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只要劳苦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一定能把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富农阶级推倒,得到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大救星。二是讲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当时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强大,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西北战场、华东战场及华北战场都接连打了大胜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尽管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但他们脱离群众,国民党兵大多是被抓来当兵打仗的,他们注定要失败的。解放战争的目标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得到翻身解放。三是讲参加训练班的青年,家住敌占区,要积极行动起来,宣传解放战争,支持解放战争。要配合地下工作人员搞好征粮、宣传、带路等工作。训练班除讲课、讨论以外,还有解放区的剧团来训练班演出节目,有时我们训练班也出一两个节目,形成联欢会的形式。随着训练班的学习深入,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眼界大开,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从心眼里感到振奋。我决心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我在讨论时表示:“如果地下工作者到我的家乡工作,我保证配合好。平时要积极宣传解放区的老百姓翻身解放的情况。如果我的家乡解放,要象解放区那样,敢于向地主、富农作斗争。”由于我的态度鲜明,在训练班中期,杨华、吴同两位同志还个别找我谈过话。杨华同志问我:“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说“共产党好!共产党不压迫人,不剥削人,将来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帮助老百姓彻底翻身解放。”又问:“如果地下工作人员去你家,你敢不敢出来带路、找人?”我说:“敢!叫干什么都行!”又问:“如果不进你家院子,而往你们院子里扔块石头,或有人去叫你,你能不能出来?”我说:“只要我发现有人扔石头,或有人去叫我,我保证跟着出来。”又问我家种多少地,本产多少亩,租地多少亩,家庭居住的具体方位,父、兄姓名职业等等。最后,杨华同志提出:你愿不愿加入共产党?我说:愿意入共产党。谈话时,他俩和蔼可亲的神态、语重心长的叮嘱与期望,虽然事隔四十四年之久,至今牢记在心。谈话时所用的油灯,农家的桌、凳仍然历历在目。我一直把这次训练班和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视为我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直至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难以忘怀的启蒙。

说来也巧，敌占区青年训练班结束不久，在1947年6月下旬，一天夜晚，吴同同志带着游击队来到尤家坟村。找到我家门口，他跟人进院，点着我的名字说找张珍。我一看是八路军，我说我就是，我马上就随着出来，见到吴同同志后，他靠近我耳边说，让我领着找地主家的麦场。因我家与地主家的麦场只一墙之隔，二话没说，我就领着找到地主家的麦场。吴同同志带领几十个人，每人都灌多半口袋麦子，有的用人背，有的用毛驴驮走了。还有一次是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夕，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北京，我受村里委派，同乡亲一起往长辛店送玉米秸。我赶的一头毛驴由于体弱、眼力差，当深夜走到大董村村西时，有一个大土坎，别人的牲口很自然的下坎走进大董村沟，而我的小毛驴怎么也不敢下去，别人都走过去了，他们让我把玉米秸扔在半路，赶着毛驴回家。我没有这样做。当时我想，不管绕道多远，也要把玉米秸送到长辛店，支援前线，让解放军早日解放北京是我的任务。于是，我独身一人，在伸手不见掌的深夜，赶着毛驴沿着土马路，绕道良乡、梅花庄、篱笆房、岗洼，中间还淌过一条河，一直把一驮不足60斤的玉米秸送到长辛店接收站。我当时感到为支援解放北京，心中象有一团火。因此，一点也没觉得路远、天寒、河水冰冷。努力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打心里高兴。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夜袭侯家坟火车站

宋九星 口述 索 俐 整理

1947年，那天是五月初五。我被甲长叫到东岭开会。原来，是解放军要打侯家坟火车站跟村里要民伏。开会的人到齐了，甲长和在场的解放军说：“人都来了，你们用谁就抓谁……”解放军说：“解放军不讲抓人，要民伏得人家自愿去。”开会的大多数是各家的妇女，没有几个男的。我最年轻就报了名。那年天旱，五月初才下了透雨，家家忙着抢种。解放军吩咐甲长，一定要替我把地种上，别误了节气。晚上，我回家吃完饭，就赶回东岭跟队伍出发了。

这支队伍是马辉的侦察连。队伍先到了羊耳峪。在羊耳峪队伍集合后又到了东流水。东流水也有一支队伍。连长让我背着一个背筐，有五六十斤重，上面盖着蒿子，不知道是什么。连长要我千万小心，要轻拿轻放。一个战士小声跟我说：“千万不能动火抽烟，不然，弄不好咱们得升天！”我猜出了筐里可能放的是炸药。队伍从东流水出发奔侯家坟，超近路走直线，见沟跨沟，见坎上坎。队伍过一个大沟，从沟底上去有八九尺高。战士们搭成人梯爬了上去。沟上边正好是一片瓜地。战士们按连长要求，三人一组穿过瓜地，没有一个弯腰摘瓜的。

半夜，队伍到了侯家坟火车站。解放军战士分成三路，胳膊上系着白毛巾，迅速包围了火车站。事前规定，听三声爆炸就抄家伙进攻。这时，一列火车亮着大灯开过来。连长让三个爆破组埋伏在铁路旁，等火车一进站，爆破组立刻窜上铁道，把炸药埋在铁道当中点着了药捻子。只听“轰、轰、轰”三声，铁道崩翻了，河溜石象盆碗大飞得满天。队伍呐喊着向车站岗楼冲去，枪炮声连成一片。队伍原以为进站的火车是货车，没想到装的满是军队。这一来，站里站外敌人合成一股，凭着岗楼，打着探照灯用机枪猛扫。不少战士倒了。一个战士冲到炮楼前，架上梯子往上爬，被手榴弹砸下来，可手榴弹没响，他站起来又往上爬，正好一颗手榴弹爆炸，他

受伤摔了下来,等别人把他抢下来,他却牺牲了。仗打得很凶,连长怕我受伤,让我趴在站外的一个坟圈子里不要乱动,等战斗结束再叫我。站里的敌人凭着探照灯和有利地形向我们扫射。连长命令战士炸毁了三根高压线杆子,敌人的探照灯才灭。天麻麻亮,车站一时打不下来。为减少伤亡,部队主动撤退了。

这次战斗,伤亡很大,三十几个战士牺牲,四十多人受了伤。伤员用担架抬回来,牺牲的战士用大车拉了回来。大部分牺牲的战士拉回山里根据地埋葬了。剩下的五名烈士,因在山里没有亲人,就从羊耳峪村征了五口棺材(三百斤棒子一口)埋在了羊耳峪村西的小坡头上。谁也说不清这五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为了纪念他们,附近学校的学生常来给他们扫墓、送花圈,请我给讲战斗经过。1976年,燕化客运公司占地建厂,五位烈士墓迁到了羊耳峪一果园的北山坡上。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索例系《燕山油化报》总编辑

对日寇建立庙安据点的斗争

张成基

1942年秋,日寇的败局已定,但仍垂死挣扎,在平西各地建立了最后一批据点。昌宛房四区的庙安梁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据点虽然只建了五个月,但对我们的危害很大。首先是切断了我党的交通线,给我们军政联系工作、生产、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其次是修建炮楼、强征民夫、搬运建材、砍伐树木,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三是破坏了正常秋收,庄稼不能及时收回,给家庭生活带来困难,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庙安梁,是我平西最高山峰百花山东麓十五华里处较低的一个垭口。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向东延伸到永定河畔。西边与太行山相连,走出百华里的群山,就是房、良、涞、涿。山后是富饶的斋堂、保安两道大川。这个垭口,是四条交叉的路口。从清水到房、良,由天津、门头沟到涿州、张家口,又从热河、辽宁到沿河、青白口奔史家营等地的必经之路。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先后侵占了宛平的斋堂川和房山的河套沟、大安山等地。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包围日寇侵华指挥中心——北平,我党以百花山为中心,建立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经常住在涞水的三坡、涿鹿和房山县的十渡一带,指挥全地区十二个县对日作战。同时还起到开辟平北,坚持冀东、冀中后方,保卫晋察冀边区的作用。因此,住在北平的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多次下令把共产党挤出平西,采取了五次强化治安,多次分五路、十路,由万人到几万人的兵力,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宛平境内除四区外全部失守,县政府只能转移到秋林铺、宝水、东村一带

坚持工作。因此，到东和北边的二、三、五、六区去工作，必经庙安梁。因为交通要道、较大的村镇都被日寇占领，这条僻静之路，除群众正常来往增多外，我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人员，从平西出发，去平北、冀东开辟指导工作，平北、冀东各级干部来平西开会受训，以及我方到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去做地下工作，各城市的爱国人士、进步学生、知识分子来我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还有我游击队和民兵向敌人进行游击战争，担架队转移伤病员，民工背粮草，送军鞋军衣等，都要从这里通过。驻斋堂的日本队长濂野，情况早已掌握。提出要在庙安梁这个交叉路口上建据点，使共产党、八路军不能再到各地来往，同时吞并宛平四区。但此处离中心据点太远，四面不靠村庄，建起据点很孤立。东西两侧虽有较高的山势，但也难以守住。日军还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在山顶上建筑两层高的岗楼和配套设施。队长濂野立即抽调两个小队日本兵六十来人，两个清乡小队，也六十来人，还要了民夫五十人，共180人，要在一个月时间修成。于1942年的8月3日来到庙安梁上安营扎寨。日本驻在山顶，临时搭起帐篷，清乡队和民夫住在宋家台。第二天，分两路向十个村进攻。东路向金林台、金鸡台、清土涧、西岳台五村，西向大村涧、史家营、曹家坊、莲花庵、秋林铺五个村。到村后先张贴通告，内容是：皇军已来庙安梁建立据点，卡断共党共军交通。为保百姓安定，将四区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中。皇军对各村民，以亲善为宗旨。各村在三月内派人到据点，确定保甲组织，接受派民夫，送粮、菜、肉、柴的任务。各村看到通告，都大吃一惊。说日本要让我们当亡国奴，坚决不能答应。我县、区工作组也到各村传达上级精神；日本建据点要长期占下去，我们要准备与敌斗争，克服困难，抢收粮食，坚壁清野。群众要转移到山上去住，尽量少受损失，坚决不能接受他们的统治。

日本军得意地等着去人。等了两天无一人去。又分兵下去督促各村去接受任务。并威胁不要违背皇军的命令，否则给村民造成不幸。各村根本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抓紧对日监视和组织转移上山的工作。

三天过去了，也没有一个村去接受任务。队长濂野火冒三丈，怒气冲天，想以武力镇压，但“亲善、和协”的墨迹未干，也行凶不得。只好从东斋堂大编乡强征二百民夫，两天之内集中庙安，不按时到就以保长的头试问。于是东西斋堂、马兰村、达摩庄十多个村的民夫，集中在庙安梁上建岗楼。

二

庙安梁上建据点由日本队长濂野亲自指挥。他决心要按时建成，于是就增加哨岗，不断地增派监工的。干活时不准民夫直腰，不准喘气，民夫累得七死八活，还经常挨打受罚。垒岗楼用石头要到离工地二三百米以外去捡，或用炮崩山石，堆成若干堆，而后上百人站成大队，用传递方式运到工地。在传递过程中，有的石块重量大，遇到老弱病残者接不住掉在地上，被监工的看见，就用皮带抽，枪托墩，大皮鞋踢，有的累得当场吐血，有的终身致残。民夫垒墙要是横不平竖不直，不但要返工，还得罚站。站直后每双手还要举起一块四、五斤重的石块，不知站多久，只有大多数民工苦苦哀求才能饶恕。

针对这种情况，我党决定，破坏敌人的施工进度计划，对据点不断进行破坏和打击，使敌人不得安宁，首先向出*村党支部及接受我任务的保甲长进行传达，让他们通过给敌人送粮、菜、肉、柴的人告诉民夫，尽力拖延时间，使炮楼在上冻前修不完。游击队和民兵，按照上级的命令，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破坏。如把民夫头天捡起的石头堆，夜里用炸药炸飞，到第二天民夫来了再慢慢往一块儿堆。

高山施工，用水困难。山前两华里处有一水源能勉强够施工和食用。每天要六十多人桶背和担挑。我们县大队和民兵，曾几次夜间用大石头把水泉填平，或用炸药把水泉炸掉，以此来拖延工期。

经我军民多方扰乱和破坏，敌人穷凶恶极，加紧施工进度，对民工实行残酷手段，严刑拷打，还要向各村出击扫荡，用歪把子机枪、步枪乱打乱放。除抢走建筑材料、粮食、鸡、猪、油、盐、蔬菜外，见到年老体弱的就打，碰到妇女，不论老幼就强行奸污。广大群众惨遭迫害。

三

庙安的岗楼修建了五十多天,9月下旬将要封顶。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七团三连和县大队奉命,要向庙安据点进攻,但为了避免重大伤亡,不能进行决战和全歼,根据地形确定重点袭击清乡队驻地。经过周密研究,决定从金鸡台周围四个村,集中近百名民兵,由区大队长张秀峰带领,配合部队作战。于9月14日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七团三连占领日本庙安据点两侧的高地,任务是打而不歼,箝制住他不能向清乡队驻地增援。县大队根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分东西两路,包围住在宋家台民房中的清乡队和250名民夫。这天恰巧是清乡队换防。伪小队队长李关群带领新队四十来人,原有的伪小队队长姓范,也是四十来人,双方一见如故,商定新老队晚上搞一次联欢。双方都集中院内,说说唱唱,非常热闹。会后摆了简易宴席美餐一顿。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李队长饭后去和日本队长见面。日本头目在打麻将。双方匪徒已入睡。夜十一点战斗打响。开始我军打的猛烈,县大队向清乡队院内猛投手榴弹,一时枪弹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喊杀声连连不断。未走的范队长冲出院内,指挥反抗,被我当场击毙。其他匪徒从蒙胧中醒来,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只有少量伪军向我还击。除二十多人钻在炉坑、厕所和混入民夫逃跑外,多数人都举手投降了。日军虽占据的地形好,火力强,但被我七团箝制未能向清乡队增援。我们将250多名民夫留下60名,让他们挑着水梢把伙房里的米面、杂粮、油盐酱醋、刀勺案板,连挑带背一齐带走,其余的民夫全部放走。

县大队押着俘虏直奔金龙(现在金鸡台的关地沟),到达目的地天已亮了。经区委书记于明然和县区大队长研究决定,用挑来的粮食做饭,叫民夫吃饱肚子,再每人发两元钱,放他们回家。并告诉他们,最好躲几天再回去,以防保甲长再让他们回去接着干。县大队带着五十四名俘虏和缴获的四十六支步枪,两千多发子弹、二百多枚手榴弹,奔清林台又到宝水那边去了。把得来的水桶存放在金龙台村,分给每村民兵二十枚手榴弹,也全部解散回村。

七团三连待县大队撤出战斗后,也向西部百花山方向转移了。这次在双方激战中,我一名战士牺牲,另一名战士受重伤,抬到金鸡台村也牺牲了。

这次战斗,日本吃了败仗,清乡队和民夫被全部瓦解,受到严重打击。住斋堂的日本队长濑野得知消息大吃一惊。他下令让斋堂各村,按原出夫人数,两天内集中到庙安梁,同时,又派清乡队一小队驻守。提出在一个星期内复工。但由于这次的打击,日寇的胆子小了,士气低了,对民夫的态度稍有好转。据了解,镇守斋堂的日本队长濑野,虽然是一杀人不眨眼、诡计多端的战犯。他想在庙安梁建据点,卡住我四条要道,但是他根本达不到目的。从敌人建据点开始,我们就把庙安梁东西的七个垭口,作为南来北往的通道。我们确定,东由大村奔马兰村后,到洪水峪、田寺村、黄安坨为山后通道,山前西由曹家坊到大村涧、金林台的西岭、于家塌奔龙头村为山前通道。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经常从庙安梁以西去庙安梁以东下乡布置工作,征收公粮,进行游击战争。西北部和和平津的来往仍然不断。当地群众说,别瞧日伪匪徒们张牙舞爪,气势凶凶的,实际上是卧在庙安梁上的一只纸老虎,对我们党、政、军的活动屁事不管。我们虽有路可走,但毕竟不畅,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障碍。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庙安梁上好风光,双十路向八方,日寇强行压据点,制造城乡难通畅”。因此,基层军民强烈要求,应早日除掉这个祸害。

四

日寇从1939年秋开始,已连续四年破坏我们的秋收,整个秋季都被他们控制。我县、区干部帮助各村建立了严密的战斗抢收组织,首先建立了民兵组织,配合部队作战,昼夜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有情况就給

信号，提醒群众迅速隐蔽，以免造成损失。群众组成若干抢收小组，把山上的土豆、蔓菁疙瘩和大萝卜收下来，弄到隐蔽地方埋起来。易被敌人发现的地块，就由青年突击队趁敌人夜里回据点后把庄稼抢收回来。年老体弱的在近处抢收、抢脱、抢晒，把晒干的粮食坚壁起来。

收割不易，脱晒更难。正常年景，在整理好的场内，套上牲口用碌碡轧。在敌人监视下分秒必争，只得起早贪黑在炕上或筐箩里揉，用碾子轧，弄一小块场脱，用棒子打或脚踩，脱下粒来再簸干净。

粮食打下来了，虽然不多，种类很复杂。除大宗玉米、谷子，还有荞麦、黍子、苡麦和各种杂豆。小杂粮可用罐坛装，藏在窟窿里。大宗的玉米等发动群众提供岩缝、石塘、土洞等，只要有僻静处，就可加工修理，存放粮食。有的新挖洞穴，把大板柜和水缸装进去，或编荆条囤子，抹上黄土掺上牛粪，以防老鼠吃，这样战斗了一个秋天，粮食打下来了，总算坚壁完了。

五

战胜天寒和疾病，大敌当前不投降。庙安梁据点，控制四区的范围有金鸡台、史家营、秋林铺等十个村，每村一二百户，村中成了无人区，都搬到山上去住。居住条件很差，都是在岩石下，靠墙根，山洞内，峡谷中，并且是干砌墙，草屋顶，既不挡风，又不遮雨。一到寒冬季节，五六千人的性命怎样熬过，又是一个难关。如灰青涧是离庙安梁据点最近的，是日本向西路进攻的必经之地。全村二十四户人家，都搬到山上临时棚居住。张显成一家老小六口，跑到一个较大的崖头下，用干石块砌了三面墙顶在崖石上，里面搭上土炕和火炉，住了下来。虽然隐蔽程度较好，但吃水、烧煤、推碾子都要到四华里以外去弄，出门往返，要走羊肠小路。下雪后，路窄又滑。行走特别困难。有时两三天不能下山。赶上无水、无煤又无加工出的粮食，只好用柴烧锅，炒玉米和黑、黄豆吃。全家人越吃越渴，两个小孩有时渴的哇哇哭。下了大雪可以化雪水吃。冬季风猛，气温下降，干石墙透风，全家老小无棉衣，两个小孩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又无被褥，生活实在困难。

张显存一家五口跑到离村两华里河心右侧大石头下，是早年煤窑坍塌的大坑，经过修整，全家人住在里边。旁边有煤有水，推碾子要回两华里的村中，不论白天夜间，冷风潮气袭人，使全家人不是头晕，就是腰腿疼。张显存说：“隐居住在塌陷坑，本来有房村中扔，阴风潮气刺骨寒，严防全家疾病生。”

从1938年日本对这个地区实行封锁，当地每年产的核桃、花椒等干鲜果品都卖不出去。从外边进的食盐、布匹、铺陈、针线等价钱很贵。那几年，每户做衣服的很少，只能缝缝联接，拆一件补两件。到1942年冬，大部分人家已经到了没的可拆的时候了。人们穿的是夹衣或单衣，很多人露脚趾头、脚后跟。就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雪，站岗、运粮、带路、送信、抬担架等，都是照常出动。

在这危难之际，庙安的日本鬼子越来越猖狂，他们每天出来到各村扫荡，并到处张贴布告，其内容是：“庙安要口，据点建成，皇军镇守，歹徒难行，共匪绝迹，八路无踪。为大东亚，全民共荣，富豪乡绅，早日兼程，共商大计，保甲实行，尽快建妥，百姓安宁。如再拖延，杀光扫平，三日不到，绝不留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区人民在上级党和村支部的领导下，同生死，共患难，宁愿无粮饿死，天冷冻死，也绝不投降当亡国奴。

六

日本在庙安建成据点后，没有一个村来接受保甲组织。濂野非常恼火，强迫各村要在旧历年前完成建立伪组织的任务。他们想以金林台村作为突破口，先后抓了董春方、张成明、张成林、刘天宽四人到据点内，让他们接受建伪组织的任务，担任正副保甲长和维持会长。这四人都说：“我们是庄稼汉，没文化，干不了

村上的事。”都不接受，敌人就不放他们。后来让他们回村找能办事的人来。又怕他们走了不回来，就向他们宣布：“如找不来能当保甲长的人，他们也别回来，皇军就把你们的全家人和房屋炸平，让你们人财同归于尽。”这四个人知道找不来，谁也不走。日伪头目除每天向他们训话外，还让他们在据点内打扫卫生，帮助伙房干活，不许他们出栅栏门，直到解放他们才跑回来。

10月中旬，日军进攻一区的洪水峪村，把该村王成方家和杨家的羊抢来，同时把杨家的主人和给宋家放羊的宋显华抓来，每天叫他们二人放羊。10月下旬的一天，他俩去西边放羊，夜间我游击队从西来袭击他们，又打枪，又扔手榴弹。羊和骡子听到响声乱蹦乱跳，把羊圈和骡棚的门都挤开了，羊和骡子都跑了出去。事后敌人说他二人是奸细，和八路有勾结，约好在夜间把羊和骡子放了出去。并说他们与各村都不来接受建伪组织有关系，将他二人绑起来吊打，残忍地审问，但他二人宁死什么也不说。日本兵气急败坏，当时把他俩拉到栅栏边上活埋了。11月初的一天，金龙台村中队长宋守富和张成银，在金林台村刘殿有家研究两村民兵去扰敌人的事。这时日本突然闯进了屋，张成银左肩挎着装有四枚手榴弹的兜，右肩挎着刚装好七斤玉米面的粮袋子。他灵机一动，把披着的破大衣用手往中间一扯，高声说：“我撒泡尿去。”走到房后把这两件东西迅速藏了起来。因四外有敌人，逃跑是不可能的。只能又回到屋里。宋守富虽披着破大衣，但敌人一眼就看见他肩上有手榴弹匣子，强迫他摘下来，问他姓名。敌人得知他是中队长，立即将他捆上进行审讯。结果他什么也不说。气得敌人连打带骂，不让吃饭，放在岗楼顶上冻一夜。第二天上午拉出岗楼，活埋在栅边上。张成银被带进据点平房，后叫张成银背水，他背上水桶往外一看，虽然跑的时机来了，但不能从门岗走。沿着背水路又都是秃山野岭没法逃跑。只能奔后边森林才能脱身。因此他假装去厕所，翻过铁丝网钻入森林才跑出来。11月下旬的一天，日寇向金林台村进攻，搜山到了张根菜老太太家，看到屋里有倭瓜、大萝卜、蔓菁疙瘩等，就让夫子背走，六十多岁的张老太太苦苦哀求不让背走，凶恶的日本鬼子把老人从屋里拉到院外，照后背一枪打死。12月中旬，日伪又向清土涧扫荡。在村外北乱石坡抓住六十五岁的张显栋，要通过他建立伪组织。这位老人不仅不接受任务，反而破口大骂：“你们日本人跑到我们中国来欺负人，谁能伺候你们这些混蛋……”。敌人将他强行带走，老人边走边骂。走到离村五华里的老鸱崖根，老人坚决不走了。凶恶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扎、石头砸、活活地给打死了。

七

12月10日夜，我军袭击庙安据点，敌机枪、步枪向我还击很久。第二天，发现曹家坊瑞云观庙中住着八路军，在12日天亮之前就包围了曹家坊。天很黑，放哨的民兵宋振欧正注视史家营方向时，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往北一看，日本快到他身边了。手榴弹打不开盖，无法报警，所以他只好猛地向山下跑。日本占了大坨，控制了曹家坊。其余日伪军就分多路向瑞云观庙和曹家坊村进行包围。五点多时，村内响起枪声。

住在村里的群众和庙里的军队就慌乱起来。

军民在三班长的带领下冲出庙门，门外一名战士张国权当场牺牲。另一名战士左膀肩被穿受了重伤，倒地装死。日军踢他一脚，他忍痛未动。小队司务长和第九团来的一个买菜的军人，从后边冲出来，日本鬼子已到了大门口，将他二人迎头抓住弄回庙里。把他们捆了起来，用铅丝穿了锁子骨，同时找到庙上主持的老道张礼成和尼姑主事陈智芳，将他们一起带走。

村中情况更复杂了。因为冬季太冷，村离庙安据点又远，晚上有些人回家来睡。当敌人占了大坨制高点，多路向村包围时，日军居高临下，见人就打。向村下西边史家营方向跑的人较多。妇联委员张国敏，带领和指挥群众正向前跑，从左背下一枪打进，左肋下穿出，当场牺牲。同时五岁小女孩陈玉旺小腹中弹，第二天上午死去。陈廷葛的内弟端着锅也跑在这条路上，被机枪把两腕打穿，活了七天也死去。张朝辉、张朝汉弟

兄两个都是党员、民兵骨干，向西坡他家羊圈跑去，被机枪射中。石廷春的儿子跑到村后榿木港口，被机枪打死。宋连居是村政府文书，夜间在村公所值班，和他的内弟董大眼跑到东坡沟，被日本用步枪打死。日本抓住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陈文通（外号小黑狗），这人穿的整齐，长的秀气，是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日本人看他象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上前将他捆绑起来，连推带拉将其带走。村长杨春的父亲杨德柱小腿肚被打穿，从部队找来凡士林药膏，伤口很快痊愈了。这次事件，打死九人，重伤二人，抓走七人。

1943年2月2日，敌人在杜家庄召开群众大会，又将陈文通、张成弟等当场处死示众。这三人自1942年12月12日抓来，经五十天的残酷折磨，遍体鳞伤、不成人样。日本头目宣布执行时，先放出数条狼狗，对他们浑身乱啃乱撕。张成弟等三人，用嘶哑的声音对群众喊：“同胞们！别伤心！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日本人的狗命长不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日本头目命令士兵用刺刀向他们一阵猛刺，三人当场牺牲。当人们赶到跟前，三具尸体被戳的肉泥一般，分不出谁是谁了。

八

曹家坊惨案后，日本还不断地进攻扫荡，并扬言，“各村如再不顺从皇军，建立保甲组织，皇军就要彻底搜山，斩尽杀绝。”群众心里恐惧。正在这危难之际，于1943年1月20日，区委书记于明然在史家营召开了中、东两片村支部书记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地委和分区司令部批准昌宛房县委请示拔掉庙安梁据点的意见。讲到四区人民的情绪和存在的实际问题时说：“四区人民这种为民族独立，抗击日寇侵略不怕牺牲，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当珍惜它，爱护它，保护它。”并就当前所处的环境和形势作了具体的分析：“日本要大屠杀，制造惨案。庙安据点压在我们四条路的交叉点，对各条战线都有影响。”同时对我方力量估计是：“群众要求拔掉据点的情绪迫切，军队士气高涨，敌据点地形对我有利，所以攻之必克。旧历年前，一定将他拔掉，让广大群众回家过好春节，从现在起抓紧备战，西、南两小区各村，立即整顿民兵和担架队，准备配合部队作战，中、南两小区离据点近，各村要准备埋锅做饭、烧水，备柴，给前线送水，送饭，给队伍带路，同时准备好房屋，迎接队伍和伤病员。我们要男女老幼齐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大家听了精神振奋，盼望战斗早日到来。

由于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线越来越长，不断从各据点调走日本老兵。庙安的日本鬼子由三十人减到了二十人，士气低落。1943年旧历腊月濼野要来上百名民夫，把据点的东西全部运走了，早晨五点人都撤净了，放火烧了岗楼，日本和清乡队六十多人逃回斋堂据点。

九

当群众看到庙安梁岗楼起火冒烟，知道敌人是自行逃跑的，各村群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少人在山头上或高坡上高喊：“日本鬼子逃跑了！我们胜利了！该回家过年了！共产党万岁……”。县、区领导看了现场，工作组到各村，组织群众搬回家来，召开不同形式的庆祝大会。群众虽是食不饱腹，衣不遮寒，但都积极参加会议。日本占庙安五个月，共一百五十天。虽说群众受了苦，我们没有屈服，最后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

到2月4日，还有七八天就是大年三十。怎样过好春节，这还是个问题。经大家研究，采取以下办法：各户都没有糊窗户，纸又买不到，靠烧好煤生大火把炕烧暖。炕上没有席，用推过榆皮面的纤维和黄土拌在一起抹炕，这样不起尘土。没有白面包饺子，就用玉米面和荞麦面作皮。没有白菜，利用各种干树叶、菜梗，再调剂一下现有的大萝卜、蔓茎疙瘩、土豆等做馅。

过节的食物虽然简单，但是个战胜日本鬼子的胜利年，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克服多种困难过好春节。

这年与任何一年都不同。

春节期间,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各种不同的娱乐活动,学生们组织起来唱歌、跳舞、打霸王鞭,青年团、妇联会也组织文娱活动。还要给年老体弱的困难户、烈军属打扫屋子、推碾磨面、做豆腐等。在这衣裳破、粗皮饺、没有肉、鲜菜少的艰苦情况下,春节过的非常热闹。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二三事

罗玉源

南口战役支前工作

1947年春季,我当时任良乡五区武委会教导员,奉命带担架连和一个民兵班,随华北野战军护送中央工作队去东北。正当夜间12点时,开始路过南口铁路,和驻在北平傅作义暂三军打了遭遇战。为了完成护送任务,我军一部和敌人作战,一部护送队伍过路去东北。我担架连急速赶到前线抢救伤员。由南口昼夜送往斋堂、上下清水、杜家庄等后方医疗站治疗。经过两天两夜紧张护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军伤员无一失落,而敌人的伤员也被我们抢救活命,部分惨死在前线。

战后总结工作,我担架连和民兵班受到晋察冀边区第三分区表扬,我个人被评为支前模范。

猫耳山脚下的抗击战

1947年4月15日良乡五区民兵连奉命驻防在良乡五区南小区的三合村。这个村就座落在猫耳山脚下,是良乡县佐公署的南大门。盘集在房山、周口店的敌伪还乡团,经常通过猫耳山脚下的南大岭,向解放区进攻,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实行烧、杀、抢、掳,搅得解放区人民不得安生,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宁,保卫人民已得的胜利果实,良乡五区民兵连于1947年4月的一天早晨,由连长隗丰瑞和我(当时我任民兵连教导员)带领全连指战员,由三合村出发,向长沟峪、周口店一带敌后开展工作。正当我们行进猫耳山脚下南大岭时,盘集在房山、周口店的敌伪军和还乡团,妄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民兵连全体指战员当即部署在猫耳山脚下,向敌人抗击作战,但因民兵连武器装备较差,当时只有一支冲锋枪,其余的是步枪、手榴弹。我们为了抗击敌人,就集中火力英勇抗击。当敌人用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向我们轰炸时,我们就躲到山后隐蔽作战;当敌人发起向我们全面进攻时,我们就正面抗击,发挥手榴弹、短武器的威力。就这样从早七时打到中午,将近四、五个小时,打退了敌人三次规模较大的进攻。由于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只得退回房山、周口店去了。我全连指战员经过奋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抗击敌人终于取得了胜利。当我们凯旋而归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战后经过总结,受到良乡五区武装部、良乡县佐公署的表扬,还受到晋察冀三分区的通报表扬。

解放坨里的战斗

1948年，我任良乡县佐公署五区武装部教导员，当时正在中小区陈家坟、北峪两个村下乡，负责良乡通向门头沟的联防工作。5月28日早晨接到区委通知，叫我立即赶到东庄子村集合，我急赶路程，上午赶到东庄子村，听取了县武装部长晋朝铭解放坨里的部署，命令我和姜振水同志带五区民兵连参加解放坨里的战斗，主要任务是，随从分区独立团打扫战场，护送伤病员。当夜到磁家务，然后接近坨里岗楼，然后从磁家务、北车营、坨里村东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总攻，我人民武装战士，如同猛虎下山直捣坨里守敌老巢。守卫坨里之敌在大队长尤茂志带领下，还妄想负隅顽抗。但在我军的强攻之下，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只抵抗了很短时间，就伤亡惨重。大队长尤茂志也受了重伤。敌人已溃不成军，有的投降，有的被俘，剩下残部又退回了房山县城。我五区民兵连在战斗基本胜利时，就深入到敌伪军驻地、岗楼，捣毁了敌人的据点，拆了岗楼。在打扫战场中还俘虏了三个敌伪军，抓到了还乡团长的小老婆，缴获了三八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物资等许多战利品。最后当部队撤离后，我们护送三个伤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坨里的解放，打通了通向河套沟山区通往房山、良乡的门户，为我们深入敌后开展工作，为房山、良乡和北京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8年5月30日我军政、军民集中在东庄子村召开了大会，会上总结了解放坨里的战斗成果。我五区民兵连还受到良乡县佐武装部的表扬，我个人也受到了口头表扬，还给了我被子、褥子、一个军大衣、一条武装带等奖励。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我所了解的张令德

段泰清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秘密发展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我在家乡涞水县第五区紫石口上学，校长常给我们讲民族革命的道理，动员全体师生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团结一致共同打日本。那年我十三岁。

1940年2月，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名誉副校长叫张令德，他负责政治课，每周一、六上课。我记得第一课他讲的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第二课是阶级斗争，地主剥削农民。我在学校里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威信较高，是儿童团团长。还有两个同学学习成绩也不错，一个是董望仲，是儿童团副团长。一个是李文海，是儿童团小队长。张令德特别爱接近和关心我们。我们仨在一块儿常说：“这位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他特别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后来他把我们带到校门外一棵大核桃树下谈话，交待任务。他说：“日本侵略了我们中国，我们决不当亡国奴。为了打败侵略者，人人都要出力。你们年龄小，只能站岗、放哨、送信。”我村是涞水县第五区公所所在地，张令德从那里拿信交给我们，我们分别往蓬头、东马各庄、上庄、芦子水等村送，最远的有20多里地。

张令德跟我们的第二次谈话是在大操场的东边。他问我们：“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为什么他们的子弟能上中学大学，而我们却上不起，我们为什么受剥削、压迫？”他用这些革命道理开导我们，我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40年初夏，一天放学后，他把我们三人留在教室里，突然十分严肃地问：“你们看共产党好不好？”我冒失地说：“我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红发，巨齿獠牙……”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共产党跟我们一样，打地主打恶霸，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巨齿獠牙？”我说：“你是我们和蔼可亲的老师。”他又说：“你们不要信那些反革命宣传”。接着，他就给我们讲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等。最后，他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问：“你们愿意不愿意入？”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愿意入。”我又把目光转向董望仲和李文海，说：“你俩入不入？”他俩异口同声地说：“入。”接着张令德严肃而郑重地说：“你们说的是不是真话？”我们坚定地回答：“是真的！”他立即给我们每人一张毛头纸油印字的入党志愿书。填好后他就带走了。

七、八天后他回来了。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天，教师学生都走了，张令德掏出一张粉红纸画上镰刀、斧头贴在教室墙上，他领我们庄严地宣了誓。

当年秋，日军大扫荡，学校被摧垮了，我回村担任青救会主任、抗先队长，党内任宣传委员，董望仲、李文海参了军，张令德转移到南峪村工作。

组织担架队

1941年秋天，盘踞在房涑涿等地的日本鬼子，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妄图扑灭我抗日烈火。当时张令德正在涑水县南峪村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一天上午，村长带着一个八路军排长来找他，说：“村上没有党员，只有找你这位教员了。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实行坚壁清野，派九团一营一连一排在八里堂岭阻击敌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让你和村长组织一个担架队为战士们服务。”

八里堂岭位于房涑交界处，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道的咽喉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时近中午，这个排32名战士进入阵地，卡住了进山的嗓子眼儿。担架队在阵地后边山上待命。下午两点钟敌人上山了，爬到我前沿阵地四十米处，隐蔽在山石后面的战士向敌人开了火，鬼子一个个倒下去。随后他们又抬出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向我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又被我军打退了。鬼子误以为碰上了我军主力，不敢轻易进攻了。这时，一架轰炸机飞过来，在我军前沿阵地狂轰一通儿，接着鬼子又爬上来，被我英勇的战士又一次打下去。

乘着打退敌人的间隙，张令德带担架队两次冒着危险跑到阵地上，先后抬走十余名伤员，这些伤员抬到半路就牺牲了。一次，抬两个伤员走到半路上，听到敌人冲上来的喊声，伤员猛的跳下担架就往山上冲，但没多远就倒下去了。太阳落山后，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块砸敌人，虽然战士越来越少，但敌人始终没有攻上来。为我军和群众的撤离争得了时间。

次日凌晨，张令德、张得满与村长王文如带担架队来到阵地清理和掩埋烈士遗体时，发现一个还活着的战士，他双腿受了重伤，昏迷了很久，送到老乡家里，他是32名战士中唯一的幸存者。

抬送伤员之后，张令德发现丢了一名担架队员，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他在背伤员时走在最后，被鬼子活捉了，活埋在萝卜窖滩上，我们发现了他的鞋子，才找到他的尸体。

张令德在掩埋烈士遗体时，心情很急，在刨坑、搬石头时，左手食指碰破，感染了病菌，当时缺医少药，手指烂了，高烧不退，不得不回家养病。他在家服了几十副中药，双手脱了一层皮，以后就留下了残疾。

夜奔大场捉汉奸

日本扫荡进山后，老百姓都转移了。八路军大部队也撤到平原。根据地只留下我们小股民兵。日本过来后，立即建立反革命政权维持会。还在蓬头村安上了据点。蓬头村曾是我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肖克司令员的住所。为了打击日伪反动派，地委派宣传部长陆平、区长王殿举和干部张令德等组成对敌斗争指挥部，在大车山、大北胡和三崖寨、兔子窝、可怜坡、相树背、南天门一带组织各村民兵坚壁清野，埋地雷，转移老百姓。同时还负责给军队送信，送粮，组织做军鞋、军袜，往前线运。

维持会特别可恨，经常出来抓捕老百姓、村干部、民兵和我地下工作者，破坏人民革命斗争。

一天深夜，我们集中在村南大核桃树下，张令德秘密召开会议。他说：“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到大场去抓汉奸，夜十二点前完成任务。”我们村离曹八岗村约二里地，先到那儿维持会抓人，会长跑了。接着又到大场去捉汉奸，要走十多里山路，困难很大，山坡很滑，全是碎石板，一蹬哗哗响。等我们一到大场，年轻的汉奸都跑了，只剩一个老家伙没跑了，被我们逮住了，回来时还逮住一个年轻的维持会长，姓郑。把他们带到紫石口东港门，杀掉了那个罪恶多端的老家伙，让那个年轻的郑某陪绑。把郑某吓得走不了路，我们把他背到山上一个老乡家里，训练他七天。从此，他改邪归正了。

完成了捉汉奸的任务，张令德他们就去了东山村。以后又到平西第一情报站工作去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投奔八路军

赵润东

1944年秋的一天，房山伪保安团六中队由队长马德福带领，从房山城内出发，沿山路向西南进发，搜剿我政府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地下党，一路上耀武扬威、气势汹汹。先来到石门村，又转向长沟镇，到四分所，已近中午。马德福等人饥肠辘辘，便在长沟四分所安排了午饭。这些人走了几十里路，又饿又累，饥不择食，见了酒饭，不管三七二十一，围上去就狼吞虎咽，没了命似的往嘴里灌、往口中填，一阵“扫荡”之后，有的醉得东倒西歪，成了一堆烂泥，有的人强撑身子，骂骂咧咧，吵闹不休。

早有弃暗投明愿望的伪保安团的排长孔宪臣、士兵赵凯、号兵孔宪福、商景玉等人见时机已到，带上武器就要走。这时，有人出来阻拦。孔宪臣手急眼快，端起机枪就要扫射。屋内立刻鸦雀无声，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谁也不敢动弹。孔宪臣朝其他几人说了声：“走！”赵凯顺势抄起孔的手枪，连衣服都没穿，就朝外走去。当那些人清醒过来以后，孔宪臣等四人早已走到村北的坟地里。队长马德福得知情况气得浑身发颤，他独自朝四人追去。他追上四人便大声斥喝，企图阻止住四人前往。

这时，赵凯举起手枪喝道：“别动！你动我就毙了你！”耀武扬威的马德福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魂飞胆丧，一动不敢动。赵凯一步跨上去，下了马德福的二把匣子枪。然后喝道：“听着，背过身去，向后走十步！”此时的马德福象泄了气的皮球，蔫头耷脑乖乖地转过身向前走。

赵凯、孔宪臣等四人乘机带着二支手枪、三支大枪、四颗手榴弹及几百发子弹立即朝平西抗日根据地奔去。

过了一段时间，马德福气急败坏地带着队伍追赶上来。当他们追到西甘池村东时，赵凯等趴在对面的小山坡上，冲着追上来的伪军“叭一叭一叭一”就是三枪，听到枪声，伪军乱作一团，有的抱头鼠窜，有的趴在地上不敢动弹。马德福吓得心惊肉跳，连路都走不动了。之后，队伍不敢再追了。

孔宪臣、赵凯等人来到根据地，见了领导头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投奔八路军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第七区区长马剑书和政委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讲了许多抗日的革命道理。后来，他们被接到当地的县政府圣水峪，受到热情的款待。为了给他们接风，专门给他们宰了只羊，做了顿丰盛的饭菜。

当他们看到根据地的同志吃的是青谷米饭，喝的是清水沟里的水，生活十分艰苦时，心情十分激动。快到中午时，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又来看望他们。

孔宪臣、赵凯、孔宪福、商景玉等投奔八路军的行动，给了日伪反动派以沉重打击。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中央军来去纪事

王凤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刚升三年级半年(春季始业)，正放暑假，卢沟桥炮声可闻；黄老师负气而去，一去不返；日本进了中国……

赵登禹等爱国将士的浴血抵抗。日本兵虽然侵略野心勃勃、锐不可挡，但终因爱国将领及其士兵的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抵抗而寸步难进。争得时间。南京中央政府的中央军、杂牌军得以长驱北上……

我父亲王钧(秉衡)当煤窑“总管”(即经理)。因雨季不能采煤，每年五月初一——八月初一煤窑停产，他在家休息。炮响后，他和乡亲经常到村东高处向东了望、听炮，眉头忽紧忽松，判断炮声远近变化、敌我进退变化——有人说老百姓不知爱国，那是诬蔑和褻渎。

忽一日，几路人马从村南向村里涌进。军服虽然各色不等，但帽徽则一律的“青天白日”。百姓惊诧一瞬，知是“中央军”，便渐渐欢迎起来——接待、号房，帮助安营下寨……房舍较好的人家住了长官。我家南屋住的是“无线电团部”。大概因为“机密”，家人不许随便进入。以后很久，才知是“电报”组织。

不久，“团部”换防或迁移，来了一个“特务排”。似乎从来未见或不记得“排长”，只记得一位“赵排副”，这人瘦高个，两眼终日泛红。这些人不着军装，全是便衣，而且每人一辆破旧旧自行车。赵排副每每向我显弄他的步枪、手枪和大刀片：“这叫三大件儿。你要跟我当兵，马上给你三大件儿！”我便向母亲要求：“妈，他们叫我去当兵。”母亲脸稍沉，吓我：“人家摸黑去削日本(兵)脑袋，你不害怕?!”特务排不象团部那么冷若冰霜，有说有笑，也透露点儿特务行动。每天擦黑，他们带上三大件儿骑上自行车出门……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从南屋出来刷牙、洗脸已是日近中天了。赵排副说，今天夜里到八十亩地削下小日本好几十颗脑袋……我惊讶也羡慕。现在想来，他的话半真半假——那时候，日本兵还在坨里——两村相距好几里又有大石河相隔。你说完全是假也不对——日本兵睡觉前还囫囵，天明就“身首异处”的传说时有所闻，能都是谣言?!

离我家百步的马家，驻的是炮兵。开始还见有一辆装有“炮”的骡拉炮车停在门前，一个麻脸兵在车旁

转转悠悠。有时见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拽来带叶树枝往炮车上捂捂盖盖。再往后，炮车失踪，听说挪进了村北坡下林木森森的邱家祖墓地。老百姓偷偷骂：“有炮不放，留他妈炮弹熬着吃?!”有人说，从来到走只放了一炮；也有人说，只见不断换树枝“伪装”，从来没见过天日、没露“真相”。

从开始到八月(旧历)中旬，队伍一直南来北往，象是换防，而换中有增；队伍增加，而敌军却步步逼近，老百姓莫明其妙了。

村中比较富裕的人家，一开始就向南逃。我家也算小康。父亲看家，母亲领着一姊一妹一弟和我，赶着一头老草驴投奔西庄姑母冯家避难。我们把衣物存放姑家，不久我们就又回家了。途经迎风坡村外，一敌机盘旋。我们避在岩下，任老驴自由吃草……好久，飞机才一头钻向东北面去——大概是看我们不值一颗炸弹……

回家只过一二夜，母亲看着不妙，又原班人口奔向顾册姨家。姨父人称“石老道”，不知其大名。最小的姨兄叫“石庚敏”，其子叫“落(lào)儿”、“小海”，余皆久远已忘得干净了。

母亲和姨母劝姨父到饶乐府帮父亲收秋、作伴，姨父去了我家。

母亲领姊、妹、弟在石家避难，我则来往于家和顾册之间，给避难者取点零物，传个消息。那年雨勤，遍地是河是水。两村之间的路本来狭窄，水草相侵，便似有似无了。好在相隔五六里，中间不经村落，只得方向就无差错了。

八月初十。中央军忙忙乱乱却又喜气洋洋，念念道道“沟葱大海茄，日本过不了八月节……”意思是：这场战争将在中秋节前以敌败我胜结束。

饶乐府东坡是我村的最高处。这些兵扯着整匹的白布在坡头摆列。后来听说，为南京飞来的飞机设标志，叫它们分清敌我，轰炸日本兵……

可是直至月升日落，军民才缩下因仰望南天而发疼的脖梗，因没见飞机一个影子而纳闷：半道出事了？有的骂：上边净冤当兵的当老百姓的！当兵的火气更大，骂：我操他姥姥……

第二天是八月十二。天没全亮就听到空中轰叫。人们跑出屋，喜出望外，以为是南来的飞机。可是抬头一看就泄了气——从声音、形体辨认，才知还是日本的飞机……东来的敌军炮弹嘶叫惨人，几乎是擦房顶飞过。正方形的房山县石头城，东南角的魁星楼高耸城上，被敌人误认为据点、碉堡，因而成了射击目标。可是中弹的东城墙只留斑斑弹痕却无塌落，这又使乡亲们自豪自慰：小日本的炮弹到底不行，打不透中国城墙！

城墙未倒，而兵败如山倒。天明，中央军便拔锅拆灶落荒南下了。老百姓扶妻携子也离乡背井南逃。乡亲逃过门前向院喊叫：“王先生，逃吧！”父亲仍满面谦笑：“好好，前后脚……”父亲的“襟兄”石老道向他告别：“王先生，我走罢，我死在你家，你一秋的食物也不抵一口棺材！”谁知一走竟成永别——那天晚上，一颗流弹嵌入腹中，这位石道爷便羽化而登仙了。一辈子善念为本，却死在敌弹之下，是天道不公，还是战犯狂恶?!

父亲塞给我40枚铜币，搭在我肩上一条褥子，叫我快奔顾册。嘱咐我：“告你妈说，我放开狗(家狗颇凶，怕咬了驻兵而锁在大场树干上)就去……”后来得知：父亲肩搭“捎码子”——前兜酒瓶，后兜房地契，跳过后院南墙，经过曹家准备南逃。曹家年轻人已逃走，剩下夫妇俩老人，老头双盲。老妇劝父亲：“文书丢在路上就倾家荡产了。一块就伴儿别走了！”父亲随后就又跳了回去……后来得知：那天日本一进村，一位80多岁的老头正从矮墙露头北望。敌人一举枪，老头饮弹而倒——他是饶乐府最早被倭寇杀害的人。老人尸体往南约百步是五道庙。庙南邱家，逃走前，请“白拐子”看家。这时，他不知日军进村，大概想跳墙上街，才一露头便被日本兵一枪打了“回”去。我的大妈(王德福之母)死在村南树林中(逃难归来，尸体已腐烂)，则是我记得的第三个遇难者了。

父亲没能和我们会合。我们从顾册逃出时已是月到中天了。这时，石楼火车站上的火车只有“南上”之

军、没有“北下”之兵了。逃奔娄子水姑母刘家，刘家只剩一老头，我们只好往西。天明才知道，落脚之室是黄山店的自然村黄山场的许家……

不知怎么牵强附会地和黄山店的白家认了亲戚，便“吃”在白家、住在许家了。白家老头有只“琉璃眼”，看着可怕，谈话却亲切、爽直：“来的就不是外人，一块喝粥、吃窝头罢！”现掰棒子现碾面。玉米粒由圆变扁不成面却能捏成窝头。连盐也没处去买，只好把菜豆角泡进咸菜汤里；你才把豆角放入，他过来就捞走去吃；咸菜汤越来越淡，后来就光是白水了。中秋节那天，白家似乎没什么好的饭菜。许家端来了几块黄米年糕、一碗猪肉粉条。虽然缺少作料，但五十年后似乎仍可回味……

返乡时已是八月十七了。走到周口村之北，父亲让乡亲侄来接我们。

父亲没死，驴、狗俱在，只少了我们称作“徐妈”的保姆(开古庄人，乱时回家)。离家不久，虽然变化不大，但隐隐中总觉添了几分凄凉。

我家不再雇人，减少开销，家务全由自己操劳……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回忆抗战中的一段经历

白天一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38年10月28日，就在日本向我根据地疯狂的大扫荡中，我在张坊镇穆家口村经芮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培养一批抗日骨干力量，于1940年初，经县委书记赵然的派遣，让我和王殿臣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去受训。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经过简单的准备就出发了。我们从家里出发第一天住在十渡，第二天住在涞水县紫石口，沿路经过的都是解放区，每天要走百十来里路。去时背了一袋子炒好的小米，到了紫石口，部队正准备还击鬼子进犯，就把小米扣下留给前线，让战士们吃，让我们背上些棒子面路上吃。

在延安受训了48天，到1940年3月底才回来。在那里受训的共有一百多人，都是全国各地解放区派来的。我们都坐在一个大屋子的土炕上，头一课是一个妇女讲的。内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课讲抗日战争，以后还讲了全国的形势。那时朱德总司令也坐在土炕上跟战士们一起听课。从延安受训回来后，就在姜士泽手下当兵。我们游击队队长是李连方。我当时还兼着村党支部书记和治安员。我们经常出去打游击，不是端炮楼，就是偷袭日本兵和白脖子的住地，或是躲避日伪军的围剿。根本不敢在家住。特别是从延安受训回来不久，王殿臣就叛变了，他三天两头来抄我。那时我的家都搬到老村东山坡石塘住，经常不回来。1941年除夕夜里，我偷偷跑到家里吃了顿妈妈做的白薯叶馅的饺子就赶紧回去了。

1942年初一天深夜，王殿臣带人来砸开我家的门，当时只有我母亲、老伴和孩子在家里。他翻着白眼问我老伴：“白天一上哪儿啦？”我老伴说：“不知道！”他就把我老伴隗玉荣弄走了。关在张坊大编乡一间小黑屋子里，关了五天四夜，先后审了三次，毒打了三次。他们翻来复去地问：“片上村谁给八猴子(指八路军)送过粮？”“村里的党员干部都是谁？”“八猴子什么时候来？都到谁家里去”他们威吓道：“你不说就杀了你！”隗玉荣说：“你刷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老伴不说，他们先是拳打脚踢，后来就用四楞的木棍抽。抽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老伴被他们逮走后，我很着急，怕他们下了毒手，就找到三区区区长马剑书，请他想个救人的办法。他让我找十二连想办法去救。我连夜跑到穆家口，找到八路军九团十二连连长何明驻处，让他帮助我一下。他给我找了两个特别机灵的班长(党员)，带着手枪。我又借何明一支手枪，十来发子弹。我说：“命要是丢了枪也就回不来了！”他说：“我放心，你一定能顺利地回来！”我带着两个班长乘着深夜回到家，让我妈给他们做了锅面汤喝。喝完了面汤，我说：“走！”我们连夜赶到史各庄村北，翻过一道大沟，一溜小跑儿直奔了西白岱。进村后拐弯抹角地摸到伪大编乡乡长郭茂廷家门口，我们跃墙跳进院里，两个班长把东西窗子堵住，我铆足了劲一脚踢开了门，闯进了屋里，郭茂廷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被我们给捉住了。“跟我们走一趟！”我紧握手枪，大声喝道。他哆哩哆嗦地穿好衣裳，慢腾腾地出了门。一出门，我就连拖带拉地把他弄到史各庄村东北。他用颤抖的嗓音说：“你们往哪弄我？有什么事情好商量。”

“你大编乡扣押着一个妇女，他是老天爷(白天一的外号)的妻子，请你给保出来。”一个班长强硬地说。

“这事呀，好说，好说。”郭茂廷听说是老天爷的妻子吓了一跳，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满口答应。

“你说话可算数？”我盯问，他满应满许地说：“后天我保证把她放出来。”第三天夜里他不得不让丁玉明(是大编乡的两面人物)把我老伴送回村里。

1941年末的一天，赵然来到我家，把一只坏了的手枪和文件及几件破旧衣服存在我家。我老伴随手把它包起来放在里头屋的柜子里。以后王殿臣常带人来抄我们，老伴就经常挎着这包袱往山里逃，把这包东西看得比命还重要，走到哪儿就随身带到哪儿。除我们俩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回到家又把它存在破柜子底下。逮走老伴隗玉荣那天，幸亏没翻东西，如果要是翻着可就糟啦！她从小编乡放回来后继续收藏这些东西。

1942年初，赵然了解到这些情况，说我老伴立场很坚定，对革命很忠诚，经他亲自介绍，吸收了我老伴入党。入党后她干工作更积极了。

想起这些，再看看现在，我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实在是来之不易呀，应该好好地珍惜它……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取缔会道门活动概述

宋 湘

道会门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据现有材料，最早的道会门产生于元末明初)。一些破了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为了在社会生活中互相援助，抵抗压迫他们的统治者，以封建迷信的意识形态为联系纽带，结成原始形式的秘密团体，即道会门。初期，它们在反抗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也曾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如清末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以“白莲教”、“红阳教”为核心组织发动起来的。

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组织形式、领导力量上，都决定了道会门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相反，最终都被地主豪强势力操纵利用，成为维护各个时期反动统治，反对、破坏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政治集团。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动道会门

成了主要的反革命组织；我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同反动道会门作斗争成了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动道会门名目繁多。全国约有三百多种。根据其组织名称可分为道、会、门、堂、教、社、派、坛、院、宫、房等。有的对内称道，对外称会。有的一道多名。也有的同名异道。全国流传较广的有一贯道、九宫道、先天道、同善社、圣贤道、道德学社、真空道、皈一道……等。

反动道会门的道首多是一些地主、恶霸、资本家、流氓头子、汉奸、特务，解放后也有一些新滋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道徒大都是被欺骗蒙蔽的群众。反动道会门头子利用我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思想，以开坛摆供，诵经拜佛，制造传播迷信邪说，以及打着某些慈善活动的幌子，欺骗、利诱群众，发展道徒，扩充组织，甚至组建反革命武装，对抗人民革命事业。

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动道会门勾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散布不抵抗主义，愚弄群众作日寇的顺民，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我方情报，破坏抗日工作，成为日寇侵华的工具。解放战争时期，反动道会门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持利用，不少道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或特务外围组织，疯狂进行破坏人民解放战争，破坏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反共反人民活动。解放以后，反动道会门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动下，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杀害干部群众，奸污妇女，诈骗财物，破坏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规，甚至组织反革命武装，阴谋暴乱，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复辟封建统治。

解放前，许多反动道会门即已在我区广泛传播，几乎遍及每个村庄。由于反动道首都与日伪、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机关相勾结，所以当时反动道会门得以公开设坛拜佛，发展道徒，与人民革命为敌。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反动道会门，多次集中打击，部分罪恶昭彰的反反动道首受到镇压，大量道徒声明退道；少数隐藏下来的反动道首不甘心失败，转而采取秘密串连手法继续活动，多次组织策划反革命暴乱，先后被我公安政法机关粉碎和镇压。

解放前后在我区传播的反反动道会门有十几种，其中主要的有一贯道、九宫道、先天道、圣贤道。

一贯道 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是全国流传最广、势力最大、活动最突出、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道会门组织。

一贯道起源于清光绪年间的“东震堂”，传至路中一（道中称其为第十七代祖师，山东济宁人）时，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改名为“一贯道”。1925年路中一死后，其弟子张光璧自称“济公下凡，奉天承运办理道务”，在山东、河北两省传道，该道开始流传。抗日战争时，张光璧公开投靠日寇，充当汪精卫政府的“外交顾问”，大汉奸王揖唐、周佛海、褚民谊等都曾加入该道，因而取得“合法”地位，势力迅速扩大到大江南北。日本投降后，该道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利用，继续活动。1947年张光璧死后，该道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张妻刘率真及其子张英誉为首的“明线”或“师兄派”“正义派”，主要活动于江南地区；一派是以张妾孙素珍为首的“暗线”或“师母派”“金钱派”，主要活动于华北、西北地区。我区的一贯道即属于后者。

九宫道 起源于元末明初，到清末传至李廷玉，创“八卦教”，其弟子八人分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称“八卦真人”，共保李廷玉为主，故称“九宫道”。李廷玉死后，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僧李向善（法号“普济”）创“新九宫道”（或称“后天九宫道”“后天道”），并将其信徒分为十八“天”，五大“会”。1912年李向善死后，各“天”“会”纷纷独立，且各自分成许多不同的支派，因此，九宫道是支派纷杂、名目繁多，又流传很广的一个反动道会门。在我区，几乎遍及平原各村的“正字慈善会”（“余九天”的支派）、“普济佛教会”（“外九天”的支派）、“后天道”（“余九天”的支派）、“亲民至善会”（“正字慈善会”分裂出的又一支派）等都是九宫道的不同支派。

圣贤道 又称“还乡道”“一柱香道”。据说原来也是九宫道“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派系。因满清时期即从九宫道分裂出来，在全国流传较广，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反动道会门。其上层历代传人已无从查考。

解放后北京地区仍在活动的圣贤道有杨继舟和周福元两派。在我区(主要是山区)活动的是周福元派杨天利(及其子杨万全)支派。

先天道 1939年3月,河北省安国县圣贤道徒、国民党少将旅长、日寇谍报人员江洪涛在北京发起成立。因此,先天道是日寇公开支持、操纵,暗中又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反动道会门。抗战时期该道发展很快,在本市各区县都建有先天道分会,其中房山分会最大。先天道的组织有“文会”“武会”之分。“文会”在城市,“武会”在农村。“武会”会员都配有大刀长枪,故群众称之为“大刀会”。先天道在我区主要活动在良乡、官道、豆店、紫草坞一带。

打击反动道会门活动

由于反动道会门活动对人民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危害很大,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政府就曾给予严厉打击。1949年1月,前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取缔封建道会门的布告,全国不少地方人民政府也发布过取缔道会门的命令。建国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反动道会门头子被列为重点打击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之一。全国各地在充分揭露反动道会门的反动性、欺骗性的基础上,镇压、惩办了一批首恶分子,动员广大道徒登记退道,给了反动道会门以摧毁性的打击。

1949年初,原房山、良乡两县对反动道会门进行调查。两县有反动道会门十余种,大中小道首2200余人,道徒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几乎遍及每个村庄。1949年二、三月间,两县公安局明令取缔道会门,限令道首、道徒登记退道。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房、良两县由县委书记挂帅,以公安机关为主,从有关单位抽调83名干部,深入农村调查。1951年1月17日至24日统一行动,逮捕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41名(房山21名,良乡20名),对罪行较轻的中小道首集训教育25天。这是解放后对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第一次集中打击取缔。其中,对解放前活动最为猖獗的一贯道打得较为彻底,所以此后一贯道在我区再也未能兴风作浪。1955年、1962年又组织了两次对反动道会门的集中打击。截至1965年底,两县对大中小道首共判处死刑33人,判处有期徒刑113人,管制49人,作其他处理29人,共计224人。

但是,一切反动势力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些漏网的和刑满释放又顽固不化的反动道会门骨干分子,千方百计企图死灰复燃,秘密发展组织,选择时机策动武装暴乱,阴谋实行反革命复辟。在我区,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这种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政法公安机关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工作路线,时刻注视敌情动态,做到敌动我知。反动道会门的复辟活动尽管十分诡密,手法不断变换,但都没有能够逃过公安机关和广大群众的眼睛,所以多次反革命暴乱活动都在他们动手之前即被歼灭,从而有力地保卫了人民民主专政,稳定了社会秩序,保卫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破获反动道会门案例几则

伊寿臣特务活动案 长沟镇北良各庄村伊寿臣,1937年加入正字慈善会并充任会长。日本投降后,该会为国民党特务所控制。伊寿臣将其所辖的长沟、韩村河、梨园店、涿县东鹿头四个劝道师处改为站,专门刺探我方情报。

解放后,伊寿臣又与原国民党涿县守护十团团团长张聘三、原国民党94军稽察员习振林暗中勾结,冒充李大钊同志的部下,谎称系“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招摇撞骗,秘密组织土匪武装。1949年7月被房山县

公安局破获,伊寿臣被逮捕判刑。

朱锡华、张云波等九宫道阴谋暴乱案 长沟镇东良各庄村朱锡华、朱锡龄、朱锡臣、朱贵,1937年前后参加九宫道正字慈善会。朱锡龄、朱锡臣、朱贵于解放前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朱锡龄曾向伪军特务机关告密,致我方村干部、退伍军人和无辜群众三人被敌杀害。朱锡臣、朱贵也曾多次刺探、密报我方情报。

1949年8月,九宫道首郝凯旋、郝学昌(国民党中统特务)、张云波(良乡五街人)和朱锡华、朱锡龄、朱锡臣、朱贵等在涿县房树村郝凯旋家秘密集合,组建九宫道戊己皇坛,由郝凯旋主中军宝帐;建立“大元帅组织”,将道徒数千人编为涿、良、房三路。朱锡华、张云波、郝学昌分领房、良、涿三县道务活动,分任各路元帅,并刻制了帅印,制作了帅旗。1950年秋,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朱锡华家集会,密谋分期分批轮训暴乱骨干。他们以“上方老佛爷旨意”蛊惑欺骗道徒,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天时要到”的谣言,要配合美帝侵朝,推翻共产党,在涿县建都坐皇帝。

1951年2月,房、良、涿公安机关将此案破获,仅房、良两县即逮捕首恶分子23人,张云波、朱锡华、朱锡龄等主犯被判处死刑,朱锡臣、朱贵被判处无期徒刑。

加瑞、加震东九宫道反革命暴乱案 1933年,豆店镇芦村加瑞、加震东父子参加九宫道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加瑞为佛掌盘主。二犯积极发展道徒,骗敛钱财,至解放前夕,已辖150多个小盘,拥有道徒数千人。他们利用骗取的钱财在房山、良乡、长辛店、北京城内开设商号,借以掩护道务活动。加震东到北京、天津等地传道期间,投靠日寇,勾结汉奸,介绍道徒参加日伪特务组织。日降后,摇身一变成成为国民党保定警察局第二分局长、国民党特务组织“知行励学会”常务理事、民社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北平市候补参议员等职。

1948年底北平和谈开始后,加震东潜回房山,与加瑞合谋,以芦村为据点,串连道徒,组织反动武装“八卦军”,成立3院33部,加震东任军政部长,统领佛兵5千余人。为配合美帝侵朝战争,二犯密谋1951年旧历二月初二举行武装暴乱,推翻共产党,建立“龙华天朝佛国”。就在他们暴乱前夕,北京市、房山县公安机关将此案破获。1953年10月9日,加震东被判处死刑,加瑞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姜元贤圣贤道复辟活动案 1957年班各庄乡红煤厂村圣贤道首姜元贤自封为“列侯”,下设三个“贤”,即总部贤、童子贤、女儿贤;均设元帅、副元帅。又下设左背巡营、右背巡营、战兵、茶童等。秘密集会,烧香求天,公开散布谣言:“鼠年(1960年)百姓家家愁,三年无雨天下忧,从此天下大乱”。阴谋在河北、班各庄、周口店地区组织万名道徒,杀人放火,推翻共产党,保道首周振录到北京做皇帝。此案1958年被公安机关破获,首恶分子受到依法惩处。

田雨林、郭占春九宫道反革命暴乱案 田雨林(大紫草坞乡小紫草坞村人)、郭占春(大紫草坞乡炒米店村人,良乡农机厂工人)、宋维(炒米店村人)都是1938年参加九宫道余九天普济佛教会。1951年镇反后该道一度停止活动。

1961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郭占春与田雨林、宋维等密谋后,以亲连亲、友连友方法串连、发展新、老道徒。先后在炒米店、小十三里、丰台区佃起村建立佛堂,作为活动据点,多次秘密集会,“立誓愿”“传卦”学武术“念咒语”,计划组织20万佛兵,由郭占春自任领兵大元帅。1961年除夕夜,在三处佛堂燃放了焰火,作为“起义”开始的标志;将烙好的饼翻过来,称之为“翻天饼”;阴谋在1962年农历三月初一举行武装暴动,三月初三暴动成功,推翻共产党,建立“佛国”,保田雨林做皇帝。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已在10个公社38个大队发展了146人。就在他们武装暴乱前夕,1962年初公安机关将此案破获。同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郭占春死刑,判处田雨林、宋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贾苏氏、王树林九宫道反革命复辟活动案 贾苏氏,东南召乡常舍村人,解放前加入九宫道余九天的支派大佛教。1950年该道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1960年又死灰复燃。秘密串连旧道友,发展新道徒。1969年

12月，贾苏氏将本村回乡知识青年王树林拉入道内，向王传授“皂王经”“菩萨经”，鼓动王招兵买马，扩大组织。此后，苏、王二人四出活动，在东南召、琉璃河、葫芦堡、交道、官道、紫草坞等7个公社的13个村，以及涿县、武汉、贵阳、我区部分内部单位发展成员112人。王树林被贾苏氏封为“皇帝”。王妻和另两名女青年被封为“娘娘”，王的4岁女孩被封为“公主”，王的岳父被封为“国丈”，贾苏氏自封为“太君”；此外，还封了一批“八千岁”“千岁”“丞相”“巡按”等。

1972年11月以后，他们多次秘密集会，制造、散布反动谣言，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密谋时机成熟兵分三路进北京夺权，谋杀国家领导人，推翻共产党，建立所谓“圣朝佛国”。

1974年此案被房山县公安局破获。1975年房山县人民法院判处贾苏氏无期徒刑，判处王树林有期徒刑20年。

高树勤正字慈善会复辟活动案 1947年，长沟镇北良各庄村九宫道正字慈善会道首伊寿臣将本村高树勤发展为骨干道徒。1949年伊寿臣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后，该道活动暂时收敛。但伊、高仍坚持反动立场，暗中进行破坏活动。伊寿臣临死时嘱咐高：“我死后你要接替我继续干”。

高树勤曾因散布反动言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多年。1979年摘掉帽子后又继续散布变天言论，曾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但其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1984年以来，以经商为掩护，先后到本区和涿县的9个乡镇15个村秘密串连旧道友、发展新道徒60多人。

高树勤将伊寿臣的孙子伊正收为徒弟，教伊正以看风水、用邪法治病手段发展道徒。高自封为“周文王下转”，叫嚣“天时已到，你们要保我当皇上”、“把党、团员、村干部全杀掉，到北京建都”，还封了丞相、军师、领兵大将、正宫娘娘等。高还以看病为名，奸污女道徒。

1986年3月，高觉得自己年龄已大，来日无多，即对伊正交代后事：“我快走了，就交给你了！这块云彩不能散，不能断了烟火。”伊正给高磕头，痛哭流涕表示决心继承反动衣钵，“一定把事情办好”。

1986年5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破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高树勤有期徒刑12年，判处伊正有期徒刑3年。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建国初期贯彻《婚姻法》纪实

苏秉刚

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我们在国际上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在国内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并在加强民主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恢复与发展生产诸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4月30日发布命令自当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为了把这一婚姻家庭准则宣传贯彻好，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1953年中央决定3月份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1953年1月30日原中共良乡县委作出了关于大张旗鼓地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计划。计划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反封建的社会改革运动，与土改、镇反等不同，它主要应该是从贯彻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工作。要求全党动员，既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使婚姻法的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广大群众自觉地执行。

具体方法是：(一)从上到下进行“婚姻法”教育。县委规定：县直机关1月1—25日学习讨论，区政府2月10日—30日进行学习讨论。并对中小学全体教职工进行教育。农村以支部为核心，在2月15日—24日学习讨论。(二)动员一切力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贯彻。首先是培训宣传骨干。县委从2月5日至2月8日以四天时间集训了宣传传授站站长和党支部教员，共350人。其次是以支部为核心，以宣传员为骨干，党支部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利用片会、广播、黑板报、口头宣传与各种文艺形式相结合，如鼓书、快板、演剧、绘画等，采用干部分片包干挨户串户进行深入宣传。县报告员36名由县委书记召开报告会，要求每人保证5—10户，同时加强请示汇报制度，要求各机关行政首长必须对下乡干部布置宣传任务，回机关后要汇报情况，在婚姻法宣传月运动期间，县里不论召开任何会议都要适当地讲婚姻法。据1953年原河北省良乡县不完全统计，有农村业余剧团50个，职业剧团3个，要求除普遍上演：“三全其美”、“都满意”、“小女婿”、“新事新办”等小节目外，在春节期间还要上演“刘巧儿”、“柳树井”、“罗汉钱”、“赵小兰”等五个新剧目。当时文化馆组织七架幻灯到各村巡回放映《婚姻法图片解》，同时动员各学校共五千人投入宣传活动。

原河北省良乡县人民法院地址在良乡城内西南角署前街，原为日伪时期伪县长秦仲长的公馆，分南北院。为法制宣传分别在良乡城大角四个城门洞及法院门口建立八块黑板报，题为“良县人民法院布告栏”，并组织专人不定期更换宣传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婚姻法》问答等内容和案例。

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使婚姻法的精神深入人心，解除了大量的封建包办婚姻。如良乡二区贺照云村就有三个童养媳解除了婚约。良乡城内有个四十多岁的老姑娘经人介绍自愿与公路干部结婚。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从而也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原河北省良乡县人民法院是1950年在良乡县司法处基础上组建的，县长闫振峰兼法院院长，副院长杜万兆主持全院工作。全体干警不足二十人，担负着刑事审判、民事审判任务，日夜奋战超负荷运转。由于婚姻法的贯彻深入人心，民事案件中婚姻案件占主要内容。1953年原良乡县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397件(其中离婚193件，解除婚约15件，离婚后财产纠纷5件，其他184件)(据法院档案室统计)。为了突击清理积案，贯彻执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方针，学习马锡武(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解放区的审判方式。经请示党委批准，在原河北省通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指导下，在1953年9月中旬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展开了一场“集中审理婚姻案件”的歼灭战。这确实是件新鲜事物，也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审判不是在法院法庭上，法官服务到基层。当事人去掉了畏难情绪，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互相讨论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办法很实际，仅三、四天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具体做法是：(一)充分做好准备，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预备会议，抽调力量协助法院搞好“集审婚姻案件”。参加会议的有民政、妇联、青年团等部门。(二)拟好集审报告及各种法律文书，如“良乡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离婚证明书”等。并在城内四街两关安排住房及讨论地点。(三)选择有代表性的离婚案件100多件(除个人隐私案件外)，集中起来分类划分小组以便于讨论。(四)采取会议方法通知要求：凡有离婚当事人的村及单位要求派村长或民政、妇联、青年干部参加，自带伙食费，每天四角，会期四天。每个区都要有带队负责人参加。与此同时，采取大小会结合，主会场设在良乡城内文化馆。

集审婚姻案件第一天由河北省通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动员报告，良乡县人

民法院副院长杜万兆主持会议，并讲了会议要求、分组情况，然后回各驻地讨论；第二天集中解答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采取理论联系实际自我教育、自主解决的方法；第三天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解决实际问题，办理各种法律手续；第四天由杜院长作总结报告。通过上述活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封建包办婚姻，确无感情的双方同意登记离婚发给离婚证；一种是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有一定感情并且有了子女，只因一方产生喜新厌旧思想提出离婚的经教育表示和好撤回起诉；一种是一方坚决离婚，一方坚持不离，思想不通的只有六七件未解决，后经依法判决。

通过集审婚姻案件使我体会到：审判工作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挥政策法律威力，就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创造奇迹。当初法院案件多，审判力不足，确实压力很大。集中审理“婚姻案件”也是一个“创造”。真正起到了及时、便民、维护与发展生产、促进安定团结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区法院干部

回忆房山解放前的斗争片段

张进儒 口述 郭 薇 整理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1948年是三年内战的最后一年，那时许多地区都已解放，房山县城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加强了各地区的防守。

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年，驻守房山县城的伪军，组织了大批伪军保安团、还乡团，经常向我解放区边缘地带进行骚扰、抢掠、杀人。当时，我和王殿龙同志（涞水县人）担任房山县五区工作。该区是敌占区，有些村是两面政权，敌我双方经常争夺。1948年秋，开封解放了。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大好形势，使人民相信八路军的力量，看清国民党必败，我军必胜的前景。区委书记王殿龙在孤山口村召开了五区范围内的伪保长会，通过保长向敌占区人民进行宣传。保长会散后时至中午，保长们都走了，王书记一人左臂挎着盒子枪，右肩背长枪，两手提着装满红土子水的铁桶，往墙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庆祝开封解放！”的标语。突然，伪保安团的营长马德福带着二百多敌人，从山上和村外大路分两路包抄而来。王书记发觉时已经晚了，他迅速躲进老家后院，敌人追进来搜查，开始没找到。山上的敌人居高临下，他们高喊“王殿龙在某家后院”，敌人向里开枪，王书记奋力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腹部中弹而被捕。敌人用门板抬着他，准备带回房山城他们的老窝，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时年仅28岁。王殿龙牺牲后约一个月，房山县解放了。王殿龙同志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强，生活朴素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把自己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我们这些幸存者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西甘池遭遇战

1948年秋初的一天,我平西独立团得知敌军准备在房山支娄一带修建琉璃河至周口店的铁路支线,若这个阴谋得逞,将对平汉地区的革命斗争不利。为了配合平汉线的对敌武装斗争,我们决定去支娄一线设下埋伏,破坏这条铁路的修复。早晨4点左右,我(当时任五区区委书记)和四区区长吕镒配合这个团从后石门出发,一路急行军。行至西甘池,吕镒所配合的二营突然与王凤岗的一个营遭遇,这支敌军企图到西甘池地区砍伐枕木。双方接触后立刻接上火,战斗打的非常激烈。我配合的第一营也投入了外围战斗。当时我们的武器不如敌方,但战士们打的都非常勇猛。十分钟就消灭敌军一个排。这时我们的一个排长跑过来报告王再民团长,问是否再打下去。王团长考虑了一下说,再打十分钟结束战斗。因为时间一长,房山、长沟的敌军会很快增援,我军将处于被动地位。战斗又进行了约一刻钟,敌一个营被我军击溃。这次战斗共消灭敌军一个连,打死打伤约20多人,俘虏六十余人,缴获机枪四挺、掷弹筒数枚及大量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我们向敌占区和游击区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威风,迎来了房山城的最后解放。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我在抗战中的二三事

王文治 口述 李有庆 整理

1943年至1945年间,我在村里(门头沟王家山村)任南北两山石河、台上、上蔡岭、东北山、灵云寺、王家山等几个村的民兵队长期间,经常出去侦察敌情,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现在回忆几件小事:

一个地雷

1942年冬天,宛平县武装部长刘永晋交给我一个地雷,叫我好好保存,等以后用时再来取。临走时对我说:“这个东西威力很大,埋在地下能把几百斤的大石板炸碎,一定要小心……”。说完他就走了。

到了1943年开春儿,楼儿岭、石河村岗楼子的伪军频繁地出来活动,常到各村骚扰,搅得百姓不得安宁,群众纷纷议论。这时我就把家里的地雷取了出来,正巧我弟弟文林也来了。他见我拿着地雷,就说:“哥!刘部长不是不让咱们随便动吗?说它有多大威力……”。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精神大振:“好主意”。

第二天早晨,我们哥儿俩把地雷包好,放在篓子里,进屋跟我父亲说:“爹!我姐姐不是说让我们哥儿俩帮她去干点活儿去吗?我看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这就去吧?”我爹想了想说:“你们去吧,可要早点回来,不要落晚儿……”。我们一听他允许了,高兴的背起篓子就上路了。

爹哪里知道我俩的心思。我们边走边商量着怎么利用这个地雷打击敌人。当我们来到石河村,向老乡了解了情况。他们说:“岗楼子里的敌人一共有十几个人,有时在中午前后三三两两地到村里来串门儿,

一个人进村时很少”。我一听心里有了底儿了。约有十点钟了，我朝弟弟使了个眼色，说：“咱们走吧”。我俩背起篓子出了村子，寻找地形去了。

出了村子，在距离岗楼子一里多地的叉路口儿，选了一个位置，不管你往哪条路上走，都躲不开。这时天快中午了，路上没人，我叫弟弟从村里找来一块大荆拍子和一条绳子，我们把地雷埋上，把荆拍子用土盖好，然后刨沟顺好绳子，隐蔽在距离地雷二、三十米以外的墙后边儿，我把绳子的一头儿交给弟弟，说：“你把住绳子的这头儿，听到我的口令再拉，不然咱就前功尽弃了”。交待完我选了一个既能隐蔽，又能观察叉路口儿的地方耐心地等候。

初春的天气有点儿凉，肚子也有点儿饿了。心想今天敌人怎么没动静？如果他们不出来就白干了……，我有点儿起急了。下午两点来钟，我望见两个伪军背着大枪从岗楼儿里出来了，我暗自庆幸，赶快跑到弟弟身边说：“要坚持着，敌人下来了，听我的口令……”。说完又回到自己的位置去了。等了十几分钟，两个伪军一前一后接近了雷区，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步、二步、五步，好！我大声喊“拉！”。弟弟文林用力一拉，只听“呼隆！”一声，两个伪军一死一伤，伤的拖着拐腿一瘸一拐的跑了回去。这时，岗楼儿的伪军朝着这个方向打起了枪。我们哥儿俩拣起死者扔下的枪就跑。跑出有二里路才停下来。这时又渴又饿，再也跑不动了。我们就地休息一会儿，我说：“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敌人要追过来咱们无法对付。”我们忍着饥饿又起来上路了。

后来我父亲听说我们有了枪，指着我说：“你哪里来的枪？拿来我看看。”我以为我父亲要怪罪我们，无奈从草垛里把枪取出递给父亲。他接过枪一看，打量着枪问我，“你们怎么弄来的？”我说，用刘部长存放这儿的那个地雷炸死敌人得来的。我父亲听了后，高兴地说：“你还真有点儿能耐呀，好！”。把枪又递给我。当时我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巧得钢枪

约在1943年3月，我到军响、斋堂一带侦察，寻机打击敌人。当走到东葫林村和军响村的交界处时，发现一个清乡队员背着大枪从东向西自由自在地唱着小曲儿走过来，心想他可能是哨兵，大队人马有可能在后边。我找了个隐身的地方观察着，等了好大工夫不见后边有人来。我想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对一，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夺他这支枪。主意已定，就暗自跟踪。等那个清乡队员走到东葫林村边时，再到一棵大核桃树旁四处望一番，便要解手儿。这时他把枪靠在了核桃树上解开了裤带。我乘这个机会，从他身后二十多米处蹿到了他的身旁，迅速抄起他的枪，枪口对着他说：“不许动！”吓得他连裤子都没提起来便跪在地上求饶。我说：“你不用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不要你的命。你站起来系好裤子，一直往东跑，别回头，回头我就打死你”。他吓得哆哩哆嗦地连声说：“我听话，我听话”，系好裤子就往东跑。当他跑出有百米时，我转身往西跑，跑出一段回头一看他还在跑，我急忙转弯钻了山沟。就这样没用一枪一弹夺了一支钢枪，这次行动受到上级的嘉奖，增强了我战胜敌人的信心。

捉住伙夫张

1943年8月的一天，我出去侦察敌情，路经台上村，那里多数群众都认识我，他们对我说：“王文治！伪军岗楼儿的那个伙夫张（石河村岗楼儿里管伙食的姓张，都称其伙夫张）经常到我们村来搜刮老百姓，不是要米面，就是要猪肉，吃了喝了还得捎上点儿，老百姓都怕他，我们真受不了啦。”他们还说：“你要把他治服了，我们得好好感谢你，奖给你一头大肥猪吃……”。我一听心里就燃起怒火，心里说：“好小子，你别让我碰上，瞧我整治你的”。接着我向百姓了解伙夫张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规律后，说：“过两天我来收拾他”。

老百姓听了都很满意。说：“他哪天来我们给你送信儿去”。

按照群众反映的情况判断，明天就是伙夫张来的日子，我一看天气也不早了，便说：“找个地方我住下，明天会会那个伙夫张”。老百姓高兴极了，这个也拉，那个也让，我住在了村中的一个老乡家里等候。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来了，进村后就找村里管事人，还和往常一样，要吃要喝的。

这天早晨。我早就出了村子，观察情况，发现伙夫张进了村，我也隐蔽起来。到了村公所进屋就把他堵住了。让他交待问题，并下了保证不再骚扰百姓。然后叫谭巨龙把他送到区里去了。

送走约有六、七天，区里通知我去一趟，我不知又有什么任务，等我到区里之后，公安助理杨兴民跟我谈。他说：“前几天你派人送来的张伙夫你还得把他送回去”。我一听就火儿了，“我不同意”。杨助理说：“经过教育他已经认罪了，他答应以功补过，给咱们送情报、送子弹……”。他又跟我讲了很多道理才把我说服了。伙夫张回去没过十天，真的送来一些子弹，还不断的把鬼子的一些活动通过关系传出采，以后他成了我方的情报员。

严峻的考验

1943年秋末的一天，区公安助理杨兴民找我，他叫我跟他出去一趟。我问他：“你把我叫出来到底干什么去？”走到村外他才对我说：“今天我叫你跟我一起去执行一个任务”。我问：“去哪儿？”他说：“咱们去斋堂探探日本和清乡队的活动”。我听后心想：这是个危险的差事儿，那个地方是日本把守的重要地点，让他们捉住是九死一生。我问他还有谁。他说：“没别人，就我俩。这是命令。”我一听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没好气地说：“就凭我赤手空拳和你那支破手枪，不是去送死吗？……”争论之后，我就跟他出发了。

已经决定去了，就这样单刀直入的去吗？不成，边走边想办法，一个庄稼人装扮什么都不像，我俩一合计就化妆成捡粪的吧。于是又往回跑，到家背上篓子，拿上捡粪的叉子，向斋堂出发了。路上杨助理给我明确了任务，他说：“这支手枪交给你，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走，咱们得拉开点儿距离，免得引起敌人的怀疑，遇上敌人要大胆、果断的应付，但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暴露，不要等我。”说完后我俩就一前一后拉开了距离。

这天天气晴朗，刮着小凉风儿。快进斋堂地界了，他说：“我们的距离要拉得远一些，你先走，我在后边看着你，回来时我们在北山上集合。”我说：“好！就这样，走吧”。说完后我就头里走了。我到斋堂村边时他已经走向另一条道去了。就在这时，有六、七个清乡队的队员从城里走出来了，我心里还真有点儿发慌。敌人离我近了，路上没有粪蛋儿，我就拿起叉子锄起石子儿往篓子里扔。清乡队真把我当成捡粪的了，从我身边走过去都没理我，我这才放了心。转过身一看，有个清乡队员离了队进了伪保长宋国藩家了，这时我想起了老杨说的话“遇到问题要大胆、果断……”我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弄他那支枪去。

清乡队员进了保长的院，到正房屋把枪就靠在墙角儿，还没坐稳，我也跟了进去，到正房门口儿一个箭步上了台阶，“嘭！”一脚踢开屋门，掏出手枪就顶在清乡队员的胸口上，大声喝道“不许动”，吓的那队员直哆嗦，我顺手抄起他那支枪，命令他随我一起出了保长的大门，出门往北跑去，一拐弯儿进了白虎头沟，上了北山才把他放回去。等城里的日本和清乡队出来追时，我已经翻过山到达安全地方儿啦。我回到北山上时杨助理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我见到他高兴的互相拥抱起来，拿起刚得来的枪对杨助理说：“要不是你硬派我去，这支枪是得不来的”。回到村子后，大家都为我这次出奇制胜而庆幸。当我把手枪还给杨助理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民兵队长合格了”。我这才明白这是领导对我一次严峻的考验。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李有庆系原区水利局副局长

夜闯石楼村

张进儒 口述 张 珍 整理

解放前房山城关外的顾册、北市等西南地区的十几个村庄归五区管辖。那时我是五区区委书记。因为是游击区，区政府常驻在环境比较巩固的大峪沟檀港口一带。1947年的秋天，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崔洛春同志（县委书记是王宪同志）常到五区下乡协助开展工作。他对我说：“你们五区应当到铁道（指周口店至琉璃河铁路）东的石楼村看看，那是个产粮村。”县委领导的要求一下提醒了我。过去我们天天到铁道西边的大次洛、五侯、南北庄、大韩继、南韩继、支娄以及孤山口等村活动，而铁道东的石楼村，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从来没去过。现在正是秋收季节，应当闯进去。我决定自己亲自走一趟，趟趟路子，一则为政府征粮，二则为进一步开展工作。9月的一天晚上，秋高气爽，皓月当空，我带着从老区来的配合开展工作的民兵，从史各庄村出发了。当时自己觉得，腰里别着几颗手榴弹，手里握着匣子枪，有两个扛步枪的民兵，浑身是胆，无所畏惧。我们走了70多里的路程，到了支娄村。进村没歇脚，正好碰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让他带我们去石楼。他很胆小地说：“东边的（指县城的敌人）尽来这些村抢粮，要碰上怎么办？”我说“只要你带到石楼村边就行！不要怕”我们到了石楼，让一个民兵留在村边放哨，我和另一个民兵进了村。没走多远，见一个农民正在井台打水，我一个箭步窜过去，把那人吓了一跳。我说：“你别怕，我是西边的，这村里边有没有白粽子？”他说“不敢说，白天有六七个在村里转。”我让他带我们去村公所，挑水人说：“你们来多少人哪！就你们这两个人我不敢去。”正说着，从北面走来一个人，他头戴礼帽，手里托着个空饭碗，好象是去小铺买东西。看这人打扮，起码跟村公所有关系。后来得知他是敌人常驻琉璃河的情报员。于是，我把挑水人放了，我猛然窜到戴礼帽人跟前，一下抓住他的衣领，吓得他把碗都扔了，他一看见“八路”模样，就连连说：“别误会！别误会！我也是地下工作者，隗永忠是解放区的城工干部，你认识吗？”（实际他并不认识隗永忠，是从敌情报中得知的人名）我说：“我现在没时间告诉你，你在村里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子？”他说叫张少宗，外号张丫头，在村里管些杂事。让他带我们去村公所，他说你们千万别去，东边的有一伙人正在那里吃饭。我说我们能收拾他们！他说你们两个人不行！我坚持让他带着去，他只好前边带路，走进一座大庙，他说这里就是村公所。于是，我立刻警惕起来，进山门后，我窜上一口大钟，几步又跳上了房顶，一看院子里没人，吃饭的人走了，只剩一个肩膀搭条白毛巾，正在烙饼的人，桌子上还有很厚一叠烙饼。当时我想，如果几个敌人仍在屋子里吃饭，我居高临下，准能把他们收拾了，这回算便宜了他们！我从房上下来对张丫头说：今天有成绩，认识了你，又看到村公所，现在太晚了，我还要赶回山里去。我让民兵装上几张烙饼，又问张丫头：“你真想为我们做点工作吗？”他满口答应说：“给什么工作都接受！”我说：“那好，三天我还来，弄粮食来，有一点告诉你，既然来就不怕你给敌人送信！”张丫头大声嚷着保证：“你三天来，我等你，粮食没多有少。”我说至少得10万斤。他说太多了！我说四五万斤也行呀！说完，立即撤出了石楼村，连夜又赶回史各庄。

第二天崔洛春同志知道我去石楼的情况后，高兴地对我说：“张进儒真不软，胆子不小，县委要支持你们去石楼村征粮。”三天过去了，县大队（县委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以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距石楼村仅三四华里路的杨驸马庄村。为我们去石楼村征粮坐阵助威。同时，派出一个班在支娄村边等候接应。我独自一人，借着月光，直奔村公所。跑腿的跟我说：“正、副保长全去房山了，张丫头也没来。”我想可能张丫头躲了，我不能死等他，既然来了，就得弄到粮食。于是，我就摸到村公所附近的一家门口，叫开门一问，正好

这家是一名甲长，姓宋。他说：“张丫头有话，保长们全不在村里，如果你们来了，让我帮助办你们的事，说给弄些绿豆、小麦、玉米。”正说着，张丫头来了，并问我：“你会吸烟吗！我给你们弄来一匣子大手牌香烟，共 50 盒。你和隗永忠各一半。我说：“赶快找大车装粮食，越快越好。”他说有准备，找人正在弄。我们在村公所等候近一个小时的工夫，三辆大马车，满载粮食，足有六七千斤，在部队配合下连夜送到解放区。

临出村时，我对张丫头说：“隗永忠是县委的城工部长，回去一定把你的好意带给他。今后我们需要了解石楼、疏河、城关的情况，你经常给我们写些情况。”他答应得非常干脆。

到 1948 年底，房山城解放后，我还是五区书记，头一个到区里找我的就是张丫头。我介绍他到县委举办的知训班学习，参加了革命工作。

（《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

挖壕歌

宋 湘

1948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房山城解放。洪寺村民和长育学校(解放后更名为房山县第十三完小，五十年代初改称洪寺小学，近已恢复长育校名)师生欢欣鼓舞。1949 年旧历正月，校园内外开展了扭秧歌、打霸王鞭、演唱等文艺宣传活动。《挖壕歌》以其悲怆的曲调、通俗的唱词控诉了伪军政当局的暴行；道出了广大群众盼解放、庆解放的心声。因而在洪寺村曾盛行一时。

挖壕歌

- (1)留台尖上的月光，照着我房山，^①
人民苦难血泪斑斑，它来作证见。
- (2)解放军大反攻呀，张德祥要玩完，^②
提心吊胆退守县城不敢到乡间。
- (3)垂死要挣扎呀，百姓遭涂炭，
敌人通令环城挖壕限期把家搬。
- (4)拆房又砍树呀，城厢起狼烟，
四关百姓携儿带女何处把家安。
- (5)家无隔宿粮呀，度日如度年，
保长传令强征民夫去把壕沟剌。
- (6)天寒地又冻呀，冰水里施工难，
身上无衣腹中无食怎能把活干。
- (7)胸中燃怒火呀，抬头望西山，
敌人监工一顿皮鞭打得我皮肉绽。

五十年代初房良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

王硕儒

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密切中苏两国关系,增进友谊,于是年下半年建立了房山县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房山县支会筹备委员会)和良乡县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良乡县支会筹备委员会),隶属河北省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友好协会河北省分会)领导。

房、良两县中苏友好协会宗旨是:发展与巩固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

入会的条件是:凡一切享有公民权、赞成宗旨、愿意增进中苏友好的人民,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和性别,在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志愿书上签名,就可入会为会员;各人民团体、经该团体成员开会讨论通过书面决议,可以团体资格入会为团体会员。县内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农村(行政村)均可建立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友好协会支分会)。房山县中苏友好协会,到1951年上半年已建立支分会187个,发展会员14889名。是年3月23日,召开了全县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房山县支会,通过支会章程,推选出会长杜恩霖(县长兼),副会长宋广宽(宣传部长兼),下设23人组成的干事会,并由干事推选出11人组成常务干事会,总干事(专职秘书)白璧。截止1951年10月底,支分会发展到261个,会员发展到26763名。11月16日,召开了一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1952年的工作计划。据1952年6月统计,建立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委员会12个(县直6个,区级6个),支分会320个,会员达到54547名,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团体会员达2950。3年中,特别是通过中苏友好月、苏联十月革命节,对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进行了广泛宣传。

良乡县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与房山县基本相同。到1953年8月统计,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委员会4个,基层支分会219个,会员发展到26000名。

1953年底,因机构精简,房、良两县中苏友好协会撤销。会员活动自行终止。

注:

1、中苏友好协会是统一战线组织。

2、中苏友好协会名称,以地方、机关、团体、学校的名称命名,如房山县中苏友好协会、××县××村中苏友好协会、××县××学校中苏友好协会,分会、支会、支分会用于体现隶属关系,不作为正式名称。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回顾房山解放前战斗的片断

吕 镒 口述 张 珍 整理

开辟新五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疯狂抢夺胜利果实。我们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县委决定开辟房山县新五区。新五区的范围包括：孤山口、中院、天开、五侯，到东部的赵各庄、曹章、琉璃河、豆店、石楼，北至房山县城南的顾册、大韩继一带村庄。当时的五区区委书记是尚金秀，区长是方锡志，我是民政助理，区里还设有武工队。开辟五区的任务是：(1)建立党组织的地下关系；(2)征收公粮；(3)开展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抓壮丁等；(4)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破坏敌人活动计划。区里的工作人员，到新区(敌占区)开展工作，一般都是夜晚出发，天亮前后回归，住在解放区边缘的大峪沟、圣水峪等村。深入较远的敌占区，白天要就地隐蔽休息，在外边住上三两天。记得在1946年5月，我们开辟五区工作的第一天，住在较偏僻的皇后台村，准备第二天去赵各庄、五侯一带工作。结果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房山县的“白箍子”三四百敌人，把这村的东、南、北三面包围了。敌人大叫大嚷抓活的，向村里发起猛烈进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区干部10多个人，还有区武工队30多人。打了一阵子，我们撤到村西的后山上，占领了制高点，“白箍子”不敢再往西追了。我们抬着两名负伤的战士，撤到解放区三岔村。经过几天修整后，又从新开始工作。

还有一次深入敌区开展工作，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我们五区区委在县支队一百多名战士的配合下，秘密进驻了敌占区的曹章村。由于特务告密，房山国民党的“白箍子”出动一千多人，把曹章村团团围住。战斗打响后，敌人大叫“别让八路跑了！抓活的！”同时猛烈地向村内冲锋。我区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县支队的掩护下，勇猛突围。区委书记尚金秀从村南突围，绕道涿县的尚庄、青岗等村，回到解放区根据地，其他工作人员大多数突围成功。县支队在突围中牺牲连长一名，战士十多名。区委敌工委员张丙兴同志，他正要升任县委城工部部长，在这次突围中被敌人抓获。张丙兴同志立场坚定，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闭口不向敌人透露我方情况。敌人气急败坏，将他活埋在房山南关的沙河滩里。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经过近二年的艰苦工作，我们开辟新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一是在大多数村庄内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使我区的工作人员有了秘密活动的立足点。二是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平原产粮地区能及时向解放区运送公粮。三是有效地破坏了国民党抓壮丁计划。四是向群众揭露了房山的国民党特务，暗杀我地下积极分子和为我服务的伪保长等罪恶活动。两年来的新五区开展工作，为1948年底的房山全县解放作了准备。

尤家坟村脱险

1947年8、9月间，房山城南的大片原野被青纱帐笼罩，对我们开展敌占区的地下工作非常有利。据调查，尤家坟村有个武装特务叫顾广顺，是高家地主的管家，又长期与该村一个女人通奸，顾广顺经常吃住在这个姘妇家。顾广顺的任务是：刺探我八路军活动情报，为敌效劳。县委要求我们拔掉这个钉子，活捉特务顾广顺。这个任务，由五区区委书记尚金秀和我去执行。我俩第一天到尤家坟，住在这村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志明家。由当时公开身份为保长的我地下党员的高余，负责侦察顾广顺的行踪，一旦发现，就立即抓获。为

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我俩一天住一个地方。第二天我俩住到村中间吴邦贵家的场房里，未发现顾广顺。第三天又住到地主高志家宅内。结果有人告密，房山的“白箍子”知道尤家坟村有八路军，就风风火火的从尤家坟西头近村，逐户搜查八路军。我和尚金秀同志听说村西头来了白箍子，便把子弹顶上膛，张开板机，我还有两颗手榴弹，准备同敌人一拼到底。保长高余，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掩护我们。我俩先是在地主家的屋内，后又到屋外西屋后夹道，一旦敌人上来，我们的目标小，便于射击。当时，我们听到敌人在大街叫嚷。正在这紧张时刻，离这村三四里地的西周各庄村的小山坡上，传来一声地雷的炸响，白箍子误为八路军从山上下来了，很快就往村北撤，一下撤到了南韩继村。这时他们才发现，刚才一声巨响，是踩了地雷，不是来了八路军，因此有人还要回尤家坟村去抓八路。当时带队的大乡长高彬说：“他们(指八路)早跑了，别回去了！”结果白箍子未有返回来。敌人逐户翻八路，总以为藏在穷人家，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是在地主家藏身。直到这天下午，我们与地下党组织，继续监视顾广顺的活动。傍晚，才撤出尤家坟村。

配合七纵队攻打周口店

1947年夏天，我们五区接到县委指示，由我和尚金秀带领华北第七纵队的作战参谋等共20余人，去周口店侦察地形和敌情。上级要求拂晓前赶到周口店村敌营外围。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和意图，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从天开村出发，途经周各庄村，到瓦井村的刘家坡，向北又到娄子水村的北山，从这进入周口店采石场的南山。在这个山头上，画出敌营周围地形图，标出炮楼的位置、伪军住处等。连敌人早晨起床的情况都看得很清楚。七纵队的大部队当晚就进入了阵地。作战指挥部设在瓦井村。南韩继、大韩继、顾册等村，全住着我们的部队，声势相当大，实力相当充足。当时计划先打下周口店，接着就把房山县的敌人消灭掉，解放房山县城。

我们侦察的当天夜间，就开始了进攻。经过一段战斗，把周口店村西北的石板屏炮楼打垮了，我军占领了石板屏。这是敌人阻挡我军前进的屏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军开始攻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南边的炮楼。正当我军激烈战斗的时候，纵队指挥部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军马上撤出，停止攻打周口店战斗，将全军立即赶往保定以南，支援石家庄的反击战。真是军令如山，攻打龙骨山炮楼的战斗停止了，我军转入围而不打，掩护大部队向南转移。第三天夜间，我军秘密撤走，使敌人莫名其妙。

配合独立团打游击战

1948年夏天，平西独立团在石窝辛庄村成立。它是由涿县、房山、易县等县联合建立的。团长是肖炳林，政委姓康，副政委姓纪。为了考验新建独立团的战斗力，由新任五区区委书记张进儒和我带队，到房山新五区打游击。走到南甘池村，正好遇到国民党五十三师讨伐。发现敌情后，我们到南甘池村的枣树林隐蔽，准备战斗。经侦察发现五十三师一个连队正在休息，我们从西甘池村突然出现，敌人毫无察觉。于是，抓住战机，以优势兵力，发起攻击。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我们就全歼了这个敌兵连，缴获六〇炮一门，机关枪和步枪等上百只。敌五十三师在沿村和东甘池村，未来得及支援南甘池，就结束了战斗。我独立团无一伤亡。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平西第一个抗日模范村

隗合旺

1941年秋天，房涑涑联合县政府在十渡西庄村口的龙王庙（现平西烈士陵园）召开授奖大会，县长王天瑞亲自将绣着“抗日模范村”的锦旗交给了马安村代理村长刘占臣。这是在反扫荡中平西第一个抗日模范村。

马安村被授予抗日模范村是“当之无愧”的。

1940年秋，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阶段。日军分成十二路对平西进行大扫荡，其中一路从涑水的石亭出发，向十渡、马安、蒲洼一带奔袭。设在马安的房良县政府不得不与大部队被迫转移。当时十余万斤粮食来不及坚壁，大批文件来不及隐藏，八路军32团三营的40几个伤员也来不及转移，这些艰巨的任务自然压在了马安村党支部和乡亲们的肩上。全村百姓在党支部领导下，将十八万斤粮食坚壁了起来，将文件做了巧妙处理，又及时地把40几个伤病员转移到山上做了妥善安排。

县政府及大部队的转移，使地方叛匪猖獗起来。当时的王老铺在霞云岭民团头子杨万芳的拉拢下已经叛变，几个主要叛匪头子在马安东山头上盖起了炮楼，设置了据点，直接监视马安村的行动。十余万斤军粮，大批文件，特别是40几个八路军伤员无疑受到严重威胁。不仅如此，炮楼伪军还不断给村干部捎信，让去据点开会，让村里成立维持会，否则杀个鸡犬不留。“怎么办？”党支部书记刘德香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决议是：开会不去，维持会不成立，谁去开会、谁主张成立维持会就枪毙谁。而且必须尽快将炮楼端掉。

经过前后两次侦察，秋末的一天夜间，13人的小分队带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和几把砍刀在村长刘德忠的带领下悄悄地摸到了炮楼前，小分队把炮楼紧紧围住，把枪架在了窗眼上，由村长刘德忠上前叫门，交待政策。借着屋内微弱的灯光，队员们清楚地看到屋内仅三个人。三个叛匪知道寡不敌众，乖乖举手投降了。但没料到，对叛匪还没来得及处理，其中一个撒腿便跑，几个队员立即追上去。这个伪军借机藏在了一个坡下的瓜架上，被我们的队员发现一刀砍了下来，活捉。至此，一场端炮楼的漂亮战斗就结束了。炮楼端掉了，隐患消除了，乡亲们放心地为伤员送饭送药，进行精心调理。几个月后，40几个伤员全部康复，返回部队。坚壁的10余万斤军粮无一粒霉烂，大批文件一份也没丢失。马安人民模范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马安人民是善于战斗的，马安人民也是十分坚强的。

局势发展到1941年，敌人在西庄村又建了临时据点，前前后后计72天。敌人三番五次通知临近各村去据点开会，命令各村建维持会，分派各村给他们送粮、送肉、送菜、送柴。对此，马安人民一如既往，对敌人不理不睬，不送一根柴，相反却积极参与支前，抬担架，送公粮，做军鞋，样样出色完成。这自然引起敌人的恼怒，他们放火烧毁了马安村470余间房屋。马安人民为抗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抗日战争中，马安人民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安人民的支前是出色的，马安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抗日模范村”的殊荣。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系区政协四届委员、区政协研究室副主任

英勇抗日的上石堡村民兵中队

王硕儒

1938年,房良联合县上石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于1939年该村又组织了房良联合县最早的民兵中队。

这个民兵中队,开始只有10余人,逐渐发展到27人,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战斗队。一方面由于他们出身贫苦,自幼深受地主恶霸的欺压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成了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敌人对根据地贫苦农民的摧残,激发了民兵的斗志,那时,当地日伪汉奸程子良、杨天沛经常率领日伪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3月,程、杨二人率领日伪军200余人,向我抗日根据地下石堡、上石堡、北直河、大草岭等一带村庄进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有70余户的上石堡村就烧掉50余户的民房,房内的粮食、衣物和其他生产、生活等用具全都烧毁。群众只好住在山沟里的岩根石堂或是用树枝搭起的小棚子里,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1940年,日本特务又在夜间扑进了上石堡村,把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于进琛、农会主任李福贵、抗联队长解景森、民兵队长王兴云4名共产党员杀死在南窖,激起了全体民兵和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恨。

1941年,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1942年又吸收了对敌斗争坚强的骨干分子隗和宽、隗和常、解文海等5名共产党员。同年,在区委委员金耀巨的帮助下,成立了上石堡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隗和宽任武委会和抗日联合会(简称抗联)主任,隗和常任民兵中队长。区武委会发给上石堡村民兵中队长枪2支、手枪1支、手榴弹10枚和部分地雷,从此,民兵有了武器。同时,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了有仇要报、有冤要申的复仇运动,更激发了广大群众仇视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热情。

民兵们肩负着站岗放哨、保卫群众生产、埋设地雷、摸敌岗楼、阻击敌人进犯等任务。曾两次深入敌占区活捉伪大乡长刘单林和伪团长程子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至1944年,抗联主任隗和宽和区大队长霍梁,经常在夜间带领民兵于进水、刘福银、王炳更、郑全巨等人,偷袭护高压线的安子高线站的敌人,破坏敌人电话机13部。使敌人白天不敢出门,夜间不敢动。

从1942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在第三次“强化治安”中,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驻良乡、宛平、房山等县的敌人联合行动,沿我昌宛房联合县及房涿涿联合县边缘,北从杜家庄、东西斋堂、吕家村,经大安山、长操、南窖,南到周口店、孤山口、下庄、张坊等10余个据点,对我根据地形成一条半圆形的“封锁线”,不准一切物资进山。根据地所需要的棉布、食盐、纸张、电池、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又必须得到解决。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生产自救;另一方面是采取果断措施,迫使敌人放物资进山。为此,在1942年1月,上石堡村民兵中队接受了活捉伪南窖乡乡长刘单林的任务。由隗和宽带领部队一个排和民兵4人,部队掩护,隗和宽和区助理员郭蕊等4人,趁黑夜摸入南窖村,搭肩跳入伪乡长的院内。郭将大门推开,隗从窗外监视敌人活动,发现屋内6人,正准备开会。我除留1人放哨外,郭一脚将房门踢开,用枪指着敌人,敌人措手不及,便将6人全部捆上,带回送交县政府。我方对刘等6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以物易人;二是通情报信。他们都一一答应了。我方只扣留伪乡长1人,将其他5人放回。事后,伪南窖乡背着日本向根据地放进不少物资。伪大乡长还背着日本亲自为我送进物资数次。有一次,日军要进根据地“扫荡”,伪中队长尤茂志派人送信报告给我们,使我们了解敌情,早作准备。由于

实现了条件，为争取和利用敌人，最后将伪乡长放回。

1944年7月，日伪军70余人从长操、红煤厂出发，向霞云岭进犯。上石堡村民兵中队没有阻击，等敌人返回时再予以消灭。魏和宽、魏和常在村西横岭棍河滩埋好两枚地雷，又在村口埋设4枚地雷，等敌人返回时，3名敌兵若无其事的进入我阵地，一声巨响，当场炸死1名伪军，两名受了重伤。敌人乱打一阵，慌忙逃走。这个民兵中队还接受了除掉汉奸、伪军团长程子良的任务。魏和宽带领20余名游击队员深夜钻入程子良家。程正在抽大烟。魏和宽破门而入擒住了程子良。这时伪军已经发现，包围上来。民兵和游击队员英勇冲杀，冲出敌人的包围，一人未伤，将程子良送交政府，在龙门台村予以镇压，为民除掉了一大害。

同年8月中旬，中队长魏和常得知日伪军200余人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后，一面命令民兵掩护群众转移，一面带领解景成等8名民兵到下石堡村口南山上，6支步枪对准下石堡的敌人齐发，使敌人摸不清我兵力，只好慌忙窜回。

同年9月，魏和宽率领游击队和民兵一个排，攻打安子村南大岭的日军护线队。这个岭是通往我平西根据地的要道，敌人企图长期固守。过去日军曾几次在此修筑岗楼，都被我民兵破坏。为彻底消灭驻守在此的护线队，与敌人展开了山地战。40多名护线队被打得连喊带叫、连滚带爬的逃向安子村。打死敌人6名，缴获步枪1支。

1945年5月，日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向上石堡村进攻，企图消灭上石堡村党组织和民兵组织。中队长魏和常带领20余个民兵分开两组，一组在村北大岭坨，一组在村南南坡上。敌人一股从西面下来，另一股从下石堡上来。在进村之时，魏和常一声令下，南、北两面枪声齐鸣，打得敌人不知向何处去。向我南坡山上的民兵冲击，被打了下去。敌人见势不妙，狼狈溃退。民兵见敌人抢夺大量民财，追至大草岭，打死特务1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石堡村全村民兵又配合部队到平原完成破交、支前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各项任务。由于这个民兵中队在几年的对敌斗争中英勇、机智，战绩突出，深受人民群众爱戴。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孙连仲将军抗战记

韩宗喆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受令北上抗日。

从7月12日开始，第26路军分向鄂北的孝感、广水、花园，豫南的信阳、新店、明港等车站集中沿平汉线北开。途中，接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之电，劝孙部暂缓北进。此刻宋哲元正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中将举行谈判，他担心孙部的行动会刺激日军，扩大事态。孙部遂在保定以南下车待命。

日军利用“和谈”争取时间，调兵遣将，终于7月25日起向我部廊坊守军发起进攻，至26、27两日包围北平四郊，发动全面总攻。

7月28日，孙连仲奉命率部向永定河推进，增援北平。原预定第27师至长辛店下车，第31师至涿县下车，向固安集结。但中途，宋哲元部已撤出北平，由门头沟、长辛店一线撤下来。孙部第27师乃下来在琉璃河占领阵地，掩护宋部第29军撤退。

第26路军抵达琉璃河时,长辛店、良乡已先后失陷,敌我隔河对峙,孙连仲及时将左翼延伸到房山县。孙连仲率第30师张金照部在房山西南高地,第31师池峰城部在平顶山,第27师冯安邦部在琉璃河。

8月上旬,日军主力在南口一带与汤恩伯军作战,平汉路上的旅团在长辛店、良乡之线取守势,连日来在南岗洼、开古庄、北车营等地只发生小规模战斗。

8月中旬,南口形势危机,孙连仲部第31师进占房山城与鲁家滩之线阵地,掩护第14集团军向南口进出。

8月19日,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出发北进,上级命平汉、津浦两路出击,使敌首尾不能两顾,以利卫军完成北进任务,特命孙连仲部“于21日晨开始行动,向良乡积极进攻”。

21日拂晓,孙部第27师第79旅派侯象麟团长指挥第157团和两个“登峰队”夜袭良乡城。登峰队由城东南角登城冲入城内,第157团也突入一部,与日军展开巷战。敌由北门冲出一队骑兵,以青纱帐为掩护,绕攻我攻城部队左后方。侯团长为诱敌出城予以全歼,故意从城内撤出部队,向交道镇及窦店方面退却。敌良乡守军倾巢向窦店追来,被我窦店守军王书忱营顶住,侯团及两个登峰队从敌人左后方猛冲反扑,一个回马枪,予敌重创。敌不支,缩回良乡城,我军获大炮一门,战车一辆。

24日,第26路军重新布置部队:第27师担任码头镇经琉璃河至房山城之防线;第31师担任房山城经平顶山到朝阳洞以南之防线;第30师在涿县待命;独立第44旅负责守护涿县至徐水间平汉路之桥梁。

当日,良乡日军两千多人进至坨里,以炮兵、装甲车向孙部第31师平顶山阵地轰击。25日,敌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向平顶山阵地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孙部伤亡惨重。口头村、平顶山阵地被敌占领。我平顶山守军周凤朝连队死拼,全连壮烈牺牲。日军乘机西进至万佛堂、高线铁路附近与孙部第31师对峙。31师因伤亡过重,于26日调涿县整顿,遗防由第30师及独立第44旅之一部填补,并赶筑房山城至坟上、银江寺至东天宫之第二、第三防线。

8月27日,日军占领南口,我怀来、居庸关守军撤退由青白口向南转进。敌一纵队沿高线铁路西进,坨里、北车营等地也发现敌军5千人、炮20门,企图阻截第14集团军南下。第26路军为掩护该集团军,派一部占领黑龙关阻敌西进,另一部破坏高线铁路。

日军占领南口后,以坂垣征四郎为指挥官,率三个师团对我平汉线阵地作正面不定型的或间隔性攻击。

28日,敌三百余人向孙部第30师南大寨阵地猛攻。孙连仲为巩固左翼阵地,并与第14集团军保持联络,乃令独立第44旅推进至黑龙关一带,对东方警戒。31日,敌千余人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再次向南大寨猛攻,一场激战后,阵地失陷,我第30师主力转守房山城、沙峪之线。9月上旬,平汉路上敌我双方均在调整兵力,相对沉寂。是时,孙连仲部第27师、第30师及独立第44旅仍在房山、琉璃河、黑龙关一线与敌对峙,第31师在五侯村附近待命。

孙连仲被派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峙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二集团军隶属第一战区(蒋介石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下辖第一军团(第26路军)孙连仲部、第52军关麟征部、第32军商震部、第13军曾万钟部等,负责平汉北段沿线作战。

9月11日,孙连仲部奉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9月9日“攻守兼用,阻敌南进”的命令,派第27师一部向良乡攻击前进;第30师一部向磁家务攻击前进;第31师、独立第44旅原地待命;骑兵第10师一部攻占大十三里;第30师一部向大苑、坨里、黄土坡之敌出击。后因敌增援反攻,两部均撤回原阵地,唯独立第44旅进击顺利。

9月16日,孙部第30师当面之敌两千余人、战车二十多辆在飞机支援下向我辛庄一带阵地攻击,并一部进攻我房山阵地,均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我平汉路正面守军右侧背受到威胁,故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下第26路军转移阵地至柳河营、涿县、张坊、孙臆山之线。同一天,日军800人在飞机、战车和炮火支援下猛攻孙部第27师窦店据点,因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敌军占领窦店即向第27师琉璃河主阵地发起

攻击，我守军顽强抵抗，顶住了日军。但日军前一天(15日)已由我军右翼固安强渡永定河成功，正向我守军后方高碑店迂回。同时，我军左翼又受重创，且战且退，致使我琉璃河主阵地有被敌包周之虞。第79旅不得不于17日夜间放弃琉璃河向涿县撤退。至此，孙部第27师在涿县以西，左与长沟峪第30师，右与涿县城第31师互相联络，组成新的防线。

孙连仲部在涿县立足未稳，日军又猛扑过来。由于我第53军万福麟部与第52军关麟征部都已南撤，使涿县处于突出位置，为避免日军围歼，孙连仲命一位团长带4门山炮死守涿县城，掩护全军撤退。

自7月底至8月中旬，第26路军孙连仲部在房(山)、良(乡)地区与武器精良之日军鏖战近50天，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英勇悲壮的一页。

孙连仲到了保定，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系区政协三、四届政协常委，原北京煤矿机械厂职工医院主任医师

黄埔军校回顾及同学会的建立

王 岗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革命军官学校。1923年作出开办革命军官学校的决定，1924年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初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位于广州黄埔长州岛上，故以后通称为黄埔军校。

军校以贯彻孙中山先生的“建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亲爱精诚，”为校训。创建后，国共两党都派出了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叶剑英都曾在校任教、任职。

军校采用当时世界最新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从难从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国共两党培训了大批军事人才，享誉海内外，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军事院校之一。

学生在考试录取后，分为入伍生、军官生两个训练阶段。入伍生：以培养军人基本的素质入手，吃苦耐劳、大强度、高难度，以军容军纪、队列体育等军事活动为内容，并辅以数、理、化、英语等有关军事需用普通学科训练。使其成为一名优秀的列兵。军官生：入伍期满，再度考试，合格后升为军官生，并分别编入步、骑、炮、工、辎重、通讯等科进行专科训练。学习的课程有：典(步兵操典)、筑(射击教筑)、令(阵中勤务令)，以及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通讯学、军制学、卫生学、经理学等八大教程。随着形势的需要、兵种的特点，还减少原有教程，不断增设新的军事学科。毕业考试合格后，分配到部队任少尉见习官，成为一名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掌握熟练军事技能的合格军官。

黄埔军校自成立到大陆解放共办了23期，抗战期间还先后办了九个分校。共培养248404人。目前，在台湾凤山已继续办到66期。

军校成立后,边训练、边战斗。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国共两党师生携手合作,共同北伐,打败了北洋军阀。

“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战高潮。从这时起,我区原房、良县的同学据不完全统计,在黄埔军校任职、学习的人有教官1人,学生30人。

根据湖南、四川、陕西档案馆、台北王曲文献、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录中的资料,将房、良地区黄埔军校师生名单列后。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在党中央关怀下,在中央统战部的支持下,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其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1985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荣幸地参加了代表大会。

1988年6月16日,在校庆64周年纪念日,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90年4月20日,在房山区委统战部领导支持下,我区10名会员,成立了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房山区联络组,并开展了对台、港的联络工作,每个会员都和海外保持着1至2人的联系,联络了感情,促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共识。

房良地区黄埔军校师生录(按期别排列)

| 序号 | 军校用名 | 现名 | 别名 | 期别 科别 | 籍贯 | | 解放后从事 行业及工作 | 备注 |
|----|------|-----|----|----------------|----------|--------|----------------|-------|
| | | | | | 原籍 | 现住 | | |
| 1 | 刘文宾 | — | 王虎 | 22、23期 筑城教官 | 良乡 | — | 情况不明 | |
| 2 | 殷宗前 | — | 绍先 | 8期步科 | 房山 | — | 情况不明 | |
| 3 | 刘光甲 | — | 冠侠 | 8期步科 | 房山东庄村 | — | 情况不明 | |
| 4 | 王维疆 | — | 维超 | 9期炮科 | 房山 | — | 情况不明 | |
| 5 | 全国用 | 全国用 | 乾元 | 10期步科 | 河北正定 | 石楼乡吉羊村 | 教育 | 会员 |
| 6 | 李仲武 | — | 次韶 | 10期骑科 | 良乡东街39号 | — | 情况不明 | |
| 7 | 王永基 | — | — | 10期骑科 | 良乡 | — | 情况不明 | |
| 8 | 刘保恕 | — | 太可 | 10期骑科 | 良乡黄土坡 | — | 情况不明 | |
| 9 | 萧文渊 | — | — | 12期步科 | 良乡城内 | — | 情况不明 | |
| 10 | 刘继先 | — | — | 12期工兵科 | 良乡琉璃河 | — | 情况不明 | |
| 11 | 张永纲 | — | 振乾 | 13期炮科 | 房山坨里横流水村 | — | 情况不明 | |
| 12 | 郝志秀 | — | 惠清 | 14期步科 | 房山檀木港村 | — | 情况不明 | |
| 13 | 卢存初 | — | — | 14期步科 | 良乡高舍村 | — | 情况不明 | |
| 14 | 纪绍先 | — | — | 14期步科 | 房山琉璃河 | — | 情况不明 | |
| 15 | 苏者刚 | — | 子廉 | 16期步科 | 良乡窦店 | — | 情况不明 | |
| 16 | 刘大为 | 刘大为 | — | 16期炮科 | 吉林双向 | 燕山向阳里 | 教育 | 入会后迁出 |

| | | | | | | | | |
|----|-----|-----|----|--------|--------|------------|------|-------------------------|
| 17 | 施洪凯 | 施洪凯 | — | 16期步科 | 河南淮阳 | 房山石楼乡吉羊村 | 医 生 | 会 员 1993年病逝 |
| 18 | 谭 亮 | 谭 亮 | — | 16期步科 | 房山洪寺村 | 房山洪寺村 | 医 生 | 会 员 |
| 19 | 吴俊源 | 吴振杰 | — | 16期步科 | 浙江海宁 | 石景山 | 机 械 | 入会前迁出 |
| 20 | 黄庆舜 | 黄庆舜 | — | 17期辘重科 | 云南弥勒 | 良乡送变电公司宿舍 | 电 力 | 会 员 1992年病逝 |
| 21 | 姜致华 | 姜致华 | — | 17期步科 | 北京房山 | 房山区周口村 | 商 业 | 会 员 |
| 22 | 陈鼎九 | 陈鼎九 | — | 18期步科 | 北京房山 | 房山区永安西里 | 银 行 | 房山联络组 副组长 |
| 23 | 王景煦 | 王岗 | — | 18期步科 | 河南浙川 | 燕山杏花西里 | 统计师 | 房山联络组 组 长 |
| 24 | 程梧林 | — | — | 18期步科 | 良乡大十三里 | — | 情况不明 | |
| 25 | 李 达 | — | 达之 | 18期步科 | 房 山 | — | 情况不明 | |
| 26 | 马郁卿 | 马维 | 季纲 | 21期通讯科 | 房山小次洛 | 房山东营乡小次洛村 | 农 业 | 房山联络组 联络员 1990年病逝 |
| 27 | 辛世奇 | — | ? | 22期步科 | 良乡西瓜地 | — | 情况不明 | |
| 28 | 胡振魁 | — | 中杰 | 22期步科 | 房山西东村 | — | 情况不明 | |
| 29 | 陈仿舜 | 陈仿舜 | — | 22期工兵科 | 河南淮县 | 大兴县黄村 | 测 量 | 入会前迁出 |
| 30 | 王尚仁 | — | 明之 | 23期骑科 | 良乡西南召村 | — | 情况不明 | |
| 31 | 吕毅忱 | 吕志仁 | — | 骑校3期 | 北京房山 | 房山区河北乡东庄子村 | 农 业 | 会 员 1993年病逝 |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系区政协二、三、四届委员，黄埔同学会房山联络组组长

记忆中的平西兵工厂

刘明泉 口述 隗合旺 整理

我是河北省涞水县板城人。1938年3月经军邮所长杨春潮(宛平齐家庄人)介绍参加军邮工作。由于一心想到正规部队，后经郝绍尧县长介绍到了平西兵工厂(俗称炸弹厂)。

说起平西兵工厂(1941年后改为11军分区兵工厂),那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1937年,“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狠狠打击日寇,保证抗战前线武器供应,我平西司令部于1938年在房山西部的芦子水村建起了平西兵工厂。当时除了这个兵工厂外,还在河北省的紫石口、沙岭西、刘家河等地分别建了被服厂、织布厂、皮革鞋厂和修枪所,同属司令部下属供给处领导。兵工厂的第一任厂长是何鸣岐,原是东北学兵连长,因负伤后派到兵工厂任厂长。全厂200余人,和正规部队一样,穿军装,配枪,出操点名,按时作息。说是兵工厂,生产任务却很单一,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其次是地雷,也适当造些短枪,俗称“撅把子”、“独角冲”(一次只打一发子弹)。因搞不到合格的钢铁,短枪的生产量很小。工厂分为翻砂、炸药、木工、组装四个车间,都是百姓的民房,十分简陋,也不在一起,零散分布。

说起造手榴弹,现在是一种极简单的工艺,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且不说没有设备,在我们200多人中,连个会翻砂的都没有。我们从宛平农村请来两个铸犁铧的老乡,一个叫杨文广,一个叫杨文茂,负责翻砂,但他们不算军人,穿便服,打仗时不与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最难过的是炸药关。1939年以前,药的主要原料是油甜炸药(类似芝麻糖,用油纸包着)、苦味酸、梯恩梯和硝酸铵四种,这四种药放在一起,力量虽然很大,但杀伤力却不理想,原因是爆炸以后弹片几乎破碎成大米似的颗粒。1939年下半年,我们改用了自己研制的炸药,即“黑炸药”。其中原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硝二磺三木炭”,这三种原料的功能是:“硝响磺炸炭引火”。我们把买来的硝经过熬制,去盐去卤,磺也经过熬制去除石头,木炭是自己烧。仅木炭这一项我们就试验过若干次。经过反复比较,认定了一种最理想的“栾荆炭”。用这三种原料制成的黑药,再加上用赤磷、硫化锌、盐铂三种原料配制的拉火药,制出的手榴弹,爆炸力大,弹片大小适中,大大提高了手榴弹的杀伤力。开始由于技术不熟练,尽管昼夜不停地干,一昼夜才生产二三百枚手榴弹、地雷,后提高到500枚。随着技术的提高,两年后产量提高到一昼夜生产1000枚的水平。尽管如此,仍然是供不应求。每天运送武器的民工和牲畜不得不排队,当时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先供应冀东和平北的,再供应平西部队和地方武装(兵工厂的供应范围是平西、平北、冀东、冀中)。

平西兵工厂的建立,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特别是平西抗战的顺利进行。众所周知,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武器装备明显劣于敌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自制的手榴弹。以蓬头战役为例,当时我平西七团在蓬头与日军遭遇,日寇凭着强大兵力和先进武器把七团逼到山上,我七团官兵虽然每人都有一支枪但子弹却有限,最后硬是用手榴弹把敌人打退了。可以这样说,手榴弹是我军的主要武器。日军也最怕我们的手榴弹,一提中国的手提炮(日军称手榴弹为手提炮),他们就胆战心惊。

有一件事现在回忆起来十分有趣,那就是所谓的“兵工厂汉奸”事件。一次一个连的日军从范各庄路过,被我七团阻击。战斗打响后,我军战士一个劲地向敌人甩手榴弹,但却听不到动静。结果敌人秋毫无损,乖乖地被放跑了。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在那种特殊年代,兵工厂制造不爆炸的手榴弹,肯定是出了汉奸。那段时间,人人心里都防贼似的。为了把事情原委搞清,我们决定到战场将没爆的手榴弹捡回来检查试验。捡回来一看,手榴弹还都是新的。再一试验,100支手榴弹炸了99支。一了解才知道,当时参战的都是一伙新兵,根本没来得及训练就参加了战斗。他们把不拉弦的手榴弹甩出去,怎么能响呢?真相大白,我们的汉奸帽子也摘掉了。

兵工厂虽然是后方工作,但同样是战场,危险系数同样很大。稍有不慎,炸药就着,另外产品的试验本身就是一种冒险。1942年是我厂最痛苦的一年。这一年厂长何鸣岐在刘家河(刘家河是1941年从芦子水分过去的炸弹车间)的山间烧文件引起炸药爆炸被轰到山下牺牲了;后来的厂长兼工物员(工程师)白贵云在试验炮弹的过程中也牺牲了;一次车间不慎失火又牺牲3人,伤3人;其中我的入党介绍人李来科也牺牲了。每一想起这些,我这个幸存者的心里就十分难过。

平西兵工厂曾经出现过一次战略大转移。那是1940年,日军集中兵力对平西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

为了保存实力，使兵工厂免遭破坏，我们奉命向陕北延安转移。经过一番坚壁清野，大约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左右，我们经涑水的紫石口、苗树到安北，与十一军分区司令部会合在一起。中午将要开饭时，敌人开始向我们打炮。我们顾不上吃饭就在肖克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饿着肚子出发了。一路山道，经易县的黄土台、塔峪、摩天岭到山西的阴家沟、王安镇、榆次、柳叶沟，最后进入陕西。当我们到达陕西的枣树台时，接到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打回老家去，进行反扫荡”。于是我们又掉头往回返，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41年的春节我们又回到了芦子水。芦子水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归来，他们在门上贴上对联，上联是：八路军好像茫茫草，敌人来了他就跑；下联是：八路军好像割不倒的柴，敌人跑了他就来；横披是：维持治安。遗憾的是，原来坚壁的设备、材料都被汉奸领着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着手反奸反特，其中一个汉奸头子在芦子水群众大会上被我们镇压。接着又着手兵工厂的恢复工作。我们把翻砂、木工车间留在芦子水，其余两个车间迁到刘家沟，做为芦子水的分厂。

194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平西芦子水村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房良两县解放初期剿匪肃特斗争概况

王凤奎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解放后，潜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党特分子不甘心其失败，纠合各种反动势力为匪作乱，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房山、良乡两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贯彻上级指示，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剿匪肃特斗争。

历史背景

解放前的房山、良乡两县，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三青团、军警、特务、道会门等反动组织已形成势力。国民党大乡长以上政府官员132人，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骨干256人，三青团分队长以上骨干72人，警察局警长以上骨干95人，各种特务组织共有特务及外围分子1087人，保安团、队排长以上骨干299人。他们濒临末日，经常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特别是乘我土改之机，造谣惑众，策动地、富分子逃往敌区，组织还乡团，煽动叛乱，气焰十分嚣张。1948年12月，房、良两县宣告解放后，两县公安局遵照河北省委指示，首先把工作中心放在打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上，并及时采取了措施。如制定了治安公约十一条；号召国民党旧组织人员登记，交出物资和枪支；与部队配合，坚决彻底歼灭了准备逃往山西和绥远的武装股匪，对两县的土匪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平津解放后，我大军南下，匪特活动抬头。1949年4月后，潜藏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和各种反动势力活动逐渐猖獗。一是原伪房山县保安团少校团副尤茂志、军统特务组长毛长福，以及国民党师长郑祖尧，暗地网罗部下，扩充实力；二是弃城逃跑的张德祥及其残部仍流散平津地区，勾结地主以及封建道会门头子造谣惑众，行抢路劫，凶杀暗害，扰乱社会秩序；三是王凤岗部下第一旅旅长谢大千、团长石友等数十人也不时

流窜到房、良一带，携带武器伺机作恶。房山县山边一带及县城附近，7、8、9三个月共发生案件30起52人次，共死6人、伤2人。1949年6月，两县分别成立剿匪指挥部，开始了剿匪肃特斗争。

特匪种类及活动方式

1. 匪特种类从其性质上可分为两种。

(1) 政治土匪。专事破坏铁路、电线，袭击民兵，杀人抢劫，扰乱机关等活动。为首者多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党特分子，其成员有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反动地主富农、会道门头子及惯匪等，形成了匪特在组织上的合一。

如，王凤岗原部下旅长谢大千、石友一伙，号称“九路军”，共分5股，活动在北京至河北省新城县之间。他们携带长短枪支，一二人至三五人一伙，化装成商人、农民模样，于要道两旁、集贸市场等地抢劫民财，破坏通信线路，扰乱社会秩序。其中活动在房山县娄子水、上方山的一股约40人。他们联合反动会道门、反动地主富农，冒充“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反动宣传，暗中与国民党九十四军特务习振林、河北省涿县守护十团张聘三等人勾结进行破坏活动。仅1949年4月至7月间就作案27起。

另有五种政治性的反动组织，分布在房、良两县，秘密组织土匪武装，并于1950年7月后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

①以赵中祥(涿县王户村人)、贾云亭(涿县沿家村人)、朱银为首的“忠义救国军”分布在涿县、石窝至芦村一条线上，秘密组织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在石窝、南韩继一带组织两个连。

②以许振江、苏志超、陈工福为首的“中国救国队”活动在北京至良乡、房山至石窝、羊耳峪至赵各庄等地，已有土匪1523人。

③以涿县张起为首的反反动道会门“燕常英雄会”，以上方山为据点，下设8个分会，进行反动破坏活动。

④以李元、刘福为首的收缘道(一贯道的化形)，活动在羊头岗至芦村一带，有时公开活动，对付政府的中心工作。仅羊头岗一个村就有道徒143人。

⑤1950年7月中旬，伪县长高清、常玉和国民党一个军长、一个师长来到北京，派马德福等2人来涿县、房山县组织“和平建国救国军”，6月至7月间开始在长沟、曹章一带活动，并有暴动性计划。

(2) 零星散匪。其成员主要是惯匪、流氓、散兵，多系盗匪。1949年青纱帐起至1950年3月中旬房山县所捕获的38名土匪中，不务正业者16名，占42%，多数属抢劫自行车、盗窃牲畜等财物案。这类土匪对生产和社会治安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2. 匪特活动方式及罪行：

(1) 昼伏夜出，城乡跳跃，异地作案，分散隐藏。他们白天隐藏于城市或青纱帐内，夜间袭扰机关、村庄或住户，制造谣言，杀害革命干部、民兵，抢夺枪支和交通工具。入秋，青纱帐倒后，各地匪特活动多为分散隐蔽，伺机破坏。1950年7至8月间，以胡同为首号称“忠义救国军”的一股13人，以谢大千、崔昌清为首的一股5人，以赵洪元为首的一股15人，以常玉、高清为首的马德福股匪28人，共4股61人在房山、良乡、涿县一带频繁活动，秘密串联，发展土匪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并扬言要和共产党公开干。7月10日在房山县长沟和曹章两村交叉路口杀害我公安队员张国印，抢走冲锋枪1支、子弹30发。7月14日抢劫我周口店公私合营灰窑人民币19686450元(折合现在人民币1968元6角4分)。8月2日晚，马德福股匪4人携枪窜到石楼村抢民兵中队长刘贵的枪(未逞)，我方被敌手榴弹炸伤1人。8月9日夜，马德福股匪高树林等6人袭击南河村民兵中队长张国仁、副支书丁福玲、村长杨显堂，抢走步枪3支、子弹104发，后潜伏到涿县。匪特的猖狂活动，给各项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2)与反动道会门等反动势力相勾结，利用迷信活动进行反动宣传，发展土匪组织，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台湾当局派遣大批特务深入大陆，利用各种反动会道门及匪特分子制造谣言，扰乱民心。房、良两县地处北京周围，情况更为复杂。如三区南尚乐村发现个别地富分子暗中向农民收租。二区下滩村一农民不敢要人民政府分给的土地。南窖村慈善会头子杜××拉拢被斗地主和少数落后群众经常开会，烧香念佛，挑拨我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良乡城内同善社社长刘方武(地主)在4月20日说：“窝窝头，就咸菜，别忘了买公债，吃青菜啃树皮，别忘了毛主席”，以此分裂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党的政策。

对策措施

解放初期，房、良两县的剿匪斗争，是在两县县委、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公安机关和地方武装配合，协同作战，追剿国民党部队残匪。1949年2至3月间，把企图逃往山西和绥远的武装匪军4股207人全部歼灭。同时，进行了收缴枪支和流亡分子登记处理工作。初步平息了国民党散兵游勇、逃亡地主、还乡人员的骚扰破坏，使社会秩序渐趋平稳。

1949年4月后，随着我大军南下，潜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匪特互相勾结，破坏活动日趋猖狂。1949年6月，房、良两县分别成立剿匪指挥部，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

1. 全党动手，全民动员。

房、良两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贯彻了“政治瓦解、军事清剿与侦察破案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治保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保证了剿匪肃特斗争的有力进行。

1949年6月，两县县委分别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布置剿匪工作，并相继成立了剿匪委员会。3月1日至12月10日，房山县共捕获匪特106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六〇炮两门，冲锋枪5支，步枪39支，手枪7支，撅子枪2支，六〇炮弹6发，手榴弹39枚，子弹5000余发(不包括部队缴获部分)。

1950年4月，房山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和县武装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区有计划地实施重点清剿。当月，确定大韩继至娄子水、曹章至长沟、芦村至坨里一带为剿匪重点区，抽调公武干部27人组成3个工作组，加强重点区工作。同时，与涿县、良乡县公安局结合，成立了三县公安局长委员会。在三县交界地区建立联防组织3个，在本县区与区、小区与小区之间建立联防组织19个。良乡县公安局与武装部结合，在总结五月份剿匪肃特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青纱帐期间匪特活动的特点，提出新的要求：第一、要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生产和剿匪相结合；第二，宣传党的政策，最大限度地瓦解敌人；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组织；第四，加强县、区联防组织建设，首先完成与房山、涿县、大兴、长辛店之间5个联防组织的建设；第五，组成5个武装工作队，分别到一、二、三、四区和良乡镇开展工作。

1951年，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一些潜逃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会道门头子，纠集蒙蔽一般顽伪人员，又形成新的股匪。当时在房山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潜逃的20余名反革命分子聚成土匪三股：①以纪德才(马德福股匪“河北人民自卫军”组织成员)为首的一股5人，带枪支潜伏在房、良、涿三县；②以霍孝昌(叛徒)为首的一股10余人，跑到上方山一带潜伏；③以邵振海(伪保长)为首的一股5人潜入长沟峪一带。为了加强对清剿工作的领导，房山县清剿办公室与镇压反革命办公室合署办公，统一行动。6月16日，通、保两军区在房山城召开房、良、涿三县公武干部会议，成立了联合指挥部，组成4个武装工作队，分别深入房山四区黄山店、房涿结合部曹章一线、房良结合部琉璃河、豆店等重点区村，结合护麦工作侦察敌情，进行抗美援朝教育，发动群众控告检举匪特活动，不给匪特立脚之地。此种形势之下，匪首纪德才化装潜逃；霍孝昌在我民兵围剿中坠崖身亡；邵振海向北京一带逃窜。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剿匪斗争的不断深入，匪特活动方式又不得不转入隐蔽和分散。

1952年“三反”开始后,两县公安局在已发现土匪案件和掌握土匪线索的地区全面展开侦查破案工作,集中兵力一举剿灭;未发现土匪案件和线索的地区,则对过去的残匪逐个查明情况,对确实不再活动者,加强劳动改造和监控工作。

2. 瓦解敌人,壮大自己。

房、良两县公安局在剿匪斗争中坚决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发动群众“剜匪之眼,刨匪之根”的方法。主要做法是:①对成股持枪流窜作案的匪特,以武装清剿为主。②对镇反中潜逃的反革命分子和用威胁恐吓手段纠合一般顽伪人员新结伙成匪的,则以政治斗争为主,深入宣传党的政策,通过匪属及其亲友做争取工作,促使其改过自新,帮助政府缉拿匪首。如1950年3月,房山县公安局利用土匪亲属提供的地址抓获土匪侯振华;使用土匪朱××抓获土匪赵甫云。1952年利用土匪家属破获冯绍堂股匪案等。③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广泛进行防匪反特教育,发动群众制定治安公约,检举潜匪。1950年11月,房山县公安局根据匪特常常利用反动会道门公开活动的特点,全面开展了对各种道会门调查摸底工作。于12月抽调22名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首先在县城南关、大小洪寺、羊头岗3个重点村开展了取缔道会门工作。至1951年2月,房良两县逮捕道首41名,集训道首119名。至1952年11月下旬,房山县182个村,除新区7个村外,其余175个村均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289名,委员719名,加强了治安保卫力量。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房、良两县公安局共对338个村的608名公安员和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2至3月,房良两县公安局根据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和专区公安处的指示,对各村的管制工作进行了检查。经查,255个村被管制的737名人员中,应撤销管制的共500名,应继续管制的共237名。纠正了管制工作中的问题,达到了分化瓦解敌人之目的,有力地配合了剿匪斗争的胜利进行。

至1952年10月后,两县虽然仍有零星土匪活动,但多系镇压反革命中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流氓惯匪等单个作案。此类案件,结合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出处理。至此,两县清剿匪特任务基本完成。

主要战果

房、良两县解放初期的剿匪肃特斗争,经过广大军民和公安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以及邻县的密切配合,取得了重大战果。破获的主要案件有:

1949年7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以北良各庄村伊寿臣为首的利用“慈善会”做掩护,冒充“共产主义小组”而暗中与原国民党九十四军特务习振林、河北省涿县守护团张聘三相勾结的土匪活动案。

12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活动在北京至新城之间属原国民党保安第一旅旅长谢大千领导的号称“九路军”股匪案,逮捕土匪12名,匪首郭友祥被擒。

1950年3月,良乡县公安局破获以李瑞明、李瑞才、杨起、许庭为首的股匪案,4名匪首被抓获。7月,房山县公安局会同良乡、涿县公安局,破获以涿县张起为首的反反动道会门“天恩燕常英雄会”案,抓获主要案犯张起等8人,缴获“燕常领袖名册”、“开天要录”等5本,开天印1枚,功过簿2本及会员名册等。

8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1950年1月23日县税务局会计员康淮被杀、枪支与税款被抢案;7月10日县公安局公安队队员张国印被杀、枪支被抢案;7月14日市清管局周口店灰窑现金和物资被抢案。以上三案案犯刘甫全、赵洪元、李允武、刘善全部被抓获。

9月,房山县公安局配合北京市公安局破获“河北省人民自卫军”案,马德福等19名案犯被擒。

12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兰衣社”,逮捕案犯杜腾云、胡兆年、芦耀宗、赵玉良。

同月,良乡县公安局破获以高岩为首的“九路军”股匪案,匪首高岩被抓获。

1951年2月，在河北省公安厅和通县、保定专区公安处领导下，房山、良乡、涿县、固安4县公安局和通县、保定专区公安处联合成立侦破“九宫道暴乱案”指挥小组，房、良两县公安局积极配合，侦破此案，逮捕朱锡华等首要分子共23名。

6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1949年7月13日夜琉璃河水泥厂周口店采石场被抢劫案和同年8月16日李庄村西两商人被抢劫案，抓获武装匪特3名。

同月，在通县专区公安处指挥下，房山、良乡、涿县公安局破获“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反动组织，陈士新等20名反革命分子被逮捕。

8月，良乡县公安局破获反动组织“救国会”，首要分子郑祖尧、刘春、朱宪章被逮捕。

1952年4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以周德全、冯绍堂为首的股匪案，逮捕匪首4名，缴获自制手枪3支、子弹30发、手榴弹1枚及制枪工具等。

典型案例

1950年，房山县接连遭到匪特的骚扰破坏。继1月23日房山县税务局会计康淮同志被枪杀之后，7月10日，房山县公安队员张国印同志又惨遭枪杀。接着，7月14日，市人民政府清理财产管理局周口店灰窑又被抢劫。

为了加强对以上三案的侦破工作，房山县公安局组成了侦破工作小组，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和武装匪特相继进行抢劫、枪杀、破坏活动的特点，分析认为三个案件很可能是一伙股匪所为，是带有政治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据此，一方面派出8名公安干部分赴12个相关村，结合护麦工作全面调查了解案情；一方面以周口店灰窑为突破口进行重点突击，查寻匪特下落。根据群众反映和我方秘密关系报告的情况，很快发现赵洪元、李允武、刘善、刘福全、李银亭为重大嫌疑。与此同时，周口店灰窑案也有突破。本案的直接参与者、为马德福股匪提供灰窑目标的赵春山（周口店税务所所长）迫于我强大攻势的压力，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被我公安机关重新派入马匪内部。按照赵春山提供的情报，8月20日，在北京西河沿九道湾三福旅馆将赵洪元、李允武、刘福全、刘善抓获，缴获手枪1支、冲锋枪1支、子弹20发。经审讯，三个案件真相大白：

①1948年12月，伪军出身的赵洪元携带十四式手枪潜回洪寺村，1949年12月与李允武秘密勾结在一起，寻找机会抢劫作案。1950年1月23日，二匪趁我房山县税务局会计康淮收税后返回县城之机，佯装卖香火的小贩，在洪寺村西山路上迎向康淮同志，当康淮检查李允武税票时被赵洪元从背后一枪打死，抢走金钩枪1支，子弹30发，税票100余张，税款1550000元（折合现在人民币155元）。

②1950年7月10日，李银亭、刘福全奉马匪德福之命，携带枪支，去长沟刺探剿匪工作组的情报，寻机进行武装骚扰。二匪在长沟发现房山县公安队员张国印同志只身一人背着冲锋枪离开这里时，便相互示意尾随。行至长沟与曹章的叉路口，李匪趁四面无人便扑向张国印同志。此时，刘匪趁二人扭打之机从后面将张国印同志一枪打死，抢得冲锋枪1支、子弹30发。

③1950年7月14日，武装匪特李银亭按照叛徒赵春山提供的情报，找到刘福全、张海山、任连坡、任连水，携带冲锋枪1支、手枪1支、手榴弹1枚等凶器，窜至市清管局周口店灰窑，佯装查户口骗开房门，抢得现金19686450元（折合现在人民币1968.65元）以及布匹、面粉等物，后又分散潜伏。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原房山公安分局干部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回顾

宋 湘

解放初期匪盗猖獗

1948年12月13、14日,良乡、房山两县全境解放,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春起,开始了新区土地改革。翻身农民渴望从此安居乐业。但是,同全国各地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十分猖獗,疯狂进行破坏活动。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初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撤到房、良两县接受改编。少数官兵企图负隅顽抗。2月下旬,伪35军两个排在磁家务一带哗变逃窜,伪暂三军100余人从周口店窜至南窖一带,伪94军200余人企图从房山窜入山西、绥远。这些逃窜伪军均被我解放军、地方公安部队、民兵武力歼灭。

1949年夏,伪王凤岗保安第一旅旅长谢大千纠合溃散伪军(多系原房、良地区伪军)组成“九路军”,活动于北京、良乡、新城之间,进行路劫、暗杀、割电线等破坏活动。1948年底至1949年6月,房山县发案30余起,干部、群众被杀死6人,杀伤2人;良乡县发案31起,干部、群众被杀死12人。

1950年初,伪房山县县长常玉指使伪房山县保安大队长马德福、尤茂志组成“河北省人民自卫军”,疯狂进行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策划、煽动了南河村民兵中队队长丁福旺等人携枪叛变。他们深夜摸进房山县城企图劫狱,“营救”已被关押的房山县伪军头子张德祥。1950年1月,匪徒赵洪元在山顶庙(今称卧虎山)后山路上枪杀了从长沟峪收取税款后回房山的县税务局干部康淮。1950年7月10日,匪徒刘甫全、李银亭在曹章村南枪杀了县公安队员张国印。

1950年1月,匪首胡同、谢德芳、朱银组织“忠义救国军”,秘密集会,收集武器,待机暴动,公开造谣煽动破坏征粮工作。

1950年6月,侦查发现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房山发展10余人;石楼村杜腾云任大队长,经常秘密集会,收集枪支,待机暴动。

1950年3月,良乡县公安局破获了以李瑞明、李瑞才为首的14人惯匪集团。他们在良乡地区杀害无辜群众、拦路抢劫钱财多起。

反动道会门也乘机兴风作浪。1949年7月,房山县公安局破获了北良各庄村伊寿臣为首的正字慈善会,冒充“共产主义小组”,与国民党94军特务习振林、河北省涿县守护十团张聘三等人勾结,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案。1950年5月,公安机关破获了张起为首组织的反动道会门“天恩燕常英雄会”。1950年,东良各庄村朱锡华、朱锡龄、朱贵,良乡城内张云波等为首的“九宫道”,活动于房、良、涿、固四县;芦村加恩、加瑞、加振东为首的“九宫道”,活动于北京、良乡、房山地区;他们都在密谋反革命武装暴乱。反动道会门在密谋武装暴乱的同时,还大肆造谣煽动,蛊惑人心。“闹拍花的,专门拐骗小孩,挖心,割生殖器”的流言在房、良两县农村广泛传播,造成人心惶惶,家家封窗堵门。后来查明,都是反动道会门制造的谣言,或深夜翻穿皮袄流窜街头,制造假象,惑乱人心。

解放初期,国际国内敌我斗争形势极其尖锐,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重考验。

清剿土匪斗争

1949年4月25日，中央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土匪斗争。房、良两县根据河北省委、通县专区地委统一部署，依照“政治瓦解，军事清剿，侦察破案”三结合的原则，1949年6月分别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房山崔洛春，良乡霍梁）为总指挥的“清剿土匪指挥部”（1950年初改称“清剿土匪委员会”），各区也相继成立了清剿土匪指挥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剿匪斗争。房山县由公安局、武装部抽调29名干部、4名战士，组成4个工作队；抽县公安队58人，武装民兵697人，非武装民兵820人，长枪722支，机枪10挺，深入土匪经常出没的大韩继至娄子水、曹章至长沟、芦村至坨里、南尚乐“南五村”等地开展剿匪斗争。良乡县组织干部108人，民兵700余人，以良乡城、豆店、琉璃河为重点地区，开展剿匪斗争。从1949年至1950年底，两县先后歼灭了“九路军”“河北省人民自卫军”“兰衣社”“天恩燕常英雄会”4股土匪武装，缴获60炮3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冲锋枪6支，长枪22支，手枪1支，手榴弹253枚。为镇反运动打下了有力基础，揭开了镇反运动的序幕！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房、良两县根据省、地部署，开始侦破反革命案件和反动道会门案件，逮捕、判处了一批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0年3月31日，房山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并执行原霞云岭地区土匪头子、汉奸、反革命杀人犯杨天沛死刑。这是房山解放后“法字第1号”（布告）死刑案件。同年9月21日，执行了房山县伪军头子、反革命杀人犯张德祥和日伪房山县汉奸特务队长、反革命杀人犯王兰亭死刑。1950年3月，良乡县执行了惯匪集团首犯李瑞明、李瑞才、许庭、杨起死刑。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有不少干部和党委，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此后不久，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镇反斗争的方针、政策、主要对象、量刑标准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镇反”从此形成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从1950年10月持续到1953年9月，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地部署，房、良两县于1950年11月分别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房山崔洛春，良乡霍梁）、县长（房山杜恩霖，良乡闫振峰）、公安局长（房山张林，良乡杨怀清）及法院副院长（当时县长兼法院院长）、组织部长5人组成的保卫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全县镇反运动，研究审核反革命案件。同时，两县县委分别发出《关于具体执行地委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的决定》。

此后，两县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宣传发动群众。宣传镇反与宣传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结合起来。各村宣传骨干及中小学生以屋顶广播、黑板报、街头演唱、组织剧团演现代戏等多种形式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公安机关继续派员深入基层，以公开发动群众控诉、检举、揭发与秘密侦查相结合的方法，大力侦破反革命案件。一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镇反运动高潮在两县城乡形成。

1951年1月16日夜，根据通县专署公安处统一行动命令，两县抽调干部（房山51人，良乡32人）分工

到村,在基层党组织和基干民兵配合下,一举逮捕反动道首41名(房山21人,良乡20人)。又以5天时间在县城集训中小道首104人(房山56人,良乡48人)。

1951年3月1日、4月7日,两县又根据专区公安处统一行动命令,成批逮捕反革命分子。3月1日逮捕122人(房山68人,良乡54人),4月7日逮捕213人(房山125人,良乡88人)。

1951年3月,两县清剿土匪委员会及办公室分别与保卫委员会、镇反办公室合并,统一领导镇反运动和突审反革命案件工作。

从1950年11月以后,两县陆续对捕获的反革命分子判处徒刑或执行死刑。如房山县1950年12月8日将持枪叛变的南河村民兵中队长丁福旺等3人枪决,1951年3月将“兰衣社”股匪头子杜腾云等2人枪决。良乡县1950年12月将“九路军”匪首高岩、李洪宾枪决。

为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两县于1951年4月25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通过要求上级批准成批处决反革命分子决议。1951年4月27日,通县专署统一部署,房、良两县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成批宣判处决反革命分子。房山处决49名(城关26名,周口店20名,张坊3名),良乡处决27名。

1951年8月8日,两县又一次统一行动,成批宣判处决。房山县在一、二、三、四、五区分设5个会场,宣判2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执行死刑9名。此外,还零星处决了一些。

第二阶段 1951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4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发出镇反运动“补一环”的指示。两县分别作出在镇反不彻底的区、村进一步深入镇反的决定,制定了抓捕计划。

1951年12月2日统一行动,两县又成批逮捕反革命分子45人(房山31人,良乡14人)。同时,继续抓紧审理、判决反革命案件。

与镇反运动同时,1952年还开展了机关“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私营工商业“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第三阶段 1952年11月,中央发出“把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一切不彻底的地区和一切不彻底的方面都进行彻底”的指示,同时召开了第5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两县分别制定了继续镇压反革命计划。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1)继续抓捕一批反革命分子(1953年5月良乡县逮捕10人)。(2)清理案件(抓紧审判处理)。(3)建立健全乡村治保组织,分批培训公安员和基层治保干部。(4)对放到群众中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检查,纠正漏管、错管问题。1953年9月,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两县分别写出了三年来镇反运动总结。

从解放初期开始的清剿土匪斗争到1953年9月镇反运动结束,经历了5年时间;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镇反运动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经历了3年时间。三年中房山县共逮捕反革命犯450名,其中土匪76名,恶霸91名,特务79名,伪党团骨干78名,反动道首29名,其他血债分子97名;共判处死刑96名,其中土匪21名,恶霸16名,特务14名,伪党团骨干30名,反动道首1名,其他血债分子14名。

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敌对阶级的残余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社会治安秩序大大好转,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有力地保卫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迎接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后记:回顾房、良两县第一次镇反运动,本应写出原房、良两县三年运动逮捕及判处各类刑罚的统计数字。由于史料不足,笔者虽经努力搜寻,终未能获全面数字。盼有识人士来日补正。

解放战争琐忆

张本荣 口述 温志银 整理

鲜血捍卫土改工作队

1947年，房山县五区区委书记杨树清、区青年委员刘贤在我的家乡北窖村搞土地复查工作。我当时正在专区的一个煤矿工作，也被调到这个工作队。村里的土改主要靠贫农团，工作队领导只是我们三个人，区委书记杨树清是工作组组长。我们三人住在两处：他们两人住在一个民宅，我一个人住在小学校。

在土地复查工作期间，几个月我们都是日日夜夜的工作，搞得非常疲劳。当复查工作基本结束时，这一天，我们算是睡的比较早的一天。已是深夜了，我刚刚睡熟，约在夜里3点左右，“叭”一声枪响把我惊醒了。我觉得不好，跟着枪声四起。我来不及穿鞋，抱着衣服跑了出去。这时学校前边的小山头上，敌人架着一挺机枪，把学校前门封锁了。我只得从后边跑出去。我刚跑出学校，敌人就端着刺刀跳墙冲进校堂，从学校后面追赶下去。凭着路熟，又赶上天下着小雨，我终于跑出村子爬上一个小山坡，不慎又蹬滑了一块石头。敌人发现有动静，向我连打数枪。我险些被击中，不敢再站着走，左卧式爬出三里路远，钻进了一煤窑洞口。一个钟头后，枪声渐渐的停了下来，敌人撤走了。

我回到村里后，才知道在这次脱险过程中，民兵李春河、孔祥秀、李振汉、牛有才、申克义为保护工作组，掩护乡亲转移，已光荣牺牲。小学教员孔繁照听到有情况，急忙返回学校给我送信，被杀害在学校。我走到孔繁照被杀的遗体前，被惊呆了。他在与敌人搏斗，双手夺刺刀时，五指被割下，鲜血淋漓，敌人的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他是为我的安全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面对烈士们的遗体，我以泪洗面，当众发誓，要为死难者报仇，不让烈士的血白流。当我正在惆怅区委书记杨树清的下落时，忽然得到了从花港村送来的消息，区委书记杨树清同志安全脱险了。这个喜讯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在掩埋烈士尸体的同时，总结了这次被敌人突袭的教训。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土改工作队和村农会为了瓦解敌人，派敌伪骨干孔凡贵和杜甫堂的两个亲属，去房山伪大队做说服感化工作，让他们弃暗投明。由民兵队长从村东大岭一个雷区缺口把俩人送出去。谁知这两人在敌伪县大队头头的逼迫下，反而当了敌人的向导。由孔凡贵带着500多敌人，于夜间悄悄地来到北窖村，目标是把土改工作队和村干部全部抓走，带回房山。可他们也没有料到，敌伪军首先暴露了目标，在民兵的英勇还击下，阴谋没有得逞。

南宫村征粮脱险记

1948年农历八月的一天，良乡县县佐王蕴新在河北小学校召开支前工作会议，决定去丰台征集军粮。会上对已组织好的上千人的征粮队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吃完晚饭启程。同时，解放军的一个独立团在良乡执行破交（破坏敌人交通）任务，也一起出发。为确保征粮工作与部队破交任务同步进行，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征粮任务，因此没来得及吃晚饭就出发了。

我和刘增宽、杨海全、王文玉、梁福才被编为一个征粮组，带领200多人和200多头牲口，还有两个班的民兵负责保卫工作。由杨海全负责指挥两个班的民兵，其余四个人组织征粮。我们这个组的征粮地点是现

在丰台的南宫村。当时征粮的运力主要是牲口驮。大队人马抄近路向目的地进发。夜很静，除不时听到几声狗叫之外，就是人们急促的脚步声和鞭打毛驴声。午夜时分，我们已接近南宫村。根据掌握的情报，当时敌伪军在王佐村一个堡垒驻有百余人，因怕八路军袭击，每天总是白天驻守，晚上撤到盆子坑去住，所以征粮按原计划进行。

征粮队伍刚进村，突听“叭叭叭”一阵机枪声响起来。我们马上意识到情况有变化。因为我们征粮队伍都是民兵，没有机枪，肯定是敌人掌握了我们的行动，给敌人送了信，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几个征粮干部迅速凑到一起商量对策，决定涉险强行征粮。由杨海全组织民兵，把命令布置下去，监视敌人。刘增宽、王文玉、梁福才我们四人各带一拨人马分头行动，征到粮食后迅速撤到约定的地点集合。强行征粮的方法是打破以往征粮由伪保长将粮食征齐，我们再运回的常规。现在已找不到伪保长了，只能自己下手。凡是青堂丽舍深宅大院的富贵人家，向他们讲明政策，打开粮仓装上就走。当我征好粮食准备撤退时才发现，出村的路口已被敌人封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村外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原来八路军独立团得知征粮队伍被包围，立即派一个排的兵力前来支援。敌伪遇到正规军，也不知多少兵力，一阵激战后，很快就被阻击回去了。我们征粮队伍在八路军一个排的掩护下胜利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回忆解放战争二三事

马良民 口述 栗景鸿 整理

1946年6月13日，我和良乡一区区长谭天瑞、教育助理刘德广、青年干部任成积、李万会五人来到羊圈头村征收军粮，顺便了解一下敌人的动向(羊圈头村当时处在敌我双方争夺地带)。

中午，我们五人在村里吃完饭，准备再去后甫营村开展工作。刚走出羊圈头村外不远，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麦地里有二、三十穿着黄军装的还乡团，正向我们走来。情况紧急，但我们都很镇定。谭区长命令在敌人尚未发现我们前立即撤回村里。就在我们往回返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一时枪声大作，夹杂着喊叫声。

我们迅速撤到村西的一拐角处，没想到对面又遇上另一股敌人，有五、六个。敌人一面向我们开枪，一面大喊：“站住！”我们还了几枪后，立刻散开隐蔽。我跳进旁边的一个院子，又从院子里翻过另一边墙头，隐蔽在一条大沟里。刘德广也随我冲了出来。谭区长被村民李印堂的母亲藏在一个干草棚里，没被敌人发现。李万会跑到村北的山上。而任成积同志不幸中弹牺牲。由于敌人也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没有敢在村里逗留搜查，就赶紧离开了羊圈头村。我们四人脱离了危险。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上万村的郭家坟，分析这次被敌人包围很可能是有人送了情报，不然敌人不会这么快有组织地分两路进村。

任成积同志的遗体还在羊圈头村。当天晚上谭区长派人到羊圈头村买了口棺材，将任成积同志的遗体入殓后，抬到北上万村东河滩边上放了一天。后由曹叔成等人将烈士遗体护送到他的老家。

1948年夏的一天，分区司令部四名侦察员和两名区武工队员(一个是北岗洼村的王俊臣，一个是李各庄村的段茂玉)，为了了解敌情，从郭家坟出发，来到羊圈头村。当天，我去后甫营村催公粮，比他们晚些也

从郭家坟出来。路过羊圈头村时，几个侦察员看见我，便告诉我说后甫营村有国民党 208 师的青年军在活动。我听说后甫营有敌人，便决定返回郭家坟。刚走出羊圈头村西口，就传来一阵枪声，原来敌人这时已来到羊圈头村了。我赶紧顺着村西跑出了羊圈头村，回到郭家坟。后来知道，在这次与敌人遭遇过程中，司令部的四位侦察员都被俘，段茂玉也受伤被俘，只有王俊臣一人冲了出来。这次遭遇战给我方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948 年夏，正是杏黄的时候，我和区武工队及部分区干部共四十多人来到敌我交界的晓幼营村，当时武工队长是乔明玉。

我们吃完中午饭正在休息时，房东赵生的妻子从外面跑回来，告诉我们说，她给家里人送饭时，发现有一百多还乡团往村北坡去了，这时恐怕已把村子包围了。

乔明玉听完，跟我商量，认为敌人奔村北，我们应立即从村子西边冲出去。于是便紧急集合队伍出了村西口。这时从村北的山坡上传来了枪声。我们一边还枪，一边撤退。乔明玉亲自从蒋士芳手中接过机枪向敌人射击。冲出村摆脱敌人后，撤到北上万村。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卫生员杨万水（南窖人），其余同志都平安，无人受伤。

后来知道，卫生员杨万水在突围时掉了队。当时他急中生智，将所带卫生箱等物藏在玉米地里，装作老百姓。敌人发现了他，盘问他时，他假称自己是去北车营卖杏的过路人，躲过敌人的盘查后，返回了部队。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房山县国民党组织的诞生与发展简述

张玉泉

房山县的国民党组织始建于 1928 年 8 月。它三起三落，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直至房山解放，国民党组织瓦解。

—

1928 年 8 月，在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任指导委员的殷景春（本县河北镇东庄子村人），联合在省党部工作的刘鼎臣（本县坨里镇上万村人）、高均（本县城关地区田各庄村人），还有张印溪、张守山等发起在房山县发展国民党党员，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房山县分部的工作。殷景春回到房山首先介绍了当时任地方自治区第六区区董事的李仲三加入了国民党。并要求他回房山后大力发展组织。提出只要够七人以上即可成立国民党房山分部。

李仲三秉承上级旨意，积极做发展工作。同年 9 月间，他先后介绍了孤山口村的许仲英，岳各庄村的张玉峰，大次洛村的李秀成，石楼村的郭继武（小学教师），新街村的王量臣，新庄村（周口店乡）的马顺文，瓦井村的张筱花、王润生，东周各庄的孔宪江等九人之多。不久就成立了国民党房山县分部。李仲三任常务委员，许仲英、张玉峰为执行委员，其余为普通党员。1928 年 11 月间，李仲三等即赴县里筹备建立农民协会，他任筹委会主任，推举瓦井村的田松亭、石楼村的蒋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报房山县（由董事和县参议会批准）。

1929年初,召开筹备会。委员集中到县里举行农民协会领导班子的推荐会。其推荐结果是,国民党房山县党部的刘鼎臣为县农会的常务委员,张守山、蒋平即为普通委员。实际上农民协会完全操纵在李仲三为首的国民党房山县分部手里。农民协会成立后即下令各区选派三至五个骨干到县党部受训一个星期,为在各区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打基础。

1930年初,李仲三首先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内成立了三个乡农会:即周口店乡农会、石楼乡农会和瓦井乡农会。区农会办公地点在瓦井。区乡农会由李仲三任常务委员,田松亭、王鲁青为委员。当时由于县参议会和董事会的阻挠,房山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和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李仲三以农会的名义在国民党内提出打倒任伯华的口号;当时任伯华为房山县参议会副参议长、第一区董事。

1930年夏,房山县国民党的活动奉命完全停止了。李仲三回本村当小学教员。其余成员也各奔他乡。

二

1931年9月初,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执委会委派张雪纹(河南顺德人)来到房山。先找到周口店的常介甫(他从南方回来)商量在房山重新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原来发展的党员通知他们重新登记。登记的地点设在县教育局。由常介甫、王儒具体办理重新登记的手续。直到1932年初登记完毕。国民党房山县党部即宣告成立。推举常介甫为常务委员,王儒、陈福褚、于思齐均为干事。不久,李仲三又出来成立房山县农会,他任干事长,刘鼎臣任副干事长,李兆庚为副干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国民党组织,扩大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争夺领导权。

到1935年,房山国民党组织又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全县有正式党员190余人。新发展预备党员90多人,未经河北省党部批准,未发党证,不予承认,宣布无效。常介甫去开滦煤矿做工,陈晶三去了陕北榆林军队做事。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陈福褚、李仲三先后跑到保定,被国民党26路军孙连仲部委任为游击队长。李仲三任涿涿房固四县通讯处主任。孙连仲的部队退却后,李仲三又随之逃到郑州。陈东来、周文龙、白秀亭等在房涿涿建立地方军,李仲三曾频繁与其联系。1935年,国民党停止活动后,李仲三便命孔宪江任涿涿房固秘密侦探员,搜集共产党的活动情况,转入秘密活动。

1940年春,李仲三由豫北上任河北民军总部平津工作团的主任。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房山城,房山的国民党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傀儡,先后扶植起项振安、王德裕等为伪房山县县长,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工具。他们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乱杀无辜。直到日本投降,此间顾不上发展国民党组织。

三

1945年日寇投降后,当年九月李仲三从北平派任国民党房山县县党部书记兼伪房山县县长。国民党组织死灰复燃,疯狂开展反共活动。据1945年10月3日中国国民党房山县党部发布“告全县民众书”中载:“曾经中断了八年之余的房山县党部又与房山县父老兄弟姐妹们重新晤面。好啦!日寇无条件投降,你们的大仇已报,党部更生,你们的幸福降临。”文中说,新任李县长仲三兼县党部书记,“为本党忠实同志”,坚决执行“本党主义,为民众为桑梓谋福利”。

李仲三到任一个月中首先接管了伪县政府,恢复了国民党县党部,更新保安队,建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机制。“为发展模范的房山县,光明的房山县,望父老兄弟们与我党政军密切联合”。在两个多月的工作中发

了七份(次)《谨告乡民父老书》，有发还日伪征收的小麦，举发汉奸，免除当年捐税，发展武力保卫治安，搜捕伪县长王德裕及其党羽，建立反共情报网等十多项工作。

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奉令合并，由常玉、赵继长组成统一委员会。次年，党、团员重新登记，共登记1130人，加上原有的党员900多名，共两千余人。解放前夕，不断健全完善国民党及反共机构，建立健全情报网。始终把打击“奸匪”做为国民党后期的工作重点。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抗战时期的一场官司

赵润东

提起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和他的29军132师的大刀片、就地十八滚，无人不晓。而发生在当时房山域内他帮部下打官司一事却鲜为人知。

当年，赵登禹作为132师师长，不仅治军严明，而且爱兵如子，主持正义。他作风正派，对士兵十分和蔼。士兵们有了为难之处，只要将军得知，马上帮助处理。因此，大家都愿跟随他。卫士李竹明就是其中的一个。李竹明出身于房山城南15公里五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八九岁时他就听说赵登禹将军的大名。怀着的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投身赵将军部下。事也凑巧，在全军检阅中，李竹明因精明强干被赵将军选中，当了他的随身护卫。在随将军驻防长辛店时，曾打了一场不小的官司。

一天，李竹明请假探亲获准。临行前，赵登禹将军委派他顺便在家乡房山征兵，以扩充部队。他遵从命令，在房山县署挂起了招兵旗。一些热血青年纷纷报名。而与竹明同村的林海也来房山，见了招兵旗，在院内大声嚷嚷：“李四儿(李竹明乳名)也他妈的招兵，他是一个臭拾粪的，跟他喘什么气？”他这一嚷，给招兵工作造成很坏影响。一些青年持怀疑态度，不敢近前。李竹明得知，就找到林海说明情况。不想，双方发生口角。后来，此事传到五侯村大财主东邢家。东邢家仗着有财有人有势力，待李竹明回家后，竟然对其进行污辱、威胁。李的领章、帽徽也被扯掉在地。后由村中长老出面调和，邢家才勉强答应暂时放李。几天后，李竹明带领几名军人回到村中，不由分说，将邢财主捆绑于大庙前的柏树上，足足教训一顿，粪叉杆被打断两节。这事惊动了左邻右舍，满街筒子人都争着来看热闹。结果，又是村中长老从中解劝才了结此事。

事后，邢财主告官于县署。因当时邢家有钱有势，又有亲戚(当地乡绅)苏士超在县里撑腰，长沟化玉堂药店也连亲带故，出示证明称邢被李致伤残之情况。一时间，官司打得难解难分。李竹明家贫如洗，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怎么能打赢这场官司？赵登禹将军得知此事后，严肃批评了李竹明的过错。但对仗势欺人的残暴行为也十分憎恶。于是他主持正义，亲自出堂代替部下打这场官司。邢家也决非等闲之辈。最后，官司打到南京府。由于赵登禹将军嫉恶如仇，代李出厅，终于使李竹明打赢官司且免除一难。这件事虽然距今近六十年了，但人们提起来，仍对赵将军赞不绝口。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巧俘傅作义残部

蒋士良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48年11月7日傍晚,我和父亲蒋振宗(当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副村长董凯、民兵指导员蒋士华在我家里谈事情。见东港(自然村,属檀木港管辖)的侯月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股国民党军从白口沟奔檀木港村北开过来了,约几十人,扛着步枪、机枪,带有冲锋枪。”当时村里的基干民兵都调到良乡去了,准备解放北京城。父亲他们怕这伙残兵袭击村里,就开始组织民兵,准备对付他们。父亲赶紧去通知农会主任、妇联主任和在家的一些民兵。妇女干部刘月娥和刘英很快组织了男女老幼共50多人。当时正在家里养伤的解放军连长蒋士昌自动当了组织者和指挥员,他把这些人带到了村北大河沟两侧的高约30多米的地坎上。沟里过人根本看不见。

我们这些民兵仅有两支步枪,20多颗手榴弹。只有蒋士昌有只手枪。所谓的民兵,这点儿有限的武器装备能不能战胜敌人,大家都很担心,心里没有底。蒋士昌向大家做思想工作,他说大家不要怕,咱们是守株待兔,天时地利对我们都有利,一则天很黑又下着雪,河沟石头多,路很滑,他们都穿着皮鞋,二则他们在黑处看不到我们,大家要听我指挥。他刚说完,只听河沟传来哗哗的走路声。等敌人走到跟前,蒋士昌高喊着:“一排准备,二排掩护,三排出击。”他先打了一枪,随后步枪手榴弹同时打响了。刚打了两三枪,扔了四个手榴弹,那些国民党军就喊:“交枪——交枪”。“要交枪,就拍着巴掌过来!”蒋士昌冲他们喊着。他们举起了双手走过来。我们对他们进行搜身检查后,经核对人数共有16人。当夜把他们带回村公所,集中缴械。共缴获了中式步枪15支,铁把步枪15支,轻机枪一挺,手枪一支。缴械后进行了审讯,才知道他们是傅作义部的一个特务连,准备遣返回乡的。

他们是以检查防线的名义潜逃出来的。因到处是军队,两个排分别行动。这个排只好乘天黑钻山沟逃出来。“没想到走到这儿上了你们的当,你们就两只枪几个破手榴弹就把我们解决了,要知道这情况,我们说什么也不交枪”。一个副排长说“看来,国民党的天下算彻底的完了!”他们一看这伙民兵不是老太太就是小孩子,说:“连这些人都跟我们干,回陕西是无望了!”蒋士昌说:“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有你们回家那天。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乐意回家的可以给路费”。他们高兴地说:“那我们就放心了……”

深夜,我们把这一排俘虏兵押送到河南村,交给解放军教导队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段淑兰智救董春山

张成基

1942年是旱涝少收之年，但根据地的干果核桃却是个小丰收，核桃仁就达十万多斤。眼看着能换钱之物，因敌人封锁运不出去。这个地区的核桃质量较好，历年都是运往天津，销售到市场。今年天津客商不断前来联系，仍想购买，就是日伪封锁，岗卡太多，运不出去。

推销十万斤核桃仁的任务，交给了永庆贸易公司经理石迪华。他也早作了安排，为防止鬼子来抢，把收购点都选在了僻静处，并确定了收购人员，向群众宣传，核桃下树抓紧晒干，收购后，让人砸仁，公司再来购买。

贸易公司与天津有关系，愿意要我们的核桃仁。也是发愁无法运去。在收核桃前，公司经理石迪华和董春山同志，就到贾峪口找段淑兰同志，请她帮助疏通岗卡，能把核桃仁运到天津。因她是地下联络员，城联部也给他部署了这个任务。今年粮食仍欠收，就得把这些核桃卖出去，换回过冬的衣服等生活日用品。要求他通过地下关系，把这项工作搞好。由段淑兰出马，首先和长操伪军队长康纪安协商好，他老段的货一定放行。接着又和红煤厂伪军队长商量，躲开日本站岗的时间通过。接着把河北和芦沟桥关系都打通了。从陈家台、班各庄、黑龙关、佛子庄、长操等村联系了三百头骆驼。到十月下旬，段淑兰请石迪华、董春山来贾峪口，安排哪个收购点有多少货，应去多少骆驼，哪天去等。董春山来了，详细安排了两天，基本安排妥当了。第三日早晨，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贾峪口。段淑兰跟董春山立即向北沟跑。董春山跑出院内，奔向北沟，发现日伪军已占了东坡的制高点，正好挡住了去路。董春山扭头又跑回李家店。东坡敌人看的清楚，派了一个伪军尾追去抓。董春山进院慌忙的和段淑兰说，不能向北沟跑了，这时全村都被敌人控制，无有可跑之路。段淑兰也急的没有办法，突然想出，叫董春山快揭开炉坑板，躲在里边去。董春山下到炉坑，段淑兰把炉坑板盖上，从炕上把不到两岁的儿子抱在怀里。这时伪军进院问，进来一个八路军哪里去了。老段一听就说：“是吗，那可不成，赶快找他，这东西们到处乱窜，哪都去”。他也和伪军在院里找。在院找了两遭，根本无人，站在院墙边上往外看，也无藏人之地。这个伪军说，到屋里去找吧。段淑兰也无办法，只是说：“我在屋里呆着，没有进去人呀”。她随着伪军往屋里走，又和伪军说，你是否看错了，不是到这院来的吧，这院里外哪有八路军呀。那伪军说，看的很清楚，没有错，在外边的也都看见了。段淑兰很沉着的说，不对，要到这院来怎么也藏不住。接着就给伪军倒了一碗茶水，又说，你也累了，喝碗水吧。叫他坐在炕沿上喝水，这个伪军喝着水，就看着炉坑说，我往炉坑里打一枪吧。那个伪军顶子弹，朝炉坑要打。段淑兰说，你可别对不起乡亲呀，我这小孩才一岁多，要给我吓坏了，怎么办呀。这时伪军也一愣，停止了打枪，说那怎么办呀。段淑兰说，你们也别这么不信任人，你们拿我当什么人看呀，难道我这屋是私藏八路军吗？这个伪军听了这话，也不好再用别的办法了。他已看明白，这个人就在炉坑里。正在这焦急万分之时，外边吹哨，并喊着各班要跑步来集合，这个伪军也就急忙的走了。

董春山在炉坑里可吓的够呛，听说要打枪，就往有人的这边挪，心想今天怎么也是凶多吉少了。当时也想，如果不为难老段，还算罢了。如果为难他我就挺身而出，不能叫老段因我受罪。伪军走后，董春山从炉坑出来，对段淑兰说，今天真是你救了我一条命，我已感到，怎么也跑不出敌人手心了，你的周旋算化险为夷了，怎么报答你救命之恩呀。

日伪军撤出了贾峪口，根据地马上开始了核桃仁的外运工作。在十五天的时间中，把核桃仁全部运到天

津，又从天津买回一些解放区和群众过冬用品。段淑兰出色的完成了宛平四区核桃仁的销售任务，受到了平西地区城联部的表扬。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难忘的扇子港

任成利

在史家营乡秋林铺村西约四、五里路的地方有一条深山沟，名叫扇子港。这里紧靠百花山，地势险要。抗战前只有三户人家，不足二十口人。平时，除了种山坡地的和放牧的人以外，几乎没有行人来往。

抗战开始以后，日本鬼子经常向史家营村、金鸡台村、秋林铺村一带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秋林铺村有三人被鬼子枪杀或被活活烧死，牲畜、粮食和物品全被抢走，房子被烧掉。在那恐怖的年代里，百姓们逃到深山里四处躲藏。扇子港，由于山高沟深，相对安全，因而有七、八户人家先后逃到那里居住。

1940年秋，日军先后在斋堂、大安山、长操等地建立了据点。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宛平县政府到处打游击，最后辗转来到扇子港。

机关工作人员约有五、六十人，还有司法科的看守所看管着七、八十名犯人。这些犯人大多是斋堂、千军台、大安山等敌占区有通敌行为的人，也有少数刑事犯。全都住在这十来户人家家里。政府机关住在扇子港中心的三合院里，司法科住在北坡。重刑犯被集中在一个屋子里，由看守员看管；罪行轻一点的被安排到各户。我家住在北崖根儿，也住进来了两名干部和三、四个犯人。

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决定组织犯人建临时住房。几天以后，十多间草房建好了，住房紧张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乡亲们不管自己的住房有多紧张，也要把政府机关安排好。他们把自家的热炕腾出来给干部们睡，而干部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推来让去，最后让老人、小孩和病弱的干部睡在炕上，其余的人都睡在地上。干部们还抽出时间帮助老乡们干农活、搞卫生。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可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非常融洽。鱼水情深，患难与共。

为了保证生活自给，政府干部组织犯人到百花山开荒种地。种了土豆和其它农作物，从而使粮食和蔬菜基本上自给自足。老百姓们还把自己种的菜送给干部们吃。政府干部们在县长张地的带领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

为了保护政府机关的安全，村里组织了十四、五岁的学生站岗、放哨、传递信件。村、区、县三级的信件全靠我们少年通信队来传递。有一次，接到情报，长操的敌人要向我山区进犯。我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封信送到县政府，县里的领导接到信后立即布置工作，做好了战斗准备。宛平县政府在扇子港住了二年多的时间，与当地的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感情。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扇子港象是母亲在风雨中撑起的一把小伞，保护着她为之自豪的中华儿女。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原大安山派出所所长

侦察员王喜福二三事

孙寿郃

1924年，王喜福出生在大安山乡西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十三岁开始就给地主放牛。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队在宛平与日军激战后退至门头沟代鹤岭。王喜福的大哥王喜瑞被这股败兵抓了伏，从此一去不回。1939年，日军占领了大安山。在西苑村，有个汉奸指着放牛的王喜福对鬼子说：“他们家有人参加了抗日的队伍。”鬼子在街上拦住了王喜福，不由分说，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口鼻出血。家人和乡亲们就在旁边看着，没人敢言声。那年他才满15岁，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冬天，山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八路军杨成武部队三十一大队的战士冒着大雪从山上下来，把鬼子赶出了大安山。不久，鬼子又采取了报复行动。扫荡大安山，还烧了很多民房。到了1940年10月12日，三十一大队的八路军趁黑夜从罗家坟下山，袭击大安山的鬼子。双方经过激战，三十一大队又占领了大安山。大队部就设在西苑村王喜福的家里。王喜福对部队首长说：“我要当八路军！”正巧，军分区侦察股长于有田需要一名交通员，王喜福就跟于有田一起做起了情报工作。经常出没于城内和敌人据点儿附近取送情报，往往两头见不到人，对内也非常保密，只与于有田一人有联系。从1940年至1944年几年里，王喜福跑遍了房山、良乡、门头沟、宛平一带的村庄和城镇。我军相继建立了王佐地区里十三村、外十三村和西片情报站，使日军的举动尽在八路军的耳目之下。日军投降前夕，准确、及时的情报工作为拔除山区据点儿创造了条件。1945年，王喜福入了党，并由一名交通员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情报站长。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战败投降。游击区的鬼子纷纷撤往城市。国民党孙连仲部队接收平津地区，先头部队很快到达了长辛店，要求日军只准向他们缴械投降。王喜福侦察到，长辛店的日军已将武器集中到了二老庄，尚未与国民党接收部队举行受降签字仪式。守备二老庄弹药库的鬼子白天枪里不装子弹，夜晚每人发5颗子弹自卫。11月，冀察军区十一分区决定成立独立团，杜廷忠任团长。独立团也急需武器装备。王喜福向杜廷忠汇报了二老庄弹药库的情况，军分区立即召开会议，做出了奇袭二老庄的决定。1946年1月的一个夜晚。王喜福和手枪队长吕树清、副队长乔明玉带领20多名手枪队员，身穿日本军服，列队来到二老庄。乔明玉是东北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只见他咿哩哇啦地跟守门的鬼子兵讲了一套日语。手枪队员和后面独立团的三个连就冲了进去。13个鬼子、30多名伪军没怎么抵抗就当俘虏。战士们趁黑夜赶紧往马车上装武器。其中有山炮8门、轻机枪20余挺、步枪1200条，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只是没有子弹。部队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的几十个鬼子、伪军回到解放区。随后又派人与日伪军联系用俘虏换子弹。我军在朱家坟山坡与日伪军交换了子弹。经清点，把子弹箱装在十几辆大马车上拉回了山里。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解放区军政干部进行了疯狂的抓捕。1945年9月下旬，房山保安团副大队长尤茂志带人来丰台后甫营村抓捕我妇联主任一名，民政助理六名，带回房山押在城东饶乐府村。王喜福得到情报后，在地下人员的帮助下，只身潜入房山城內李家大院尤茂志住处，自称是尤的老朋友，让尤的嫂子把尤茂志找回来。尤茂志原是汉奸王凤来的部下，长得仪表堂堂。抗战时期曾在山里被王喜福下过枪。当时为了分化瓦解伪军，经过教育又把他放了，所以他们俩早就认识。尤茂志到家一推门：“天哪！哪来的什么老朋友，这不是手使双枪‘心狠手黑’的王喜福吗”。尤茂志刷地变了脸，强作镇定地问：“你来干什么？”王喜福把磨去准星的双枪放在桌子上，说：“你从后甫营抓了我们几个人，我想让你把他们放喽，放还是不放，你瞧

着办。”尤茂志知道来者不善，态度缓和下来，用商量的口气说：“一下子都放了我也不好办，明天先把那个女的放喽，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事后，尤茂志将我妇联主任用毛驴驮着送到了焦各庄的土洞村。其余六名民政助理在被送往国民党二〇八师充军途中逃跑了。

1946年夏天，王喜福带侦察员王子江一起奔天津执行任务。刚到朱家坟，便被几个国民党军人拦住了。原来是新来驻防的青年军二旅旅长王勇书带着卫兵和家眷出来兜风，顺便察看一下地形。他们一行六人，一个挎手枪的警卫，两个挎美式冲锋枪的军人，还有两个打扮不俗的妇女。警卫员把王喜福二人带到王勇书面前。王勇书问他们是不是本地人，又问东南西北的村庄叫什么村，地形有什么特点。王喜福对答如流。王勇书听了面带微笑，非常满意。王喜福看清王勇书的军衔是少将。他冲王子江使了个眼色，二人拔出腰间的手枪，分别扑向敌军官和警卫员。王喜福用手枪顶住敌军官王勇书的脑袋说：“让他们把枪放下，要不就先崩了你！”两个挎美式冲锋枪的卫兵乖乖地交了枪。王喜福和王子江押着六个俘虏顺小路往西走，到王佐时那两个妇女说走不动了。王喜福跟村公所要了辆大马车，一路上快马加鞭，经过晓幼营、里峪沟和孤山子，进入白石口沟又把别的俘虏扣下，用担架抬着敌军官到河北找到了军分区领导。军分区政委与被俘的敌军官谈判并达成协议，三天后又将六人连人带枪送回了长辛店。

1947年，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侦察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侦察员反映：情报比日本时期难搞，国民党实行保甲制，侦察员刚到一地儿，便有伪保长给敌人报信儿。

一天，王喜福从坨里出山刚到闫村，良乡保安团中队长杨贤就带着一百多人前来抓捕。王喜福从闫村跑到怪村，由怪村到崇各庄又到贺照云、南宫村、庄户，最后跑到哑叭河的庄稼地里，过了一夜才躲过杨贤的追捕。杨贤对手下人说：“这小子手黑着呢！谁抓住他就给谁1400万。”后来王喜福参与了一系列镇压伪保甲长的活动，遏制了伪组织的反动气焰。

1948年5月下旬，王喜福乔装混入坨里敌占区，经过一个多礼拜的侦察，把13个炮楼和据点分布情况绘成图纸，交给了部队首长。5月28日，九团和独立营及民兵两千多人包围了坨里守敌。将守备坨里的房山保安团副团长武德功击毙，俘敌136人。此后，王喜福离开房山，随大军南下，踏上了解放全国的征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日寇第二次进攻宛平四区

张成基 徐淑荣 刘甫玉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平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欠下了累累血债。

从1939年至1944年的六年里，日本鬼子每年春秋分两次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每次都调集五、六万，有时达十万人的兵力和大量的民伕，分十路、二十路对平西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小股敌人也经常出来清剿，妄图一举毁灭平西根据地。

敌人春季扫荡的目的是干扰老百姓及时种地，造成根据地不打粮食或少打粮食的局面。所以他们扫荡到哪里，遇到耕畜、农具和种子都抢走，大型笨重的农具不能弄走的统统烧掉。每次进攻都要影响农时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秋季扫荡，目的是把老百姓将要成熟的庄稼，强制民伏抢收，运往据点由他们食用，不成熟的破坏掉。

1940年秋，日军纠集了十万兵力，分二十路向平西根据地进攻，于10月12日开始全面出击。其中一路从南窖据点出发，经过红煤场。当天驻扎在大安山。第二天越过东安岭向宛平四区进攻。这股敌人共有两千多人，其中日本鬼子有四百多人，伪军有五百多人，民伏达千人。这次的任务是扫荡史家营、秋林铺一带，然后回到大安山建立据点。

宛平四区子弟兵 首次交战东安岭

昌宛县委和子弟兵团接到南窖敌人要通过东安岭进攻宛平四区的情报后，首先命令新成立的昌宛子弟兵团四区中队到东安岭阻击敌人。并明确指示：“这次战斗不是决战，而是阻击。任务是打乱敌人的行动部署，使其在前进中丧胆。达到目的后安全转移，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中队长董春宇奉命带领全队于12日晚到达预定地点，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当晚勘察了作战地形，准备明早迎敌。

当时这个中队仅有三十八人，相当一个排的兵力，三个班的编制，一班长耿宏范，二班长张文茂，三班长刘广学，通讯员刘广进，都是当地人。各村民兵骨干，爱国热情高，杀敌决心大，都是自愿参加子弟兵的。不如意的是武器装备很差，每人只有一兜(四个)手榴弹，全队只有七条旧步枪，有的还拉不开栓，有的退不出壳。这支队伍组织起来才一个多月。

13日拂晓，董春宇带队进入阵地。五点半钟我军发现敌军向东安岭进发，当敌人进入我军范围，立即开枪射击。鬼子发现山上有我军埋伏，很快就看清了不是大部队，就象蜂群似的围攻过来，子弹象雨点一样向我阵地射击，战士们英勇顽强，积极作战。队长根据上级指示考虑到，敌人火力向我军接近，我军的装备和兵力数量相差悬殊，只能按原定转移的方向，撤出阵地，通过悬崖峭壁中的羊肠小道，安全地转移到了圣米石塘。

待敌人越过东安岭向史家营方向进攻后，董春宇带领全队通过四堰台和庙安梁向团长刘玉坤、政委史梦兰汇报了阻击敌人的情况，并请求分配一些装备，夜间扰乱敌人驻地。团长政委说：“现在还没有武器弹药装备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去扰乱敌人。你们的任务是在四区东半部范围内监视敌人的行动，防止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给老百姓撑腰壮胆。”董春宇接收任务后，带队返回四区，当晚住到金林台村的于家塌，开始执行巡视东半区的任务。

七团五连急行军 东安岭上阻敌人

平西军区司令部接到敌人进攻宛平四区的情报后，命令七团二营五连在13日早晨赶赴东安岭阻击敌人。五连接到命令已是12日下午了，在连长黄志仁、指导员马利的带领下，从涞水县北边桥出发，昼夜兼程，晚上赶到史家营村住下。13日早四点钟前，敌我双方部队都从驻地出发。因我军离东安岭较远，同时路过金鸡台村群众给送水喝，耽误了一些时间，当时又没有通讯联络，我们的两支部队没有衔接上。这样就在四区子弟兵中队撤下东安岭，而七团五连尚未到达的时间差里，敌人抢先占领了东安岭。当我七团五连行进到东安岭脚下一华里的北坡时，被已到山顶的敌人发现。日军立即向对面的南坡散开形成对阵，向北坡进行疯狂的扫射，枪炮声震天动地，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在这危急时刻，五连战士们勇敢应战。我轻机枪射手韩玉田，是沈家庵人，熟悉山形，利用巨石掩体，消灭了不少暴露在草坡上的日本鬼子。因敌人居高临下，地形有利，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军伤亡严重，最后决定立即撤出阵地转移到金林台一带。待敌向西进犯后，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送往后方医院，组织民兵打扫战场，掩埋烈士的尸体后返回涞水向部队首长

汇报。部队领导认为，我们对日作战还缺乏经验，准备不够。没有和地方取得联系，没有接好通讯联络，所以造成被动的局面。

日寇向西进攻 老爷庙遭炮轰

东安岭战斗结束后，敌人顺路而下，向宛平四区西半部进攻。首先到达金鸡台、清土涧和西岳台村，这三村在他们春季大扫荡中人财物损失较大，但不是这次扫荡的重点，没有在此站脚，就奔史家营村去了。除少部分人先进村安排生活，大部分日伪军带着民伕，兵分多路，对村外的沟沟港港以及每个山头都进行搜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捕我政府工作人员、八路军和老百姓，碰到山里盖的临时房子烧掉，财物抢光，抓着妇女不分老幼都被强奸，奸后都被杀死。看到远处的人就开枪射击。

第二天早晨，敌人向史家营西半边继续搜索。来到村西八亩地台时，日本鬼子发现我军数十人。这正是我平西党政军设在百花山上的通讯站。不到非拆不可时，通讯站是不能拆掉的，多坚持一分钟，都能起到重大作用。敌人住到史家营时，全体指战员三十多人，带着通讯器材才开始转移。敌人因距我较远，不能近战，所以就向老爷庙开炮。第一发炮弹打高了，从山顶飞过，落在十五华里以外的黄安坨爆炸了。紧接着又问老爷庙连打数炮，有的炮弹打到庙内。我通讯兵尤一伤亡，安全地经过黄安坨向西转移了。敌人这天向史家营西边搜索，并把曹家坊村也搜了一遍，晚上驻扎在莲花庵村。

第三天敌人向秋林铺进发，晚上住到秋林铺。第四天兵分两路，留下一部分仍在秋林铺搜山，另一部分向西通过松树岭，经过堂上、宝水到东村，和从涑水出发经十渡、蒲洼到东村的日本鬼子会师。他们会师时间不长，当日又返回秋林铺。第五天拂晓(16日)，从秋林铺出发向东路过西岳台村。他们派了三百多名日伪军，到碾子坨上，向大村涧三个自然村(即大村、小村和灰清涧)猛烈射击了二十多分钟。大村涧是八路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常住之处，地、县、区经常有干部在此养病，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村之一。他们用机枪猛烈射击之后，返回大安山据点。

坚壁清野搞的好 日寇抢光未得逞

日寇这次大扫荡，来势凶猛，时间长。并采用了分进合击、铁篋重围的办法，史家营至秋林铺四个村都“拢”了一遍，想把我军政人员消灭，结果没达到目的。当然他们经过的村庄，老百姓也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比起春季进攻金鸡台一带，损失还是小多了。其原因主要是接受春季大扫荡的教训，秋季未到，就采取了多种形式向群众开展了“一定要搞好坚壁清野”的宣传教育。县区两级按片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各村进行发动和巡回检查，遇到问题认真解决。工作组到村首先召开党员大会，讲形势派任务，分片包户，要求党员必须带头，不但把自己的粮食财物坚壁好，还要把所包户搞彻底。接着召开群众大会，由工作组作动员报告，讲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要活下去，除房子背不走，其它一切物资都要转移出去，以保障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接着各个部门和团体也都召开了会议，做了同样的部署。

除了开会宣传，村中还沿街书写宣传标语，按片出黑板报。还在晚上进行屋顶广播。没有电，就用铁片卷的喇叭筒广播，也有的站在山头上向全村人们广播。总之都是宣传一个内容，即一定要把坚壁清野搞好和怎样搞好坚壁清野。还宣传坚壁清野中的好人好事及典型，还召开典型户的经验介绍会。

各村小学生也成了宣传员，学生课文中编写了让广大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一定要把坚壁清野搞好，避免造成财物抢光、人员伤亡的后果的内容。真正出现了一个坚壁清野的新高潮。

群众彻底大转移 虽有伤亡也较轻

这次进攻，鬼子实行杀光政策，但是未能得逞。主要是各村群众都接收了春季进攻金鸡台杀害我无辜百姓四十多人的教训。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伤亡。当时宛平四区公安助理史正学因患疟疾在家治疗。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村东蛤蟆树洼陈广才家已建好的山坡铺里隐蔽。发现日本搜索已经到了村东离住处近三百米的知事庵，立即组织院中所有人进行隐蔽。当时陈广才六十多岁的母亲在院里灶火上做玉米面粥，因灶内起烟，被日本鬼子发现，打来一枪从左太阳穴进，右太阳穴出，倒地而死。紧接着日本进村，在正街的财神庙前，遇到了一个从外地来讨饭吃的小叫花子，将他用刺刀挑死在财神庙前。第二天向南坡搜山的日本鬼子，朝着耳朵崖方向进发，走到半坡韭菜台时，将一外地席匠五十多岁的老伴强奸后开枪打死，并将其十来岁的男孩抓走。

13日早晨，莲花庵村的任全水，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去门头沟背煤，走到西苑村，与日本鬼子相遇，被打死在道边上。秋林铺村任宏广在离村不远的地方隐蔽着，看到自家房子起火，跑进院去救火。当时烧房的日伪军还没出院，看到他到院内救火，就一枪把他打倒，但没有死，日伪军把他抬到烧着的房里，活活地把他烧死了。还有任显耕家七十多岁的老母有病，家中人要背她到山上去，她怎么也不让，谁要动她就自杀，儿女们无奈也就不往外转移她了。结果也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还有在村外隐蔽很好的任显民，担心自己的房子被烧，回到村边观望准备救火，被日本鬼子发现，一枪打死。当敌人15日由秋林铺去东村汇合路过堂上时，安家李老太太从院里往外跑，被鬼子一枪打死在大门口。李晓春的丈夫李荣，鬼子进村没跑出去，藏在捆好的玉米秧后，被鬼子开枪打死。村里的安李氏也被鬼子轮奸。总之敌人这次进攻，从金鸡台到宝水的九个村中，哪村都有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

房屋被烧毁 抗寒过严冬

日寇这次大扫荡，是为了进一步破坏平西根据地，特别是宛平四区西南部，昌宛县政府和八路军游击队常住的地方，把这几个村的房子全部烧掉。从16日清早，敌人从秋林铺往回撤兵时，将所有的房屋全部烧光，他们所到之处，顿时一片火海。

就这样七个村被烧掉房屋一千四百多间。其中秋林铺三百多间，莲花庵二百多间，曹家坊一百多间，史家营二百多间，西岳台一百多间，清土涧二百多间。金鸡台村在春季烧过后，群众在原来废墟上搭起的简易房屋，又被烧了二百多间。

面对艰苦局面，县区工作组立即到各村进行工作，首先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议，部署工作。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对这次日本进攻，做了认真的总结，并布置了当前工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鼓足干劲，抓紧生产，重建家园。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在原房基上搭起了简易的房屋，群众很快就有了住处。

由于敌人几年的封锁，群众买不到棉布，多数人身上没有棉衣，若干户炕上没有被褥。根据当地条件，也采取了防寒措施。各村都有丰富的煤源，组织各户用加大煤火炉的办法进行取暖。同时县级领导根据各村正流行麻疹和生汗病情况，向区村政府提出：“要在搞好抗寒越冬的同时，开展室内和个人卫生及防疫工作”的要求。

发动群众自救 冬季生产抓紧

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对解放区的封锁及天灾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很困难。四区党委在积极组织群众抢修临

时房屋的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首先发动了冬季大生产运动。组织各村农民砍柴烧炭和开窑挖煤。在柳林水和元阳水两村开设多个大煤和木炭的收购场,同时开设多处骆驼店和骡马店,把烧好的木炭和挖好的大煤块,用骆驼和骡马外运销售。还积极组织当地商贩,利用各种关系,从外地购进食盐、布匹、旧衣和日用杂货等,并发动各村群众利用当地羊毛擀毡做屐,羊绒织毛衣、毛裤和毛袜。同时开展农业生产。组织群众搞好冬季造肥,修理制造农具和整修梯田的工作,调剂种籽,检查和调整耕畜,不足的用人工搭配,必须保证来年春耕任务按时完成。

总之,日伪军进攻宛平四区,妄图挤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目的没有达到。实行三光的野心未能得逞。正象小学生当时唱的一首歌:“五月里来是端午,日本鬼子胆如鼠,张牙舞爪吓唬人,原来是个纸老虎。”

日寇这次进攻,我军除在东安岭进行阻击外,在后几天的扫荡中,没有继续与敌人正面冲突。以董春印为小队长、石甫成为副队长、四十人三个班的区小队,即宛平县的第六分队。在保卫区政府安全,配合地方干部工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接送领导和爱国人士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八里塘岭阻击战

方舒

1941年8月中旬,侵华日寇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纠集和指挥十万余兵力,分十多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

斯时,我主力部队九团驻十渡、西庄,冀中十分区医院、兵工厂和房涞涿县政府及二区公所也驻十渡、八渡。

13日夜,日寇分兵四路,分进合击,集中目标十渡等村。企图围歼我军主力和后方机关。

从涞水出发的日寇二百余人,经太平庄越山,图谋窜入前石门南沟,抢占前、后石门,卡住我军政机关西撤的退路。

当日夜,我九团二营派一个排,由排长赵楷带领,阻击由南沟追窜之敌。命令其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敌人前进!

我军九团,为更有利歼灭敌人,奉命西撤。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是沿拒马河谷西进,此路河流弯转水深激湍;另一路越八里塘岭,此路是通常来往大道。不管走哪条路,都必须经过前石门或后石门。所以阻击由南沟进犯之敌,是我军安全后撤的保障,任务十分艰巨。

八里塘岭,山势险峻,一条山路崎岖蜿蜒,全长八里,山间有些洞穴,故得此名。

赵楷带领全排战士,急行军登上八里塘岭,在下半山腰的有利地势,分梯形布阵,以巨石、灌木丛为掩体,埋伏下来。天将破晓时,一部饿犬般的日寇,从山涧疯狂扑来,闯入我军战士们的视野。

打!密集的子从从天而降,前面的一批日寇应声倒下。群寇被这突然一击,懵了头。倾刻,他们慌乱地抢占对面山坡,准备顽抗,却又被我战士一阵排枪压了下去。

天色大亮后,战斗更趋于激烈,日寇被我军战士阻击在狭窄的峡谷里,毫不能前进。狂敌于是继续组织

力量强攻我军阵地。我战士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予以痛击，日寇纷纷滚下山去。顽敌不甘失败，用机枪、小炮和掷弹筒，一齐向我军阵地倾泻，轮番进攻。

我军战士，浴血奋战，抗击大于十倍以上的敌人，以一当十，连续杀溃日寇的进攻。尽管伤亡很大，阵地巍然不动，就象一把钢钳，把敌人钳制在谷底。战斗从拂晓战到近中午时分。最后，我军战士弹尽粮绝，日寇施放了毒瓦斯弹，用毒气毒杀我军战士，除一人受重伤昏厥，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一开始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了敌人重大杀伤。最后我排战士壮烈牺牲，英勇阻击了敌人疯狂进攻，粉碎了日寇妄图抢占前、后石门的诡计，掩护了主力部队、后方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安全转移。

八里塘一仗，我八路军九团二营以一个排的牺牲，阻击了日寇的疯狂进攻，掩护了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的安全转移。烈士的英勇事迹至今仍在当地老百姓中传颂。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我做地下工作的回顾

赵国荣

1940年冬季，驻大安山的日伪军举办青年训练班。这时我宛平二区区委研究决定派人去。任务是：第一，要了解他们训练的内容是什么。第二，要掌握各村去的青年都是谁，是什么人，把他们的思想动态摸清。第三，看看管训练的是什么人，通过他们咱们是否能打进去。第一期先让王文汗同志去。王是龙头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他到班首先看到管训练的人有一个日本人，两个是中国人当教官，一个叫加玉堂，一个叫王文焕。训练的内容就是，宣传大东亚、皇军日本人如何好，学日语，练踢操，学军事，哪里有八路军要及时向他们报告。每期训练的人数是40人左右，时间一个月，每天早晨去，晚上回家住。第一期结束了，党组织研究决定第二期让我去。任务是，千方百计的找各种关系及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敌人的内部，了解敌人的兵力、武器及特务活动等情况。

1941年初训练班开始了。我到训练班时间不长，教官加玉堂对我的印象就大有好转了。同时我又认识了一个伪军孔团的班长任义芳，因为他常去训练班找加玉堂玩。我看他们的关系很好，以后我就有意识的多接触他们，慢慢和他们混熟了，这是我打进去的一个好机会。为了更深入一步，我和他们拜成盟兄弟，工作就更好作了。我又找了张文兰、杨怀旺、赵成普三人。回村后请示了党组织的同意，第二天我找到这三个学员说，咱们这几个人很投脾气对劲的，为了在这里少挨打、少受气咱们和教官加玉堂，还有常来咱们班的孔团班长任义芳拜盟兄弟，你们说行不行。他们说太好了，人家和咱们拜吗？我说，咱们和他们商量商量看怎么样。在這一天的中午，我们四个人就找到教官加玉堂、孔团班长任义芳，我先说，咱们几个在训练班虽时间不长，但混的很熟，又这么好，训练班散了咱们可就分手了，我想咱们几个人拜个盟兄弟你们说好不好。任义芳和加玉堂说，咱们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就拜了吧！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结拜的仪式。

结成盟兄弟，就常和他们接触，就很自然的问这问那。有一天我和任义芳碰到一起问他孔团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每天都干些什么？他就很直爽的告诉我：团里一共也就有二百来人，武器吗？什么武器都有，当

兵的都有长枪一支，子弹不限数，有刺刀一把。当官的都有短枪一支及子弹，岗楼里还有机枪。我问他岗楼里要机枪干什么用。他说，预防八路军围攻岗楼时用。我又问他头是谁呀！他说，孔宪江、马德福、尤茂志这都是大头。他反过来问我，你知道八路军是干什么的吗？我说八路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像你们这军队都是为自己吃喝玩乐。他笑着说，小弟可别包括我呀！我是被他们抓来当兵的，如果我不当，马德福就得杀我，我可不干那些伤害人民的事。我听他说的是真心话，我说：干脆把你这个班拉出来，投靠八路军怎么样。他说，不行不行！如果我拉出一个班，马德福杀不了我，也得把我全家人给杀了，因为我们都是涿县人，离着也很近。我看日本人在中国长不了，伪军也威风扫地了，到那时我还是回家当农民安全点。最后我告诉他，咱俩说的话你可别和别人去说。任义芳说，你放心，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小弟今后有什么事看我能办的你就找我，我一定帮忙。

我在学习时区党组织又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找到张成典的住处。张成典又叫张业东、张振武，原来是我方抗日区长，日本到大安山以后，他投敌叛变了。他还霸占一个有夫之妇作为他的小老婆。我想还是找任义芳问问，张成典大乡长常在哪里住。他说：他就住在孔团岗楼旁边杨家院北屋。我回去找到区委干部杨怀清、公安员于振边汇报。他们派了两个人在一天夜里去了张成典的住处，谨慎地把第一道门打开了，到第二道门还没有打开，张成典就从屋往外打了枪，当时考虑岗楼的人要听见外边有枪声一定会出来，所以先放弃了。以后这个叛徒就转移了住处，还经常换地方住，党组织考虑不能再去找他。

训练班结束后，一天上午加玉堂找我说：任义芳让我告诉你：今天夜里日本和孔团要出发，具体到哪里去不知道，可能围着这几个村。等他走后我马上到西窖村，找到党组织于振边、杨怀清等人，把情况告诉他们。杨怀清说，不防一万要防万一，我们今天夜里就赶快转移。结果第二天拂晓，有百余名日本和伪军把西窖村包围了，到各家各户搜找八路军的干部，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就气急败坏的向老百姓们发火，又打又骂，问八路军到哪里去了。老百姓说没有见过八路军来呀！他们连鸡窝、羊圈、牲畜棚都找遍了，也没有八路军。后来任义芳告诉我：你们村杨××报告的西窖村有八路军，杨怀清、于振边他们都在那里住着，可是去找了半天根本就没有，回来以后日本还把杨××打了一顿。

1941年冬的一天，杨××又向敌人报告说，龙头村王永祥是共产党员，还是党支部委员、模范队长，还有赵成仲也是共产党员，又是于振边的亲表兄，他们经常和杨怀清、于振边有联系。敌人在当天夜里，把这两个人抓到孔团去了，审问他们是不是八路军，你们村还有谁是八路军，于振边、杨怀清他们都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不知道。这时就对他们严刑拷打，打的死去活来的，当他们站不住时，就用一盆盆的凉水浇头，等他们苏醒过来，还问谁是共产党，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都给八路军干了什么事！说出来就放你们回去，不说就杀了你们，限你们三天之内交出八路军，不交出来就杀了你们。可是这两个人始终没有出卖党，也没有向敌人屈服。

党组织知道后，让我找孔团任义芳是否能解救他们。这时我心急火燎地正要去找任义芳，加玉堂来了。他说任义芳让你去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赶快到大安山找到任义芳说：我给你带信也是为这事，你别着急，我已经找人正在说着。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任义芳又让加玉堂告诉我赶快找人保出王永祥、赵成仲来。

1950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当时在良乡县公安局工作，突然收到由天津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任义芳写的，信中说小弟你还能认你这个大哥吗？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你在良乡县公安局工作。我把信让局长杨怀清、秘书王士才同志看，并说明我和任义芳过去的关系，领导让我马上给他去信，让他立即来良乡公安局找我。任义芳来到后，领导责成我和他谈，他很害怕，所以我首先把政府的政策给他讲明，并说在大安山已经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害怕什么？我问他咱们分手以后你都干什么啦！他说，我由大安山到房山还是当班长，解放了我也不敢常在家住，过着流浪的生活！我又想盟弟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他放下顾虑大胆揭发敌伪残余势力活动情况，揭发伪军头目马德福，他现已改名叫马锡波了，在北京三义成煤栈住，东单观音寺四十九

号。还有尤茂志、李银廷他们都在马德福哪里躲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说马德福他太坏了，老想与共产党顽抗到底。有一天马德福找我说：咱们组织一个河北自卫军，都是咱们过去在房山当过兵的人，房山有刘甫全、李银廷、高树林等人，涑水有齐振海他们，涿县有尚琴他们，估计咱们能组织上百人，这些人都有枪和子弹，咱们分成两部分，房山以南涿县一带由我马德福负责，房山以北良乡一带有尤茂志负责，你给咱们组织人。马德福还说有一天我带着刘甫全、李银廷、刘玉川几个人，正走在石楼、曹庄一带碰上民兵和公安队，和他们打了一仗，打死他们一个人，我们也伤了一个人就是刘玉川。我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所以我想离他远点，我就跑到天津去了。

我把任义芳所说的情况，向局领导都作了详细汇报，又和涿县公安局联系，让他到涿县公安局，揭发检举了马德福等人的罪行。

任义芳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同时还立了功。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日寇在天开一带的统治

赵润东

1941年至1943年，正是日本侵略军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时期。他们一方面组织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扫荡，妄图扼杀我抗日军民的正义斗争，一方面又强迫村民修筑岗楼，深挖壕沟，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

当时，为了控制平原与山区的联系，日本侵略军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驻扎在岳各庄乡天开村。山头上筑了岗楼，中队部设在村西北的马家大院，管辖着长沟、周口店的日本小队。在中队部的周围，强迫村民筑起高高的围墙，围墙顶部有一米多宽，上面垒着垛口，可以掩体射击。同时，在垛口里侧还可以行走。日军中队长山口，三十来岁，长得一脸连毛胡子，村民都称他大胡子。他既狡猾又凶恶，村民们提起他就恨得咬牙切齿。在日本中队部的外面即围墙的北侧，驻守的是张德祥伪保安团的一个排，排长姓康，是圣水峪村人。在日本侵略军围剿扫荡中，他主动配合，提供线索。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灾祸。

五侯村王才老人当年被迫给日本做饭二年多。他讲，中队部里设有伙房，三位厨师，除他以外，一位是良乡人，一位是天开本村人。日本出一人专门负责管理。这里的日本鬼子一日三餐，主食是三顿闷饭，用大麦仁与大米混合闷熟。副食是，早上熬小鱼汤，一人一个鸡蛋，将蛋打在碗里，有时加上四五个腌青杏儿。中午、晚上，一锅熬菜，里面放上猪肉、大葱、鲜姜、青菜，加上一种类似芥末一样的东西，放上两勺子白糖、花生油等一锅大杂烩，每人舀一勺。

伙房烧的劈柴由维持会派人到各村催敛，猪肉由维持会供应。征收来的物品都要一一过秤。日本人用的秤大，交来的东西十斤也就称出六斤，不足的部分由维持会补足。实际上，维持会所补部分仍然摊在各村百姓身上。被奴役、压榨的各村百姓敢怒不敢言。

开始时，日本鬼子所吃的粮食、牛肉、鱼等都统一由日本供给。大多是从东三省用火车运到周口店火车站。接到通知，维持会马上从各村派大车去拉。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我国战场上失去了有

利地位,加上日本本土遭到猛烈轰炸,我抗日军民又不断破坏交通线,打击敌人的运输部队,多方面钳制敌人,使得敌人整日处于惶惶之中,造成供给困难。因此,日本鬼子吃的大麦仁和大米供应日趋紧张,就使用高粱米、小米代替。当然,这些粮食都是从中国国土上掠夺来的。

为了抗日,积极打击侵略者,伙房的大师付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如做饭时不放够份量。熬菜时少放肉和糖等。在平时送情报时,人们也常常谎报军情,迷惑敌人。如当地有一位叫赵凡古的人,经常背着背筐到罗家峪、孤山口、圣水峪和上方山一带探听情报。了解后报告日本中队长山口。其实,他所报告的情报都是自己编造的,以此糊弄鬼子。山口中队长听了报告,马上便拉着队伍(保安队在前,日本兵在后)到山里搜捕八路军。结果,跑了很远的路连影子也没有。几次用此方法,惹怒山口中队长,就把赵凡古杀害了。

为了保障日本鬼子的反动统治,在天开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由周围几十个村庄联合组成,会长叫赵文汉。新民会被八路军除掉后,赵文汉便跟随八路军队伍参加了革命。在根据地学习训练一段时间以后,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带着上级交给的任务回到天开村当了维持会长。明着替日本办事,暗着将敌人的内部情况及行踪转告我平西革命根据地。赵文汉家住村外的北坡根,出入比较方便,由上方山一带过来的八路军与他联系也比较容易。在他与日本周旋给平西抗日根据地送情报时,不慎被张德祥的伪保安队发现。立即派人将赵文汉骗到周口店,用刺刀挑死。不久,赵文汉的妻子也被黑杀团杀害。赵文汉夫妇惨遭敌人杀害,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留下。

日本鬼子在天开盘踞的几年中,经常烧杀抢劫,给这一带的村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人民才解脱桎梏,摆脱了日寇的奴化统治。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日寇在天开一带的统治(续)

赵润东

《房山文史资料》作为“三亲”史料之实录,拾遗补缺,佐证历史,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它所起到的以史为鉴、惠及后人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在搜集整理日寇在房山地区统治时期的资料时,笔者曾在《房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军政往事”栏目里发表过一篇“日寇在天开一带的统治”的文章,被采访的对象是岳各庄镇五侯村年过八旬的王才老人。当年,他曾被迫给驻扎在天开村的日本鬼子当厨师,亲身经历了日本鬼子在这一带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回忆中,老人曾讲述以维持会会长身份活动于乡间、为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搜集情报并与敌人周旋斗争的赵文汉及妻子高秀兰被敌人残酷杀害的经过。由于事情过去了将近六十年,被访老人又非天开村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很难掌握事件的详细过程和与该事件相关的全部情况,加上笔者采访时线索中断,故而在文章最后写道:“……赵文汉夫妇惨遭敌人杀害,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留下。”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只是赵文汉夫妇的两个女儿年幼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前不久获悉,赵文汉夫妇牺牲后,两个女儿幸存下来,现在依然健在。于是,笔者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和极大的兴趣,约定时间,与其长女赵桂珍及家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之后,又多方了解调查,取得了较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现将其整

理成文，力求完善，作为对先烈的缅怀和前文遗漏之弥补。

1941年7月至10月，日本侵略者进行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中心是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隔绝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繁殖点线，依据点线向外扩张，以达到其紧缩根据地的目的。其间，房涑涑联合县二区十渡一带，驻有我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队，并驻有冀中十分区兵工厂和医院，为平西革命根据地重要前沿。敌人多次进犯，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然而，他们每次进攻都被我八路军击败。

1942年春，日本鬼子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的基础上，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更为严酷的经济封锁。为了切断房山山区和平原的联系，日军在其占领区强征民力，自房山以南至张坊沿西部山区，修碉堡、筑岗楼、挖壕沟，苦心经营其“点”和“线”，在山边一些较大据点盘踞，并经常出没于附近村庄，烧杀抢掠，骚扰百姓。各地民众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天开村驻扎着一个日本中队，中队部设在村西北马家大院内，管辖着周口店镇和长沟镇内驻扎的小队。为防止我军民的反抗和斗争，他们强迫村民在中队部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顶部有一米多宽供人往来行走，上面垒着垛口，用来掩体射击。日本中队长叫山口，三十来岁，一脸络腮胡子，当地百姓都叫他大胡子。这个人既狡猾又凶狠，老百姓一提他都恨得咬牙切齿。在日本中队部的外面即围墙的北侧，驻守着张德祥伪保安团一个排的兵力，排长是圣水峪村一个姓康的人。这个人丧失了民族气节，甘愿充当日本鬼子的走狗。在日寇多次进攻扫荡中，他都主动配合，提供线索，给政府和当地村民造成很大损失和灾祸。

日本鬼子在这一带实行的封锁和统治，激起了当地村民的愤慨和反抗，人们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日本鬼子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和奴役中国百姓，采用让中国人治中国人的办法，成立维持会。就这样，天开村便与周围十几个村庄组成了维持会，会长由本村村民赵文汉担任。但是，这个维持会没过多久就被我平西八路军捣毁。随后，赵文汉便跟随八路军参加了革命。

赵文汉来到陕西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集训，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抗战形势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信心，鼓舞了斗志。不久，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革命，斗争到底。集训之后，赵文汉按照上级组织安排，带着任务回到老家天开村，继续担任维持会会长。他家住村北的北坡根，出入很方便。从天开村向西行走十几里山路就到了上方山，穿过上方山可到张坊和十渡一带即平西革命根据地。平时，他在维持会里出出进进，表面看上去是在为日军办事，而实际上时刻都在观察敌人动向，搜集情报，并及时将敌人的内部情况和行踪报告给我平西抗日根据地。后来，在他和敌人周旋并给平西革命根据地送情报时不幸被伪保安队发现。伪保安队经周密策划，将赵文汉骗至周口店逮捕，随后用刺刀残忍地将他杀害。当时，他年仅35岁。

赵文汉牺牲后，年仅二十六岁的妻子高秀兰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大女儿赵桂珍七岁，小女儿赵桂婷不满周岁）相依为命，整日处在惊恐之中。见这娘仨孤儿寡母实在可怜，村中一对老人就搬到院里住进厢房，以此做伴壮胆。为了讨取日本鬼子的信任和喜欢，伪保安队杀害赵文汉之后，接着又策划了惨杀高秀兰。据赵桂珍回忆，那年她七岁，夜里，她和母亲、妹妹正在睡觉，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住在厢房里的老头将院门打开，一帮人立刻拥了进来。他们气势汹汹，胡遭胡闹，翻这翻那，见吃就吃，见东西就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人们被惊呆了，孩子被吓哭了。

折腾一阵之后，当中一个人冲着高秀兰大声嚷道：“走！领领道去。”高秀兰坐着不动，那人就用枪把子对着她的脑袋说：“让你走就得走，走不走？”当时，屋里屋外站满了人，身穿便衣，都有枪。没有办法，高秀兰被一群持枪者带出屋子，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剩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只知哇哇的哭叫。过了一段时间，就听村里响起了枪声。又隔了一会儿，那群人返回来，进屋冲着年仅七岁的赵桂珍说：“小孩，认识认识，是谁把你妈弄死的？”赵桂珍被吓得只管哭，不敢抬头。如果当时敢说认识，肯定立即被杀死。

据知情人讲,高秀兰被带到学校门口交给一人看押,其他人又去捉捕另外的人。当时那个看守看她很年轻便顿生歹意。高秀兰奋起反抗,一边痛骂一边与那人扭打在一起。那人羞恼成怒照她开了一枪,见没打死,又照她软肋扎了一刀。高秀兰被害时头发蓬乱着,手里一直紧紧的攥着一块石头,那年她才二十六岁。第二天天亮后,乡亲们到邻村上中院接回赵桂珍的婶子料理后事(其叔父早年走后一直没有回来,其婶子也是孤身一人,院里两间东房归她所有)。其婶回来后,找好当家实户和乡亲们把高秀兰遗体埋葬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到上中院村抚养。之后,有人同情婶子,说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就劝她把小的送人过继。再后来,婶子又把过继出去的赵桂婷接回来一起抚养。婶子体弱多病,还要抚养两孩子,几年下来就病倒了,她病故时年仅三十七岁。

解放后,赵桂珍和赵桂婷姐妹俩相继出嫁,本村百姓便慢慢将她们忘记了,所以才有“赵文汉夫妇惨遭敌人杀害,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留下”的说法。现在姐妹俩都已年过五旬接近花甲,每当提起父母的那段经历与遭遇,就会感慨万千。她们为父母就义时的壮举感到骄傲,同时,也为他们没留下一点痕迹感到遗憾和惋惜。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上石堡村的反资敌斗争

王硕儒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抗日救国,号召人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因此,抗战初期,特别是1940年以前,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政权大部分还掌握在农村上层分子(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手中,特别是根据地同敌占区接壤的边缘村庄,存在着面向我、面向敌的两面政权,其中有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的,也有假心向我、真心向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就是领导人民群众使两面政权成为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的政权,向假心向我、真心向敌的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上石堡村的反资敌斗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上石堡原是属下石堡村的自然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房良联合县曾于1938年在该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1939年,因为负担纠纷,同下石堡分开单建行政村。全村86户,682人,土地780多亩。这个村有共产党员9名,支部书记于进琛,对党忠诚,工作积极,办事认真,能出色的完成各项任务。当时,村政权、农会、抗联各项工作都很活跃。民兵中队是房良联合县最早的民兵组织。上石堡村党支部是房良六区(原属旧九区,1939年5月划为房良六区,1940年5月一、六区合并为一区)的模范支部,干部被群众称之为“群众领袖”,因此,引起了敌探、汉奸的注意。

1940年11月,房良一区事变发生前,汉奸杨天沛等人曾同驻南窖日伪军取得联系,暗中互相勾结。当时,上石堡村党支部曾给区委(区公所驻庄户台村)写快信三封,报告南窖敌人有向西活动之势,并报告汉奸队近日大肆活动,但未能引起区书和区长的警惕,因之,未采取相应措施。致使11月13日拂晓,汉奸队把区公所包围,区长王英武等四人被捕牺牲。直至汉奸在霞云岭村集会,大量逮捕我工作人员时,上石堡村党支部仍给区委写报告,结果报告落入敌人手中。敌人扑进上石堡村,村长兼支部书记于进琛、农会主任李福贵、抗联队长解景森、民兵队长王兴云被捕牺牲。这时,房良一区一片白色恐怖,上石堡村党支部陷于停顿,

但党员的信念仍未动摇。1941年，区委同上石堡党员接上了关系，恢复了支部工作。

房良一区事变后，上石堡村政权一度掌握在资敌者手中，他们带领敌人捕杀我村干部4人。支部工作恢复后，被害干部家属要求惩处资敌者，为死难者复仇。因当时各种条件未成熟，故对受害干部家属进行解释工作，从长计议，先从各项工作着手。这时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解情况上，掌握村政权资敌的详细情况，党员以群众的面目联合可靠的人，宣传负担重，以造成群众对村政权的不满。调查结果表明，从房良一区事变后，有六千斤粮食和六千元伪钞没有下落，并把这些没有下落的粮、款分摊到各户，更增加群众的负担。党员通过亲友关系扩大活动范围，使更多的群众对资敌者不满。至此，斗争准备工作已打下了一个根基。

在斗争准备工作过程中，资敌者闻到了风声，他们先发制人，从他们内部找出一个人来，把一切资敌、贪污的罪恶都推到一个人身上，即带领敌人捕杀我村干部者身上，其他二人则推卸责任，以缓和群众的情绪。于是，他们想联合党员一起反对带领敌人捕杀我村干部的这个人。他们说：不但带领敌人抓捕我村干部是他干的，资敌、贪污都是他一人的事。当时，村党支部接受过去的教训，不暴露目标，以把这个斗争变成群众的行动。开始说：“我们不多事”。但群众起来了，非要求斗争不可，结果第一步把带领敌人捕杀我村干部的人逮捕起来，为群众出了一口气。这时，群众对其他资敌者尚有些畏惧，党支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不仅要逮捕一个人，还要清算帐目，让资敌者把贪污的粮、款全部吐出来。这个宣传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但是找不出带头的人来。恰巧这个时候，上石堡村有十二个人到庄户台缉私线内取粮，村政权没给开购粮证，在扫兴回村时碰见区委，区委问明情况后，到庄户台给开了购粮证，并趁此机会将上石堡村资敌者资敌、贪污等罪恶给予详细揭穿，引起十二人对资敌者更加愤恨。这十二人回村后，鼓动其他群众非斗争资敌者不可。因此，斗争大会就以十二人为中心召开了，公开提出“反资敌、清帐目、赔粮食”的口号。

在斗争大会上，群众公开要求村政权断绝同南窖敌人的联系，把贪污的粮、款全部退出，粮食作为救济灾民之用，款由政府处理，镇压带领敌人杀害干部的人，为死难者复仇，恢复岗哨，组织游击小组，改造村政权等等。会后，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村里选举了新政权，各种组织完全恢复了1940年以前的活跃状态。

经过调查取证，政府对两名有血债的资敌者予以处决，一名判刑。资敌者贪污四千斤粮食，全部归还给群众，并救济了灾民。

1941年5月，上石堡村召开群众大会，区委指示要加强岗哨，防止敌人袭击，但岗哨上的人也要参加大会，结果被敌人包围。当时，会已结束，村干部正进行统一累进税填报，一个七岁的孩子看到敌人没有往自家跑，而是跑到村干部所在地报告敌人到了，干部全部逃了出去。干部混在群众中，群众把自己的手巾掏给干部（干部中有留着头发的），并说：赶快包上”。结果敌人没有抓到一个村干部，临走时说：“白来了，一个重要的人也没抓着”。但是敌人对上石堡村并不甘心，时刻有烧杀的可能，而群众也都明白这一点，群众革命情绪特别高涨，他们说：“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敌人烧房子？村里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组织了合作社，运粮救灾，村党支部发展了，民兵中队公开了，完全变成抗日的一面政权。”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考验

杜绍文

1946年9月,不足18周岁的我参加了察哈尔省国营贸易公司怀柔分店工作,在怀柔县黄坎村。不久因蒋介石动用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根据上级的部署商店要向深山区转移,商店的物资要进行分散坚壁,并决定让我协助一姓郭的业务员将二百只山羊送到敌占区出售。

头天下午出发,第二天的上午我们到了顺义县城外的一家客栈住下。恰好客栈就有买羊的客商。当天下午洽谈好价钱就将羊全部卖给客商,并商定到北平粮食店大北客栈交款。第二天我们到北平大北客栈后姓郭的单独同客商接洽,客商说款还未到。一直等到三天,我问他对方为什么总不付款。这时他才对我说:“款还得再等一两天。”并说:“咱那边(指商店所在地)已被国民党军给占领了,咱们也回不去了,你北平有亲友没有?如有亲友我给你点钱,暂时到你亲友家住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我说:“我姐姐家住在北平,可总等到这里算怎么回事?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得回去”。他又说:“要回去,我给点路费你自己先回去吧,暂时我不回去了,等拿到钱以后再说。”我一听这话,心想不是卖羊款没拿到,而是他思想动摇了,想要背叛革命。当时我想我如果坚持要他带着款同我一起回去,看来不仅达不到目的,很可能被他出卖,我也回不去了。组织上什么情况也不能掌握,不如我一人先回去,把情况如实向领导汇报。于是我表示自己先回去。就这样他给了我少许的路费我独自一人返回。

结果坐火车到顺义站,听说顺义以北铁路已被我军拆毁,于是我在顺义下车,步行50多华里,深夜才到家。不久就下起了大雨。紧接着怀柔县城西枪炮响声不断。第二天一早我本想起程进山去找商店,不料因夜里敌人先头部队已从北宅、峪口村那边攻到了山里,即商店所在地黄坎、九渡河一带,一直连续了三天向里进攻。这样就把我截堵在山外,我被迫在家附近的山沟里隐蔽了几天。当时就有些好心人对我说,国民党军队不仅打下了张家口市,就连延庆也被占领了,这回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什么希望了,你可不要再去了。一位负伤在家的党员也劝我。我听了这些话思想上丝毫未发生动摇。我对他们说:“我既然参加了革命,就要革命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就是死也要和同志们死在一起去。”人们见我态度这样坚定,就再也没有人劝说我了。就这样待国民党军队完全过去以后,我就毅然钻山沟走小路日行夜宿到处寻问单位转移的去处。一直到第五天终于在昌平县黑山寨的东沟找到了单位。当我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之后,真好似离别多年的亲人重逢,心情无比激动。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感到无比的温暖。我把郭的情况和我当时的想法,向党组织如实作了汇报。党组织肯定了我的想法和行动都是正确的。从此我又能和同志在一起。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经受的初次考验。

第二次是1948年底密云县解放后,经过一段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之后,按照土地法大纲,1949年秋后开展了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同当时城关区的农会主任李某还有两名女同志为密云县城内五街九街两个街(相当于两个村)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农会主任李某为组长,我为副组长。

当土改进入到贫下中农分胜利果实(即分地主阶级的浮财)阶段,五街的农会主任侯某等几人商定从没收地主的浮财中选出两套上等的被褥,还有鸭绒筒被等单独存放起来。一天侯某把李和我带到妇救会主任范某的家里,打开一个柜子说:“我们看你们都很艰苦,缺衣少被的,你们黑天白日的辛辛苦苦帮助我们贫下中农搞土改斗地主、闹翻身,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同我们贫下中农共享胜利果实。”听他说完后,见李不语,我当即表示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东西我们决不能收,因为这是贫下中

农的胜利果实，我们要了就是侵占了贫下中农的利益。我说完后，他们还是执意要我们收下，说这算不了什么，并说你们要是不收，就是对我们贫下中农不亲，没拿我们贫下中农当成自己人，就辜负了我们贫下中农对你们的一片真情。他们以为这样一说，我们就不好意思再驳他们的面子了，就不得不把东西收下。当时我紧接着说：“你们要是真爱护我们，就别非让我们把东西收下，这就等于逼着我们犯错误。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戴，实际上是害了我们。”当时李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们见我们态度这样坚决，就不再勉强了。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都很清苦，我当时在机关里睡的是凉铺板，有一条露着棉花的破被子，天天睡觉缩成一团。其它同志也如此。当时我虽然还不懂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任何时候都没有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权利，而只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义务。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有人揭发，我才知道，李单独接受了农会赠送的那些东西。

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使我深刻的认识到，一个人虽然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但不一定都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到人生终点。因为每个人在一生的征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考验，就看你怎样对待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上万脱险记

张成基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47年8月，正是敌人强化治安、加紧搜捕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时期。我当时任良乡一区区工委城工委员，主要是做联络工作。根据上级的指示，良乡县委开始贯彻交穷朋友工作。县委派我与良乡县宣传部长李铁、勤务员赵岐山，还有优抚助理吴云生到上万一带敌占区找贫苦农民以交穷朋友为中心同时侦察敌情。

8月20日晚上，我们来到村北一位姓张的老两口家里，打算住下，可这老两口怎么也不让住，他们关心地说：“如果留你们住下让甲长知道了报告‘白箍儿’（良乡保安队），他们立即就来杀人，烧房子，可不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离开了老乡家，到山头上蹲着。第二天早上我们躲到山下几户人家附近，这时来了八个“白箍子”到各户寻问昨天晚上有几个八路军来没来，老乡们说没有，他们就到王佐据点去了。以后，接连三天照例来寻问，都从我们眼前过，这时李铁对我说：“咱们把他们‘拣’喽！”我说：“咱们四个人，人手少，‘拣’不了，要‘拣’，就得回去组织武工队。”我们回到西大洼，组织武工队和区干部近八十人的队伍。决定在8月25日“拣”掉这伙敌人。后因敌人已占领有利地势，我们只好放弃了原定计划。不久首长叫我带着一区宣传委员于庆录、吴云生到吕峪沟一带侦察敌情。我们到任国庆家（地下联络站），他说：“快回去吧，敌人天天来搜！”我们向他了解了敌人数量、装备以及每天什么时候来搜山的情况后，就来到了上万村北山鹰咀崖上。早晨七点多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就在附近李井泉家（地下联络站）避雨，他家院子都是没脚面深的积水。雨停了，李说：“今天‘白箍子’可能来不了啦，给你们带上这些东西走吧。”他从里屋柜里拿出接关系时用的物资，脸盆2个，日光牌肥皂九条，还有红糖、花洋布等都是从敌占区买来存在这里的。我让吴云生带上先上山，我去马德清（关系户）家一趟，说着我们一起出了门口。出乎我们的预料，一群“白箍子”已经围了院子。我猛地往前蹿了出去，一步蹿到门前边地坎下趴下，吴云生把手中端的脸盆及

盆里的东西往出一扔，拔腿就跟我一个方向往西跑。当堵在门口的敌人一愣神，把注意力分散在扔出的东西上时，我们已跑出很远了。

“抓活的——”“抓活的——”“你们跑不了——”，敌人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边追着，一边往半空打枪。我提着手枪，身穿深灰色的裤褂往前边跑，对面的路口一挺机关枪正对着我，射手正要扣动板机，旁边的人说：“那个穿灰衣服的是翟队长过来啦，不要打！”（驻坨里的伪军小队队长叫翟权，那天他也穿一身灰衣裳，率队追捕八路军）我们躲过了敌人的射击，一口气跑到崇各庄的北四位村西，敌人跟着我们的脚印追过来。我们跳进一道大水沟里，上岸进了北四位村。村北又来了“白箍子”，我们又向东南跑去。钻进南上万的桃园里，又饿又冷，等到天黑又下起了大雨，又回到鹰咀崖上。我的鞋早已跑丢了，爬崖时又踩了不少葛针棵子，双脚全扎上了葛针刺儿。到了水洞儿跟老乡家要了双破鞋绑在脚上坚持跑到了西大洼杨维秀家里，受到杨维秀父母的热情周到的照顾，使我消耗已尽的体力得到了恢复。所以当时我们就发誓：“宁忘爹和妈，不忘西大洼”。

1985年秋，我与老区长方舒一同回到了阔别三十八年的西大洼，触景生情，感慨万分，当时作诗一首，以为纪念：

“战友重逢西大洼，三十八年探旧家。
房屋残存无人影，不见昔日杨妈妈，
草木丛生盖院落，户主村中见新厦。
忆往残痛看今日，悲喜交加垂泪花。”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千河口战斗

方舒

1942年12月初，日寇从房山城、张坊和石亭（涑水）等据点，拼凑了七八百人的兵力，进至千河口，向我房山二区进犯。我军九团派出了两个连，跑步登上穆家口南山，阻击敌人。

一天，约上午九点，日寇由千河口村西北过拒马河，行进到一片开阔地。我军居高临下，一阵机枪和排枪倾泻过去，打的敌人措手不及，几具尸体撂在河滩，就退至千河口，抢占村北山坡，向我军盲目射击。然后连续两次强渡拒马河，企图夺取穆家口，均被我军击退。

我军阵地山峰顶端，是一处宽阔的平台，地势对我军很有利。

敌我据两山对峙，中间隔着拒马河相互射击。战斗便是断断续续，暂形成相持局面。

第二天下午，我军发现敌人占据的山坡后面是个马鞍形，靠敌方山峰的最高处敌人并未占据，灌木丛生，利用此地形攻击敌人很有利。

时近黄昏，我轻重机枪一齐向敌阵地猛烈射击，佯攻正面。同时派出一个班，绕过村东，涉过冰冷刺骨的拒马河，爬上敌人背后山峰的制高点。战士们居高临下如猛虎扑食冲下山去。这迅雷不及掩耳式的冲锋，打的敌人懵头转向、吱哇乱叫。紧接，和敌人展开刺刀肉搏。此时，我军后续部队，轻重机枪掩护，向千河

口正面敌人攻击。日寇背腹受敌，见势不妙，便乘夜幕狼狈弃尸而逃。

千河口战斗，我军共歼敌三十余，伤数十人。我一个班的八名战士英勇牺牲。

平西《黎明报》很快刊登出这次战斗胜利的消息。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元港村抗日纪事

任成利

原宛平二区（今大安山乡）元港村，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形成了两派，一是以张文起、安自稳、董凤伶为首的“穷人派”，一是以王国选、王国华、王国通为首的“富人派”；两派之间明争暗斗，针锋相对，毫不妥协。

“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党和政府派出干部到大安山地区开展抗日工作，杨怀清、于振边等先进分子积极配合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有力助手。他们到各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杨怀清先后担任了宛平二区区委副书记、书记，于振边担任了区公安员。于是，他们二人就成了大安山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头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政府在元港村设立了活动中心，并先后在各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政府依靠这些组织开展工作，并从中发展共产党员。

这时，元港村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穷人派”很快倾向于我们政府，而“富人派”则处处和政府做对，巴望着日本鬼子早日来大安山。此时的两派斗争，已经发展成为两大阶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较量。

当时，政府曾制定了一项类似现在税收的政策，被称做“合理负担”。也就是说，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没钱没粮的出劳动力。王国通、王国忠等人带领“富人派”公开抗粮抗税，对抗政府分配下来的合理负担。“穷人派”对此极为气愤，上告到政府，打起了在大安山地区轰动一时的合理负担官司。经过政府的审理公断，“穷人派”胜利了，“富人派”不得不向政府交纳粮款。从此以后，两派斗争日趋深化，“富人派”千方百计打击“穷人派”，而“穷人派”有政府撑腰，他们也奈何不得。

1940年10月，合理负担官司结束仅一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大安山地区。他们先后在大安山村修建了五个岗楼，宝地洼村和南晃各建了一个岗楼，岗楼之间架设了电话线。日本鬼子派了一个中队的日军、三个中队的伪军（系伪房山县孔宪江部下）驻守大安山。元港村虽然没有建据点，但是距大安山村只有五里路，是敌人的重点扫荡目标。伪军大队长马德福经常带领日伪军到各村扫荡，抓捕我方干部，实行“三光”政策。从此，大安山地区的抗日斗争被迫转入地下。

敌人为了在大安山地区站住脚，先后建立了维持会、大编乡、联保处和警察所等伪组织。他们建立了保甲网络，即各村根据户数的多少建立若干个保。元港村就建了四个保；保下面每十户再建一甲；保与保之间建立联保。敌人利用这些网络组织，在各村发展特务，搜集我方情报。

元港村的王凤鸣当了保长，王国通、王国忠等人完全投靠了敌人，他们穿梭似的来往于大安山地区的据点，频繁向敌人报告我方的情况，以此领取赏钱。

元港村的人民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建立了以“穷人派”为成员的政权组织，安守邦被选

为我方的村长，还发展了若干名党员。他们及时而秘密地向党组织报告敌人的活动情况，对“富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开展分化瓦解工作。

肖仕儒最初也是倾向敌方的，后来我方人员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攻心，终于使他认识到做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日本人卖命，于是倒戈投靠我方。

有一天，我方人员找到肖仕儒，让他把汉奸自卫团长宋德福引出来。肖找到宋说，“皇军”有重要事情找他，宋信以为真，跟着肖走了出来。当走到大北河的下边，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我方人员立即冲上前去，把这个恶贯满盈的宋德福按倒在地上，用石头砸死。

通过这件事，肖仕儒已经完全取得了我方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民兵队长。敌人恼羞成怒，想方设法地抓捕他。

1942年4月，由于特务告密，敌人在一天早晨包围了肖仕儒的家。肖仕儒和母亲被抓到警察所。敌人对母子二人严刑拷打，让他们说出元港村的八路军干部和共产党员。肖仕儒宁死不屈，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最后被活活地钉在木板上，放在大街上示众，直到尸体发臭了才让家属取走。

1943年春的一天，日伪军向元港村进行扫荡。接到情报，全村的干部群众都跑到煤窑里躲藏起来。敌人进村后，发现空无一人，就到处搜、抢、砸。可恨的特务为他们指点目标，于是敌人直向煤窑扑去。敌人朝煤窑里打了一顿枪，又哇啦哇啦的叫喊了一阵，看看还是没动静，就把煤场里所有的木料、柴草塞进煤窑口，点起了大火，想把所有的人都烧死在里面。正巧，煤窑洞里有一个通风孔，滚滚的浓烟都从通风孔排走了。敌人以为里面的人肯定都烧死了，便哈哈大笑滚回了大安山。

1943年9月，敌人在一天夜里对元港村进行偷袭。按照特务事先在大门上画好的“十字”标记，包围了村长安守邦的家，将安守邦、其弟安守相和串亲戚的外甥谭发财(史家营乡金鸡台村人)抓了起来，另外还抓了七、八个老百姓，当时就把安守邦打了个半死。敌人用一根绳子将这十几个人捆成一串，押往大安山警察所。每个人都遭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是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安守邦被打得死去活来，他说：这伙人里除了我是党员干部，其余的人全是群众，跟他们没有关系；杀了我不要紧，共产党是杀不绝的！敌人杀害了安守邦、安守相兄弟俩，硬说谭发财是八路军的探子，最后也把他杀害了。

1944年2月的一天，抗勤干事肖英儒和同事张俊明去中山村检查抗勤工作，路过瞧煤洞村时，又找到抗勤干事王永年研究抗勤工作。谁知王永年早已叛变，他先将二人安排到一个屋内休息，稳住他们，然后他跑到大安山向敌人报告。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肖英儒二人觉得情况不对，便立刻离开。当他们走出村口到大妹台时，发现王永年带着敌人来了。肖、张二人立即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但是，敌人还是发现了他们，子弹雨点般的朝他们打来。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肖英儒身边爆炸了，肖英儒受了伤，翻滚到坡下，张俊明趁机逃跑了。敌人到了肖英儒跟前，对他一顿拳打脚踢，然后用绳子捆住，又从瞧煤洞抓了两个老百姓，将他抬到大安山警察所。这时的肖英儒已经奄奄一息。敌人看到已经从肖英儒嘴里得不到什么了，就把他杀害了。

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元港村的人民。安守邦牺牲以后，安振春又当了村长，领导着村里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继承烈士没有完成的事业。因此，安振春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对元港偷袭包围，进行抓捕，但都因及时得到情报，而没有使敌人得逞。

1944年3月，在我军民的打击下，日本鬼子撤离了大安山地区。从此，大安山的人民重见了天日。

1947年，大安山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汉奸王国通、王国忠，地主肖国儒被我政府处决。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我当民兵中队长的回忆

王子良 口述 张玉泉 王国林 整理

1948 年底房山一解放，我就当上了房山城关区南关村的民兵中队长。后来又当了城关区的联防主任，分管十二个村的民兵联防工作。我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土改”、“镇反”等运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政权。

1950 年我参加多次剿匪活动。是年春天房山城关区委给我下达命令，要我在一夜之间把住房山附近的张德祥的残部和有反攻倒算行为的恶霸地主共六人都逮捕起来。天黑后我带着十个民兵，逐个将他们捕获，他们中有伪房山县治安队中队长张老六，恶霸地主王荫亭等人。

1950 年初，我县公安队战士出去执行任务行至曹章村，被还乡团团长、伪治安军打死，抢走我冲锋枪一只，子弹 10 枚。他们把枪藏到坨头村张德的家里，之后到南尚乐乡南河村去集中。南河村的民兵中队长张国仁叛变，跟这伙残匪打得火热，此村成了残匪们的根据地。当日县公安队组织 20 人，区里要我带 10 个民兵，共 30 人组成剿匪小队，我带一只冲锋枪，其余是全副武装，连夜跑步，要在天亮前赶到南河。夜行军 60 余里。天亮前我们终于赶到了。不想，十多个残匪跟我们交火后撤离了村子，双方都未造成损失。但后来我们把叛徒张国仁抓着了，带回了房山。不久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对其执行枪决。

1950 年 4 月，县里要集中杀一批反革命分子。4 月初的一天在房山西街城隍庙前召开了千余人的公审大会。会场前跪着 26 个反革命分子。审判大会结束，原定拉出西门枪决（已是不成文的规定）。突然决定出东门执行（今朝曦公园南门一带）。我因带民兵要清理现场，所以事先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残匪活动猖獗，事先曾扬言劫狱。这样保证顺利进行。

1951 年酷夏，由于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搅乱人心，扬言闹拍花的，说拍花的翻穿皮袄，夹着大尾巴，在房上爬着走。见着小孩就抠眼睛挖肠子吃。南关村人说田各庄发现了，到田各庄一查，说南关村发现了。到底谁看见了，谁也说不清。弄得孩子大人天一黑就不敢出屋子。那时我就组织 12 个村民兵，以村为战，整夜里在村道口站岗，街上巡逻，熬得精疲力尽，谁也没发现拍花的是个什么样子，但又不敢放松警惕。

那年夏天，饶乐府东边发现了劫道的，有的人挨了劫，村里向我报告，我得到了消息，带上南关几个民兵就去追，追了半天，也没追着。

那年初县里的公粮（小麦）都存到南关的北庙里。我带着一个班的民兵看守。不料，一天夜里来了土匪抢粮。他们使劲推门，推不开，就往院里打枪，我们立刻反击。他们不知里边有多少人，又怕城里的公安队出来兜后路，就急忙跑了。

我因为积极干好本职工作，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又没有分文报酬，较好完成了上级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因此不断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1951 年末我被评为县里和河北省治安模范，出席了省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会上河北军区司令王光华、政委林铁颁发给我一块奖状，至今还保存着。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作者王国林系原区法制办干部

抗战小邮局

任成利

原宛平县第四区(今史家营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地处百花山下,是个深山区。

这个地区的每个村庄,我政府机关都曾经居住过。当时的政府机关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没有电话。因此外出办事全靠步行,公文、文件都通过村里抗勤干事派专人送,工作效率低,影响支前工作,又影响生产。后来政府经过研究,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学校较高年级的学生。村干部和老师经过商量,把任务交给年龄在十四岁以上的男同学担任。我作为一名适龄者,和同伴一起被召集到村公所开会,由抗勤干事任成博作动员,交待具体任务。我们那时虽然年岁还小,但我们抗日的热情都很高,都非常愿意承担这项工作。我们到会人员排了值班表,我的名字被列在第一名。从此我们村的“小邮局”正式成立了。

“小邮局”的“局长”由本村的抗勤干事任成博担任,我们自然就成了“小邮局”的“邮递员”。其他村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全区形成了一个通讯网。

“上班”第一天,我背着自制的旧布书包来到了村公所,去接受“局长”分配给我的任务。然后把信件和登记表放进了书包,在上面盖上一些其他东西。书包里除装有信件外还有一张登记表,登记表的大概项目有“日期、送信人姓名、信件件数、送达地点、收信人(签名)。”

我接受了任务后,就上了路,刚走出村不远有人问我“上哪?”我说,去串亲去。

当时秋林铺村驻扎的政府机关有:宛平县政府,宛平县教育处,宛平县抗日联合会(简称县抗联)。邮政“总局”设在曹家坊村宛平县第四区公所。我村距曹家坊村八华里,可以直接送到。较远的村还需沿村转送。如有紧急信件,在十分火急的情况下,信上插有两根鸡毛,叫做“鸡毛信”。如有这种信件,不能耽误一分钟,宁可饭不吃、水不喝也要尽快把“鸡毛信”送到。

当时庙安梁、大安山、河套沟等地均被日本占领,并建立了据点,敌人时常向我山区进犯,实行三光政策。我们这些送信的孩子的家长和村干部都为我们的安全担心。

我们送信途中,还要有遇到敌人的准备。如有途中遇到敌人怎么办?“局长”是这样给我们布置的:“一旦发现敌人时,把书包藏起来,自己尽快跑开,到隐蔽的地方去。如被敌人抓住就装傻孩子或哑巴。”“局长”要求我们有人在,信就要在,人和信均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

在家长和村干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使全区的通讯任务畅通无阻。由于我们投递及时,为抗日工作赢得了许多时间。有一次我接到一份敌人进攻的情报,是一封鸡毛信,我快跑到秋林铺村。把信交给“局长”。人们立即做战斗准备,坚壁清野,安全转移。当敌人到来时,把敌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敌人气急败坏的烧了一些房子,毫无其它收获的走了。

我们这些小邮递员们不管刮风下雨,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邮路上,我们的足迹遍布全区的山山水水,保证了全区范围的党政机关与各村的通讯联系。

小邮递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房山县五十年代“肃反”运动

王硕儒

1955年，大规模的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但是，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尚未肃清。因此，遵照上级有关指示，全面开展了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运动。

在中共房山县委的领导下，首先组建五人小组，负责全县“肃反”运动的具体领导，并抽调政治可靠人员建立五人小组办公室。根据县委五人小组的统一部署，从是年3月开始，县直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进行“肃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对本部门、本单位所有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截止7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55年8月2日，房山县第一次“肃反”(试点)正式开始。在房山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集中了县供销社、县手工业社、粮食局、运输站、纺织品公司、干部学校、县中学等13个单位，共180人(其中教职员57人)参加，其中，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所谓“骨干”)81人。经摸底排队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的重点对象30人。运动由县委五人小组成员隗永树、蔡景超及五人小组办公室直接领导和管理。参加集中“肃反”的以单位编组，由单位负责人担任组长、副组长。

这次“肃反”大体分为四个步骤进行：一是动员。主要是由五人小组领导讲解“肃反”的意义、政策、方法和步骤。二是组织学习。主要是学习“肃反”文件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肃反”的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就是“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赎罪，立大功者受奖”的政策。政策界限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好人；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是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漏掉一个坏人。三是开展小组说理斗争。经过动员、学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要求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通过骨干，对政治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人予以帮助，让其放下思想包袱，如实坦白，对不肯坦白交待的少数人，在小组内开展说理斗争。四是核实定案。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本人交待，进一步调查核实，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定案。

截止1956年初，房山县第一次“肃反”运动基本结束。通过运动初步认定：原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上升为重点人的5人，其中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人，潜伏特务分子1人，土匪1人，现行反革命1人，其他分子1人。原怀疑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实际无问题的2人。原“肃反”的重点对象下降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3人。加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上升为重点人的5人，共有重点对象32人，其中特务分子11人，土匪1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反动会道门骨干1人，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反动分子10人，流氓分子1人，其他坏分子4人。初步处理意见是：依法逮捕2人，劳动教养2人，“洗刷”回家2人，机关管制3人，给予其他行政处分10人，免于处分5人，案情复杂，责成专案组查清后再处理8人。

根据中央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和河北省委(房山县当时属河北省管辖)会议的精神，中共房山县委五人小组于1956年2至3月，对此次“肃反”试点案件进行了甄别和复查。同年4至5月，贯彻河北省委4月会议精神，本着严肃谨慎相结合的原则，又进行全面、细致的第二次甄别和复查，截止1956年5月8日，复查工作结束，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4人，刑事犯罪分子1人，共计15人，其余17人均为一般问题。处理结果是：依法逮捕1人，劳动教养1人，给予行政处分3人。

房山县的“肃反”运动，经历了三年的时间，至1957年底，在县直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中已开展完

两批,共有 1463 人参加,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36 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 2.46%。对反、坏分子免于处理或不给任何处分的 30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的 83.5%。同时,原来怀疑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查清后属于一般问题的 36 人。并弄清了 483 名干部、职工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为后来对干部、职工的使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参加通县“四清”会战的回忆

张 珍

1964 年 10 月 14 日,北京市委组织本市十八个区县的机关干部和市级及中央机关、大专院校的干部和教职员,还有少数农村知识青年,总计万余人,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通县各公社、大队(村)、社办企事业单位开展四清工作。

房山县抽调百余干部与人民大学、地质学院、北航、北京建工学校、北京铁路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职工及市委、市政府的部分干部,兵分两路,一路由当时的县委书记霍梁带领,进驻后寨府公社各村。另一路由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胡汉文带领,进驻杜柳棵公社各村。我作为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干事随部长被分配到杜柳棵公社的工作队。为了加强领导,通县县委建立四清工作总团,各公社都建立了四清工作分团,负责领导本公社的四清运动。霍梁任后寨府分团的党委书记。他为了不向群众暴露身份,经市委同意,化名叫霍光远。杜柳棵公社四清分团由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甫同志任分团党委书记,胡汉文任副书记,兼康各庄村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北京铁路局工会主席王吉任康各庄村四清工作队的副队长,北京地质学院的人事处长吴远芬任村工作队副队长兼这村第二生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我任副组长。

四清工作队的任务是,组建阶级队伍,整党、建领导班子,以搞好大队(村)生产队的经济四清为主。具体内容是:清工分,清帐目,清借粮借款,清仓库。所谓清,就是全面查。重点查干部有无多记、私记劳动工分的;查帐目是否混乱,有没有贪污、挪用公款现象;借粮借款(指借大小队集体粮款)是否有手续,有没有长期只借不还、变相侵吞多占现象;查大小队仓库内存放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是否有帐,帐库是否相符,有没有丢失、被盗、霉烂、损坏现象。

运动中期,上级强调四清运动要以清干部党员政治方面的问题为重点。包括查干部的阶级立场、阶级界限,依靠什么人、重用什么人等,查阶级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有无反动言行,有没有蠢蠢欲动。清查村里主要领导是否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清查干部党员的思想,检查政治立场,是否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对阶级敌人是否有认识模糊、立场不稳的问题,有没有为阶级敌人说话、喊冤叫屈办事的现象,是否接触过暗藏特务,是否传播过谣言等现象。1964 年底,根据中央决定: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每个干部、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等要检查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要从党内到党外,反复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剥削思想,要把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思想批倒批臭批彻底,以使社会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保持纯而又纯,方向正而又正。

开展四清运动根据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突出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先召开党员会、干部会，主要是讲清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运动，要端正态度，要主动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要接受考验，运动中对自己担任的工作要积极干好。然后工作队深入贫下中农家庭、田间地头，召开炕头会、地头会，了解群众对党支部、对干部党员的意见，了解敌情，听取贫下中农对四清工作的建议和要求。通过访贫问苦，发现新骨干，寻找新的依靠对象。在康各庄二队，串联摸到一户是三代贫雇农的张占有有一家。他一家母子三口，长子张占有忠厚老实，为人正派，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无二心。由于家里太穷，快四十岁了，还打着光棍。他身强力壮，是位农业能手。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能力较弱。四清工作队把他作为建立党的阶级队伍的依靠力量。并上报四清分团党委批准，作为根子，要帮助他学习、入党，作为四清运动后期建立党支部的书记人选。在四清运动中让他担任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同四清工作队日夜相守，参加运动，借以锻炼提高他的工作能力。在四清工作队精心培养帮助下，他在运动后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不久就被选举为党支部书记。因能力较差，建立新党支部后，工作并没有新的起色。

第二，工作队必须严格执行八项纪律。八项纪律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是：

要突出政治，认真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不到现任村干部家吃饭。只能去贫下中农户，但不能吃鱼、肉、蛋。严防阶级敌人借机腐蚀四清工作干部。不准同村干部、党员和群众攀亲、认友，暴露原职务；坚守岗位，认真负责等八条。工作队员每周要开一次生活会，检查纪律执行情况。

第三，四清运动要求村里大小队干部下楼。什么叫下楼呢？工作队进村后，宣布所有现任干部（包括书记、支委及治保等部门，大队小队的干部）都要在四清运动中检查交待问题。不是主要干部的、贫下中农对他意见又不大的，在会上说清楚，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该干什么工作还干什么就算过关了。对主要干部，特别是贫下中农意见较大的，要在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上反复检查交待，听取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的批评（批判）意见。这个检查交待过程，干部群众称之为下楼。凡未达到贫下中农满意的就是没下楼的，凡是达到贫下中农满意通过的，就是下楼过关的干部。凡下楼过关的干部，如果问题不大，贫下中农拥护，又有一定能力的，还可继续工作。

对有较严重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四清运动要整的重点人，是检查批判的重点对象。工作队根据摸底调查，由四清骨干面对面与四清重点人用政策攻心、甚至用熬夜、逼问、罚站、弯腰等违背政策的措施，搞逼供信。因为各村整的重点人，都是经分团党委批准的，把所谓四不清干部视为坏人。因为我所在的村没发现干部较大的四不清问题，因此，整干部没那么激烈。在八九个月的运动时间内，下楼时间要占四、五个月。形成整个四清运动就是整干部过程。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

四清运动整了干部。运动中期，不了解运动底细，不敢说四清运动一个不字。等到四清运动后期，认为怎么也得挨整，对贫下中农骨干和工作队给他提的问题，他认为不确实，就公开顶牛，甚至让工作队给他恢复名誉，公开同工作队吵闹。

康各庄的四清，在干部检查结束后，下台的干部有意见，对自己挨整不满意的情况下，根据四清分团党委指示，工作队撤离了康各庄村。从1964年10月14日进村，到1965年5月24日离开，前后共224天的四清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一次亲身经历的战斗

任成利

原宛平四区(今史家营乡)是革命老区。这个地区的民兵在战争年代,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配合野战军和地方军作战,如埋地雷、割电话线和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项任务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下面,回忆自己一次亲身经历过的“破交”战斗。

我记得八路军七团和九团在日伪时期经常活动在宛平四区一带。他们每次对敌作战都有民兵参加,有时和军人一起战斗,有时为八路军运送战斗物资等,当时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在解放战争中,他们轮流到宛平五区王平口、白道子、十字道一带配合宛平县大队作战,每三个月轮换一次。他们已成了县大队的有力助手。

1945年,我不满17岁,就参加了宛平四区的民兵组织,并且也执行了几次战斗任务。这一年,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转入反攻,日本侵略者已节节败退,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这年年初,盘踞在宛平五区大台的日本鬼子已撤到门头沟一带。但是,他们不甘心自己即将失败的命运,有时还利用铁路交通向我内地进行侵略骚扰,做着垂死前的挣扎。

为了巩固抗战的胜利成果,挫败敌人的侵略阴谋,我宛平县政府决定,摧毁门头沟至大台的铁路。任务由宛平四区的民兵完成。3月,四区武装部调集全区各村民兵到区政府所在地金鸡台村集中。我也和其他民兵一起来到金鸡台村,在村里进行了整组、编队。全区大约三百余人编了一个民兵大队,大队长交待了任务后就驻扎在金鸡台村。

第二天早饭后,民兵们怀着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出发了。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到了宛平二区宝地洼村。因天色已晚,就在这村住下了。第二天一早,爬过了月牙庵,中午到大台,在桃园村落了脚。匆匆吃完饭,立刻来到铁路沿线,大队领导给各村的民兵分配了任务,划好了路段,战斗就开始了。

谁知我们带的农用镢锹,怎么也对付不了这长长的铁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起下少量道钉,干了一个下午,毫无进展,怎么办?大家犯愁了。

晚上,大队领导组织大家讨论,同志们都开动了脑筋,献计献策,最后终于研究出了战斗方案。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来到铁路线,一字排开,先在枕木下面挖坑,然后再把木柴放进坑内点燃。霎时,烟火冲天,整个铁路沿线形成了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经过一个上午的“火战”,大部分枕木被烧毁。然而,铁轨还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齐心协力,连挖带推,硬是把连接着的铁轨推下了路基。这样一来,铁路交通彻底瘫痪了。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日本鬼子再也不能借助铁路运输来侵略和骚扰我们了。

这天夜里,我们高兴得连觉都没有睡好。因为我们圆满完成了这次战斗任务。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被日寇抓去的日子

李炳田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我是丰台区羊圈头村人，抗战时期，我们村是游击区。我十多岁就当了几童团长，整天站岗放哨，还跟大人一起去挖地道、征公粮等。1944年，我刚满13周岁。这年农历3月18日良乡庙会那天，一队日本鬼子从涿州穿过良乡向西北我解放区讨伐。路过我们村时，我连忙跑回家在房后头藏起来，日本随后追进来逮住了我。从我们村一同抓走的还有李江、李文海、李西海、李术芬等4个赶驴驮脚的大人。让我们当民夫干苦力。一走就是43天，我们的小命都提在日本鬼子的手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弄死。

在讨伐的路上，鬼子叫我伺候日本小队长。行军时，让我给他背两个水壶、一个酒壶。休息时让我给他捶背、砸腰或登腿上去踩，给他解乏。鬼子和汉奸把我们带到门头沟的鲁家滩向西北到赵家台，便开始爬坡了。山坡特别陡峭。我爬不上去，鬼子就在马鞍子上拴根绳，让我拉着绳往上拽。深夜到了燕翅，小队长非让我到永定河里给他去灌水，深更半夜的我差点儿掉进河里。第二天傍黑到了方良大村，我们走了一天一夜，一口饭也没进，我连累带饿，都抬不起头来了。正在这时我见一个扛机关枪的鬼子，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花生仁。我过去就抢了一小把塞进嘴里。那小鬼子急了，狠狠地打了我两个大嘴巴，我的脸立即红肿起来。

走了两天一夜，来到怀来县镇边城我边区政府所在地(专区，辖平北几个县)，地处一个山窝里。因我边区事先得到了鬼子要进攻的消息，便事先撤到西面上坡上。鬼子见我八路军正往山梁上爬，便疯狂地往上攻，机枪、小钢炮一齐打。我八路军就往下压着鬼子打了约两个小时便撤出了。日本鬼子进城后，四处抓鸡逮猪，弄得鸡犬不宁。在西城脚发现几头大黄牛，小队长让我去赶，我刚走到一头大牛跟前，一个鬼子便“砰”的一枪把我跟前这头牛打倒了，正好把我压在它的身子底下，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鬼子们哈哈大笑起来，饿狼般的跑上前去用刀子割下肉，架上柴禾烧着吃。

夜深之后，鬼子又向西深山区继续讨伐，到了距镇边城20多里的水头村住下来修筑工事。这村的人全跑光了。在这村几乎住了一个月，天天吃土豆，肚子都吃坏了。一天，不知鬼子从哪儿弄来几口袋荞麦，让我跟李江、李术芬去推碾子筛面。快碾完了面，我对他俩说：“咱们留下点吃吧”，没想到在一旁监视我们干活的鬼子懂中国话。他指着我的脑门说：“小孩，是毛猴子(八路)，坏喽坏喽地有。”说完就给我一个大耳光，一下把我打倒在地上。我急了，站起身随手抄起筛面箩，使劲扣在他脑袋上。因用力大，箩底掉了，箩圈便套上了他的脑袋。那鬼子拿下箩圈，抽出碾棍向我头顶打来。正在他举棍时，李江从身后抱着他往后一退，碾棍打在碾盘上。李术芬又上前迎着他，他俩一个劲儿地求饶，再三地说好话央求他。正在这时，鬼子的紧急集合号响了，那鬼子什么也顾不得了，连忙向队部跑去，这场灭顶之灾算是过去了。

鬼子临走前，把全村所有的房子都点着了，火光、烟雾冲天而起。鬼子从山上逮回十多个当地妇女，圈在一个屋内，轮奸了她们，最后还点着屋子烧死了她们。这帮没有人性的畜牲太残忍了！

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很想妈妈，总想逃跑，但又不该，怕踏地雷，特别是进入边区的山道上地雷很多，跟鬼子进山讨伐很危险，尽管队伍的前边有工兵探雷，探着了就作个记号，队伍就绕着走，这也免不了有时炸死人。我和我的四个老乡以及从半路上抓的民夫，总共干了43天，从水头撤出，走了一天一夜，过了八达岭才把我放了。我回家心切，日夜兼程，第二天傍晚回到了家里。

母亲日夜思念我，哭坏了眼睛。她天天向北烧香叩头，求佛祖保佑我。她天天盼儿归，儿总也不归，就

以为我扔在了外边，没想到这个晚上我突然进了家，出现在她的面前，我娘俩喜泪交加，抱在一起……
回忆起当亡国奴的滋味，心里真不好受啊！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房良两县解放初期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

王凤奎

1948年底，房、良两县全境解放后，革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情况还十分复杂。原国民党警察局、县政府、县党部、保安总队部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逃跑，一般中下层分子中，有的隐蔽潜伏，伺机待变；有的动摇恐慌，不知所措；有的企图与我们拉关系，争取合法。城内尚有国民党、三青团、防护团、情报网、青年壮丁等旧组织存在。有些群众，尤其城内市民，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对我党的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存在严重的思想顾虑。反动分子在群众中的气焰还十分嚣张，有的敌特及反动分子活动猖獗，采取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破坏我党的各项工作。

随着土改工作的深入进行，过去逃亡在都市内的国民党反动党特、伪军政宪人员、乡保长、逃亡地主及部分受欺骗、蒙蔽的群众，陆续回到原籍。这些人还乡后，大部分人表现出听从政府法令，安心劳动生产；但仍有一些人对党的政策有怀疑，表现出恐慌不安；有的对自己的罪恶回避敷衍，或拉拢村干部，以取得保护、依靠；有的伪装进步，企图混入革命组织内部；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甚至公然要房要地，进行反攻倒算。

针对上述情况，为彻底摧毁敌特组织和他们的阴谋活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维护社会治安，两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对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在登记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重点审查、集训、管制等措施进行了处理，为以后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提供了情况底数。

为搞好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房、良两县公安局分别在两县县委的领导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入城前，分别参加了两县县委组织的进城干部集训，掌握政策，明确分工，并对城内的社会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解放前的房山县是国民党的模范县，尤其房山县城，长期在敌人的统治下，是国民党的顽固堡垒，敌党、团、特、叛徒、逃亡地主等反动分子的集中营。他们仇恨土地改革，站在反动立场上，抵触破坏党的各项政策。其中极少数人甚至别有用心，梦想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两县县委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两县公安局随县委和进城工作委员会进城后，即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召开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明确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及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党派、团体及下层组织，均为反动组织，一律解散，禁止其进行任何活动。并要求上述反动组织各级委员会的每个负责人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分子，向本地区区公所或公安机关派出所进行登记，交出所有证件与私存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器材、文件表册等，

如有违逆、破坏登记或登记后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要予以法律制裁，严惩不贷。与此同时，针对反动党、团分子的思想动态，广泛地加强了政策的宣传工作。房山县公安局在进城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门领导下，组织召开了知识分子和教职员座谈会、伪保甲长座谈会、商人座谈会、妇女座谈会、一般市民代表座谈会、反动党团人员及家属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和欺骗宣传。同时采取行动，释放了敌人抓来的800多名壮丁和监狱的21名犯人（其中我党干部2人，无辜百姓17人，来解放区途中被捕的大学生2人）；对没有随敌人逃跑又主动向我投降的68名国民党房山县政府、警察局的职员、警士，登记后分别情况作了及时处理。其中42名下级青年职员暂留，并分配一定工作；其他秘书、警长等26人回家参加劳动生产，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促进了登记工作的开展。比如：有的人说“国民党押起咱们来，共产党放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好”；一些反动党团人员开始陆续到公安机关登记悔过，坦白自己的问题，交出武器弹药。市民中害怕情绪好转，学校复课，商店开门，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二

房、良两县的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从社会上开始进行的。登记前，虽然经过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对我党的政策抱怀疑态度。比如：房山县在登记工作开始后，发现一些反动党团组织人员不敢亲自到公安机关登记，只是叫其家属代替，怕被扣起来；有的托人说好话，存在侥幸心理等。所以，登记工作是逐渐展开不断深入的。房山县公安局以政府名义发出布告后，第一天登记的只有40多人，第二天多了一些，115人，第三天213人。截止到12月底，房山城内的反动党团人员共登记368人，收缴粮食1622000斤，长短枪58支。在良乡县城，开始时前来登记的也很少，只是些马夫、士兵、警士等。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多数表现怀疑观望，踌躇不前。有的先派别人来登记，看看风声，而后自己再来登记；有的怕登记后被处理，怕受训，怕失业，有的怕特务报复；有的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敢或不愿登记。即使登记也不彻底坦白，或者预先准备好一套，不问不说，问什么说什么，应付了事；有的是半吞半吐，避重就轻，隐瞒真实姓名、职务、报假名假职务，不敢承认自己加入国民党，或者只承认是一般党员，集体加入的等。为此，良乡县公安局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利用登记人员比较集中的机会讲解我党的宽大政策；一方面改变办理登记手续的环境，变许多登记者等在一起进行登记为一个人一个人单独进行，便于登记者说实话。至1948年12月底，良乡县共登记反动党团人员238名。为推动登记工作的进行，两县公安局对那些自动登记又坦白彻底的皆给予从宽处理，适当鼓励，让他们向政府报告敌之私藏武器、物资线索，帮助做好登记的宣传工作。为了揭露敌特阴谋，除公开进行宣传工作外，两县公安局还采取了秘密侦察方式，以发现隐匿潜伏的敌人和防止登记自首分子继续活动。与此同时，两县局为加强公安行政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采取了村建公安员的办法，加强对反动党特分子的管制教育。

在登记过程中，两县公安局特别重视了队伍内部的思想建设，提高队伍成员思想水平。1949年3月，房山县局在新区集训村公安员157名。良乡县局通过整建村保卫组织，清洗了公安员队伍中个别不纯分子，增建公安员67名，为公安员规定了工作任务、守则。通过学习，参加登记工作的人员充分认识到光靠单纯的控制手段不行，重要的是对这些反动党团分子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改造瓦解其反动思想。良乡县委指示村党支部或村干部，发动依靠群众，把管制目的、方法交给群众，群众有监视检举之权；对于表现好的一般党团人员可以取消管制；对于罪恶较大有现行破坏活动及有危害性的反动分子送县局处理；对于虽然有罪恶，但现实危害性不大的，采取短期集训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分化主要分子和一般分子，有利于教育改造工作的进行。1949年4月分，他们根据登记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了原因，采取了分区进行训练的方法。每期6天时间，人数在30名之内。先宣传党的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令他们坦白交待。对于坦

白交待好的人员正式履行登记手续,发给登记证明书;对不坦白分子暂不办理登记手续;对个别仍有破坏活动的坏分子,则予控制,停止一至两年的公民权。至5月中旬,共训练两期计59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一,解除了一些人的糊涂观念,比如:对我党信心不足,对国民党仍抱幻想,轻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的谣言;对土改、工商等政策怀疑、不满;不相信我党的宽大政策。第二,揭发出一些嫌疑人;第三,缴获了一些文件、戳记、百余发子弹、3000斤粮食、牲口一头。第四,交待出一些良乡党政特的组织情况。第五,由于训练中重视了思想教育,使一些顽固分子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比如:已扣押审查的原国民党八区党部书记游××,开始在审讯中拒不坦白交待,对我审讯人员说,他如果藏有一粒子弹就枪决。这次训练中,打消了思想顾虑,短短几天便承认了自己在国民党内所任职务,并交出了文件、戳记和一些子弹。

1949年3月,房山县公安局在反复开会动员的基础上,又在顾册村举办了200多人的反动党团人员训练班,采取广泛宣传教育和个别谈话的办法,第6天就有40多名人员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比如:原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宋兰田,开始只承认是一般党员,训练中讲了实话,承认自己是党部干事、三青团区分队副队长,并交待了国民党房山县党部的组织情况。至3月20日,共有142名国民党员、69名三青团员如实进行了登记。其中有科长7名、校长6名、党部干事1名、大乡长3名、保甲长4名、保安队中队长6名、营长1名、商会长4名。在此基础上,房山县公安局于7月1日至15日,又对126名国民党反动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集训。其中包括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等7名、特务谍报员等4名、政府参议员和大乡长22名、一般职员39名、警察局长1名、一般警员4名,正规军连长等7名,地方保安团队长等38名、童子军干事及道会门头子4名。除1名罪大恶极者外,其余125名经集训坦白交待了过去的问题和罪行。集训结束时进行宣誓,表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比如:原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孙又新,在县城解放后没有交出武器,准备利用时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训练班里经过几次个别谈话,向他讲明现在交枪仍为时不晚,打消了思想顾虑后交出手枪1支。再如甄宗耀说:“我有点事,不说心里不痛快,对不起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还有一支冲锋枪没交”,当即交出冲锋枪1支。

三

房、良两县解放初期对反动党团特人员的登记工作,是逐渐深入的,取得经验逐渐铺开。自始至终贯彻了依靠群众的路线,严格执行党的“教育多数、惩办少数”的政策,揭发了反动派的罪行,暴露了敌人的政治面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分清了敌我界限,减少了反动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空隙,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给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根据1949年3月的不完全统计,房、良两县登记的国民党反动党团特军政人员数字分别为1305名和1022名。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五十年代初良乡县的抗美援朝活动

王硕儒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在华利益的彻底覆灭。但是，美国并不甘心，不仅派出第七舰队进驻我国领土台湾海峡，而且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在我国鸭绿江边，妄图包围我国，把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面对美帝这种野蛮行径，中国人民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于是，在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1950年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活动，良乡县成立了抗美援朝协会，并在各区建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主要任务是：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美帝侵略台湾，侵略朝鲜”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号召全县各界人民积极捐献武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拥护和平宣言，踊跃参加和平宣言签名活动。

在宣传教育中，全县培训县、区报告员41名，宣传员1026名，农村干部、党员1400名，并利用中、小学教师425名、学生470名组成19个宣传队，还有民校教师、学员600名。在形式上，学校主要是结合教学来进行。中、小学结合各科教学由教师负责，职工业校每日课前利用15至20分钟时间进行；民校每周以1.5个小时讲政治课。报告员主要是深入到农村、企事业、学校巡回作政治形势报告。农村业余剧团115个，农村艺人30名和学生宣传队编排抗美援朝节目，巡回演出。宣传员利用农村黑板报1261块、广播台573个，平均每人宣传10名群众，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同时，在干部、党员、团员和高年级的学生中，开展人人给志愿军写一封慰问信活动。截止1951年5月统计，全县有99161人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占全县总人口75%。参加和平宣言签名的96761人，其中男55055人，占总人数77.9%，女41706人，占总人数66.1%。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发动户户订立爱国公约。截止1951年12月5月统计：全县186个行政村，其中有58个村家家户户订立了爱国公约，104个村订立爱国公约户超过了半数，全县抗美援朝捐献计划5.3亿元(旧币，下同)，群众自己认捐81495万元，实际完成111372万元，为计划的2倍多。

1951年4月20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马维华到达良乡县城。当日，除作了大会报告外，晚间以军属、劳模为主体举办了欢迎会。次日，马维华赴交道村又作了一场报告，并慰问了驻地伤病员。城关、交道两场大会报告，听众达12142人。马维华于22日由房山返回良乡在琉璃河受到了热烈欢迎。同时接到人民群众为人民志愿军赠送的慰问品。据城关、交道、琉璃河三地统计，共收到慰问品1339件。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文革”前房山县法院人员、机构的变迁

宋 湘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房山县先后隶属晋察冀边区和察哈尔省。边区和省设有高等法院，县级只设司法科，隶属于县政府。1948年12月14日(旧历十一月十四)，房山县城解放，县政府从张坊迁入房山城内。县政府设在旧房山县县衙大院，即区政府东移前区政府办公大楼以北、区委办公大楼以南；两座办公大楼之间，至今仍保留着旧县衙县官审案的大堂。县司法科设在政府大门以内、二堂以南西侧，县监狱以北跨院10多间平房内，编制3至4人。科长由审判官刘文秀担任，其余干部称书记官、录士。

1949年6月，撤销县政府司法科，成立房山县人民法院。院长由县长杜恩霖兼任，刘文秀任副院长。审判人员陆续增至5至7人。同时，废除了旧的职称，改称审判员、书记员。

1949年8月，房山县划归河北省通县专区管辖。河北省设省法院，专区设分院。县法院业务上受专区分院领导。

1952年7月，县长不再兼任法院院长。马述唐任房山县法院院长，王奎玉任副院长。

1952年9月，原属房山县的周口店、河北等12个乡划归北京市京西矿区。矿区法院在周口店设立法庭。

1953年9月，王奎玉任房山县法院院长，周义斋任副院长。干部陆续增至10人。

1954年6月，房山县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王兴治为法院院长。编制定为13人。

1955年、1956年，孔繁昭、马振通先后任副院长；不久，马振通调大兴县法院。

1956年秋，房山县法院迁至房山城内城隍庙街路南，租用赵家院21间平房。

1956年12月，房山县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李春青为法院院长，孔繁昭继续任副院长。

1957年3月，房山县法院设南尚乐人民法庭，在南尚乐村中路北租用三间民房办公，派驻审判员、书记员、法警各一人，审判员李浩任庭长。

解放后至五十年代中期，原良乡县人民法院的机构、编制情况与房山县人民法院基本相同。

1958年3月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河北省通县专区，原属通专的部分区、县(包括房山、良乡两县)划归北京市。房、良两县合并为周口店区，并将原属京西矿区的12个乡划回周口店区。3月下旬，良乡县直机关陆续迁至房山。4月1日宣布两县正式合并。4月20日正式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法院。6月22日至25日，周口店区第一届(后改称房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谭万林为法院院长，李春青任命为副院长，张毓秀任秘书。原房、良两县法院及京西矿区周口店法庭干警共29人，合并后少数人调出，还有24人，定编24人。

周口店区法院下设良乡、河北、张坊三个法庭。除良乡法庭有固定办公地点(良乡城内西大街路南，原良乡县检察院院内)外，河北、张坊法庭无固定办公地点，是实际上的巡回法庭，直到1965年张坊法庭才在张坊村租用三间民房作为办公地址。

1959年夏，将法院东侧原城关公社西街第二生产队饲养院划给法院，新建9间平房。

1960年1月，国务院决定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2月2日，周口店区人民法院改称房山县人民法院，2月5日启用新印章。

1960年12月21—23日，房山县召开第四届第一次人代会，谭万林再次当选为法院院长，李春青继续

任副院长。

1961年春，执行上级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指示，房山县法院部分干部调出，法院定编18人。这一编制数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1961年11月，房山县法院院长谭万林、副院长李春青工作变动。北京市高级法院派刑庭审判员、原通县专区分院副院长冯加骏来房山法院主持工作。1962年1月（春节前夕）冯加骏调回市院，市高院派刑庭审判员马英来房山法院主持工作。在此期间，房山县法院一切审批手续内部由马英签署，对外文书仍由谭万林署名。

1962年7月，谭万林、李春青正式调离法院，马英同时调回市院，县委决定由鲁敏生（原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院长）代理房山县法院院长。

1963年初，法院从城隍庙街迁至房山西街路南、马家胡同北口。这个院子共有30间平房。早年是一处商家，解放前曾驻伪县大队的马队，俗称“马号”，解放后是干部职工业余学校。1963年7月，县委任命审判员常彬为房山县法院副院长。

1963年12月1—5日，房山县召开第五届第一次人代会，选举鲁敏生为法院院长。

1965年11月29日，县委任命曲珣（原市委政法部干部）为房山县法院副院长。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房山县法院17年历史至此告一段落。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我在房山县法院工作的回顾

宋 湘

我于1957年5月从房山县人民委员会调到房山县人民法院，从此开始了我在法院30年的工作历程。往事如昨，记忆犹新。现仅回顾“文革”前的一些片断。

第三次“镇反”运动

五十年代法院主要业务工作是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工作的方针是“镇压反动，保卫人民；惩罚犯罪，保护善良”。法院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之一，审判刑事案件一直是首要任务。

1957年秋，在全国城市、机关“反右派”同时，农村开始了社会主义大辩论。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会，对地、富、反、坏的现行破坏活动和一些落后社员的不满言行展开大辩论。广大农村凡可以群众集会的场所，甚至场院、田间地头，都成了大辩论的会场。大辩论实际上并非双方据理论辩，而是有组织的群众对辩论对象的说理斗争、揭发批判；但是一般还没有出现“文革”中触及皮肉的武斗局面。基层单位将被辩论对象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逐级上报，情节严重的则由政法机关逮捕判刑，或判处拘役、管制。

农村大辩论逐步深入，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加上公安机关的专案侦查，陆续破获了一批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案件。这场群众运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形成解放后第三次“镇反”运动（第一次“镇反”是

1950-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房山县、良乡县法院1957年受理刑事案件527件,房、良合并后的1958年受理刑事案件952件,分别比1956年的224件上升1.35倍和3.25倍,主要是第三次“镇反”的结果。第三次“镇反”对于打击敌人的破坏,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大跃进”中“左”倾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法机关办案中,加之群众运动搞出的材料往往比较粗糙,或者无限上纲,从而有的案件混淆了两类矛盾,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如有的社员对当时“共产风”“浮夸风”发泄一些不满言论,有的群众不愿入社而毁掉自己的生产工具(砸水车、杀耕畜等),被以造谣破坏、破坏生产定罪判刑。1962年根据上级指示对大跃进中的案件进行复查,政法机关主动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巡回就审

五十年代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方针是“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审判人员分片包干、巡回就审是贯彻民事审判工作方针的主要方法。

1957年5月,我调到房山县法院任书记员。当时法院只有12人,还包括临时雇员1人。除院长、副院长各1人,法警2人外,有审判员4人,书记员4人,其中1名审判员,1名书记员负责办公室行政后勤工作,其余3名审判员、3名书记员采取分片包干、巡回就审方法,办理全县大量的自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检察院公诉的刑事案件由院长批给各审判员办理)。

我和审判员常彬负责石楼、赵各庄、岳各庄地区。每月大部分时间是骑着自行车、驮着铺盖卷在这一带巡回,哪村有案子就住在哪村。那时,全县只有一条京周公路是沥青路,乡村间都是土路,有的还是地边、沟沿上的羊肠小道。晴天起风沙,雨天陷泥泞。1957年夏季一天中午,我们从房山去赵各庄。刚到顾册村南,瓢泼大雨铺天盖地而来。雨衣不能穿,要用来包上所携案卷。不仅浑身湿透,自行车挡泥板里还塞满了淤泥,无法再骑。铺盖卷湿透,份量越来越重,推车走也很吃力,而且走几步就得用棍子捅一次挡泥板里的淤泥。到赵各庄天已经快黑了。村主任领我们到一户社员家,这家新婚的小两口住娘家去了。房东大娘让我们住进了新房,用上崭新的被褥。第二天,晒上湿漉漉的铺盖,我们就去走访群众、调查案件去了。

下乡巡回就审,有时吃住住在乡政府或村公所,有时在老乡家。在老乡家吃饭由村干部分派,我们还要特别提醒村干部决不能派到案件当事人家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牵连的人家。每日三餐要交1.5斤粮票,3角钱。当时农民都很穷困,但对下乡干部极其热情。给下乡干部做好吃的,没有细粮,吃得不好于心不忍。有的粗粮细做,把玉米面用细箩筛过,掺点榆皮面擀“板条”、压“饴饴”。有的村群众缺粮,无法派饭,下乡吃饭就成了大问题。1957年秋季的一天,我和常彬同志骑车到芦村。时已中午,接待我们的村妇联主任告诉我们派饭有困难。我们决定就在村公所自己做饭。妇联主任从村分销店帮我们买来面、鸡蛋、芝麻酱。用煤炉子烙饼,没有油,抹芝麻酱;炉火要灭,添劈柴;烟薰火燎,烙出的饼全是黑的,而且外边糊里边生。没有油不能炒鸡蛋,只好用芝麻酱拌煮鸡蛋。不知是什么化学变化,芝麻酱拌鸡蛋是越拌越稠越硬。这顿饭吃过后,嘴唇、腮帮全成黑色,肚子胀得难受。午后,就在村公所院里摆上桌子,露天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秋阳暴晒,汗流浹背,头晕肚胀,全凭那时年轻体壮,两个小时以后,庭开完了,肚子也轻松了。

办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办粮食”“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到处是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一片轰轰烈烈,确也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法院也是一片紧张、繁忙景象。全院24名干警,抽出一部分去炼铁、修水库,留机关的人每天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夜

战。1958年全年审结刑、民事案件1344件，办案效率比1957年(1013件)提高32.7%；比1956年(641件)提高1.1倍。1958年底，法院刑事未结案为零，民事未结案只剩4件离婚案。全院干警欢欣鼓舞。12月31日下午年终总结会开成了庆祝会，大家倾心交谈，忘记了时间，竟彻夜未眠，毫不困倦，院长谭万林宣布散会时已是1959年元旦的清晨。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9年初，中央提出政法机关“办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周口店区法院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大体上采取三种形式：一是审判人员携卷下乡，调查、询问、调解等办案全过程都要到田间、地头、场院，边劳动边办案；二是办案的部分过程，特别是调查阶段要在劳动中进行；三是审判人员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利用中午、晚上社员休息时间办案。这样办案的积极效果是审判人员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能够了解到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在劳动中办案不影响群众生产。这一年，全院审结的民事案件和自诉刑事案件有57%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办理的，在全市法院系统名列前茅。因此，周口店区法院被评为全市法院系统的先进集体。

“有事办政法，没事搞生产”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激发了群众的建设热情，另一方面，“共产风”、“浮夸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左”倾错误也误导了群众。一夜之间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推行集体食堂化，吃饭不要钱了，财产的私人占有已无必要，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的刑事案件也几乎没有了，社会上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1959年，周口店区法院全年受理案件221件(刑事74件，民事147件)，比1958年的1308件(刑事952件，民事356件)下降4.92倍。

在全国性案件大幅度下降的形势下，1959年年中，中央提出政法部门“有事办政法，没事搞生产”的方针，按照区委部署，区直机关抽调大量干部到乡村蹲点，帮助农村社队工作。1959年秋季开始，法院由院长谭万林带队，抽一批审判人员到赵各庄公社蹲点，重点是曹章、郑庄大队，主要是帮助抓领导班子建设，抓兴修水利和集体食堂。

与此同时，各包片审判人员除参加当地集体生产劳动外，并与所在队联系，自己开小片荒，种“十边地”，当年收获了一些白菜、萝卜用于补贴机关食堂。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造成的人民生活困难，1960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房山县法院继续贯彻“有事办政法，没事搞生产”的方针，抽调一批审判人员到河北公社东庄子大队蹲点，参加劳动，协助工作。同时，各法庭都在所驻社队种了“十边地”。法院机关除种地外，还养猪、养兔，养了一头毛驴，拉一辆小胶轮车，买了几辆双轮手推车。一部分人坚持日常工作和办案，一部分人每天下地劳动，两拨人随时轮换，形成了生产度荒、生产自救的局面。1960年秋，收获了一批粮食、白薯、白菜、萝卜。冬季，机关办了一个粉房，用白薯磨淀粉，作粉条，以蔬菜填饱肚子，弥补了口粮的不足，度过了最艰苦的困难时期。

“乱摸乱拿”

三年自然灾害和“左”的错误在全国造成严重恶果，反映到社会治安上，“大跃进”中出现的案件急骤下降的趋势很快结束了，因饥饿而引发的案件大量发生。最突出的是外省市饥民流入北京，许多妇女草率结婚又草率离婚，当时俗称“水涝婚姻”大量发生，其次是盗窃粮食案件猛增。房山县法院1960年受理刑、民事案件561件(刑事251件，民事310件)，比1959年的221件上升1.54倍；1961年受理870件(刑事218件，民事652件)，比1959年上升2.94倍；1962年受理1987件(刑事350件，民事1637件)，比1959年

上升7.8倍。

以拾秋为名乘机哄抢庄稼(与河北省毗邻的社队情况最突出),单独或结伙到地里偷掰玉米,偷割谷穗,到生产队场院、库房偷窃粮食,成了多数社队时有发生普遍现象,作案动机大多数是为了填饱自家人的肚子。根据上级指示,政法机关既要保卫集体生产,维护社会秩序,又要考虑群众普遍饥饿的现实情况。对于结伙大量盗窃场院、库房粮食的组织者、为首者要给予打击,因此,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大增。对于确因生活困难,参与群众性的哄抢庄稼,或到地里少量偷窃玉米、谷子、蔬菜等,又确实用于自家食用的,一般不以抢劫、盗窃论处,而以“乱摸乱拿”为案由作民事案件处理,对当事者给以批评教育,粮食仍在的退出粮食。这是连续三年民事案件大量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边区赞(外一首)

晋有国 口述 隗合旺 整理

听我说,听我言,
听我把边区说一番。
群众完全有了组织,
工农青妇村政权。
区长以上是县长,
县长以上是专员。
无论村,无论县,
都是代表民意机关。
政府人员“三三制”^①,
没有污吏和贪官。
边区自从八路军占,
人民当家掌政权。
凡是年满十八岁,
不论女不论男,
不分阶级和党派,
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人民文化要提高,
村村成立识字班。
办中学,建大学,
初级小学更普遍。

人人都夸边区好，
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

说敌占区

要说区，净说区，
中日战争三种区。
晋察冀，是边区，
日本占领的地方是敌区。
八路军来了日本去，
两方面的是游击区。
边区游击区我不表，
我就单表敌占区。
自从被鬼子占去了，
人民生活好委屈。
人口捐，地亩税，
敲诈勒索更甭提。
所有粮食抢个净，
老百姓挨饿又忍饥。
出兵去打太平洋，
日本国小没人力。
抽抓壮丁上战场，
中国人到达外国地。
撇下父母不能养，
可爱的妻子两分离。
死在他乡不能相见，
尸首失落在外国地。
修堡垒，挖壕沟，
到处抓人当苦力。
鬼子一边来监工，
口中还直嚷快快地。
你要一时不长眼，
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汉奸走狗真可恨，
也帮助日本把人欺。
当了日本的大孝子，
不知羞耻无脸皮。
这种欺压还不够，
每村还要花姑娘地。

东庄有个王老寡，
家中无儿有个闺女。
闺女年方二十来岁，
人格长得真不离。
伪保长决定好，
今天一定让她去。
你们大家想一想，
谁的闺女可舍地。
姑娘一听无可奈，
撇下母亲跑出去。
一跑跑到井台上，
扑腾一下跳到井里。
王老寡，着了急，
哭喊闺女死得屈。
撇下我可怎么过，
不如娘俩一块去。
说话来到井台上，
扑通也跳到大井里。
一家人死了娘儿俩，
吓得保长拉了稀。
伪军解差开言道：
叫声保长你听仔细。
皇军急着把人要，
没有花姑娘带上你。
皇军一听真有气，
好你保长坏东西，
可惜这个花姑娘，
怎么死了死了地。
一边说，一边打，
打死喂了洋狗吃。
当了一个伪保长，
落得被洋狗尸分离。
敌区的同胞多凄惨，
你看可惜不可惜。

注：①“三三制”是指政府成员构成：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无党派和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八国联军侵占良乡城

王硕儒

十九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反洋教的基础上兴起和迅猛发展起来的，是一次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是清廷的统治中心，也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良乡地处北京郊区，是义和团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1900年初，开始由山东、河北向北京发展，良乡城关及周围的元武屯村、肖庄村、窦店村、大、小十三里等村的义和团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各村无不从拳者”的局面。按顺天府尹赵舒翹视察良乡一带时的说法是：“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良乡地区“各乡村均设有拳场，声言灭洋”。各村都设有坛口，负责人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总坛设在大十三里村，总负责人称团董。正团董是住元武屯村三官庙的李道士（北京道教圣地白云观派的），副团董是元武屯村孟守田（曾任良乡县衙经房负责人）。“4月中旬，义和团开始在北京城区教习‘拳艺’，张贴揭帖，散布传言，为攻打北京制造舆论，组织力量。”5月27日，义和团二、三万人进占北京西南重镇涿州城。连日，义和团毁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丰台等处车站、铁路和桥梁。

不久，北京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再次侵略中国的借口。5月31日，英、美、日、法、俄、意等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三百余名强行入京。6月10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集结在天津租界的驻军两千多人（简称“八国联军”）联合向北京进犯。同时，各国海军舰艇近四十艘云集在大沽口海面上，并于6月17日攻占大沽口。7月13日攻占天津。8月4日，八国联军近两万人由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清王朝的都城——北京进攻。北洋大臣裕禄统率清军抵抗，大败于杨村。义和团英勇反击，大战联军于广渠门，但因武器落后而伤亡惨重。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义和团民一千七百余人殉难。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特许其军队抢劫三天。各国瓜分北京城，分区、分段占领。然后，出城窜扰京郊，连日不断，大肆屠杀义和团。9月11日，联军出动一千七百余人攻打良乡城，良乡知县弃城而逃，义和团奋起据守城池，抗击联军。开始，联军以步兵架云梯进攻城池。义和团民奋力反击，联军未能得逞。后来，联军从长辛店调来大炮，架设在良乡城东塔坡上，猛轰良乡城，联军才得以入城。据《良乡县志》记载：“光绪庚子八月，拳匪（统治者称义和团民为‘拳匪’）占据城中，联军来攻。从燎石岗轰以巨炮，城遂陷，拳匪半遭屠戮，良民被害者亦多。房舍亦毁十之八九，城垣皆残破，门楼半就倾颓，东南隅魁楼尤令人惨目”。据《义和团运动史要录》记载：八国联军攻打良乡城，义和团顽强抵抗，阵亡二百五十余人。城破后，在城内展开巷战，联军恣肆屠杀，义和团民和城内百姓四千余人罹难。良乡地区的义和团，终因八国联军的镇压而失败。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日寇进攻平西根据地纪实

张成基

1940年春季,日寇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后,我根据地军民抗敌积极性不但没有低沉,反而更加高涨。一方面不断夜袭敌人据点,另一方面经常截击、伏击日伪军,有效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使敌人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日寇面对不利局面,气急败坏,策划在1940年的秋季,再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将平西共产党、八路军全部消灭。同时要彻底破坏秋收,使抗敌军民收不到一粒粮食,困死在深山里。

1940年8月20日,从华北各地抽调的日伪军十万余人,兵分二十路,对平西根据地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扫荡。敌人在多处集结兵力,东部出发点包括长辛店、卢沟桥、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昌平、南口;南部出发点包括良乡、坨里、河南、南窖、周口店、涿州、高碑店、涑水;北部出发点包括延庆、怀来、新保安、宣化、涿鹿、张家口、蔚县。

大扫荡开始后,平西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面对穷凶极恶的来犯之敌,我军决定避敌锐气,一面积极组织根据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一面坚壁清野,不跟敌人发生正面交战。

敌人所到之处,杀烧抢掳,无恶不作。面对来犯之敌,虽然我方进行了反复动员,发动群众,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太充分,仍有部分群众伤亡,有的粮食被抢。例如,日伪军在进攻堂上村时,该村一位二十多岁、贤良貌美的安李氏,被二十多鬼子轮奸。该妇女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自感羞耻,无脸见人,从此不敢迈出自家大门,直至七十多岁含愤离开人间。当这群禽兽窜到张家口地区的万全县时,在一个村子抓住三十多名青壮年妇女,逼着她们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在大街上扭秧歌。妇女们坚决不肯,鬼子就用刺刀扎,或上去拖拉,或将其中的妇女拉出去强奸。有的妇女不堪忍受这种羞辱,就偷偷选好旁边的石头或墙壁碰撞而死。最后,剩下的妇女全部被轮奸后杀害,尸体扔进了东门外的万人坑内。同时,鬼子还将抓到的男人拉到万人坑边,一是刀砍,二是枪杀,三是用刺刀捅死,四是放狼狗咬死。据昌宛、涑涿、房良三处统计,敌人在这次扫荡中,共杀害老百姓109人,抓走青壮年12000多人。被抓走的这些人,一部分被送到东北,一部分被送到日本,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劳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些人每天被强制干十六、七个小时的苦力,生病后还未断气,就被拉出喂了洋狗,幸免于难的人寥寥可数。另据三县统计,这次敌人在扫荡中,共抢走粮食17200多石,抢走大牲口6800多头,共烧掉房屋12043间(其中不包括群众为躲避敌人而修建的临时房屋),给根据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日寇发动的这次大扫荡,先后经历了两个月时间。敌人在向平西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时,还在一些较大的村镇、交通要道以及地形险要的山沟路口,新建了32处新据点。其中包括昌宛房12处,即杜家庄、下清水、东斋堂、军响、青白口、付家台、煤窝、千军台、沿河城、大村、向阳口、下苇店各一处;房涑涿9处,即半壁店、南尚乐、塔照、张坊、娄子水、长操、红煤厂、大安山、宝地洼各一处;宣涑怀3处,即大廊、李家堡等处;涑水县8处:花园、泽畔、展台、李皇甫、东祖、岐沟、石亭等处。除此以外,敌人还在蔚县、阳原范围内建立了据点。同时,驻大同的日伪军也由西向东对我平西根据地进行蚕食。我平西根据地面积大量缩小,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抗战工作进入十分艰难的时期。平西虽有百花山作天然屏障,但由于面积太小,物产不丰富,加上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经济封锁,又遭连年的旱涝灾害,屯驻的军政人

员过多，造成了各种军需、民用物资十分匮乏。疾病流行，缺医少药，人们体质非常虚弱。面对敌人八方伸来的魔爪，如何战胜顽敌，是对我平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峻考验。我平西军民一方面以树皮野菜充饥，一方面利用各种有利时机与敌人周旋，决心打一场持久战。秋季大扫荡后，敌人在昌宛房四区根据地四周都建立了据点，如东边的大安山，南边的长操和红煤厂，北边的斋堂等地，对我四区形成了包围之势。敌人把这块根据地当成了重点进攻对象，采取了分工按片进攻扫荡的战术围剿。下面从四条路线回顾一下当时敌人是如何疯狂进攻我四区根据地的。

第一条路线：驻红煤厂、长操、花港的敌人负责扫荡柳林水、元阳水、杨林水和青林台四村。敌人接受任务后，就三天两头向这四村进攻一次。每次扫荡时，各村群众都提前转移出去，并将各种物资都坚壁起来，使敌人什么也找不到。有一次，一队鬼子在柳林水村的南港沟搜查时，发现我民兵马文彬正顺山沟往山上跑，喊他站住，他不听，鬼子便开了枪，子弹从马文彬后背打进，从肚子穿出，肠子都被打了出来，马文彬当即身亡。1941年2月，鬼子又一次进攻柳林水村时，在北港口抓住了民兵任显富，问他八路军在哪里，任显富说不知道。鬼子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然后让他带路去找藏起来的粮食和物资，任显富仍不答应，几个鬼子便将他扔进一个大水坑里。早已遍体鳞伤的任显富连冰带冻，再加呛水，活活地被折磨至死。这只是敌人在四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中最普通的两例。

第二条路线：驻南窖的敌人负责协助护路队，保证三合村、西安、北安和高线站安全向坨里运煤，并经常向霞云岭地区扫荡。由于敌人对霞云岭各村进攻任务重，所以对上述四村的进攻没有形成重点，群众损失较小，也自然形成了昌宛房四区党政军民干部存身之处。又因为这四个村与杨林水、青林台、秋林铺相邻，四区机关干部就经常在这几个村庄出入，向史家营、金鸡台、柳林水三个地区开展工作。虽是游击区，相对讲还是比较安全的。昌宛房县政府长驻莲花庵，司法科驻秋林铺的扇子港（所有犯人都在这里关押），这片山村在游击环境中便成了县政府的生存之地。

第三条路线：驻大安山日伪军有两个连兵力，主要负责进攻金鸡台至西岳台五村。每次进攻都是天亮前到达目的地，而且都是从山间小道绕过村庄和岗哨，使站岗民兵不易发觉而报警。有一次，日伪军要包围西岳台，天亮前就到达了村西岭头上。进村时，碰上给昌宛房四区公所送情报的张国富（清土涧村青年主任张国宽的哥哥）。张国富没想到鬼子会这么早到达，以为是八路军。当鬼子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是给区公所送情报的。敌人便向他索情报，他说什么也不给，被打得东倒西歪，鼻口出血。敌人要他带路找本地区干部和坚壁的公粮，都被张国富拒绝了。最后，张国富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这时，村里人知道鬼子来了，都纷纷躲出了村。敌人在村里没有什么收获，中午就滚出了西岳台村。时隔不久，敌人又在天亮前包围了清土涧村，被我岗哨发现后报警，群众在转移时，由于熟悉山路，大部分未被追上。只有张进明夫妇二人在往山头上跑时，身强力壮的张进明躲开了鬼子，他的爱人刘小燕由于体小力乏，没跑过岭头，被鬼子一枪打死。张进明恨得咬牙切齿，乡亲们也都摩拳擦掌，决心与日本鬼子拼到底。我四区武工队决定找准机会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几天后，日伪军又包围了清土涧村。村里群众听到报警后都跑到山上躲避起来。敌人在村里什么也找不到，就四处搜山。一队鬼子搜到村东北的小北港村，发现了村民张成本的爱人和女儿，当场便将她的爱人刺死，大女儿躲在房后吓得不敢出声，未被发现，小女儿不到两周岁，被鬼子扔出很远，侥幸未死。这时，我四区武工队得知鬼子又来清土涧村，立即与西岳台村民兵配合，从红岩子压了过来，与鬼子交上了火。敌人不知我军情况，害怕被全歼，便仓皇地向金鸡台方向逃窜。我武工队和民兵迅速占领了四晏台制高点，控制了由清土涧至金鸡台五华里的路程，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敌人被打得魂飞胆丧，以梯田作掩护，沿着三华里的田间小路，逃到了金鸡台村的低下炉。这里离村还有两华里。可路程都是六、七十度的上坡，又正对着四晏台岭我武工队的枪口，敌人已无藏身之地。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武工队和民兵弹药不足，不能用重火力

封锁住敌人退路，只是零星而有节奏的瞄准敌人单枪射击，给了鬼子可乘之机，这股敌人顺着山地树木和排水沟渠拼命逃向了金鸡台村。这次战斗中，鬼子受重伤1人，轻伤2人。战绩虽不大，但震慑了敌人。从此，一般的小股敌人再也不敢到西山坡上的清土涧、西岳台、金林台等村扫荡了，只是发现那里可疑就打一阵枪，放一阵炮，就算完成了扫荡的任务。

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打击来犯之敌，我民兵领导决定为清土涧、西岳台两村民兵配置一个班的武器弹药，每人四枚手榴弹，长期轮流驻守在四晏台岭，一旦发现鬼子，就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击。对地形不利的金鸡台、金龙台两村，武装民兵不好发挥作用，领导便决定组织民兵在敌人进犯的路上埋设地雷杀伤敌人。有一次，驻大安山据点的日伪军进犯，在金鸡台村东圈外，敌人踩上了地雷，当时炸死了日本军官骑的一匹大白马。鬼子将这匹马就地掩埋。待敌人走后，民兵和村里人回来，挖出了白马，用马肉改善了一次伙食。不久，大安山敌人又来进攻，在金龙台的山坡上，一名伪军踩响了一个地雷，虽未炸死，但身受重伤。敌人再也不敢轻易搜山了。从此，区武装部组织全区各村民兵在敌人进攻的重要路段，以及通往的群众隐蔽点、坚壁粮食地点的必经之路上都埋上地雷，敌人听后更加丧胆，嚣张的气焰被打了下去。

当时，大安山日伪军几次进攻金鸡台、西岳台和清土涧，为什么都能轻易绕过别的村庄、穿过我方岗哨而偷袭成功呢？原来是金鸡台村民兵史天悦投降了敌人。由于他了解我方情况，又熟悉地形，每次都是史天悦带着敌人扫荡各村，给我方造成了严重损失。敌人见他死心踏地，便封他为伪军小队长。他还带领鬼子将驻在羊草背的三名八路军侦察员打死一个、重伤一个，是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日本投降后，我方将史天悦抓获，于1952年春在七村群众公审大会上将其判处死刑，在大安山刑场枪决，为人民除了一害。

第四条路线：驻斋堂(包括清水和杜家庄据点)的日伪军主要控制史家营等村。具体分工是，斋堂据点的敌人进攻大村涧、史家营；清水据点的敌人进攻曹家坊、莲花庵；杜家庄据点的敌人进攻莲花庵、秋林铺，每次扫荡都如此。1941年阳历年前，敌人抽调鬼子三百名，伪军三百名，并从当地征了民夫六百多名，组成了一千二百多人的队伍，星夜出发，企图彻底消灭我昌宛房县政府，在天亮前先对史家营实施包围。后被我方岗哨发现，连投三颗手榴弹报警，村中群众迅速转移出了村。敌人进村后发现没人，便抢光财物，放火烧了全村房屋。因天气寒冷，鬼子未到山上搜捕，晚上驻在史家营村。第二天，敌人又窜进曹家坊村，将各种日用品抢劫一空，晚上驻在莲花庵村。第三、四天对莲花庵、秋林铺、扇子港进行大规模搜查，妄想抓住我县政府领导，搜到重要文件。结果是一无所获，只抢走了一部分生活用品。第五天早晨，这股敌人返回了斋堂据点。我军之所以未与敌人交战，主要是为了组织群众转移，尽量减少群众伤亡。

1941年2月，斋堂守敌接到汉奸特务报告说昌宛房四区史家营一带的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政府工作人员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布置工作；各村民兵每天早晨出操，加强军事训练；识字班在晚上教授群众文化知识，学唱抗日和爱国歌曲；八路军也不断来这几村驻防。另外，昌宛房县政府的办公地点就在莲花庵村。上述情报，斋堂守敌向统辖斋堂川日伪军的日寇联队长船木健四郎作了汇报。船木健四郎听后非常恼火，立即从各据点抽调五百多名日伪军，从各村征调五百民夫对史家营村发起围攻，全面搜查了菩萨岩、耳朵岩下的山坡和北山、古洞坨一带，妄图扫平我平西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敌人晚上就驻在了史家营村。

我平西领导得知敌人又向史家营大举进攻的消息后，认为现在天寒地冻，老百姓为躲避鬼子侵扰都上了山，如果我军与敌人正面作战，当地群众恐怕忍受不了，特别是当时传染病流行，许多家里都有病人，也不利于群众长期躲在外面。因此决定不与这股扫荡的敌人正面交战，派七团的一个连，配合昌宛房县大队包围斋堂据点，消灭敌人老窝，迫使敌人停止扫荡，缓解对我根据地的压力。命令下达后，我军连夜赶到斋堂据点外围，于当夜12点，开始围攻斋堂据点。根据当时形势，我军还不能将斋堂据点吃掉，就对守敌薄弱点的仓库发起猛攻，夺取粮食和武器弹药。斋堂守敌遭围攻后，慌忙给扫荡史家营的敌人送信。天亮前，史家营敌人接到报告，非常紧张，害怕自己的老窝被八路军端掉，赶紧下令急行军撤回斋堂。这股敌人早饭都没

敢吃，于早八点赶到斋堂据点附近，未敢贸然进入，一面了解情况，一面盘算怎样解救斋堂据点。

这时，我军已攻到敌仓库，抢运出部分粮食和弹药。当发现进攻史家营的日伪军已返回，并觉察到敌人企图从马兰村兵分几路对我军实行反包围时，立即撤出阵地，安全转移。我军的这一行动使史家营到秋林铺五村的群众避免了一场大难。从此以后，斋堂的敌人再也不敢大规模进犯我昌宛房根据地了。

自从日伪军对我平西根据地形成包围、实施封锁后，我根据地军民生活处于十分艰苦的境地。为瓦解敌人的攻势，缓解根据地恶劣的生存条件，更好地巩固根据地局面，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对敌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向敌人占据的山头、阵地喊话，宣传抗日政策，给日伪军作形势报告。由昌宛房四区区委和区武装部组织各村民兵、模范队、青年救国会和敌工部人员，在同一个晚上，对长操、红煤厂、花港等据点的岗楼喊话。主要内容是，伪军兄弟们，你们给鬼子卖命是被迫的，要记住你们是中国人的，别再替他们卖命了。你们要记住，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谁干的坏事，人民是给你们都记着帐的，早晚要跟你们清算，你们要给自己留条活路。我们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赏。希望你们争取立功，早日站在人民这边来。

第二、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确定一个晚上，由保甲长将十几个村的伪军家属集中起来，保甲长也一起听我政工人员讲当前形势，讲共产党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求家属们转告当伪军的家人，到解放区跟八路军打仗要冲天放枪，不要抢老百姓的东西，更不要烧老百姓的房子。有机会就投降过来，一定会受到奖励。如果继续作恶，我军一定要把他除掉。

第三、在敌占区书写抗战标语，散发抗战传单。这项工作一般都在晚上进行，用白灰或红土在敌占区的墙壁上、石头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鬼子的狗命长不了”、“庆祝××地方打了大胜仗”等大字标语。同时还张贴同样内容的标语，散发宣传抗战必胜的传单。接着，还将日伪军队长、小队长、班长犯下的罪行，如该人进攻过哪个村、打死过谁、烧了多少民房等内容都造成大表，在各村张贴。这几种作法对伪军打击很大，上了帐的人都害怕起来，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第四、进行策反工作。例如，我们曾经给一名伪军头目写信。劝他认清日本鬼子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希望能早日醒悟，争取立功。并且要跟他建立联系，以便支持我军的工作。经过反复工作，这名伪军头目表示一定不再为鬼子办事，并且在暗中经常给捎来十发、二十发子弹，还把敌人的内部情况写信告诉了我们，对我军的抗敌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通过以上这些办法，再加上我军队和民兵不断袭击伏击敌人据点，给敌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亡。日伪军都开始担惊害怕起来，从以前每星期向我根据地进攻三次逐渐减到每两星期一次，而且到后来每次进攻村庄时只是在村边放上几枪，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很少进去搜查，更不敢到山坡上去乱搜乱窜了。他们也不敢再随意烧房子、抢东西了，都怕以后跟自己算帐。随后，敌人对粮食物资的封锁也松懈下来，有时，伪军还暗中为我军提供一些武器弹药。在长操据点驻守的一小队伪军，在我军做通小队长康积有的思想工作后准备反正。尚未开始时，该小队被调防到张坊据点。我昌宛房县委敌工部立即与房涞涿县委敌工部联系接洽，最后经过努力，康积有带领这队伪军投降了我军，为人民立了功。

日寇在1940年秋季大扫荡后，侵占了平西大部分村镇和交通要道。为便于开展抗战工作，我冀热察区党委由斋堂迁到了涞水县的山里，即白涧地区的李各庄、赵各庄、板城一带；平西地委迁到了计鹿、玉斗、河东等村；平西分区迁到了紫石口、晓峰口、蓬头一带。由于活动范围缩小了，领导机关又较集中，目标较大，引起敌人疯狂的进攻，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冀热察区党委的任务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由于日寇控制了根据地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我方各项工作无法统一开展。就连冀东在平西地区党委受训的干部，都很难回到冀东和平北地区。更重要的是晋察冀边区支援东北战区的人员、物资在通

过平西地段时，也受到阻隔。大批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爱国学生、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来边区人民政府考察抗战工作的国际友人等，都不能按时到达解放区。因此，尽快开辟新的交通线路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立即发动各方人士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考虑新交通线如何开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百花山东侧十华里处的庙安梁双十字路作为新的交通线。

庙安梁中心路口通往各地都非常方便。如从西面冀热察区党委所在地出发，通过野三坡、张家铺村、马家铺村，可到百花山。往东经过百花山梁到大寨岭，可由前山和后山绕过封锁线，到达昌平、怀柔、密云。如从区党委机关出发，可由马各庄村奔山后芦子水村、秋林铺村和大村涧村，经过庙安梁，这又是从西南到东北的一条大道。过马兰村，绕过斋堂据点，过清水河可到达平北东部地区，还可通往东北各地。另外，还可通过庙安梁向东去。如由西北地区的蔚县、涿鹿一带经过小龙门、柏峪、梨园岭、红水口村，绕过杜家庄封锁线，过黄安坨村或田寺村、西达么村，经过庙安梁，再过金林台，到昌宛二区的龙头村。绕过大安山封锁线，经中山村到北峪村，最后可到达北平、天津等地。如从北面的张家口、新保安一带越过长城的七座楼梁，到燕家台绕过清水封锁线，通过上达么村、红水峪村和庙安梁，再过大村涧、清土涧、金鸡台村、柳林水村，可到良乡县城、房山县城和华北平原一带。由此可见，庙安梁这个双十字路口确实是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这条交通线的开辟，沟通了平西地委与冀热察等根据地的联系，为平西根据地抗日斗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心情十分激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以此文纪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了的先烈们。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抗战时期的大安山沦陷经过

任成利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向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不久，战火蔓延到房山，并占领了坨里、河北、南窖等地区。1938年，日军开始向大安山进攻。至1939年，日本鬼子向大安山发动了三次进攻，每次进攻都给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940年春季大扫荡，日本侵略者纠集了房山、坨里、河套沟、南窖等地区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十万余人向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犯。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这次大扫荡，除宛平四区以外，大安山成了重灾区。被鬼子杀害的有二十多人，烧毁房屋二百余间，抢走的东西无法计算。一时间大安山村狼烟四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景象惨不忍睹。

日寇占领大安山以前，由分区敌工部干部潘铎同志主持，在西苑召开了一次抗日民主政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公安员、民兵队长、农救会主任等主要干部三十余人。会期三天，主要内容是：

1、日本占领大安山以后，我们要继续坚持对敌斗争，要采取公开的、秘密的、单个的、集体的各种形式，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

2、坚持持久战。要有和日本鬼子长期打下去的思想准备。同时，还要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用毛

泽东思想武装大家的头脑，坚定斗争信心。

- 3、加强除奸、反特工作。对当地汉奸、特务、恶霸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 4、保存革命力量，加强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能蛮干。
- 5、不做胆小鬼，更不能当叛徒。
- 6、要抵制日本的苛捐杂税。

会议期间，每天上午开会，传达文件，下午讨论。最后参加会议的人员表示，一定要和鬼子斗争到底。这次会议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因此，这次日寇进犯，绝大多数都能与敌人进行斗争，有的人在斗争中光荣牺牲了。

1940年10月12日，日本开始秋季大扫荡，驻扎在南窖的敌人，开始向山里进攻。这次进攻是整个秋季大扫荡的一部分。他们先到了红煤厂，与河套沟上来的敌人会合。日军头目们先在一起嘀咕了一阵，然后分两路：一路从红煤厂向长操方向进攻，一路向大安山进攻，这支队伍当天就到了大安山。进村后开始了烧、杀、抢活动。百姓们因事先得知情报，都跑到山里躲藏起来。但一小撮汉奸、特务、恶霸不但没有跑，还拍手欢迎日本鬼子的到来。他们积极为日寇要粮、要物，找柴烧，找炊具，安排住处，甘当卖国贼。这次敌人带来很多夫子，以便于抢东西运走。他们扫荡的主要目标除大安山外，还有宛平四区（今史家营乡）。天还不亮，他们集合了，日军头目哇啦哇啦的叫喊了一阵，开始西行。天将亮时，他们到了西苑村，然后继续向东安岭方向进发，因为东安岭、西苑和金鸡台交界处是敌我必争之地。

宛平四区政府事先得知日军进攻的情报，当夜派出宛平子弟兵团、四区中队连夜赶到东安岭进行阻击，以延缓敌人的前进速度。

我四区中队在中队长董春宇的率领下，很快到达东安岭进入阵地，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进行埋伏。大约在六点钟，敌人通过西苑村向东安岭窜来，东安岭战斗开始了。当敌人走进埋伏圈时，中队长董春宇一声令下，“打”字刚一出口，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开火。敌人发现我埋伏部队，就像炸了群的羊，乱成一团。然后，他们立即分散开来卧倒，向我埋伏部队还击。敌人的兵力和火力大于我数百倍。我四区中队只有四十人，二十几条枪，每人三至五颗手榴弹，要想抵挡上万人的敌人那是不可能的。双方在交火中，敌众我寡，我四区中队只得撤出战斗，向圣米石塘方向转移。敌人发现我部队撤走，就像一窝蜂似的向东安岭冲去，很快占领了东安岭制高点，并乱打了一阵枪炮。他们虽然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但仍不敢轻易下山西行。正在这时，我野战军七团二营五连从史家营跑步冲向东安岭参战。因迟到几分钟，刚到东安岭北坡与敌人接火了。敌人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步枪、机枪、火炮等各种武器向五连开火。不一会儿，枪炮声响彻东安岭，各种火器响成一片。战场狼烟四起，尘土飞扬。尽管我五连战士猛打猛冲，英勇善战，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有二十几名战士倒在血泊中。这些烈士现在还长眠在东安岭的山角下。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籍贯住址。最后五连只得撤出战斗，向于家塔方向转移。

敌人发现我部队撤走，立即顺坡而下，很快到了金鸡台村。进村后，立即进行烧、杀、抢活动，许多百姓的房子第二次被烧掉。然后他们继续向西扫荡。敌人从10月13日到17日，从金鸡台、青土涧、西岳台、史家营、莲花庵、秋林铺直到堂上、宝水，一村不漏的进行扫荡。所到各村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做。他们所经之处砖破瓦烂，烟火冲天。房子的倒塌声震耳欲聋，大人哭，小孩叫，一片凄凉景象，真叫人心酸。

1940年10月17日，日本扫荡宛平四区后，从秋林铺出发返回大安山不走了。这就是日本占领大安山的经过，也是大安山沦陷的全过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五十年代房山县的“划乡撤区”工作

魏志华

1953年前,原房山县设6个区,辖182个行政村。其中一区包括现在的城关镇和石楼镇;二区包括张坊镇西边几个村及十渡镇各村;三区包括现在的长沟镇、岳各庄乡;四区包括东营乡及岳各庄乡的五侯、东南章、西南章村;五区包括现在的南尚乐镇及张坊镇的南白岱、北白岱、西白岱村;六区包括现在的霞云岭、蒲洼两个乡的各村(原五区的河北、南窖、长操、班各庄,原四区的周口店、黄山店等68个村,已于1952年初划归京西矿区)。

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选举法》规定了以乡作为实行普选的基层单位,为了统一国家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也使农村基层组织更适合发展需要,房山县遵照华北区行政委员会及河北省政府的决定,决定于1953年6月底以前完成本地区的划乡工作。划乡的任务包括:划好乡界、委派干部、组织临时乡人民政府,建立各项制度,建立起党、团、妇联、武装等组织机构。

为了搞好划乡工作,县成立了划乡委员会。副县长隗和有为主席,县委、政府、团委、妇联、武装、公安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委员,下设办公室。副县长隗和有、县委组织部长高华兴同志主要负责。从县直属部门按1/3与1/2的比例抽调150余名干部组成30多个工作组,协助各区抓好划乡工作。

房山县的划乡工作分三批进行。每批约20天左右。第一批有一、四区,为划乡试点,共68个行政村划20个乡,5月1日开始,5月22日完成;第二批有二、三、五区,91个村划31个乡、1个镇(长沟),6月1日开始,6月20日完成;第三批为六区,23个村划17个乡,7月1日开始,7月18日完成。三批182个行政村共划了68个乡一个镇。整个划乡时间共三个月。人口稠密的平原,一般是二、三个村、3000人左右划一个乡,人口较少的山区一般2000人左右划一个乡。

划乡工作中,主要是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培训骨干。划乡是件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培训骨干是搞好划乡工作的基础。每一批划乡前,都召开划乡工作会议,同时也是一次骨干培训。参加会议的除县抽调的下乡工作组外,还有参加划乡工作的区干部、村支书、村长参加。第一批划乡会议在房山县城召开,420多人,4月24日至5月29日,进行36天;第二批划乡会议在南尚乐召开,5月26日至29日,进行了4天,参加会议的500余人;第三批划乡会议在霞云岭召开,6月26日至30日,进行5天,100余人。会上主要是传达中央、省政府关于划乡工作的决定,讲县划乡工作的方案,经过充分讨论,提高认识,明确划乡工作的方法步骤及政策界限。

2、抓好生产,做到划乡、生产两不误。划乡工作中,不仅开会研究生产,布置生产,而且明确专人抓生产,工作组、区、村干部划分生产、划乡两条线。

3、宣传教育贯彻始终。划乡工作中,干部群众顾虑不少。有的对划乡不理解,有的怕麻烦。大家议论的话题是谁当乡干部,谁上谁下,许多人怕自己的村吃亏。针对这些顾虑,划乡工作中把宣传教育贯彻始终。特别是前一阶段,重点是抓宣传教育。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反复宣传划乡的目的和意义。同时,还通过板报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提高认识,解除顾虑,使干部群众积极参加。

4、选好干部是搞好划乡的关键。这次划乡,部分乡干部由上级委派。因此,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挑选好干部非常重要。工作组通过各种座谈会,个别访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同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使其

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划乡工作组提出乡政府各部门干部的意见，交给群众讨论协商。经过反复讨论，并经区委、县委审查同意，乡干部正式确定后，再召开各部门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建乡大会，公布乡干部名单，宣布乡政府成立。

乡政府的组织机构：乡人民委员会由7~11名委员组成。其中乡长1人，副乡长1~4人，秘书1人，下设民政委员会、生产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并建立了各项制度。乡人民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乡政府的日常工作由受补贴的几个干部轮流值班。受补贴的干部是乡总支书记、乡长、秘书等。建立乡政府的同时，党、团、群众、民兵等组织也同时建立。各村建立村委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一般由副乡长或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

1953年划乡后，由于乡政府刚建立，干部没有经验，各区暂没撤，协助县里对各乡开展工作。到1954年5月份才正式撤销6个区，对区干部重新进行了安排。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1956年至1958年又进行了两次并乡，使乡的规模逐步扩大。到1958年初，乡的规模就相当于现在各乡、镇的规模。1958年成立大公社，打破原来的乡界，1961年又划分人民公社。1983年又恢复乡的建制，但其规模没有大的变动，只是个别乡、镇作了调整。如长沟镇的18个村，1953年6月第二批划乡时划为6个乡，即双磨、良各庄、长沟、坟庄、甘池、六间房6个乡。1956年合并为长沟、甘池2个乡。1958年初，长沟、甘池两个乡又合并为长沟乡，即现在长沟镇的规模。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文革”前房山县检察院机构的变迁

宋 湘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建国初期，各级检察机关称检察署，最高人民检察署署长罗荣桓。房山、良乡两县当时隶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两县检察署约建于1951年11月。当时，法制尚不完备，机构尚不健全，县检察署署长由县公安局局长兼任。房山县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长先后是张林、魏有清，良乡县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长先后是王士才、路清华。检察署只配备一名工作人员（良乡是张志），在公安局办公。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决定设立各级人民检察院。

1954年冬，河北省先在少数县试点建立检察院，通县专区在通县试点。11月，在试点基础上，河北省决定在一批重点县建立检察院，良乡县是重点之一。县委决定，调良乡三区（琉璃河地区）区委书记马岱儒任县委委员、检察长，带领刘玉景（县供销社人事科长）、马成贺（琉璃河税务所长）、潘成祥（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去保定参加建院培训。1955年春节前夕，培训结业。1955年旧历正月初六，又前往通专分院通过参加实际办案接受业务培训。

1955年3月，河北省通知全省各县筹备建立检察院。通县地委决定调良乡县监察委员会干部李明到房山县任检察长。房山县开始筹建检察院。

1955年4月1日，房山、良乡两县正式建立检察院，4月6日挂牌对外办公。干部编制各5人，法警兼勤杂各1人，以后陆续增至各10人。

良乡县检察院开始在县政府大院(良乡城内东大街路北)内三间平房办公,不久迁至县政府对面一个四合院,1956年又迁至良乡西大街路南一个四合院(1958年房、良合并后良乡法庭设在这里)。房山县检察院开始在县公安局院内,1956年迁至房山城内西街县人民政府大院内西侧一个跨院(县法院从这里迁出)。

建院初期,检察院尚无印章。1955年4月1日,良乡县检察院发出通知:“经省检察院批准,我县建立人民检察院,定于4月6日开始办公,暂用旧印章,为‘良乡县人民检察署’(长方形无框木制印章一枚,正方形有框木制印章一枚)”。1955年12月31日,房山县检察院发出通知:“定于1956年1月1日启用新印章(铜质,圆形,中间是国徽,上方环绕‘房山县人民检察院’八个宋体字),原检察署印章同时作废。”

两县检察院初建时正值一届一次、二次县人代会之间,检察长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1956年12月,房、良两县分别召开二届一次人代会,由代表选举李明、马岱儒连任两县检察长。

1957年9月,傅英(从河北省公安处调来)任房山县检察长,李明改任副检察长。1956年3月,王德仲(原房山县公安局政治协理员)调任房山县副检察长。

1958年3月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河北省通县专区,原属通专的部分区、县(包括房山、良乡两县)划归北京市,房、良两县合并为周口店区。3月下旬,良乡县直机关陆续迁至房山,4月1日宣布两县正式合并。4月20日正式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检察院。同时,区检察院发出通知:正式启用新印章,房、良两县检察院印章同时作废。1958年6月22日至25日,周口店区第一届(后改称房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傅英为检察长,李忠孝(原通州市检察长)同时调任周口店区副检察长。1958年10月,傅英调出,上级任命李忠孝为周口店区检察长。

房、良两县合并后,周口店区检察院迁至房山城内城隍庙街东口北侧一个大杂院办公。两县合并后仍留在检察院工作的干部19人,法警兼勤杂2人,原通专分院调来4人,共计25人。1958年中调出、调入变动较大(马岱儒、李明、王德仲等人在此期间调出),到1958年底实有干部16人,法警兼勤杂2人。

1960年1月,国务院决定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2月,周口店区人民检察院改称房山县人民检察院。

1960年12月,房山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忠孝为检察长。同年,检察院迁至县公安局(原房山城隍庙)前院办公。干部陆续精简至11人。

1963年12月1日至5日,房山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忠孝连任检察长,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娄子水村与北京市公安局造林大队

穆玉敏

提起娄子水村,大家都熟悉,但提起北京市公安局造林大队,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因为一则是年代久远,二则是特殊历史阶段产生的特殊单位。

1957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在位于天津的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成立了“干部农场”。“干部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各业务处、室、分局的500余名下放干部、民警组成。

这些干部、民警中，除对一部分属于出家门、进校门、入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进行短期轮流锻炼外，大部分人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冲击或因这样那样原因而被长期下放劳动的。

1958年4月，市委、市人委号召加强首都山区建设，改变山区的自然面貌，要求全市各部门分片包干绿化荒山，当年北京公安局即承包了房山周口店西南的大片荒山，在娄子水村成立了北京市公安局造林大队，将天津的“干部农场”移至这里，开始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

造林大队成立后，除了“干部农场”500多名下放干部、民警外，市公安局各处、室、分局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农场劳动的干部、民警也陆续集中到周口店造林大队。

造林大队的队址选在毗邻著名的周口店龙骨山南侧的娄子水村有三种考虑：一是所承包荒山的几条山沟都起自娄子

“文革”前北京市公安局造林大队的宿舍（穆玉敏 提供）

水村：二是娄子水村较大，仅次于周口店村，易于安顿造林大队队员；三是娄子水村距周口店火车站及长途汽车站近，交通便利。

造林大队队部下设秘书组、行政组、业务组及六个中队。六个中队分别设在所分配绿化的荒山附近的村子里，其中一中队在黄院村，二中队在拴马庄村，三中队在黄山店村，四中队在娄子水村，五中队在上方山，六中队在新街河滩。行政组下设的基建队劈下娄子水村西的半座山，填平山前的大沟，收购人民公社淘汰的骡马牲畜、大车等，做为运输建筑材料的工具，取当地的石料，运来市公安局改建旧房舍时剩余的砖瓦、木料等，盖起了10多排、50多间平房，造林大队有了稳定并在当年很气派的办公和居住场所。

娄子水村西北半山腰处，有一座古庙，建于元代，始建时名超化寺，后称庄公院，为二层阁楼式建筑。造林大队四中队就居住古庙内。除四座石碑和三松一柏外，古庙内文物均被破坏。立在一层殿内的三圣像被推倒，所有房间被辟为居室，直至今日，庄公院内仍残存当年造林大队用石头盖的一间小房。

1958年下半年，造林大队在娄子水村西南的黄山店、宝金山、上方山等大面积荒山、沟壑、河滩上展开了植树造林大战，能造梯田的山坡就造梯田，不能造梯田的就挖鱼鳞坑，土薄的山坡还要从山下背土上山。造林大队还请专家指导，在不同的地域种植不同的树种，如油松、洋槐、山杏、臭椿、山丁子、紫荆条等等。

除了在荒山上挖坑植树外，造林大队还接管了一些公社和村子废弃的梯田，经过重新修整，种植果树和蔬菜等。

1958年底，造林大队在盛产煤炭的黄院村开了一个小煤窑，并在黄山店北沟阳坡上建了一个鸡窝铁矿厂。本想用开采的煤炼铁，但因煤炭质量差，炼出来的铁像“豆腐渣”。铁厂流产，紧接着又建起了一个石灰厂。

几年后，市局领导到造林大队检查工作，见小煤窑里巷道非常窄小，挖煤民警双肩拖着装满黑煤的大筐在巷道里爬出爬进，劳动强度太大且不算，毫无安全保障，遂令煤窑关闭。

造林大队还搞了多种经营,搞猪、鸡、兔等养殖业,在六中队办了养猪场,三中队办了养鸡、养兔场等,并在果树行里种各种蔬菜,争取自给自足。

造林大队为了获取资金解决必需的化肥及劳动工具、交通工具等,搞起了一个土造酒厂和石灰窑,酒厂刚刚试生产,就因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夭折。

造林大队刚成立时,正值“大跃进”之初,工、农、兵、商、学都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参加劳动。所以,造林大队从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参加造林的干部、民警最多时达1000多人。

经过千余名干部、民警的共同努力,使承包的大面积荒山秃岭都着上了绿装。经统计,造林总面积达15546亩,其中含良乡65亩果林、135亩苗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波及到造林大队,使500多人饱经“文革”风霜,经受了他们一生中永远难忘的岁月。造林大队里不但劳动强度很大,还实行特殊管理方式,白天集体劳动,晚上集中学习,汇报思想,并且各种“运动”不断。每月一个小整顿,每年一个大整顿。正常的公休日被取消,使在造林大队劳动的人始终感到自己是“另类”而被紧张、谨慎、压抑、苦闷所笼罩着,以至于有的干警不堪重压而自杀。

1970年,造林大队被撤销,500多名干警的冤案也于1978年始得到平反。造林大队12年间所种植的大片林木、果树等全部移交林业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只留下造林大队的队部,兀自立于娄子水村西。年久失修的房屋,昭示着北京市公安系统那段“痛史”的逝去。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后金兵在房山

王硕儒

现今的房山区,在明代是良乡和房山两个县。1958年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形成现在政区的状况。

明王朝末期,后金政权在我国东北建立,不仅占领了东北的大片土地,而且以种种借口向山海关内进军,直抵明廷京都(今北京),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明王朝万历年间,长期居住在东北长白山东南部的女真族爱新觉罗氏兴起,在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历经30多年的内部征战,统一了女真族(满族)的各部,并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因金王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故自称为“后金”),同明廷分庭抗礼。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召开叛明誓师大会,提出明廷的7条罪状,向明廷宣战。开始,后金夺取明廷在东北的地方政权,由边远山地不断向平原扩展,经过10余年(公元1618年至1629年)的战争,先后占领了沈阳等70余城池和大部地区。

后金势力的发展,八旗兵(努尔哈赤初定兵制)队伍的扩大,女真贵族已经不满足于对东北的统治,开始向关内进军。进攻前,后金首领皇太极向关内百姓发表文告,提出种种理由要对明廷“兴兵问罪”。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夜,后金统治者皇太极亲率后金军10万人,毁边墙,分道自喜峰口、龙井口、大安口、洪山口入边,攻陷遵化、三河等地,很快经顺义、通州直抵京都城外。明蓟辽督帅袁崇焕得信,急率九千劲旅自关外返回京师。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兵临京都城下,同明军大战于广渠门

外，袁崇焕亲自督阵力战后金兵 1000 余人。后金兵大败，皇太极被迫移兵南海子。

皇太极战斗失利，遂以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崇祯皇帝信以为真，于同年 12 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杀害。皇太极阴谋得逞，势力复兴。诸将劝皇太极乘势夺下京城，皇太极说：“夺下京师容易，但明朝的疆土很大，各地的兵力还很强，不是短时间能攻破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简兵练旅，以待天命。”于是率军南下，经丰台、长辛店，直抵良乡城（今房山区区府所在地）。

明代的良乡城是一座县城，知县党还醇督促全城文武官员和军民奋起抵抗，据守城池，但岂能抵挡后金数万大军的攻击，终因力屈城破，城内军民伤亡惨重。知县党还醇，教谕安上达，训导李廷表，典史史之栋，驿丞杨其礼，兴州卫掌印指挥陈以忠，管操指挥李承爵，千户蔺如龙、何秉忠，百户李阴，生员孙耀祖、梅友松、魏时中、孟维祺、徐邦教、陈万春、薛尚爱、李为梁、张抱璧、任克宅、任克孝、张冲玄、陈万机、刘弘道、何宗宪、石应斗，武举陈鑫测，节妇万国宁妻朱氏、刘振武妻任氏、刘弘彻妻陈氏、姊刘氏、李为梁妻沈氏、陈自重妻薛氏、何宗宪妻王氏、陈万机妻张氏、孙耀祖母陈氏、妻梁氏、周鉴妻陈氏、陈舜典妻徐氏、苏之策妻梅氏、薛边科妻王氏等 40 余人，惨死在后金兵的刀枪之下。安上达、孙耀祖等全家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崇祯三年（公元 1630 年）三月和四月，顺天提学御史和礼部上奏崇祯皇帝批准，对上述留下姓名的 40 余人予以抚恤或厚葬，并建坊列名，以示表彰，流芳后世。然更多的死难者并未留下姓名。

良乡城被后金兵攻占后，京都西南地区一度为后金所控制。崇祯三年五月初二日，后金骑兵 1000 余人到房山城外东岳庙，然后派一骑兵头目到城下对城上说：“房山县是金大定年间建立守陵的，县官应开门相迎我们。”^①当时房山知县杨齐芳不予答应，后金兵遂以大斧劈城门，城中男女老幼仓惶号泣。这时，房山县生员李元勋、弥愈杨、曹耿挺身而出，到城外对后金兵说：“你们既然知道房山是金陵的所在圣地，就不应该加害房山的百姓。”^②3 名生员在城外同后金兵交涉两、三个小时，后金兵全部退回良乡。第二天，后金兵数骑（前日在城下交涉之人）又到房山城外送信，声言：“我们主帅已经传下命令，不许士兵杀人，但本月十一日去金陵祭陵，你们要同我们一同前往。”^③五月十一日，后金兵果有 3000 余骑到房山县城北，声称祭品已备，对房山毫不相犯，只呼几名生员引导我们前往。这时，三名生员遂如约出城，又有房山县典史及生员孟宗孔、张养中、张绳武、赵嘉胤、刘光远、马出图、董芝渲、陈如吕等人随往九龙岗，祭章宗陵以后，当日返回良乡城。十二日，遂起营而去霸州道。

注：①、②、③均引自《崇祯长编》卷三十四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北峪沟军民抗日往事追忆

张成基 安庆谭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峪沟就是今天北峪村、陈家坟村的总称，位于房山、宛平两县交界地带，北与宛平县隔山，南距重镇河北十余公里，东面的东港是宛平县六区工作中心，地势险要，军事上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的北峪沟共有农民四百多户、一千五百多人，分别居住在山上的南岭、北岭、岭西、桑树窑子、板桥、黄岗子

和沟里的陈家坟、东坡、柿子树洼、白湖、外河、滴水岩等自然片。八年抗战期间，北峪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的代价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写下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发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派包森、杜伯华来北峪沟地区宣传抗口救国主张，收缴地主武装，发展抗日队伍，教唱抗日爱国歌曲。记得那时教唱的歌曲有：

《救亡进行曲》歌词：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和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我们的队伍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的兄弟，斗争向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歌唱；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大家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向，要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光，努力奋斗。杀，杀，杀！”

《卢沟桥事变小调》歌词：

“七月太阳似火烧，日寇进攻卢沟桥。亡我国，灭我种，还要奴役我同胞。二十九军的士兵，忠诚为国不后人。齐奋起，下决心，英勇抵抗在平津。抗日红军志气高，要求国防前线调，开大会，发通电，以及改名换番号。四万万同胞团结起，铲除日本帝国主义。求解放，从今起，以后再不受人欺。”

《华北失守小调》歌词：

华北事变卢沟桥，二十九军拼大刀。汉奸殷汝耕，图了贿赂了，使了日款，卖了华北，人人受苦劳。

除了上面的歌曲外，还有当地群众根据当时的形势自编的歌曲，如：

三区三区汉奸王凤来，勾引日本他也没发财，请来小日本，来到三区后，奸淫妇女，抢夺民财，人人受迫害。

四区四区汉奸也不少，请来日本河北建碉堡，汉奸马大兜，还有段汝梅，依靠日寇，欺压百姓，人人受苦劳。

五区五区都是抗日的，打下粮食军民一齐吃，做鞋做军装，还要送烧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去杀日贼。

石堡石堡立着县政府，日本来了烧得苦又苦，军民团结紧，积极修房屋，努力学习，抓紧生产，还把汉奸除。

当时北峪沟属房良联合县五区管辖，后又划归宛平县六区管辖。区委副政委耿子华、五区干部李万会、武工队长强治国、二区公安助理于振边等同志都先后到北峪沟开展过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地进步人士张万田、张镇、李庆芳、张贵、王宪、段兴茂、段志元、王进、王广、王庆田等人在耿子华同志的领导下，从1941年开始在北峪沟地区一方面发展中共党员，一方面进行民主选举村政权，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主要包括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救会和武救会等群众组织。具体一点讲：工救会由给地主、富农打长工、打短工的以及走煤窑的贫苦百姓组成，主要任务是跟地主、富农清算工资；农救会由租种地主、富农土地和向地主、富农借高利贷的农民组成，主要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青救会由年龄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青年组成，主要是组织学习，进行抗日宣传，参加识字班，提高文化素质；妇救会由所有妇女组成，主要是向群众宣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剪发放足等。记得有一首宣传妇女解放的歌曲：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住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我们妇女不自由，为人奴隶做马牛，受压迫，受束缚，要想解放哪能够。幼年就把双足缠，好像犯人带脚链。穿耳孔戴耳环，不把妇女当人看。我们打破男女界，世上男女一样般。走向社会，参加政权，也要当兵上前线。

儿救会即童子军，由八至十七岁的青少年组成。主要任务是在村口站岗，盘查过往行人、路条，无路

条者送村政府审查；第二项任务是为我部队和工作队带路；第三项任务是为我军政部门转信件。

武救会即民兵组织。以村为单位建立民兵中队，中队长也称武委会主任，各队下编排、班，以便指挥。武救会成员按年龄分为三层组织，即：十八至二十五岁者为青年抗日先锋队；二十六至四十五岁者为抗日救国模范队；四十六至六十岁者为抗日救国自卫军。先锋队与模范队每天要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等候上级指示。主要任务有两项：一项是配合我工作队执行任务，另一项是独立执行任务，如：破坏敌人通讯、铁路交通等设施，配合部队至里外十三、河南、十字道等敌伪据点附近喊话，宣传抗日政策，开展政治攻势；不定期召开民兵大会，表扬好人好事，树立典型，鼓励先进。

随着抗日工作的不断深入，北峪沟地区的群众抗战热情日益高涨，形成了全民皆兵，一致对外的局面。耿子华同志曾有诗歌颂北峪沟军民的抗战热情：

抓髻山上驻英雄，北峪深藏我兵营。
青龙头上站住脚，凤凰山下显神通。
桑峪梁高飞腿过，河套沟长分组攻。
外八村属丘陵地，打击日伪不放松。
抛掉头颅洒热血，为保中华永安宁。

敌扰

北峪沟做为我军一条交通要道，东边有白口沟的东港，西边有大安山地区的瞧煤涧和史家营的金鸡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我地下工作者经过此地区，或去北平，或进入我根据地。到北平去的我工作人员都以去北平卖山货为掩护，由史家营董春山安排好，派武工队护送，绕过大安山的日伪据点，经过北峪沟、东港、外十三进入北平。从北平来我根据地的多是一些进步学生和运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也都要经过北峪沟地区。当时东港王振宝的母亲对我过往人员接待十分热情，不少人都认她为义母。

与此同时，北峪沟地区还是我宛平二、四、五、六区武工队和地方部队屯兵训练休整的基地。当时宛平六区陈大队长、五区马大队长和李万会、二区于振边、杜凤明都曾带队伍在这里休整过。休整期间，我军还利用各种机会破坏坨里到良乡、窦店段的铁路以及河南据点往山里的电话线路。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坏，搞得敌人很狼狈。

日寇为打击我抗日斗争，企图控制我北峪沟地区：1944年春，敌人东拼西凑了四、五百日伪军从河南村日军大队部出发，疯狂进攻北峪沟地区。我军得到消息后，迅速组织当地群众坚壁清野，不叫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同时分散了群众到山上居住。

敌人进入后，挨家挨户搜查，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将群众没有带走的衣物等抢劫一空，还抓住了两名妇女孙秀英和张秀凤。孙秀英被打得昏迷不醒，张秀凤被劫到据点，惨遭摧残后被放回。日伪军在北峪沟又欠下了一笔血债。

后来，敌人为了巩固在北峪沟地区的统治，从良乡、房山两地的几个大编乡中强征民伕六、七百人（因为从北峪沟抓不到民夫），以南岭为中心，分别在南岭、北岭、庙儿安、东台建了四个四层的碉堡。在建碉堡过程中，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对民工拳打脚踢，干活的人苦不堪言。所用建碉堡的材料多是当地百姓家的围墙、坟地和石堰的石料，以及百姓地里的成材树，附近的各种树木都被砍光。当时我当地各村党支部为阻止敌人建碉堡，曾组织群众开展过各种斗争，使北岭的碉堡终于没有建成。

斗争

敌人在北峪沟一带驻扎后,我党政部门和民兵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活动。附近各村党支部的各种抗战会议经常选在苇子沟、蔡吴港、桑树窑子等距南岭据点较远的偏僻地方召开。同时积极组织各种侦察活动,配合我工作队和大部队执行任务。

经侦察得知,敌人在北峪沟一带的四个据点中共驻扎了五、六百人,包括一个中队三个小队,每处碉堡驻有一个小队,经常换防。碉堡建成前,有一个日军小队驻守。碉堡建成后,日军小队撤走,驻扎的只有汉奸队了。

在了解了敌情后,各村党支部曾领导民兵配合工作队对敌据点展开了多次斗争,取得了不少战绩;

1944年春,我宛平五区副大队长张万田带队组织东坡的张玉润、张玉稳、张玉德、张玉安、张玉海、张玉贵等七、八个人在陈家坟里边、五凤沟外边劫获敌人运粮车,劫得玉米七、八百斤。

1944年某天,张万田写一封信派党员王志增给庙儿安据点队长杨××送去,要杨到桑树窑子与张万田面谈。迫于我强大政治攻势,杨××面谈后,送给张万田手枪和子弹等武器。

1944年冬,我民兵组织配合区武工队将北峪沟地区的叛变分子王张氏处死。同年冬,在西班牙各村将真心向敌、假心向我的伪联保主任佟福臣处死。

1945年3月8日,王再田带领手枪队从北峪沟出发,经过西班牙各村来到黑龙关村北,拦路劫击日伪汉奸中队长尤茂志队伍,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自此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敌斗争,北峪沟地区的抗日形势越来越有利了。

解放

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7月9日,张万田组织北峪沟当地民兵十余人将东台据点包围。由于我方武器装备简陋,仅有一支“三八”步枪和数枚手榴弹,强攻据点不利。于是采取对敌据点停水、停粮、围而不打的方针,同时对敌展开政治宣传,讲抗战形势:日本鬼子很快就要被消灭!龟缩在碉堡里的伪军逐渐感到孤立无援,于是在7月11日夜仓惶撤到南岭中心据点。我民兵乘势占领东台据点,放火烧了碉堡。

与此同时,7月9日白天,宛平五区民兵队长刘天贵带领千军台、庄户、板桥三村的民兵二十多人携两支步枪,一枚地雷将南岭岗楼包围,按照上级指示,仍是围而不打,主要向据点敌人宣传我军政策,瓦解敌人军心,迫使敌人缴枪投降,即使敌人放弃据点逃跑也是胜利。五天以后河南日军据点派来援兵,将南岭、庙儿安两处被围困的敌人接走。在半路中踩响了我军埋的地雷,一人被炸伤,敌人四下逃命,我方俘虏了这名伤兵,同时缴获一支步枪。随后当地民兵和群众放火烧掉了这两处据点。北峪沟的敌人被全部赶走,当地群众迎了解放。

中流砥柱

北峪沟地区的党组织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越来越成熟了。

自1944年春到1945年7月,日伪军盘踞在北峪沟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的党团组织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而且日益壮大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地1941年至1943年入党的党员有7名,到1945年,已发展到31名,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成为该地区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八年的抗日战争迎来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北峪沟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一致对外,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永远值得后代人牢记,因此特

做以上的回忆，以表自己的激动心情，同时也要告诫后人：千万不要忘记历史。

附记：此文写成前，作者于2000年3月22日来到佛子庄乡北峪村，与村党支部书记王庆立，老党员王亮、王庆贵、孙秀英等同志反复回忆座谈，最后几易其稿方成。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作者安庆谭系原房山县工商局副局长

马鞍山阻击战

张玉泉

马鞍山，是一座英雄的山，一座“钢铁”铸就的山，一座可歌可泣的山。它位于张坊村正东，是通往解放区根据地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全长一华里有余，南高北低中间凹陷，呈马鞍形，故得名马鞍山。

在解放战争中，蒋匪帮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曾几次从这里向我解放区根据地（六渡、十渡）发动猖狂的进攻，均受到我军的阻击。比较著名的战役有两次，一次在秋季，一次在冬季。这两次阻击战，不仅规模大，双方投入的兵力都比较多，而且持续时间长，最后一次达三天三夜。

第一次战役是1947年农历8月28日，是个雨雾蒙蒙的天气。早晨8点多钟，由国民党房山县张德祥保安团和河北省新城县王凤岗保安团，拼凑了三个团的兵力向张坊进攻。当时我房山县县委、县公安局、县武装部和独立团团部都设在张坊村内，张坊以里的解放区正在进行土改工作。

战斗打响之前，我独立一团侦察排长王花获得张德祥、王凤岗要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信息。县委决定：要坚决把敌人阻击在马鞍山以东，不能让他们的一兵一卒越过马鞍山。我军接到命令，立即开赴马鞍山上，昼夜挖战壕、做掩护体、运送武器弹药及一切后勤供给准备。

我军分区派独立一团迎战，独立二团在马鞍山北侧准备打敌增援。独立一团团长王成派一营把守山南的制高点，二营坚守北侧最低点，并看着敌人，把三营放在中间马鞍的凹陷处。战斗打响时，三营派出五连在前沿阵地最先与敌人接上了火。五连有重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两挺，其余是掷弹筒、手榴弹、步枪等轻武器。敌人有重机关枪、火箭炮等比较优良的装备。他们死死咬着五连的阵地，用密集的炮火猛攻，在炮火的掩护下集中起来往上冲，我五连战士死守。用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手榴弹等交插成密集的火力，把敌人打退，敌人一片片倒下。我军居高临下，连续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中，我5连长壮烈牺牲，有一半战士伤亡，最后仅剩副连长和六七个战士。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五连副连长擅自从火线上撤下来，遭营教导员的严厉批评。他不接受批评，反而指责领导未及时增援，当场被处决。

此时敌人发现中间没人抵抗，连忙向中间的凹陷处冲。说时迟那时快，在两侧的一营、二营迅速向中间转移，猛烈的打击即将冲到山顶上的敌人，敌人以更密集的炮火扫射，一团司号员杨臣背包上穿了六七个枪眼，硬是没受伤，战士王存采被俘虏。

从上午8点多直打到下午四点多，近九个小时的战斗，敌人未能占领马鞍山，伤亡一百多人的保安队，

感到再坚持打下去也白搭,不得不失望的撤退了。气急败坏的保安军仓惶逃走时,把马鞍山前的陈家洼村民房烧掉了400多间,算是出了气,大街小巷处处冒烟,空中弥漫着焦糊味和血腥味,使躲到山中的老百姓回来后无家可归。

第二次战役是当年农历11月底。我华北野战军对石家庄进行了包围。傅作义为了牵制我军,减少对石家庄的压力,趁我主力军南进之时,派出94军、16军和暂三军各一部,向我解放区进攻。我军分区独立一团、二团和独立4旅12团,还有房山县大队及张坊一带的民兵,奉命在马鞍山阻击。

11月7日,我独立团埋伏在马鞍山上,在山梁上筑起第一道防线:独立4旅12团在史各庄一带筑起第二道防线。八日晨,天上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雪,大地银装素裹,我解放军都把棉衣翻过来穿,以便隐蔽。敌人从王洛庄、南北尚乐迅速向塔照集结。我独立一团先派出一个连(第二连占领马鞍山前面的塔山、孤山和东山)向敌人开了火,目的是牵制敌人主力向马鞍山进攻的时间。敌人用火箭炮、重机枪还击。开始他们误认为我主力部队埋伏三个山头上,狡猾的敌人也派约一个营的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等攻上半山腰才发现我军还不只是一个连的兵力。此时敌人大部继续向马鞍山进发,早上8点多,他们到了马鞍山下,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从南北两侧往上冲,改变了第一次战役主攻凹陷的打法。敌人用迫击炮、火箭炮和轻、重机枪做掩护,像放羊似的一齐往上冲。山梁上我军只放一个营的兵力,利用有力的地势和8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其余是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坚持了三个半小时,到中午打退敌人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一营的三个排仅剩下半个排,8班班长打断了左臂,还在坚持战斗。密集的炮火把掩体洞的门板烧着了,打平了,整个山梁都烧焦了。我军来不及运下山的部分伤员被烧死,山下的敌人一片片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中午,一团奉命撤下,独立二团上来。就在此时小股敌人摸上来,与我二团短兵相接。不到一小时,大部分被消灭在山上,小部分逃回山下,而且掳走了我几个战士。

第二天11月9日,我独立二团4连换下了5连,继续阻击敌人。上午11时许,狡猾的敌人从马鞍山的北侧向后面移动,前边的打着八路军军旗,穿着八路军的军服,企图绕到马鞍山后,来个前后夹击我山上的部队。小股先头部队一到后侧山下,一面往山上打炮,一面喊话:“兄弟们交枪吧!交枪不杀!”这时我军才发觉,敌人在北侧兜了后路。我4连战士前后奋力抵抗,在敌人即将登上山时,我在史各庄二线的独立四旅12团派出精锐部队。把绕到山后的敌人大部分歼灭,把马鞍山北侧即将失守的隐患彻底消除了。

战斗持续到第三天(11月10日),我独立四旅12团,从马鞍山的左侧绕过去,直奔下滩一带去抄敌人的后路,第二道防线由张坊、塔照、广录庄和涑水的基干民兵承担,迫使敌人从原路仓惶撤走。

这次战斗持续了三天,歼灭敌人300多人,光死尸就拉走了5汽车。我军仅伤亡百余人。马鞍山阻击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企图。马鞍山阻击战给张坊地区的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每逢谈起这些往事,老一辈的张坊民兵们,特别是当年那些抬担架、送伤员,站岗放哨、看俘虏、送军粮的,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注:根据陈伶、杨龙兴等人谈话整理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建国前解放区的诉讼收费制度

宋 湘

诉讼费用是法律规定由当事人负担的为进行诉讼交纳的费用。其立法依据主要是认为民事诉讼是以解决私人权益纠纷为目的，应采用有偿原则；凡进行民事诉讼，就应以一定的费用补偿国库开支。现代世界各国办理民事案件均需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依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诉讼收费制度古已有之。据史书记载，周代进行诉讼，原、被告双方即须交纳似诉讼费用的“束矢”或“钧金”。建国前解放区也曾一度实行诉讼收费制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副主任胡仁奎）以会法字第19号令“令颁各级法院状纸与讼费暂行办法希讨论执行”，内称：

“查抗战期间，人少事繁，物质困难，故遇事均力求简便，用物亦力求节约，因而各级司法案卷一般参差散乱，检查颇感困难，偶尔遗失（特别是判决书）即无从查核。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扩大，案件增多，司法工作较前更形复杂。为了保障人民财产权益，适合环境的需要，应逐渐建立各种必要的司法工作制度（如比较健全的记录统计，比较完善的卷宗档案等）以便组织事务，克服零乱现象，而达改进工作之目的。但各种制度之建立，需要一定的费用，如普遍向边区人民征收，势必增加人民负担，倘由诉讼当事人负担一定的费用，则问题即可适当解决。因之征收诉讼费用，正所以减轻一般人民之负担。且讼费征得后，仍系用在整顿司法工作上，就当事人来说，亦属合情合理。其次，由于诉讼的征收费用，还可限制一些滥讼案件，减少人民讼累，使人民能把时间用在生产上，同时可推动调解工作的进行。此外，由于照顾了贫苦工农（如免征审判费），亦不致因征讼费而限制工农群众的诉讼。”

“基于原因，兹制定晋察冀边区各级法院状纸与讼费暂行办法公布施行。希各级政府，特别是司法部门工作人员详细研究讨论，慎重执行。由于此事在边区尚属试办，没有经验，实行后有何利弊，干部及群众有何意见，统希详作考查，搜集材料，于三个月后总结问题与经验，并提出改进意见报会核办。”

《晋察冀边区各级法院状纸与讼费暂行办法》共十条，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 为保障人民财产权益，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提倡民间调解，减少人民讼累，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诉讼状纸与诉讼用纸，由各级法院各厅处依式印制〈附式样〉，发给当事人应用，不论刑事民事，每张按所需工料费收价。”

“第三条 诉讼当事人购买状纸后得自撰缮，或报告事实及理由，请求司法人员记录。”

“第四条 诉讼费包括审判费、执行费及当事人因诉讼支出之费用。”

“第五条 民事因财产权而起诉者依诉讼标的之金额或价额按左列标准征收审判费：（一）300元未滿者，不收；（二）300元以上500元未滿者，10元；（三）500元以上千元未滿者，20元；（四）千元以上一万元未滿者，每千元30元；（五）万元以上10万元未滿者，每千元35元；（六）十万元以上50万元未滿者，每千元40元；（七）50万元以上百万元未滿者，每千元45元；（八）100万元以上者，每千元50元。以上（四）至（八）项尾数不及千元都以千元计。”

“抗日军人家属与贫苦工农免征，如抗属与贫苦工农胜诉时由败诉方补交。”

“第六条 执行费不满千元者免征，千元以上者每千元征收 10 元，尾数不及千元者以千元计算。……”

房山县当时归晋察冀边区北岳专区管辖，按边区政府指示也执行了诉讼收费制度。据房山司法处 1946 年“9 月份前的工作概况”载：“5. 诉讼费工作：由于已往习惯及未坚持收之故，现在对此认识还差，大部还依白纸或口头来呈诉及保人。由 9 月份起仅征收了 500 元状纸费，40 元申请费。我县经费困难之下司法用纸难以解决。”

诉讼收费制度在解放区执行了近三年时间，根据当时形势，1948 年 12 月 3 日北岳行政公署令：“顷奉华北人民政府法行字第 7 号通令规定：一、为便利人民诉讼，自文到日起，所有讼费一律取消；二、取消人民诉讼须经区、村介绍制度……”

此后，各级人民法院一直实行免费诉讼，到八十年代初，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又开始实行诉讼收费制度。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房良两县土改运动概况

张文玲

房、良两县区域广阔，地形复杂，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占了一大部分，整个土改运动是按照党中央的批示和省地委的统一部署，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随着解放区域的推进而进行的。

老区、半老区土改

根据中共中央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改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中共房山、良乡两县委于 1946 年冬和 1947 年春分别在房、良两县的老区及半老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包括房山县的一、二、三、六区(霞云岭、蒲洼、六渡、十渡、张坊、南白岱一带)原宛平四区(大安山、史家营一带)，良乡县的三、五区(河套沟一带)共 129 个村庄和原良宛县的窑上地区(北从任营、万里，南至韩营、鲍庄等)12 个村庄。此次土改方法步骤是：工作队进村后，先召开村里贫苦农民大会，罢免地主分子在村政权中的职务，由贫苦农民推荐代表组成村政权，成立贫农团，然后在贫农团的领导下，发动贫苦农民与地主老财作斗争，讨还血债，封地主的门，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再根据贫雇农的贫困程度，分给土地、房屋和浮财。

仅在半年的时间里，房山、良乡两县的老区、半老区 129 个村子中，约有 5 万农民斗争了地主，获得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促进了政权的巩固。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紧张，时间短，干部对土改经验不足，再加上一些地方的封建会道门盛行，封建宗族、阶级关系复杂，存在着一些地方对地主不分罪恶轻重，乱打乱杀的过“左”的倾向，对旧式富农的土地财产基本上没有动的过右的倾向，部分农民分得的土地不够合理，远地、坏地居多等问题。

1947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

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至没收和分配的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依据中央指示，中共房、良县委分别于同年五、六月份，在房山县的一、二、三、六区和良乡县所属的三、五区开展了土地复查运动。复查运动经过发动群众、清算斗争、分配胜利果实、整顿村政权和建立群众组织几个步骤。

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访贫问苦发动贫、雇农，成立翻身委员会或翻身指挥部，建立领导核心，团结中农参加清算斗争。分配胜利果实是：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剩余部分合理分配给其他阶层，缺地者分地，无房、缺房者分房，凡发给翻身票的，再比光荣、划等级、定分数，按分数进行分配。据统计，仅三区 10 个村 1129 户贫苦农民分得土地 4042.1 亩，浮财 39138.35 元。配合土地复查，两县委注意培养和吸收了大批斗争骨干加入党组织，改变了党支部的阶级成份。整顿了村政权和群众组织，巩固了根据地。

土地复查运动，纠正了首次土改中的某些不彻底性，清算了地主老财，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征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房屋、财产。但是，在复查中出现了严重的乱捕乱杀现象和侵犯工商业、中农利益的问题。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平西地委为认真贯彻《土地法大纲》，以整党的精神解决土改中少数农村干部多分地、分好地的问题，由地委书记孙明主持在板城召开会议，房、良两县干部全都参加。先学习《土地法大纲》，然后审查干部，查三代、“搬”石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即把原来干部按不同身份分为：核心骨干，需要考验，需要回避三类。会议结束时，原有县区干部，凡出身地富和中农者，几乎都调离原工作单位或集中在训练班学习，空缺由出身贫农者代替。在基层农村甩开党支部，由贫农团决定一切。仅良乡县三、五区，被搬掉的大小“石头”91 人，其中有 64 人送往县学习班培训，27 人被村中扣押，被撤职的干部 204 人，造成敌人乘机报复，村中坏人抬头。“左”倾的干部路线，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板城会议后，房、良两县认真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和板城会议精神。坚决实行“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连同乡村中一切其它耕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房山县一、二区和良乡县三、五区以及宛平县四区进行了平分土地。

平分土地，改变了复查中按产量计算的方法，采取以地亩作标准，以产量作参考、地亩与产量相结合的办法，按照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原则平分。

土地平分后，贫雇农要求得到土地的心愿基本满足，在村中掌了权、当了家，真正成了主人。但是，平分工作中只注意“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却又忽视了不能侵犯劳动人民利益的问题，平分过程依然存在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错误，而且在整党中“搬石头”的“左”倾干部路线也需要加以纠正。

1948 年 2 月 22 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为贯彻中央指示，房山、良乡两县委，于 5 月中旬，分别在所管辖的土改地区召开了被斗户和贫农、中农会议，学习中央指示，讲清政策，选出了新的评定阶级成份的委员会。6 月，平西地委副书记阮泊生主持在门头沟区清水村召开了土地平分后的纠偏会议，被搬掉的县、区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纠正了“搬石头”中的“左”倾错误。在清水会议上，平西地委书记孙明作了检讨，被当做“石头”搬掉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房、良两县委结合贯彻清水会议精神，于 9 月开始纠偏工作。纠偏工作分以下几步进行：

第一步：宣传政策，走群众路线，做好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地划分阶级成份，对中农的补偿、地主的安置、浮财的分配都需要经贫农大会讨论通过。

第二步：按规定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将错划的成分纠正过来。据良乡县三、五区 26 个村统计，平分土地时划出地主 182 户，富农 246 户；通过纠偏，正式定为地主成份的 62 户，富农 43 户。

第三步：补偿中农。真正勤劳起家的大部分如数退还。对错划错斗户道歉。评委会定出补偿数目。

第四步：安置地富。这项工作与补偿中农有本质区别。分给地富的土地、房屋、农具、衣物，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参加生产，自食其力。

第五步：补偿工商业。对错斗户财产未分的或已分但未消耗的退还原主；财产部分已分配、出卖或消耗的，可以用其他物品抵偿。

第六步：调剂土地。土地复查、平分后，土地分配出现的肥瘦不均的现象，通过调剂土地得到解决。

此次纠偏工作各阶层人士均表满意。

1947年冬至1948年初，房、良两县部分地区实行了随军土改。军队所到村庄，军政干部将地主富农的土地、粮食、农具、牲畜、财物分给农民，宣布废止租佃关系，农民租种的土地归农民自己所有。

这样，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8年冬，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老区、半老区的土改任务基本完成，土地的分配基本趋向合理。

新区土改

1948年12月，房山、良乡两县全境解放，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尽快解决新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中共房、良两县县委分别制定了新解放区土改的政策和措施，并于1949年2月，先后对新区土改工作计划、组织领导、干部配备、工作步骤公布实施，决定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分批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批新区土改是在房山县的四、五、七区(南白岱、五侯、周口店一带)，良乡县的一、二、三区和城关区134个村进行，自1949年2月下旬开始分4步进行，到4月结束。

第一步，工作组进村，解散各种伪组织，收缴村中暗藏武器，严格控制保甲长、坏分子的活动。发动群众，通过选举，成立以贫、雇农为骨干，有中农代表参加的村民代表大会。

第二步，按标准，以村为单位，经群众大会通过，划分阶级成份，确立斗争对象。

第三步，开展诉苦说理斗争，按政策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及财产。此次土改吸收了老区、半老区的经验、教训，工作队反复宣传，明确政策：坚决没收地主财产，但不准扫地出门，分配时按平分原则给其同样的一份；只能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不准征收中农的土地财产；坚决保护工商业，即使是地富的也不准没收；对贫农、中农的保甲长政治上打击，不能和经济上的没收混在一起。由于政策界限清楚，这次土改没有发生侵犯工商业和中农利益问题。

第四步，分配胜利果实。先是核实、登记土地亩数，根据地段远近、好坏定出年产量；经自报公议，代表会审查，群众大会通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仅房山县70个村的不完全统计：没收地主、征收富农的土地有39966.84亩，房屋5945间，大车103辆，农具6741件，粮食2862.95石，牲畜437头。

第二批新区土改始于1949年11月，止于1950年2月。1949年10月10日，华北局根据中央有关土地改革的规定，作出关于新区土改的决定。10月15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了关于具体执行华北局决定的指示。两个文件要求，新区一律于今冬明春全部完成平分土地的任务；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封建财产，征收旧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及其财产的封建部分，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坚定不移地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平分政策；做到既准确消灭封建剥削制度，适当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又切实巩固贫农、雇农、中农之间的团结；慎重地、正确地划分阶级，巩固扩大乡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以贫农为骨干的，团结全体中农及一切劳动人民的农民代表会议及农会，彻底完成改造旧政权的任务；将地主、旧式富农、大地主与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劳动起家的富农与一般富农与带恶霸性富农等加以区别，分别对待；对

罪大恶极、危害一方、为广大群众所痛恨的恶霸，应领导群众进行有组织的清算斗争；群众性的斗争方式与人民法院的斗争方式紧密结合；严禁乱打、乱扣、乱杀或其它变相肉刑。

1949年11月，房、良县委依据华北局和河北省省委指示，分别研究制定了《中共良乡县委关于新区土改与结束土改计划》和《中共房山县委关于执行地委“新区土改与老区半老区结束土改工作指示”的工作布置》。对此次土改工作的任务、方法、大步骤进行了具体安排，决定除留一部分干部作支前工作外，全力投入土改运动。

1949年11月下旬，两县分别召开了扩干会，培训土改工作骨干，学习土改政策，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和方法，然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贯彻土改政策。在此基础上，土改工作组分别深入各区，组织召开农民代表会和积极分子会，反复宣传土改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树立搞好土地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经过县、区、村的代表会后，土改工作干部即同农民代表们一起回村，帮助组建农会，选举村农民代表会。农代会以贫、雇农为骨干，并保证了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中农参加。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员，经农会审查批准后可入会。为防止土改中过“左”或右的倾向，在划定阶级成份中各村普遍采取“三榜定案”。即本户先自报家庭情况，农代会小组审查贴出第一榜。然后，经农会小组讨论，农代会复审贴出第二榜。二榜公布后，召开地、富会，先通知本人，再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并在大会公布前将各村农会划定成份的名单，经土改干部会互相审查通过后公布第三榜，地主、富农超过8%的，经县委审查，三榜定案后本人不同意的，说明理由可以到政府上诉。

在没收、征收登记财产中，采取自报与农会审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地主、富农自报的土地、房屋、农具、粮食等财产进行登记造册，然后查封没收等待分配。两县各区、村在分配胜利果实过程中，普遍对军、工属给予适当照顾，群众比较满意。

为消除广大贫、雇农怕“地主、富农倒算”的疑虑。各区、村农会依照政府法令，对土改中分得的土地、房屋，及时颁发土地证，并宣布旧的文书地契一律作废，对安定民心、鼓励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1950年2月底，房山、良乡两县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土改取得丰硕成果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至全境解放，两县推进土地改革并全面完成土改这一重大任务，历时三年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两县共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土地35.5万余亩，房屋3万余间，大车840辆，粮食10万余石，农具4万余件，牲畜2200头。4.5万户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据1952年统计，土改后阶级构成情况为：房、良两县农业户70862户，其中雇农1063户，占1.5%；贫农39187户，占55.3%；下中农10346户，占14.6%；中农13251户，占18.7%；上中农3401户，占4.8%；富农1913户，占2.7%；地主1701户，占2.4%。

由于两县委注意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新区建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到1949年底，有209个村新建了党支部，有些村个别建立了党员关系，白点村所剩无几。两县共有党员7000多人，新区发展党员1500多人，新党员中有女性300多人。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的普遍性上以及党员的数量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土改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部分村庄一面土改，一面组织群众搞副业，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了巨大的战勤任务，为推进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准备了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保北战役中，房山县筹粮、送粮给解放军，其中有小米105340斤、小麦4190斤、大米148斤、白面127500斤、马料40970斤、饲草27600斤、柴816387斤；平津战役中，房、良两县

动用 104 个运输连,牲口 4680 头,出动民兵五个连 615 人,动用大车 1776 辆,完成运粮 8105000 斤,运草 400 多万斤,运柴 5409000 斤、运木头 6500 根,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作者系区史志办干部

建国初期房良两县的“三反”、“五反”运动

王绍清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规定了党对各种社会经济成分所必须采取的方针和政策,除掌握经济命脉,确定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外,还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中共房、良两县县委遵照中央及河北省委的指示,在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商业并存的情况下,为恢复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确定在两县生产推进社(后改供销合作总社)的基础上,调配主要领导干部,迅速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组建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商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占领了房、良两县经济阵地。

房、良两县政府在发展国营、合作社(以下简称“国合”)商业的同时,对私营工业进行扶植。1951 年私营工业发展到 100 个,个体手工业达到 417 户。工业的发展使私营商业,从萎缩凋敝中迅速发展起来。1951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393.9 万元,供销合作社仅占 220 万元(不包括两个烟酒专卖处零售额),大部分为私营商业所经营,资本家称此时期为黄金时代。在这门庭若市、空前繁荣的情况下,部分资产阶级不满国家和工人阶级给予的地位和利益,不愿接受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国营经济的改造,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向国家和工人阶级发动进攻。他们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国家干部,采取“派进来”、“拉过去”的方式,内外勾结,进行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同时,他们还不择手段地同国合商业争夺原料,争夺市场,把国合商业分配的原料制造计划外的高利产品,破坏国合商业的购销计划和价格政策,从中牟取非法利润。经群众揭发,在国家机关干部中,有的在战争年代是勇敢坚强的,进城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在企事业中,浪费严重,有的干部被商人资本家利诱腐蚀而出卖经济情报等。面对这种形势,两县县委按照河北省委和通县地委统一部署,于 1952 年 1 月在县直机关深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教育了广大干部职工。房山供销合作总社将驻天津货栈、周口店货栈、云峰寺煤矿、各经理部、批发部及在京采购人员与各科室统一编组,在总社汽车队大北屋再次动员,学习“三反”有关政策文件,组成骨干队伍(俗称打虎队)。经民主检查,查账对证等措施,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违纪违法人员分别给予处理。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三反”运动,按照全国总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工作要求,采取分批集中的办

法，二批共集中 200 余人，其中有 28 人交待了贪污受贿款 601 元（一版币）；因失职造成经济损失 868 元。对上述人员本着“以教育为主、实事求是”的方针给予了妥善处理。

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房、良两县工商界采取由店员、工人参加检举揭发的办法，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揭发出来的不法工商户，遵照中央有关政策，及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本着团结大多数的精神，按照“过去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对有严重问题的不法工商户分别给予处理。

1952 年下半年，房、良两县“三反”“五反”运动斗争基本结束。这次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职工，极大地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营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取得了重大成果。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又一次出现了困难，经营很不景气。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私商的违法活动由于在运动中受到严厉打击，资本家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产生了怀疑，经营消极，甚至抽逃资金，趁机申报歇业。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看到私商的种种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产生了强烈不信任感，不愿同私商交易。另一个因素，当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部分干部职工，产生盲目排斥私营商业，加上国家调整改组经济结构，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壮大，私营商业社会商品销售额大幅度下降。为了解决公私关系的紧张状况，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活跃城乡经济，1952 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其中调整公私商业关系方面，主要调整公私经营范围，取消对私商各种不适当限制等措施。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遵照全国总社及河北省财委指示，在业务上退让了部分商品，缓和了公私关系，为两县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五十年代初良乡县的兵役工作

王硕儒

新中国成立初，良乡县的兵役工作仍然实行革命战争时期的志愿兵役制，青年入伍当兵，全凭本人志愿。为了加强国防建设，补充野战部队每年退伍兵员的缺额和建立地方武装，每年均根据实际需要接收一部分青壮年入伍参军。

1950 年秋，在保卫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的前提下，建立本军分区的地方武装，良乡县征集新兵的任务是 200 名。这次征兵的方式是：出兵多少以区、村自认为主，坚持青壮年多者多出、少者少出的原则，重点放在工作基础强、青壮年多的村庄进行，劳力缺乏的村庄不进行，克服平均主义。在进行中掌握的条件：一是年龄条件，18 岁以上至 28 岁以下；二是身体状况，身体健康，五官齐全，无慢性病和传染病，身高四尺五寸以上；三是政治条件，政治清白，保证一定数量的党员、团员；四是免于征集的对象，独生子或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户不予征集。在工作中，县、区建立新兵入伍工作机构，县新兵入伍工作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县武装部长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审查登记股、管理教育护送股、总务股，分管具体工作。新兵入伍的手续，一律由区政府填写入伍登记表，一式三联，一联存村政府，一联送上级审查，一联交接兵部队。

全部工作从12月上旬开始,到年底基本结束,各区、村自认为240名,超过任务20%。各区的新兵289名,经复查退回49名,实际接收240名。其中共产党员34名,青年团员79名,共计113名,占实征新兵总数47.1%。家庭出身为贫农的188名,中农的52名。本人成分农民208名,青年工人12名,青年学生20名。军分区对此很满意。

1951年提出的兵役工作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卫家乡,保卫生产,巩固与扩大人民解放军。”新兵入伍条件,基本同于1950年,对能入伍者作出了明确规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公布,征集补充兵员是按照政务院的命令和《兵役法》的有关部分进行的,这标志着我国志愿兵役制的结束和义务兵役制开始试行。

1955年的征兵工作,正是根据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进行。国家依法征兵,公民依法服兵役,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军事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加强国防力量与加速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兵役法》对应征公民的征集对象、征集政策、政治审查条件、体格检查条件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家公安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于政治审查还作出了十条具体规定。中央还规定:1954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期间内年满18岁、19岁、20岁的男性公民为征集对象;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156项大企业中三级以上技术职工或在高级中学就读的学生予以缓征;为在群众中普遍树立正规征兵制度的观念,各乡、镇要全面分担兵役义务,尽量不留白点村。这年的征兵工作,从1955年12月25日开始,至1956年2月26日结束,前后历时64天。

县建立兵役委员会,县委书记任主任,一名副县长和县兵役局长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和兵役征集站;经过准备、召开民兵代表会议、宣传《兵役法》、应征青年报名、上站体检、政治审查、定兵批兵、发应征入伍通知书、新兵集中等阶段,良乡县胜利完成征集新兵200名的任务,其中炮兵30名,通信兵150名,学员兵20名。新兵的政治条件和身体状况都很好,有共产党员17名,青年团员111名,共占入伍新兵的82%;贫农成分129名,中农69名,工人和城市贫民各1名;甲种体格67名,乙种体格133名。

在全部工作中,贯彻了“全面教育,普遍提高,争取适龄青年全部报名”,在群众中造成了依法服兵役光荣的社会舆论,实现了既要征到好兵,又要团结农民的目的。出现了祖父、母送孙,父母送子,妻送郎参军和兄弟相争入伍的局面,为后来的兵役征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房山县“贫协”始末

罗玉源

房山县的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建立于1965年。当时全国农村经过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将原来较大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规模划小,建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基层组织,纠正了吃大锅饭的作法。在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生产、管理、干部作风、农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高。在这样的形势下,从1964年开始,全国农村普遍地开展了“小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仓库。“小四清”运动还没彻底结束,全国又开展了“大四清”

运动。除了继续开展“小四清”工作外，还要清理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等问题。为了把“四清”搞彻底，各级都抽调大批领导干部，组织“四清”工作队，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采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依靠贫下中农发现解决干部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不少工作队曾错误地认为不把农村原来的领导班子整掉，运动就不算彻底。这样使农村干部情绪很不稳定，与贫下中农的关系一时搞得十分紧张。房山县的贫下中农协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贫协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县委、县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面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为了把农村各项工作搞好，强调农村要贯彻执行“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和团结中农，教育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1965年从县、乡（镇）到大队，都迅速建起了贫下中农协会。

房山县的贫下中农协会由8人组成。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协会主席由县委书记霍梁担任，罗玉源任副主席，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县委农村部副部长张占明、黄启才协助工作；南尚乐公社郑家磨村卞淑兰（女）、岳各庄公社天开村马淑芬（女）担任不脱产、不驻会的副主席；贫协办公室由隗功绵、蔡向阳负责。这样，贫协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全力支持协助下开始了工作。当时，农村大队党支部班子与贫下中农协会的干部矛盾很深，各村向贫协反映问题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来信，有的是来访。村党政干部反映贫下中农不服从党的领导，贫协干部则反映党支部不支持贫协的工作，还反映“四不清”干部翻案，打击报复等等。市、县委对贫协工作坚决支持，高度重视。一次市委有关领导在全县召开的“四清”大会上，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与贫协的矛盾，对农村某些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对贫协给了坚决的支持。如某领导说：“我们贫协是钢鞋、铁鞋，专踢你这“四不清”的干部……”并当场令一些干部退钱退物。这样做好似火上浇油，农村干部与贫协的矛盾更加激化。后经市委领导从正面又作了不少缓解工作。但矛盾仍难于解决，导致县贫协办公室的工作难以开展，后经贫协办公室向县委作了比较详细地汇报，并采取了具体措施。

由佟建和、罗玉源负责，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党校、贫协抽调干部，在县委党校分期分批举办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贫协主席学习班。学习班着重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著作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县委书记霍梁同志亲自讲课，明确提出党支部必须站在前头领导贫下中农，支持贫协工作；贫下中农协会必须服从支部的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把农村工作搞好。通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提高了认识，表示回村一定把工作搞好。为把全县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县委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为了搞好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协会的团结，县委决定组织工作组到三个大队去抓典型：即由罗玉源带队到北市大队，由农村部副部长张占明带队到坨里大队，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马连仲带队到惠南庄大队。经过深入工作，县委分别总结出了坨里大队“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共同搞好丰产丰收的经验；北市大队小麦、玉米间作套种的经验；惠南庄大队养猪生产和林果粮间作的经验。通过试点，取得一些宝贵的经验。县委决定在全县召开由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四级”干部扩大会，会上，北市大队书记李树林、坨里大队书记郭华、惠南庄大队书记杜宝珍介绍了各自的经验。县委书记霍梁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各公社、大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出了全面规划，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并开展生产竞赛，在全县很快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好转。

房山县贫下中农协会，是个历史的产物，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搞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贫协的工作即告停。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五十年代的县直机关生活

宋 湘

1948年12月房山城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从张坊迁入房山城内西街路北旧县衙大院内，从此一驻50年，直到1998年11月18日区府东移迁至良乡。世事沧桑，一片古旧建筑到五、六十年代改建成现代式的平房，八十年代初平房几乎全部拆除，改建成区委、区政府两座大楼。区府东移，物是人非，旧县官审案的大堂经历了百年以上风雨，至今兀自矗立在两座大楼中间，成为房山县人民政府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五十年代我曾任县政府工作，团结祥和的气氛，紧张有序的工作，艰苦朴素的机关工作作风，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县府大院像个大家庭

五十年代初，县政府大院内除县长1人、副县长2人外，设有秘书室、生产办公室、民政科、财政科、实业科(1951年后改为农建科，下辖林业站、水利组、农业技术推广站，1954年后改建为农林局)、文教科(1957年后改建为文教局)、卫生科、人事科、工商科、计划统计科、监察委员会等。每个科室少者仅2人(科长1人，科员1人，如人事科、卫生科、工商科)，多者不过七、八人(如财政科、文教科)；秘书室人员最多，约20来人，包括文印、收发、总务、会计、收音员、信访、传达、食堂炊管人员、县长的警卫员等。属于政府系列的公安局、粮食局、税务局等设在大院以外，非政府系列但设在大院内的单位有法院、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电话站等。1958年以前整个大院内约有近百人。

大院内的干部队伍主要由以下几方面人员构成：(1)抗日战争时期至房山城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区的一批老干部，如县长及各科科长；(2)房山城解放后两期知识分子训练班结业人员；(3)从农村提拔、招收的村干部及有一定文化的青年；(4)房山中学、师范陆续毕业分配的学生；(5)少量由专区及外地调入的人员。这些干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年轻。县长、副县长不过三、四十岁，如县长李明当时三十四、五岁；科长们大多只有二、三十岁，如文教科长杜生聪、工商科长杨景秀、人事科长宿显盛、统计科长夏方伟、法院院长王兴治，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各科室的一般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二十挂零的小青年。

由于年轻人多，所以这批干部的又一特点是大多数尚未结婚。少数已婚的人其家属也多在原籍农村，迁到房山城里住的极少。所以人们很少回家，上班在一起工作、学习，下班后一起搞文体活动，或者聊大天、逛大街，朝气蓬勃，亲密无间，整个大院就像一个大家庭。

工作作风艰苦朴素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生活习惯还较多地保留着战争环境的影响，机关化的作风还远未形成。

人们的衣着都是粗棉布制作，大多是灰、蓝、黑三色。有老八路的灰军装、军帽，有上衣三个口袋的學生服，有上衣四个吊兜的“干部服”，也有上衣对襟缀纽攀的中式服，两肘、两膝、臀部衬着大块补钉的不

在少数。这样一群“杂牌军”走在大街上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干部待遇大多实行“供给制”。县长享受“中灶”待遇(按规定,参加革命15年以上的一般干部也享受“中灶”待遇,但这样的老干部在县一级几乎没有),每月伙食费15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行人民币1元,下同)左右;大多数一般干部都是“大灶”待遇,每月伙食10万元,直接划拨到伙房。除伙食费外,服装费和津贴费一般干部平均在15万元左右。吃饭没有定量,开饭时都到伙房(政府大院前院东侧)围站在一个个砖台四周。一律是大锅熬菜,每人一碗;窝头、小米饭(偶尔是馒头、白米饭)管饱,仍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习惯。到1954年以后陆续改“供给制”为“薪金制”,才取消了“大锅饭”,实行凭饭票买饭菜。主食仍是米、面制品,吃多少买多少,菜分甲菜、乙菜、大菜,价格不等,可自由选择。

每个科室两、三间房,既办公,又住宿。因为大家常住机关,绝少回家,没有轮流值班制度,任何时候都有人在岗。人们几乎没有“星期日休息”的观念和习惯,星期日照常办公、接待群众。“抛家舍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使人们羞于提及“回家”。县直机关广为流传过一个故事:某单位两位已婚小青年星期六想回家看看,从中午就开始出来进去“转磨”,难于向领导启齿,怵到下午快下班时才壮胆向领导请假,一个说“我回家补补袜子,明天早晨一定回来”,一个说“我回家换换衬衣”。久之,成了每次请假的“套话”,领导戏言曰:“别吞吞吐吐的了,你们都走吧,我岁数大了,也不用补袜子也不用换衬衣了!”

办公点上煤油灯

1958年4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在这之前房山城内没有通电。县政府大门口内东侧有一台手摇风笛。每天早晨起床、上班、下班由传达室老职工李中和摇动风笛,声震全城,成为县直机关作息的统一号令。

各科室晚上照明一律是以煤油为燃料的玻璃罩子灯。罩子灯和盛煤油的玻璃瓶是各单位的必要“装备”。每周或每月初到总务室去领取煤油。夏季晚饭后,冬季下午4点左右,各科室不约而同地擦灯罩,成了当时机关“一景”。1955年文印室有了中文打字机,晚上加班打字,煤油罩子灯已不足以照明,特殊装备了一盏台式汽灯。每天晚饭后点汽灯,成了打字员的一项“技能”。

下乡全靠两条腿

五十年代初期,交通极不方便。北京到房山、周口店,房山到张坊,房山到琉璃河几条公路实际是能通胶轮马车的土路,其他都是乡间羊肠小道,山区是沿拒马河、大石河上溯的鹅卵石河滩路。全县只有供销社接收伪政府的两辆以烧木柴为动力的六轮破卡车,每天上午从城内十字路口(俗称“大角”)以东发车去北京市内,这是房山最早的公共汽车。

县政府大院总共只有十几辆破旧的自行车,除县长及警卫员的“专车”外,较大科室可以分配一辆,人少的科室两个单位合用一辆。1954年专区下拨全县几辆日本进口的“僧帽”牌新自行车,县委书记、县长开始骑上新车。

每年开春,县委、县政府召开一次全县三级(县、区、村;1953年夏季撤区划乡后是县、乡、村)干部大会,部署全年农业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秋末再开一次“三干会”,总结全年生产,部署冬季整党整社工作。“三干会”后,抽调各机关干部统一组成中心工作组,下到各村指导工作。干部下乡无论路途远近,基本都是背着铺盖卷步行(人们戏称为“11号汽车”)到村。偶尔有十来人成批同时进山,可雇一辆胶轮大车,沿河滩陆续下车,仍需背着铺盖卷到村。到霞云岭地区下乡,大多沿房山——周口店——黄山店——涑利水一线,

翻越十几里路的青峰岭才能到达。这种步行下乡，特别是步行进山的状况一直坚持到六十年代。一年夏季，法院一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去十渡办案。拒马河涨水无法通行，只能爬山。山路又不熟悉，在深山中迷失了方向。夜幕降临，又冷又饿。二人打着手电筒辨认方位，寻找下山道路。山下群众看到山上可疑亮光，逐级上报到乡，乡干部分析认为“可能是美蒋空投特务利用手电光作联络暗号”，遂召集百余民兵，打着火把搜山，很快将二人“捕获”，押解下山。二人心中有了底，未因当“特务”被抓而感到羞辱，反因此获救而庆幸。到乡里经过一番审查，所携案卷及介绍信证实了二人身份，又经电话与法院联系核实，才消除了一场虚惊。

一台干电池收音机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主要靠各级干部会议层层传达到群众，其次是黑板报、屋顶广播等“原始”的宣传手段。约在1951年，通县专区下发给房山一台五灯干电池收音机(解放后房山第一台“电器设备”)。县政府为此专门在秘书室下设了一个收音室，配备一名专职收音员(先是冯越，1954年后是赵文瑞)。收音员每天要背着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房山县属河北省管辖)对农村广播节目。每月要将收听场次、内容、人数反映上报县委、县政府和专署。到1958年房山通电后，成立了县广播站，有了有线广播。八十年代末，建立了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电视台，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起来。那台干电池收音机堪称开创房山广播电视事业的功臣，冯越、赵文瑞则是房山广播电视事业最早的工作人员。

生龙活虎的文体活动

五十年代政府机关业余文体活动相当活跃。机关工会、团总支是组织者。陆续购置了篮球、排球、乒乓球、单杠、双杠、风琴、手风琴、小提琴、二胡、各种棋类等文体器材。大堂成了乒乓球室，大堂东侧跨院是篮球场，大堂前院是羽毛球场、单杠、双杠及沙坑所在地。还陆续购置了一批书籍，建立了图书阅览室。二十左右岁的一群年轻人下班后绝少回家，大院到处活跃着各种文体活动，一片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景象。

约在1955年，县工会在县政府对过临街建了一座大房子，建起了职工俱乐部，修了一个篮球场。每天晚上都有舞会或球类、棋类比赛，青年人又多了一个业余活动场地。

政府机关“火星篮球队”是县直机关乃至全县有名的一支强队。张中兴、高熙宇、何宏昌、刘泽、杜义、王俊起、祝瑞云、侯正钦、郝志远、张广明等都是篮球队的“健将”，经常与县直其他机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县委机关“红星队”，县粮食局“海鸥队”，县银行“银鹰队”，县供销社队，以及中小学教师组成的“教工队”都是当时实力较强的球队。

1954年春，在房山中学体育场举行全县职工篮球比赛，县直各机关及教工各队参加。按平时友谊赛的成绩，政府“火星队”应是夺标热门球队。县长张拓夫积极组织，以“如能夺得冠军奖励全体队员吃烙饼摊鸡蛋”鼓励队员们。是日，全体队员身穿“火星”队服，由张拓夫县长带队，从县政府整队出发，一路高歌，引来满街路人围观。“火星队”第一个对手是县社队，平时相遇，“火星”胜多负少。然而这次“火星队”突然发挥失常，传球屡屡失误，投篮多数不准，结果竟大比分落败，未能进入第二轮，烙饼摊鸡蛋也没有吃成。

一年夏季，北京体育学院女子篮球队来房山，在职工俱乐部篮球场与房山县直机关、学校、中央市属厂矿男子联队举行了一场表演赛。体院女篮技艺高超，人高马大，体力充沛，场上冲撞拼抢中男联队员不是对手，房山男子联队输得心服口服。

五十年过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上述的这些亲身经历都似乎成为了“笑谈”，

但这些活生生的往事，时刻在提醒着后人：现在的繁荣，是上一代艰苦奋斗的结果；而中国未来的富强，更应继承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在中共良乡县委机关工作的日子

刘振祥

最为留恋怀念的五年

1953年初，我调离良乡中学到良乡县委报到。县委书记姜永刚同志发给我一枚金属硬质刻有“中共良乡县委”的证章。有了这枚证章，在全县范围内办事不用开介绍信，还可以参加或组织召开党的基层会议。这时，来了个紧急任务，良乡县要出1500名民工参加修建官厅水库的会战。没待分配我便投入了组织民工的工作。我原在良中做室内工作，从来未下过乡。组织部的同志便教我打背包。乘火车到琉璃河三区区公所。经研究后我和区公所石树森同志一起到交道小区各村去组织民工，每天步行在小区所属的十多个村庄的土路上。由于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组织民工的工作圆满完成。全县1500名民工在政委王茂发、大队长李明的带领下，开赴官厅水库，奋战三个月圆满完成了任务。每人颁发一张印制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一定要把官厅水库修好”的题词做为纪念品，胜利归来。

1953年6月我从官厅水库回机关后，即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兼管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宣传部先后由县委常委马有勋、姜永刚任部长。宣传部围绕中心作好宣传工作外，日常主要抓干部学习和支部教育、宣传员网等几项工作，每年要召开一两次全县范围的宣传员大会，主要是总结表扬并布置下一步宣传工作任务。县直机关干部每周要上理论课，每天早上上文化课，每隔一段县委领导要作一次形势报告，基层党支部要选一名文化较高的支委任支部教员，负责支部党员的学习。

1954年下半年，根据河北省委和通县地委的指示，良乡县委及时建起了农村工作部，以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具体内容为农、林、水、气(象)、合(合作化)和征兵工作，到1958年房良合并划市建区，我一直在农村工作部工作。这五年多的时间，使我最为留恋怀念。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五十年代的中共良乡县委机关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方面的表现也是特别突出的。县委机关的食堂分大灶、小灶，一般叫大伙房、小伙房(系县委常委少数人用饭)，下乡派饭给啥吃啥，每顿饭半斤粮票二角钱，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那时不论多高贵的客人，多大的领导，如地委书记徐瑞林、专员王宪经常来良乡检查生产、防汛工作，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到岗上吴春山农业社、军留庄李德生农业社调研，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到县委机关看望外交部下放的干部等等，这些客人都是在县委小食堂用饭，由有关领导作陪，食堂会计按实际开支记帐，结算时超支费用，由县委常委按人平均分摊。

五十年代住的也非常简朴。年岁较大带着家属的如张令德、张本荣、姜永刚、罗玉源、解德元等，都是个人在城内租房住，当时没有找机关领导要房一说；有两地分居的家属来机关探亲的，机关同志都热情接待，大家挤在一起住，腾出房来让给来家属的同志暂住；其余年轻的同志多是大房连铺住在一起。我在宣传部曾和刘孝先、王显会、孔祥录同志共同住在县委机关里院北屋的土炕上，老鼠、蛇经常出现在屋的炕洞里。我在农村工作部时又和李贤、李信、张庆贵等同志共同住在县委机关一进门的临街东屋。副部长王树瑞同志虽有个单间，但他偏不去住，硬是和我们几个干事住在一起，觉得非常亲切，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当时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县委常委有辆自行车，一个部门有一辆公用自行车，下乡骑用。时间长的就只好打背包步行。自行车坏了由门卫谷殿山包了下来，负责修理，对此党刊《支部生活》还刊登了他的事迹。开始我在宣传部，由于兼管中苏友协工作，很幸运也配备了一辆自行车。在修崇各庄水库之前我随同县委书记张令德、副书记姜永刚，把自行车放在大苑村供销社。之后往北步行，顺着河沟走到尽头，登上高山察看地形、水的来源和去路，往返几十里，晚上回到大苑村供销社，县社主任尚元基同志在等待我们，这才喘了口气吃上一顿饭。1957年春节，县委书记张令德、县长曹庶民、农村部长罗玉源、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和我们几个干事，到临近房山县惠南庄全国劳模杜宝珍那里去参观学习稻麦间作的经验，这样一个外出考察团，也只是借用全县唯一的县社的大货车。条件虽差但大家情绪很高，杜宝珍同志对良乡的同志热情接待，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当时县委领导也很强调年轻化、知识化。良乡县委在五十年代初，先后从良乡中学和其他单位抽调我们近20名优秀青年到县委机关，充实到县委各部委办及青年团、妇联会。当时在领导的心目中，这些初中生算是小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年青人，干劲足，热情高，学理论，学文化，学业务，学写作，那真是如饥似渴。在那夏日炎炎的日子，写材料照干不误，身穿短裤，肩披湿手巾，脚泡在水盆里，手臂底下还要垫隔湿的硬东西，以免汗水把稿纸润湿了。连续作战一天两夜是经常的。晚上打夜作，白天学理论，学文化，开会照常进行，个个都是精神振奋，毫无怨言。当时省地委的文件指示号召经常是：“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大张旗鼓地开展……”下乡抓生产，抓合作化，抓防洪，抓运动，特别是防洪。有时整天泡在水里，一下乡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平时下乡不论节假日都不能随便回机关，更不能回家。

老同志以身作则

当时书记、部长等一些老同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努力拚搏，给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县委常委、农村部长罗玉源当时经常闹病，每次都是病倒了才下战场。他文化不高，但虚心好学，经常给报社写稿，主动起草短小文章，还虚心向干事们请教。1954年罗玉源同志在黑古台下乡，一个老乡急着对他说：“你还在这儿没事人似的哪，你老婆生孩子很危险，快回去看看吧！”他这才从当地请了位接生的老太太用自行车带回家。1956年他正在参加常委会，儿子被县供销社的大门砸的头破血流，头一次听说他没动身，接着来人又催才感觉问题的严重，这才把儿子急送北京抢救，保住了性命。由于这次事故罗玉源同志卖掉自己带的手表，还了药费，从未向机关申请困难补助。

姜永刚同志从当宣传部长到当县委副书记，他对工作一直敢于叫真，敢于执行纪律。每次大会小会，作形势报告，他都按通知要求办事，凡不请假无故不到会者，不管是谁，就是县直机关的一把手，他也点名提出批评。因此县直机关每逢开大会，各单位领导都是带头参加，这些老同志的革命精神、事业心和工作作风，都深深的教育和影响着我们。

关爱青年干部

在紧张工作刻苦学习的同时，县委领导和机关支部对年轻人的文体活动和恋爱婚姻等问题也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县委副书记姜永刚直接抓文体生活，把文体方面较好的党员干部调进县委机关。机关支部书记张本荣同志也以身作则，建立起县委机关的篮球队、乒乓球队，加强锻炼，使县委机关的球队成了县直机关的强队之一。由机关支部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同志带队，到房山县委机关进行篮球友谊赛，房山县委书记刘永国同志热情接待并同我们一起用饭。骑车往返几十里，情绪很高谁也不累。不久房山县委办公室主任杜生聪同志带队来良乡进行回访，双方进行了篮球赛和乒乓球赛，生动活泼，大家心情非常舒畅。对于年轻人的恋爱婚姻问题，县委领导、机关支部也都非常关心和重视，通过引线搭桥，促成十几对男女喜结良缘。

团结民主气氛浓

当时县委机关民主气氛很浓。从县委书记、部长到干事、交通员、警卫员，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说，之间没有隔阂。工余时间大家在一起打牌、打篮球、乒乓球，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无拘无束，在一起谁是领导很难分辨出来。过年过节，机关食堂吃节余，住在城内家属都来机关，欢聚一堂，谁的家属来了，本部门的同志主动腾房，安排吃住，情真意切，亲如一家。农村部副部长王树瑞同志下乡回机关，把打来的麻雀整好，从农村买来花生油，到伙房亲自动手炸丸子，又用大茶缸子买来白酒，以此为乐。农村部郎宝山、张庆贵、李贤我们的几个干事，和部长一起吃丸子喝白酒，真是痛快。正好曹县长从门前走过，王树瑞同志大声叫：“曹县长：快来尝尝我们的炸丸子，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

1954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一周年，我把写完的讲稿交给了宣传部长马有助，我拿着茶缸，提着暖壶到了会场，台上他讲，台后我一人支应。全县县直机关参加的纪念大会，仅两个人就完成了任务。当时我在台后只注意领导讲的情况，忘了其他，忽然马有助部长回过头来小声说：“振祥，饮饮我呀？”这时我才醒悟忘记了给部长添水了，我忙给他添了水，他停了小小声说：“我嗓子都快冒烟了。”我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自责，但“饮饮我呀？”这个纯朴亲切的话语，不是批评，不是埋怨，更不是盛气凌人，而使我感到民主平等、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宣传部副部长兼理论教员刘孝先老师，孔祥祯、史维义、毛锡恩和我们几个干事，为了弄清楚一个观点、一个词意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直到闹明白为止，但越争论，越明白，越亲切。我们农村部不论是研究工作会还是党的小组生活会，都是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副部长王树瑞同志，噪声高，一开会像吵架一样，整个院里都能听得见。我们对部长罗玉源同志有什么意见都是当面提出，干事与部长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很好。罗玉源同志对大家的意见或批评都能正确对待，有的耐心解释，有的则虚心接受进行自我批评，所有部内同志，心情舒畅，无话不说，亲密无间。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共良乡县机关工作的日子，那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那朝气蓬勃，积极进取，日夜拼搏的革命干劲；那充分发扬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亲如一家、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像电影一幕幕从眼前掠过。这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深切的怀念，使人感到格外的亲切。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五十年代的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张 珍

建立县委农村工作部

五十年代初，房、良两县合并前，中共房山县委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指示，于1950年建立起房山县农业互助合作办公室。其工作重点是在动员和组织刚刚翻身解放的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生产中组织临时互助组和长期互助组。并从1952年开始，负责重点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贯彻“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即党中央制定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线。通过宣传贯彻总路线，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据统计，全县到1953年共建立起长短互助组5930个，入组农户达到全县总农户的90%以上。同时，全县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4个。

为了加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房山县委于1954年4月，撤销县农业互助合作办公室，建立起县委农村工作部。为此，当时县委召开全县党政机关及基层乡以上的干部大会。宣布撤区(即全县原设置的六个行政区)建乡及县直各部门组成的干部名单。县委农村工作部的组成人员是：四位部长六名干事。部长吕镒(县委常委)，副部长是袁德印、郭宴、隗合龙。干事是白璧、康继周、梅廷章、王庆宽、孟宪周、张珍。

县委建立农村工作部，就是要把这个新设机构，作为县委进一步抓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参谋部和助手，迎接和领导农业合作化高潮。新建的县委农村工作部，全体干部热情高涨。决心不负县委重望，团结一致，日以继夜的工作。特别是部长吕镒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一班人，处处带头，蹲点跑面，深入农村和群众，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及时向县委反馈重大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县委部署的各阶段的工作任务。

在这段工作中，部长吕镒同志严格的组织观念，雷厉风行的作风，严明的群众纪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吕镒同志对县委常委决定的任务，抓落实抓得特别紧。常常县委开完会，回到部里就开会传达，安排落实措施。经常是立即步行或骑自行车到点上去开会。下乡吃派饭，不管跟着几个干事或其他部门的干部，他总是抢先为大家交饭费。他在群众中秋毫无犯的纪律作风，成了农村工作部全体干部的榜样。

农村工作部在实际工作中，围绕县委的安排有点有面，点面结合，不打乱仗。根据房山县的面积大、有山区、有平原的特点，把山区的西关上、四马台，平原的半壁店、北正、五侯、北市、沿村、双柳树、西安庄等十几个先进农业合作社，作为重点，经常去蹲点搞调研，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县委提供决策依据。1954年秋季，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3年底的130个，发展到556个，入社农户达到13401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41%，全县70个小乡，达到了乡乡有社。房山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在了河北省通县专区十几个县的前列。

不分昼夜工作的三个月

农村工作部最紧张的工作时期，是1955年的10月至12月。我们后来称这三个月是“不分昼夜工作的三个月”。在1955年春夏期间，社会上刮起一股退社风，说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可以让不十分自愿入社的先退出去。结果，不足半年的时间，全县有33个合作社解散，有1345户退社。到了1955年的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批判“小脚女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所谓“开口子”让农民退社的右倾思想，批判有些党委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象个小脚女人，不敢大胆领导群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重新审定和划分农村阶级；根据土改后农民生产收入和雇工情况，重新划分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和新老上中农；对雇工多、剥削量大的，划为新富农。同时，入党没有入社的共产党员，均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各级党委检查右倾表现，查出不该解散而解散了初级社。

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通县地委要求各县委连夜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检查各自的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并作出全面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规划。每天县委要向通县地委汇报两次，中间还不断地向各乡通知新精神。面对上述庞杂的工作任务，责成农村工作部具体负责，向上及时汇报，向下从县直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乡、村进行具体工作。为了完成任务，农村工作部全体干部，既要汇总各乡、各村情况，又要根据县委领导意图提出全县的发展计划。由于当时县委领导思想赶不上上级的要求，划分阶级时，不是新下中农少了，就是贫农多了，不是新富农少了，就是老下中农多了。计划发展入社的农户比例，今天计划发展到45%，明天上边通知外省市已发展到50%，我们就得连夜修改计划，不能落在其他省市的后边。有时县委书记从地委开紧急会议回来；一传达精神，我们计划发展到55%的农户入社，仍是保守的，还得连夜重新规划。每一次修改发展计划，或汇总划分阶级成份情况，农村工作部的全体干部都要通宵达旦的连续工作，赶到第二天向县委汇报，讨论通过后向地委汇报。有时农村工作部提出的计划县委讨论不同意，部里还要按县委要求，重新研究再次计划。就这样天天熬夜，天天反复做规划，天天连夜汇总下边各乡活动情况。这样紧张繁忙的工作，没人叫苦，没人喊累，情绪都特别高涨，认为这是真正的干革命，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这样，从1955年10月，一直干到12月底，这三个月的整风整社运动，使全县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全县入社农户从1万多户猛增到20277户，占全县总农户的61%，初级社由原来的500多个发展到665个。全县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试办高级社

1955年底，在全县初级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党中央又发出了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所谓高级社，就是取消初级社的土地入股分红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由于整风整社运动的推动，从1956年1月，全县从山区到平原，普遍掀起初级社转高级社、小社合并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到了月底，全县原来的60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了87个大社，有的一村一社，有的组成联村社，并同时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到全县农户总数的99.75%，全县仅有85户单干户。当时，整村整乡都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各乡党委(党总支)及有些大村党支部，敲锣打鼓的庆祝高级合作化的伟大胜利，并成群结队的高举标语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锣鼓喧天地向县委报喜。

但是，到了1957年的春夏之交，在农村掀起一股拉大车、闹退社的风波。县委农村工作部在七贤村搞试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退社风。部里的试点，开始由副部长隗合龙同志带队蹲点。当时这村有两个

退社户，带头闹、带头吵，硬是把已经折价入社的骡子、大车拉回家。村党支部和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工作组，多次说服教育也无效。后来农村工作部又派去一位副部长袁德印同志，加强工作组的力量，到退社户的家去说服教育，宣传党的合作化政策和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退社户仍然坚持要求退社。最后，部长吕镒同志主动到七贤村蹲点，同两位副部长一起做退社户的工作。就在这双方坚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下达了新的指示精神，指出：可以用依靠贫下中农和群众与退社户进行大辩论的方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击退右倾势力的进攻。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协助党支部，组织以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为骨干，向退社户展开说理批判，揭露退社户诬蔑党的合作化政策，辱骂工作组、党支部的言论，从而有力地打击了退社风的嚣张气焰，保护了高级社的公共财产。农村工作部还把工作组和七贤村党支部用大鸣大放辩论的方法，击退了攻击党的政策、拆散集体经济的社会上的右倾歪风，在全县进行了推广。这种大鸣大放辩论的方法，持续到1958年，并成为后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奏。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我所经历的一段山区生活

魏志华

走进深山

1953年初，房山全县开展贯彻婚姻法工作，县里组织几个贯彻婚姻法宣传队。我和县政府的徐庆云等6位同志做为宣传队员被分到房山六区。当时的六区，包括现在的霞云岭、蒲洼两个乡共23个村，是革命老区，也是深山区。因刚过春节天气还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衣，带着棉被，还带着10多斤的干电池收音机。出发那天，我们坐着雇来的一辆马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一天，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赶到贾峪口村。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吃完早饭又继续西行，下午赶到六区区政府所在地霞云岭村。按照区委的决定，我们县里去的几个人，到六区西片的龙门台、堂上、宝水、东村、蒲洼、芦子水、鱼斗泉等房山西部最远的几个村工作，在每个村住一、二天。每到一个村便分别召开干部会、党员会、群众座谈会，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结合村里的实际，宣传婚姻法的主要内容，宣传好人好事。批评违反婚姻法的封建落后的错误倾向，并用收音机组织群众收听婚姻法节目，使群众深受启发和教育。那次下乡，我们在六区呆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和群众的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仍记忆犹新。

当时，山区人民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六区是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有的参军、有的长期外出搞支前，抬担架，送公粮。我们去的时候，各村烈军属、残废军人、干部家属占绝大部分户，男性青壮年很少。提起这些他们丝毫没有怨言。解放后，他们对下乡干部也跟对八路军那样，特别热情、实在，把自己好吃的招待下乡干部。他们对党的各项政策积极拥护，开会和宣传党的号召也特别积极。

山区昔日六大难

第一难，交通不便是当时山区的最大困难。各村之间连一条像样的土路也没有。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有事，出门就爬山。群众干活每天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山路。有的地方特别陡。群众习惯了，我们初次进山困难就大了。我们从堂上到宝水村要爬过五、六里的山，爬到半山腰就没了路，只有放羊的小道，只好双手揪着荆条往上爬，二个多小时才到山顶。山区除个别干部到房山开过会，绝大部分群众没出过山，没看见过自行车、马车，更不用说汽车啦！交通不便也使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干鲜水果、花椒运不出去，几个村有煤窑只供本地用，煤卖不出去，价格很便宜。堂上村的煤二升玉米一个驴驮、三升玉米一骡驮，三斗玉米保一个火长年用煤（一升玉米约1斤半，十升为一斗）。通讯也十分落后，全区只区里有一部老式的摇把电话，声音很小，只能通到房山，刮风下雨就坏。送文件、送信、送报纸完全靠人送，几天去一次。斯大林从生病到逝世几天的报纸是一天送到的。区里召开各村的干部会议要提前几天通知。村里开会，由于居住分散也要提前一、二天通知。三月中旬，工作结束后我们回县时是从山路回来的。我们天亮就从霞云岭动身，从南沟爬山到三流水吃早饭，然后爬青峰岭。中午一点多钟才到山顶，又累、又渴、又饿，虽然当时天气还冷，但我爬山爬得全身是汗。幸好山上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听说我们是县里的下乡干部，对我们特热情，给我们烧了好多开水。我们喝足了水，休息一会又继续赶路。从霞云岭到青峰岭完全是往上爬，山顶海拔1200多公尺。从青峰岭往下到涑沥水村完全是下山，有些地方很陡、很危险，只能一步一步往下蹭。我们真正尝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的滋味了。从山顶到山下只十几里路，我们走了两、三个小时，到山下耳朵也震聋了。到黄山店村时太阳快要落山，天黑才到房山。从霞云岭到房山只七、八十里路，我们整整走了一天，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脚也起泡了。去六区这一个多月是我一生走路最多的一个月，生活最艰苦的一个月，但那时没有丝毫怨言。想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想到当时县里的领导比我们钱不多挣（当时是供给制，每人每月130斤小米，折合14元），和我们一样背着背包下乡，自己就什么都不想，只想把工作做好。

第二难，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经济单一，主要是农业，每人平均不到一亩山坡地，没有水源，完全靠天吃饭，粮食亩产六、七十斤，人均收入二、三十元。风调雨顺还过得去，遇到灾年就难以维持，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每年都要储备大量野菜、树叶，如桃叶、杏叶、榆叶、花椒叶等。雨水多的年头就在山坡上多种些土豆、窝瓜、蔓菁菜。吃的完全是自产的粗粮，过节过年也吃不上大米、白面，吃玉米渣、玉米面从来不去皮。比较富裕的户，春节杀头猪、宰只羊，几户分分，腌点腊肉，这就是全年过节待客的最好食品。平常吃不上肉，吃油也完全是自己熬的花椒籽油、核桃油。自己养只鸡，鸡蛋很少自己吃，留着用它去换火柴、煤油、盐等日用品。吃菜更困难，除雨水勤自己种些瓜菜外，一年四季都吃不上蔬菜，光吃腌咸菜、酸菜，不少户连白菜也没吃过。

群众穿的衣服又旧又破，几年不一定换一件新粗布衣。做一件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了又补。冬季是棉衣，夏季拿出棉花是单衣。一件较整齐的衣服，平时不能穿，谁出门谁穿。每户只有两、三条破被，几个人盖一个。没有煤窑的村冬季不少户也不生火，就靠砍柴烧火做饭，顺便烧炕取暖。秋季群众普遍都割黄蒿拧火绳用于点火做饭、抽烟，既省火柴又熏蚊子。群众家屋里的家具很简单，除去吃饭用的东西外，一般的只有一、二个盛粮食或衣服用的大缸或柜子，有的户连柜子也没有。

第三难，水贵如油。缺水是山区的普遍现象。一般的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去背水、驮水，特别是每年的春夏之交，雨季到来之前，缺水更为严重，群众对水特别珍惜，一点也不能浪费。一家几口人用一盆水洗脸，然后再洗衣服、和煤。有些人几天洗一次脸。群众除了夏季外，一年也不洗澡。宝水村村边有个泉，但水很少，群众要经常排队弄水。因此，我们到那里下乡也不敢浪费一点水，每天几个人用一盆水简单洗洗脸，

有时还要帮助群众去背水。当时房山没电，山里煤油也较紧张，所以晚上有事开会就点小煤油灯，没事干脆不点灯，天黑就睡觉。

第四难，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过去没有学校，成年人、老年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解放后各村虽然建立了学校，但人很少，一般的一个村一、二个教师，二、三十个学生，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复式班。生活困难的户或离村远的户的孩子都不能上学。村里的文化生活更为贫乏，除一、二个大村有剧团，每年春节唱几天戏，平常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甭说电视、收音机，就连矿石耳机也没有，更看不上电影。我们带去的收音机很受欢迎，走到那里好多群众就围着看、围着听，觉得特别新鲜。

第五难，缺医少药。全区 23 个村，从东到西 150 多华里，只霞云岭有一个卫生院，三、四个大夫。庄户台、堂上、大草岭村有几个较好的私人中医，其他村连个医生也没有。群众有病一是“抗”，一是吃偏方，实在不行才去找医生。有的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把病耽误了。

第六难，物资交流难。当时小村没有供销社的代销店，只是大村才有，货样很少，只是生活必需品，连纸烟都没有。代销店的东西都是从山外用人背、牲口驮来的。我们工作组有个同志把带去的烟抽完，再也买不到，憋的没办法，只好向群众找烟梗子抽。

如今山区变新颜

40 多年过去了，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山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空前的变化。他们不单是经营农业、林业，而且办起了不少企事业。首先是山区公路的发展极为显著。过去山区没有车道，没见过马车，现在 108 国道和房蒲路从东到西从两个乡穿过。百分之八十的村有了柏油路，其他村也通了汽车。过去从房山到霞云岭、到蒲洼要走两天，现在坐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对山区经济的发展和方便群众的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区的煤炭、石料、干鲜果品可以随时运出去，群众需要的东西可以及时运进来。商业网点遍布各乡、各村。霞云岭、蒲洼两个乡，1999 年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有 90 多个，三级企业利润 47003 元(包括个体)人均收入由 1952 年的 20 多元，霞云岭乡达到 2900 元、蒲洼乡达到 2600 元。

吃水难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乡、村都搞了不少水利工程。修水库、建塘坝、搞截流，并建了 2400 多个小水窖，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而且还可以浇一部分农田、果树。

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两个乡都建立了寄宿制中学。各村小学也扩大了几倍，在校小学生 7532 人，中学生 1827 人，教职工 277 人，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各乡、村都有了程控电话，共安装电话 2200 多部。

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变化。两个乡都建起了医院，各村都有了合作医疗或诊所，群众有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群众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不少户都盖了新房。还有些人到房山、良乡买了楼房。去年霞云岭乡四马台村在海拔 2030 米的百草畔山顶建起了度假村。蒲洼乡蒲洼村建起了一个住宿、餐饮、娱乐多功能的天龙山庄，不仅有歌舞厅、台球、健身房，还有保龄球、室内游泳池、狩猎场，大搞旅游观光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的富民政策，山区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群众说：“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变成了现实。”

真是山区今昔两重天啊!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下放劳动时的生活片断

张 珍

清队整党

1968年8月，房山县的县直机关干部，除留下少数人支撑机关日常工作外，共三、四百人集中在岳各庄乡西周各庄村西的北京市第二精神病院，借用该院的房屋、会议室、伙房，举办县直机关干部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完成文革运动规定的斗批改任务。到1969年5月，学习班的斗批改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对运动中揭露、清理出的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包括所谓走资派（即原县委、县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有海外关系的干部，还有被县委准备提拔重用的青年干部，即所谓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都被列为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对象。我当时是旧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干事，是县委准备提拔重用的对象，被编在一个下放劳动小组。

我们的下放劳动小组共6个人，我和蒲怀瑛任组长。蒲怀瑛是旧县委办公室的干部，也是准备提拔的所谓“黑苗子”。组员有教育局的青年女干部陈培媛、团县委女青年干部曲振香、县干校青年教师赵树华和公安局青年干部蒋世良。我们被下放到太紫草坞公社（今闫村镇）南梨园村参加劳动。

接受再教育

下放劳动小组的中心任务，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我们6个人到村以后，参加劳动特别积极。因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身强力壮，又都胸怀落实毛主席指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强烈愿望，所以都坚持天天出勤，积极跟社员群众一起下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村里的群众对我们特别热情，不让我们干重活，但我们都抢着干。我们小组内有两个刚出学校门就进机关的小青年，对干农活不熟练，社员们就手把手地教给怎样割小麦，怎么锄地。我们当中有干活速度慢的，社员们就主动上前帮助。赵树华身强体壮，农村出身，农活熟练，经常同社员一起比着干，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称赞。

按县里规定，我们下放劳动干部必须到农民家吃“派饭”。我们感到这个规定正好为我们深入群众创造了条件，所以自觉坚持吃派饭。南梨园村共有300多户人家，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6个人就把全村吃了一遍。后来有的生产队派饭还达到两、三遍。为了减少各家为准备派饭而耽误劳动时间，我们下放劳动小组经上级同意，又先后到村小学校、南梨园中学和535库等单位去吃饭。通过吃派饭，使我们了解了各家各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加深了我们与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为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搞好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农村“三夏”、“三秋”大忙期间，我们不仅每天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劳动，还要在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同农民一起下地抢收小麦，直到中午烈日当头，还要坚持田间劳动。当我们看到广大农民挥汗如雨，顶烈日、冒酷暑的情景时，就不禁想起中华民族人人喜爱的那首《悯农》的古诗，深感农民劳动的辛苦，深感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来之不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在搞农业生产方面，我们还学到了不少农田基本常识。如“春争日，夏争时”，“春差一，秋差十”、“人勤地不懒”……这些带哲理性的谚语，说明农业生产带

有强烈的时间性。农民们都掌握播种季节，何时播种何时收秋，决不拖延一天。因此，我们下放劳动小组的6个人，经常自觉的和农民一起起早、卖晌、打夜战，夏天抢收抢种，秋天抢种小麦，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备战备荒

1969年冬，我们小组还和农民一起参加了一项特殊劳动，即为了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从10月开始，在南梨园的东西大街上破土挖地道。方法是先挖旱井，挖出一个五、六米深的干井筒后，在井底再向两边扩展挖隧道。隧道高两米左右，宽1.5米至2.5米不等。我们和农民一起编成劳动小组，每个小组每天都有进度要求。小组内分工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推运、有的在地面出口处用轱辘往地面上提。我们整干了冬三月，挖出了南梨园村的一条地下大街。

回味无穷

按照公社党委的要求，我们在劳动之余，还主动参加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召集的会议、学习活动。帮助队长组织群众开会，辅导群众政治学习，还经常同村干部一起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由于我们小组既积极参加劳动，又积极协助基层工作，多次受到大紫草坞公社党委的表扬，年底还被县委评为出席北京市的先进下放干部小组，1970年4月，参加了北京市召开的下放干部表彰大会。5月份以后，我们小组的6位同志，陆续被革委会安排了工作。至此，这段下放劳动的生活宣告结束。这段生活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今天回忆起来，仍回味无穷。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强志国火烧敌岗楼

张成基 安庆谭

1939年至1942年间，北峪地区有宛平五区的一个武装干部，名叫强志国。他是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部下的一个干部。1938年10月份，从冀东撤回平西并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到了宛平五区做武装工作。因为五区公所在王平口、北峪等村，也经常被敌人进攻。他和区抗联干部李万会等分成一组，环境残酷时，就转移到六区的北峪沟去躲避。活动累了也来北峪休息和学习。来到这里看到北峪地区地理位置好，对抗日的决心较大，全村老百姓的素质较高，是他们以游击方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所以强志国不断地以这里为基地进行打击敌人的活动。

1941年的秋季，强志国带五区武工队来北峪休整。因为枪支不足，急需解决。

这时在北峪村民兵干部中有知情人提供，王佐乡大乡长王凤来能解决。但抓他很困难，最好能从晓幼营村的家把他小儿子捉来当人质，找代表与其谈判，条件是叫他用枪来换人，他不敢不给。强志国立即从北峪村民兵中选了五个骨干，来到了晓幼营村王凤来家。王家没有防备。强志国等对王的家人说：“我们要把小

孩儿带走，不打不骂，但有事要王凤来办，你们可派代表到北峪村的岭西去找我们，答应我们的条件，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放小孩儿回来(当时小孩儿十二岁)。”

小孩被带到北峪后，为防止日伪军来抢孩子，民兵全都动员起来了。王凤来的谈判代表来了，当时特别害怕，也不知叫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我方代表向他们提出：要给解决十五支步枪，十二支手枪。对方代表认为没有办法解决，要求提别的条件。我们态度很明确，这次不需要解决别的问题，就是枪支。谈判时间很久，最后没办法，他们提出是否可以少要一些，以便能办。后谈到十五支三八大盖枪，一千发子弹，十二支手枪(一箱，包括二把驳壳枪)五百发子弹。表明这是我们最大诚意，不能再变了。对方代表一再求饶，叫再减少点。我方代表态度坚决，不能再谈了，最后才答应下来。我们表示枪支子弹送来，孩子立即放回。

三天后，他们送来了枪支弹药，让他们把孩子领了回去。十五支大枪和子弹装备了我武工队，十二支手枪送到了县武装部。

事情发生后，对敌人震动很大。王凤来也很快把家搬到长辛店。武工队的这一行动，也给别的伪军官们敲了警钟。他们了解到老强带来抓人质的民兵是北峪的人，一切事情的处理都在北峪村，该村已成了八路军的基地，是坚决的抗日村，要设法进行报复。

1941年冬季，河北沟和岭东沟部分游击区的老百姓为了谋生度荒，到门头沟背煤挣钱的很多。人们都反映，天桥日伪岗楼的敌人，对来往背煤的人很残暴，盘查到没有良民证的人，就用皮带抽打，拳打脚踢，有些钱物还被抢走。对从窑上回来的人，更是刁难，非打即骂。特别是二、三个月挣点钱，千方百计得让他们找茬要走，有的分文不给剩。强志国听到这个情况，感到既可气，又可恨。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经过暗地观察岗楼的地形，决定攻打敌岗楼。

强志国马上回到北峪村，调来五区武工队，研究具体打法。大家一致认为，要避免我方的伤亡，以手榴弹攻为主，步枪打为辅，再用几个拉火地雷把伪军轰跑。主要目的是烧掉岗楼，背回岗楼里一千多斤粮食和其他物资。打法定后，立即做了分工，从北峪村召集了六十个民兵，四十人负责背粮食和物资，二十人配合武工队作战，由中队长王朝武带队。然后把民兵召集起来商定将四个地雷埋在岗楼后墙根，以达到轰跑敌人为目的。经一天时间的充分准备，第二天夜晚，大家进入阵地，先将岗楼包围，武工队的步枪、手榴弹主攻岗楼的两侧，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伪军们没有准备，弄的措手不及，对突如其来枪炮声，无法应付。在混乱中，民兵将准备好的地雷推到岗楼的后墙根，先后拉响了四个地雷。震的伪军晕头转向，朝东南的一条路狼狈逃窜。战斗结束后，我们捉住两个受伤伪军。

随后，民兵们冲进岗楼，将岗楼里的大米、猪肉、蔬菜以及三十多个手榴弹、一百多发子弹和二十多双胶鞋运了出来，最后一把火将敌岗楼烧掉。这次战斗，我军无一伤亡，胜利而归。

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强志国鼓励大家：这次战斗打得很漂亮，武工队和民兵配合的很好，今后我们还要继续配合作战，夺取更大的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激战平汉线

贲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军陆续从关外、朝鲜和本土调集了大量的部队，由榆关、大沽、古北口等处向平津集中，不断加大对29军的压力。7月28日，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殉国，由南苑向北平撤退的132师伤亡惨重，宋哲元遂于7月28日晚偕同37师师长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由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所部由国民政府改编为第1集团军，在沧县、青县一带构筑二线工事阻敌南下。

南苑战斗之后，日军十分猖狂。由占领沙河的日军酒井镐次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攻击西苑第37师师部，占领北苑和清河的铃木重康的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向北苑29军独立第39旅猛攻，致使该旅瓦解。由川岸师团、河边旅团占领卢沟桥并向西南方向平汉线北段攻击，以力图迅速打通追击中国军队的通道。地处这一地区的良乡、窦店、琉璃河迅速成为了敌我双方的争夺焦点。

为有效抵抗日军的南侵，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7月29日由保定、高碑店进抵琉璃河构筑工事，其前锋第27师79旅一部前进至长辛店掩护第29军余部撤退。

26路军原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的一个部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刘志丹、刘伯坚等都担任过该部的政治工作干部，使这只军队有着较深的革命基础，因而这支部队曾有一批指战员如赵博生、董振堂、黄镇、孙毅、边章五、孟庆山等，先后成为中共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由于这支部队是第一次走出内战的阴影，开赴抗日前线，所以士气十分高昂。许多指战员都向自己的亲人和上级领导写信，表示了自己要向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如毕业于淮阳师范79旅旅长黄樵松，个子不高却有儒将风度。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挥师北上赶倭寇，壮士一去不复还”。他向上级指挥部表决心写道：“他不死，我便亡，决殊死之战的最后关头便在今日！”（黄于解放前夕牺牲于南京，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在完成对29军掩护和收容任务以后，根据集团军（此时26路军已配属第2集团军）战斗部署，以79旅黄樵松占领琉璃河，以80旅阎廷俊占领周口店，以30师张金照部和31师池峰城部向左翼房山至坨里布防，对南进日军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26路军的右翼则由东北军53军沿固安、码头一线布防。

8月1日，沿平汉线南侵的日军完成了对中国军队作战部署，企图乘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以步兵、火炮、坦克、飞机向窦店和琉璃河的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军自恃中国军队无现代化武器，比进攻南苑的29军132师时还显凶恶。先是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上掠顶而过，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然后用坦克向我军阵地横冲直撞，坦克后边是步骑的纵深配备向我军阵地发起波浪式进攻。

为了挡住日军的进攻，旅长黄樵松亲临一线指挥。针对敌人的凶猛进攻，他命令一线部队以排为单位构成以轻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为相互支撑的火力网，给敌步骑兵以大量杀伤；组织排子枪和机枪对空扫射，使敌机不敢低飞；还让部队利用八月初平原地带的青纱帐，埋伏狙击手用迫击炮和手榴弹阻滞敌坦克的进攻。由于部队沿袭了西北军的老作风，大多战斗员都配有大刀，对冲入我军阵地的敌人用大刀砍杀，使敌军的优势受到有力的遏制和打击。除了丢下被击毁的坦克和飞机以外不能前进半步。

为了有效的打击敌人，师长冯安邦在我军士气高涨之时，组织一些登峰队（临时作战小分队）深入敌后，

配合正面部队利用敌夜间休息时候组织反击，以至于8月5日一度将日军赶至良乡以北，因良乡城内驻有敌军，完成任务后我军又主动撤回阵地。受到打击的日军河边旅团无法寻求突破，不得不向大本营请求增援。

正当平汉线我守军面临更大压力时，平北战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受蒋介石急令，驻平地泉的国民党嫡系第13军汤恩伯部突然出现在居庸关、南口一线，使日军的背后受到威胁，日酋香月清司不得不将精锐的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调向北面，向汤军发动攻势，由于汤军顽强抵抗，南口一线战事战斗日趋激烈，使平汉线我军的压力有所减轻，部队则抓紧时间修筑工事，补充弹药。

8月中旬，南口的汤恩伯见战事日见吃紧，援兵却迟迟不能到达，恐难以支持，于是向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号。蒋介石一方面命令中国军队的主力之一——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由房山、门头沟的西部山地向南口增援，另一方面令孙连仲的第26路军向日军发起进攻以缓解汤军压力。孙连仲遂令第27师冯安邦部实施向日军主动出击的命令。经冯安邦师长与黄樵松旅长商议，决定向日军盘踞的良乡城发动攻击，以造成较大的影响。

8月12日深夜，79旅侯象麟团长率157团（缺一营）和两个登峰队秘密靠近良乡城，刘冠三带157团一部首先突入城内，接着，时尚彬队从良乡东南角登城进入城内，敌发现后仓皇应战，我军以大刀、手榴弹、手枪与敌展开肉搏和巷战，手刃敌寇百余名，由于日军在城内驻有重兵，突入部队伤亡较大，终因寡不敌众仅刘冠三等九人负轻伤退出城外，其余全部牺牲在城内。

城内敌军不甘吃亏，为实施报复，利用我军与之巷战的时机派一队骑兵由北门冲出，利用青纱帐作掩护，绕到我攻城部队的左后方，企图将我攻城部队消灭于良乡城下，恰与我掩护攻城的第3营展开激战。侯象麟为了给敌更大杀伤，以一部吸引敌人向窠店退却，另一部以青纱帐的掩护向交道镇方向退却，敌人倾巢追向窠店，被窠店守军王书忱营顶住，侯团及两个登峰队及时在敌后方猛冲反扑，给敌以重创。敌不支溃退良乡城，我军夺得大炮一门、战车一辆，终取得良乡城攻击战的胜利。

良乡攻击战之后，日军逐步加强了平汉线的军力。敌酋土肥原亲自指挥日军20师团、14师团对我军阵地作不定型的间歇性攻击。为实现突破我军防线，从而对14集团军的右翼形成威胁之目标，日军首先对26路军左翼第31师及30师阵地攻击。这两支部队都是由中共党员吉鸿昌创建的，有着较强的战斗力。面对着强大的日军，他们凭险固守，毫无畏惧。在战斗中，官兵们前赴后继，爬上敌战车用手榴弹投入敌战车的孔穴，用枪塞入坦克履带阻止其前进。在坨里、南观村、八十亩地的恶战中，31师池峰城部伤亡近千人，其聂子彬旅几伤亡殆尽，即奉命撤至涿州整补。30师张金照部及独立第44旅立即将遗缺补齐，官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飞机扫射，不断发动逆袭与敌进行白刃肉搏。房山当地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向火线送水送饭，救护伤员。有的干脆拾起战死官兵的枪支参加战斗，表现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爱国精神。终使敌军妄图突破我军防线将我军分割包围的企图未能实现，敌我双方沿大石河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日军既对大石河防线无法突破，又转向琉璃河我军阵地进行攻击，但在79旅的抵抗下，也未能得逞。

8月24日，日军在南口战线突破中国守军的横岭地段，进入长城以外的怀来，从北面察哈尔南进的日军也进入张家口西侧。三面受敌的南口守军于27日奉命向涞源和易县方向突围。9月4日，失去增援目标的第14集团军开始渐次向西转移。同日，日军完成了《华北方面军会战指导方略》的制定，该方略规定：华北日军下一步将以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向。

9月上旬，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对平汉线的中国守军进行攻击。由于日军完成兵力部署需要有一定时间，平汉线战场一度相对较为平静。

9月11日，日军司令官下达了攻击命令，敌第20师团在得到第6、第14师团的增援下对26路军左翼发动了立体式的凶猛进攻。由于已完成了对北面第14集团军撤退掩护任务，至9月15日，房山县城以北的我军阵地被全面放弃。

9月12日,日军对平汉线上的窦店进行了猛烈攻击,守军王书忱部伤亡很大,营长王书忱擅自撤退,窦店被攻占。接着,日军乘势向琉璃河主阵地进攻,在中国将士顽强抵抗下,日军的攻势被遏制。15日,日军由固安突破友军防线,并迅速向我守军侧后的高碑店方向迂回。另一支日军(第5师团)已由蔚县进入涞源,企图于易县切断我军的退路,我军有被包围之危险,于17日晚上放弃琉璃河阵地,向易县撤退。不久这支部队又在山西娘子关、山东台儿庄与日军进行了新的战斗。

自1937年7月末至9月17日,平汉线的中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抵抗了装备精良的日军达五十天之久,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系区政协三、四届常委,原燕化集团公司集体企业管理部干部

突袭伪据点

苏维亮 苏维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房山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并设立了許多据点。从房山县城往西南方向的就有周口店、半壁店、塔照、北白岱、张坊等。并从房山至张坊挖了一道深3米宽10米的封锁壕,每天除日、伪军正常巡逻外还从附近各村抽调一定数量的青壮年给他们站岗放哨。遇有情况及时向日、伪军报告,妄图封锁解放区,困死我解放区军民。我军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扩大解放区,向敌占区征粮,往解放区运送物资,决定拔掉这颗“钉子”。1944年6月20日我驻房山十渡村(当时房山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军分区四十四团接到侦察员苏温、蔡文春关于驻北白岱敌据点人员、武器、弹药等情况的报告:该小队是属伪房山三十三团住塔照连部领导,连长是张德祥,共有二、三十人。小队长杨春启是汉奸张德祥的表弟,该人是头上长疮,脚后跟流脓——坏透了。他们经常抢男霸女、仗着日本势力欺压当地老百姓。伪军武班长有个十四、五岁的小舅子是个“独眼冲”,他狗仗人势,经常欺压百姓。当时全村共有三眼水井,两口井在村外,村中只有一眼二十多米深的水井供全村二百多人畜饮用。因担水人多需要排队,这个伪军的小舅子经常拎着一根棍子看着这口水井不让老百姓打水,谁要打水就揍谁,老百姓早就恨透了他们。

1944年6月22日,我军分区四十四团由团长王茂全、参谋长刘光第率领四个排的兵力从十渡出发,翻过大峪岭来到离伪据点附近的大峪沟村待命。这时又接到侦察员报告:原定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拿下此据点,但因伪军内应没有归队,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团长王茂全和参谋长刘光第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拔掉这颗“钉子”。深夜,我军战士在侦察员的带领下,神不知鬼不晓地越过封锁壕来到据点附近。我方关系户苏广福、蔡春旺等在周围的麦地里隐蔽起来。第二天拂晓,据点里吹起集合号上早操。这时,我方两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一个人挑着一担水,一个人背一个背筐,手中拿着一张纸,向据点门口走去。站岗的伪军见了也没阻拦。那背筐的对伪军说:“老总,我们有情况要向杨队长报告”。正说着,那担水人突然把扁担一放,

弯腰指地说：“嘿！有条大长虫！”两伪军忙问，“在哪儿？”说时迟那时快，我方人员迅速掏出手枪对准他俩的后腰，低声喝道：“不许动！我们是八路军，！举起手来！”顺手夺过他俩的枪支。

这时隐蔽在周围的我军战士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一拥而上，冲开了据点的大门，分两路一路直扑小队部。我侦察员蔡文春一脚踢开了队部的屋门，小队长的警卫见势不妙，妄想拿枪抵抗，被我战士当场击毙。小队长被枪声惊醒，慌忙从枕头底下拿枪，这时被我冲进屋的战士一枪结束了性命。操场上的伪军正在出操，他们的枪支都集中在操场中间，攒在一起。正喊着“一、二、三、四”的时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军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一百多条枪对准了他们。我军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交枪不杀！”这时有个伪军忙跑向操场妄想拿枪抵抗，我军战士手急眼快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其他伪军见势不妙纷纷举手投降。这时，炮楼被我团长王茂全用席子点着，站岗的伪军在慌乱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跳楼逃命摔断了腿。不到一个钟头战斗结束，共击毙伪军四人，重伤二人，俘敌十三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手枪一支，步枪二十四支，手榴弹五十一枚，子弹七百五十发，棉大衣二十一件，还有一些军用物资，我军无一伤亡。

战斗结束后，太阳出来了，战士们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越过封锁壕，浩浩荡荡回到了根据地。

这时驻塔照伪军连部知道这个消息后，又急又气。张德祥带领多名伪军急忙赶到现场。这时我军早已撤出阵地，把所有俘虏及战利品全部带走，只给他们留下几具伪军尸体，他们非常丧气，扬言要把北白岱村民全部杀掉！吓得老百姓纷纷逃走。他们只得强征了村民的几口棺材，埋葬了伪军尸体。事后抓走了苏玉文等十几人以“共党嫌疑”为名进行审查，因找不到证据，再加上托人花钱说情，才被陆续释放回来。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苏维亮系张坊镇旅游公司干部、苏维斌系原区商业局工会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的房山县民兵连

王硕儒

抗日战争胜利后，平西解放区房山县政府设在张坊村。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大举进攻。

为了保卫我解放区，增强对敌斗争的武装力量，于1946年底，就在房山县政府所在地周围村庄，发展民兵组织，开始以十余名坚强骨干为核心，逐渐在南尚乐、北尚乐、南白岱、北白岱、惠南庄、镇江营、下滩、蔡家庄八个村，共发展民兵一百五十余名，建立起一个民兵连。全连配有有机枪一挺，步枪十八支，短枪七支，直接受房山县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县大队的领导和指挥。具体任务是：保卫房山县解放区，保卫县政府；阻击房山、长沟、涿县、夹河等地敌人的进犯；协助县政府征粮、押粮、运粮；配合县大队作战、破坏敌人交通线。这个民兵连的指战员，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劳动农民，过去深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翻了身，政治上纯洁可靠，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因而，圆满地完成了多次战斗任务，经受了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是当时全县驰名的一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战斗队。

全连指战员英勇善战，依仗人熟地灵，常常神出鬼没地深入到敌占区破坏交通，同敌人作战很少失利。1947年，国民党政府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平西解放区房山县政府所在地进攻，妄图夺取张坊重镇。我民兵连运用熟练的战术，摆好一个地雷阵，当敌人先头部队进入我地雷阵后，踏响地雷，当场炸死敌军十五人。敌人见情况不妙，不敢再继续南进。

每次完成战斗任务，都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特别是在破交任务中，我民兵连更显得积极、活跃。1947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军对冀中大清河以北举行大扫荡，敌军运输繁忙。为配合冀中反“扫荡”，我军攻打石家庄。上级指示，房山县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平汉铁路交通线，阻挠、延缓敌人对石家庄的增援。民兵连接受任务后，在平汉铁路上选择破交地点。通过侦察认为：琉璃河、涿县两个火车站都有敌军驻守，破交的地点以琉璃河至涿县之间的鹿头村附近为宜。根据确切情报：在当月17日夜11时至次日3时有军用运输车通过。为了胜利完成任务，房山县民兵连做好了充分准备。17日晚，在军分区独立团一个连的配合下，民兵连自西甘池村出发，夜11时前到达涿县鹿头村附近的铁路上。大部分民兵和部队负责掩护，由县武委会作战股长王兴元，率领王金桂、王鸿梅、杜宝珍、王莫起、晋保林、高继祥等民兵组成的爆破组爬上铁路，埋伏炸药箱。此时，敌人的军用车正从琉璃河站向南行驶，爆破组以熟练的技能埋好炸药，趴在铁轨上听着。等敌人火车将要经过时，爆破组又以破交的丰富经验，发现火车前列以空车皮引路。王兴元当机立断，下达不炸车皮炸车头的命令。当车头经过时，拉响炸药，将铁轨炸飞，火车头被炸毁，车皮连翻带滚，完成了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任务，迫使平汉铁路线停车三天。事后侦察，敌军伤亡二百余人。

在配合解放保定的战斗中，民兵连又接受了破交任务。1948年8月22日夜12点，又到达鹿头村附近的铁路上，由王兴元等十名民兵负责爆破。约用半小时功夫将炸药刚刚埋好，一列敌军载运弹药的货车由北向南驶过。当敌车通过时，拉响炸药箱，这列货车共四节车皮，全部脱下铁轨。因被敌人察觉，敌人猖狂地向我民兵袭击，我未能得到战利品，但有力地拦阻了敌军对保定的支援，为我军解放保定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46年底建立至1948年底全县解放，房山县民兵连共作战三十次(直接对敌作战十五次，配合部队作战十五次)，其中阻击战十三次，遭遇战一次，地雷战四次，破交战十三次，共打死打伤敌人188名，缴获或炸毁敌机枪十挺，六0炮二门，步枪八十支，冲锋枪一支，炸毁敌火车头二个，火车皮二十余节，铁轨三百四十余根，破坏敌铁路线十五华里，割断电线三千五百余斤，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由于战果显著，成绩突出，因此，受到平西军分区的通令嘉奖，王金桂等五人还受到二百万元(边币)奖金的奖励。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山县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发展

宋 湘

审判程序是法院审理案件的操作规程。解放以后房山县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随着全国的形势发展和上级法院的规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极不完善到有法可依的发展过程。根据个人的经历和体会，这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前后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8年12月房山县城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从张坊迁入房山县城。当时尚未建立人民法院，只在县政府下设司法处，行使审判职能。1949年6月，撤销司法处，成立房山县人民法院。但此后法院仍是县政府的一部分，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1952年7月，县长不再兼任法院院长。1954年6月，房山县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首次通过选举产生法院院长；法院不再隶属于县政府。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这个阶段中，国家对于法院审判工作也作过一些原则性规定和指示。如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提出了“集体调解、巡回审判、就地审判等方式”。1950年8月中央第一届司法工作会议确定了人民法院“便利人民、保护人民的审判制度”。国家还陆续颁布了一些实体法。如1950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2月2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2年4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在诉讼和审判程序上也下发过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指示。如1949年9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令：“民事案件当事人对判决不服，上诉期可定为5—10天”。1949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判决核准执行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地方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的案件应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1951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指示：“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应以二审为终审，除重大疑难案件外皆不得上诉到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了“二审终审”的原则。

尽管如此，总体上说，这个阶段法制还极不完备，尚无法定的审判程序。尤其是建国前的近一年时间和建国初期，法院审判案件基本上是老同志口传心授，新同志“比葫芦画瓢”。

从案件管辖及案件来源看，当时公安局主要精力是侦查、预审反革命案件，普通刑事案件有的是公安局逮捕、预审、起诉，但大多是区、村干部直接上报甚至捆绑扭送到法院，有的职务性犯罪(如贪污、违法乱纪)由机关单位直接移送向法院，也有的是公民自诉向法院。民事案件(大部分是离婚)原告人持文字诉状者极少，大多是到法院口诉，由审判人员记录后即算收案。

1952年，六区(霞云岭地区)芦子水村发生隗永杰疑奸杀人案，村干部直接报到法院。不经公安局侦查、预审，法院直接派人到村勘验尸体(法院设有勘验员)，调查取证，将犯罪人押回法院审讯，即判处了死刑。二区(张坊地区)某村一女青年猝死，群众议论是与之同宿的另一青年是“二尾(yi)子”，死者是被其“糟踏”死的。于是村干部就将其五花大绑扭送法院。法院将其收押后请县卫生院医生检查，认为该人实为女性，于是将其放回。但群众舆论强烈，村干部再次将其绑送法院。法院从通县专区请来法医再次检查，证实该人确是女性，不可能奸杀他人。就到村反复做群众工作，一场风波始得平息。

从案件审理形式看，当时并无正规审判庭。审判人员的办公室兼宿舍就是审案场所。绝大多数案件是审判员自问自记，法院干部戏称之为“自拉自唱”。边喝茶水边抽烟边问案，累了随时休息，相当随意。只是边审边用毛笔记录的功夫是后来许多审判人员难于企及的。

从案件审理过程看，约定俗成的作法是先问清当事人的姓名、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籍贯、住址、简历，然后逐项审清犯罪事实或纠纷内容；至于告之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回避、辩护)等尚无明文规定。

1950年3月至1953年9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处在这一阶段。由于工作量大，任务急，公安局的预审人员，法院的审判人员，加上县委、县政府从县直机关抽调的一批干部，全力以赴审反革命案件。这时更谈不上严格的法定程序，公安局预审、起诉实际上也已省略。一次集中统一行动从全县各地抓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分给各审案人员审讯。一包到底。由于这次镇反运动抓捕的基本上都是伪军政警宪特中的骨干成员，大多是血债累累的“明摆着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所以只要一条以上血债供证清楚，就可上报死刑，而来不及审清每一项罪行的详细情况，一个案卷只有十几页不是个别的。

为了加大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力度，在“镇反”运动中，原有的一些程序性规定也作了变动。判处死刑

的反革命案件均不准上诉,也不再报最高法院复核。死刑审批权下放到省法院。省法院派出工作组到各专区分院行使审批权。房山县法院判处死刑的反革命案件由审判人员填写一张“判表”,写明被告人姓名、年龄、住址、简历、主要犯罪事实,由县“保卫委员会”(县“镇反”领导机构)负责人签署“判死刑”的意见后,携卷到通县专区分院报省法院工作组审批,回来后即可执行。1951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指示:“凡被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亦与判处死刑的一样,一律不准上诉”。

第二阶段:1954年到1957年,是建国后法制建设、审判程序建设进度较快的一个阶段。

随着1952年司法改革(主要内容是整顿司法队伍,清除旧法观念,确立新的司法制度)的胜利完成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颁布,法院的审判程序逐步走上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

1955年5月,最高法院、司法部联合召开全国司法座谈会,部署肃反审判工作,提出法院审判案件“既要合法,又要及时”的原则,同时印发了全国十四个大中城市刑事案件、十三个大中城市民事案件审判程序初步总结(讨论稿)。1956年10月17日,在全国试行、讨论、修改之后,最高法院正式下发了《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虽然尚非公开的法定文件,只供内部参照执行,但法院审判案件操作规程从此有章可循。

1956年3月5日,房山县法院在东大街县委北院小礼堂公开审理了李品三盗窃案,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及群众代表旁听。由审判员刘洁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马淑芬、朱宇参加陪审,审判员张永海担任书记员(因是第一次公开审判,故由审判员出任书记员),特约辩护人张泽宽出庭辩护。这是房山县法院参照《审判程序总结》最早实行公开审判的一个案例。对于法院来说,这是个全新的事物,事先经过了充分的准备,认真的“排练”。对于旁听群众来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法院开庭审案,就好像看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三堂会审”。

那时,群众文化素质还很低,法律知识更是茫然,对审判程序还极不适应,一些法律术语更闻所未闻。曾经发生过许多流传很久的笑话。在审问一位老年妇女时,审判员问:“你什么族?”答:“我是缠足”。审问一起盗窃案时,问:“你的简历”,答:“我没有拣栗子,就拿了一篮子桃儿!”有个案件宣判以后问被告“是否上诉”,答:“我岁数大了,上不去树了!”当时,刑事案件判决书上叙述被告人身份一段中多有“无前科(指此前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记录)”一语,有的群众反映:“吴前科这小子坏透了,怎么哪个判决上都有他呀!”

1956年以后,公开审判逐步形成习惯。法院门前公告牌上经常公告开庭日期,欢迎群众旁听。

实行新的审判程序不再像过去审案那样审判人员有很大的随意性,而是要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地进行。以公诉刑事案件为例,检察院将案件移送法院、提起公诉后,由院长将案件分到审判员手中,审判员与两名陪审员阅卷后要组成准备庭,审查案件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侦查是否合法,羁押措施是否合法、必要,然后作出准备庭裁定,决定是否受理。如决定受理,要确定开庭日期,通知公诉人及有关证人,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告知其有写出答辩状、请律师或辩护人为其辩护的权利,有提出新证人、证据的权利等。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开庭三日前要张贴欢迎群众旁听的公告。开庭审判一般要经过五个步骤。第一,审判长宣布开庭,宣布法庭组成人员,告知被告人对法庭组成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如不申请回避,审判进入下一步。第二,核对被告人身份,告知其法定诉讼权利。如有证人出庭,要告知证人责任和义务,并当庭具结。第三,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人是否收到了起诉书副本,对起诉书有何意见。然后由被告人叙述、交代事实,审判员、陪审员发问;传证人就某一事实作证。第四,法庭辩论。由公诉人与律师或辩护人或被告人自己就案件事实、证据作若干轮辩论发言。第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如果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研究定罪量刑。有的案件可以当庭宣判,有的案件择日宣判。

审理民事案件由于贯彻“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方针,在法院开庭审理的较少,

大部分是审判人员携卷下乡，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向群众调查，然后就地开庭。按照《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不组成合议庭而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由于大部分民事案件可以调解解决，所以组成合议庭正式开庭审理的是少数。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审判员、书记员即分头去调查、调解，审判员“自拉自唱”，有的书记员也“自拉自唱”的现象得以延续多年。

1954年5月28日，司法部发出《关于建立陪审员的指示》，1954年9月颁布的《宪法》进一步把“人民陪审”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确定下来，从此全国基层法院逐步推行了人民陪审制度。房山县法院于1955年底由法院提出有关陪审员的条件、名额分配的意见，报请县委、县政府批准后，由各乡、镇推选了第一批人民陪审员。此后，基层和县人代会换届选举同时，采取乡、镇人代会选举或人大常委会选举的办法，改选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作为人民群众参与法院审判活动的代表，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提出处理意见的权利。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都要由审判员1人和人民陪审员2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法院根据工作需要，请陪审员轮流来院值班，一般每期2-4人，半个月轮换；有时也采取临时邀请、审完一两个案子就走的方法。房山县法院最早的、参加陪审较多的人民陪审员有：城关南街李培芝，东街雷淑贤(女)，西街马淑芬(女)，洪寺村赵纯元，纺织品公司范宗华(女)、晋国香(女)，理发业合作社郭振海，县马车队谭希斌，饶乐府村赵立志，修车业合作社毛义，南关沈金忠，夏村芦永志，顾册村张敏东，支娄村林淑珍(女)，吉羊村许士英(女)等。1956、1957年法院位于房山城內城隍庙街路南，院内临街两间北房是小法庭，城隍庙街东口北侧一个大院内有五间房的一个大法庭。每天早晨，值班书记员要打扫法庭，准备开水，冬季生火，作好开庭准备。大多数时间是在法院大、小法庭审理案件，有时陪审员也和审判员一起下乡调查，就地开庭。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人民法院人民当家作主，法院工作实行群众路线的精神。

1954年《宪法》规定依法实行辩护制度。1955、1956年省、市及专区一级陆续建立律师组织。县级还没有律师组织。但从1956年起，房山县法院审判案件时，有的当事人到通县专区法律顾问处请律师，有的在当地请亲友帮助辩护，有的由法院请一些县内知名人士任特约辩护人。县职工进修学校教师张泽宽、贾文文，县政府教育科科员石振英……都曾担任过特约辩护人。

第三阶段：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至1966年“文革”前。

1957年整风反右，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反右倾，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开始的小“四清”、大“四清”运动，“左”的错误越演越烈，正在起步的法制建设陷入停顿，试行不久的审判程序遭到破坏。虽然政法机关通过打击犯罪、调处纠纷，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仍是这一阶段政法工作的主流，但是“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确也不可低估。

整风反右运动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法律观念受到批判；政法机关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此只强调“配合”，不敢再提“制约”；不少干部被打成右派或受到批判；律师组织被取消，辩护制度因是“替犯罪分子说话”而名存实亡。

“大跃进”开始后，农业生产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越吹越响，波及到法院则是“简化一切繁琐手续和程序”“多快好省”地判案。过去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审完的案子，这时可二、三十分钟审完。有的案件开庭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以后，审判长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有没有不同意见”，答“没有”，于是宣布调查结束。由于没有律师或辩护人出庭，也不再展开辩论，即宣布闭庭。为配合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法院派出工作组进山到十渡、蒲洼、霞云岭一带，一批“大辩论”对象不经公安局侦查、检察院起诉，而由乡政府作原告(称“送案机关”)，审判人员就地审讯，就地判刑，然后由民兵押送回县收监执行，工作组回院后再补发判决书。

1962年,上级指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查出了一批冤假错案,虽然主要是政策性的错误,但也确有一些是因程序上的简单草率以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的错案。

“四清”运动中,各分团(乡镇)上报一大批运动中搞出的需剥夺选举权利或判处管制的案件。法院对这些案件索性废除了实体审。县“四清”总团保卫组(公安局)填写一份起诉意见书,由保卫组负责人签章,送到法院,法院从始至终没有传唤、询问被告人,只凭这张表格即填写统一制作的判决书,由公安局下发到派出所宣判执行。

第四阶段: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也席卷了法院。法院机构被砸烂,干警“斗、批、走”,审判程序更遭到彻底破坏。

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处于揪斗“黑帮、走资派”、两派武斗夺权的混乱时期,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处于彻底瘫痪状态,完全停止了办案。1968年底政法机关实行“军管”,建立了“公检法军管会”、“检法军管小组”。1969年6月,经过“清队”“整党”后,绝大多数干部被赶出法院,下放劳动。留下的少数干部及军管人员陆续恢复办案。但此时已无审判程序可言。政法机关只处理运动中揪出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及刑事犯罪案件。民事纠纷案件一律下放到公社;公社一度行使了民事案件的审判权。刑事案件的审理已无公安预审、检察起诉、法院审判之分工,而是由军管会统一领导,工作人员分案审讯,然后即发到基层,征求群众量刑意见,名曰“落实群众专政”,最后由军管会拍板定案。这种破坏法制、破坏程序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8月1日撤销军管。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案件,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按“现行反革命”处理的冤假错案以及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错判的刑事案件。

第五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从此我国法制建设和法院审判程序建设走上了法制化、正规化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最后,笔者需要作两点说明,一是本文着重叙述了“文革”前房山县人民法院审判程序的发展情况,对“文革”期间以及新时期情况只作了提纲式的简略回顾,详细情况有待以后更加熟悉情况的人士写出续作。

第二点说明:我区一些史志资料均称“房山解放初期县政府下设司法科”,笔者对此一直存疑,近查房山法院存档之案卷证实:解放初期房山县政府下设司法处,并非司法科。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良两县抗美援朝运动纪略

张文玲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火烧至我国的东北,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严峻的考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斗。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1951年1月中共房、良两县委分别成立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并在各区建立了分会，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各种会议，深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去。两县分别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会、区级主要干部会、村支书、宣传员代表会等。为使宣传深入扎实，良乡县培训宣传报告员41人，动员组织农村宣传员205人、机关宣传员46人、中小学教职员425人，中学生470人，民办教师及学员600余人；县区干部约90%，村干部有70%和80%的党团员参加了宣传活动。房山县委提出全体县区干部、党员毫无例外地投入这一运动，成为宣传员，并组织中小学教员450人，学生1500余人，集训党员骨干1200余人，组成宣传队深入各村各户。

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村子里的片会、院子会、家庭访问、生产小组会等小型宣传会议，深入广大农村讲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说明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各村还普遍召开控诉会，控诉战争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使妇女、老人都受到了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宣传形式上，动员各界人士利用黑板报、幻灯、洋片、屋顶广播等宣传工具和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歌、说快板、演活报剧等多种宣传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学校则利用政治课或结合各科教学、出黑板报、写标语、壁报等对学生进行抗美援朝的教育，并动员学生向家庭人员作宣传。工商户还在自己销售的商品包装上印上抗美援朝宣传标语，在橱窗上贴上宣传漫画等。两县大街小巷普遍刷写了新标语，在集镇、城内人口密度大，人流较集中的地区出刊街头壁报，张贴漫画等。据1951年5月份统计：约21万余人受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中：房山县受到教育人数达113340人，占全县总人数的57%；良乡县受教育数达99161人，占全县总人数的75%。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房、良两县抗美援朝委员会于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分别在两县范围内组织发动游行示威和“和平签名”运动。此次全民性的大游行，参加人数达180749人，其中：房山县117170人占全县总人数的60%；良乡县6357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0%。两县在“和平宣言”上签名的总计有226037人，其中：房山县129276人，占全县总人数的64%；良乡县9676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2%。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两县人民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其内容主要是：(1)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2)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单独对日媾和。(3)贡献一切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4)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号召保证完成1951年粮棉丰收任务。(5)做好优军代耕工作。(6)争先交纳公粮、充实国防力量。(7)要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向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国家财产。城内各摊商在公约中提出：保证不偷税；粮库在公约中订出具体办法，保证做好保卫、保管、供给调运、会计手续等；学校在公约中则以站好岗位、加强学习、做好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等为实际内容。使抗美援朝的宣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达到了高潮。

为有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美帝国主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中去。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重要文告，号召全国人民普遍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及优待烈、军属等三项运动。房、良两县委认真研究部署，分别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和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随着人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来房、良两县作报告以后，两县人民在志愿军爱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争先恐后地投入了捐献活动，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仅房山五区就完成捐献任务1.5亿多元(旧币)。南甘池赵永花抱娃组，自贯彻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口号提出后，他们就计划除白天做活外，晚上做鞋卖，共挣15万元，全部捐献；六间房村7个砸石小组60多人，每人一天砸200斤石子，自提出爱国增产捐献后，他们每天每人多砸40斤作为捐献，该村共捐款600万元。辛街村募集82万元，东矿职工捐款400多万元，城内工商界140万元。据统计，截至1951年9月底，

房山县共完成 7.7 亿元,超过计划 1.7 亿元。至 11 月底,良乡县完成 11.13 亿元,超过计划 5.8 亿元。

与此同时,两县城乡还开展了慰问志愿军、优待军烈属活动,在干部、党员、团员和高年级学生中,开展人人给志愿军写一封慰问信的活动,并将各种慰问品经抗美援朝委员会转送朝鲜前线。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入伍。1951 年仅良乡县报名青年 677 名,超过当时应征任务的 118%,应征入伍 320 名。

两县县委积极引导两县人民以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把抗美援朝运动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和爱国丰产竞赛活动,促进了两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上,永定河护堤工程原计划 40 天完成,结果仅用 25 天即完成任务。全县超额完成了粮棉生产任务。据 1952 年统计,粮食总产量达 16487 万斤,比 1949 年的 11300 万斤增加 5187 万斤;棉花总产 116.1 万斤,比 1949 年的 27.3 万斤增加了 88.8 万斤,亩产达 43 斤,比 1949 年的 22 斤增加 21 斤。房山县还获得了全通县专区的甲等模范丰产县的光荣称号。全县工商业总产值为 1981.7 万元,比 1949 年的 934.7 万元增加 1047 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732.7 万元,比 1949 年的 817.7 万元增加 915 万元。大大提高了支援前线,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经济实力。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五十年代的审干工作

王硕儒

五十年代的审查干部工作,是从 1955 年 3 月开始的,当时分房山县和良乡县,到 1958 年底的周口店区时基本结束,历时约四年时间。这项工作是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根据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和要害部门后一般的原则进行的。审查的范围是:先县级党政机关、后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

房山县第一期的审干工作,开始时由县委直接领导审查各部门的领导骨干 29 名。为了取得单位审干的经验,在各单位未开始前,于县人民委员会的 46 名干部中进行了审干试点。第二批从 1955 年 6 月开始,审查科、股长级干部共 195 名,根据任务建立了党群、政法、财贸三个审干组。第三批从 1956 年 1 月开始,审查了行政部门一般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统计、会计和小组长以上干部 512 名。到 1957 年 7 月,列入审查范围的 792 名已全部审查结束。占干部总数的 77%。确定应审对象 188 名,占审查范围内干部数 24%,其中参加敌特组织 2 名,参加敌特外围组织(情报网网员)8 名,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 3 名,一般国民党员 29 名,三民主义青年团分队长 1 名,一般团员 10 名,伪军警官 4 名,伪组织一般人员 30 名,自首叛变或有自首叛变行为 10 名,脱党、蜕化人员 8 名,包庇反革命的 4 名,小道首 3 名,参加革命工作或加入青年团后进行道会门活动的 2 名,一般道徒 29 名,有其他历史问题人员 45 名。经过审查,根据问题性质、本人态度、一贯表现,并本着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精神予以处理。给予处分的共 9 名,其中开除党籍 2 名,党内严重警告 4 名,开除团籍 2 名,留团查看 1 名,占应审对象 4.8%。

良乡县第一期的审干工作,也是从 1955 年 3 月开始的,到 1957 年 8 月结束。全县列入审查范围的 717 名,占干部总数的 63.7%。确定应审对象 177 名,占审查范围内干部数 24.7%,经过审查,有 24 名早已作出彻底交待,予以结论,并未发现新问题,不需再作结论。需在审干中作结论的 153 名,其中国民党县党部委员 1 名,一般国民党员 18 名,三青团区队长 1 名,三青团一般团员 12 名,其他反动党团 1 名,参加敌

特组织(中统及国民党通讯网)3名,参加敌特外围组织1名,反动道会门小头目1名,国民党军少校1名,敌伪军政警宪一般人员63名,伪造历史、隐瞒政治历史问题3名,我方失掉组织关系1名,脱党5名,被捕后在敌人面前犯有一般错误4名,自首叛变3名,其他(如道徒)35名。在审干中均予以结论和处理,其中给予党内或团内处分的5名。

第二期审干工作是周口店区进行的。1958年4月,房山县和良乡县撤销,建北京市周口店区,同时开始了第二期的审干工作。这期的审查范围均是新扩大的,包括乡镇干部163名,公私合营管理人员78名,农村水利技术员28名,邮电人员43名,基层手工业社管理人员60名,交通运输系统人员48名,医务人员89名,中小学教职员1637名,国营企业售货员、业务员1145名,农业社社长、党支部书记646名,其他各系统的干部555名,共计4492名。根据调查研究、摸底排队,确定审查对象382名,占8.5%。经过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基本弄清,并区别情况,作出正确的结论和处理。在处理中,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给予开除公职处分3名,开除党籍处分6名,开除团籍处分2名,行政撤职处分1名,行政记大过处分3名,共计15名,占审查对象的4%。

在审干工作中,为了加强领导,县(区)建立了审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审查干部工作。在全部工作中,始终贯彻和执行从政治上审查干部的方针,紧密结合肃反运动,正确掌握着三个主要环节,一是认真细致的审阅人事档案;二是调查与研究相结合,查取确切的人证物证;三是实事求是的予以结论和处理。为了作到实事求是,本人满意,有些案件经过几次复查。

通过这次审干工作,弄清了干部、职工的政治历史和思想品质,进一步纯洁了干部队伍,为正确的使用、提拔干部奠定了良好基础。就第二期审查对象来说,原确定382名,经审查后,历史上有污点的331名。从问题性质上分:属普通反革命分子身份的40名(反动党团骨干9名,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20名,反动道首11名),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100名,反动道徒32名,曾参加敌特外围组织24名,投敌叛变6名,脱党、蜕化23名,伪军政警宪一般成员93名,其他13名。有51名干部,原来对其历史有怀疑,经过审查、本人交待和调查研究,弄清确无问题,或有点小污点,但本人早已交待清楚,这样就可以大胆的使用和提拔。如财贸部门有一干部,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原来就对其历史不太清楚,未能大胆使用,审干后,弄清其历史无问题,于是调往机要部门以重用,工作很出色。对历史上有污点的干部,由于审查弄清了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因而解除了思想顾虑,放下了思想包袱,工作积极性大增。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五十年代房良两县的新“三反”斗争

许冬梅

为了严肃党纪、政纪,纯洁党组织,提高和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改进领导方法,发扬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完成,根据中共河北省通县专区地委指示精神,1953年1月、2月,中共房山、良乡两县县委分别作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新“三反”)。

《计划》指出,开展新“三反”斗争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处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应掌握的政策是对一般犯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错误的人,以“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改正错误从宽、坚持错误从严”为原则。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适当的加以惩办。同时,对一般犯有命令主义错误的人,要弄清是领导上的责任还是执行者本身的责任,若是领导上的责任应主动的担负起来。主要惩办对象是违法乱纪分子中最严重、最恶劣的,以缩小打击面。

1月30日,中共房、良两县委分别组织两县县级机关干部以部门为单位,区级干部以机关为单位,整党干部以组为单位,自本月31日起,开始学习指定文件:河北日报社论——《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及《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关于台底村》等文章。

2月,房、良两县分别召开县区扩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作新“三反”动员报告,说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性及其危险性,动员全体干部端正态度,积极参加这一斗争。随后,房、良两县又于6月、8月分别召开三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县委以新“三反”的精神检查了在春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处理了典型坏人坏事,表扬了好人好事。为了做到“边反、边改、边建”,会议结束后,县委把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按性质归纳了三十七种,并转给有关部门做了处理。

从8月11日开始,根据县扩干会议精神,两县全面开展了新“三反”。县级党政部门、各人民团体用三个星期时间检查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财经企业部门,主要检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供给制思想,以及计划不当,经营不善,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区级单位用七天时间检查命令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矛盾问题。乡级单位结合普选工作,在党内进行民主教育。

按照各阶段工作的部署,在解除思想顾虑,开展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揭发出了大量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一、房山县供销社给群众贷小麦种子6万斤,经农场检查,因不适合当地种植,建议不推销。可是,他们却推销出去。入冬后,冻死了很多,给国家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二、借用职权欺压群众,如良乡县某生产队长因听到某个男青年唱“小女婿”,误认为与其妹搞恋爱,打了他耳光,并抓到村政府吊起来,打得这个青年昏死过去(已处理)。

对以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共房、良两县委制订了整改措施:一、县委办公室设有专人负责管理群众来信,统收登记,然后按问题性质向各有关部门转发,限定在半月内给予答复,并随时催办,处理后经县委有关领导审阅上报或通知本人;二、县级党政负责人,定期分别接见来访群众和基层干部,县委书记每星期五批阅一次群众来信,每月25日召开各直属机关支部负责人会议进行检查;三、确定各区委副书记兼管检查工作,主要任务是每月反映一次下面的情况,各村支部设纪检委员,及时向上反映情况;四、各单位要设兼职管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人员。

一年中,良乡县共受理人民群众及各有关部门来信141件,从结案性质分析:属官僚主义失职41件(内有1952年10件),贪污浪费22件,违法乱纪35件(内有1952年6件),强迫命令20件(内有1952年2件),其它23件(内有1952年6件)。所受处分的县级一般干部有5人;区级一般干部受处分的有记过9人;财经企业部门受处分的干部有15人;小学教员受处分的有7人。乡村级干部因贪污、违法乱纪被撤职26人(法办2人)。

通过开展新“三反”斗争,基本纠正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工作上的盲目冒进倾向。县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检查工作多了,在三秋工作中,县委委员先后分头深入农村到第一线工作;从领导上看,干部作风转变了,已由过去在办公室签署文件转到深入农村,现场检查工作,用抓典型指导一般的领导方法代替了一般化的领导方法。过去干部下乡多是开会要数字,而现在,下乡干部不仅帮群众浸种、拌种、修理步犁等,还组织群众参观学习,推广小麦密植。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系区史志办联络科科长

在三年困难时期

刘振祥

1960年至1962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当时我是房山县工业战线搞资料工作的一名干部，困难时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在全县工业战线的情况是：

生活上处于大多数人吃不饱的状态。干部月粮食定量28斤，职工轻体力月定量30斤，重体力职工也是30多斤左右，一般在40斤以下。每人每月食油最少时2两，后保持在半斤，其他副食基本没有。供应证上虽有少量粉丝、麻酱、肉类等，一是量小，二是经常买不到。至于蔬菜、水果更是少得可怜，而且很贵。有时买一个柿子就要一块钱，所以在工人中流传着“当个七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的顺口溜。工人把不够吃的每月定量粮叫做保命粮。由于营养不足，人们曾一度身子浮肿，患肝炎的人也相当普遍。面对这一严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曾提出，一把手要亲自抓生活，书记抓食堂。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一斤白糖，二斤黄豆。工人把这叫作“糖豆”干部（不久，这一制度也取消了）。县委书记李明曾对粮食局的领导严肃的讲：“你们要千方百计搞好粮食的购销工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就是打扫粮食库底也要保证定量供应，不准饿死一个人。”良乡糖酒厂改生产淀粉，各酒厂改用高粱秸秆生产高粱秆酒，并发动职工到农村挖白菜疙瘩，挖树根，拾白薯叶、野菜、树叶，总之千方百计搞代食品。尽管这样，仍有不少干部、工人因饮食不足造成营养不良，体力不佳，有的甚至住进医院。我当时还不满三十岁，由于定量低，工作累，身体虚弱，体重从150多斤下降到105斤，多次晕倒，最后终于住进良乡医院，经一个多月的治疗才继续上班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在工矿采取了大量精简人员、企业关停并转的措施。总要求是：“人员减半，产量翻番。”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文件要求是：凡是1958年1月1日以后来自农村的工人，除少数创汇企业如地毯厂、生产出口产品和农业机具急需的工厂以外，其他工厂的工人基本上都返回农村。对于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基本不动，但迫切要求回农村的也予以批准。这样全县企业职工约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个别企业还要多些。如上千人的棉织厂由于原材料（棉花）问题，被迫停产。留在厂里的职工由工业局分配到所属各厂。服装行业除房山服装一厂外，良乡、琉璃河、河北以及1959年市下放到琉璃河的服装厂等四、五个规模小、业务不足、管理差、效益低的企业先后合并为良乡服装二厂。此后，经济效益逐渐提高，实现年利润由原来的二、三十万元增加到105万元；良乡皮麻厂针对市场上买不到马口铁、烟筒，但北方群众又急需烟筒的情况，经多次研究试验，用铁丝窗纱、沙子、粘合剂终于制成了一种土烟筒，虽比不上用马口铁作的烟筒，但解决了暂时困难，为此国家二轻部的领导曾亲自到良乡皮麻厂召开十几个省市参加的“土烟筒”现场会。

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县委副书记张令德同志主管工业；县委常委、工交部长秦芝儒，工业局长顾宪图；平时以这三人为主一般问题就解决了。副县长刘增勤、工会主席胡长存也参与工业战线重大问题的决策。开始时只有工业局，有些局尚未建立。工业局的社办企业科是县企业局的前身，小煤窑科是煤炭工业公司的前身，小农具科是农机局的前身。层次少，机构少，领导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一来很快作到思想统一，贯彻快、行动快、见效快。在这三年里任务非常艰巨。像棉织厂几百人返回农村，离厂前抱头痛哭。但由于上下一致，思想统一，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均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各基层班子也是一样，均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团结奋斗，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完成任务。实践证明，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在三年困难时期，房山工业战线各级干部，从上到下都能较好的坚持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领导干部到基层厂矿，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从而团结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推动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县工业局长顾宪图一直在顾册农具厂蹲点，改革发展小农具，千方百计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心中有五亿农民”为题，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业会议上重点发言，作为农业服务的典型，被列为房山十二面红旗之一。周口店煤矿从书记、矿长作起，深入井下跟班劳动，及时解决了矿工思想上、生产上、生活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减员的情况下实现了安全生产，使煤的日产量提高了30—50%。工人们对于矿领导班子作风的转变评说为：以前矿领导的作风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躺在床上”，现在是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共同商量，有问题与我们共同研究，立马解决。因此大家情绪高干劲大。工业局长顾宪图在参加全国煤炭工业会议上，曾以周口店煤矿的先进事迹作典型发言。

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员减少了，但团结战斗的干劲没有减，真是“穷且益坚”。越是困难，对党的正确领导，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直是坚信不疑，没有丝毫的动摇，不少同志仍是加班加点日以继夜，在营养不良身患疾病的情况下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我们去河北下乡，工委书记姜永刚同志得知我们搞资料工作的夜里加班没有吃的食物时，就给我们拉了筐柿子，这对我们真是如获至宝。我们把柿子运回放到工业局的房顶上，冬季夜里写材料实在饿急了，从房上取下柿子，每人只吃一个，留下以后再吃。后来我们又从直属库买了一些豆饼放在抽屉里，饿了就抓一把，边吃边喝也能解决问题。我因病住进良乡医院，工业战线领导来良乡各厂检查工作，召开职工大会作报告，我在医院主动为领导写报告材料(因我较长时期在良乡各厂下乡，对情况比较了解)，带病干点工作，非但毫无怨言，而且觉得很欣慰，很有意义。

党中央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总结，有的领导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个严重教训。全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终于战胜了困难。之后党中央又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新的的发展，到1965年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不少已与日本的经济指标相近了。可惜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家飞速前进，而我们却大踏步的倒退，这就更加加大了我国的经济落后的差距，以史为鉴，我们多次吃了“左”的苦头。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房山县剿匪纪实

刘存生

房山县在五、六十年代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它位于京城西南，西与涞水县的野三坡相邻，东与大兴县搭界，南与涿县毗连，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寇入侵、蒋党统治均派有重兵驻守。同时地方反动势力交织，建有反动团队，捕杀我军政人员多人，昔有“长操、柳林水，一溜十八台，看见八路就活埋”的反动谣言。

蛰伏的匪特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前，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下，蛰伏在保定、房山、涞水等地的特务分子与地方反动分子相勾结，就已经蠢动起来。特务头子王凤岗（蒋党保定地区特派员）、马德福到处网罗纠集残渣余孽，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王凤岗、马德福自任正副司令。自此，这股匪特气焰嚣张、活动猖獗，经常出没在霞云岭、云居寺、上方山、东矿和涞水县的野三坡等地，阻碍我税务、商贸开展工作。1950年7月在房山县的大石河东岸枪杀我执行公务的公安战士张××，抢去冲锋枪一支，子弹三十多发；继之又砸抢我张坊镇银行营业所，抢去货币（旧币）百万元；当年冬季又在洪寺通往周口店的山路途中枪杀税务稽查员一人，抢去手枪和税款数万元。这股匪徒到处网罗蒋家溃兵及其党羽，安插耳目，刺探我军情。大苑村的蒋党隐匿分子赵连海与王、马匪徒结伙坐探我情。羊头岗村的邵振和曾参加过反动团队充当伙会头目，政府未曾追究，本应悔过自新，却执迷不悟，又入伙为恶。房山县城北大街的劣绅王荫庭认贼作父，充当房山县的维持会会长，为日寇效劳。其在县城中学操场聚众五千人，大讲东亚共荣，挖空心思地大搞反共宣传，恶毒攻击我党，蛊惑人心，编造我党对“富有者杀，迷信者杀，孝顺者杀，经商者杀……”的“三十六杀”。塔照村的董玉贵与黑窝村的王振祥也兴风作浪，相交为恶，冒充王、马匪伙也打起“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到处流窜抢劫民财，强奸南尚乐、惠南庄等村在田间劳动的青年妇女……

联手剿匪

这伙匪徒狂妄嚣张，到处滋扰，阻我公务，殃及人民，颇有蔓延之势。为此，上级党委责令专区和县领导组织人马尽快予以歼灭。通县专区公安处的处长贾希光和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立即组成剿匪指挥小组，房山县委书记崔洛春、县公安局长张林、县法院令我参与成立剿匪行动小组，张林指挥刑警分赴农村，发动全民举报匪情，了解匪特征。同时刑警人员装扮樵夫奔赴上方山、云居寺等地侦察匪情，逮捕了匪伙耳目赵连海，收审了失枪人张警卫和涉嫌人白玉堂。经过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的侦察追捕，匪徒惶恐四散躲藏。我刑警三人在云居寺附近侦察时与马德福相遇，马头蒙棉织花巾，手持香烛，佯作拜佛人。被我刑警人员识破，三人扯下马匪头巾，马惊慌失措，掏枪欲抗，被我刑警合力摁倒擒拿，押送县城急审。马匪供出近日与王凤岗在上方山分手，王去东矿、岗上等地活动，待机南逃保定。根据口供，剿匪行动小组分析，匪徒王凤岗极有可能乘火车南逃。为此，把重点放在火车站，刑警分别在长辛店、良乡、窦店等车站与车站公警合作，布网盯守。不出所料，隔日王凤岗身着工人衣帽戴着墨镜出现在长辛店火车站，欲要乘车南逃，在我刑警车警密切合作下彼此示意，当即被捉拿捆绑，缴获手枪一支。匪徒张德祥在东矿为我干警捕捉，作恶多端的邵振和在羊头岗被捉。但树欲静风不止，人民正在剿匪胜利喜庆时，残匪董玉贵、王振祥于1950年腊月二十七日下午又持枪路劫两名赶集的鞭炮商，劫走货款。但被抢商不甘心被劫，就尾随董、王二匪直至塔照村的董犯窝点，一人盯守，一人火急到南尚乐向区政府报案，区里急电县里，县公安局长张林立即调派公安干警十余人，马上赶到塔照村包围董玉贵住宅，经对董、王二犯的威慑喊话和针对性的攻心，两匪徒交枪被擒。

经审讯，董王二犯曾在1950年夏季佯作锄禾人，在房山县的张坊镇东的田间小道树荫下用木棍将买米归来的县委书记警卫员张××打晕倒地，抢走手枪一支，子弹三十余发。此后董、王二犯还流窜于房山、涿州、涞水等县，抢劫民财，强奸妇女，危害社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

典章结案

王、马等匪伙不甘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惨败，秉承台湾蒋介石的指令，又网罗反动分子结成匪伙，梦想东山再起。但经我刑警、公武人员六十多天的艰险追捕，在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下，匪徒个个被擒。当时遵照北京市意见将王、马二犯押送京城行刑，抢劫犯董玉贵病死狱中，同案犯王振祥判刑二十年。除罪犯邵振和逃走外，王荫庭、赵连海等罪犯经省核准均被处以极刑。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作者系北京市密云县离休干部

房山保安团的罪证

王硕儒

房山保安团就是日本侵华时期的伪军，一贯为非作歹，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日本投降以后，房山保安团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在房山的“先遣军”。但是，其反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1946年6月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公然反共反人民。在房山县，以张德祥为首的保安团，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死心蹋地的走卒。

房山保安团、还乡团和黑杀团经常不断地向我平西解放区进犯。特别是1947年我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和平分土地以后，张德祥的进攻更加猖狂。1947年末至1948年3月，以张德祥为首的房山保安团、还乡团、黑杀团与驻房山、涿县花园等地的“暂三军”(国民党当时的一支正规部队)一起，向三、五、六区大举进攻，前后持续了三个月。所到之处，杀害我党政干部，尤其是农村贫农团干部，烧毁民房，抓丁抢粮，劫掠财物，无恶不作。据石窝、辛庄、岩上、下营、独树五村统计，当时被害的贫农团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就有26人。

1948年4月20日至23日，中共房山县委在反“扫荡”斗争的汇报中，对各村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统计。现有两份调查材料就是房山保安团的罪证：

一、敌人扫荡房山县三区各村受损情况(1948年4月27日统计)：王家磨、蔡家庄、下滩、郑家磨、镇江营、史各庄、西白岱、南白岱、北白岱、大峪沟、蔡家口、广录庄、塔照、南尚乐、北尚乐、洛庄、王庄、南河18个村，受损失户1091户，受损失人口2542人，被杀1人，被烧房屋119户，被烧房屋566间，被抓壮丁69人；损失粮食：大米422斤，小米420斤，玉米1504斤，其他粮食687斤；损失大牲畜：马1头，骡1头，牛13头，驴42头；损失布匹308尺，衣服1748件，鞋182双，被褥23床，口袋81条；损失肉猪36头，鸡948只，食油307斤，食盐936斤；损失农具折价1636万元。

二、房山县六区各村损失调查情况(1948年4月25日统计)：水头、三岔、下庄、后石门、前石门、高

庄、下营、石窝、辛庄、岩上、独树、纸房、黄元井、六甲房、半壁店、南正、北正、双磨、东良各庄、南良各庄、北良各庄二十一个村。被抓壮丁 99 人。损失粮食：大米 2483 斤，小米 1624 斤，玉米 4355 斤；损失布匹 124 尺，被子 97 条，衣服 682 件，鞋 227 双；损失猪 5 头，羊 18 只，鸡 696 只，鸡蛋 3932 个；损失家具 788 件。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房山县早期的一份死刑布告

宋 湘

1958 年至 1960 年我在房山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工作期间，亲手整理了一大批诉讼档案和文书档案。此前所有档案资料都是成捆堆放在库房里，无法查阅、利用。根据县委、县政府加强档案工作的指示，将上万件文书档案、上千件诉讼档案一宗宗、一件件进行清理、分类、装订、登记、入档，用了一年多时间。县直机关档案工作验收中房山县人民法院被评为先进单位。

在大量档案资料中，有一批房山县城解放前县人民政府在张坊时期司法处判处的案件。现存最早的是 1946 年形成的案卷材料。所用纸张都是 32 开现在已很难见到的“毛头纸”。这种纸很难用钢笔书写（钢笔书写将洇得难于辨认），而多用毛笔书写，可见当时物质条件之艰难。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敌人不断进山“扫荡”，县、区干部要经常背着案卷材料转移。到革命胜利时能够把这些案卷（从 1946 年到 1948 年）带进房山县城，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难能可贵的。

1946 年判处的郑宗起叛徒案，可算是现存房山县最早的一个死刑案件，该案《布告》也是现存房山县最早的一份死刑布告。现将该案《布告》及其他情况简介于下：

为布告事

查叛徒郑宗起，一区三流水村人，于本年 6 月 20 日投奔伪房山县张逆德祥部下，阴谋破坏我解放区工作，经常刺探我方军政消息。至 7 月 15 日^①带领伪匪向三流水村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叛变，掠夺民间财物，将政府发给自卫的枪枝三棵、手榴弹五十余发送交敌人，令其长子郑起璞往返侦查送信，认贼作父，认伪为友，扰乱民主社会秩序，丧尽民族气节等不法行为，该犯已供认不讳，我政府碍难宽恕，合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二两款、《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②之规定，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警效尤。

此布

县长 谭惠民

计开

叛徒郑宗起，男，年 45 岁，本县三流水村人，务农。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③

晋察冀边区第二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覆

建法字第 10 号

(覆该县处决之叛徒郑宗起、杨玉堂准予备案由)

法行字第2号报告及附件悉,查郑宗起、杨玉堂组织三流水叛变,与特务杨万明勾结,企图瓦解我解放区工作,背叛祖国,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之罪行,该县业将二犯处决,按其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应准予备案。

……

此复

房山县长 谭

专员 魏国元

民(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④”

注:

①:《布告》所述“本年”指1946年,“6月20日”及“7月15日”当系旧历。查“民国35年7月15日”即1946年8月11日,这与房山区现已出版的一些史志资料所载“三流水叛变是1946年8月11日”完全吻合。

②:1946年尚未建国,解放区人民政权尚承认并执行国民党政府之法律,《布告》引用之《惩治汉奸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当是中华民国之法律。

③:1946年解放区尚未建立人民法院,县政府行使审判职能,故《布告》由县长署名。另,本案于1946年12月22日由察哈尔省房山县公安局起诉,房山县政府审判官马剑书、录事靳金章承办。

④:《布告》及《覆函》原件均无标点,为便于阅读,笔者加了标点。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原子能院的历史性贡献

强家华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那一声巨响,就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大西北的戈壁滩上,一声巨响震撼了五洲四海,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1971年8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功。“两弹一艇”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振我军威,扬我国威,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在与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的同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广大职工更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两弹一艇”的技术攻关中,凝聚着该院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心血、智慧和汗水。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地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张劲夫同志在《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中写道:“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里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

央决定把这个所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当时，原子能所的所长是钱三强。张劲夫同志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钱三强同志以其精深的科学素养和杰出的组织才能，领导、组织原子能所职工完成了多项“两弹一艇”攻关任务。

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研制

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是铀-235，它是由六氟化铀经气体扩散法取得。按原来与苏方的协定，在苏方援建的六氟化铀工厂投产前，由他们提供六氟化铀产品。但苏方单方撕毁协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前，苏方即停建了六氟化铀生产厂，并中断了产品供应。因此，六氟化铀的生产就成了“一线”任务(研制原子弹任务)中最卡脖子的项目。解决这一难题，成为当时最紧急的一项任务。二机部党组把这个任务交给原子能所。

1960年6月，宋任穷部长亲自到原子能所部署工作，限时半年拿出合格产品。所里成立了由副所长李毅负责的领导小组和科学家吴征铠、汪德熙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常友、黄昌庆等组成的攻关组。他们因陋就简，土洋结合，昼夜奋战，克服一道道难关。10月第一次试生产时，钱三强所长亲临实验室，提出“只要拿出一克合格产品，就算成功。”结果生产出了3.3公斤合格产品。试验期间，国防科工委张爱萍副主任、二机部刘杰副部长亲临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给大家以鼓励。当简法生产工艺初步试验成功之后，接着又进行了各种工艺试验和设备改革。直到1962年，共经历了13次试验，证明了扩建成的“615乙”生产工艺是可行的。同年7月，正式承担了六氟化铀的生产任务。在六氟化铀生产厂的协作下，到1963年底，胜利完成了18吨六氟化铀的生产任务，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随后，又完成了解决六氟化铀生产厂的一批技术关键问题的研究任务——615丙。为此，二机部党组为原子能所发来贺信，说：“615乙、丙超额和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按时完成了技术攻关任务，并培养了一支生产队伍，这对一线生产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你们的成绩是很大的，特向你们表示祝贺！”

1958年，周恩来总理、陈毅、贺龙副总理同外宾一起在钱三强所长陪同下来原子能院视察
(强家华 提供)

研制点火中子源

点火中子源是原子弹引爆装置的重要部件之一。1959年开始研制。钱三强所长把这项任务直接交给十

室王方定小组。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不仅没有仪器设备，连起码的实验室也没有。根据钱三强所长的建议，他们同修缮队的同志一起，用一个多月的功夫，盖了一个以沥青油毡作顶、芦苇杆子抹灰当墙的简易工棚为实验室，捡了别人不用的旧手套箱，加工一些简单器具，便开始了实验工作。夏天，工棚里室温高达摄氏三十六、七度，他们要穿上三层防护工作服，戴上两层橡皮手套，每次实验后，汗水湿透了全身工作服；严冬时节，有时自来水管都冻裂了，他们仍然坚持做实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刻苦攻关。研制人员本着“质量第一”的方针，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每当建立一种鉴定方法时，都必须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核对，只有达到标准，才算过关。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三年中做了 978 次试验，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生产工艺，制成了高标准的优质化合物。

配合研制的工人的事迹也很感人。他们得知这是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时间就是胜利”就成了激励他们行动的响亮口号，个个争分夺秒，不甘落后。工人师傅郭坤把身患绝症的爱人送进医院手术室，甚至来不及说几句宽心话，便含泪返回所里投入工作；李维安师傅相当长时间每天工作 17 小时以上，从不叫苦。经过攻关小组的团结奋斗，终于在 1963 年 12 月，如期拿出了第一批合格产品，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引爆装置送上点火中子源。为此，二机部党组从试验现场发来贺电，表彰参加研制的全体人员“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

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提供六氟化铀原料的生产
车间（强家华 提供）

35#突击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不久，1965 年 2 月，原子能所又接受了一项绝密的紧急任务，即配合氢弹研制部门进行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代号 35#任务。它对选择氢弹技术路线具有重要意义。前来下达任务的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引用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要求在第二季度先提供一部分数据。原子能所党委把它作为最紧急的政治任务，决定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抽调 30 人，组成以副所长何泽慧（钱三强夫人）为指挥、党总支书记吕广义为政委的 35#突击队，进行突击攻关。

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早在四年前就有所准备了。1960 年底，钱三强所长在所党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二机部刘杰部长指示：“现在九院正在忙‘原子号’，你们原子能所应在‘氢字号’方面先走一步，做些准备。”所党委根据这一指示，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在钱三强所长领导下，抽调一部分理论骨干和数学骨干组成以黄祖洽、于敏为主的轻核理论组，着手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进行重要探索，先后写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报告 69 篇，为氢弹中的一些现象及其规律以及实现氢弹的各种可能途径奠定基础。同时，以丁大钊为首的轻核反应组，对轻核反应截面数据进行调研，编写了轻核反应调研总报告，并开始做一些轻核反应测量和实验方法、实验技术方面的准备。由于有这些技术储备，所以，当刘西尧副部长来所下达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任务后，35#突击队仅经过四个半月的苦战，便攻克了一系列实验技术上的难关，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第一阶段（35#-1）任务。接着，杨楨等完成了 35#-2 任务，中关村一部赵忠尧、郑林生完成了 35#-3、35#-4 任务。大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平时需要二、三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原副所长李毅回忆说：“全体突击队员真是用‘只争朝夕’的精神苦战攻关啊，他们工作日以继夜，常常放弃星期

天，有的自动推迟婚期，有的自费探亲刚刚到家，见到所里有紧急任务的电报便火速返回。他们这种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的忘我精神，充分表现出我们这支科技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风貌。”35#任务的胜利完成，使我国有了自己可靠的实验数据，澄清了当时数据的混乱，为我国早期的氢弹技术途径选择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数据。

为研制核潜艇做出积极贡献

在广大职工为“两弹”攻艰苦奋战的同时，原子能所承担的核潜艇动力堆研制试验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1960年4月，二机部袁隆成副部长邀集原子能所副所长李毅、反应堆线负责人孟戈非与海军政委苏振华，商谈由原子能所承担研制核潜艇动力堆的任务，即“09”任务。1961年成立了以彭士禄为主任的“09”研究室（47—1室）。该室在完成第一个船用动力堆的初步设计方案后，即开始堆芯各系统主要部件的设计工作，并在1963年经上级决定，将47-1室全体人员连同设计任务，一并划归海军七院。但是，原子能所承担的“09”任务并未因体制归属变动而停顿，有关科技人员借助已建设起来的条件，继续为核潜艇动力堆的研制做了大量

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简易工棚（强家华 提供）

工作。1964年，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子能所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材料试验堆49-2堆达到临界，投入运行，为“09”压力钢和其它堆材料考验提供了条件。此外，还建成了检验材料力学性质和金相结构用的半热室，并进行了“09”主要燃料、材料、二氟化铀、压力壳钢等辐照行为研究。同时，“09”动力堆元件组件和单棒的堆内考验准备工作，堆内高温、高压考验回路的设计和加工，以及元件破损监测及检出装置的研制等，也在加紧进行。并于1967年至1971先后进行了五次“09”动力堆内综合考验以及辐照后检验工作，并作出了全面性能评价，为核潜艇动力堆的设计、制造和运行，提供了重要依据。1970年5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堆启动之前，原子能所承担的启动、运行所需要的强中子源及有关测试仪表、探测器等工作都提前完成，为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加卫星和导弹研制工作

原子能所还为我国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的研制做了很多工作，如完成了小型紫外光电管、塑料晶体探测器、高纯氦-3的研制任务；完成了导弹再入时等离子鞘、等离子体的电离度、导电性、粘性、导热、扩散、

电磁辐射等性质以及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衰减等方面的研究；还为卫星的元件和部件进行质子束辐照考验。1970年国防科工委下达任务，要求原子能所为人造卫星核电池生产一个大于1000居里的钋-210热源，为此，我所一〇一室大功率开堆150多天，十六室503组连续生产一个月制成一个1070居里的钋-210热源，按时交付有关单位试用。

核工业的“老母鸡”

原子能所除了圆满完成“两弹一艇”各项攻关任务，建成了一批重要科研设备，开辟了许多研究领域外，还派出很多科技骨干到部内外一些单位，帮助建设生产线，建造大型设备，攻克技术难关等。先后从我所派生或经我所援建的单位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兰州近代物理所、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中国反应堆工程研究院、国防科工委九院、二十一所等。另外，我所还为核工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从1959年到1965年，我所为部内外培养和输送了近5000名科技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成“两弹一艇”攻关和核工业的中坚力量。原子能所创新性的工作，先后造就了60多位两院院士，在1999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科技专家中，就有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7位曾在原子能所创建功勋。正如《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中所说的：“原子能所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这个基地在核工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逐渐派生出一系列核科学研究机构，并培养出一大批日后成为核工业各单位科研生产骨干的科技人才。”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房山县的农村“大四清”运动

魏志华

房山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运动)是经过1964年的“小四清”和通县“四清”大会战后进行的。这次“四清”运动从1965年7月准备工作开始到1966年6月工作队离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声势大，内容广泛，影响也很深。当时全县共有19个公社，加上第一批基本结束的4个试点公社，共有23个公社、360个大队参加了这次运动，占全县大队总数的80%。10个山区公社中，除河北公社于1965年随平原公社一起进行外，其余9个公社原计划1966年冬开始，1967年春结束，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进行。

房山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党委极为重视，由领导带队，抽调了大批干部、职工参与。全县工作队员共有5169人。其中，中央单位663人，军队478人，市级机关614人，大专院校2960人(教师、

干部 1158 人，学生 1802 人)；党政机关干部中 13 级以上的 168 人，14-17 级的 335 人；技术专业干部中，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33 人。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蔡顺礼中将在交道公社普安屯村，副院长宋维斌少将在交道公社，训练部部长李丙令少将在紫草坞公社；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在周口店公社姜子水村；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化名纪平)在河北公社；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石少华和党委副书记王天章在张坊公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机关工委书记谭立在五侯公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贺志平在南尚乐公社；原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副所长李纯在周口店公社；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德远在城关公社；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尔林在周口店公社；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孙卓夫在长阳公社；北京师范大学副院长马池在良乡公社；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在良乡公社黄辛庄村。另外，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也随张南生同志在姜子水村参加“四清”，只是没有公开身份。县委及县直各单位的领导也大部分参加了“四清”。

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房山县的“四清”运动分三个阶段、五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做好准备；第二阶段，全面四清；第三阶段，建设、整改。五步是：第一步动员准备、发动群众；第二步，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清理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即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四个方面)，以清经济为主，以清思想带经济，搞好退赔，解放大多数干部；第三步，对敌斗争；第四步，后期建设，整顿基层组织，健全领导班子；第五步，生产革命，制定生产计划，掀起生产高潮。

为了搞好“四清”运动，县和公社都建立了专门领导机构。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霍梁，副记张智勇、张令德、孙卓夫、谭立，党委委员隗永树、孟长友、佟建和、董祥、郭馨亭、李丙令、姜君辰、王天章、郭德远、黎晓、房威。“四清”运动后期领导班子进行了个别调整。肖恩惠(北京市银行行长)任县团党委书记，霍梁、房威任副书记。各公社都建立了“四清”分团党委，县和公社都设立了“四清”办公室，县团还成立了政治部。县“四清”办公室主任是佟建和，下设秘书、检查、文教、财贸、保卫、后勤各组。政治部主任房威。政治部主要是负责“四清”工作队的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搞好“四清”，对新抽调、没有搞过“四清”的干部，于 1965 年 8 月下旬，利用一周的时间集中县里集训。县委领导作了动员，学习、讨论中共中央“23 条”、市委“四清”工作的指示和县委的部署；介绍上期“四清”试点工作的经验教训，提高大家的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和政策界限。对于全县比较突出的先锋队(当时叫“尖子队”)，如岗上、南韩继、惠南庄、北市等村及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当时的十二面红旗单位，不采取面上的方法、步骤。干部不搞“洗澡”、“下楼”，而是从总结工作入手，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总结经验教训，找差距、定措施，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对这些单位，县委也派出了较强的工作队。

按照县委的工作部署，县“四清”工作队于 1965 年 8 月进村，到 10 月初，这一阶段“四清”工作队全力以赴抓“三秋”种麦，结合生产搞好调查研究，开展宣传教育。讲“四清”的目的、意义、方法，使干部群众端正态度，放下包袱。“三秋”种麦基本结束以后，各公社、大队便转入了“四清”阶段。各公社都利用三、四天的时间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并吸收各村贫协代表参加。会上进一步进行动员，宣传“四清”的目的、意义，政策界限，启发干部自觉革命。会上由公社党政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检查自己的问题。同时，各村利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各村的“四清”全面开始。在党内外充分讨论、揭摆问题的基础上，各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检查自己的问题，由“四清”工作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向群众转达。同时组织查帐班子，根据群众揭摆的问题和干部检查交待的问题，进行查证和查帐。把发动群众、教育干部和查证、查帐密切结合起来。边揭发、边交待、边查实。把主要问题基本查清后，由工作队、群众、干部面对面的核实定案，进行经济退赔。对群众反映不大或虽有一般问题，“小四清”时已作过交待、没有新的问题的干部，没有再搞“洗澡”、“下楼”。这一阶段占的时间最长。一般的村到 1966 年 3 月才结束。最后通过定案核实，全县社队干部的经济问题共计

现款 664718 元, 粮食 516908 斤。其中,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476066 元, 粮食 466970 斤; 多吃多占款 70604 元, 粮食 94938 斤。减免后应退赔款 386826 元, 粮食 269978 斤。当时已退赔款 154103 元, 粮食 104340 斤。其余也都作了退赔计划, 分期归还。

“四清”阶段结束后便转入了“对敌斗争”阶段。这一段主要是发动群众大揭、大议、大诉, 发动干部、群众查上当、找危害、追根源, 从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上全面揭露阶级敌人。并进行阶级复议、评审四类分子。对问题严重、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 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落实监督改造政策。通过群众评议有 100 多名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四类分子帽子。有 500 多名过去已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又重新戴上帽子(包括一些新定的四类分子)。还有的被逮捕判刑。如良乡的杨贤, 解放前曾任良乡县的保安团长(与房山县的反革命分子张德祥同样的职务), 曾杀害革命干部、群众数十人, 抢男霸女、欺压百姓, 无恶不做。解放后逃到山西平遥县农村, 更名改姓, 冒充雇农, 当上了生产队的饲养员。1966 年初潜回紫草坞公社后闫村其妹妹家, 被群众发现报告给公安局, 县公安局连夜派人到后闫村将其抓获。县里在良乡电业中学操场召开斗争大会。有 3000 多名干部群众冒着大雪前来参加。最后经法院审理, 将外逃二十多年、罪行累累的反革命杀人犯杨贤判处了死刑。

“对敌斗争”阶段结束后, 进入“整改和组织建设”阶段。根据“四清”中揭露出的问题, 系统地进行整党。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知识, 特别是对党员进行党纲、党的宗旨教育; 改选党支部,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对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 经过培养教育, 发展入了党。同时对管委、共青团、妇联、民兵、治保等组织也进行了整顿, 调整了领导班子。最后, 对“四清”中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组织处理。全县进行“四清”的公社, 党委书记、主任 81 人中, 受处分的 2 人。603 名大队书记、大队长中, 受党纪处分的 128 人。

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 发动干部、群众讨论制定了生产规划、增产措施, 特别是对当年的生产作了具体安排, 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另外, 社属企事业单位的“四清”, 是随农村“四清”同步进行的。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四清”是农村社队“四清”转入建设阶段时, 抽一部分工作队到企业进行。方法步骤与农村“四清”大体相同。

文教系统进行的“四清”运动, 采取的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1965 年 10 月 4 日到 24 日, 利用 20 天放大秋假的时间, 全县教职员到县里集中, 传达讨论中央、市、县“四清”工作的指示, 并请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同志作了报告。讨论中, 学校领导带头检查自己的问题, 教师也作了自我检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并互相揭发检举。集训后回学校, 每周以学区为单位集中学习一次。主要是解决办学思想, 正确执行教育方针, 改进工作作风。对有经济问题的, 及时组织查证, 本人检查交待, 最后实行定案处理。

各公社“四清”运动临近结束时, 县团都派检查组按照中央的六条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1965 年至 1966 年的“四清”运动, 虽然也查出了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问题, 对促进干部的革命化,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特别是对各级干部的廉洁作风, 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整个“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左”的, 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和农村干部的问题, 看得过于严重, 工作队中不少人怕犯右的错误, 工作中宁“左”勿右。有的甚至强迫命令、搞逼供信, 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错案、扩大了打击面,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 把几个大队主要干部搞成一个万元的贪污集团, 把他们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部被开除党籍, 党支部书记还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被监督改造。到 1974 年, 在县工作组的帮助下, 对此案进行近半年的内查外调, 经查实, 贪污集团完全是假的, 才给予彻底平反。南尚乐公社一个大村的老党支部书记、市劳动模范, 因一般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已作过结论)和生活作风问题, 被开除党籍, 戴上坏分子帽子, 监督改造十几年, 1978 年才平了反, 恢复了党籍, 安排了工作。还有几个大队主要干部, 由于对四清运动不理解, 思想不通, 运动中自杀, 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搞好“四清”运动，市、县委对“四清”工作队都有严格的要求和严格的纪律。农村的工作队要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特别是吃饭，规定不准到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和群众反映较大的“四不清”干部家去派饭。工作队要轮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时还规定四清期间工作队员不准与农村青年谈恋爱、搞对象。工作队每月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和违纪现象。1965年底，工作队中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开讲用会、树典型。1966年初，在全体四清工作队和各级干部中，又深入开展了学习“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活动，对全体干部震动很大。促进了四清工作队的革命化。工作队绝大部分精神状态是好的，高标准，严要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当时没有假日，更没有星期天，只是每月轮流休息一、两天。全县5000多名工作队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除了执行“左”的路线外，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房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许冬梅

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继续执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同时，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此时，“左”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并继续发展下去，导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指导下，1963年2月、3月，中共中央分别作出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帐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城市县级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这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9月，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随后，城乡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全面展开。1965年1月，党中央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运动的重点转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房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共房山县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两次，人们俗称第一次为“小四清”，第二次为“大四清”。

初始的农村“四清”运动

根据《前十条》文件精神 and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县区先搞农村“四清”运动试点的指示，房山县委决定在石楼公社吉羊、大次洛两个大队搞试点。1963年5月下旬，县委派出40多人的工作组进村，按照中央提出的当前农村工作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重新组织经济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共五大问题，以“四清”为纲开展了工作，历时七个月。同时，县委还于7月上旬、秋收前分别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和县、社、队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揭盖子、放包袱、找差距，为全面开展社教运动打下了基础。

10月,中共房山县委作出《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为加强领导,成立了由县委书记霍梁、副书记张革夫等9人组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成立政法小组,研究处理有关地、富、反、坏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据部署,全县32个公社除长阳公社另做安排外,其他31个公社共分4批进行。为了积累经验,第一批在石楼、琉璃河、窦店、南召4个公社、57个大队、265个生产队中进行试点。同月8日,市、县、社三级干部组成403人(市级180人、县级147人、公社76人)的工作队进驻各村。在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分六个阶段开展了工作:1、宣传教育、组织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文件,大讲阶级斗争,组织群众回忆对比,进行诉苦。同时,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帮助安排生产和工作。2、干部“洗澡”。主要检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法是:先集体后个人,个人“下楼”,由书记带头,层层自我检查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特殊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3、进行“四清”。通过清理帐目、工分、仓库、财物,解决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干群关系,使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经过清理,发现的问题有:少数公社领导借支情况严重,克扣物资,财务手续混乱,积压物资。共揭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中有严重问题的336人,一般问题的1149人。应当退赔粮食1.15万公斤,现金2.76万元。已退粮食589公斤,现金1.07万元。4、开展对敌斗争,组织训练阶级队伍,审定阶级成分。共查出漏划地主、富农100户,对企图抵赖的209人进行了说理斗争。5、总结教育,加强组织建设。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开展了双十条的学习和党的基本知识及十项标准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57个大队全都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入会1.49万人,占贫下中农成年人口的84.3%。6、改善经营管理,制定农业发展规划;重新进行总路线教育,评选了五好队、五好社员和模范干部,制定1964年生产计划和农业发展长远规划。到1964年6月,4个公社社教运动发展情况是:1、经过验收合格,彻底结束的工作队已经撤离的有5个大队(黄土坡、八间房等);2、进入扫尾工作的有41个大队;3、正在整顿组织或经过验收发现质量不合格,进行补课的有11个大队。

1964年3月2日,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有良乡、坨里等17个公社,276个大队。市、县、社三级工作队员共1519人参加。为加强领导,县委每个常委和市带队的领导各蹲一个点(大队),配备一两个助手,并设立了办公室,巡回检查,及时掌握整个运动的情况。主要抓四项工作:完成反修宣传;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宣讲和讨论两个十条;访贫问苦,扎根串连。5月7日,市委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决定对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收缩。同时,强调要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之一。为此,房山县收缩了张坊、天开、黄山店、崇各庄、葫芦堡5个公社,抽出268名工作队员充实到其他12个公社力量较弱的大队中去。6月30日,又抽出355名工作队员补充到公社所属的财贸以及社办企业共63个单位搞“四清”,留下部分队员(1个大队1人至2人)协助搞农业生产,继续调查研究。9月,根据华北局和北京市委关于集中力量到一个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房山县12个公社的社教运动暂时停下来,抽出大部分工作队员到通县搞会战。其中,周口店公社官地、紫草坞公社公主坟、坨里公社石梯、良乡公社四街、五侯公社西周各庄共5个大队和窑上公社修配厂在运动中问题比较严重,需要继续搞下去,因此,安排36名队员在这些单位继续工作。

县委对收缩后的16个公社(包括第一批的4个公社),留下79名工作队员,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巡视组,在市委社教总团的领导下,与各村贫协组织协助县、社党委处理打击报复案件,检查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意见和要求等。

10月初,房山县共派出200多人到通县参加大会战。其中,一路由县委书记霍梁带领,进驻后寨府公社各村;另一路由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胡汉文带领,进驻杜柳棵公社各村。

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五反”运动

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在县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进行了“五反”运动(后期也称“四清”)。房山县“五反”运动开始之前，分别在工业、财贸两个系统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减少中间环节，调整商业机构，反对企业浪费为中心的改善经营管理运动，为全县“五反”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63年4月6日，中共房山县委作出《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部署》，制定了具体计划。县委及党群、政法、工业各委口成立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7月中旬，“五反”运动在县级机关24个单位、838人中进行。首先是县级领导干部在群众中“洗手洗澡”。从县委书记开始，依次至科局级干部逐个“洗澡下楼”。县委正副书记下“三层楼”，即常委会、科局长级干部会、全体干部会。其他领导干部下“两层楼”，即党委会或党组会、本系统或本单位的全体干部会。机关“五反”运动经历四个阶段：领导干部层层“下楼”，一般干部“洗手洗澡”；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领导干部检查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问题；开展以回忆对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系统整改，促进机关工作革命化。“五反”运动到1964年3月基本结束。

全县工业、财贸、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五反”运动从1964年3月下旬开始。参加单位152个，10192人。整个运动分五个阶段：1、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各单位的党委(支部)书记、厂长、副厂长等主要领导干部，检查了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违反制度、走后门、多吃多占和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及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洗澡下楼”的方法，首先由领导干部在党委(支委)会上检查，开展批评；然后向职工群众检查，发动群众背靠背提意见，领导直接听汇报。规模较大的窰店砖瓦厂、灰石厂、化工四厂共三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下“三层楼”，即党委扩大会、全体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领导干部“洗澡下楼”之后，中层领导干部(车间支部书记、主任)在各自领导的部门内进行“洗澡”，共有285人参加。其它中小学单位一般的下“两层楼”或“一层楼”，即先干部、后群众或在三级干部会后直接向职工群众进行检查。2、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放下包袱，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组织革命阶级队伍，共同对敌。通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讲家史、厂史，组织职工现身说法，激发群众的阶级感情。同时开展“洗手洗澡”，着重检查乱拿乱抄、走后门、多吃多占、公私不分等。3、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4、进行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由单位的领导干部代表集体(包括个人问题)向全体干部和职工群众进行检查。5、集中力量进行大整大改。对群众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做到件件有登记，有答复。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基层领导干部轮流到集体宿舍与工人同住，到集体食堂与工人同吃的制度。

全县“五反”运动坚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并结合学习“双十条”，学大庆和反对修正主义，领导干部检查了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铺张浪费等问题。经查帐、核实定案，县级机关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共43人，其中有党员21人。根据党的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的政策，对6人分别给予党籍、团籍和行政处分。基层企事业单位通过“洗手洗澡”共放大小“包袱”13708个，其中，领导干部放下了8120个，一般干部放下了5588个。按性质划分属铺张浪费的有464个，走后门4597个，多吃多占2254个，特殊化781个，收送礼物519个，高价买卖880个，贪污盗窃69个，投机倒把14个，其它问题4130个等。“五反”运动的开展提高了领导干部的革命自觉性，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

深入贯彻《二十三条》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渐减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社队还没有全面搞过“四清”,许多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同时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贯彻中央精神,2月,房山县委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会上,收听了彭真、万里等领导关于“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录音报告,并组织了学习讨论,启发干部自觉革命,洗手洗澡放包袱,轻装前进。这次会上共交代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性质的经济案件2500多件。在提高思想觉悟放包袱的基础上,会后,各公社紧密结合生产,进行了基层干部的选举工作。为了协助工作,县、社两级抽调5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村,按照成份好、思想好、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等条件选举了干部,全县连连连任的干部有10721名,是原有干部总数的87.7%。

同年5月初,房山县参加通县大会战的工作队队员陆续撤回来。为了重新组织队伍继续开展“四清”运动,县委抽调百余名干部到党校学习。按照市“四清”总团的要求,房山县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委员会(简称县团委),公社成立工作分团,大队派工作队。县团党委书记霍梁,副书记张令德、张智勇等4人,委员共12人。8月13日,县团委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整个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五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准备。贯彻政策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第二阶段,四清。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步团结两个95%,开展对敌斗争。第三阶段,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生产建设。第一步,动员准备;第二步,全面四清;第三步,对敌斗争;第四步,后期建设;第五步,生产革命。随着农村同时开展四清的还有县、社属企事业单位和市属厂矿。

8月下旬,由市、县、社组成的农村四清工作队4000多名队员陆续进村立即投入到三秋生产,开展了比、学、赶、帮、超活动,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与农民实行三同,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建立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在此基础上,10月下旬各分团先后转入全面四清阶段,有13个分团召开了三级干部会,约有70%到80%的干部放了“包袱”。到1966年1月初,据19个公社统计,在1.2万多名农村干部中,80%以上的人交代了程度不同的四不清问题。其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3069人;共交代贪污盗窃款185529元,粮食202647斤,粮票6046斤,投机倒把获暴利81285元;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获赃款、暴利千元以上的37件,千斤粮以上的25件,万元、万斤以上的各2件。

同年3月,运动进入后期阶段,各分团、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突出政治,坚持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集中力量进行大反“和平演变”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搞好社员自我教育。4月6日,县社教工作团办公室发出总结四清运动工作和整理有关资料的通知。随着中央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即“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四清”运动即告停止。截止到5月初,公社级四清运动的进展情况是:六渡、十渡、蒲洼、霞云岭、南窖、长操、大安山、史家营8个山区公社及新镇未开展“四清”运动,结束的有4个公社,正在开展的有19个公社;未“下楼”的干部有380人;未核定案的有366件;未通过三定(定事实、定性质、定时间)三允许(允许本人申辩或别人代为申辩、允许补充交代、允许翻案)的有839人;未定经济退赔计划的有1300人。对敌斗争:结束评审、斗争的大队有205个;对残余反革命查清了一半尚有202件没有弄清;在161起积案中只破案68起。领导核心:有13个大队领导核心不齐,有8个大队主要领导人选还未物色出来。

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1963年开始到1966年5月,先后断断续续在23个公社开展。由于认真贯彻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运动中始终把生产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长抓不懈,因此,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

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增长。但这次运动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人人过关，打击和伤害了一批党员和干部。在整个“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案件中，全县开除党籍的 336 人，因其他原因出党的 888 人，开除公职的 197 人；新定反、坏、贪、投分子 429 人；补划地富成份的 344 户。经后来甄别为错案，予以纠正而恢复党籍的 599 人（其中被开除后恢复党籍的 198 人）；恢复公职的 127 人；新定反、坏、贪、投分子又改正的 47 人；补划地富成份改正 326 户。这些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形成的错案、冤案，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予了纠正。其中，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和二队被错定为贪污集团，属典型错案，后来对其成员组织上恢复了党籍，经济上予以退赔。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建园始末

姚志明 魏志华

平西抗日烈士陵园位于十渡地区，由烈士碑、碑亭、纪念馆三部分组成。陵园从 1984 年 9 月开始动工修建，分三个阶段施工，到 1992 年 3 月建成。从筹备到建成共用近八年的时间。三项工程建设的主要经过是：

第一阶段：修建纪念碑。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是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根据平西人民的意愿，委托房山县人大常委会建立的。

1984 年 8 月，曾在平西抗日根据地领导革命斗争的李德仲、陆平两位老领导来房山转达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的意愿：为了表彰忠烈，缅怀英灵，述诸儿孙，教育后代，拟在房山十渡地区建立一座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希望由房山县人大常委会出面并承办。其理由：一是房山地区当时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根据地抗日领导机关曾在十渡、蒲洼一带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战争；二是十渡山青水秀，是著名的旅游区，在此建碑便于群众瞻仰。房山县人大常委会认为，建立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不仅是健在的一些领导过平西抗日斗争前辈的夙愿，也是全县人民的心愿。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通过学史建碑缅怀平西抗日烈士的英雄业绩，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义不容辞地把这件事情办好。于是，从 1984 年 9 月至 1985 年 10 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要抓了三件事：

第一，选择碑址。县人大主任张成基、副主任孟常友等同志两次陪同李德仲、陆平同志，三次陪同县建委副主任、工程师刘经久到十渡勘察地形。开始计划将纪念碑建在八渡望佛台东侧，后来经过反复比较，决定建立在十渡卧龙山山上。

第二，设计碑型。县人大常委会多次研究讨论，并征求李德仲、陆平等领导同志的意见，在刘经久等同志的帮助下，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第三，请有关人士题词和撰写碑文。碑的正面题词为肖克同志手书：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背面碑文 1200 字，请作家苗培时撰文，书法家金寄水书写，南尚乐乡高庄村负责精选汉白玉石料并雕刻。纪念碑高 1.6 米，宽 3 米，由三块汉白玉组成。碑座高 0.9 米，用墨玉贴面；碑底高 0.8 米，平台面积 100 平方米，周围用花砖镶砌。由十渡乡西庄村修建碑座，同时修了上山的路和停车场。

在烈士纪念碑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四川贡嘎山开发中心、北京电力机械建筑公司、县公路管理所、县水泥二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房山的52952部队、57601部队和十渡乡、南尚乐乡政府及高庄、西庄、十渡等各单位都积极组织捐款捐物,总计折款30余万元。

经过紧张的筹备,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于1985年10月5日揭幕。在松柏翠绿的十渡卧龙山头,隆重举行了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肖克、杨成武、刘道生、肖文玖、张明远、李德仲、臧伯平、李水清、赵榕、苏梅、钟子云、纪亭榭、李钟奇、肖思明等50多位曾在平西领导过抗日斗争的革命前辈应邀出席。参加落成典礼的还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和中共房山县委、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的负责同志,县直各机关单位,各乡镇的领导同志。应邀出席揭幕典礼的还有作家苗培时、书法家金寄水、原平西抗日根据地所属的门头沟、昌平、涿县、涞水、涿鹿等县委的负责同志及各界代表400余人。

在揭幕仪式上,房山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讲了话。他讲了建立平西烈士纪念碑的意义、筹备经过,并对支援平西抗日纪念碑的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任挺进军司令员的肖克同志也讲了话。他介绍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概况和对敌斗争的历史,号召平西人民发扬抗日烈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原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同志当场吟诗一首:“崇山峻岭盘坡雪,拒马激浪向东流,平西人民多壮志,战胜日寇换新颜。”向抗日战争中在平西牺牲的烈士表示深切悼念,向平西人民表达良好的祝愿。最后,共青团房山县委书记马大军代表全县17万青少年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接过先烈手中的火炬,循着他们的光辉足迹,树立共产主义必胜信念,开拓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揭幕当天,肖克、杨成武等老领导还当场题词。肖克同志的题词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杨成武同志的题词是:“昔日在战场立功,今朝为四化建业。”

第二阶段:修建碑亭。纪念碑刚建时只有碑,没有碑亭。后来经李德仲等老领导的提议和有关方面的多次研究,考虑没有碑亭,既不美观,又不利于纪念碑的保护,风吹日晒时间长了容易风化,决定建立纪念碑碑亭。第二期工程由原房山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主抓,区建委主任周来新协调,城关建筑公司经理史增录设计,最后由城关建筑公司施工,按计划需要资金14万多元。由于资金不足,所有施工单位千方百计节省开支。亭顶原计划用木料制做,改用水泥后节省了大量开支。坨里乡政府送来琉璃瓦,南尚乐乡石窝村送来用大理石雕刻的立柱,区水泥二厂捐赠了水泥,良乡送变电公司负责材料的义务运送、安装。由于烈士碑上边有高压线,影响施工,张成基同志找了房山供电局后,孙克新局长亲身安排改线,共改了8根电杆,所有费用都分文未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碑亭于1987年9月竣工,整个工程只用资金6万多元,节省开支一半多。

第三阶段:修建纪念馆。1985年建立了抗日烈士陵园之后,陵园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前来瞻仰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有的组织党员到这里重温入党誓词,进行党的奋斗目标和党风党纪教育;有的在此举行新党员、新团员、新队员的宣誓仪式;有些学校在这里开展为烈士扫墓、向纪念碑献花圈,请老干部、老革命军人讲抗日斗争史等教育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感到纪念碑文只是对平西抗日斗争史作了高度概括,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尚缺乏细致的描写和直观材料,烈士陵园只有纪念碑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平西抗日斗争史的需要。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使之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决定建立平西抗日斗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斗争纪念馆的建设于1989年4月开始。筹备工作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选址。纪念馆主体建筑面积850平方米,有4层楼高,占沙荒地1.5亩。经过反复考察、勘测,最后确定将纪念馆建于山青水秀、交通方便的卧龙山崖头下的开阔地面,与纪念碑山上山下互相联结。辉映一体,便于群众瞻仰参观,而且不占耕地。

二是广泛发动群众,多方筹集资金。修建纪念馆按设计需要资金30万元。为了筹集资金,李德仲、张

成基等老领导和区民政局的领导同志一方面积极争取到中国科学院赞助3万元，北京市民政局支援8万元，市煤炭公司支援1万元；另一方面动员房山各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据统计，房山区煤炭公司、物资局、民政局、建筑集团公司、绿化办等单位捐款10余万元。房山区和京西矿务局所属在房山境内的60多个煤矿、灰厂捐款8.4万元。周口店地区办事处、良乡地区办事处、韩村河、吉羊、窦店镇、紫草坞乡等7个构件厂捐赠预制构件260多块。区水泥一厂、二厂、周口店地区办事处水泥厂、新街、瓦井、周口店、周口村、南韩继等8个水泥厂赞助水泥26吨。官道乡、紫草坞乡砖厂及石楼、二站等15个村赞助砖26万块。坨里乡赞助价值4600余元的琉璃瓦。燕化市政公司赞助价值4600余元的油毡、沥青。赞助水泥、砖、瓦和水泥构件的单位，不仅不收费，而且按照工程的需要，分期按时运送，既保证了工程的正常进行，也节省下许多人力和开支。十渡镇建筑公司承担建设任务，西庄村支援土地，建委苗风亭工程师义务设计，勘测队刘希稳队长带领义务勘测。全区为修建纪念馆进行赞助的单位共计120多个，共赞助现金和实物44万多元。

三是搜集编辑平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料，设计布置展厅。为使纪念馆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曾在平西领导抗日斗争的李德仲、陆平等同志，到原平西抗日根据地所属各区、县召开座谈会，研究征集史料和实物等有关事项。曾在平西领导抗日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及原平西所属各县，为展馆提供照片300多幅，领导题词和诗词12件，实物12件。房山区文化馆刘仲全、南尚乐乡文化站赵友华等同志对资料精心整理，绘制图片和编写解说词。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于四海同志制作了沙盘。展览馆共分“火种”、“七·七事变”、“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冀热察区党委”、“日寇的残酷暴行”、“人民的斗争和胜利”、“缅怀英烈”七个部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抗日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历史。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平西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于1992年2月竣工，3月26日在十渡抗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肖克、李德仲、肖文玖等二十多位原在平西领导过抗日战争的革命前辈应邀出席。中共房山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原平西抗日根据地所属12个区、县的领导及房山区的干部群众500多人出席了揭幕仪式。会上，张成基同志汇报了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经过和展览馆的主要内容，向支援建馆的单位表示感谢。中共房山区委副书记张朝星代表房山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对前来参加揭幕典礼的革命前辈表示问候，对支援建馆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号召全区人民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使房山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原中顾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肖克也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当时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平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号召干部群众发挥革命传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中共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秘书长程葆刚代表来宾讲了话，他感谢房山区人民对建馆工作所做的努力，认为这是为原平西抗日根据地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共青团房山区委书记王洪钟和少先队代表也相继发言。

整个平西抗日陵园的建设，得到了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市民政局、中共房山区委、区政府及各乡、镇、各单位、厂矿、驻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特别是原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同志，对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的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的建设，从建碑、建亭、建纪念馆，从选址、设计、物料选购、诗人题词、书写以及筹集资金，到搜集资料、展厅的安排，都是他亲自部署和精心安排。整个烈士陵园的建设，凝聚着张成基同志的心血。

开始建立平西烈士碑时，张成基同志任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带领县人大的同志积极参加烈士碑的筹建。特别是烈士碑揭幕前后几天，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从主任到一般干部，从人力到车辆，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主任张成基、副主任孟友同志曾住在高庄和十渡亲自校对碑文，组织安装，保证了烈士碑按时揭幕。1987年以后，张成基同志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对建设好烈士陵园的决心和劲头丝毫未减。他多次找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领导座谈，到其他区县访问，到外地的陵园参观学习。建陵园需要大量资金，筹集资金是陵园建设的最大难题。除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捐款6万元以外，其余大量

资金都是张成基同志组织捐赠的。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到过几十个单位、乡镇，宣传建陵园的重大意义，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些单位他不只去过一、二次。他的这种精神，使各单位的领导深受感动，积极捐款捐物。纪念馆建成后没有资料和实物，张成基同志又带领区民政局和陵园管理处的领导同志到原平西抗日根据地各区县去座谈、去搜集，使展览馆得到大量珍贵资料和实物。此外，烈士陵园建立以来，区民政局领导和陵园管理处的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

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建立以来，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前来参观瞻仰的干部群众已达100多万人次。近几年被国家民政局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陵园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成为我区一处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姚志明系区政协三、四届常委，原区政协文教工作办公室主任

西甘池村的烈士陵园

傅洪珍

1947年8月，我八路军独立四旅首次攻打周口店敌人据点。周口店是房山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工事极为坚固。前一天下午五点，独立四旅从甘池、上下中院出发，一部到李庄附近埋伏、准备阻击琉璃河去周口店援敌；另一部埋伏在山口附近，准备阻击房山来周口店的援敌。大部主力部队则集中攻打周口店的敌人据点。

周口店西山上，敌人建有中心炮楼，岗楼外有封锁沟。河滩里还建有好几个小炮楼。当夜，天阴得很沉。夜两点许，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军开始向敌炮楼发动攻击，很快攻占了河滩的几个小炮楼。天将亮时，雨越下越大。为攻克山上的中心炮楼，我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敌人的主炮楼旁安放了炸药包，待炸响后发起总攻。不料大雨将导火线和引信淋湿，爆破未成。拂晓雨停，晨雾散去，我潜伏部队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中。敌借助坚固工事，居高临下，几挺机枪疯狂地向我军阵地扫射，使我军伤亡百余人。又因良乡敌人赶来增援，我部队不得不撤出阵地。

这一年我十五岁，曾参加了西甘池伤员接待站的工作。西甘池、黄元井、三座庵、六间房等村，每村出三两个人。我们二十来个服务员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领导我们的是部队的一位女卫生员，约二十四、五岁。报到以后，她把我们各自的姓名和村别都一一记在了日记本上。然后给我们开会说：“我叫赵文琴，比你们都大，你们就叫我赵大姐吧。你们都要听我指挥。咱们的任务只有一项，就是要千方百计伺候好伤员，对伤员说话要和气，你们都要称他们解放军叔叔。好好叫他们吃叫他们喝，谁也不准数落他们……你们都记下了吗？”

“记下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咱们都住在这个屋，你们躺下睡觉吧，有事我叫你们。”我们十几个都挤在一条大土炕上。这个场合，谁也睡不着，就在炕上眯着。赵大姐在一盏小油灯下不知写什么。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就听院中有说话声。赵大姐到屋外，工夫不大就回来了，她对黑牛和铁柱、赵龙儿

(当时我们都没有大名字,就叫乳名儿)说:“你们几个快起来,伤员下来了,你们几个跟我来,其他人不要动。”赵大姐带出去四、五个人,跟她一起伺候伤员去了。我们二十多人就这样被一拨儿一拨儿地安排好,经过两天两夜,把轻重伤员,经过本站都转送到后方医院去了(当时张坊是我军的后方医院),把牺牲了的七十多名烈士安葬在西甘池村的小北坡上。由西甘池村主持,立石碑一座,上刻“烈士陵园”四个大字。从此,西甘池烈士陵园正式建立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不少的学校师生、机关和农村干部们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扫墓、缅怀先烈。

按理说,这样的革命文物不应损坏。然而,事与愿违,不知何因,园内外的大树被伐而光。坟冢被平,那块石碑,歪着身子摇摇欲倒。

1985年,我在畜牧场上班,天天路经此墓。目睹此景,心里非常难受,为何把烈士陵园给糟践成这个样子呢?对得起那些为国殉难的烈士吗?于是我给《北京日报郊区版》写了篇稿子,反映了这种情况。文章在1986年4月11日见报后,长沟乡党委、政府对此重视起来,立即号召全乡人民捐款,重修烈士陵园。于是把烈士陵园从小北坡迁移到大北坡的顶峰。当时,全乡把重修烈士陵园当件大事来抓。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乡团委组织团员和青年负责迁坟。西甘池村也全力投入此项工作。新碑为大理石料,取材于石窝。陵园又重新用红砖垒了围墙,园内栽植了许多柏树。

烈士陵园竣工揭幕这天,原解放周口店战役时的司令员肖文玖老人亲自乘车赶来并讲了话。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也乘车赶来。长沟乡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各村群众千余人参加了揭幕仪式。当年亲临战争的老干部在揭幕仪式上介绍了战时的情况。从此,西甘池烈士陵园成为后人凭吊革命先烈的重要活动场所。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日伪侵袭昌宛房根据地

张成基

1942年7月下旬,良乡至南窖各据点的日伪军接到命令,到百花山下秋林铺村围剿昌宛房县政府所在地。于是良乡、坨里、河北、红煤厂、长操、南窖各据点出动了四百多人的日伪军,头天晚上驻扎在柳林水村,企图趁夜袭击秋林铺村。

昌宛房县政府接到敌工部的报告后,立即研究决定:县政府系统立即转移到宝水村的东泥湾去坚持工作;法院有现押犯人一百五十多,转移到岭后北边桥的西沟老乡家中;县大队一连留守在政府机关附近,以松树岭为防线,阻击来犯之敌;二连去青白口、千军台、沿河城一带防备东线各据点敌人;三连赴沈家庵、大峪沟、龙洼一带防备石亭、张坊西线各据点的敌人;区武工队至杨林水村,准备阻击南线各据点敌人。进行战斗部署后,我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各奔自己的预备岗位。

武工队来到杨林水,驻扎在下半村。队伍驻下后,领导立即察看地形,选择地雷战地区,还选出用手榴弹打击敌人的有利地形。为保证战斗顺利又选了抄道岭高山头上的战区,实行远距离射击的战场。头道岗部署在杨林水村口,检查来往行人。

当天晚上,驻柳林水日伪队长们开会,把河北伪军带来侦察北沟的特务刘维常和南窖日伪特务陈文厚二

人找到一起,询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怎样,二人谁也说不清楚。日伪队长们认为在这样的地理地形情况下进军,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命令刘维常、陈文厚二人在第二天早上军队出发前,要将十五里地以内的情况搞清楚,避免受到我军的阻击。

第二天早晨四点,刘维常、陈文厚每人穿了一件灰大褂,肩上挎了一个小包袱,头上戴了一个凉帽,拿了一把扇子出了柳林水村。他们走出五华里,到了杨林水村边,被武工队岗哨卡住,送到队部。我武工队长董春山一看有陈文厚,知道是日本特务,但他也是我县敌工部的地下关系,所以向他了解日伪军的情况。随后问他们到这里干什么。他二人说,河北、坨里、良乡各据点抽调来四百多名日伪军,昨天已驻到柳林水村,准备袭击秋林铺村。他们二人侦察沿路有八路军没有。如果放他们回去一定不敢报告这里有八路军的埋伏,只说山神庙以下的十五里路程中没有八路军。于是,二人就被放回了。

根据陈、刘二人的交待,武工队为更好地打击敌人,把部分队伍埋伏在超道岭去,等日伪军上来时,从高空对其进行阻击。

时间不久,四百多日伪军果然上来了。等他们走到大窰晃吞最窄处,早已埋伏好的武工队一班的战士立即开枪,敌人乱了营。有的爬到石头下的石塘内,有的躲到山石根下。当场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打伤十五个。后来敌人把死者弄到边沿处,用汽油烧成灰,装进塑料袋。同时抽调由河北来的一个班日本兵,两个班伪军,将受伤的十五个日伪军护送至河北据点。

等敌人好不容易从大窰战场中冲出来,都已是魂飞胆丧。一路上,提心吊胆地到了清林台的上村头。因为这里地势宽敞,房子整齐,敌人误认为是到了秋林铺。陈文厚告诉敌人,还得往上走八华里才是秋林铺。接近秋林铺村下,敌人分成东西两队,占领村口后,径直向昌宛房县政府各机关驻所窜去。因我军早已做好了防备,敌人没有发现一人一物。所以敌人顺着三条小路向西进犯,又组织一支队伍向北我司法科押犯人的扇子港进发。

这时,我县大队一连早把一排部署在松树岭上,二排部署在扇子港村上边的坡头上,三排部署在古洞安,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当向西去的敌人走到解安岭时,被松树岭上我一排战士发现,朝着敌人开了火。打的敌人焦头烂额,都躲藏起来,谁也不敢露头。去扇子港之敌,搜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刚打算向深山去搜捕群众和粮食物资,被埋伏在山头的二排战士发觉,一阵枪击把敌人打了回去。敌头目看情况不好,就下令各路日伪军都撤回秋林铺村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原路返回,命令全队立即出发,迅速到了青林台村的黄土台片。

我区武工队领导研究,不能让敌人从青林台原路返回,最好把敌人引到杨林水村来,在李家安子打个伏击,进一步打击敌军。关键是怎样才能让敌人过杨林水来。经研究,我方决定待日伪军撤回时,派人去黄土台南坡上打几枪,把敌人引过来。当时就确定让二班作宣传的于克俭带一个战士去完成这个任务。果然,敌人被于克俭二人的枪声引了过来。

早就部署好的武工队立即发动攻击,战士们弹不虚发。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没有掩身之处。

由于我们子弹不足,战斗不能持久。在给敌人一阵痛击之后,主动撤出了战斗。这股进犯的日伪军也未敢追赶,灰溜溜地逃回了各自的据点。

日伪军这次长途侵袭昌宛房县政府驻地用了两天工夫,一无所得。

我们武工队在两次战斗中,共打死日军6人,打伤37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原良乡县五区民兵连追忆

罗玉源

原良乡县五区民兵连始建于1946年。当时我任良乡五区南小区武装大队干事兼民兵指导员。民兵连刚组建时由佛子庄村姜振水担任连长，到1947年由五区武委会教导员兼任连长。民兵连由五区武装部领导，大队长张九清经常亲临指挥。民兵连都是由各村抽调的民兵骨干组成，开展活动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任务紧急时集中，平时分散在各村。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生产战斗两不误。民兵连武器装备主要以手榴弹、地雷为主，刚组建时配有一支冲锋枪，两支三八枪，其余都是七九枪。

民兵连的主要任务是：防奸防特，保境安民，支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带担架队护送伤病员，保卫解放区人民生活生活和解放后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破坏敌人交通设施等工作。这个民兵连在执行以上任务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镇压叛变分子程汉民

1946年，南窖村叛变分子程汉民因对其父程子良被我政府镇压而一直不满。在当地解放后，他伪装积极进步，当上了民兵指导员，并负责村中的剧团和南小区交通站长的工作。他经常到敌占区房山、周口店一带做小买卖，于是利用外出之便，与日伪特务谢景谭勾结在一起，密谋发展特务人员，暗杀我村干部，夺取民兵武装，准备伺机叛变。当程汉民将要叛变时，被村党支部民兵干部察觉，立即报告党支部和五区政府，我独立团迅速将程汉民等叛变分子逮捕。房山县县长兼法院院长谭惠民和县公安局负责人张林亲自对程汉民进行审讯，经核实，程确实犯有策划叛变的罪行，因此决定将程汉民在南窖村处决，其余人员经教育后释放。民兵连在逮捕处决程汉民前后昼夜站岗放哨，并执行了处决任务。

一次阻击战

1947年4月15日，五区民兵连奉命驻防在良乡五区南小区的三合村。这个区就在猫耳山脚下，是良乡公署的南大门。当时，盘踞在房山周口店的敌伪军还乡团通过猫耳山脚下南大岭经常向解放区进犯，实行烧、杀、抢、掠，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报复，扰得解放区人民不得安宁。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保卫人民已取得的胜利果实，这年4月的一天早晨，连长隗丰瑞和我（当时我任民兵连教导员）带领全连从三合村出发，前往长沟峪、周口店一带敌后开展工作。正当我们进入猫耳山脚下南大岭时，与盘踞在房山、周口店的敌伪军和还乡团遭遇。我全连战士当即部署在猫耳山脚下，向敌人发起攻击。当敌人用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向我们轰击时，因为我们武器较差，当时只有一支冲锋枪，两支三八枪，其余都是步枪、手榴弹，就躲到山后隐蔽作战。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时，我们就正面抗击，发挥手榴弹短武器的威力。就这样从早上七点多钟打到将近中午，我们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退了敌人三次规模较大的进攻。由于敌人一直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只得逃回房山、周口店去了。我全连指战员经过奋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抗击，终于取得了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还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夜袭南岗洼火车站

1947年11月,正是寒冬季节。我当时任良乡五区武装部教导员,正在南小区进行征兵工作。这时接到县武装部命令,要我当日晚六点钟以前赶到东庄子村集中,有紧急任务。接通知后,就立即动身按时赶到东庄子村。当时县武装部长晋朝铭给我的任务是:带一个民兵排和一个担架班,在外围作警戒放哨和接收伤员工作,配合大部队夜袭南岗洼火车站。因南岗洼火车站是南北交通要道,要切断敌人的交通要道。任务布置好后,夜间10点钟战斗打响,我军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达到了破坏敌人交通、通讯联络的目的,完成任务后又立即回东庄子村。次日上午在东庄子泥湾大戏楼前召开了庆功大会,我们民兵排和担架班受到了表扬。

良乡五区民兵连从1946年组建到1948年全国解放近三年时间里,为保卫解放区人民的安全,支援前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难忘的一次战斗

谭万林 口述 张 珍 整理

1943年夏秋之交,我在蔚涿宣支队二连任副指导员,那年我21岁。在我分管的任务中,有一项是负责战士的家信审查工作。当时我们连有个战士叫董观,参军不足七八个月时间,平常表现还算正常。他当时写了一封家信,拿到连部请求审查。我审查了这封信觉得很平常,是一封平安家书。说的是离家已经七八个月了,很想念他的父母,他本人身体很好,在牛心山一带整训学习,叫他父母放心。信里要求他父母把家中的一条腰带、一个包袱皮、一支钢笔方便时托人捎来。我看了以后也未在意,一字未动的叫他寄走了。这时候我们连和支队部确实在牛心山村休整。

9月,我们连新派来一位姓蔡的连长。同时支队派我们连去桑干河北部,去开辟地区及征粮等工作任务。连队出发后,来到牛心山北面十几里的一个叫宋家梁的小村子。这里离桑干河还有四五里地。因天黑了部队就在这村驻扎下来,准备第二天拂晓过河。

在宋家梁村驻下后,连队负责人察看了这村的地形,布置了岗哨后,蔡连长通过点名方式,和战士见了面,提了要求。全连休息后,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关系”(即情报员)派人送来情报,说涿鹿县的日本鬼子正准备出来讨伐。涿鹿县城离我们驻地有七八十里路程,我们考虑问题不大,敌人要向什么方向去还不清楚,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严加防备也就可以了。这样,前半夜没事。我半夜(十二点前后)起来第一次出去查哨,走完了各哨位、铺位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回连部将查哨查铺任务交给了三排长隗合龙(解放后曾任房山县水利局副局长)。查完岗哨后回连部我很快就睡着了。在睡梦中我突然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连部我们几个人谁也没言声,立即各自收拾东西,迅速都向原规定的地点集中。我因穿的是一双新鞋不好穿,最后出了屋。当时枪声紧密,我提醒自己要镇静,不能慌。为了不丢东西,我临出屋时还摸黑在炕上摸了一

遍，摸着一个象包袱似的东西，就顺手夹在胳肢窝里了。出屋后又想着伙房的人是否走了？到伙房查看没人了，可是有一大罗烙饼没全拿走，我把烙饼卷了起来，又夹在胳肢窝里。这时我才发现先夹着的那包袱，原来是个枕头。我从伙房出来，又听村东传来的枪声，还听到敌人的喊声。我一直向村西跑出了村。在村西边的道上，见到了三排七班长谭文庚受了重伤，有两个战士架着他艰难的向前挪动。

他的小肚子被敌人的机枪射中了三发子弹，肠子已被打烂。他说他不行了，要求放下他，让我们去追赶部队。当时我十分难过，心如刀搅。因为我俩是亲如兄弟的战友啊！他是房山金鸡台村人，才24岁。他去察南前，是七团的一名班长，共产党员。军区在涑水蓬头村组织各团的射击比赛时，谭文庚荣获特级射手称号。他的事迹全军区都知道。

这时，天已将亮，村西的矮墙外不断的露出敌人的头，枪声更加紧急。看到形势非常严峻，谭文庚急了，他说：“我不成了，咱们不能都死在这里啊！你们赶快走！”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按他要求。给他留下两枚手榴弹和一把刺刀，把他背送到道边下的一片谷子地里。随后迅速地向前面的山头奔去。

我们到了山头，看见蔡连长正指挥机枪班向敌人射击。但敌人的火力更猛烈。这时，我眼看有一个班长被打中了腰部，见他自己跪到一个灌木丛中从挎包中取出救急包给自己包扎伤口。我们两次派战士去抢救他，两名战士都壮烈牺牲了，没有抢救成功。这个班长最后也牺牲在阵地上，他叫任成贵，房山柳林水村人，当年只有21岁。由于敌人向山头越逼越近，我们不得不边打边退，不时也有战士牺牲。其中三排长隗合龙和一排长（山西人，名字记不清了）都受了伤，班长苑丰桐（涿县人）、史维严（宛平西斋堂人）都先后牺牲了。那个写过家信的董观也受了伤。还有一个机枪射手因年龄大跑不动，我将机枪替他扛上。董观由于腿下部受了伤，走的越来越慢，我又把他的枪也扛上。还拉着他一起撤退。过了一条小河后，情况逐渐安定下来。部队在山下一个小村子里集中，检查这次战斗的伤亡情况时，发现全连120多人，死伤15人，全连9位班长牺牲了4位，三个排长伤了2人。连部决定，伤重的都送到涑水根据地医疗。

当天下午，老乡派人来告诉我们：当时共有三百多日本鬼子和七八百汉奸队，对我进行围剿，现在已撤回涿鹿县城。当日晚上，我们又派一个排长带一班人到交火的村子去搜查。发现已牺牲的战友谭文庚和任成贵的遗体，后来由地方区政府负责，为二位烈士买了棺木，安葬在附近的山上。

两天之后，我们召开专门会议，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教训，是对那天夜里收到的情报重视不够，对敌情分析的不具体，战斗部署也存在遗漏。

1943年冬，我们蔚涑宣支队在桑干河北的付家堡村进行整顿学习。这次整顿学习的后期，全支队进行了“坦白”运动。通过运动，我们查出了敌人向我支队派进来的两名奸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写家信的董观。经我审查过的那封家书，实际就是他给日本鬼子送的情报。据他个人交待说：“一条腰带”是暗示让敌人来一千人以上；“包袱皮”暗示采取包围的形式；“一支钢笔”暗示必须携有重武器。听了董观的坦白交待，我悔恨自己太信任他了。另一个奸细是在蔚涑宣支队部中揭发出来的，这个奸细的小名叫大二小。他的任务是那天晚上用信号弹向敌人显示我方所在位置。他携带的信号弹从他的背包中查出。

两个奸细的落网，终于可以告慰那几位在地下长眠的英灵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一场惊险的遭遇

郭守城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48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被国民党征了兵,告别了一家妻儿老小,被送到良乡县一所大院子里换上了国民党军装。随后,与同时被征的二百多人一起被送到北京西郊团管区。一周后坐上“闷子车”(没有窗户的货车),被运到了抚顺,驻扎在东北部的沟邦子。分配入队时,我们都被分到了蒋经国直系207师青年军里。我分配到一连四排一班,当炮兵瞄准手。在那里驻了四个多月,我们连又被调往锦州军营。

到锦州不久,我被抽出来分管全排伙房里的采购任务,只要保证伙房有足够的蔬菜和柴禾就行了(粮油上边统一供应)。这个任务有许多机动时间,带着写有“供给”的蓝色袖章,可以随便出入军营。这个工作为我后来的逃跑提供了方便。干了两个多月,他们觉得我干得很出色,很可靠,便允许我随便到锦州的市場及附近农村去采购,借此机会,我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在青年军里生活很苦,每天三顿饭除去玉米面就是高粱米。半年也吃不到白面,见不到荤菜,起早贪黑军训、积极备战,累得抬不起头来。这时我手里约有七、八万块的东北票,我从家出来一直思念着父母妻儿,总想找机会逃走。

这年阴历十月初的一天早上,司务长让我出去买柴禾,还让带着两个北京籍的兵帮我运柴禾。出逃的机会终于来了。出了军营,我们撒脚就向北跑,到了锦州北门外。我们来到了一个老家乡,说明来意,要求跟他换身老乡衣服穿。这位老乡很害怕,因为那时锦州城内外遍地是兵,村里还有“红眼”(国民党在农村建立的反动武装叫联庄会)监视着村民的活动,不敢跟我换。经我再三恳求又给了他一些流通券,才给我换了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裳。

从老家乡出来,我们又向西南绕,走到锦州西门外一个地坎时,才发现是个碉堡。岗哨盘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做买卖的。”他不信,把我们带进碉堡内审查。“这回可算完了,根据规定凡逃兵逮回去就得枪毙。”我想。

哨兵把我们带到里面,只有一个班长盯岗,排长去队部了,他见我们态度好,一连问我:“干什么的?上哪去?什么地方人?”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看我们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说是做买卖的,他怎么也不信,最后我们只好说了实话。这个班长说他也是北京人,很同情我们,最后就把我们放了,还提醒我们从野地里走。

万万没想到,我们才跑出三里多路,过一个村边遇到了“红眼”——联庄会的四、五个会员赶着马车,身上都带着枪,从老远向我们喊话:“站住,干什么的?”我们没敢停下赶紧跑起来。见我们没停下,“红眼”就向我们开了枪,我们赶紧趴在一座坟圈子里,不敢动了。他们立即追过来,“举起手来,不要动!”我们三人乖乖被擒了。他们把我们牢牢地捆上,推到了马车上,带回村公所,交给了保长。

保长见我们三个20来岁的小伙儿,长得挺精神,又挺忠厚,不象是坏人,就叫手下把绳子解开。等我站起身,保长上前一打量我,我跟他对视了一下,他突然惊奇地叫起来:“嘿嘿,这不是老郭吗?你这是……”真是万幸,没想到我又遇到了一位熟人。因为我采购蔬菜、柴禾时到过这村,跟这位姓于的保长接触过几次。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他使个眼色,偷偷告诉他:“我们是逃兵,家里有老有小,实在想家。求你帮帮我们吧!”

天黑了之后,于保长把我们领进他家里,让他妻子给我们做了顿小米饭、疙瘩汤和熬白菜。饭后那两个弟兄睡去,我留在于保长的屋里,跟他聊了一会儿。请他帮我买一套好衣服,把自己装成商人,另外设法找

个良民证。于保长答应后，和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一顶白猫皮帽子，一件蓝地红黑暗格的大褂，还有一双新千层底布鞋。穿上后，我全然成了一个闯关东的客商。最后他把刚刚去世的哥哥的良民证给了我，我揉搓揉搓，名字和照片已看不大清楚。带在身上备用。

第二天一早，他把我们送出村外，给我们指路：“再走二、三里地，便是大清河，过了桥就是火车站。”千恩万谢一番后，我们告辞了他。

过了大清河的桥，我们来到锦州火车南站。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正要进站去买票，突然，发现了我们部队的排长、班长带着五个兵，正在门口盯着进站的人。我的心“咯噔”一下，他们是抓我们的。如果被抓回去，必死无疑，绝不能叫他们逮着。我当时跟两个同伴说“咱们自讨方便吧，谁被逮回去谁认倒霉。”

在车站我们三人分手后，我迅速跑到站外，钻过一道铁丝网，进入一个小门。见一个拿信号灯的走过来，就上前跟他说：“兄弟，我要去山海关，等车开过来求你帮我一把，”说完我掏出50元东北流通票塞进他的手中，提灯人愣了一下，同意了。不一会儿火车出站了，火车吐着黑烟缓缓行进，乘着还未加速，提灯人说：“顺着车跑几步见门就上！”我按他说的扒上了中间的一节，手把着门边，脚登上一层台阶，再向上登去很困难，有一个装满粮食的麻袋挡在门口，我费尽力气才钻进去。

进车厢后，我发现里边人很多，都是逃荒逃难的人。我想我必须藏起来。紧挨我的是个背行里卷的老头，我跟他商量好，借他的破棉被蒙起了头，一路上提心吊胆，终于到了山海关火车站，但没敢立刻出站台。

第二天天刚亮，我蒙上脸来到火车站门口，准备再搭火车回家。又发现了我们的班长和两名战士在站台巡视、搜索。我心想宁被火车轧死也不能让他们逮回去，我决定等下趟车再走，便从车站外顺着铁路溜进站台。一位铁路警前采阻拦，我说：“兄弟行个好吧！”说着我又塞给他50元东北票，“等车开动时你帮我扒上火车”，这次没等火车开动，巡警就把我推上一辆货车里，到了秦皇岛。没想到下车后我被宪兵抓住，他把我带进站房里审问。审了半天，没发现什么问题，才让我补了车票，把我放了。

逃出之后我的心一直被恐惧和死亡的阴影占据着，不知道在哪儿会被逮回去枪毙。等我上了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

从前门火车站下了车，往大栅栏口走，在路口正好碰上我们村的老乡在京开成衣铺的张明。我们说了几句话，他就把我带到铺子里，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良乡。不料上车时又遇到了麻烦。一个巡警把我拦下，不让上车，说我是坏人，正在盘问我时，幸好遇见我村老乡张德力，他向警察证明：“他是我们村的农民，不是坏人，你放了他吧！”警察才把我放下。于是，我就和张德力同坐一辆“闷子车”回到了良乡。

我从1948年3月征兵到当年10月底从青年军逃出，三天三夜的逃亡，闯过一道道险关，处处充满了惊险，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小十三里村。我的出现让全家人都惊呆了，一家人都高兴得流着热泪，抱成一团。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张晋龄脱险记

唐占忠

张晋龄自 1943 年冬奉上级党委派遣任涿、良、宛联合县五区区委书记兼武卫会政委到窑上(今窑上村)一带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起,直到 1948 年底不幸因叛徒告密被捕而壮烈牺牲。其间,他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扎根在贫苦百姓之中,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如今事隔五十余载,但他的事迹一直被窑上地区人民永远牢记着。

一

1944 年,全国抗日形势好转,我游击区和解放区逐渐扩大。但是,敌人仍做着垂死挣扎。张晋龄领导着五区武工队利用各种时机同敌人展开斗争。

7 月的一天傍晚,张晋龄从鲍庄村搞减租减息工作回到韩营村武卫会主任刘国珍家里。刚喝几口水,就听见村里有人喊:“敌人来了!”接着又听到邻居张忠家有敌人在敲门。张晋龄感到形势危急,迅速越过东墙逃到孙永伦家院里。这时便听到刘国珍家也传来砸门声。敌人在挨户搜查,再越墙跑来不及了。于是灵机一动,赶紧对不知所措的孙永伦说:“您别怕,站在院里别动,我去给敌人开门。”说完,他迅速走到门楼前,果然这时敌人敲门了。他轻轻拉开门栓,门猛地被推开闪向两边,张晋龄被一扇门掩住。几个敌人冲孙永伦扑去。就在此时,张晋龄转身轻捷地从门后闪出院外。因怕孙永伦遭到不测必须把敌人引开。他甩手向院里敌人开了枪,一人被打死,其他人都吓的趴在地上。当敌人转过向来时,张晋龄已飞快地冲出村外,进了玉米地。此时天色已晚,敌人追到村东头,面对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又怕受到八路军的埋伏,只好向玉米地里乱放一阵枪之后撤走了。

二

1944 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深夜,张晋龄从涿县里渠村开展完工作。冒着大雪回到韩营村堡垒户张珍家。不料,张晋龄的行动已被里渠村地主商本斋发现并向敌人告了密。涿县剿共大队第七小队队长李凤林获悉后喜出望外,认为活捉“张聋子”(张晋龄绰号),是天赐良机。因此,第二天刚蒙蒙亮,李凤林便带着队伍扑向了韩营村。当李凤林一伙刚闯到张珍家大门口时,正被出来扫雪的张珍妻子发现,赶紧向屋里大喊了一声:“不好,来人了!”正在屋里洗脸的张晋龄右手握枪,左手提起一个热水壶冲出屋外。这时,敌人已冲进院子。李凤林对手下说:“不许开枪,捉活的!”张晋龄临危不惧,急忙将壶扔在雪地里,热水着雪顿时雾气腾腾。张晋龄乘机冲出西角门,飞快跳到房后柴禾垛前,扒开掩蔽体钻进了地道。敌人也随着雪地上的脚印追到柴禾垛前,围着地道口干打转不敢下去。李凤林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人说:“把柴禾垛点了,朝地道里开枪!”就在这时张晋龄已安全地从地道另一出口逃出村外,躲过了敌人的一场追捕。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抢占胜利果实。窑上地区的逃亡地主、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配合国民党蠢蠢欲动。

张晋龄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1946年底的一天夜里，他和武工队副队长田连仲到两间房村撒传单，写标语，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鼓舞人民革命斗志。两人完成了任务走到村东头，因田连仲是大北柳村人，家离此不远，想借机回家看看。张晋龄同意后并提醒他说：“当前形势危急，家里没事别久留，到韩营村张珍家找我。”

田连仲走后，张晋龄独身走进路北土地庙打算歇会再走。当他把背包放在地上刚坐下片刻，就听到庙后有人说：“这村刘歪嘴送的情报还挺准，咱们为啥不在他们写标语时动手呢？”一个胸有成竹地说：“等着吧，待会他俩要是睡着了我们冲进去生擒活捉岂不更好！”又一个说：“还是游队长有谋略神机妙算呀！”张晋龄知道是碰上了敌人。怎么办？张晋龄听出这是住肖场据点的游申会还乡团。他灵机一动，紧握手中枪走出庙门口故意高声喊道：“老田，先别睡，把烟荷包找出来，咱俩抽两袋，这里挺安全，等天亮再走。”说完，他快步离开小庙钻进东边高粱地。庙后的敌人听了这番话心里更踏实了。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见回来，敌人沉不住气了。游申会心想即使张聋子跑了还有田连仲呢，那也没白来，立即命令手下人开始行动，敌人像饿狼冲进庙里，只见地上有个背包，连田连仲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四

1946年9月，根据冀中军分区党委指示，张晋龄所在武工队暂时撤到固安县以东地区休整待命。此时，张晋龄决定将妻子和儿子送回雄县老家。事先他和副队长房文权对归途作了侦察，认为只有永定河大堤上是冒险可行之路。因为入秋以来阴雨连绵，乡间道路水漫泥泞，车辆难以行走，但是永定河大堤固安县北边北村大桥有敌人的岗楼。每天夜里有三人、白天有一人持枪死守，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如同虎口。然而，张晋龄考虑越是最危险处越是最安全的地方，决定试一次。

一天上午，张晋龄化装成农民，赶上拉着家着的马车从韩营村起程上了永定河大堤，走到北村大桥岗楼缓步趋车，站岗的敌人道：“停车检查！”张晋龄笑着说：“送老婆回娘家车上没啥。”站岗的贴近车厢搜查突然惊叫：“啊呀，车上有枪”，张晋龄手疾眼快，从腰间拔出匕首捅进敌人后心窝，随后敏捷地跨上车辕，抡起开车棍朝马屁股上狠打两下。马车象箭离弦一般闯过了大桥。

当岗楼里玩麻将的守敌知道时，奔驰的马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一张镇压反革命的布告

宋 湘

《房山区志》第27页载：“(1940年)11月13-17日，房良一区庄户台、堂上、宝水、龙门台等村部分干部和党员于日伪奸特胁迫下叛变，将八路军县、区、村干部46人抓捕，并将其中20人杀害。”是为房山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庄户台事变”。“(同年)12月13日，八路军九团二营攻克叛匪盘踞的天险三角城，房良一区霞云岭地区反动武装彻底溃灭”。

1946年7月，“庄户台事变”祸首之一李满存被房山县政府捕获，7月23日房山县政府特刑庭(县长兼司法官谭惠民，书记员罗诚之)判处其死刑。上报后，察哈尔省政府于1946年9月22日核准死刑。房山县政府将李满存执行死刑。

现将察哈尔省政府《批复》及房山县政府《布告》附后。

察哈尔省政府^① 复

特法字第115号

(为复准判汉奸犯李满存死刑由)

据报汉奸犯李满存案卷判已悉。查被告自叛国投敌之后，竟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屡次带领敌人捕杀干部，并曾造成九区惨案，残杀区村干部20余人，为群众所痛恨，原县判决中处死刑至为无当，准即照原判执行。

此复

谭县长

主席 张 苏

院长 阮慕韩

中华民国35年9月22日^②

为布告事

汉奸犯李满存于民国29年秋协同叛徒王万江携大枪2支、子弹1箱投敌叛变祖国，受汉奸杨天沛之指使，组织九区(现在一区)^③二次事变，鼓动敌伪围剿抗日政权九区公所(庄户台)，当有县区干部40余人死亡^④，后即盘踞三角城四出抢掠。同年11月间，我军收复三角城，被告又追随至南窖敌伪据点去。腊月间引敌捕杀我村干部谢景深、王兴云、于进深三人。30年正月受敌主使回家当坐探特务，供给敌伪情报及助敌诈索王水等款870元、玉米32石有余，并在10月间杀害隗和仁等。经死难烈属等控诉在案。

以上事实已经该犯供述承认不讳。视此汉奸叛徒毫无民族气节，忠实事敌，甘心出卖国家民族之利益，破坏抗战，杀害抗日有功之干部，索取民财肥己，其作恶行为已达极点，合依修正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第1、2、7三款，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291条各规定^⑤，判决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并呈请察哈尔省高等法院批准，定于本月□□日^⑥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此布

计开

汉奸犯李满存，男，年41岁，本县一区上石堡村人，农。

县长 谭

注：

① 当时，房山县(解放区人民政权)属察哈尔省管辖。

② “中华民国35年”即1946年。

③ 开辟根据地以前，霞云岭地区属房山县九区，建立根据地以后霞云岭地区先后划为房良联合县一区、房山县一区。故一些史料对庄户台事变有的称“一区惨案”，有的称“九区惨案”。

④ “当有县区干部40余人死亡”，显系“当有县区干部40余人被捕，20人被敌杀害”之笔误；按，案卷内其他材料亦证实“20余人被敌杀害”，故察哈尔省政府批复中亦认定“残杀区村干部20余人”。这与后来房山县(区)史志部门反复调查核实、《区志》认定的“46人被捕，其中20人遇害”是一致的。

⑤ 1946年尚未建立新中国，解放区人民政权尚承认并执行国民党政府之法律，《布告》引用之《惩治汉奸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当是中华民国之法律。

⑥ 《布告》底稿未填写执行死刑日期，据情况判断当于1946年9月22日以后至10月初。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良乡县的第一次团代会

刘振祥

1950年春，良乡县召开了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当时我正在河北良中第二班初中三年级学习，恰逢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作为学生团员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团代会。这次大会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些事虽时隔五十余年，但仍记忆犹新，现将我参加会议的经过，重点记述如下：

代表大会在原良乡县人民政府小礼堂(即解放前县衙门的中堂)召开，大会由团县委书记王秀恒主持并作报告。报告主要总结全县团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足之处，以及今后团的工作意见。大会报告结束后，进行分组讨论。我参加的是学校讨论组，地点在良乡一小会议室。小组成员有董昭、郝建华、何维敏等七、八个人。其他小组多在县直机关。区团委干部韩梦进、杜景华、谢绍蕴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会选举由大会主席团酝酿提名通过候选人名单。选举时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按候选人数发给每个参选代表同等数量的豆子。代表们同意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一个豆子，不准多放。最后分别数清每位候选人的得票(豆子)数，便产生了新的县团委成员。选举结果：王秀恒再次当选为良乡县团委书记。

大会用餐在良乡城内大角十字路口东南角，即现在的商店位置，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四个人围在一起露天吃饭，但这毕竟是县级的代表会，伙食搞得非常好，白米、白面、肉管够吃，这比我们学生每月60斤小米入伙，每天窝头咸菜小米饭，熟菜只是蒜瓣熬白菜要好多了。

这次大会开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与会的青年代表都有颗火热的心。大会开始前，到处是歌声，有的还扭起秧歌。各个区各个单位的啦啦队此起彼伏。良中团总支书记董昭擅长歌舞(原名董富贵，河北怀来人，

与董存瑞是同乡,1946年张家口解放上中学时便参加了革命,后到北岳区第三中学作团的工作)成核心人物,像磁石一样把与会青年紧紧的吸住。他教大家当时正流行的一些歌曲、歌剧选段。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青年问这问那,有说有笑。董照很快成为了与会青年的知心朋友,被提名为县团委成员的候选人,顺利的被选为新一届县团委委员。

这次大会,通过报告学习讨论总结,代表们进一步提高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青年团是党的助手、预备队、后备军,因此必须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服从党的领导,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二是青年团组织是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既要坚持先进性,又要坚持联系群众。在实践中既不能拉夫凑数,失去团组织的先进性;也不能高不可攀,搞关门主义,失去群众性。

三是青年团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团结教育带领广大青年一起为党的事业、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而努力奋斗。

大会结束后,我返回学校,将会议精神全面地向校领导做了汇报。良乡中学认真传达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从而使学校团的工作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明确了团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更加自觉的贯彻执行党在学校的政策和各项措施,更好的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并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1950年7月1日,褚慧兰、朱春起、徐淑珍、杨永安和我共五名团干部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也出现了积极发展青年学生加入团组织的新气象。特别在中二、师二两个毕业班,90%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校评选出的模范干部中,几乎全部都是党团员。良乡中学逐渐成为政治空气浓、党团员比例大、教师队伍力量强,在全河北省有名的重点学校。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沙广禄阿訇在抗日战争中

张宝贵

沙广禄阿訇是房山区窦店清真寺第一任阿訇。已八十五岁高龄了,现任职于牛街清真寺。

沙广禄阿訇原籍山东德州平原县。早在1934年于上海学习阿文,学习古兰经,学习伊斯兰教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毕业后就任于上海小沙渡清真寺。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开始在家投入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因任职阿訇,他利用宗教职业工作者的身份,为我党作了许多工作,留名于家乡。

1939年间,我党地下工作者王殿阁、白安良等四人,在禹城县进行抗战工作。沙广禄阿訇以清真寺作掩护,让他们住在寺院里,保护他们,支持帮助他们在禹城坚持抗战斗争。

1939年10月,山东鲁西抗日大队的一位回族战士米德昌,在同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因战事紧张,鲁西大队彭营长请沙广禄阿訇帮助安葬烈士遗体。沙阿訇接营长信后,毅然接受任务,立即在禹城辛寨街组织了韩作兴、韩希明、韩希城、韩作臣、韩作生五位青年,当夜行动,偷偷地从寨外三里多路的战地抬回烈士遗体,换洗干净。又亲身带领五位青年,抬着“买提”(回族称送死者去墓地)艰难的行走六十多里路,一夜里巧妙地绕过一道日军据点的封锁和保安团队的哨卡,把烈士遗体在他的家乡沙庄米家墓地安葬了。这位烈

士的父母现在青海省邮局工作，其胞弟米德海还在原籍工作。

在反击日寇大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沙广禄阿訇在清真寺里多次掩护了八路军战士，并以阿訇的身份为我党作工作。一九四〇年四月的一个夜里，沙阿訇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一位八路军战士要求到清真寺院躲一躲。他立即把这位战士让进屋，急忙找出自己的便服让战士穿好，并告诉他，如来人搜查，你就说“我是海里发”（回称阿訇的学生）。结果，这位战士应付过去了日寇的四天搜捕，安全的返回部队。

1940年底，沙广禄阿訇到山东平原县二区李庄清真寺任职。正是战争进入艰难的一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抗战到底，团结到底”的号召。沙阿訇到平原县二区李庄任职后，坚决响应我党号召，继续坚定地配合我党我军进行抗战斗争。这一年冬天，山东平原县抗日大队李玉池主任带着二名战士，要以清真寺作掩护开展对敌斗争。沙阿訇不但把他们安排好，而且又受李玉池同志之托，以阿訇的身份去作李玉池李家李少亭的工作，几次对李少亭讲要有民族气节，不要当汉奸。最后终于使李少亭答应在敌人内部为抗日作些工作。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一年，我八路军鲁西大队十九团团团长马立胡的弟弟马立志，在恩县被日本鬼子抓住了。沙阿訇得知这个消息后，到德州找了李少亭。由于李的帮忙，与日军司令日酋朽普谈了，又写“保状”，第二天，马立志就放出来了。

沙阿訇还从死神下解救过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那是1942年2月间。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在平原县沙庄子进行血腥屠杀。把整个庄子荡平了，抓住了沙振安、沙志学、马志水和一个绰号叫李大麻子的四位同志。当日夜里，十六个乡老到清真寺找沙阿訇、恳求营救。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急行十五里路，赶到平原县，到处奔走周旋，又用二百元伪币收买了还乡团的几个狗腿子，把四位同志救了出来。现在，这四位同志还都健康的生活着。

沙广禄阿訇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是令人钦佩的。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高兴地说，深深感谢党对自己的信任、激励和鞭策。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扩军遇险记

赵国荣

1945年秋，区里根据各村大小、人口多少，确定各村扩军任务。一天，区里决定我和一个姓史的同志到良乡苏庄村组织扩军工作，一声令下，我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到了良乡苏庄村。

到村后首先找到伪保长李森、副保长阎照谭，说明我们来的任务就是扩军，苏庄村应扩军13人，任务重、时间紧，今天夜里就要完成任务，13人和我们一起走。两个伪保长暗自商量了一番，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不行，最早也得第二天晚上。“明天晚上你们来领兵好了，一定交你们人，放心吧，没有事！”我们又叮问，明天晚上是否准完成，李森说坚决完成。

第二天晚上，我和史同志又到苏庄村找李森、阎照谭问兵扩好了没有。李森说没问题，就等来接人了。他对阎照谭说：“你给他们二位做点饭吃，我去集中人。”他走后，我们说不吃饭，人来了，我们马上就走。阎已派人把饭菜、烟酒摆到桌上了，让我们慢慢吃着别着急。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人回来。我

就有怀疑，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一定有问题。阎照谭说：“你们快吃吧！”史同志又吃又喝不想别的，当时我说你别喝酒，赶快想办法把兵领走，不然，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在这里。为了以防万一，我来到门外观察情况，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村东头有人喊了一声：“干什么的？”这时，我马上回到屋里，对史同志说：“不好了，有情况，咱们赶快从后门跑出去！”我对站在一边的阎照谭说：“咱们一起走，你不能喊，如果你暴露了情况，我就毙了你。”我们刚跑出后门不远，就听着响了几枪，顺着枪的声音，知道敌人包围了我们吃饭的那个屋子，并喊着“捉活的。”目的要活捉我们。我和史同志带着阎照谭跑到公主坟保公所落下脚，问阎照谭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我们又问：“你能不知道吗？你再想想，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他吱吱唔唔的又想说又不想说。我们说：“你说清了对你无关，如果你知道情况不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才交待是李森说我们来了先让我们吃饭、喝酒，稳住我们，然后去叫良乡的伪军来抓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是进了老虎洞，幸亏我们有十足的思想准备，识破敌人的鬼花招，不然会被他们“吃”进去的。看来，他们故意让我们第二天晚上来，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保公所，我们对阎照谭进行政策教育后，根据形势需要，释放了他。由于情况变化，扩军工作也只得先停下来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高庄围歼战

赵玉文

1939年春，经地下党由北京送来了一则有关敌情的消息：有五百多名日军要偷袭西域寺。肖克部队接到这则消息后立即部署了围歼这支日军的作战计划。

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肖克便率指挥员们在前后石门、下庄、水头、岩上等远近十余里的地方察看地势，选择在高庄这个低洼的盆地歼灭进犯之敌。

根据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肖克将几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距离高庄村十里左右的沟港山峦和要道上，单等敌人入网，一举全歼。

次日，哨兵传来消息，日军已到南正。随着五百多名鬼子的临近，肖克命各主力团进入战地，并指示只要指挥枪一打响，就要抢占高庄北坡、东坡和小港及石窝的西坡，与此同时还派两个营埋伏在由高庄到前石门之间的三里地的地段上；严阵以待！

五百多名鬼子进了石门沟之后，终于爬进了高庄、前石门之间的埋伏圈。肖克同志在高庄村西北的山头上见敌人已进入了埋伏区，便鸣枪下令出击。

预先埋伏的两营战士，首当其冲在近二里地的地段上勇敢地冲向敌人。敌人由于经不起这突然的袭击，似惊弓之鸟乱作一团，一边乱跑、一边乱打枪。

在二里多地长的道沟里，坡头上肉搏战进行得非常激烈，我军战士有的用嘴咬下了鬼子耳朵，有的战士虽已把刺刀刺进了鬼子的胸膛，但自己也被鬼子从背后刺进了一刀，有的战士同鬼子搂在一起由坡上滚到道沟里，也有的战士在身受重伤之后仍躺在地上瞄准射击……

在激烈的肉搏战时，各主力团的尖刀连队，由山岗、河岔、田野象旋风一样刮进战场。敌人已大部被歼，

剩下的有的跪地求饶，有的举手投降，余下的不到百十个敌人夺路逃进了高庄村，想依靠民房进行顽抗。有的鬼子从民房中掏个洞，刚把枪伸出洞外，一枪未放，便被战士们把枪给拽了出来，还有的鬼子刚爬到房顶，便被击毙了……最后只有几个鬼子跑掉了。

至此高庄围歼战，在近两个小时的猛烈战斗中，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拔掉北白岱据点

赵玉文

1942年，随着反扫荡的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游击战争政工工作大规模地在敌占区开展。同时，随着敌人的顽抗，斗争更为艰苦。

为打击敌人和扩大根据地，必须到平原丘陵地区开展工作，可张坊镇却被日伪军控制着。张坊沟和龙洼沟两条出山要道，均不能通行。因此，在张坊沟里的党政干部，只能绕过张坊镇，从大峪沟或经水头、蔡家口、北白岱出来进行工作。

不久，日军发现了这一情况，便在北白岱又设了一个据点，以阻止我军政人员的出入。因此，必须拔掉这颗钉子。

麦收季节到了，经了解据点里的伪军为了适应北白岱乡亲们出村收麦的需要，要在每天早晨天一亮，便打开村北的栅栏门，放乡亲们出入村。于是我县游击大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消灭盘踞在北白岱的伪军。

一天午夜后，县游击大队悄悄地运动到北白岱村北，并沿着麦垅爬到村口外的麦地里，单等天亮敌人开栅栏放行时间的到来。

天亮栅栏开了，收麦的乡亲们出了村。过了一会儿，游击队员们便跟着驮麦回村的乡亲大大方方地来到了守栅栏门的伪军岗哨面前，突然拔出短枪指着敌岗哨的头，并缴下了岗哨的枪。部队在接到行动信号之后，迅速鱼贯而入，并悄悄潜伏在敌据点周围。突然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就象飞来的天兵，迅速冲入敌据点，在喊杀声中根据事前的布置冲进敌宿舍、敌指挥部和敌了望的岗楼，切断了电话，大部分战士则冲向了操场，因为此时，四、五十名伪军正作徒手晨操。在战士们缴枪不杀的威慑声中，几十名伪军都吓傻了，有的吓得蹲在地上，或躺在地上，甚至是跳到据点的壕沟里，摔青了胳膊，摔折了腿，简直是乱作一团，出尽了洋相。只二十多分钟，几十名曾嚣张一时的伪军便当了俘虏，并在县大队战士们的押解下走出了北白岱据点，然后烧掉了敌人的指挥所、宿舍和岗楼。

当塔照村的鬼子发现火光后，认为是据点失火了，等他们知道据点是被游击队给烧掉了，我县游击大队早已押着俘虏，带着缴来的枪支和其他战利品回到了驻地。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在房山矿区最后一仗

潘惠楼

1945年7月25日,晋察冀《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我军收复房山矿区》的消息。文中记载:“我十一分区部队对敌之房山西北重大矿区,发动有力攻势,自7月11日至16日相继攻克敌之南窖、长操、西安子、北安子、花港,逼至红煤厂、长沟峪、岭南九个据点,并击退敌300余人的两次增援,将该矿区完全攻克。除该矿区全部机器、钢铁为我缴获外,综合五天战果如下:毙伤敌伪50余人,生俘伪房山县保安联队第四中队长张泽新以下官兵73人,缴获平射炮一门,榴弹筒三个,长短枪88支,子弹2800余发及其它军用品。《解放日报》对这则简讯还加了编者按说:“南窖、北窖、东安子、西安子等地是北平产煤盛地,有大批机器工厂开采,规模之大,产量之多,仅稍次于门头沟矿区。1939年及1940年曾两次为我攻克,后敌人重新用重兵占去,直到如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45年7月,我七团在军分区司令员肖文玖、政委李水清的指挥下,从宛平翻山进入房山县境内,首先采取挖交通沟、运柴草火攻的办法迫使一个中队的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将日军工事坚固的长操据点攻下。进而乘胜逼进南窖据点。南窖一带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建有以机械动力运煤的空中高线线路及站台,日本侵略军一直把这里当做军事重地,不但在南窖村建立有中心炮楼,还围绕南窖周围村庄的花港、北窖、安子建有炮楼。在南窖中心炮楼的附近建有小炮楼,以利互相支援。由于南窖中心炮楼十分坚固,所处地点易守难攻,我军为减少伤亡,采取了“围而不打”、“围点打援”、“扫清外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首先扫除了南窖沟口花港的据点,又造声势以重兵吓跑了北窖据点的敌人,再派兵攻下了安子岗楼。这样就控制了南窖进出的道路,截住了沿大石河谷赶来增援的敌人。在包围三天后敌仍不投降,于夜间又拆除了中心岗楼旁边小岗楼,断绝了中心岗楼的水源。困住敌人,迫其就范,促其缴械,使日军再也不能负隅顽抗,只好窜出来突围。我军则趁势进攻,围追堵截,痛歼逃敌。攻占南窖据点后,我军又乘胜前进,连克河北、河南、长沟峪、孤山口之敌人据点,并于7月17日一鼓作气攻下房山县城。

这场战斗收复了沦陷的房山矿区,彻底结束了日本侵占房山矿区的历史,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抗战二三事

彭德元 口述 张 珍 韩秀琴 整理

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门头沟太子墓村。做为一名身受其害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日本鬼子进我们村时，残暴凶狠，到处抓人、杀人、烧房，弄得老百姓无家可归。附近几个村的老百姓，大部分逃到离鬼子据点稍远一点的山神庙村。山神庙村的穷苦百姓增多了，急需加强对群众抗日斗争的领导。在昌宛县一区区长刘天德同志的主持下，建立了抗日组织，我当时被选为山神庙村的村长，兼任地下交通联络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开展抗日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搞坚壁清野，我们还发动群众做军鞋，保护和帮助县、区干部开展抗日工作，坚持练武、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监视日本鬼子的活动。发现敌情，立即报送到区、县抗联组织。全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非常高涨，我村成了昌宛县一区抗击日本鬼子的坚强阵地。

正当我们村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42年区税务所长陈东升叛变投敌了，供出我是抗日骨干，我被抓到敌人据点，硬逼我交出由我管理的县、区政府的文件和军用物资。因为我不说，日本鬼子恶狠狠地毒打我，往我嘴里灌凉水，在我肚皮上点火烧我。打得我皮肉破裂十几处，血淋淋的，肚皮已烧破，小便被烧焦了。就是这样，我收藏的六千双军鞋和一批县、区委文件，还有六支枪，一个字也没向敌人吐露。这年我廿五岁，家有老母、妻子，我的儿子才一岁。我当时想，不管我的家人受多大苦，我就是死了也决不向鬼子投降，决不叛党。日本鬼子看我太顽固了，因此，决定活埋我。这个消息，被给日本当博役（勤杂工）的小孩李金齐知道后告诉了我。我一听就急了。这天旧历六月十三日，正下大雨，我乘日本中午集中吃饭的时间，大雨下得天昏地暗，我光着身子，借着下雨地滑，钻出日本据点的六道铁丝网护栏，胳膊、脊背、腿、脚都被铁丝网划了许多口子，鲜血直流。我爬出铁丝网，跑到了我丈人姑家没找到人，又跑到山坡上的白岩套。由于天凉，日本人又往我肚子里灌了许多凉水，我就吐开了，眼睛看不清东西。我挣扎着从白岩套往山梁上爬，到山顶上天快黑了，看山下没动静。后来我才知道日本追我没往山上追，而是去了山神庙村，把全村的房全烧了，所有东西全砸了。这时，我吐的好些了，看到山下有个破屋冒烟，想那里准有人，我小心的慢慢往山下走。这时屋里边的人看到了我，原来是我村的穷苦人高永龙。他给我找了衣服，拿出一双破旧鞋，把我送到一区区长的所在地——擦擦石。在区政府没找到人，又找到我本家爷爷彭兴瑞，他给我弄了小米粥，因嘴肿得厉害，没吃下多少。又让我老叔用大花篓把我背到大山沟的烂坨子，找到了区委崔乐春、刘志平和县大队长彭福松等领导。他们一看我还活着，高兴极了。他们把我送到昌宛县政府的所在地椴叶台。他们告诉我，我母亲、妻子、儿子全在县政府。经县领导决定，每人每月供给公粮18斤。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荣誉和优厚待遇了。我在县政府养伤，领导和同志到处找羊肉等食品，给我增加营养，伤口日渐好转，健康也恢复得很快。

在昌宛县政府休养了四、五个月，伤口基本痊愈，体力和精神也都恢复正常。这时，县长彭成，也是我的家叔，找我谈话，还让我回山神庙工作。这次回去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领导山神庙村的群众抗日斗争，组织生产支援前线，巩固和保卫解放区；另一方面，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通过一个高丽人，做瓦解日本鬼子军的工作。同时，县政府让我把原名彭德会改叫彭德元，以掩人耳目。彭成跟我谈话以后，昌宛县公安局局长李茂田同志，把一个高丽人（会说朝鲜话和日本话）带来了，他叫张平山，任县民政局副局长，让我带领他，通过他去做为日本鬼子卖苦力的朝鲜人的瓦解工作。日本在门头沟建立据点后，要开山路、打山洞，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朝鲜人。我和张平山合作得很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成功的做了四次劝降、瓦解敌军的工作，共争取过来朝鲜人九十多人，还得到手枪三支，大枪两支，受到县、区委的多次表扬。

我兼任山神庙民兵队队长，经常带队寻找机会打击日本侵略者，被县、区誉为抗日模范队。1941年的夏天，日本鬼子进驻雁翅村后，到处骚扰老百姓，特别是四个日本军官，每天都骑着大洋马，从雁翅村出发，进山寻查，还有两个跟马的日本兵，他们六个人每天从我们侦查圈内经过，决定想法消灭他。我们发现这六个日本出来总是走山腰栈道，道路弯曲，我方很好隐蔽，栈道下边是十几米深的山崖，山崖下是永定河。我们觉得这个有利地形，消灭敌人是绝对有把握的。于是，一天我和另外三个民兵隐藏在栈道的拐弯处，等六

个日本鬼子走到我们跟前时，我们突然开枪射击，鬼子全部被击毙，倒在山崖下。我们缴获了四匹战马，四支手枪，两架军事望远镜，全部交到县大队。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从这以后，据点里的鬼子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韩秀琴系区政协三、四届委员，原区畜牧水产局书记

抗日民谣(一)

刘广月 口述 栗景鸿 整理

八大劝

一劝我的爹，听我把话说：

我要当兵走，不要把我想，
为国为民人人都有责。

二劝我的娘，听我把话讲
我要当兵去，不要把我想，
为国为民人人都应当。

三劝我的嫂，听我把话学(xiáo)
我要当兵走，家庭要搞好，
不要闹吵吵，我回来感谢大嫂嫂。

四劝我的妹，顶(比)我小两岁，
我要当兵走，你要参加游击队，
站岗放哨保护游击队，
你这才做得对。

五劝我的哥，听我把话说：
我要当兵走，在家好做活。
保着咱父母，对我负点责。
我要是回来，感谢大哥哥。

六劝我的妻，听我把话提：
我要当兵走，不要哭啼啼。
我要是立了功，功劳也有你的(di)。

七劝我丈夫，丈夫你细听：

你要是参了军，立场要坚定。
革命革到底，别当逃亡兵。
为国为民牺牲也光荣，
回来名誉真好听。
八劝我村长，听我把话讲：
拥军优属牢牢记心上，
经常去串门，经常搞家访，
别让家属泪汪汪。

妈妈别担忧

妈妈放宽心，妈妈别担忧。
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
门前栽棵小桃树，转眼过墙头。
桃树结了桃，回来把桃收。
妈妈别担忧，妈妈别担忧。

鬼子修据点

鬼子修据点，四外铁丝圈，
邻近的房子都修成大河滩。
百姓没地方住，山坡盖草铺。
十家子、八家子，都在一堆儿住。
地方也不大，住也住不下，
外面下大雨，屋里就抓瞎。
先立维持会，后立宪兵队，
七八十岁老太太，也得给鬼子把煤背。
背煤鬼子烧，百姓烧柴草，
烧柴草，净冒烟，两眼泪不干，
指望着八路军，赶快来救咱。
鬼子把款要，没有“联合票”，
卖粮食，卖老婆，也得把款交，
亲眼看见的，“白箍子”太无理，
欺负老百姓，真叫人生气。

火烧王家山

兄弟姐妹细听我言，
十二月十二号那一天，

鬼子来到王家山。
来到王家山怎么样，
兄弟姐妹细听我言。
他假装开大会，
把百姓来欺骗。
四十多人圈在一个屋子里，
百姓好象装上坛。
首头赖野把话讲，（首头：指日军指挥官）
站岗放哨是何人，
对我说个真，
不说命归阴。
一家男女齐心都说不知道，
不能把瞎话倒。
首头子把脸翻，
把机枪支门前，
就要把房点。
屋里叫苦连天，
青年妇女烧死有多少，
剩下的情报员，
死的多可怜，
人人挂心间。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抗日民谣(二)

傅洪珍 整理

—

人心涣散，土硬石坚，
刺刀加皮鞭，终日泪连连。
饭水难咽，呼地嚎天。
精疲力尽，难以回家园……

二

谁爱挖这毁民壕？保长抓我怎么逃！
为啥受这苦？国民党南逃，

毁民壕，挡老八，我看是白挖。
老八神通大，天井都不怕……
只盼老八到，统统揍死他！
揍死他！揍死他！哈哈！哈哈！

这是1941年至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修筑房山至涑水的封锁壕时，民伙的口头创作。这条大壕，全长35公里，动土约一百余万方。北起周口店南入涑水境内。为修筑这条封锁壕，日军几乎征调了统治区内所有的民力，凡十五周岁的男子均被强征。有的村凑不够人数，把少年和老年男子也征去。七八个月也不准回家。还常遭皮鞭毒打。民伙们为发泄胸中的愤怒而编的歌谣，在口头传诵。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英勇不屈的战士刘月明

张玉泉

1937年旧历8月15日，年仅13岁的刘月明在山西省灵丘县参加了杨成武、邓华领导的第一军分区，给二连连长王克生当通讯员。

攻打浑源

刘月明参军后的第二天，第一军分区的一个团开到浑源县城附近的大池缸村，做攻打县城的准备工作。这次攻城的目的就是要杀一杀驻城内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天刚亮，二连首先开到城下，偷偷从东南角搭上梯子往上摸。到了城墙上连长叫刘月明传达命令：过钟鼓楼下去打开东城门。这时，敌人开枪射击，司号员中弹，连长脸上挂花，刘月明帽子被打掉，头皮擦伤，血从脸上流下。打开县城后，伤员由老百姓转送到五台山后方医院。

在后方医院，刘月明得到精心的治疗。他的伤痊愈后，遇到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让他留下来当护士。他因想上前线，留下后工作总不安心，当时的医务主任几次劝他要向白求恩很好地学技术。正好这时从阜平医院调来一批女护士，领导才同意他回前线。他在五台山后方医院里干了八个月。回部队后，驻扎在易县。

坚贞不屈

1938年8月初，我独立一师二团二营奉命从驻地易县到宛平县珠窝去接一部分地下工作者到延安。因走错了路，途经我房良一区霞云岭境内夜幕就降临了。营长下令：一连驻在下石堡村；三连驻在堂上村；二连和营部便驻扎王家台村内。不料驻王家台的部队被日伪特务操纵的五、六百名民团连夜包围了。当晚二连司务长去村南沟买菜被民团捉住，当场杀掉，通讯班一战士到村边解手也被捉住杀死。不一会儿又有好几名战士失踪。我营部发现情况危急，想转移出去已来不及了，只好紧急动员，连夜抢修防御工事。没等我军修

好民团就摸进来，被我们打出村口。不久又冲进来，又被我二连打出去。直到午夜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我军弹药基本上用光了。副营长范元春组织了一个加强排往出冲。冲了三、四次均未成功。每冲一次都伤亡不小。营部通讯班12人，只剩下5人，营长又带两个通讯员往西冲，西部两挺机枪雨点似的打来。两名通讯员牺牲，营长受重伤。这时通讯班最后只剩下刘月明和另外两个小战士。拂晓前他们向村西北方向突围。跑到黑土岭被十多个民团包围了。刘月明砸了手中的枪。三个赤手空拳的战士被俘了。

黎明前，民团们把他们三人带到一座小山前的小院子里。扒光了身上已破烂不堪的衣裳。拴上双手，吊到西屋的房椽上。锁上门就到北屋睡去了。他们本来又饿又累加上吊着，痛苦难忍，只好顽强地忍受着。

太阳爬上东山，两个民团进屋来把两个最小的战士放下来。又绑到山下的沙河滩上，给他们解了绑，让他们自己挖好坑，又把他们绑上推进坑内。那两个家伙慌忙地填上土，两个小战士就这样默默躺在大石河沿岸。那个最小的叫六喜子才11岁，另一个12岁，连姓名都没留下。

埋人的刚进院，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子，满脸麻麻约约的人，是民团小队长，他从北屋出来，命令他们把刘月明放下来，让刘坐在一条板凳上。随后小队长进屋便开始审问：

“你是哪个部队的？当官的叫什么？”

“你从哪里来？又上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

刘月明瞪了小队长一眼，说了三个字：“不知道！”小队长被气急了，瞪起三角眼恶狠狠地说：“他不老实，给我收拾他！”两个家伙把他仰面按在板凳上，耷拉着头，往鼻子里灌辣椒水。一口下去刘月明就昏了过去。匪徒们又用草纸把他熏过来。解开绳子接着审问，还是那几个问题，并利诱他，交待后可在民团给个官做，可放他回家，还可奖励钱粮……刘月明毫不动心，依然咬紧牙关不吱一声。几个匪徒气坏了，上去就是一顿大嘴巴。刘月明被打得鼻口踹血，昏了过去。未等他清醒过来，小队长便令手下把他重新吊起来。

死里逃生

第二天早饭后，小队长带着酒气熏天的味儿，打着饱嗝儿进了西屋，让打手们把刘月明从房椽上放下来。他十分困难地站到小队长面前。小队长脸上充满狰狞和狠毒的表情：“你到底交待不交待？说！不交待马上就拉出去枪毙！”他凶相毕露地叫着。刘月明十分镇定地不欠牙缝。等了老半天，小队长再次怒吼：“交待不交待？”刘月明抬起眼皮欠欠牙缝，说：“不知道！”声音微弱而坚定。

时至晌午。小队长带上一高一矮的匪徒把刘月明绑到大石河滩上，让他冲南岸一小山前跪下。高个匪徒距他十多步远把枪口对准刘月明的头扣动了板机，子弹“嗖——”的一下从耳旁擦过，刘月明巍然不动。“你真她妈屎蛋。”小队长骂着从高个匪徒手中夺过枪。“卡嚓”两声把子弹顶上了膛。骄横地说：“瞧我的！”随后瞄准了刘的后脑。当他扣动板机时，枪筒发出“噗”的声音，原来那只老套皮炸膛了，刘月明安然回头偷看一眼，小队长的脸被炸出了血。他气急败坏地吩咐高个子“你看着他。”又转向矮个子：“走，跟我拿片刀去。”说着就走了。高个子坐在河岸上，松心乐意地看着刘月明。

当高个敌人不注意时，刘月明两手和两臂拼命松动绳子。膀子一绷劲，绳子就断了。那匪徒刚一发现，刘月明早挣脱了，刘月明猛起身蹿过河，那高个随手摸起石头追着打过去。刘月明迅速爬上了小山，随手拣了几块石头还击。由于他居高临下，高个子不敢再追了。刘月明在九死一生的时刻争得了生还。

寻找部队

死里逃生的刘月明冲下南山，沿山边往西跑。此时天已大黑，已两、三天未进食水的刘月明四处找干杏

儿、毛桃之类的野果充饥。两天后他跑到涞水县的山南镇，发现一个娘娘庙，只穿个短裤的刘月明钻进庙里取暖。发现泥胎像前供桌上摆着馒头、粉条、炸豆腐等。早已饥肠辘辘的刘月明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躲在泥胎后面休息。半夜后他觉得很冷，又把披在泥胎上的红黄绿布扯下缠在身上。天快亮了，他拿上吃剩下的供品向西南山洼走去。天快黑时他发现山腰里有几户人家，一户门外有两个老太太推碾子。他上前说：“大妈行个好，给点吃的，我走错了路。”那两人二话没说，拿起碾棍，向他打来。刘月明连忙跑掉。天大黑了，他不敢下山，只好再回庙里过夜。天亮后他窥视山下的路上有没有行人。呆了很久才发现两个穿大褂的行人路过。看模样很象他的战友，他大声喊：“站住，不要动。不然我就开枪啦！”说着他拿两块石头一碰。两个人往上一望，问：“你是哪部分的？”刘月明一下听出来了，说话的是他们连的老魏。他高兴地说：“我是刘月明，我走不动了！”他们马上把他背下山。到附近村里找了头毛驴，找了身衣服把已经精疲力竭的刘月明送到了紫荆关部队驻地，住进西陵附近的医院。八路军一分区独立师二团的首长去看望他，称赞他是英勇不屈的战士。

注：根据房山区联社原土产公司党支部书记、离休干部刘月明口述整理。正在成文中噩耗传来，这位英勇不屈的老战士因病辞世。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悼念。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忆上石堡村党支部书记于进深烈士

郑宗雄

于进深，1913年出生在上石堡村一个农民家庭。曾在本村儒学堂里念过书，后在家务农。房、良县政府在长操成立后，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5月，于进深经赵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村里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先后在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中发展了六名党员，并带领党员、群众向敌人和旧村政权展开斗争。

1940年农历10月13日，我一区发生叛变。于进深和村里其他党员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斗争。农历11月11日晚，于进深回村开会时，被本村汉奸发现，向伪军中队长杨大金告密，包围了上石堡村。于进深和其它三名共产党员李甫贵、王兴云、谢景深被捕，被送到南窖村伪军大队部。于进深等同志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农历11月12日清晨，于进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

于进深同志入党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在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中，积极选拔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入党，先后发展了李甫贵、王兴云、谢景和、王水、谢景深、郑修贤、王兴元等人入党，除王水、李甫贵以外其他六名都是青年。经县委批准，于1938年6月，建立了党支部，于进深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谢景和任组织委员，王水任宣传委员。上石堡村党支部，是我房山一区第一个党支部，也是房山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于进深同志，是我区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

支部建立后，于进深同志以支部为核心，对旧村政权开展斗争。当时村政权掌握在赵琪、郑全广、王勤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乱摊派粮款，并从中贪污，群众非常气愤。于进深同志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

决定,必须把村政权掌握起来。党支部在群众中秘密进行宣传工作,利用民主选举的机会,选举于进深同志为村长。把持旧政权的赵琪等人见自己在选举中失败,便拒不交权,不交公章。后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强迫下,才把公章交出来。为了团结他们稳定局势。又安排他们在村担任一些工作。但村支部和村政府给他们规定了三条:一不准他们参与村政大事;二是不准行使村政府的权力;三是对村的财物摊派支出必须经过研究,否则不能动用。赵琪、郑全广等人,不接受批评教育,反而以恩为仇,怀恨在心,秘密与南窖伪大队部程子良勾结。1940年10月一区发生叛变,于进深等四同志被捕杀害后,村政权又落入赵琪、郑全广之手,1941年春,村党组织恢复后,谢景和担任村支部书记兼村长,又把村政权夺了回来,领导群众对他们开展揭发斗争,他们为了开脱罪责,把账烧掉。郑全广、赵琪跑到南窖投敌,后被抓捕归案,被我政府镇压。

1939年,是我区天灾人祸最严重的一年。春天日本进攻上石堡村烧毁民房,夏天山洪暴发,遭受大水灾,秋天闹粘虫,把庄稼吃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这年秋后,于进深同志召开支部会和农会研究讨论,要求地主减租、缓交租,给全村人民减轻负担。以农会的名义,给本村和外村所有出租土地的地主下请帖,请来开会,村里所有佃户,每户参加一个人。村里杀了一头猪,请他们吃饭。在会上一面要求地主减免缓交租,一面对他们进行政治攻势,讲政策,讲形势,这次会开的很成功,全村少交地租40多石。

成立粮食借贷所。一到夏季青黄不接时很多贫苦户没的吃,就得向有粮的富裕户去借,加五贯。劳苦人民借债累累。支部决定以农会的名义成立农民借贷所,从有粮户把粮食借来,再贷给没吃的户,没有利息。全村共集中起来三、四千斤粮食,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的困难,深受农民的欢迎。

支部建立以后,随后将农会、武委会、青年等组织建立起来。李甫贵同志任农会主任,谢景和兼任农会副主任,谢景深任青年主任,王兴云任武委会指导员。机构建立后,各项工作很出色。民兵们加强武装训练,出操列队,站岗放哨,监视敌人。青年学唱革命歌曲。全村一片欢腾。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揭露大汉奸、日伪汪精卫的罪行。写标语,贴标语牌,做汪精卫的木牌像。对教育广大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为抗日救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于进深同志对党对革命高度负责。他经常了解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经常向上级反映汇报情况,取得联系,争取对工作的指导。如1940年10月,一区发生叛变前几天,就给区委写信报告说根据群众反映,有不少的人秘密与南窖日伪军勾结频繁,有叛变的可能,但未引起重视。叛变发生后,于进深立即决定叫党员干部转移隐蔽,有的去门头沟走窑,有的以买牲口为名,转移它村。于进深就地坚持工作,掌握情况;有时到遇子沟亲戚家住几天,或到其它村;有时在山上与敌人、汉奸周旋。

于进深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开辟上石堡村的革命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刘兴

张启林

狼牙:山五壮士舍身跳悬崖,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早已被人们传颂,名扬四海了。与五壮士同举的还有京西矿区的刘兴同志。刘兴是中共党员,抗战初期任房山县南窖区工会主任。1939年4月,他在被敌人

追捕中，子弹打光，砸坏手枪，跳悬崖壮烈牺牲。

“打架能手”

1912年，刘兴出生在京西房山县南窖村。南窖村四面环山，脚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这里的人们，很早以来就以采煤为生。1911年，南窖村边建起了高线（高线是指运煤用的架空索道）站收煤处，专门收购各小窑的煤。从此，该地区的许多村民成了高线站的运煤工人。

刘兴的家境贫寒。为了生存，他自十几岁起就在高线站当了运煤工人。在这里，小孩同大人一样抬大筐运煤，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但童工的工资却是“三个小孩才顶上两个大人的”。资本家的走狗们还时常用鞭子抽打工人。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环境中长大的刘兴，心里积满了对资本家的仇恨，逐渐养成了秉直刚强、嫉恶如仇的品格。他团结赵存等几个工友，出面向资本家的走狗作斗争，经常为工人们“打抱不平”。工人都敬佩地叫他们“打架能手”。

1936年春的一天，一名工人从小窑明明背来200斤煤，可到高线站一称却不足150斤。工人们非常气愤。刘兴、赵存赶到了这里，要求掌柜子（资本家的走狗）给重称，但掌柜子却大骂他们多管“闲事”，愤怒的刘兴、赵存痛打了他，替工人出了气。但资本家到县政府找来了巡警，把刘兴、赵存捆绑押走，关进县牢房，严刑拷打，过了四个月才把他们放出来。

革命先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开始了大规模进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8年2月至5月，八路军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挺进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干部包森来到了南窖地区。包森到南窖后，经常深入到运煤工人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解工人受剥削被压迫的根源。刘兴非常爱听这些革命的道理，喜欢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次他问包森：“要和资本家斗，我们没钱没势又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包森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你们工人利益的，你们工人只有团结在一块，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刘兴在包森的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从一名“打架能手”迅速地成长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38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党在南窖附近的长操建立了中共房良联合县县政府。县政府又设立了南窖区工会组织，任命刘兴为工会主任，赵存为副主任。这是抗战初期在平郊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

刘兴身负重任，革命的干劲非常大。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号召工人们入会。在他的努力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有2000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领取了会员证，许多小窑还建立了工会小组。工人被发动起来了。

在党的教育下，刘兴深深地懂得，工会要发挥作用，必须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办事。南窖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日军又对平西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封锁，使这一地区群众的生活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买一斤玉米面需要20个子，而工人平均一天只挣30个子。工人是在忍饥挨饿的状况下给资本家卖命。10月的一天，刘兴、赵存等工会负责人，找到高线站站长刘秀峰，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可刘却恶狠狠地说：“涨钱没门，你们不干我找别人干。”刘兴领着工人们罢工了。他号召工人们要团结一致，不涨工资，决不复工。他和工人们一起，把运煤的工具藏起来，把被资本家新招来的人也给说服走了。眼看站里的存煤越来越少了，高线

就要瘫痪了，罢工不到三天，资本家就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每个工人一天涨五个子。资本家的威风被打下去了，广大工人从心里拥护工会，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

工人的斗争情绪日渐高涨。在日军不断加紧军事进攻的形势下，以刘兴为首的南窖区工会，又在高线工人中，建立了“黑猛军”的队伍。“黑猛军”的战士们，积极地投入抗日斗争。他们除奸除特，还几次配合八路军打垮了日本鬼子对根据地的进攻。在刘兴的带领下，“黑猛军”的战士们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他们经常排着队，唱着按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进行曲》改编的“黑猛军”的战歌：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刀和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壮烈牺牲

1939年4月，日军纠集重兵对南窖地区大规模进攻，我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西迁，刘兴也随着县政府向西部转移。由于多日奔波、劳累，他病倒了。这天，刘兴正在三角城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养病，由于坏人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他。他连放几枪，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房子，向后山跑去。刘兴孤身受敌，且战且退，不知不觉到了悬崖边上。敌人越来越近了，一名伪自卫团的人喊：“把枪交出来，我们就不杀你，快投降吧！”刘兴怒斥敌人，高喊：“我宁死也不投降！”他射出了最后一颗仇恨的子弹，拿起石头，把手枪砸坏，然后，纵身跳下了悬崖。枪声停了，敌人惊呆了。刘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刘兴的行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他的英雄事迹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辉煌。他牺牲后，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找到他的尸体，但京西巍峨的群山就是他英雄的化身，京西的一草一木永记他的英名。刘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系北京矿务局干部

毛主席为康换保改名

隗瑞艳

在京郊房山区有位离体的老八路，一生中用过两个名字：1943年以前叫康换保，1943年以后叫康自明。后面的名字还是毛主席给起的呢。

1943年下半年，康换保接到上级命令，到革命根据地延安接受新的任务。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问：“听说你在敌占区表现很不好？”康换保一愣，本来就有些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主席笑了，接着说：“因为你表现不好，所以鬼子才要你的人头嘛。”主席的幽默和风趣使他放松下来。主席又说：“你再叫康换保，恐怕不利于今后开展工作，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康换保赶忙应声：“行。”主席想了想说：“就叫康自明吧。自明，自明，只有你自己明白你做的事。”

主席为什么要给康换保改名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东三省。年仅十几岁的康换保离开家乡，参加了县里的抗日游击队。“七·七”事变爆发后，康换保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九师三十四团，活动于河北省石家庄一带。

那天，我方二十八人在磁县与日军五十多人展开了肉搏战。气焰嚣张的日本鬼子疯狂地扑过来，康换保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他急红了眼，抄起小炮筒朝着一个日本兵的脑袋砸去，顿时脑浆迸裂。他眼疾手快地拾起那个日本兵的枪，端在手中怒视着鬼子。这下把敌人震住了，纷纷后退。康换保挺起刺刀朝一个逃跑的鬼子扎去，由于用力过猛，刺刀深深扎入鬼子的后腰，拔不出来。敌兵痛得哇哇怪叫，拚命往前跑。康换保拽着枪在后面追了半里路。第一次与敌人拚刺刀，康换保表现非常勇猛。战斗结束后，领导把这杆枪奖励给了他。

1941年，已当了班长的康换保常常带着战士深入敌后偷袭鬼子，摸情况。一次，他和两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到日军占领下的彭城火车站待机行动。不一会儿，三个日本兵摇摇晃晃地从车厢下来。康换保忽地甩出一个酒瓶子，只听“啊”的一声，一个日寇头部开了花。另外两名战士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两个鬼子，反绑着装入麻袋把他们交给了上级组织。康换保同鬼子作战机智勇敢，在磁县、武安等八县打鬼子打出了名，敌人悬赏几千块大洋要他的人头。

1943年，上级组织要选拔一批干部到延安接受培训，执行新的任务。组织上考虑到康换保的作战才能以及在当地暴露了身份，决定派他去延安。

1949年9月，康自明做为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再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还清晰地记得在延安为他改名的经过。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深入虎穴探敌情

张玉泉

1940年初冬，侵华日军正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扫荡”。驻扎在南窖据点的日伪军也纠集在一起不时向霞云岭一带进犯。我房良县游击大队决定端掉南窖据点。只是苦于不了解两个岗楼内的敌人数量、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为了弄清敌情，我游击大队决定派一名地下工作者打进岗楼内，摸清全部情况。

我房良县政府所在地的下石堡村有位叫邢德坤的进步青年（曾任该村民兵连长，后任县公安员）。他的大

舅子柏庆珍在南窖大编乡当巡警官，与日本岗楼里的郭翻译官关系很密切，跟南窖岗楼里伪军小队长康庆安关系也不一般。游击大队决定派邢德坤打入敌人内部，通过其大舅子柏庆珍再与郭翻译官、康庆安接触了解第一手资料。

这年深冬，北风呼啸，邢德坤化装成给日本岗楼送水的农民，从水峪村出发，赶着毛驴，混过日伪军的几道关卡的盘查进了南窖据点。卸完水后到警察所找到大舅子柏庆珍说明此行的目的。柏庆珍把他领到村内心家里住下。

第二天，柏庆珍把郭翻译官和康庆安请下岗楼。把妹夫邢德坤引见了一番。在饭馆里招待了一顿。饭后乘着酒劲，康庆安把他们三人带进岗楼打起了麻将。在小队长康庆安的室内，玩了一圈儿又一圈。借着翻译官和小队长上厕所的机会，柏庆珍和邢德坤一声不响地又打起了“一圈儿不寻常的麻将”，柏庆珍把日军岗楼里的人数、重武器、摆放的位置以及日军指挥官的住所，分别用麻将牌码出来。邢德坤一目了然，牢记心中。然后假装找厕所，又在伪军岗楼里察看了一番。对楼内的兵力、武器装备都有了详细的了解。直至午夜时分，伪军小队长康庆安才把他们三人送出铁栅栏门外。邢德坤发现岗楼门口只有一名岗哨。铁栅栏大门两侧分别拴着一只狼狗把门，一有生人出入便张牙舞爪地狂叫起来。下了坡又爬上一个高岗。只见东面山尖上日军岗楼象只巨大的野兽蹲在那里，除楼顶有两个探照灯发现情况时才亮，整座岗楼通体都黑乎乎的。四周的铁丝网有星星点点的小灯，还挂了些罐头筒，一有风吹就发出筒子的碰撞声……

在一个岔路口，柏庆珍和邢德坤与郭翻译官分了路。回到驻地，柏庆珍连夜又把伪军岗楼里副班长以上军官的姓名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给了邢德坤。他把纸条卷成细烟火棍似的插在帽头子里。

第三天傍晚，他继续装扮成送水的民伏闯过一道岗哨，连夜返回我县游击大队驻地，向部队领导做了详细汇报。

邢德坤深入虎穴摸敌情，为我军顺利端掉日伪军的岗楼打下了基础。根据邢德坤提供的情报，我县大队不久便攻克了南窖据点。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普通一兵李春森

李万富

李春森，1903年生于史家营乡秋林铺村一个贫农家庭，从小没上过学，和父母在租种的山坡地里劳动。一年辛辛苦苦，除了交租外，所剩粮食无几，生活困苦不堪。父母说：“咱是穷命人，命里造定，认命忍着吧！”李春森听后一言不发，心里却意识到这个社会的不平。

1926年，李春森告别父母，来到北平。3月18日，李春森在天安门前，看到社会各界人士和高校学生纷纷聚集在广场举行游行活动，抗议北洋政府在大沽口反帝事件中向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懦弱行径，游行队伍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李春森跟随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北洋军阀政府门前时，北洋政府段祺瑞卫队向游行队伍开了枪，四十多人牺牲，一百多人受伤，血流街头。李春森气得咬牙切齿，下决心当兵报效陷入水深火热的祖国。

后来，李春森听人说，南方有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建立国民革命军，他就乘火车南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李春森在军中生活十多年，感到这里的部队并不是自己理想中能救民于水火的部队。1936年的一天，他见排长强奸一名民女，怒不可遏，将那个排长打个半死，随后就开小差跑回家中。

李春森回到家后，村里一些爱国青年聚集在一起，请李春森当教练，教他们一些军事动作，练习刺杀、射击，为以后参加革命队伍打下了基础。

1937年9月，赖富等十二名党的地下工作者由延安来到平西，在原宛平县七、八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建立了平西游击支队。李春森闻讯后来到青白口，找到赖富，参加了支队，后编入邓华支队。

1938年6月，邓华支队和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冀东农民大暴动。正在平西这支主力部队去冀东时，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平西，斋堂成了日军进攻的中心，平西根据地失守。邓、宋支队于10月返回平西，在收复斋堂战斗中，李春森表现英勇，他趁日寇机枪在停火换子弹的空隙，手持“中正式”钢枪，利用地形地物迅速迂回到敌人阵地前，打倒敌射手，端起刚装好子弹的机枪向敌人射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5岁。

抗日政府将李春森遗体装殓后，护送到秋林铺村，并召开追悼大会。在追悼会上，广大群众臂戴黑纱，手持白花。青救会、妇救会、农工救国会及全村老老少少到灵前致敬。念悼词的是小学教员王树山，他念完悼词就跪在灵前发誓：“我是斋堂人，我代表斋堂乡亲向烈士致敬。我们永远记住你这位普通一兵，我们一定会把鬼子赶出中国！英雄李春森，请你安息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系史家营乡莲花庵村村民

郭春元掩护赵然脱险记

郭志凌

1943年深秋的一天夜晚，房涿涿联合县委书记赵然带领傅兴远离开当时县政府十渡，去张坊开会。二人走到中途，不慎被汉奸发现。七十多日伪军为了抓到赵然，疯狂地向赵然二人追来。赵然和傅兴远且战且退。由于赵然身患肺结核病，体力越来越弱。在快撤到瓦沟村口时，敌人已紧追其后，相距五、六百米。傅兴远为保护赵然的安全，便与赵然分开撤退，引开了一部分敌人。

赵然撤进瓦沟村，跑到与他相识的瓦沟村粮秣主任郭春元家门口，敲响了郭春元的柴门。郭春元打开门，看到是精疲力竭的赵然，立即将他扶进屋里。这时，远远地听见村里敌人的喧嚷和枪声。

情况万分紧急，赵然对郭春元说，“敌人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我，我现在走不动了，你是往鬼子那边送，还是往共产党这边送，就交给你了。”

面对这突然情况，郭春元二话没说，背起赵然走出家门，顺着小路，躲开敌人来的方向，踏着漆黑的夜，悄悄地爬上了村后的东山坡。

经过艰难的攀登，郭春元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小山洞，将赵然放下，拉过几把山草铺好，将赵然安顿好，说了声：“你好好等着，我去去就回。”郭连夜返回家中，拿来毡子和被褥，带了些饭食，安排好赵然休息，郭春元才又趁夜赶回了村里。

由于敌人没有抓到赵然，第二天又放出悬赏抓赵然的风声：如果谁交出赵然，“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面对敌人的巨额悬赏，郭春元丝毫不为所动。他象平常人一样，没有让人看出半点破绽。每天趁夜深人静时悄悄爬上东山，给赵然送水送饭，一直坚持了十二天，直到赵然离开。

在郭春元掩护赵然期间，他隐瞒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其中的危险和艰辛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清楚，但他一直默默承担下来。

赵然在恢复体力后，与郭春元即将分手。他拉住郭春元的手激动地说：“春元同志，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没有你的掩护，我可能早就牺牲了，我现在身体恢复了，需要回去继续工作，也好让同志们放心。”二人在洞内挥泪惜别。

为了纪念赵然同志，在十渡“平西烈士纪念馆”内，至今还收藏着郭春元家里那条赵然用过的毛毡。每当看到这块毛毡，人们就会想起郭春元掩护赵然的感人事迹。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陈志牺牲始末

张玉泉

陈志于1921年生，1944年春牺牲。时年23岁。

陈志于1943年3月被房涞涿县委派往八区任区长。当时区公所所在地在今岳各庄乡圣水峪村。

1942年夏末，该区的孤山口村联保主任王森^①接到我区公所的通知，征五千斤小麦送到霞云岭根据地。王森把公粮装好麻袋正准备组织送粮时，被日伪特务孟兆瑞^②发现，报告给驻扎在孤山口村岗楼里的日军小队队长左腾，此事几经周折才被王森掩盖过去，完成送粮任务。事后王森把孟兆瑞告发日军送公粮的情况向我区公所做了汇报。第二天夜里我区公所便派区小队到孤山口去抓孟兆瑞。不料扑了空，孟外出了，便把他的妻子抓来，关在村公所里进行教育，一个月后放回。从此孟兆瑞对共产党更加仇恨。

1944年2月初的一天，孟兆瑞突然来到区公所找到区长陈志，表示要投降八路军，并答应带几条枪来。孟的此次“投降”，还为了开脱罪责，向区长说明告发王森给八路军送公粮的事与他无关，是王森陷害他。孟一再表示如果不让他投靠过来，他愿意给区公所搜集情报，监视驻孤山口村的日军、伪军和警察们的行动。陈表示欢迎。不仅亲自接待了他，还管了晚饭。临走时孟还打听了陈的住所和区公所的人数等情况。

由于陈志到八区任区长不到一年，对孟兆瑞过去的反共行为不甚了解，对他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更重要的是他完全丧失了警惕性，麻痹大意到了一定程度。孟走后，当时就有人提醒陈：孟是来探听情报的，说不定明天一早他就有可能带日军上来，咱们得赶紧躲一躲。陈听后不以为然。

果然不出所料。当夜三时许，孟兆瑞带着日伪军七十人从村东的超岭爬上来，岭上的一道岗哨睡着了没有发现。二道岗哨离陈志等人住处较近，发现敌人上来了才报告，再逃已来不及了。敌人一下就包围了臧凤

望家(陈等人住在臧的两间东屋内)。陈带文书老崔和一护兵突围。陈刚向西跑出百余米,便被乱枪打死在河沟邦上。另一个姓崔的文书向山上跑,也中弹身亡。一护卫扔出大衣向河沟西部方向逃跑。尚有三个区小队战士被活捉,带回孤山口活埋。

到此,八区公所被抄,工作人员大部分牺牲。此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注:①王森当时是孤山口村伪联保主任,应付两方面的工作。

②孟兆瑞充任驻孤山口岗楼日军和伪军特务,房山北窖人,1946年被我处决。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抗战中的张晋龄

唐占忠

夜战小清河

1944年春,张晋龄奉冀中军分区党委指示,以韩营村为根据地,采取各种形式,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鼓舞民众同日寇斗争。一天夜里,他带领武工队、区小队,到平汉铁路侯家坟(今窦店)火车站以南一段进行扒轨、割电话线活动。回来走到两间房村东小清河西堤时,发现有一股敌人从对岸渡河而来,张晋龄立即命令队伍隐蔽在土牛(防汛备用土堆)后边,透过西斜月光观察敌情,以待阻击。

敌人淅沥哗啦趟着河,战士于明刚要开枪被张晋龄阻止说:“别急,等敌人都下到河里再动手”。这时,听到有个敌人沮丧地说:“今夜去韩营掏窝子没抓到张聋子(张晋龄外号),真他妈的扫兴!”另一个敌人解释说:“抓来这两男一女和两车粮食也算有功,能向良乡皇军交待……”。张晋龄听出这股敌人是汉奸地主扫荡团,大喊一声:“打!”战士们跃出土牛象下山猛虎冲进河道。将手榴弹扔进敌群。张晋龄乘机虚张声势地喊:“不要吹号,不要开炮,不要放机枪,要捉活的!”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阻击,认为碰上八路军大部队了,不敢恋战,被我军击毙的随河水飘去,没击中的吓得如惊弓之鸟,爬上东堤拼命朝公议庄据点跑去。

张晋龄和战士们急忙围拢大车,车把式唐占科悲喜交加地说:“要不是你们把敌人打跑,我们就遭殃了!”张晋龄问怎么回事,唐占科接着说:“今天,天刚黑,五间房的逃亡地主陈伦带着扫荡团闯进了韩营,挨家挨户搜查,没有抓到你,后来,在村北炭窑里把武卫会主任刘国珍、粮秣股长韩仲山和妇救会主任商桂英抓住了。五花大绑打得死去活来。逼我和任万良套上大车,拉着他们仨和抢的粮食,连夜送往良乡。”张晋龄急忙让战士上车给受害的村干部解开了绳子,并且安慰地说:“让你们受惊,吃苦了!”平时爱开玩笑的商桂英,一边揉着麻木的胳膊,一边幽默地说:“要不是你张聋子神兵天降,我们仨的小命就剃头的拍巴掌——完蛋了。”逗得人们一阵哄笑。

战斗结束,我军大获全胜。我们缴获三八大盖九支,子弹200余发和一些其他物资。张晋龄指挥战士们、保护着大车,乘着月光,斗志昂扬地返回了韩营村。

护秋保粮

1944年麦收时节,驻良乡的日寇命令汉奸赵文华,到葫芦堡据点指挥宪兵队和地主扫荡团到各村抢粮。

五月初十下午,夏场村交通员到韩营向张晋龄报告说他们村上午被敌人抢走五车小麦。得此消息,区委决定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护秋保粮斗争。第二天上午,张晋龄让武工队员们换上缴获的日军服装同县大队一起出发,当走到任场村东时,侦察员曹贵报告,抢粮的敌人奔西场去了。张晋龄和李景森县长决定分头行动。他带武工队取道直扑葫芦堡西门。守门宪兵一看是良乡来的皇军,不敢阻拦,张晋龄趾高气扬地问:“昨天抢来的麦车在什么地方?”宪兵急忙回答:“徐家大院西边场里哪!”张晋龄一挥手,队伍进村了。走到场边一看,麦车原封未动,只有四个宪兵在场边树凉下玩牌呢。他气势汹汹地走过去,伸手给了一个宪兵两个嘴巴,骂道:“他妈的,你们干什么吃的,麦车为什么不送走!”四个宪兵吓得连连求告:“皇军息怒,赵头(赵文华)说今天再凑几车一块送去。”张晋龄接着斥责:“等着装火车,误事要你们脑袋,这几车我们先押走!”宪兵齐声答应:“是”。五辆麦车押出了西门。走了不远,张晋龄一反常态和颜悦色地对车把式说:“老乡,你们吃苦受惊了,我们不是鬼子,是武工队,搭救你们来了!”几个车把式如梦方醒,悲喜交加,不知说啥好,急忙甩开鞭子催赶牲口,绕道返回了夏场。

再说县大队越过永定河大堤,穿过任场草塘,飞快扑向西场村。进军号吹得震天响,敌人在村里还没来得及开抢,听到号声知道八路军大部队来了,吓得屁滚尿流,向西边小清河逃窜了。我军一枪未发便赶跑了敌人,险被遭抢的西场得救了。以后,敌人未敢出动,我们的护秋保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营救美军飞行员记事

孙寿郃

1943年腊月23日早晨,天空阴沉沉的,下着小雪。上午九点多,一架美军飞机在执行轰炸石景山日军发电厂的任务时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飞机在天上盘旋着,拖着长长的白烟,向现在的河北镇三十亩地村东南方向飞来;冲向村北的山腰。飞行员身背降落伞跳出机舱,徐徐降落在村边的一棵桃树上。失去控制的飞机一头撞在村北的山上,起火爆炸。

时间不长,又一架盟军轰炸机在飞行员跳伞的上空盘旋几圈之后,没有发现跳机的飞行员,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美军飞行员落地后,遇到村里的王福龙,就用手向王福龙示意,请求带他往西边走。王福龙就把他带到距三十亩地村八里远的黄岩沟,跟那里烧炭窑的王凤仪一起,将美军飞行员隐藏起来。事件发生后,驻河南据点的日军接到命令立即向三十亩地方向进发,欲搜寻跳伞飞行员和飞机残骸。

我八路军联络员、三十亩地村民兵连长王凤楼为躲避日伪汉奸的搜捕,刚刚从门头沟鲁家滩的亲戚家潜回村里。听说有个外国飞行员在村边跳了伞;便和侄子王魁月一起到村东南寻找飞行员下落。碰见刚从黄岩

沟回来的王福龙。王福龙把情况告诉了王凤楼。王凤楼顺山路向村东南去寻找。拐过山嘴，不料正与一队日伪军相遇，敌人拦住王凤楼说：“一看你就象‘毛猴子’（指八路军）派来的探子”。并搜遍了王凤楼的全身，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王凤楼说：“不信你们去问问，我是当地的良民。”鬼子的翻译官问：“那你见到一架飞机掉下来没有？”王凤楼说：“我看见了，就在前边的村子里。”鬼子小队队长很高兴，相信王凤楼说的是真的。并且让王凤楼扛上鬼子的机枪在前边带路，前往飞机坠毁的地点。除了挎指挥刀的鬼子小队队长紧跟在他后边，其余的日伪军都被落在后面。王凤楼想，如果被鬼子带到河南据点被汉奸认出来，那就危险了，要早想脱身之计。他回头看了一眼日军小队队长，突然大喊一声：“不好‘毛猴子’来了！”这一喊非同小可，日军小队队长立刻跳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趴下了。王凤楼趁机扔下机枪，凭借树木的掩护，钻进了山沟。待日军小队队长明白过来，王凤楼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凤楼跑到黄岩沟，找到本村的王凤仪。他把王凤楼带到一间草棚子里，那位美军飞行员见到王凤楼立刻站起来，举着手枪，表示要交给他。

这个美军飞行员有20多岁，蓝眼睛，黄头发，高鼻梁，左手举着一个印有中英文的小牌，右手举着手枪，脖子上还挂着指南针。王凤楼不懂英语，也不识汉字。通过他的手势看出：他要往西走，投奔游击区。

王凤楼接过他的手枪，便带着他顺白石口沟到东港村去找宛平游击队的指导员耿子华。驻在东港村的一名游击队员告诉他，耿子华到北峪村去了。他们在东港村吃了一顿小米饭，美军飞行员不会用筷子，王凤楼就自己端着碗喂了他半碗小米饭。

第二天，他们在北峪村找到了耿子华。飞行员非常激动，与王凤楼分手时，执意要将身上带的金表和两个圆形的毒气弹送给他。王凤楼没有接收。

后来，美军飞行员被辗转送往延安。

腊月24日，河南据点的鬼子从各村抓来五辆大马车，用了一天时间，把飞机残骸运走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烽火连天忆当年

宋桂玲 口述 顾梦红 整理

“七七”事变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延安八路军总部先后派人深入平西深山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八路军邓宋支队进驻平西，开始在各村发展党员，建立了民兵和游击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也成立了。我们曹家坊当时属宛平四区。我父亲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以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了。日伪军千方百计要消灭这里的抗日武装，多次进山“扫荡”。

1941年秋天，日军调集兵力发动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房良地区的日寇兵分三路，其中一路从南窖出发，经长操、柳林水绕到史家营。这些人每到一处杀人放火抢粮食，糟蹋妇女，无恶不作。一天凌晨，人们睡得正香，忽听外面枪响，人们从梦中醒来，知道鬼子又来“打包围”了（当时老百姓把扫荡称为打包围）。日寇在山头上架起机枪向村内扫射。村内顿时鸡飞狗叫，乱成一片。惊慌失措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呼喊声亲

人往村外跑。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从山坡上下来,一边叫喊一边打枪进了村。他们存心不让中国百姓过安生日子,见房子就烧,见人就追赶、就放枪,见到牲畜就抢就杀,跟土匪强盗一样。天大亮时,鬼子开始挨户搜查,村里一些老人和妇女儿童争相逃往村南大石崖下躲避。鬼子追过去用枪乱射,许多来不及逃走的人被鬼子杀死刺伤。村里处处冒烟,哭声一片。

那年我才13岁,我娘有病卧床不起,我父亲为游击队送情报还没回来,两个弟弟年龄还小。我们听到枪声喊声,见到火光冲天,都吓得浑身哆嗦,紧紧地依偎在我娘身边。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院外有脚步声,就壮着胆子悄悄下炕,捅开窗户纸往外看。只见东坡、南山坡上都有好多鬼子。他们端着挂有太阳旗的大枪,刺刀和头顶钢盔在阳光下十分刺眼,正在满山遍野追赶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忽然有几个日本兵咿里哇啦地叫喊着进了我家院子,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咣一声,鬼子进了西屋,那是我家厨房和放杂物的地方,我知道他们在砸我家的水缸,又砸碎了铁锅,又到猪圈里用刺刀乱捅,我和娘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肥猪被他们弄死了。他们用绳子捆着血淋淋的猪往外拉,见到几只鸡惊慌乱飞,他们用枪托砸,用刺刀戳。院门口那棵红肖梨那年挂得很密,鬼子也不放过,又摇又用枪打,糟塌个乱七八糟。他们正要闯进东屋,忽然西山坡的鬼子又是晃旗又是吹哨,他们赶紧集合去了。

天过晌午,鬼子撤走了。人们回到村里,房子还在燃烧,鬼子抢来又遗弃的东西满街都是,焦糊味血腥味在空中弥漫。归来的人们呼唤着失踪亲人的名字四处奔走。村里的张二伯、宋老伯和其他七人被打死,被打伤的有二三十人。瑞云寺庙里的张老道和农民陈文月等人被日本人绑走,在斋堂被杀死。我担心父亲的安全,跑到大街上四处寻找。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父亲从村北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我一头扑进他怀里,哭着问:“您遇到鬼子了吗?”原来那天夜里父亲给游击队送情报,半夜时分往回返,快到史家营时,正遇见鬼子从村里出来,他们拦住父亲盘查,问他干什么的,父亲说他是在煤窑干活的。敌人见他满头大汗,浑身灰土,脸上倍儿黑,又没从身上搜出什么东西,就骂了他一声“臭苦力”,踢了他一脚,让他“开路”了。我父亲回到家里,娘高兴得不得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顾梦红系区政协四届常委、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难忘的回顾

罗玉源

1955年,正当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围绕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全国各地开始大力发展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良乡县委、县人委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苏联著名作家巴巴耶夫斯基将来良乡县调查采访建国后良乡县有关党的建设、工农业发展等情况。

5月,巴巴耶夫斯基等来到良乡。良乡县委、县人委的同志向客人们介绍了良乡人民当时贯彻执行党的

基本路线，农村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以及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情况。最后介绍了党政建设情况。巴巴耶夫斯基等听了介绍，表示满意！又提出想进一步调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执行阶级政策的情况，要到基层去实际调查采访。县委、县人委决定叫我陪同去崇各庄公社岗上村进行采访。

我陪巴巴耶夫斯基来到岗上村后，先由村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介绍了岗上村土改后在良乡县组织起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比解放前有了很大发展，社员的生活有了提高，全村人民有吃、有穿、有住，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发展。同时介绍了该村勤俭办社的情况。他们给干部规定了勤政、廉政的规矩：一是集体的钱不能乱花一分；二是村里不设招待费；三是村干部损坏集体的东西要赔偿；四是不以权谋私，还要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最后介绍了土改后贯彻执行对不同阶层实行不同政策的情况。全村当时有120多户，土改时划为地主7户，对这7户地主，按照党的土改政策分给他们每人1份相当贫下中农的土地。使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4户富农按土改政策只征收他们多余的土地、房屋、农具，留给他们相当中农的土地、农具。表现好的也可以经过批准参加农业合作社。为了证实介绍执行政策的实际情况，还到不同的户去采访。先到地主武堂、武士录两家，后到富农武月家，并到了3户贫下中农人家。通过对6户的调查，充实了内容。最后，由村干部带领又到农田参观。

通过参观访问，巴巴耶夫斯基等客人都表示非常满意，用中文说：“我很高兴，满载而归，回去后要写一篇很好的作品。”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陪同陈少敏视察的一天

杜绍文

1961年秋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同志，带着党的关怀来到房山视察工作。我县由当时的工业部长秦芝儒同志和我（当时主持县工会工作）负责接待。

这一天，我们陪同陈大姐视察了房山棉织厂、周口店水泥厂、大韩继锅厂等单位。她不顾体弱多病和劳累，每到一处不仅同干部座谈了解生产和职工学习、生活情况，而且深入生产车间和职工食堂等。同职工群众谈心，询问生产、生活和家庭情况，使职工群众深受感动。凡接触到她的同志都感受到一次陈大姐的爱护和热情关怀。

陈大姐当天为了尽可能多走访些单位，多接触些职工群众，很早就从市内出发，到房山没有休息就深入基层走访，下午很晚才结束。因为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保健医生多次提议她不要过于劳累，可她总是说不累。中午，保健医批评她违犯纪律（来前曾经约法三章）。本来组织上安排她修养治疗，可她就是呆不住，非要下来看看。所以来前她和医生有约法三章：第一活动时间不要过长，以免过于劳累；第二要控制饮食，所以来时自带着全部饮食；第三要按时服药、休息。午饭后，她在医生监督下，不得不休息片刻。她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关怀备至。每到一地除对工作中的成绩给予肯定外，还提出建议。在周口店水泥厂，她走进职工食堂，发现餐厅只有饭桌，没有凳子，就对该厂党支部书记付奎荣说：“老付啊！你能不能做点凳子，职工吃饭时也能稍事休息一下”。付奎荣当时即表示快办。当她看到有些女工从事重体力劳动，就对我说，能不能

给牵个线儿，同棉织厂商量一下，把这里的女工同他们那里的男工对调一下，这样既能对双方的生产有利，又利于女工的身心健康。当她了解到职工很少吃到豆制品时，问秦芝儒：“你们这里适合种大豆吗？”秦回答说：“部分地区习惯同玉米间种”。陈大姐说：“那好，我那里有从东北来的优良品种大豆，产量很高，回去我给你们寄点来，你们找个地方繁育、推广”。过不久，陈大姐就把种子寄来了。她多么希望给职工多增加些营养热量啊！第二年秦芝儒委托一个公社主任安排种植、推广。

经过一天的陪同，陈大姐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平易近人作风，使我们都深受教育和感动。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房山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张广明

在1965年10月份《北京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反映房山人民生产建设的文学作品。开篇大作是著名女作家杨沫的报告文学《徐庆文和南韩继人》，接着是浩然的报告文学《北市人迈开了大步》，诗人李学鳌的南韩继组歌之一《电影之歌》，林斤澜的散文《背篓商店开新花》，本区作者张广明的中篇叙事诗《背篓商店》和那一中的《场院乘凉记》。全部插图是北京画院人物组的集体创造，其中有著名画家尹瘦石的速写。集中了那么多的著名作家、画家，深入房山体验生活，写出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并在同一期文艺刊物上发表，记录下房山人民辉煌的业绩，这不能不说是房山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关于这段史实，李学鳌之子李海鸥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杨沫和李学鳌在一块下乡，到过房山南韩继大队深入生活住了好些天，这是响应当时市委书记刘仁同志的号召而去的，刘仁同志希望作家深入生活生产第一线，写出反映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来。”李海鸥还清楚地记得，去房山那天，杨沫和徐庆文同乘一辆小汽车，途经他家，因李学鳌约好去南韩继。在送他父亲上车时，看见了杨沫和徐庆文一前一后站在路旁的车外等候。杨沫身穿一件蓝色的衣服，和蔼可亲。徐庆文则是一身农民打扮，笑盈盈的。他还请他们到家坐坐。他们说，这次不去了，要赶快到房山去，以后再回来。李海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目送着那辆载有全国著名女作家杨沫和全国劳动模范徐庆文和我那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诗人爸爸的汽车，驶过了西边的护城大桥，向房山方向飞驰而去。”李海鸥的回忆证实了当时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响应市委的号召，深入农业第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写出了反映那火红的年代的文学作品。

杨沫在南韩继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她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我带着渴望求知的心情来到了南韩继”。她对房山这块土地情有独钟。当她走到地里，看到那大片大片的麦田时，不由得惊奇起来，说：“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最好的麦子了”。她认为徐庆文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不怕失败，不怕个人受委屈。她特别赞赏南韩继原野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翠绿色，说这翠绿色不是大自然润染上的，也不是手持谷穗的神仙点化的，它是南韩继人意志与智慧、辛劳与汗水的结晶。

著名作家浩然在三年里曾两次访问过房山。第一次去的南韩继，第二次去了北市村。他对两个村的生产生活了如指掌，能够准确地说出从1961年到1965年夏粮增产的数字。他在北市村和二队的“小保管”路庆辉住一块儿。站在小屋的门口，就可以看到场院一端遮墙蔽树的麦秸垛。为了弄清北市村在大旱之年粮食增

产的“谜”，他访问了好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学习南韩继，因地制宜，扩大复种面积，用新品种，发动群众，团结一心，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科学种田。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们从房山文史中这重要的一页里，得到了很多启示。它不但留下了当时的历史印记，也从中悟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真谛。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伪房山县保安团长张德祥落网记

张成基

1948年12月13日夜，房山县城解放。房山守敌大部溃散，只有以伪保安团长张德祥为首的二百名左右伪军和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等聚集一处，逃窜到南岗洼一带。

这时的长辛店等地全被围攻北平城的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伙残敌想逃进北平已没有可能，就转向东南大红门逃去。沿途怕碰上我军部队和民兵团，十分狼狈，好不容易来到永定门至南苑飞机场的大道上。张德祥琢磨，路东是国民党占领地区，可能比路西安全些，就率残部窜进路东的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他派人找到村里的保长，让其给安排住处。保长推拖不掉，只好说靠村西头有个白菜窖，周围还有些民房和一些放白菜的棚子，这些地方收拾一下可以住。张德祥看后觉得可以，这伙残敌便住下了。

人是住下了，但吃饭成了问题。张德祥一面派人去外面买粮，一面强迫保长去村里各家要粮。保长只得从各户要了一些粮食，只够这伙残敌吃两顿，外出买粮的也没有买来。张德祥更加惶恐不安，最后发现白菜窖内还有四、五十万斤大白菜可以吃，就花钱买些让手下煮着吃，勉强过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张德祥的护兵白玉峰提议说：“张团长，咱们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想解决的办法呀。”张德祥问：“有什么好办法，你就说吧。”白玉峰说：“按大局投降解放军是上策，又怕被镇压；依靠国民党军，已经找不到大门了；向南跑也跑不出去，干脆解散，各奔他乡，省得受这份罪。”张德祥说看几天再说吧。白玉峰看劝说无用，就告诉张德祥要离开这伙残敌先走一步，张德祥答应了。白玉峰离开张德祥后碰上一国民党军残部，几经周折到了南京，后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这时的张德祥已走投无路，被在房、涞、涿、良、固、新、容、永诸县活动的刚起义的我周文龙部发现。周文龙在1938年被国民党“平东抗日挺进军”司令马占山委任为“挺进军十六路司令”。1938年5月，周文龙部又与陈东来部被我冀中军区接收，改编为“人民抗日军”，统带四个大队共两千人，陈东来任司令，周文龙任副司令，部队发展到六、七千人，军需物资由冀中军区供应。后陈东来受敌拉拢，与我冀中军区对抗，于同年11月被处决。周文龙对此不满，便投降了日寇，委任为涿、固、新、房“剿共联防司令”，副司令为王凤岗，被派到房山坨里高线站，编为矿警团。1942年离职。抗战胜利后，周文龙害怕被治罪，去东北沈阳投奔马占山部下，后又投奔安东的我军吕正操部，被我军区联络处委以沈、平、津、保高级情报员，任务是在敌后进行策反活动。1948年9月10日，周与旧部姚瑞亭在平会晤。姚是我平西情报站涞涿分站情报员，与周文龙旧交很深。会晤时，姚让周积极组织敌伪军待机起义，以立功赎罪。周文龙便串联房、良、固、涞、新、容、永、涿、雄各县的国民党残部散兵共两千七百多人，在永定门外被我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

收编。周文龙任改编后原部某团团长，率部驻防永定门一带。

当侦察人员将发现房山伪保安团张德祥部逃到永定门附近的消息报告给周文龙时，周文龙觉得这又是一次立功的机会，决定亲自前往，见机行事，接收改编这股残敌。

12月19日上午9点左右，周文龙带一名办事员，来到张德祥处。二人相见后，张德祥尚不知周文龙已投诚我军，就把从房山逃到太平庄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告诉周文龙，七天来还没有吃上两顿饱饭。周文龙立即对张德祥说，赶快集中队伍到我那里吧，把行李也带上，我给安排住处。张德祥没有别的出路了，便马上集合残部随周文龙来到了周的辖区。周文龙先命人给这伙残敌安排饭菜，然后单独在自己的办公室摆了一桌酒席接待张德祥。

几杯酒下肚后，张德祥猛然想到还不知周文龙现在是干什么的，心中十分害怕。于是叹了口气问道：“周兄，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周文龙说：“我现在是解放军团长，正执行围困北平的光荣任务。”张德祥顿时目瞪口呆，说：“那我算被你活捉了吧？”周文龙说：“此言差矣，在这大势所趋的局面下，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共同完成解放北平的任务，是光明磊落的正道，有什么我活捉你之说呢？”张德祥恼恨地说：“今天你是把我枪毙了呢，还是把我送上去你受功请赏呢，还是把我放了呢？”周文龙说：“看来你对大局没弄清，对小局也糊涂。首先从小局说，我不能杀你，也不能把你算作我的胜利品，交到上级去庆功受赏。从大局来看，国民党彻底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统一全国不可怀疑。辽沈战役结束，东北成了一统，淮海包围圈已形成，平、津、张的国民党这几十万人，经得住这两大野战军的围攻吗？共产党为取得全面胜利，政策特别明确。这些政策对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等人员，提的很是时候。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给我们指出这样的明路，我们为什么不走呢？我对你怎么使用，也有了考虑。现在这个团，就我一个团长。共产党的规矩和国民党不一样，会议特别多，上级有什么事都要向团领导传达，让大家讨论，还经常组织参观、学习，要求领导到连队或前线指导工作。这些别人不能代替，都得团长参加。所以我走后，团内很多事情不好处理，等我回来有些事情就耽误了。我想你来当个副团长，我走后你在团里处理一些事务，就顺利多了，请你考虑。”

张德祥考虑后答应了，并问周文龙他手下二百多人怎么处理，周文龙说：“这支队伍既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现在走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里来了，这是改朝换代了，我们应按解放军的政策办。解放军战士都是由农村中自愿报名参加队伍的，所以叫人民子弟兵，他们出来当兵目的明确，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是无私无畏而来，所以打起仗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国民党部队就不一样了，成份复杂，有的是强制抓来的，有的是在地方上犯了什么规矩受处分而来部队的，总的说当兵的目的不明确，所以逢仗必败。我们今天要改编成解放军了，也要按解放军的规定办。要把队伍集中起来。你讲一下接受改编，我讲一下我们的队伍必须是自愿的。愿意留下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家中离不开，本人身体不好，或不愿意当兵的，提出要求，准许回家，并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留下的人，从团级开始靠后安排，班、排、连、营原来正职的任副职，原来副职的仍安排副职。剩下的人都安排在各班去当战士。这个方案你考虑如何？”张德祥也无话可说，同意这样办了。周文龙将情况向师部作了汇报，师部领导很快就作出决定，同意收编这支残部，并研究了改编方案。首先进行去留的讨论工作，因为在处理俘虏时这项工作很重要。师部立即组织按每班一个人来参加讨论。师部距离不远，人员很快来到，下午一点集中开会。张德祥首先讲了房山县伪保安团已经正式和周团长的解放军合成一支队伍，共同执行平、津大会战的任务。接着，周文龙表示欢迎大家投诚，并做了当前我军围困北平的形势报告。最后宣布了已研究好的人员去留方案。散会后，张德祥带来的二百多人中有八十多人决定回家，留下来的有一百多人。下午四点半吃完晚饭后，要求回家的人交回了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品，领了路费，打了收条，拿着释放证，离开了驻地。

周文龙将剩下的一百多人都编进第三营，并召开三营全体大会，欢迎新战士的到来。接着由新任副团长

张德祥讲话。张德祥本无心投降我军，勉强说了几句文不对题的话。周文龙在会上强调了新老战士要相互团结，最后大家观看了师部宣传队的演出。至此，房山县伪保安团的历史彻底结束。

这时的张德祥仍然惶恐不安，对我军充满了敌意，悬着的心根本不能安定下来。12月20日，周文龙外出开会，张德祥忽然看到了我军关于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文件。他一边仔细翻看镇反文件，一边对照自己以前所做的坏事，越想越感到害怕。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文件中所规定的，确属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之列。张德祥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慌忙换上便衣，绕开门岗，逃出了团部。

张德祥离开我军驻地后，到宣化龙烟铁矿当了一名工人。想从此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从此，他在地处偏僻的红石山矿，终日打眼放炮，清理矿石，并给自己起了车得路的假名。

时间不长，该矿保卫科长（房山人，曾被迫在房山县伪保安团当过兵）在进行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登记过程中，发现这个自称车德路的人对自己的原籍说不清，十分可疑。因为这位保卫科长在伪保安团时曾经见过张德祥，觉得车德路与张德祥长得很相似，可又不敢肯定。这时，他得知房山县公安局正在追捕张德祥，就立即给房山县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请来人审查，希望能带上张德祥本人照片。房山县公安局见信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研究后认定，车德路就是张德祥。在审问过程中，张德祥均供认不讳，被押解回房山。

张德祥被逮捕后，房山县人民法院判处张德祥死刑。本人不服，提出上诉。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50年9月2日，张德祥在房山城西门外刑场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张德祥被镇压后，长沟一带的受害群众曾编了一段顺口溜，控诉张德祥及伪保安团的罪行，并表达了解放后的喜悦之情：

房山伪政保安团，建立以来不保安。
八年抗战降日寇，进攻老区他当先。
奸淫烧杀啥都干，杀死群众不眨眼。
横行霸道家常事，苛捐杂税交不完。
一心反对共产党，多方争取不听劝。
善恶到头终有报，罪有应得万民欢。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在逃难的日子里

吕德芝 口述 孙寿郃 整理

我叫吕德芝，今年75周岁。日本鬼子到河南建据点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住在娘家河北镇东庄子。

记得1938年秋天，河北地区自卫团首领殷耀东投靠了驻坨里的日军。村里人传说鬼子要进山扫荡了。年轻人带着孩子藏到村外山洞里，老人们大多留在村里看家。连着几天光听远处响枪，却不见鬼子过来。我们一家七口和村里乡亲共300多人藏在一个大山洞里。母亲让我每天回村烙三次饼往山洞送。我跟母亲说，太累改两顿吧，母亲答应了。就在这一天，几百名日伪军从东南开过来了。枪声也越来越近。全村人没带一点粮食，只带了三小桶煤油在山洞里点灯用。夜里洞内又潮又冷，小孩随处拉尿，气味难闻。大人们用恐怖

的故事制止孩子的哭闹，男人们蹲在洞口观察着远处的动静。这一夜象熬过了一年。

第二天早晨，孩子们饿得连哭带喊，哭得大人们心焦。父亲对母亲说：“我得出去给孩子们摘几个梨儿吃。”父亲和大哥走出去到中午也没回来。洞里的人们都沉不住气了。因为带来的煤油已所剩无几，如果煤油烧光了，洞里漆黑一片，那就走不出来了。人们陆续往外走。上岁数的人不断提醒年轻人念叨着点儿神仙。后边有人往前喊：“有神仙吗？”前边的人答：“有！”后边的人又喊：“迷着点儿日本人的眼儿！”前边答：“绊着点儿日本人的腿儿！”从洞里钻出来的人各奔东西。我们想进村找找我父亲和大哥。可听从村里逃出来的人说：“千万别进村，鬼子见男人就抓去扛子弹箱子，见女人就……”母亲想把我们兄妹几个带到个清静安全的地方。她想起坨里北上万村有门子亲戚，就顺白石口沟向东北方向走，到三十亩地村时实在走不动了，就从地里掰几个青棒子边歇着边啃。我回头发现远处走过来两个人，我们的心又提了起来，待走近了才看出原来是父亲和大哥。他们从山洞离开我们后进了村，被鬼子抓了伏。村里的大牲畜也都被弄到河南村修据点儿去了。父亲和大哥给鬼子扛弹药时逃出来了，也有的在逃跑时被鬼子开枪打死了。父亲打听到我们的下落才赶到这里。本来一家团圆是高兴的事，但饥饿和疲劳威胁着我们，只能强打精神扶老携幼翻过一坡又一坡往北上万村走。

到了北上万村，这里的情况并不象我们想象得那样安全。枪声也时起时落，特别是夜里的枪声让人心惊肉跳。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既然到哪儿都是死，为什么要死在外边当野鬼？死也要死在家里，和亲人死在一块儿。

一天夜晚，我们又逃进白石口沟里。前边坡上又开火了。山上的枪声很稀，山下的火力很密。我们不敢往前走了，只好等天亮再赶路。

我们一家历经七、八天的逃亡终于回到老家东庄子。日本鬼子掳掠这里的人力和物资在河南村修了据点和炮楼，在河北设了卡子，严格盘查食盐、火柴等八路军紧缺的物资。为了安全，父亲把家里好端端的窗户用石片垒死加固，白天屋里黑咕隆咚的。从此开始了饱受屈辱的生活。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受训

王德泉 口述 王国林 整理

1942年，我十五岁。秋末的一天，我听别人说去参加什么训练，不但管三顿饱饭吃，而且每天还给一斗棒子(老玉米)。为了糊口，想出去闯一闯。征得我妈同意之后，经我二大爷王维祥的介绍(他当时是在村公所当跑腿儿)，第二天和西街住的李德政(当时他20多岁)一块去了周口店火车站附近的三分所，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军事训练。

原来，“三分所”是旧房山县警察局的派出机构。其中，有人专门负责军事训练。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训练各村的骨干。训练的目的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等抗日力量，以维护日伪政权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奴化中国的老百姓。按照“规定”，军训骨干，大村要出两个人，小村则规定去一人。训练开始了，我们排成队列，

由日本兵喊口令。报名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出操上课，训练军事科目。三分所的训练场子有10多亩地面。场子西面靠山，东、南、北三面是用石头垒的围墙，门口有栅栏门，没有岗哨。有时日本人喊了口令，常会出现受训人脸对脸站着，引人发笑。为此，日本人非常恼火，发脾气。对我们煽嘴巴，用脚踢，或用木棒子打人。坨头村一个姓张的小伙子，因为手脚动作慢，被日本兵和狗腿子、汉奸打坏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没法再参加训练，被赶回家。没几天功夫，就先后有三人被打伤送走。

见这情景，我心里发慌，腿发软。我和李德政一块勉强坚持了十一天，实在是难以忍受。就在这时，恰巧又传来可怕消息：我们村的郝二旦，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不知道为什么闯了祸，被日本鬼子放出狼狗活活咬死了！这更使我们心惊胆颤，就暗下了决心——逃跑。晚上我借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和李德政躲过岗哨，猫腰顺墙根走，一块逃出了虎狼窝。

逃走时也想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一回想起受训、挨揍，甚至喂狼狗的可怕下场，就加快了逃跑的步子。

半路上，我与李德政分了手，他逃往别处。我连夜跑回家里。心里害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呆了几天后，没什么风声，我爹就托舅舅找到梨园店郭师傅家当了长工。但我逃脱受训的事儿终于暴露了，一分所的日本人，对村公所十分恼火。后来，我二大爷王维祥反复说好话，上下左右托人“打点”，为我开脱罪名。最后还是罚我家两石棒子（罚粮由梨园店郭家替交的）；又让石楼村公所另外派出我村的李忠去顶替，接受军事训练，才算了事。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军民同仇破强敌

张成基

由于平西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直接威胁着日寇侵华指挥中心北平。1940年2月，日寇从华北各地抽调兵力，到3月初兵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日寇这次进攻平西抗日根据地，目的是彻底实行三光政策，破坏春耕生产，把我党、政、军、民组织摧毁，并将八路军挤出平西抗日根据地，扩大日本在平西的占领地盘。

在这严重形势下，我平西地委向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战斗的号令。号召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保卫平西抗日根据地而战；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战，为保卫春耕生产而战，平西抗日军民遵照这一号令，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扫荡斗争的准备工作。

中共宛平四区区委接到县委通知后，明确指出：日本这次进攻在北三路中，要把宛平四区作为重点，要严加防范，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同时召开各有关单位和各村主要干部的紧急会议。会上动员大家必须增强粉碎敌人进攻、抵抗日寇三光政策的信心和决心。使群众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怎样粉碎和抵抗敌人进攻呢？首先必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按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原则，对进犯之敌，有组织、有领导的依靠武装部队和民兵，适当地予以打击。我们广大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坚壁清野，所有能搬出去的物资和财产，都要转移出去。跟群众讲清楚，千万不要怕费事。特别要动员群众，敌人来了男女老幼都要转移出去，

要提前找好地方，要选全家人都能长期住下来的地方。让群众必须认清，决不可麻痹大意。

会后又组织了工作组，分片到各村帮助贯彻落实。经过大力的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基本上都这样做了。但也有些人，对宣传动员的内容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们是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来是为了打八路军的，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仇呀？对老百姓打几下、骂一顿是难免的，绝不会把人杀光等。还有的说：我们这些破烂东西，他抢了去干什么，要人们都搬出去，真是多此一举。哪村都有这样个别户，谁做工作他都反感，不给好言语，谁也不好再去动员了。

进攻宛平四区的日寇司令部设在红煤厂村。由日本军官三原任总指挥。指挥四百多名日本兵，五百多名伪军，又从农村强征了上千人的民夫和牲口，共达两千人。这是进攻平西北三路中的一路。重点是彻底“扫荡”宛平四区。具体计划定为十四天时间。第一战区，重点是金鸡台村，包括金龙台、金林台、清土涧、西岳台五村，用四天时间。第二战区重点是史家营村，包括大村涧、曹家坊、莲花庵、秋林铺五个村，用四天时间。第三战区重点是柳林水、青林台、杨林水、鸳鸯水，用四天时间，共十四天。

为什么日本这次进攻把第一个重点放在金鸡台呢？因为金鸡台村由1937年底以来至现在，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很活跃。首先是八路军总部派来平西工作队的参谋长赖富，和当地抗日骨干杜春永等，曾九次到金鸡台，宣传抗日救国，并建立了村抗日救国会以及抗日模范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抗日联合会等。这些组织在金鸡台村建立后，很快在全区各村也都建立起来了。每个组织经常组织报告会、讲演会，还上街游行示威，在街道上贴大字标语，散发传单，教唱抗日歌曲，晚上在屋顶或山头广播，每天还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锻炼杀敌本领。所有行动，都是一个目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宛平四区，通过金鸡台发动群众，造成的抗日救国的政治局面，和平西各地一样，给日本进攻造成了很大障碍。金鸡台还是个军事要地，1937年底国民抗日军住在这村，1938年邓华支队也住这村。还在这村和房山九区与六路谈判，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但未成功。1938年冬季从冀东拉过来的抗日联军二千多人大部份住在这村，司令部设在这村，高志远司令在这村住了一年之久。六支队邓华司令曾几次来这村和高志远共商抗日救国的大事。在这个村，积极报名参军的很多，在部队上的骨干也不少。宛平子弟兵团四区分队长董春宇就是金鸡台人。根据以上情况，日本决定，这次进攻宛平四区重点是金鸡台村。

1940年3月8日，日寇和伪军近千人，以及上千人的民夫和牲口，都集中在长操、山川、贾峪口和鸳鸯水四个村。3月9日早五点，日伪军到达了大窖。这是我军部署对他阻击的地点。平西军分区司令部得到日寇要重点进攻宛平四区的情报，就命令主力部队七团二营六连，于3月8日晚进驻大窖，在这深山峡谷、悬崖峭壁之地阻击敌人。当9日早晨五点钟，两军相遇时，在敌人猛烈火力的进攻下，我军实无力阻击，就有次序地组织还击，主要是吸引敌人打枪放炮，以消耗他的弹药。并报警群众，尽快转移隐蔽，为使我军不受损失，保存力量，就主动撤出阵地，向圣米石塘方向转移。敌人的枪炮又打了半个多小时，才停了下来，继续组织兵力向前进发，但再不敢大踏步的前进了。时刻提防八路军袭击，采取了枪炮开路，步步为营的办法。日伪军在进攻的同时，对沿路老百姓住户进行搜查，实行烧杀抢掠。

大窖至金鸡台，仅有二十华里。敌人从早六点从大窖出发，由于沿途怕挨打，至下午五点才到金鸡台村。进村后仍是害怕，要进那个院，也得先从门外向院里打几枪，才敢往进走。这个村本来是个大村，又是群山环绕，对面是清土涧和西岳台两个村庄，敌人感到很不安。因而就把大炮支在村后高地上，向距离六华里的西岳台村连打二十多发炮弹，不少房子被炸塌。

日伪军进村后，首先实行了杀光政策。村里的于兴武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大胖子，在村中威望较高，说话算数，自己也就仗着这方面没往远处跑。他哪知道日本的野蛮，在他家门口，被连砍两刀，因脖粗头未砍掉被推倒在后房檐下，喘嘘了两个多小时才断气。敌人在南大街碰见了经常念佛的苗玉和，一见苗合手躬身，日本鬼子不问青红皂白，迎面上去一刀，砍倒在地身亡。在西街又碰见了张显臣，他是一个教会的头目，经

常行善。自己认为日本来了也不会有事，不料和日本一见面，连刺数刀倒地而死。同时敌人又枪杀了给地主作长工的董四光、十九岁的张二岑、平民谭二壮、妇女董永芝、阴阳先生董春雷。进村这一个晚上，敌人在金鸡台村杀死近二十人。

这种惨状，我们的侦察人员看的清楚，听的明白，立即向区委领导汇报。区委组织了工作组，星夜到各村通报。当各村干部及群众得知金鸡台村于兴武、苗玉和、张显臣被杀害的消息，都心惊胆战起来。这才认识到日本来了不跑性命难保，就连那些顽固派也胆小起来。对我们的坚壁清野、人员转移是个很大推动。日本打死一个人，不如拍死一个苍蝇。日本在村中心的场地上，碰到一个从外地来要饭吃、身上无衣的叫花子，十二三岁。二十多个日本鬼子将他围住。先把他踢倒，而后互相踢来踢去，哈哈大笑。后来脚踢不过瘾，就用刺刀挑起来扔来扔去。把小孩的五脏六腑全都扔出甩掉，直到扔成了一团烂肉，方才停止。日本散去不久，被一群狗撕着吃了。

鬼子们第二天搜山到金鸡台村的南半部和近百户的金龙台村，人们都已跑光。金龙台是个分散的山村，在一个八华里长的大沟里。人们住在沟的两旁山坡上，分为低下炉、关帝沟、泡子、甘草崖几个自然片。鬼子搜山到低下炉西山坡上遇到了石板房村刘玉忠一家五口。看到日本向他们这里来了，刘的老婆带着三个小孩紧跑，躲在山沟里隐蔽了。五十多岁的刘玉忠，因久病气喘，跑不动，被日本一枪打死。鬼子又搜到了山尖上的甘草崖，是最隐蔽的一个地方。于兴隆一家在自己地上盖了一个小草房，到这里躲避。全家人看到日本攻上来了，于兴隆的媳妇带两个孩子跑出去藏了起来。于兴隆行动缓慢，一出门被日本一枪打死。

第三天，鬼子们又兵分多路搜查金鸡台的北半部和金林台村的红石港、四漫台、盘磨、西岭等村。到西岭片搜查时，张小柱一家人在煤窑里，本来很安全。张小柱想出来看日本怎么活动，刚露头就被日本一枪打死。另一伙日本兵来到金鸡台村的里头沟山坡上一个草铺里，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要强奸。这位老太太坚决反抗，残无人道的日本兵，使劲的把老太太推倒在院子里，摔晕过去。他们转身看到炕上躺着一个青年妇女，二十多个日本兵又要对她强奸，到近前才发现是个半身不遂的病人，气味难闻。他们顿时发火，气急败坏，将这个妇女的两条腿四五个人抱着一瓣两半。众人得知，无不恨之入骨。在金林台和西岭片的山坡上，敌人抓住我游击队的一个侦察员，二十多岁。日本对他审问，我军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数，行动计划等。不说就严刑拷打。但侦察员什么也不说。敌人就将他两只脚脖子用绳子拴上，挂在马的后鞍桥上。拉着他上山坡小路，大小石头成堆，东碰西撞，很快把脑袋摔碎，五脏六腑全都从背后流出，走出几里地后只剩两半截小腿全身骨肉全被道上的尖石和路旁的灌木撕下去了。在这次进攻中，日本在金鸡台、金龙台、金林台三个村中，共杀害我无辜百姓四十二人。

第四天，日本鬼子在十点前，又搜光金林台的于家塌、宋家台两个村。而后向大村涧村进攻。日寇本想在第二战区扫荡时把大村涧作为重点，彻底实行三光。因几年来日本特务多次报告，平西的正规军七团、九团经常在这村住。县大队，二、四区的游击队也经常到这村驻扎。邓华还在这村和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在张成家大北屋开会。该村还是存放公粮的地方。因此定为这次扫荡的又一个重点。因敌人在这三天中搜山很累，民夫全都疲劳不堪，对这村扫荡采取了不进村，用枪炮袭击把全村人全部打死。于是他们就从东南山一条八华里长的大岭上，向这个村猛烈射击。还选了石谷平、塔尖岭、擦擦石、平台上、灰清涧安、碾子坨六个攻击点。日寇打炮结束后，沿着东南大岭蜂拥而来。对可疑的目标，如山坡上的草铺、牛羊圈、大石头根、煤窑口、树林子等都进行步枪打、机枪扫、大炮轰，全面扫荡一遍。因群众听从指挥提前隐蔽起来，全村六百一十二人无一伤亡。

日本在撤出大村涧边界返回金鸡台的路途中，到了西岳台村，进入了少量人家，在下村头进了几户的院子，人们都跑远了，也就一走而过。敌人在晚上回到金鸡台村。

实行抢光，是日本鬼子三大政策之一。日本每次进攻，都要跟每个村子强征民夫和牲口。同时命令每个

民夫来报到时，必须带上篓子，还要带上大口袋。出发前又给民夫下命令，到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必须见什么东西都要抢，特别是粮食和食盐。不论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必须背满背足，回来顺利的交账，否则按不效忠皇军论处。所以日本实行抢光的任务，主要靠民夫来完成。这些民夫到了根据地，见到物品就得往篓子里装。有些聪明人，为表现背满背足，即早就弄些破衣裳、干菜叶子等，打成包装满篓子，有的再顶上一个口袋，就算完成了“任务”。

这次日本进攻的另一个目的是：破坏春耕生产。不仅在时间上给与影响，物质上破坏最大。对锄、钐、铧、镢和各类种子，遇见的全部抢走。看到驴、骡、马、牛各类大牲口，除当地宰着吃了，也都赶走。遇到犁、耧、耙、盖背走费劲，弄去无用，就放火烧掉。这一破坏给根据地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困难。

日本这次住到金鸡台村后，我军立即分析研究，决定对其驻地进行武装干扰，使他昼夜不得安宁。由七团六连和民兵，共同组成两个扰乱敌人的小分队，前后夜都要扰乱敌人一次。我们这样作有两个目的，既消耗敌人的精力，又消耗他的弹药。由七团六连长和四区大队长作具体安排。他们很快编成了两个小队，每队六个组，每组六个人，军队三人，民兵三人。共同又研究出了六个攻击地点。又组织了金鸡台等村民兵共同活动，以他们作向导，于十一点前都进入了阵地。按信号同时开火，步枪、手榴弹同时响起。没有入睡的敌人立即向外打枪，已入睡的敌人，从朦胧中起来，惊恐万状，也朝山上打枪放炮。我们半个小时撤出阵地，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了下来。后半夜两点第二队又向他袭击一次，敌人又打了一个来小时的枪炮。这样使他大部份人都不能再入睡了。敌人在这村住了四夜，每夜都是扰乱他两次。为了不让他掌握我们的规律，每次对他袭击的时间、地点、方法都有改变。后两夜为造成敌人更加紧张，就往靠山梁的院子里扔手榴弹。使他们认为我们要歼灭他们。三天过去了，日军已是人困马乏，惊恐不安。特别是他们的领导者们，了解到这次进攻平西十路之日军，在战斗中无一路取胜。西北战区，由小龙门、双塘涧、至杜家庄，到处挨打。东北战区，由沿河城至竭石地区，遇到十团在苏子岭决战。东西两个战区伤亡都很惨重。十路进攻之敌，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所以这次十路进攻的总指挥人见少将，害怕三原指挥的北路、即宛平四区也造成大的损失，就更不好收拾，决定进攻金鸡台之敌完成第一重点战区扫荡之后，于13日撤出阵地，不再向第二战区史家营一带进攻，立即撤回河北。

我侦察人员在12日夜晚，听到伪军和民夫说：“你们把东西都要装好，明早按时吃饭，不能影响出发时间”，据这种情况断定他要撤。向领导汇报后，我军分析他们的去路，不可能从东边走大安山。也不可能从西边走史家营。只有原路而回。于是就决定，要在离金鸡台村五华里的水湖口，打他一个伏击战。并决定七团六连和区民兵连，要在夜间两点前进入阵地，作好安排。军队按时到达阵地后，将六连战士部署在前沿，民兵安排在便于投手榴弹之处和能够抢送伤员的地方。根据地形地物都作了详细的部署，等待敌人入网。

早晨五点多钟，天刚发亮，敌人起程了。半个小时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就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按原计划把大多数人马放了过去。前后压阵的一百多名日本兵和四五十伪军进入我预定阵地。在卡口处民兵先投了一排手榴弹，断开去路，全线开火。敌人惊慌失措，伤亡不小。他们虽然武器多，弹药足，处在这深山峡谷、沟窄湾多的山涧里，两旁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大队人马和机枪大炮已经过去，也不能调回头来，等于无用。当敌人明白我们是西边向他冲击，急速抢占东方高地，想压住我军。哪知道东山根全是光滑的崖石，寸步难上，有的找到了上山的路口，将要靠近，被我民兵从山头上扔下成排的手榴弹，在他们身旁爆炸，走近者非死则伤，造成了我军打击他的又一个好场面。他又伤亡一批。这时他的轻机枪射击，在南头抢上了一个七八米高的小高地，向我猛力射击。我军集中火力，把机枪射手打死，连人带枪滚了下来。几个战士冲上去夺枪，被敌火力阻击未成。我军又将敌人火力点压住。民兵班长耿宏范，带半个班民兵冲了上去，遇到两个日本兵也冲了过来，被民兵将两个敌人打死，并得了两支三八大盖枪和二万多发子弹。这时耿宏范冲上去，把轻机枪夺了过来，立即向敌人扫射。在这过程中发现西崖根有部分敌军在这里隐蔽，也要强占东方高

地。我军立即指挥山上民兵，向山下扔手榴弹。打的敌军不知所措。当时敌军已无还击之力，我军即喊交枪不杀。这时就有几个敌军举枪过来。将敌人捉了过来，俘获二十四名全副武装的敌军。这时我军发现敌人很快向北方转移，散在北边，各找掩体，向我军射击。这时从前边返回来了近百人的日伪军，虽然他们没有占领有利地形，也是要向我军猛打猛冲的。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军也有一定的伤亡。因而我军立即撤出阵地。这一仗打死日本三十二人，打伤四十多人，俘虏二十四名伪军。

我军撤到史家营村，与当地领导和群众将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十八名战士给每人买了一口棺材，埋葬在村南边的公墓里。史家营村还组织了儿童、青年、妇女等上百人和在场的军队指战员，以及民兵，在军队和地方领导共同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担架队把伤员们抬到蒲洼卫生院进行治疗和养伤。七团的六连指战员带着俘虏过来的二十四名伪军，缴获过来的一挺轻机枪，二十四支步枪，奉命去涑水县的紫石口，向团部汇报去了。

战斗结束，我县区工作组立即进入现场，对敌人扔在满路的粮食和物资立即看管起来。经过领导研究、制定了处理办法。首先按有关村组织群众来收拾这些粮食和物资。凡是骡、马、驴、牛，还有些户主能认的东西，就让各户领回去。凡是无法辨别的，如粮、棉、盐、土豆、萝卜、核桃、杏核、花椒等物，由各村分配到这次受灾最严重的户，或平时生活困难的户。但必须明确，各级组织和个人都不许以各种名义扣留，更不准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有发现，要严肃处理。

在战斗中，民兵们还捉住了一个汉奸叫郭保玉。在审讯中他承认是个日本特务，并受过专门训练。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具体内容很多，主要是对县、区、村的组织都要弄清，特别是各组织的名称、领导干部的姓名、每个干部的工作能力、那一级在那里召开的会议，内容要调查清楚。八路军在那村住，首先要弄清军队番号，从哪里来的，要向那去，执行什么任务等等。这次进攻宛平四区，重点放在金鸡台的情况，大部分是他提供的。经过多次审讯，已弄清他是一个铁杆的日本特务，给日本提供了大量情报，确实罪大恶极。民兵将他押赴莲花庵村下小河边处死。

反扫荡战斗事项处理完毕，区委召开了总结这次反扫荡的大会。全区有关单位及各村的党、政、军、民、学主要领导都来参加。会上有区委书记陈廷禄同志作了报告。他分析这次反扫荡的全面斗争情况。着重讲道，这次反扫荡取得的重大胜利，首先是：七团六连在大窖阻击敌人，虽然没消灭多少敌人，我们却使敌人消耗了大量弹药，拖延了他进攻时间。从大窖到金鸡台二十华里，两个小时的路程，让他走了十一个小时，耽误他九个小时。他驻在金鸡台四夜，我每夜对他扰乱两次，使他整夜不能休息。造成日寇人困马乏，再没有精力向我史家营、柳林水两地区进攻。这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再者，最后打他这仗，使他损失上百人，其中我们俘虏他二十四名伪军，缴获一挺轻机枪，二十四条步枪，（另外我们民兵还得两支三八大盖）其他军用品若干。特别是把抢走我们的粮食和物资夺回来相当的一部分，这都是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

通过这次反扫荡斗争，增长了知识，学到了经验，群众受到了教训。对今后日本进攻，坚壁清野，人员转移是个很好的推动。我们必须继续发动群众，搞好备战，要时刻准备敌人再向我们进攻，直到取得全面的最后胜利为止。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回顾张家村抗日斗争生活

张进儒 口述 张 珍 整理

我的原籍是京郊门头沟区(原宛平县)煤窝四村的张家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十六岁。卢沟桥事变不久,就派出大批日军向平西门头沟地区侵袭。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四处逃避,流离失所。1937年秋,大量的日本鬼子在离我们村仅十几里地远的抓髻山地区驻扎。当时的国民党卫立煌的第10师、83师和85师跟鬼子打起来。由于国民党火力不足,损失惨重。在煤窝四村周围,到处是尸体和扔掉的枪支、弹药。这仗打了不到一个月,三个师被打垮。

1937年底,八路军包森率我先遣军到了煤窝四村。宣传民族团结,组织抗日救国会。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共同抗日。由于老百姓恨透了日本鬼子,把捡中央军扔的枪,全都自动交给了包森部队。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在包森领导下,收编了原地方自卫团,建起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七团和九团。这支武装部队,为1938年春天共产党领导的宛平县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县政府成立之后,我们煤窝四村和大安山地区的宝坻洼村为五区,后又合并为二区。1937年底。从延安来了两个青年到我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给我们讲耕者有其田,妇女解放,减租减息,团结抗日等革命道理。我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1938年春天,煤窝五区一成立,我第一批就投入了抗日斗争。我担任了张家村青救会主任;又建立武装青年抗日先锋队,我担任队长。我村建立党支部后,我任村党支部书记。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侵扰,我们的“青抗先”共20多名青年在党支部领导下,每天轮流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发动群众作军鞋,组织民兵抬担架,派“青抗先”队员到村边山头上监视日本飞机,以放枪为号,发动群众隐蔽,以免遭日本飞机轰炸。当时村里百姓对参加抗日斗争非常积极,热情很高,我们张家村成了抗日斗争的模范村。

1940年秋天,日本鬼子对解放区发动了大扫荡,把我们村的房屋大部分烧光,把吕家村百十户人家房屋全部炸平,并在吕家村建立了据点。

1940年秋日本大扫荡之后,在门头沟地区的一些重要村镇,如雁翅、军响、沿河城、东斋堂、齐家庄等村建立十几处大据点。有的据点有日本鬼子二三百人。煤窝四村的吕家村也建了据点,主要控制张家村、吕家村和杨家村、杨家峪村及通往房山大安山要道。建据点后,日本鬼子很嚣张,到处烧房、杀人、强奸妇女。吕家村日本岗楼内驻了七十多名鬼子,每天从四个村强要民夫,为他们送水、作饭,打扫房屋、院子。

为了保存力量,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晋察冀军区决定,将正规部队全部集中到敌后,开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县以下党政军留在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当时军区提出了“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三不离”方针,坚持抗战。区委为了集中抗日骨干,我和我们村的主要干部随区委、政府一起在煤窝的西大山后边的通州峪一带活动。为了及时准确掌握敌人活动情况,更有力地打击日本鬼子,区委决定派共产党员张廷森回村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由于日本鬼子要求四村联合建伪组织维持会,区委派党员吕广文、杨兴周二人为正副维持会长,派吕广印任伪合作社主任,非党人士杨子芳为维持会成员,以伪组织为掩护,开展对日斗争。各村还有伪村长,也是由区委暗中指定人担任。我村村长是张廷彦。由于村里任务太大,在党支部书记张廷森的要求下,区委决定让我也回村任职。区委书记李全善跟我谈的话,我知道回村任务艰巨危险,但我还是服从了决定。

我回村当了支部宣传委员和青年救国会主任,二区的煤窝小区的党支部,半脱产,下乡吃公粮,定期为

各村支部讲党课。我的公开身份是日伪张家村青年团的团长。张家村党组织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我们经常以合法的身份为掩护，给日本鬼子送假情报，给我们区县领导送日本活动的真情报。日本鬼子要求四个村每天必须把八路活动情况写成条子送到岗楼上。指挥我们给日本送假情报的是区武工队大队长杜凤鸣和公安员王文汉、于振边。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每天编写假情报，让四个村子轮流送。假情报内容多种多样，一般都是迷惑敌人。例如今天县、区领导要秘密到某个村里去，就向日本岗楼送去今天平安无事的情报。如果区里开会不到各村活动，就送今天八路军要从村里经过的情报。有时日本按情报说的，要出来截击八路，等了大半晌没有见到八路，另一个村又送来八路已从那个村过去了的假情报。使日本鬼子只好空手回岗楼。日本撤回岗楼的路上，一般都要吃山上民兵打的冷枪，或踏上村干部已埋好的地雷，使鬼子感到附近真有八路，以后就不轻易出击了，只是在岗楼内听情报。

村干部为了掌握日本动向，通过据点内的耳目，随时将真实情报送到区县。有一次，日本鬼子计魁利用大雪天到东大山突击搜山，抓获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我们听到这消息后，我和党员张廷度各背上50斤玉米，冒雪连夜送到东大山，还要偷偷过日本岗楼，十几里山路走了一宿，终于把情况报告了上级。区领导听到这消息后，立即紧急集合向西大山转移。等到中午，日本鬼子200多人，到东大山搜山，结果扑了空。

我们还经常向日本鬼子开展宣传攻势。由于日军强迫各村轮流给日本岗楼送水、送柴。区武工队杜凤鸣、王文汉、于振边在村里坐阵，让村里向岗楼报告，说村里来了许多八路，还抓走了人，不让百姓来送水、送柴。由于日本过去出来经常挨冷枪、踏地雷，只好龟缩在岗楼内。一连三天或五天不给送水，日本鬼子渴急了，就偷着出来自己到河边取水。这时，我埋伏好的民兵突然开枪。有一次鬼子出来弄水，有四个被民兵打伤，水也未弄成。这种斗争每月都要搞一两次，迫使日本鬼子哀求村干部为其送水，有力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日本让维持会办合作社（日本叫“株式会社”），这些成员中有许多是区委指派的党员骨干。因此，他们以为日本服务为名，实际为我区县政府筹粮，筹集各种物资，如盐、面粉、原粮、纸张、布匹、油墨等。到时通知区政府来取。取走以后维持会立即向日本报告，说八路突然来了大队人马，有多少人，把维持会及合作社全给抢光了。就这样，有力地支援了区县政府工作和生活的急需。有一次，日本通过探子侦察，说我们送的情报是假的，村里根本没来八路。于是，日本派翻译官到维持会找我和杨家村大嘴田，问那次情报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没说两句话，翻译官怒吼道：“胡说！”并抓起手枪，冲我俩叭、叭就是两枪。我俩本能的随枪响应声倒在屋地上。翻译官对我俩拳打脚踢，非要打死我俩不可。这时在座的村长、维持会的一起担保下次决不再出错。翻译官这才放了我俩。从此，区委为了保存骨干，以张进儒被八路抓走的名义，销掉伪职，转入地下，继续在村里开展秘密斗争。

由于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有利条件，跟日本鬼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使鬼子感到孤立无援，不敢出来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在1943年春偷偷撤走。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丰碑永存 英魂长在

张士功

在房山区 201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矗立着 15 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其中有 7 座碑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烈士建立的。他们分别是：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王家台抗日烈士公墓墓碑、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亭、大安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大安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亭、河北乡革命烈士纪念亭、赵然同志墓碑。

抗日战争时期，平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裹尸沙场，为夺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 年 10 月，为缅怀抗日战争中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房山县人大常委会在房山十渡乡卧龙山建立了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的 16 个金色大字“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由抗战时期的挺进军司令员肖克手书，背面 1200 字的朱红色碑文由房山籍著名作家苗培时撰文，书法家金寄水书写。

1938 年 7 月末，为扭转抗战形势，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命令独立师师长杨成武率队迅速赶到平西。杨成武接到命令后，率部队昼夜兼程，由涞源县直奔宛平的斋堂。8 月 9 日晚，这支部队二团二营的营部和一个连，夜宿房良一区王家台村。当天夜里，地方匪首纠集一千多名匪徒，将王家台村包围。我军在突围中与匪徒激战，50 多名战士英勇牺牲。1939 年 2 月，中共房良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县政府在王家台村修建了烈士公墓，并立墓碑一座。

老帽山六壮士纪念碑亭于 1984 年 2 月 26 日在十渡村老帽山建立。碑文中写道：1942 年春，我八路军六战士在老帽山阻击战，与日寇英勇战斗，弹尽后宁死不屈，跳崖就义。

大安山两座纪念碑亭，分别于 1946 年 3 月和 1968 年建立。河北乡革命烈士纪念碑亭是为纪念王凤祥等 80 多名烈士，于 1964 年在石堂寺建立，1971 年 4 月迁至河北村西。赵然同志墓碑，是为纪念曾担任过房良联合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等职，后于 1944 年 5 月在十渡乡西庄村因病殉职、年仅 25 岁的赵然同志建立的，碑址在十渡乡西庄村。

(《房山文史资料》第 9 辑)

作者系原《燕山油化报》副总编

在抗战的日子里

陈鼎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16日敌机和大炮向房山城内齐轰，顿时城内房倒屋塌，烟火冲天，人呼犬吠，全城乱成一片。人们纷纷扶老携幼冒着炮火四处奔逃。

家住城里的我，逃到琉璃河姑家避难。认为那里有驻军(国民党二十六路孙连仲部)，可以相安。没料不多日，日军沿津浦、京汉铁路两线南下进攻，驻军要转移，姑家也要避难。我当时心急如焚，于是与姑表兄商量，决定参军报国。我俩便向驻本村的二十六路军所属的炮七团要求当兵。起初未被批准，后经再三央求才同意，我当兽医兵，表兄当饲养兵，随军队转移，经历了京汉铁路沿线各地战役，打击了日寇。

日军南侵兵车行经房山大石河下游时，军车陷入泥塘中，就近从双柳树等村抓了二十多个百姓，下河去推车，等把军车推上来后，这些无辜的百姓全部被日军枪杀。

当时敌机逞凶，从早到晚对我军阵地和交通线进行狂轰滥炸。我军行动全在夜间，转移时还有大批难民同路。男人牵畜背袱，老弱妇幼相携，夜行昼息；时有阴雨，泥泞添愁。当时铁桥全被日军炸毁，我军过河全是泅涉。在过新乐河时，部队准备日落后再渡。这时有几百群众拥到岸边，军队先渡河，群众也相继下水，忽然一架敌机轰炸，我军给以猛打，敌机逃去。我因为不会游泳，又加上水流很急，就拽着一辆渡河军车上的绳子，侥幸到了对岸。

1938年春，日军企图打通津浦路，以坂垣师团为主的日军，集结在鲁南。我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一线展开。我随部队参加了台儿庄会战，驻在台儿庄南十二里的岗子村。3月20日，战斗开始后，进行得十分激烈。敌人一面从空中对我方扫射轰炸，一面指挥炮兵轰炸我军阵地，随后用坦克掩护骑兵、步兵进攻。我方将士英勇顽强地进行抗击，采取近战制敌，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同时，我军还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使敌人魂飞胆丧。与此同时，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五军在台儿庄外线侧击日军。至4月6日，我军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的胜利。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我军的抗战精神。

台儿庄会战胜利后，部队转移。我所在的炮七团后勤失掉了联络，在宿县与敌人遭遇，因后勤无战斗力，被敌人打散。我腿部负伤，和表兄一起隐蔽到一个村子养伤，与部队失掉联系。为了生存就帮村里人做些农活换口饭吃。后来和表兄徒步返回房山。不久，我来到市内大中中学读书。因为学校实行奴化教育，我下决心不当亡国奴，便逃出沦陷区。

我过了黄河，来到郑州，考进了黄埔分校七分校，在陕西凤翔入伍训练，同时学习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还学习了外语、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澠池河防线上的十七军。我所在的部队与日军隔河相峙。日军曾以飞机、大炮为掩护，进行强渡，我军占据有利地势，在敌人近岸时，枪炮齐发，敌人船只不能近岸，败回对岸，后我军组织进攻彻底打败了这部日军。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作者系原黄埔同学会房山联络组副组长

送灵记

张广明

1953年2月底,房山县人民政府接到河北省政府转来的政务院通知。内容是:在房山县平峪村停有抗日烈士灵柩一座,要求于3月5日前,派专人护灵,送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

我当时在县政府民政科工作。领导决定,由我去完成。时间很紧,山高路远,当时又没有汽车,我简单地准备一下就出发了。3月1日清晨,我骑车70里路,中午到了张坊乡。和乡民政助理员邵同志说明来意后,向她交待任务:立即准备一具棺木在乡政府等候。我去平峪接灵。因为时间太紧,铁路部门规定过3月5日列车就不再运送灵柩了,所以只好分头进行工作。

3月2日深夜,我到达平峪,找到村干部说明此次运灵的意义和目的,要求协助完成任务。村干部们都支持,并告诉我他们这一带“七·七事变”后就建立起平西抗日根据地。在十渡、平峪、蒲洼等地进驻过两支八路军部队,与当地武工队、民兵一起打击日本鬼子,牺牲过不少战士和群众。据他们回忆,平峪村山洞里停放的烈士灵柩,可能是百团大战时牺牲的一位团长,听说姓刘,也有人说是化名,叫什么没人记得了。乡亲们每年都去那里看看。听说我来是为了把烈士的灵柩送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安葬,他们很感叹地说:“这些烈士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抛家舍业,保家卫国牺牲的,今天全国解放了,是该有个长久安息的地方了。”接着他们又为难地提出,十来年了,去山洞的路很险,不好走,恐怕把棺材抬下来很不容易。我说,已经考虑到这些困难了。乡里已在准备棺材,只把灵骨起出来就行了。于是,连夜找人打着火把就去了。山洞很窄,很暗,只能装进一口棺材。因为时间久了,风吹雨浸木质朽了,用力一掀就开了。在火把照耀下还能模糊地看到尸骨形状。一位年岁大的人,一块一块地检出烈士的灵骨。

烈士的灵骨取出后装在一个用白布缝制的口袋里。由一头毛驴驮着,村里派一名民兵干部跟我一起护送到了张坊。邵助理已经把棺材制做好了。我们把尸骨盛验起来,找了一辆马车,赶到琉璃河火车站,这时天下起了小雨。

列车运灵有个规矩,要填一张表格,上边有一栏和死者的关系。问我和烈士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县政府派我送灵的。如果必须填,就写父子关系吧。我当时只有十八岁,烈士当属我父辈的。

从琉璃河到石家庄约一个小时,火车到石家庄已是4日9点多钟了。办了手续,雇了辆平板三轮车,把灵柩平放在车上,直奔华北烈士陵园。

华北烈士陵园座落在石家庄中山大道的北侧,环境庄严肃穆。在陵园的接待室,我向负责人报告了运灵的全过程,并表达了对烈士的崇敬心情。陵园政委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表示十分感谢,并要我转告地方政府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接着,一位军官请我去洗手净目,然后就领我去瞻仰烈士纪念馆。望着墙上一位位烈士的遗像和条案上陈设的烈士遗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低下头默默致哀。在稍事休息之后,只听一声军号响,全园军官战士集合在门前,由4名战士缓缓地抬起烈士灵柩,迈着沉重整齐的步伐,向陵园深处的墓地走去。此时,我再也忍不住悲痛哭了起来,嘴里默念着:我的父兄长辈们!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安息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

幼小心灵的创伤 ——记日本占领时期三件小事

段汝连

一本《学生字典》

1943年我在顾册小学上二年级。这年夏天的一次国语课上，姚老师让每个学生买一本《学生字典》，这样学习生字就很方便。星期日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冒着小雨，来到房山城内南大街的震中书店买了一本《学生字典》。绿色的封面散发着油墨的气味，心里十分高兴。回来的路上，边走边翻看。翻到最后版权页，有一行小字：“昭和二十一年五月出版”，对“昭和”二字不解其意。

星期一上早自习时，我迫不及待地去问姚老师，“昭和”是什么意思。姚老师说：“‘昭和’是日本的纪年”。我又问：“我们中国人的书为什么不印‘中华民国’而印‘昭和’？”姚老师看了我好半天，没有回答。我看她眼圈慢慢红了，眼里含着泪花，背过脸去，急步走出了教室……

看“洋片”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学生们正在打扫室内外卫生。突然集合钟声响了，我们赶快放下笤帚去集合站队，来到了庙前广场。这时已有很多村民站在那里了。

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站在台上用日语讲了几句话，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接着有两个日本兵把一个大纸箱摆到了台中央，打开纸箱，拿出一摞画片翻开第一页，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富士山的风景画。一个文职官员模样的人用生硬的中国话一张接一张的讲解。

时间一长，学生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后排就有说小话的。这时站在台上的一个日本兵吼了一声，气势汹汹地走到了后排，接着是重重的两记耳光声，哭声……

“不学日语喽！”

二年级第一学期就有日语课了，每周两节，教日语的是常老师。“阿、伊、喔、唉、欧……”从字母学起。随着课程的深入，越学越难，成了最大的课程负担。一边念日语课文脑子里闪现着日本鬼子的凶恶形象，怎么也学不下去。多数同学怕上日语课，怕被老师叫站起来念课文，尤其怕考试不及格，被老师打手板子。

一天，正在上日语课，督学要来“视察”。训育主任慌忙地走进教室，打断了老师的讲课，向学生提示要求“督学进教室，班长要喊起立，督学提问要立正回答……”这时教室就乱了，个个都非常害怕。正在乱中，班长一声“起立”，教室立刻安静下来，督学很有“风度”地走进教室，在校长的陪同下在教室内走了一圈，然后说：“很好、很好”，走出了教室。同学们暗自庆幸：“谢天谢地，督学没提问”。

又是一次日语课，常老师开头第一句话：“日本投降了……”还没听清老师下面说的是什么，教室就沸腾起来了，个个欢呼“不学日语喽，不学日语喽！”

（《房山文史资料》第9辑）